

编号：000536

04319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彙集

1946—1949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粤桂边区党组织文件)

1946.2——1949.5

编 辑：许振泳、官丽珍、卢 文
审 稿：林忠佳
校 对：余 卿、许振泳、廖运泉、林忠佳
编出时间：1988年6月
印刷时间：1988年11月
印刷单位：广州市成教印刷厂
印 数：2000份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第142号

数字资源
PDG

编辑说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汇编了这部文集，作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甲种本第49册编入的是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所保存的粤桂边区党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文件资料，均按原件刊印。

三、编入本文集的文件，均保持原有的面貌和风格，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了若干订正：明显的错字、漏字，编者将正字改加于后，并加“[]”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看不清的人名、地名以“△”代之；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但某些文件，如“区委报告第一号”，则直接改为“粤桂边区党委报告第一号”，不再加注。

五、本文集按年、月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件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使用本文集同志指正。

目 录

- 冻山：南路解放区巡礼**
 (1946年2月) (1)
- 严重抗议南路国民党当局对人民继续扩大内战进行大屠杀**
 (1946年) (7)
- 关于南路问题的研究**
 (1946年) (9)
- 温焯华：关于粤桂边根据地的工作报告**
 ——粤桂边的形势和当前的方针
 (1947年2月24日) (27)
- 吴△△关于南路情况报告**
 ——武装斗争党的组织情况
 (1947年3月12日) (43)
- 对南路工作一点建议**
 ——把解放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发动农民参加武装斗争结合起来
 (1947年3月18日) (60)
- 何灵：“铁胆”死后余音袅袅（湛江通讯）**
 (1947年4月5日) (63)
- △△关于吴同志对区党委及温同志批评意见的报告**
 (1947年4月) (65)
- 二个半月以来国民党军政措施情况**
 ——蒋管区军政情况变化，党的组织工作
 (1947年4月) (70)
- 温△△致吴耀翔的信**
 ——关于敌我情况及解决干部问题
 (1947年5月14日) (89)
- 容关于南路群众斗争情况的报告**

(1947年6月26日)	(95)
林美南给方林的报告	
——南路敌我情况、干部情况和方针政策	
(1947年7月10日)	(98)
李明：革命军民一家亲（南路通讯）	
(1947年7月26日)	(103)
粤桂边区党委关于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的指示	
(1947年10月8日)	(105)
我们对于处理南路问题的意见	
(1947年10日)	(107)
吴△△关于南路工作情况报告	
——1946年5月至1947年10月工作情况及南路党内	
在军事、政权、经济供给等问题上两种意见的分歧	
(1947年12月30日)	(114)
关于建立粤桂边区的军事方案	
——应以云浮山脉为主要发展方向	
(1947年12月)	(195)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茂电信两阳指挥部招兵布告（粤字第□号）	
(1947年)	(199)
南路武装情况	
(1947年)	(200)
关于南路战略据点的地理和经济情况	
(1947年)	(203)
中共南路地委关于广泛发动群众反三征斗争的指示	
(1947年)	(207)
李某对南路工作的意见	
——过去工作的教训和今后工作任务	
(1947年)	(211)
温焯华关于南路敌情问题报告	
——东纵北撤后国民党对我的军事“围剿”和奸细自首政策	

(1947年)	(216)
温京 (丁英) 关于南路工作的报告 ——南路组织领导、工作状况	
(1947年)	(221)
△△关于南路敌我情况的报告	
(1947年夏)	(224)
关于南路各地情况	
(1947年)	(234)
△△关于茂名电白信宜工作报告	
(1947年)	(237)
欧△△关于南路情况给温同志转区党委的报告	
(1948年初)	(242)
海客、阳春民武显威 (阳春通讯)	
(1948年3月)	(254)
吴△△致方方的信 ——粤桂边武装斗争情况	
(1948年4月14日)	(256)
温△△给美南转方方林平的报告 ——敌军和我方情况	
(1948年4月24日)	(261)
南路东征队进军总结	
(1948年4月29日)	(272)
梁△关于化吴武装斗争的总结 ——一年来武装斗争收获及经验教训	
(1948年6月17日)	(279)
黄海关于南路半年来斗争总结 ——东征前后的情况	
(1948年7月)	(312)
丁△关于东挺作战情况谈话材料	
(1948年7月)	(322)

金宗：第一次打大城市（湛江通讯） （1948年8月）	(328)
罗涛经关于南路东征部队工作总结 ——东征部队的组织、四个月来的斗争经过及战绩 （1948年8月3日）	(333)
温△△致方林信 ——刘某被捕后对湛江党的影响 （1948年8月6日）	(348)
星星：论湛江与沙鱼涌之战 （1948年8月）	(350)
南路解放军半年来的总结 （1948年8月）	(353)
粤桂边区党委关于反对宋匪第二期清剿计划等 问题的指示（摘要） （1948年8月）	(357)
丁英给香港分局的信 ——对南路党委领导问题的意见 （1948年9月26日）	(361)
粤桂边区党委关于掌握部队的指示 （1948年9月）	(369)
南路东征队关于政策策略的检讨的总结 （1948年9月）	(371)
局势发展的新阶段 （1948年10月10日报告大纲）	(380)
岑嘉苗对南路解放军的意见 （1948年10月16日）	(385)
林绍贤：粤桂边境人民在血海中（粤桂南通讯） （1948年11月2日）	(391)
温△△致方林信 ——关于干部任职的请示	

	(1948年11月5日)	(395)
梁致方信			
——内部人员情况和工作情况			
	(1948年11月10日)	(397)
超关于南路十万山区工作报告			
	(1948年11月22日)	(400)
炎关于我队占领马关县城的报告			
	(1948年11月25日)	(423)
周楠致方方电			
——金耀烈部归我指挥等事请批准			
	(1948年12月3日)	(424)
林绍贤：十万大山的民兵战（粤桂南通讯）			
	(1948年12月6日)	(425)
丁英对黄其江关于合灵情况报告的意见			
	(1948年12月6日)	(430)
温△△致方林信			
——对分散发展方针的意见和敌情报告			
	(1948年12月8日)	(439)
粤桂南区的形势和当前的方针			
	(1948年12月10日)	(441)
南路两年来工作的检讨			
	(1948年)	(453)
粤桂边区党委关于恢复地方组织处理干部党员历史问题的几个原则			
	(1948年)	(459)
美南关于最近南路工作情况报告			
	(1948年)	(461)
粤桂边区党委关于各项具体工作的原则方针			
	(1948年)	(464)
关于开辟新地区的经验总结			

(1948年)	(466)
关于钦廉四属政治经济情况报告	
(1948年)	(474)
关于南路半年来形势和工作情况报告	
(1948年)	(480)
梁广致中央电	
——收缴陈一林部战果	
(1949年1月)	(524)
中共粤桂边地委工作报告	
——十万山区四个月来敌情和我工作成绩	
(1949年2月3日)	(526)
梁广给香港分局的报告	
——关于保安第十团起义情况	
(1949年1—2月)	(546)
关于连续作战及攻坚战斗的一些经验	
(1949年初)	(558)
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	
——应着重做好敌军下层工作	
(1949年初)	(565)
梁广致统战部并转香港分局电	
——请示处理保十团问题	
(1949年2月18日)	(567)
梁广致中央、中央统战部并转香港分局电	
——俘长山等三个伪乡长、拟释放扩大影响	
(1949年2月24日)	(568)
梁广致中央并转香港分局电	
——关于陈一林近况	
(1949年2月28日)	(569)
梁广致中央电	
——陈一林略历及各方关系	

(1949年3月7日)	(571)
梁广致中央并转香港分局电	
——南路情况	
(1949年3月15日)	(573)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第十八团团部紧急宣告	
——奉命调查地方战犯	
(1949年4月15日)	(578)
古大存致中央统战部并转方方电	
——魏、曾二人准备起义	
(1949年4月15日)	(580)
南军：军队向前进（南路解放区报道之一）	
(1949年4月20日)	(581)
南军：雷州半岛的民兵战（南路解放区报道之二）	
(1949年4月22日)	(586)
南军：记“雷公”（南路解放区报道之三）	
(1949年4月24日)	(590)
杨应彬：粤桂边区军政机构干部人选（草案）	
——第八支队边纵司令部和边区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	
干部人选	
(1949年4月29日)	(594)
梁广致中央并转香港分局电	
——高雷部队一年战绩	
(1949年4月)	(598)
南军：南路人民当家做主（南路解放区报道之四）	
(1949年5月1日)	(600)
粤桂南边地委：军民大动员实施纲要	
——动员工作的重要性、动员工作内容和方法	
(1949年5月9日)	(604)
中共十万山区地委关于建立政权机构的指示	
(1949年5月15日)	(608)

中共粤桂南边区地委关于目前本区形势与今后方针的决议	
(1949年5月15日) (611)
南路人民拥军热 (南路解放区报道之五)	
(1949年5月16日) (622)
周楠致中央统战部、香港分局电	
——敌向我进攻及我之布置	
(1949年5月30日) (628)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茂电信两阳指挥部告粤桂边区民众书	
(1949年5月) (630)
中共十万山区地委关于怎样做农会工作的指示	
(1949年5日) (632)
神州照希关于敌情侦察报告	
(1949年5、9月) (636)

南路解放区巡礼

(1946年2月)

冻山

南路人民是怎样站起来的

我是一个教书匠，当桂林紧急疏散的时候，我离开学校，回到我一别多年的故乡——遂溪来。在桂林时，我不晓得故乡的情形，以为它尚在敌人铁蹄下，所以一路怀着惴惴的心情，冒险似的回到家中；可是，当父亲用欢笑迎接我时，他告诉我故乡已被南路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家中情形已不像我离开时那样困苦，弟妹都参加了解放军工作。我这次归来，本打算看看老父即入内地工作的，这样一来，使我不得不打消这念头，待在家中，直至最近中央军进攻解放区，我才再次离开家乡。

遂溪是南路最贫瘠的县份，全县五分之三是“坭地”，瘴气很重，人民的死亡率很高，因此，许多田地都荒废了。畜牧很发达，平常很穷苦的人，也得养几头牛，但那都是地主寄养的，因为他们要利用牛力种田，就不得不义务给地主畜牧，除了使用牛力和牛粪之外，一切都归地主所有。出产以甘蔗为大宗，但大多数农人在甘蔗未收获前，为了要钱买米，便贱价卖给地主了（叫做卖糖花），所以遂溪的农民一年辛劳也无法养活自己的。但乡保甲长却还天天往他们身上转念头，今天要壮丁，明天要粮响；沦陷后，这些吸血鬼又一变而成为敌人的鹰狗，遭殃的还是他们，于是他们忍无可忍，便在敌后站起来了。

据说最初是遂溪老马村和湿坭塘村几个知识青年和十多个农民组织成功的，当时他们只有十三条土造七九和二条手枪，他们伏击了几

次敌人，得到很大胜利，不久整个遂溪民众都风起云涌了。几个月后，他们已有了二个支队，解放区已扩展至廉江的新塘、东桥，吴川的大洞、白沙、石门，化县的柑村、双牌村、桐庆墟等一带民众全都武装起来了。

这是一支正义的队伍，虽然装备比不上中央军，可是战斗力却比他们的正规军强得多。以南路来说，解放军要算第一个给敌人打击的队伍，它使敌人不敢离开县城和公路线一步，它解放了许多由国民党当局手里不战失掉的土地，如遂溪的界炮墟、洋柑墟、河口墟以及许多村庄，面积约占全县的五分之四强。还有廉江的新塘、三合、竹根仔、龙湾墟、新墟、禾燎塘、南墟、东桥等，面积约占全县三分之二。此外又有化县、吴川等地区。南路人民常常说：“我们全靠它（指解放军）吃饭呀，因为它保护了我们的生命和财产。”

这样一来，日伪和当地统治当局把解放军看成眼中钉，非消灭它不可，因为他们一向横行霸道，苛捐勒索，走私违法的行为，这时都受了限制，不能再像过去为所欲为了，因为人民中有了一个强大而有力的保镖——解放军了。

开荒生产和练兵

次日，弟弟从解放军回来，几年不见面，我几乎认不得武装起来的弟弟了。谈起来，他告诉我说，队伍就驻在离家五里的大宗祠里，要我明天就到他们部队去参观。

第三天的清晨，跟着弟弟走出村边，早雾弥漫的田陇，不断传来频繁的吃牛声和快乐的歌声，充满着一种欢愉的气氛。这是过去农人荷负着沉重的痛苦时绝对不会有的。

弟弟告诉我，这是“共耕社”的社员在犁坡开荒。解放军不只打日本鬼打得好，减除民众痛苦，改善民众生活也是很注意的。在减除民众痛苦方面，在解放区里废除了苛捐杂税之外，又和地主、佃农双方订立了“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办法。据说当初有些地主不肯，又是经过解放军一番深入解释之后才接受下来的。在改善民众生活方面，最显著的就是组织“共耕社”来从事开荒，增加生产。“共耕社”

是由乡队做骨干组成的，加入社的，集体劳作，互相帮忙，不分彼此。这样一来，零星的劳动力便组织起来，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而且耕种之余，还有学习文化的机会，把思想意识也渐渐改造过来了。弟弟指给我看，村外所有荒秃的山岗，现在都开成了一畦畦的梯田，种上了木薯、番薯之类的作物。过去争着占点小便宜，把田陇锄削得狭狭难走的情形也没有了，大路小路都修得平坦整齐。贫农没有牛，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现在规定租来的母牛，生了小犊，主六牧四，始初地主很不愿意，后来见得这样办，农民料理得特别细心，小犊长大得快，母牛也茁壮得多，于是乐于应允实行了。

不久，到了他们的驻地，部队正在上操，弟弟便带我入宗祠里看看他们的连部。部队经常流动，最多两三天又转移一次，虽然这样，还是布置得整齐清洁，象个小学校的教室，挂有黑板，贴有壁报。

下操了，年青的小伙子笑着叫着跑进来。从他们的口音，我知道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有说客家话的，有说吴川话的，也有说“卯卯”声的化州话的，自然，说雷州话更不少。弟弟把陈连长介绍给我认识，他个子很高，满面晒得黑黑的。听说以前是个小学教员，胆子最大，曾用一个手榴弹炸死、炸伤了十多个日本鬼，人很客气，没有半点骄矜的神气。他告诉我：他们训练的主要科目是射击、刺枪、地形地物的利用、夜间动作等等在战场上实际应用的技能，对于制式教练，是不大注重的。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好些游击战争的原则和实战的经验给我听。他说他们战斗力的强，不在火力上，而在政治素质和战斗技能上。一会儿，他们的政治指导员和服务员都过来了，又给我讲了好些部队政治教育的情形。他们特别注重爱民教育，八路军、新四军那种军民关系有如鱼水的优良传统，他们也是承受过来的。政治指导员对我说，兵大哥欺侮老百姓的事在解放区里是绝对不会有，发生了纠纷，只有当兵的向老百姓赔不是。因为如此，所以民众对他们，也亲切得如对自己的子侄一样。

欢愉健康的战斗生活

为了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解放军自己宁愿过最刻苦节约的生活，

住祠堂，晒禾草，已经算是较好的享受了。要不是有坚决热烈的抗日意志，是难以捱受得起的。我在参观当中，曾和好些战士接谈过，奇怪的是他们不但不觉得艰苦，即使是农民出身的士兵也好，都是颇为明白生活的意义的。我看见那些拿惯了锄头的大手竟如此细心与诚恳捧着习字本子，开口闭口都“学习”、“学习”的，才恍然是面对着被解放了的土地上生长着新人了。

当文化教员的那位同志，带我到偏祠去参观他们的中山室，那里我见到了几张四开纸油印的“解放军简报”，字迹的玲珑细致和油印技术的高强，使我为之惊异。听说负责写印的还只是些不够二十岁的大孩子。这份报纸，在解放区里负起了报导时事和教育民众的责任。他们从敌人手里夺到一座军用无线电台，虽在经常行军转移当中，也能迅速获得国际、国内的消息；此外还建立了很好的通讯网，经常有部队的和各地的通讯员替报纸写报导文字。

部队里一定是很注重时事教育的，因为我以后经常见到其他单位也和这个单位一样，频频举行小组读报，有些识字的战士还要替报纸写稿，或拿了报纸去讲解给民众听。

歌声在解放军里也是普遍传播的，小鬼、战士、干部都一样，一有空就张开嗓子唱起来，八路军歌、南路人民解放军军歌以及我在外边听不到的新鲜曲儿，他们都唱得怪纯熟。弟弟对我说：“你怕不相信吧？他们每个人不论识不识字，袋里总是有一本歌本的。”他向坐在树荫下埋头练写字的战士袋里一掏，果然就有一本印得怪漂亮的歌儿。

那晚，我被留在部队里，参加他们的晚会。据说这样的晚会，他们是常常举行的。会场就在祠堂外面的地坪上，参加晚会的除了队伍本身之外，还有当地的乡民，大家挤在一起，亲密得看不出军民的界限了。他们围坐成一个圆圈，圈中间烧起一堆柴火，亮红的火光，映照着几百个洋溢着欢笑的脸孔。节目很丰富，有双簧，有活报，有讲故事，有唱山歌。这些东西外边的晚会也少不了，但是这里的却很多创意，而且内容又都是反映当前的斗争事件的具有宣传教育意义的。如象一个战士唱山歌，他就这样唱道：

“高州烧火化州烟，反动军队烧我村，
有枪不打日本仔，专拉壮丁和索钱！”

与会的民众所见所闻，觉得都是身边眼前之事，所以特别感到亲切，看到反动内战军的暴行，他们会不自觉地流起泪来。

他们就是这样团结了部队，又教育了人民的。

改造中的日俘

南路人民解放军不断打击敌伪，俘获不少日军和伪军。日俘另设收容所收容，进行改造的再教育。对于这些日俘，我曾作过一次访问，由政治部敌伪工作课陈课长陪我去的。

我去访的那一部分，分住在三间平屋里。屋里陈设简单，但很清洁，桌上摆了些文具和特为他们的学习而印的日本课本。除了村外有卫兵负责警戒之外，日俘住在小屋里，出入都很自由。陈课长说，还有些日俘是生病和受伤的，都送到医务所去治疗着。

日俘看见陈课长陪了客人来，都站起身来微笑行礼。听说他们最初被俘获时，态度很顽强，但是解放军优待俘虏的办法释去他们不少疑虑，经过接近谈话，加以启发教育，他们的态度也渐渐改变过来，明白自己也是被压迫阶级中的一份子，被军阀们驱上战场充当炮灰，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刚刚相反的，以后，他们就安心学习，热烈地追求真理了。

其中一人叫做酒井文雄，在日本小学毕业以后，到工厂里做了很久工人，在他身上最可以表现出日俘的改造过程。初时进收容所来，酒井傲慢放肆，故意捣乱，但求速死。后来受教育觉悟过来之后，就在解放军中担任了对日本士兵的反战宣传工作。我们走入他的房间，他正在写日文标语。他停下笔来招呼我们，等不及陈课长替我们翻译，他就打着手势示意。在他的桌上放了些中文书报，原来中国书籍他倒是看得懂的。在坐椅旁边那堵墙上，贴着他自己写的这样的句子：

“以前的酒井是糊涂的酒井，那个酒井死了；
现在的酒井复活过来，
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中国人〔民〕是我的好朋友。”

在学习之外，他们也种种菜，做些劳作。我坐在酒井那里和他笔谈，其他两间屋子里不时有歌声传过来，我虽不懂他们的歌词，但从那歌声所表现的情绪来了解，他们是有浓重的乡愁的。

尾 声

南路人民在年多时间里，使久被压迫凌辱的土地解放了，在这个新生的区域里，虽然不断遭受反动分子的进攻摧残，但各种合理的设施仍旧是有成绩的，纵使是在匆忙的巡礼中，也见到了不少使人兴奋的事物。

可恨的是，正当南路解放区里的军民听到敌人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举行热烈庆祝时，反动派即向他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中央军一五五、一五九、一七五、一八八、新十九等五个师，保一、保十两个团，加上各县杂牌军十万多人，向抗战有功的南路解放区大举进攻，把南路人民又投进血海火坑里。我以一个南路人民的资格，简略报道了所见所闻，希望能把一切污蔑造谣揭穿了，让公正的人士来裁判。

（原载《正报》第41、42、44、45期，1946年2月19、21、25、27日）

严重抗议南路国民党当局 对人民继续扩大内战进行大屠杀

(1946年) ①

全南路人民必须严重注视最近国民党在南路扩大内战的罪行，自从停战协定颁布，停战命令到达南路后，一个月来，国民党毫无执行表示。国民党军队在化县、吴川、茂名、廉江、遂溪、海康、合浦、灵山、钦县、防城等十县，反复进行惨绝人寰的清乡扫荡，更成立了粤桂南区绥靖指挥部，以加强指导清剿“奸匪”为其唯一任务，实行所谓二个月肃清“奸匪”的计划。最近因为广州军事调处执行组快要派员南下，国民党采取什么态度呢？很明显的，依然没有停战的诚意，相反的，采取了继续扩大内战的新阴谋，迅速集结雄厚兵力，加紧进攻“围剿”。并以特务进行暗杀政策，并非法强迫人民自首，下令提早于本月内完成既定的计划，妄想军调处执行组南下之前，消灭南路人民武装力量。却无耻的欺骗人民，说南路已经没有共产党的军队，他们是剿“匪”，下令各机关部队毁掉及涂抹一切反共文件、反共标语，企图这样来掩饰其破坏停战命令，以便利执行扩大内战的新阴谋。今天国民党在南路用来内战的军队，有一五六师四六六团、一七五师五二五团、保安第一团、新由伪军改编的保安第九团、保六大队、保七大队及各县的自卫队、联防队，合计不下一万五千余人。各地政府机关亦配合一致，以反共为施政中心，派遣特务政工队扩大反共的政治活动，造成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夹攻之势。

正当全国和平实现，停战命令在华北、华中已有显著成效，广州

① 原件未署作者。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军调处执行组亦积极展开工作的时候，南路国民党当局，对停战协定竟敢再三违背，公然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和平建国的基本国策，保障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信的自由，并经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原由蒋主席在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中郑重宣布，本会议所通过之各案及施政纲领，是具有全国性的，全国各地不分区域，不分党派，均必须共同遵行。而南路国民党当局竟置之不理，倒行逆施，这是极端严重的一件大事，决不能等闲视之。

我们特此严重抗议南路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协定，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我们站在自卫的立场，坚决反对这里对南路人民进行大屠杀的暴行。今后由此产生一切严重后果，南路国民党当局应负完全的责任。

国民党当局说南路共产党军队复员了，现在已经没有共产党的军队，他们所剿的是“匪”，实际清乡剿匪，没有前后夹击，于下午二时左右接的通知。我英通战士即予敌人以痛击，炮火猛烈，我军始终居于优势。敌见势不佳，且战且退，企图遁走，被我包抄部队抵达敌军右后方，展开火网，予敌以致命打击，敌当即伤亡数十人。我英勇战士复勇猛冲锋，余敌乃举手大呼投降。清理战果，计击毙敌约五十余人，其中连长一人，排长二人；后并俘敌副团长刘友钰等官兵十六名，生俘敌排长二名、指导员二名，及士兵四十六名，共六十六名。缴获重机二挺，捷克轻机六挺，六0炮一门，自动步枪七支，汤姆生冲锋枪四枝，步枪三十二枝，航空的一支，其他子弹二箱，各种子弹六千余发，手榴弹四十二只，枪尾炮五门，雨衣六十多张，其他军用品甚多。

关于南路问题的研究

(1946年)

我们在华东局干训班学习期间，在华东局直接领导下，研究了南路问题，作出以上的研究总结。我们是学习中的初步研究，而不是作任何正式结论（这种结论是要经过正式领导机关作的）。

北撤干部是南路干部的少部份，研究这个问题时，又只是北撤干部中一部份参加，特别是没有南路党领导同志参加，所以，我们所得的材料是不足的，所看到的问题难免是片面的，因此所下的结论难免有错误，希望南路全体同志，特别是特委领导同志作充分的补充和作多多的加以纠正，使南路问题能作出正确结论。

我们分政治、军事、组织三方面来研究。组织方面，把抗战以来直到我们北撤的整个时期，作综合研究；政治与军事两方面，则单只研究雷州半岛沦陷后至日本投降之前这个时期，至其他各个时期，希望地委同志与南路全体同志继续研究，把抗战以来南路党全部历史作全面的总结，我们这个研究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就好了。

我们研究结果，觉得南路工作，在各个时期都发生了各种不同的偏向，在组织上一贯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政治上军事上则左右摇摆不定，而以左倾错误为主。特别是一九四四年六月我们公开建立独立武装之后，左倾盲动主义相当严重，以下分别分析这些问题。

甲、政治路线上

这是我们研究雷州半岛沦陷后至日本投降前这个武装斗争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们工作表现，有两个不同阶段和两个不同偏向。第一阶段是从一九四三年三月雷州半岛沦陷至一九四四年六月我们公开建立独立武装之前，在这个阶段里，我们的工作发生了右的偏向。第

二阶段是公开建立武装至日本投降之前，在这个阶级里，我们的工作，又从右的偏向走到左的偏向。

(一) 第一阶级

雷州半岛沦陷后，南路党发动雷州半岛敌后的游击战争，但在发动游击战争过程中，我们为了“统线”工作，怕得罪国民党，不敢建立党的独立武装，放弃了党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放弃了自己独立自主的立场，或者把军队交给国民党，或者无条件为国民党服务，无条件为国民党巩固地位，发展力量，“为人作[嫁妆]”使自己既失去了发展时机，又上国民党的当，招致党与人民的严重损失。这个错误具体表现在以下一连串的事件上。

1. 深坭塘事件：

深坭塘是遂溪西北方的一个乡，遂溪沦陷后，伪军到该乡虏掠，激起群众的愤怒，我们同志领导群众发动武装斗争，把伪军气走了。后来，又领导群众打退了日寇的三次进攻（每次百余至二百余），发展了武装队伍，组织百余村队（民兵）和二十左右常备队。可是组织常备队的时候，我们怕国民党不同意，不敢由自己同志当队长，为了“统线”，请国民党分子卜建忠当队长。卜当队长后，与遂溪反动头子铁胆暗谋，解散了常备队，缴了一部份枪，下令驱逐我们同志出境，我们为了“统线”，乖乖地把同志撤退了。从此，深坭塘的群众基础与武装组织全部垮了，前功尽费。

2. 界炮事件：

日寇占领遂溪洋青、城日等地之后，界炮、杨柑、豆坡的国民党通通跑了，我们自己不敢出来占天下，抬铁胆结拜兄弟张德安出来当界炮乡长。后来用乡自卫队形式来组织了二十余名武装，队长是一个可靠的同情者，其中全部队员、班长都是自己人。不久，日寇打到杨柑、豆坡，张德安害怕，跑到廉江去，我们看见张走了，不但不乘机“捞世界”，而且认为张走了，我们失去靠山，惶惶不可终日，派人去廉江劝说回来。日寇退出杨柑、豆坡之后，我们又设法拥张德安做杨柑区长，帮助他巩固地位，拉我们的自卫队给他使用，完全服从他的指挥。后来铁胆发觉这个自卫队是我党所掌握，暗谋策划缴枪，

我们已经发觉了这个阴谋，但当张下令把我们队伍调回去缴械时，我们害怕违抗张的命令，“破坏统线”，便乖乖地把队伍调回给他，结果，队长被他请到房子里，拿手枪指着胸膛，迫令把全部队伍缴枪了。

3. 海遂边境联防队事件：

国民党分子陈展在海遂边境江洪、纪众一带组织海遂边境联防大队，我们为了“统线”，自己有枪有人不敢组织独立武装，却拉三十余人枪去参加陈展的队伍，把自己的武装交给国民党指挥。陈展与徐闻县长陈桐暗谋，以调往徐闻抗日为名，拉我们队伍到徐闻去缴枪。我们为了“服从命令”，乖乖地执行陈桐命令，把队伍拉到徐闻去。入到徐闻边境，我们领队同志发觉国民党阴谋，拉着队伍逃回海康，把枪埋起来，人则各自归家，全队垮了。

4. 海三区事件：

我们同志在海三区组织了二个中队的武装（约七十余人），自己不敢独立活动，初则参加在国民党分子的谢云楷的××大队中，交给谢拉着东奔西走，自己完全不能作主。后来又和国民党分子陈宏良合组县自卫大队，我们人数占三分之二，陈人数仅占三分之一，但为了“统线”，抬陈当大队长，自己队伍完全交给陈指挥。不久，陈奉上峰命令，又暗谋消灭我们，幸发觉及时，把队拉出来。

5. 企山岭事件：

企山岭在海三区一个山地，有四十余村（人口不明），我们同志王福秋在那里秘密工作，为群众做很多好事，团结了广大群众，把整个地区的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发动抗日战争，与伪军和平军打了好几次仗。铁胆看见了那里的情形，派爪牙陈班到那里组织挺进队，王福秋同志全心全意帮助他组织武装，一直帮助他把一个大队组织起来，好，“兔死狗烹”，队伍组织好之后，陈班把王福秋同志逮捕起来，送给铁胆杀了。

这个阶段里，我们的武装工作绝大部份都是这样做的，仅仅是卜巢村的秘密游击队三十余人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后来建立独立武装，就是在卜巢村游击队与从陈宏良那里逃出来的二个中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做，一开始我们就坚持自主独立的立场，

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武装，南路的局面就不同了。

这种错误，是执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是执行王明“一切为着统线”，“一切服从统线”，“一切通过统线”的理论的结果，这种路线与理论，实质上是叫自己一切为了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一切通过国民党，完全取消自己的独立性，完全放弃了独立自主的立场，无条件的和蒋介石讲联合，不了解毛主席的方针是一面争取各阶层，又一面坚持独立自主；一面联合，又一面斗争，不了解毛主席这种两面性的正确政策，只顾前面，放弃后面，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二）第二阶段

南路负责同志在重庆报告工作，经中央同志指出南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独立发展武装斗争的方针之后，南路便停止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独立发展了武装斗争。但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中，却又从右倾投降主义走到左倾盲动主义。我们觉得，在这个阶段里，南路工作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犯了错误：

A. 对K斗争与统线政策问题：

首先，在对K斗争问题上，毛主席的方针是：在抗日时期以对日斗争为主，对K斗争为次。在对K斗争上，又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和K进行政治斗争，在自卫原则下和K进行武装斗争。可是我们所做的都违反了毛主席的方针，我们武装斗争以对K为主，而在对K斗争上又超出了自卫原则。

毛主席决定以对日斗争为主的方针，是从中国当时基本形势出发的。当时中国的基本形势是：民族矛盾是当前主要的矛盾，阶级矛盾变成了当前的次要矛盾。一个民族敌人打进了国境，大敌当前，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基本要求是抗日救国，这个基本形势是终抗日战争之局而不变的。毛主席根据这个基本形势来决定党的基本方针：对日斗争为主，对K斗争为次。在某一地区的某个时候，因一时情况变化，一时以对K斗争为主也是必要的，如新四军事件之后，苏北的国民党军队配合日寇大举进攻我们，我们为了打破敌人的进攻，先对K进行自

卫反击，然后回兵打日本，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又如琼崖，驻留在琼崖孤岛的反动土顽军，数年来勾结敌人，向我进攻，为全岛民众所周知，我们拿出一个时候，集中力量向他们进行自卫反击，消灭它，这也是必要的，正确的。但这只是个别特殊地区的一时情况，而不是全国一般如此，也不是在某个地区全程如此。我们南路的形势怎样呢？日寇打进南路，侵占了雷州半岛与廉江，有随时侵占全南路的危险，全南路各阶层人民与日寇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各阶层人民的基本要求是抗日自卫。南路基本形势与全国基本形势是一致的，因此，南路基本方针也应该和全国的基本方针一致，也应以对日斗争为主，对K斗争为次。南路某一地区，如遂溪，由于铁胆的顽军天天向我们进攻，为全南路民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拿出一个时候，向铁胆进行自卫反击，也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也不是全南路一般如此，或遂溪一县全程如此。可是我们南路当时所做的却是另一套，根据陈恩同志向雷州干部传达（是不是特委的正式决定我们不清楚），说今后斗争以打国民党为主，他还说今后的计划，以向合浦、徐闻乃至高州进攻为主要目的。后来，我们的实际行动，也是以对K斗争为主的。在这个阶段里不论雷州半岛敌后，或高廉的国民党统治区，我们都是打国民党多，打日寇、伪军少的。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开进海康，自始至终都是集中全力打国民党（当时特委领导同志指示说，尽量避免与日寇打，完全不和伪军和平队打，全力打国民党军队）。在海康打邓世模之后，又打谢云裳，打谢之前，则进攻徐闻之陈桐，海、徐人民对符永茂的伪军是恨之入骨的，我们对他却完全不打，而去打人民不太反对的陈桐与谢云裳，结果，发动不起群众，以至在徐闻大吃败仗，险些儿全军覆没。全南路的全面武装暴动，是以对K斗争为主的集中表现，武装暴动失败后，又把全力进攻合浦，又是这个方针的继续。暴动失败和主力进攻合浦之后，雷州半岛刚刚重新组织了两个大队，特委又匆匆下令开进廉江国民党统治区打廉江的局面，又是这个方针的再继续。吴化暴动后，周同志下令从雷州敌后的部队，迅速将遂溪主力调上廉江与化北，为了打出廉江与化北的局面，放弃遂溪工作也在所不惜。……这就是对K斗争为主的领导思想。这个方针

执行的结果怎样呢？海康局面打不出，进攻徐闻遭受惨败，武装暴动的失败，使全南路党遭受不可补救的损失，进兵合浦折兵过来。

我们的对K斗争，又超出了自卫原则，全面武装暴动，不是民变形式，而是竖起党的公开旗帜，提出推翻南路反动国民党、推翻独裁统治的口号，是主动向国民党进攻而不是实行自卫，是“无理加兵”，而不是“先理后兵”。因此，暴动就变成了“无理行为”，违反了有理原则，国民党到处宣传说：共产党阴谋推翻抗战政府，夺取政权，捣乱后方，破坏统线。各阶层人民对K这种宣传多表示赞同，一个一贯同情我们的职员对我们说：“人家到处说你们捣乱后方，破坏抗战，有钱人无钱人都说‘是的’，我听了内心难过，但又无词辩驳，明明看着人心丧失，但却无可奈何？”这个暴动的确使党失去了人心，脱离群众。在茂、电、信、合、钦、灵等县的暴动，均没有广大群众参加，甚至暴动后，陈以铁大队开进茂南、茂西，群众拿作土匪打，就是因为我们的行动无理，得不着群众同情拥护的结果。其次进攻徐闻，进军合浦，及至暴动前进军青平，都是超出自卫原则，无理的主动的进攻国民党的行动。拿进军徐闻来说，由于伪军和日军在海康蹂躏人民太甚，引起徐闻人民提高的抗日情绪，徐闻县长陈桐，打退日寇两次进攻，博得了徐闻人民的叫好，我们无缘无故地去打“打日本”的县长，是难于取得徐闻人民的同情的。我军入徐之后，群众到处为陈桐当侦探，很少人帮助我们，使我们被敌人包围而不知，如入黑暗地窖，四面皆敌，几乎全军复没。进攻合浦之损兵过半，进军青平之遭受挫折，局面打不出，群众发动不起来，都是由于“加兵无理”，得不到人民拥护同情的结果。

但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武装。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武装斗争是必要的，不过，用什么形式出现，就要慎重考虑。按常理来说，官逼民反是合情的事情，当时我们在国民党地区发动武装斗争，应采用这种形式（如过去的白石水斗争），民变形式与我们公开主动进攻的形式，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原则，前者是有利行动，后者是无情行动，前者能取得各阶层人民的同情，是能联系群众的，后者为群众所反对，是要脱离群众的。

这也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应该公开主动去进攻国民党，公开主动进攻有时也是必要的，不过在什么情况下进攻就要考虑的。照中国的常理来说，人家打我，我被逼实行自卫是对的，我们主动打他就要依照这个原则，即所谓“先理后兵”，先找到被逼自卫的理由，然后加兵，这种理由如果没有，我们主动去制造也是可以的，不然，无理的（不是被逼自卫的）公开主动进攻，是我们违背“团结抗日”的大前提，人民不赞成，人民会骂我们不实行“团结抗日”的政策，骂我们捣乱，破坏抗战。

其次，由于采取了对K斗争为主，对日斗争为次的方针，因此，在统线政策上也犯了错误。既然是以对日斗争为次，那么，争取抗日的同盟者就成为不必要的了；既然是以对K斗争为主，那么凡是国民党的力量都要打了，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几乎完全取消了抗日同盟者的工作。除了张炎之外（当时也有个别领导同志主张先打张炎后打邓鄂），是一切都打的，领导同志提出“消灭一切国民党力量”，“地主是阶级的敌人，向地主进攻”的口号，全面暴动，是不讲统线政策的最大表现。这个暴动是向南路国民党势力，不分彼此（仅是张炎除外），实行全面进攻。完全采取中立态度的灵山县长陈公沛，我们打到他反动，原来不积极反共的廉江县长王进，也打到积极反共；海康杂牌军大队长谢云裳，原来和我们合作打反动邓以模（海康K书记长），送子弹、供给情报给我们；我们也实行袭击，使人说：“共产党无仁无义，不可以他做朋友。”在这个阶段里，对一切地主、商人都采取敌对态度，杀了不积极反共的黄汝清，引起全雷州各阶层人民的反对，激怒乐民区几十条中立村庄，起来建立反共的“祝家庄”，使我们在乐民区无法立足；很久了与我们携手抗日的朋友杨希德的武装（本来还布置杀他，后来杀不着），激起他反感，组织反动武装，积极进攻我们，使朋友变成死敌，而且由于他的号召，激起杨柑区的土霸也纷纷起来建立反共武装，坚决与我们作战，使我们在杨柑区无法立足。由于黄汝清与杨希德两个事件，使我们在遂溪县西的广大地区上树起了众多的敌人，并引起了不少下层群众的反感，造成雷州半岛敌后斗争的重大困难，便利了敌人巩固遂西半壁山河。由于我们对一切地主、

商人采取了敌对态度（打单、拿贪、抄家、打船……），结果，直接引起了绝大多数地主、商人对我们发生反感，到处骂我们是“土匪”、“土共”，是“杀人放火”，是“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强盗。一个同情分子对我们的同志叹息说：“外面敌人、四方八面都骂你们这件是贼，那件是贼，真是听不入，如何是好！”同时间接引起落后的下层群众的反感。这种错误的统线政策的结果，既多树立了敌人，又脱离了群众。

我们发生统线政策的错误，除了由于对K斗争为主，对敌斗争为次的方针所引起的原因外，最主要还是在思想上缺乏毛主席“利用敌人矛盾，争取多数，孤立敌人，逐个击破”的思想，缺乏“敌人愈少愈好，朋友愈多愈好”的思想，这是小资产阶级冲动情绪的结果，是把感情当政策的结果。

在和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毛主席的方针是：既争取各阶层，又坚持独立自主立场，既联合又斗争。我们在前一阶段里，只讲联合一面，放弃了斗争一面，只顾争取各阶层一面，放弃了要坚持独立自主一面。可是在后一个阶段里，却又走到了另一个偏向，只顾斗争一面，取消联合一面，只顾坚持独立自主的一面，放弃了争取各阶层的一面，从右的偏向走到了左的倾向，两者都是错误的方针，都是脱离了立场，这是小资产阶级在政治情绪上左右摇摆不定的结果。

B. 策略指导方针问题：

关于进攻或退守的策略指导方针问题，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策略指导方针，要正确的估计形势，要正确的估计革命形势（正确的估计高潮与低潮，来潮与退潮）与敌我力量对比。反之，错误的估计形势，错误的估计革命形势与敌我力量的对比，就会产生错误的策略指导方针。

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间，大欧同志从重庆回来以后的南路革命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形怎么样呢？我们的策略指导方针怎么样呢？

我们觉得在这个阶段里，在雷州敌后地区，对革命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是正确的，策略指导方针也是正确的。但是国民党统治区则完全相反，对革命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都是错误的，

因此，策略指导方针也是错误的。

在雷州半岛敌后地区，当时在领导上估计：雷州敌后群众的抗日情绪是高涨的，敌后群众有抗日高潮，但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是悬殊的，我们有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但又未有力量在军事上进攻敌人，打击敌人。因此，我们的政策方针，应该是进攻的，应大量发展游击战争，但又不可在军事上对日寇实行危险的进攻，而以发展力量为主。在这个策略方针之下，我们在雷州与廉江敌后，大量发展了游击战争，发展武装力量。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但是当时对国民党统治区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所决定的策略指导方针也是错误的。

当时国民党地区形势的基本特点是：

(1) 在革命形势上：当时西南交通线与雷州半岛虽然被日寇占领，但是桂东南和南路的高廉二州的茂、电、信、吴、化、合、灵、钦、防等九县全部及廉江大部份都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在各阶层人民的观感上，这个广大地区，仍然是国民党的正统政府统治的天下。占领西南交通线的敌人，因离着一个广大的桂东南，对人民的威胁不大，因而不会引起南路各阶层人民抗日情绪。但是占领了雷州半岛的敌人，一九四四年又占领了廉江与安铺，并经常出扰吴、化边境，有继续进攻高属各县的模样。敌人的侵略，直接威胁吴、化、廉三县的人民，因而，激起了三县人民的极高抗日情绪。我党领导的民众抗日自卫队，开到遂吴边境抗日，张炎自卫队也参加，打退敌人回来，博得群众的热烈慰劳，但是仅仅是接近雷州沦陷区的吴、化、廉三县才能有这样群众抗日情绪，在茂、电、信、合、灵、钦等县，这种抗日情绪是不高的（茂名的学生群众比较高），所以，在局部地区，开始了抗日的来潮；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恶政府“三征”恶政的抽剥，再加以严重的旱灾，造成人民生活的极端痛苦，激起局部的、而不是全局的、既非全南路的普遍现象，亦非吴、化、茂某一县的普遍现象。群众对国民党的斗争要求，还只是达到减税、减粮、减丁，改善目前生活的程度，而未曾达到要求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程度，国民党政府虽然暗中与日寇勾结，但还未在群众面前戳穿，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它还是抗

战政府。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还是次要的。各阶层人民共同的基本要求，是抗日自卫，而不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此，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反对的是不良措施，但还未根本反对其统治。因此，国民党统治区革命形势的特点是：局部的抗日来潮是有的，但全面的抗日来潮是没有的；局部的经济斗争潮流是有的，但全面的经济斗争潮流是没有的，打倒国民党政府的革命高潮更是没有的。在这种形势之下，在吴、化、廉的前线地区，发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条件是有的，但发动全面的抗日武装斗争是没有的；在吴、化、廉等县发动局部的经济斗争的条件是有的，但在全南路发动全面的群众性的经济斗争或政治斗争的条件〔则〕是没有的，发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条件更是没有的。

(2) 在K我力量对比上：日寇从雷州半岛经过化县进攻梧州的时候，国民党的驻军一三一师溃退广西去了，这削弱了国民党在南路的力量；但是国民党的力量也不是削弱到无法维持统治的程度，在高州与中区西江之间，还驻有一个正规师（一五八师），在高、廉各县，还有三个保安团、一个挺进队和各县大小不等的警备队、自卫队等，兵力总共尚有五千至六千人。国民党的力量，不单只在于现有的其外，而且还在于：①军阀、地主、官僚势力的雄厚，阶级斗争尖锐起来，有随时组织反共武装的可能。②日寇只是占领大陆的交通线，只是线的占领，而没有面的占领。国民党的军队，是随时可以通过这条线开回南路来的（我们暴动不久，一三一师就开回来了）。至于我们的力量，当时雷州半岛游击队只有三个大队，不满六百人，吴川一个民众自卫队约百人，吴、化二县有些白皮红心的县自卫队（人数多少不清楚），吴、化、茂、电、信、灵、合、钦等县的地下力量也是很薄弱的，我们的武装队伍战斗力又很差，与K军比较起来，虽然政治觉悟比它强，但配备、作战经验、技术、交通联络等等都是不如K的。所以在力量对比上，敌强我弱的形势是极其悬殊的。

根据这种形势（革命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当时我们在K统治区策略指导方针，基本上应该是防御的，但个别地区（如吴、化、廉的前线）则可以采取局部的进攻（而这种进攻主要的也不是军事上的

进攻，而是政治上的进攻）。在这个策略指导方针之下，我们工作上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在吴、化、廉接近沦陷区的地区，广泛发动群众的武装抗日自卫的武装抗日自卫斗争，同时在吴、化、廉三县发动群众减租、减粮、减丁、减税等斗争，把抗日自卫的武装斗争与群众的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即把民族问题与民生问题结合起来，展开群众性的抗日自卫斗争。在茂、电、信、合、灵、钦等县基本上应是一面坚持秘密工作，一面展开群众的合法斗争，在个别地区，如群众斗争情绪好，可以局部采取官逼民反的民变形式，发动小规模武装斗争，慢慢打下武装斗争的基础。

可是当时南路领导机关对当时南路国民党统治区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对革命形势，认为群众已经达到了不能再继续生活下去，国民党也已经达到再不能继续维持统治下去，列宁所说的三个暴动条件已经成熟了。对敌我力量的对比形势，认为国民党的力量已经不足惧，只要群众普遍暴动起来，就要垮了（决议原文我们没看过，只是从听了口头传达的同志中知道这个大意）。根据这个估计，就在策略指导上决定采取进攻的方针，决定推翻全南路国民党统治的计划，对国民党实行冒险的进攻。首先第一个事件是作出全面武装暴动，推翻全南路国民党统治的计划，命令茂、电、信、合、灵、钦、吴、化八县的党员，全体举行武装暴动，这个暴动很快就失败了。这个暴动失败的结果，八县的地方组织有的全部垮了，有的大部分垮了，损失了大批武装，牺牲了大批干部（如：张世聪、林林、陈以铁、梁洪涛、阮明等重要干部），使党遭受空前的损失，造成今天在合、钦、灵、茂、电、信等县发动游击战争的困难，今天在这些县份打不出局面，就是因为这个暴动招致这些县份力量过大损失的结果。

事实证明，这个暴动计划，是一个错误的盲动计划，根据自己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命令党员举行毫无胜利把握的武装暴动，甚于在自己力量极其薄弱，或敌人统治中心地区（如茂、电、信、钦、合等地）命令党员暴动，结果一暴动起来，立即被敌人消灭了。暴动的事实证明，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①茂、电、信、合、灵、钦等县，参加暴动的是党员与游击小组，广大的中间状态、落后状态的广大群众并

没有参加，这是党员暴动，并不是群众暴动，合、钦、茂、电、信等，参加暴动的人数，多则二百余人，少则百余人乃至数十人。灵山虽然有七百余人，但五百是青年学生与教员职员等，二百是农民，绝大多数都是党员与紧紧团结自己周围的进步分子。吴、化两县，开始暴动时，也是少数的党员与游击小组，后来由于张炎行动起来，打了县府，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情绪，再加以两县群众抗日情绪较高，所以有比较好的群众运动。这证明认为全面革命形势已经成熟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②在茂、电、信、钦、合、灵等县，暴动起来的武装队伍，有的不够数日就被敌人全部消灭了，有的被敌人大部分消灭了，即使吴、化二县千余武装，再加上张炎的武装，也只能生存半个多月，敌人一打即垮了。这证明了对敌我力量估计也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个行动完全是左倾盲动主义的行动，这是玩弄暴动，类似历史上立三路线的暴动计划与新立三路线的盲动进攻计划。

这个暴动计划，其策略指导方针是进攻的（而且是全面进攻），这个策略指导方针，是完全错的。

总起来说，这个暴动之所以失败，一则因为超出了自卫原则，变成无理行动，得不到群众的同情拥护；二则因为策略指导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毫无胜利把握的行动。

有同志怀疑这个结论，说如果没有这个武装暴动，就没有今天吴、化乃至合、灵的武装斗争场面，今天的武装斗争场面，是当时武装暴动打下基础的。这个看法，是片面的看法，他有对的一面，也有错的一面。的确，吴、化等县今天的武装斗争场面，是当时武装暴动打下基础的，这是对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就此下结论说，这个暴动是正确的。另一面的事实证明是，假如当时不是采取全面暴动的方针，而是采取上面所指出的方针（在前线发动武装抗日自卫斗争，并和群众经济斗争相结合，在其他各县则采取一面发动群众合法斗争，一面坚持秘密斗争，以积蓄群众的革命斗争，在有条件的地区，则用民变形式，局部发动小规模的武装力量），则今天南路的武装斗争局面，将更加壮大了，茂、电、信、钦、合等县则不致在今天遭遇这么大的困难，至今打不开局面。这个同志只看到前一面，而看不到后一面，因此，

便发生这个怀疑。

吴、化暴动之后，张炎被打垮了，我们吴、化部队也被打垮了，剩下的遂、廉队伍（及吴、化一些残存队伍），还命令他开进合浦打合浦的局面，建立合浦的根据地，这是策略指导上盲动进攻的继续。

当时形势是张炎队伍与我吴、化队伍被打垮之后，敌人的气焰高了，我们的士气低落了。当时我合浦的情况（敌我力量、群众情绪）又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马上实行退守，把剩下的遂廉部队退回雷州敌后或遂、廉机动地带，休息整顿，保存力量，重新做起。可是当时却不这样做，而把败后残兵推进不明情况的地方硬干，结果，到处吃败仗，五百多人打剩二百左右逃回，在雷州敌后多年工夫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两个大队损失了大半，张世聪、洪荣、梁标等重要干部就是在这个错误进军中牺牲了。

暴动失败之后，敌人回兵“清剿”暴动地区是意中事，张炎惨败与我吴、化部分被打垮的消息传到吴、化人民的耳朵，再加以敌人回兵“清剿”，吴、化人民（乃至茂、电、信等）的革命情绪低落也是意中事。因此我们在暴动失败的地区，在策略指导上应马上实行退守保存力量，留下吴、化的陈以铁、梁洪涛的队伍（约二百人）或则就地分散活动或则退入雷州敌后整训，可是特委对暴动失败的革命形势却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各县的群众革命情绪依然高涨的，各县群众对K的斗争是继续向前发展的，根据这个错误估计，就决定继续普遍发动各县武装斗争的方针，命令陈以铁队伍在两周内重新建立第二支队，因此当敌人回兵清剿吴川的时候，陈以铁的队伍连忙退去茂名，全军复没于茂西，仅得数人生还，大批干部（陈以铁在内）牺牲了，这是策略指导上盲动进攻的继续。

起义失败后，雷州敌后刚刚重新建立了四个中队，不满二百人，特委又命令开到廉江K统治区去打廉江的局面，这又是策略指导上盲动进攻再继续的另一着。

在吴、化等地暴动的时候，特委同志命令海康大队冒险进攻徐闻，这是盲动进攻中的一个插曲。当时徐闻的形势是：①由于伪军与和平队在海康荼毒人民太苦，使徐闻人民群众发生很高的抗日自卫要求，

陈桐积极起来抗日，打退了日寇两次进攻，博得人民好感，抗日自卫是徐闻人民的主要要求，反对陈桐不是主要要求；②当时徐闻有三个大队，何麟书大队曾经打退了日寇的两次进攻，海康的杂牌军也是受陈桐调遣的，徐、海二县K、土顽军共约千二百人左右，且陈桐又是当了十多年县长的本地人，保甲组织严密，地主很多拥护他。我们呢，仅有一个海康大队不够二百人，我们在徐闻群众中的影响又很差，我们仅有两三个乡有组织基础，而基础又很薄弱（不满五十人），又多数是外来的，所以我们与陈桐的力量比对是相差很远的。

根据这个形势可以看出，当时没有立即解决徐闻的条件（发展则可以），我们除了力量比人家弱之外，既不得人和又不得天时（没有革命形势），更不得地利（离遂溪自己地区太远），大举进攻解决徐闻是不可能的。

可是当时特委领导同志却再三下令进攻徐闻，说吴、化已经起义，是进攻徐闻的最好时机，而不了解南路一般形势不是进攻徐闻的决定条件，徐闻本身才是决定条件。可是领导上当时却不客观的估计徐闻的形势，却从一般的形势出发，硬要进攻徐闻，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对徐闻的进攻既不适合自卫原则（违反“有理”原则），又毫无取胜条件（违反有利原则），这就是进攻徐闻失败的基本原因。

C. 发动群众问题：

在发动群众问题上，毛主席的思想是：从解决群众民生、民主问题中，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自动自觉的力量发动起来，自己解放自己。

我们过去在发动群众问题上，最基本的弱点，就是缺乏毛主席的思想，过去我们的思想是：（1）为了谁？这个问题缺乏明确的观点，我们有的是错误的观点：认为革命是为着将来，而不是为着现在，把群众今天的利益与明天的利益对立起来，要求无条件放弃今天的利益，要求群众与党员一样，要牺牲个人利益，遇到群众提出目前问题来的时候，就骂群众自私自利，不了解群众是为了解决暂时的民生、民主问题而参加斗争，是群众革命运动的规律。因此，我们为群众服务的思想是空洞的、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实际的。（2）依靠谁？这个

问题也缺乏明确的观点，我们所有的也是错误的观点，认为革命的天下是靠党与党的军队打得来，我们军队普遍流行一句话：“代老百姓打天下”，而不了解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依靠群众自动自觉的力量。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实际上取消了发动群众的任务，产生了党与军队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

比方，在解放区我们既不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又不帮助群众解决日常生活上的具体困难问题。比方在遂西地区下层干部发动群众成立了区政府、村政府，并且颁布了减租减息、减税、扶助生产条例之后，向上级提出如何具体解决这些问题。领导同志说：“我们现在一切为着武装，这些工作不是当地当时的需要，我们这里不是陕甘宁边区，边区才需要做出一个榜样来向全国宣传号召，我们这里不需要做出一个榜样来向全国宣传号召，我们这里不要这样榜样。”后来群众提出不打租给沿海的反动地主，要求区政府出主意办理，区政府干部向上级指〔提〕出，上级同志说：“不打给反动地主就打给部队。”从此减租减息的政策就搁起来了。山家群众组织了一个百余人的农会，进行开荒（开辟被沙冲了的荒田），无钱买锄头、畚箕，要求部队贷款数万元，问领导同志，领导同志不答应，且骂群众自私自利，部队要钱要紧，不能乱借钱给农民。老马村群众被烧劫之后，群众生活痛苦，要求部队借二百万元来修理运海泥的道路，好使群众改善生产，领导同志同样不答应，老马村干部又向上级反映群众的疾苦，说群众要求解决耕牛、种子问题，上级同志批评他说：“现在最要紧是如何购买子弹的问题，这个大问题你不去想，却偏偏天天想这些琐碎问题。”

后来遂西北区群众纷纷反映：“干部以前无官做的时候，我们共苦同甘，现在官大了，当团长了，忘记我们了，变成官僚了。”

“过去青抗的人多么好呵，现在不知青抗那班人到那里去了。”不但广大群众怨言百出，下级干部也发生不满。

又比方，在我活动地区，我们军队到后，对群众的民生、民主问题也是置之不理的。一九四四年九月间，我们部队开到遂西海乐民区，在广大地区上，没有日寇伪军，也没有国民党势力，我们在那里公开活动了两个多月，除却与一两村搞联防队外，在上层份子兜圈子之

外，对基本群众的民生、民主问题，一概没有提及，对穷人没有做过半点好事。关于如何发动群众问题，在脑子里所想的是组织政工队，开到各村去做空洞的宣传，想凭这些空洞宣传去发动群众。所谓向地主进攻，并不是发动农民自动自觉起来向地主减租减息之类，而是我们部队亲手出马绑地主的“票”，“抄”地主的家，杀地主的头，结果在海山村弄了岔子，激起十几条村组织起“祝家庄”反对我们，使我们无法立足。暴动失败后，我们部队开向合浦去破了国民党的仓谷，不分粮给群众，要群众拿钱来买，给不够钱，不准把谷担去，天天在山上作“武装游行”，群众的民生、民主问题完全不过问，结果到处挨打，无法立足。吃了几次败仗之后，受了过半损失，四散奔逃回来。

在廉江新塘解放区，廉江同志做了不少的贷款救济工作，群众反映说：“共产党真的救穷人”，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是出于恩赐的观点，还不是自动自觉的去从解决群众民生、民主问题中发动群众，所以广大落后群众还是不广泛发动起来。

又比方，我们部队开到海康活动，在海康足足活动了十个月，只是建立了一个空架子的横直十多里的“联防区”。所以造成这个结果，基本原因也是不从解决民生民主问题中去放手发动群众，一天天拉着部队东游西击，所做的仅仅是一些空洞的革命大道理的宣传，给海康人民的印象，仅仅是使人民觉得“红军的军纪比K军好一点”，如此而已，对群众没有做过半点好事，没有为群众解决过一点民生、民主问题。

由于这个缘故，在日本投降之前，我们的部队仅仅能在旧地区中立足，离开旧地区到了新地区我们就象鱼[无]水之鱼，没有靠山，立不下足，打不出局面，这是我们非常惨痛的教训。

抗战初期参加过我们的救亡工作的（如邓成芝），因与我们闹口气，当做反动分子杀了；从K统治区到我们解放区来探亲戚的（如△△△），全无确实证据也当做K的特务了；积极帮助我们发动群众，因与反动分子是亲戚，去过反动份子的家一次的（如郑△△）也当做勾结反动派的人杀了；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职员，一向同情我们的（如黄△△、周△△），也布置杀（后来停止）；捉到乞丐、媒婆怕

是侦探也杀；凡是讲过一句反共的话，甚至讲过一句对我们表示不满的话者杀，凡是与国民党有点关系的人者杀，可疑的特务自然在杀之列了，真是杀人如□，杀到“天怨人厌”！

上下层普遍反映不满：“共产党的红色恐怖，比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还利害。”“这样杀人，地方有多少人够杀”。“这样杀办法开历史先例”。“毛泽东的真共产不是这样做，这是土共产”。甚至到表示同情我们的人也说：“共产党什么我都赞成，但抄家与杀人却不赞成”！

原来我们的思想是认为多杀可以减少敌人，保卫自己，可是事实证明，由于我们多杀了群众认为不应杀的人（而不是杀群众认为应杀的人），结果愈杀敌人愈多，愈杀群众愈反对，增加我们保卫自己的困难。这证明我们所做的违反了事实发展的规律，违反了毛主席的正确方针（毛主席的方针是根据事实的发展规律定出来的），这就是我们锄保政策错误的所在。因此我们的锄保政策就变成了盲动的行动，其结果既多树了敌人，又脱离了群众，这种情形和毛主席“既瓦解了敌人，又发动群众”的目的，恰恰相反。

这是由于我们不了解：（1）杀应杀大多数群众深恶痛绝的坏人，都杀得中肯，杀一可以警百，杀了一个可以分裂拉拢其他（对反动分子、特务皆如此），也可以发动群众，团结群众；（2）宽大了（教育、优待之后释放）大多数群众认为不应该杀的，既可分化敌人（感化他转变思想，改变态度即所谓改清为上，以德化人），又可以团结群众（中国人民的传统思想主张仁爱、宽大、讲究道理，我们宽大得合情合理，群众即同情拥护）。因此，我们就和这些道理（即事情的规律性）背道而驰，弄出错误，招致损失。

D. 具体政策问题

由于我们既不争取各阶层，又不发动基本群众，因此我们处理一切具体问题等都不讲究政策，而在以下几个具体政策上犯了错误：

（1）锄保政策：

关于锄保政策，毛主席的路线是：一面镇压，一面宽大，而以宽大为us，不论镇压或宽大，目的都是为了瓦解敌人，发动群众，保卫

自己。为了宽大得对，镇压得对，处理每个事件都是要走群众〔路线〕，重实据不重口供，首长亲自动手，这是毛主席的锄保政策的基本精神。

我们这个政策上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方针，实行一味镇压，取消宽大，既不走群众路线，又实行了刑逼供，不是首长亲自动手，而是人人有权先斩后奏。

比方，杀海山的黄汝清，黄是大革命时我的叛徒，但他近年来他籍公正诚实来拉拢群众，上下层对他都表好感，群众对他十几年前的事情多数不计较了，他与国民党反动派有点关系，但他未公开反共。因此，我们逮捕了他，上下层都起来反对，地主、商人联名呈文保释，下层群众积极要求放人。可是我们主观上固执镇压态度，不走群众路线，把群众意见置之不理，把黄杀了。杀了之后，激起雷州广大地区上的上下层的强烈反对，太平市全市嗟然“共产无理杀人”，“共产杀人比贼还凶恶”。

(原件缺乙、丙部分——编者)

关于粤桂边根据地的工作报告

——粤桂边的形势和当前的方针*

(1947年2月24日) ①

温 华

第一，为建立粤桂边根据地而斗争

(一) 战略目标：建立以十万大山为中心的粤桂边根据地，并以十万大山接连的粤桂边境山地：灵山、合浦、化州、廉江之北部，横县、兴业、博白、陆川之南部，建立小的根据地，廉江、化州、吴川、遂溪、海康等地平原地区为我们的游击区，并与山地根据地连接起来。此外建立准备长期斗争的隐蔽根据地：一个是茂名、信宜、电白、阳春边境山地；一个是海康、徐闻边境山地。今年之内就要达到打下建立根据地的基础，建立一个至二个主力兵团，把山地周围农村里的农民动员起来，在山地一些地区开始建立民主政权，在平原游击地建立了两面政权。把平原的游击活动和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斗争结合起来，把游击战争与农民的反三征、要求粮食、求生存的斗争结合起来。

实现战略目标，一方面存在着有利的条件：①有坚持二年来武装斗争的经验与留下一些经过二年来斗争锻炼的部队与干部，以及化、遂、廉平原地区的广泛群众基础，同时有了建立主力兵团的基础。②广大农民反对三征，要求生存，反对独裁统治斗争来〔浪〕潮接近将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K经济崩溃的迅速将加速了斗争的结合。③K统治基础的动摇，本身经济的困难和内部及其与人民矛盾的尖锐，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军事力量的削弱。④全国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胜利，尤其是反攻到来时的伟大胜利，将给予人民莫大的鼓舞和影响，大大地提高人民斗争的情绪和信心。⑤山地有利的地形和山地边境K统治力量薄弱和统治的不统一。⑥安南的自由独立解放的实现，将对我们的斗争有巨大有利的影响。

另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困难：①中央化、特务化的统治已深入到各县的统治基础和大地主的封建势力结合着建立起地方的大地主反动武装（如合浦之林翼中）成为进攻我们的工具。②大地主：邓龙光、梁华盛、陈沛、林翼中、林时清、铁胆等反动头子的当权者，是必然要组织与调动一切反动武装来消灭我们。据报林时清已成立七区保安司令部，现在化州建立指挥部，调动集训队及重机队、保十总队进行清剿，还可能从广西调一个保安总队或一部来配合进攻，如我力量扩大对K威胁也大之时，可能再从琼崖或别地增调一个保安总队来。目前各县正在加紧扩大地方反动武装，估计各个县可能组织与调动三百至五百的地方团队配合保安团对我进攻。在今后一年中继续展开残酷的战斗。③我要建立根据地的地区，不是基础薄弱就是没有基础，四属党的组织迄今仍未正式解决；目前四属坚持的武装，长期脱离党的领导，群众基础薄弱。因此，目前四属工作实际上是要从新搞起，强的干部和主力都已撤退，今天留下来的干部都是很弱的，干部亦很缺乏。留下来的部队除合、灵部队外，都是以武工队的形式分散活动，作战经验是缺乏的。④经济严重困难，没有经常的税收，粮价飞涨。目前部队主要是依靠原有地区群众的支持及向地主的征借，若部队离开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到新的地区去活动或K长期的残酷压迫底下，就遭遇着严重的困难。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对我部队的活动和发展是有很大的影响。⑤粤桂边广西党的组织不迅速解决，建立统一领导，使工作不能配合，影响我们建立根据地工作。

（二）因此，在实现战略任务当中，我们目前的方针：①四属于山地活动的部队经过初步的整理巩固工作，就转向大搞方向发展。目前化、廉、遂平原地区则是小搞，并从小搞当中建立主力，准备向粤桂边山地大搞的力量，达到从小搞到大搞的阶段。②在没有基础的粤

桂边境山地区，初期则着重派遣大量武工队去开创群众基础，放手动员群众，在适当的时机就由化、遂派主力到边境建立根据地工作。在四属的山地则以主力和武工队互相配合开辟根据地工作。③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能够有条件先搞起基础来的是博白、廉江、化县、陆川边境和合浦、灵山、横县、兴业、博白边境的山地。我们首先着重于这些地区分别的搞起，进而再把这两地区连接起来，我们也就可以派遣大部主力向十万大山推进，去搞十万大山根据地。不过，目前钦防党就应该从现有的基础放手发展部队，放手动员群众，建立起地方的主力。只有现在就准备好基础，才能使主力兵团推动到十万大山之时，才能长期的坚持，达成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根据过去的经验，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地方党的支持，即使是有利的地形，亦是很难坚持的。根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来布置，我同意老吴的意见，初期以廉江北部的粤桂边境为中心，因可以南联遂溪，东连化、吴，西联合、灵，北出广西。在这地区的周围，我们是有基础，斗争就不致孤立，而且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部队的运动就容易得多。但是，这不是我们主要的长期的根据地，主要的仍在十万大山，粤桂越边境的根据地（老吴不了解这里主要的根据地，是不对的）。我们去搞廉江以北的粤桂边境和合、灵以北的粤桂边境，都是为着我们去搞十万大山根据地，这是我们去搞十万大山的前进基地。若没有这个前进基地，我们立即派主力去十万大山搞是不容易坚持的，甚于有被消灭的危险，过去我们已有了教训。

（三）怎样能打垮敌人的进攻，怎样能够在敌人的进攻中不受损失保存力量，又能生长自己力量和削弱敌人的力量，这是建立根据地斗争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打垮敌人进攻，生长自己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就不可能达到建立根据地的任务。究竟我们采用什么政策方针来达到建立根据地的目的呢？过去我们坚持斗争的经验是这样：一方面过去一年中在斗争过程中我们曾遭受了一些损失；这种损失是在下列这样情况下产生的；①轻敌麻木没有警惕，而被敌袭击，合浦一个大队长的牺牲，损失了20余人；②被敌人的进攻时打硬仗，没有在不利的情况下坚决的迅速撤退、转移，如黄文德的牺牲及其部

队的损失，这是军事指挥战术上思想上的错误；③在敌人的进攻当中动摇害怕，解散队伍，而遭受损失，如黄飞的部队就是如此；④新组织起来的部队被袭击的而被打垮，如化北新组织起来的部队和K军硬打而被打垮，如六王嶂；⑤于敌人的军事进攻残酷又配合着政治进攻，威迫利诱自首底下，个别干部自首，队员投降叛变，使敌人获得了叛徒的帮助，对我发生了严重的威胁，这是我对敌阴谋警惕不够，坚定干部、队员坚持斗争信心的政治教育工作的缺乏；⑥过去对于山地区新地区不能坚持，不能打开新局面，一方面是由于我没有强的主力，可以打击敌人的进攻，另一方面主要的是由于我没有群众基础和党的组织的支持，使部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⑦不能掌握有利时机，乘敌人动摇之时，采取坚决的进攻，存着保守观点，如吴川起义后的形势和进军合浦时的形势；⑧起义的盲动冒险，过份使用力量，全面炸路，没有战略思想。总结起来就是：军事领导上没有游击战术的思想，只有打正规战和阵地战的思想，没有建立强的主力做骨干和核心来支持斗争。在政治上没有在斗争中注意干部的麻木动摇的倾向，及时肃清干部、队员的右倾投降思想，加强阶级教育，提高警惕，及正确掌握政策方针，没有领导起义艺术，领导没有预见，没有及早布置山地工作，建立群众基础和党的组织迎接斗争，没有群众观点，切实的认真的放手动员农民，以自己的力量来参加斗争，使我们的斗争是群众性的斗争。

另一方面在斗争中我们没有被消灭而且扩大了我们的群众基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①过去一年中除合、灵外，化、遂部队主要是用分散武工队的形式去开辟新基础，开辟了相当广泛地区的群众基础，使我部队有相当广泛回旋活动地区，我就可利用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突出敌人的包围圈。②运用了两面政策，乡保甲长以至K的自卫队，许多都和我有联系，供给情报，K军的一切活动情况我都能知道。③对于中小地主一般是采取争取拉拢的政策，一般的中小地主没有和我采取尖锐的对立，他们从二年来的经验当中，K军在怎样大举和残酷的不断进攻底下，我都没有被消灭，K军走后我又恢复活动。因此他们是不敢积极反动，我们则利用他们，需要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他

们的利益底下争取经济的支持。④对于地方反动份子和特务分子是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使特务艰难活动。K对我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在执行过程中当然是有过左的倾向，尤其是一些杀不死的反动份子更是更坚决的来搞我们。⑤主要的是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援助，如解决经济困难，供给情报，隐蔽我部队人员，对我部队情况保守秘密，交通带路等。群众对K的仇恨是不断的加深，对K斗争的经验，也不断的增加。老地区的群众由于二年来斗争的锻炼，使他们更坚决，初期害怕的，逐渐减少了。过去我们对群众进行了教育和为群众做了一些好事，是起着相当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过去的方针，一般是采取依靠群众，争取中小地主，运用了两面政策，镇压了反动份子和在军事上我没有主力的情况下主要是采取武工队分散的形式，开辟群众基础、坚持斗争。

在今后的斗争中，我们应该运用这些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掌握正确政策方针，来完成我们的伟大的战略任务。

A. 首先提高了全体干部党员群众对敌阴谋的警惕性和对敌斗争的坚决性。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对K的斗争是长期的经常的，当我们拿起武器自卫之时，K就采取坚决消灭的方针，对我们是顽强的追击，不容许我们有任何休息、整顿、巩固的机会，不达到消灭则不停止进攻的。二年来都是经常进行残酷的斗争，今后将会表现更残酷的，虽然在某个时候缓和一点，这是在过去的进攻找不到我的主力，不能消灭我之后，是为着要进行新的进攻，布置特务活动，更深入到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准备力量布置新的进攻。同时于这时期则加强政治进攻，挑拨离间，动摇分化、威迫利诱、收买，进行自首政策、奸细政策，以达内外夹攻消灭我们。因此我们任何时候，对敌人一刻也不能麻木，松懈对敌人进攻的警戒。同时我们又必须认识敌人是有几十年武装斗争的经验，是非常狡猾，阴谋花样是很多，他是会欺骗恐吓群众来孤立我，甚至利用群众力量来打击的。因此，我们不能轻敌，不能过低估计敌人的阴谋。我们对敌斗争的方式和方法，不能是教条经验主义的，应该随时向群众学习，向敌人学习新的经验，根据敌人的新阴谋、新情况来规定我们斗争的新策略。我们应该要比敌人

的办法更多、更富创造性、灵活性，掌握正确的政策方针，对敌的斗争是有决定的意义。

B. 目前我们对敌斗争的方针：①展开广大群众的反三征的斗争，要求粮食的求生存斗争，和一切为群众服务的工作为中心，进行放手动员群众，从群众斗争中发展游击战争，把群众斗争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使我们的游击战争，变为真正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只有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才能取得胜利。②动员一切力量来建立我们的主力兵团，实现建立主力兵团而斗争，只有建立强大的主力兵团，才能打垮敌人的进攻，建立根据地。③具体运用革命两面政策，正确的运用统战策略，争取地方势力、中立的地方绅士，拉拢动摇分化地方反动势力，孤立中央势力与地方最反动势力，镇压最反动份子、特务份子。

对各问题的具体意见分述如下：

(一) 领导群众斗争问题：

1. 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是反对K横征暴敛的三征政策，要求粮食，救济饥荒，要求解决春耕困难，增加生产。我们就要根据群众的要求，领导群众切实要求而斗争，尤其是领导群众的反三征斗争，是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除最少数的反动份子外，各阶层人民（包括地方绅士）都是一致反对K三征政策的，尤其是抽壮丁对农民的威胁最大，再加上目前粮价暴涨底下，更刺激农民反抗三征以及抢粮的斗争情绪，即使没有我们的领导，农民自发的斗争，也会广泛的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只有有组织的领导农民斗争，走上胜利的道路，才能把农民动员起来。只有把广大农民动员起来，才能使我们游击战争，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才能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中建立主力，建立根据地。因此领导农民斗争，放手发动农民，成为今天发展游击战争、建立主力、建立根据地的主要环节。

所以我们领导群众斗争的目的，主要是为着达到保卫农民的利益，把农民团结组织起来，来坚持长期斗争，进一步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走向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道路发展。

2. 当前的群众工作，一方面加紧开辟山地根据地农村基础，以大刀阔斧的作风，把山地的农民团结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则加紧巩固

原有基础的群众组织，使群众组织向更深入的巩固的发展。这就是说要把过去组织起来的同心会、农会巩固起来，未有组织的则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广泛的组织起来。无论巩固与发展，或开始建立组织的工作，都应该以把握当前群众要求出发来进行。又应该从斗争中组织群众和巩固组织，又从群众组织中来领导群众斗争，注意在斗争中培养群众组织中的农民领袖，即使我们的部队不在之时，也能独立领导斗争。群众工作中心是为着农民群众利益服务，为保卫与争取群众利益而斗争，而不是只为着部队服务而存在，成为部队的附属品，应保持群众组织的独立性，并使农民组织在农村中逐渐控制全村，农村中的一切行政措施，都经过群众组织讨论决定，形成政权的作用。

3. 今后领导农民斗争须注意下列问题：

(1) 目前群众斗争的发展，必然走向武装斗争，因为K必然以武装力量、以特务来摧残。因此，应在群众的思想中准备着武装自卫，在各种群众组织中建立农民自卫武装，我部队就要协助建立，并和他们配合斗争，进行自卫、保卫他们的利益，这就形式了农村斗争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

(2) 照顾到农民的落后性和急躁性领导斗争，落后的农民是占绝大多数，争取落后部份又是主要的，因此对农民的教育，必须是很耐心的长期的思想教育，提高其觉悟。每个斗争必须是农民自己起来救自己的斗争，而不是包办、恩赐，斗争又必须是胜利的，照顾到长期，不是一时的胜利，转而遭受摧残，应该是胜利能够持久巩固，注意到积小胜到大胜。每个斗争要达到积蓄力量的目的，而不是消耗、损失力量。农民一遭受失败，斗争情绪就很难恢复的。对于农民斗争中的过左，在起来时是必然的，不要采取压抑，而是领导他们逐渐走上正确的道路。

(3) 应注意纵深配备，不要过份使用力量，应保持大部份潜伏的力量，准备长期斗争。

(4) 斗争策略的运用：对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斗争，则是采取调解的协商的方式，以我的力量支持农民的要求，使地主让步，主要是组织农民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斗争。对于反对K的三征及其一切苛

杂，应该争取中小地主参加，并可以利用他们出来号召和推动斗争。

4. 加强中小学教[师]工作，主要是加强政治上思想上的教育，爱国民主运动的思想教育，推动他们扩大民主爱国运动的影响，到各阶层到农村去（报告消息，分析目前经济崩溃、物价高涨的根源），并动员他们到农村去接近农民，为农民服务，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在他们中培养农村工作干部。没有大批知识分子是不能应付今后的新局面，这个工作是不能忽视的。

（二）建立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

A. 于半年之内建立一个主力兵团，人数600人至800人。建立的步骤：首先是原有地区建立主力，即是由建立地方的主力连、主力营，然后再从各地方主力建立成为主力兵团，但是要适应情况的变化发展，特别是要掌握有利时机迅速的创立主力部队。根据目前情况，遂溪、化州各地可以建立一个主力连50人至70人，廉江主力排30人，合、灵可建立一个主力连至二连人，人数约在70人至130人，建立主力部队的比例则是一个营中建立一个主力连。于三个月之内各个主力连向着扩编为主力营（二百人左右），化、遂各建立一个主力营，合、灵建立一个主力至一个半主力营，廉江、钦防建立一个主力连。主力部队的建立工作：①挑选优秀的军政干部到主力部队中去；②提高政治素质，党员成份须占三分之一以上，加强党的领导；③改善装备，充实弹药，达到每连至少有二挺至三挺的轻机及大量的地雷手炸；④提高军事技术水准，准确的射击，提高战术素养，为袭击与伏击战术的学习锻炼，集中与分散，适合情况的灵活运用；⑤在有利的时机与有利的条件底下，争取主动歼灭地主的反动武装，以补充装备，扩大部队，提高士气，提高战术素养，以达到提高战斗力的目的，使能够和保安团作战。

主力队的任务：建立根据地，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就是要粉碎K军主力的进攻，个别地歼灭K主力，打垮K地方部队。同时又协助建立地方主力，最主要的就是要保证我党建立根据地政策的实现——解放农民，建立民主政权，但是主力部队的使用应该谨慎，应以很大的努力，保存、巩固和发展。对敌作战是以高度运用游击战术歼灭敌人，

发展自己，不打硬仗，不打被动的阵地战，在不利情况底下，应争取主动，迅速转移撤退，或化整为零，在有利的情况和我力量又能胜利的情况下，则应该坚决主动出击（袭击与伏击），迅速进行个别的歼灭战。

B. 建立地方团二个，一个是在钦、廉四属，一个是在廉、化、遂，人数在600人左右，半年内完成任务。每个地方主力抽出建立主力兵团的时候，同时又建立另一个地方主力来代替。建立地方团的方法是从有计划选择地方不脱产民兵中建立脱离生产的地方兵团。其任务则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保卫群众利益，争取群众利益，锄奸，经济活动。

C. 大量组织武工队：以十个人左右为一个活动单位，以群众工作干部为主要成份。人数分配：雷州区（主要是海、徐）50人；廉江60人（主要派在北部山地，包括博白、陆川）；吴、化50人（主要是派在化州北部，化、廉边境）；四属80人至100人，主要分布于山地；茂、电、信边境山地30人。各个单位武工队最好能够轮流集训的一个短时期，主要内容是总结武工的经验教训，学习群众作风。其主要任务是开辟新地区尤其是根据地的群众基础。

D. 广泛发展不脱离生产的游击小组和广泛建立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游击小组是领导民兵的核心，配合地方部队或主力兵团的作战。这是游击小组的日常活动，是保卫群众的日常利益而斗争。如反抗三征、组织劳动互助、生产合作、增加生产、救济饥荒、推动减租减息，必要且可能之时则个别的消灭地方反动分子。

上面我所提到关于主力部队、地方部队的发展问题，目前主要是精干的发展，再从精干发展的基础上准备大量的发展，在一般的情况来说，须要一个准备的过程，然后大量发展，这就是要经过群众的动员，相当数量主力的建立（是大量发展的核心和骨干）和干部的准备、经济的准备等等。这是由于敌人的残酷扫荡，经济的困难，干部能力薄弱和缺乏，以及我们过去部队发展的经验，使我们不能不经过一个准备的过程。但是，在农民反对K斗争高潮到来之时，就应该掌握着这有利的时机大量发展。再从发展中来巩固。

E. 建立和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巩固部队。自从分散活动之后，部队政治工作不是忽视就是没有经常性和有计划性的进行，于敌人残酷扫荡之时，有个别干部投降自首，个别部队瓦解，这是没有经常的政治工作的结果。现在就应该恢复连队的政治工作。目前的政治工作要注意下列几个问题：①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警觉性，使他们深刻的了解K消灭我们的阴谋，不仅是军事的进攻，尤其是充分运用特务政策、奸细政策，形成内外夹攻来消灭我们。因此对于重新入队的复员人员及新部队应该经过严格的审查，是否来历清楚，忠实可靠，对于来历不清楚的，不能滥收。对于部队人员干部的生活、行动、表现应该经常的注意检查了解，务须经常的清楚各人的生活、行动，对于队员来历不清楚或可疑分子应该严格审查解决问题。一切审查中所发生的问题必须谨慎小心处理，不要造成恐怖或施行过左打击政策，便利于敌人的破坏。②部队的政治教育，主要是强调提高干部战士对赤色割据思想的认识，坚定斗争前途的信心，清除过去一切徬徨苦闷看不见前途的思想。同时又强调群众观点的教育，改变非群众路线的作风，了解自己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是解放人民的军队；了解和实践随时随地都为群众服务（无论大小），领导群众求生存的斗争，一切军事活动以不加重民众负担、不使群众遭受损失为原则，真正建立军民一家亲密的团结。③加强官兵间的团结，干部相互间的团结，清除过去闹地位、争利益、闹意气的宗派观点。干部首先起模范作用，爱护战士，照顾其生活，为战士解决困难。

（三）运用革命两面政策，执行正确的统战策略

A. 目前在山地根据地未形成前，对于K的乡保政权，还不是采取摧毁政策，立即建民主政权，而是暂时让它存在，不过是以两面派的形式存在，就是表面上是K的政权执行K的法令，但实质上服从我，执行我的命令。K军来时则执行K的命令（只是敷衍应付），K军去后则执行我的命令。我对于两面派形式的政权，应保守秘密，使其长久的隐蔽保存下去的，对于这样两面派的政权，不仅是对中立的乡保甲长都可运用，对于反动的而不是坚决的也可以运用。两面政策运用主要关键，必须以我的力量来压倒地方反动力量，使乡保甲长不敢反动，

对我畏惧。同时我又进行拉拢工作，不危害其地位、利益，执行我的命令时又照顾其困难，使其对K应付有方，这样便可争取大批的乡保甲长走向两面。过去我们是这样做，但是还不够广泛深入，尤其是对两面派政权，不注意秘密隐蔽，有许多暴露了的乡保甲长被K军捉去，使一部分乡保甲长害怕，这是一种损失。今后必须注意：

(1) 对乡保甲长的联系采用单线的方法，使两面政权能够长期保存。(2) 更普遍的广泛的争取，即使是暂时的也应该加以利用。

(3) 对于两面中的叛变分子则采取适当的镇压到根据地形成后，应该建立民主政权以巩固根据地，但对于平原的游击区一般的仍采取两面政权的形式。

B. 对于K军的自卫队、乡自卫队、联防队，争取中立的，实行互不侵犯。对于只是应付上峰，不是坚决执行反动命令的部队，则先打后拉。对于比较坚决反动的，则分化中层，争取下层，可能打则打，给予打击后则执行上述策略，是会更有效果。对于坚决反动，则采取消灭方针。对于倾向进步的部队则采取联系，加以领导，但要保持秘密，争取其信任，扩大部队，充实装备，须等待有利时机才起义。我有党员干部或进步群众在里面工作的则采取单线领导。今后应注意建立争取瓦解K军工作。

C. 对于中立的中小地主、绅士、地方势力，应采取拉拢方针，这些人普遍是对K的不满，反对K的三征政策，反对K的苛杂，这点是与农民的要求是一致的，我们就应该在共同的要求的基础上进行团结合作，建立反对三征、苛杂斗争的统线。组织并推动他们出来号召、发动斗争。我们则以农民群众为基干，领导斗争。对于农民的斗争，和中小地主利益冲突的，则采取协调的方式，使农民获得利益（如减租减息，发放粮食救荒）。对于K的清乡屠杀，则以维持地方治安，维持宗族观念来反对K的借口清乡，实质进行奸淫劫掠，以消极的怠工、阻挠的方式反对。对于他们的争取工作，也是以力量为基础，没有力量的表现，是不易争取的。对于个别坏的，则采取镇压，以杀一警百。应该经常以拜访的方式找他们谈话，把我们的主张、力量、自卫战争的胜利、K的腐败、暴行、军事上的惨败等的消息告诉他们，

经常供给他们宣传品。对于他们当中的开明分子，遭受K的摧残打击，应该营救慰问，给予帮助解决困难。对于和中央势力对立的地方势力，应该在维持地方利益底下使他们团结一致，反对中央势力的压迫剥削。对于反动的地方势力，应区别那些是反动头子，那些是受他们欺骗的部属，了解他们内部的矛盾，然后对于少数的反动头子则采取打击，对于受欺骗的则进行动摇、拉拢、分化，组织其内部的反动势力来反对反动头子。对于建立民主政权过程中，对中小地主不要过左，不采取过早分田政策，使他们过早反对我们。我们是采取渐进的方式，把农民动员起来。根据地逐渐巩固的过程中，又经过相当的调查研究当地情况，才转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第二，组织工作

(一) 中心是审查工作：根据区党委的反特防敌的指示精神来进行，半年之内完成了干部党员的初步的审查，三个月内完成区级以上干部的审查。在斗争尖锐的环境中，审查工作是不可能平均的一般的进行。因此，首先是完成了部队干部的审查和斗争和缓的地区的审查，如茂、电、信、雷、梅、遂、化一部分。对于斗争尖锐的地区则注意从斗争的表现上来审查。对下列份子应该注意审查解决：①可疑分子；②失掉关系而又恢复的分子审查；③被捕分子的详细审查；④学校的知识分子和关系复杂分子。进行的方法是先从目前几个主要县级干部做出结论，给干部审查下级示范作用。在目前蒋管区的环境写自传的方式来审查是妨碍秘密工作，斗争环境不适宜，只有经常的不断的谈话为主要方式来审查。

(二) 整理组织：①主要是四属组织的整理，首先从审查了部队干部做出结论，经过特〔委〕批准，然后建立部队党的组织生活。其次是地方组织工作干部党员审查，经过了同样的手续解决问题。②整理各地部队党的组织，建立支部生活和工作。③茂、电、信及其他不暴露的地区仍继续采取单线领导，继续隐蔽巩固。

(三) 加强阶级教育：①根据区党委几个指示：政治问题、反特问题、经济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再综合当地情况，提出报告、讨论，

使干部党员对目前时局发展，有明确的认识，提高警惕，反对特务，肃清浪费、腐化观点，建立生产节约的经济观点，对武装斗争前途有坚定的信心。②党章学习，〔以〕刘少奇同志报告为中心，发动干部来研究讨论，可能时首先建立一个干部学习组，做领导学习党章的骨干。学习党章的目的是改造党员干部非党意识，改变作风，提高党性，达到全党在以毛泽东的思想团结一致巩固党。

（四）领导问题：①提高对革命割据前途的认识和加强信心，为着使全党为建立根据地而斗争，必须一方面希望区党委对于领导展开自我批评，澄清过去武装工作方针的错误所引起党内的徬徨苦闷，对党的领导发生不信任的现象。另一方面必须指出斗争中所遭受的损失，自己在领导上是负主要责任，这就是领导斗争中没有在思想上具体解决坚持斗争所遭受的困难和可能发生的偏向。领导上不深入，把区党委武装方针作教条的传达，使干部在思想上受着相当的影响，产生了消极脱离群众的倾向。只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发挥，才能启发下级自我批评，才能帮助下级纠正偏向。②照顾长期方针，注意困难的严重性，斗争的曲折、波浪式的发展，注意公开的根据地与秘密的根据地，山地与平原，非法与合法斗争的结合，武装与地方组织的〔公〕开与秘密的配合，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的结合，必须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K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对于急性病与只是到处大搞，把党的力量，全面的动员的倾向必须防止。③同时又应注意到，在搞的过程中，必然遭遇着严重的困难，如K的残酷进攻、经济的困难或斗争中遭受损失，一部分干部党员及群众可能发生悲观失望的情绪。我们必须预见这些困难，准备力量来克服困难，首先在自己领导上不为这些困难转移我们贯彻建立根据地的精神，在克服这些困难中自己起着模范作用，以这种精神来团结全党克服困难，争取胜利。④贯彻走群众路线的领导作风：（1）提高了对下级对群众负责的精神，纠正执行上级决议的盲目性和教条主义的硬搬硬用，必须研究决议，又研究情况，根据实际来执行，同时把这种精神，使下级也如此做到。对检查下级工作时，应提高自己责任心，发扬自我批评精神。（2）对下级的工作意见，应该是从群众中来的意见，因此应该虚心倾听下

级意见为主要意见，纠正过去包办、代替下级提意见的作风，这种作风只是使下级听训、受命令、服从的作风；是使自己彻头彻尾走向主观主义，窒息下级积极性、自觉性的作风。（3）一切工作斗争的布置，应该都是为着为人民服务，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而不是为着其他。一切工作的检查也是如此。检查究竟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和群众的结合程度如何，这是工作检查的尺度，纠正过去我们只是去了解一般情况，没有明确的目标和中心内容。⑤我们领导干部全体到部队中去，加强武装领导，但实现这方向须要一个时间的准备过程，如隐蔽据点的建立，主力部队的建立，新交通站的建立，交通联系的整理，情报网的建立。领导机关目前应放在廉、博边境山地，比较可能照顾全南路。这样必须建立电台，否则在山地无法进行政治领导。但目前山地没有基础，现在就须要加强干部，建立山地的群众基础和党的组织，并建立一点隐蔽据点。⑥领导机构问题：领导单位分为四个：雷州、吴化、茂电信、四属。干部的分配在口头再说明。

第三，经济问题

（一）解决给养的来源，建立税收。目前我们是遭受着严重的困难，部队是没有经常的税收，朝找晚食，只依靠当地群众的借和地主的捐，或打地主，如果部队调离原有地区，则给养成问题，影响部队的活动。因此必须解决经济的给养；①向地主征粮（过去已经开始）；②控制一些墟镇税收；③控制公路及河流进行税收。

（二）经济队加紧活动，搞几个大世界，准备一万万以上的基金建立生产事业及利用一切关系条件，发展生产，鼓励党员发展生产事业。

（三）各地党和部队，建立财政经济制度：①指定专人负责计划管理；②确定预算决算制度；③今后一切经济用途是为着扩大部队，建立主力，提高战斗力。

（四）提高党性，建立干部党员正确的经济观点，把中央对大后方经济检查指示精神，展开反省（我们自己做起），纠正下列错误：①纠正对法币不值钱，而乱用浪费的观点；②纠正干部党员享乐腐化、

自私观点；③纠正没有长期打算的观点，应该提倡为革命节约，为革命捐输的作风。

第四，还有下列几个问题补充说明

（一）关于今后领导机关的组织如何，须持区党委说明，我才能提出干部分配的意见。

（二）关于划出广西南部地区组织这个问题，希望我走前能够解决，以便利工作的开展。

（三）希望区党委再派一个团级的军事干部去主持化、遂、廉的军事工作，因为我们都是门外汉，欧初仍依照原定计划派去四属，现在负责四属组织工作的丁同志可和欧初入四属部队（主要是合、灵），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老吴才回到四属去，目前老吴还是靠近我协助解决问题。

（四）因船缺乏，交通于26日才能启程赴湛江，27日晚可到，通知老吴调查叛徒在湛江对我及组织的威胁情况，我才返去，这个时间约在十天至半个月。为着使工作不遭受损失，我主张欧初比我先去见吴，传达区党委意见和布置工作，欧初回去的时间约在27日至28日，希望于26日前区党委解决了南路工作问题。如果同意这样的布置，请立即通知我，准备欧初回去时所要解决的问题。

（五）我的工作意见是根据目前南路情况和我个人在一年中所感受到领导上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是我这次来获得区党委的教育之后，才能够明确地提出问题，但是所提的都是原则性意见，还须回去时和各地干部商量具体布置，执行上必然遭困难，首先敌人残酷的进攻，搞通干部思想的不易，以及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可能有些计划是不能执行。如关于完成建立主力，开辟山地工作，审查工作，领导机关到部队去的问题。因此目前我们决定具体计划时应带原则性、灵活性，不能是下命令式死板的决定。我们的意见还不能完全反映着全体党员干部的意见，因此主观主义的意见是不能避免，希望区党委对我的意见提出具体意见（批评、修改、补充）。我的意见中有许多未有具体说明的，再在口头上来补充。

(六) 关于电台的建立问题 (如何建立? 怎样建立? 何时建立), 希望能够获得具体解决。此外, 希望区党委能够供给我们一些医科人材, 造地雷、手炸人材。

(七) 闻周同志回来, 关于在安南的干部, 就可和他具体商量解决。

温 2月24日 (1947年)

吴△△关于南路情况报告

——武装斗争、党的组织情况*

(1947年3月12日) ①

正月初八及二月初五日来信都收到了。现先将此地情况报告如下：

目前我各地武装按预定计划发展中，计遂溪方面有四百余人，化州方面约四百人，廉江二百七十人，钦、防一百人，合、灵三百人（系二月前数字），阳、茂、电正月中旬来信有四十六人，另收编土匪一股六十人，总计全区兵力已有二千五百人以上。配备：遂溪方面轻机六、掷弹筒一（另原有之机枪已设法购弹，可能购到）；化州机枪六、冲锋枪一，另据昨日来讯云，这几天又可搞到轻重机数挺；阳茂电轻机一；钦防轻机三；合灵轻机十一，冲锋机一，另轻机三挺，即可买到，已交订钱；廉江未有机枪，但该县负责同志声言是月内必可搞到两挺，其他长短如人数配备，队伍及武装日夕发展中，军心甚旺。计自正月以来个多月中，人员、武装增加两倍以上。武器有一部分是过去埋下来的，但多已坏不堪用。如廉江原埋枪百余，现挖起来经修理继能用者仅得四十支，其他各县原有藏枪可用者亦很少，真太可惜了。目前武装来源，主要是靠动员民枪，缴获得属其少部分。民枪比敌我均多，又容易取得，如廉江有一条村自己组织了一个连，枪枝人数全由大家负责，只要我们派现在我们一个该村的同志去做连长。其他我们缴的枪，大多是向敌最弱的部队，如乡保队去缴，这种来源，化州约取得五六十支，遂溪亦约如此数。但今正〔月〕以来，我各地均已积极活动，故干部、队员气概一新，群众观感也大不相同。正月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十九日至二十八日，我遂溪连打了四仗，毙伤俘敌约六十人，我仅死一人。二十九日又在泥地北边打铁胆主力一中队，毙伤其六七人，铁胆有个中队，被我打得只剩三十人了（原七十人），该中队长不敢回去，□□到处问人，就问老虎在那里，要找老虎打。正月二十三日我占领江洪港，缴枪十余支，并击败来援之敌兵百余。迨至二月十六日，我遂部〔署〕在湛遂公路上，与铁胆之座车遭遇，铁被击毙，其县府秘书长宁可风被打断了手，铁之卫兵十一人，计死四人，伤七人，此役K甚震〔惊〕。湛市戒严了两日，现K驻湛兵力仅保安一个中队、自卫队四个中队（每中队仅三十人），共约二百人而已。其他赤坎区，仅有警察四十人。另一些宪兵、卫兵之类，兵力很薄，一时尚未能有大兵下去剿，其他各县敌兵都不强，由省调来之保丁总队实到了两大队，约五百人，一大队驻钦、防、廉，一大队驻高、电、湛。各县自卫队无大增加，如廉江只有二百五十人，仅化县有从高、信、电、阳调来之县兵，配合化县之兵，共十二个中队。在化南设剿匪总指挥部（下分四个分指挥部），会剿我化南区。但其中电白县兵因电方我队活动，来了几天，就因“有事”撤回去了。化南会剿因我主力主动转移化北，同时敌兵力也弱，我没有什么损失，相反我们打了几次胜仗，在化南打了两个乡公所，缴枪三十，轻机一，打两次敌之县兵，其中正月底打廉江警察大队长亲自率领的七十余人，被我击溃了，生擒二人，陈本人几被生擒，缴获几支枪、两箱子弹、两匹马。合灵方面半月未有大打过。钦防队方面有广西县兵四个中队，来配合防城县兵共八个中队兵力向我扫过，我无损失。总之我去年年底积极行动以来，虽然还很不会打仗，指挥员的指挥技术很拙劣，但除了前几天，在遂溪南区我全部百一十人被敌袭击，死二人伤二人，丢了十二支枪外，其他的仗都是我打胜的。大抵我们的军事指挥员指挥作战都有一种习惯，好挑选少数精锐者以少胜多，而不是集全力以多打少，以强打弱，故在战斗中往往不能最后解决敌人，很少缴获，部队也缺少血战的习惯，故不能迅速解决战斗，歼灭敌人。自去年底以来，关于发展部队、掌握部队、指挥战争，经已各县多次研究，写了些指示性的文件下去，又写一篇论游击战争的指挥问题发下去。据反映，干部对掌握部队与

指挥战争的问题都进步些了，从各地部队近来的战争中最可以看出，相信是不会被人打垮的。

我原定的发展计划是：第一步，从今年正月至二月两个月全区发展至二千人；第二步，三月至六月四个月内将队伍发展至四、五千人。这计划是在我正月中旬的报告里有说及的，它是有根据的，可能行而得应该这样行的。但不知何以温同志在二月初五的来信，似未尝看过与考虑过我的报告似的。他也没有说我的计划对与不对，也没有提到一只字（除了同意派阿丁入合灵部队一事外，他全信数千字没有答复我任何一个问题）。他指示要我在今后三个月内，遂溪组织五十人之主力连，廉江三十，化州七十至一百，阳、电、茂停止公开的武装斗争。这真使我惶惑，为什么准许搞那么少呢？我们现在已经发展起来的人，难道又解散复员回家去送死吗？如不相信我们能在二个月内发展至二千人（比原有多四倍），我以为也应指出这种所以不能发展到此数目的原因，如认为这样发展起来是不能坚持下去的，也应有不能坚持的理由，为什么一点也没有提到呢？按温同志过去的做法是一县有若干主力，其实就只是一县允许有这么一支集中编制的部队，而其他通是三、五个人一组的游击小组而已。这次纵说除主力以外，还允许有（二字看不清楚），又容许有几多呢？据其意亦不过三十人者，另有六十人、五十人者，另有一百人而已。而这是今后三个月的任务，我接他的信时早已超过他此数很多了。以后三个月我们就不必再发展了吗？我觉得他的指示是完全按照空想，而不按实际的情况是可能发展的应该发展，可能坚持的应该坚持。而温同志大概是以为不能发展，不能坚持的，因此他的来信里特别提出要我注意四大困难：1. 干部困难；2. 经济困难；3. 武器困难；4. 兵源困难。前三种是困难的，难道第四种也成为困难吗？我们此时竟因为怕没有人来当共产兵，而必须采取收缩政策吗？遂溪全部五十人去南区，几天即发展五百一十人；化南丁带四个连上化北，几天即发展了八十人。我以为不必待这种事实证明，即随便找几个从乡下到香港去的普通人问一问实情，就不会把兵源也列入我们目前武斗的大困难了。目前敌第二期征兵较第一期重得多，廉江是有每保十五人，湛江每保九人。群众愤激已极了，

湛江的群众也纷纷准备不交。化州的则参加我之抗丁会来反抗，有些人拿谷送给我们，说将来他征兵时，他儿子好来入我队，先交粮来准备将来给他儿子吃。我们如采取放手动员群众的政策，群众会更加成千成万来参加斗争，尚不是成百成十的。

关于解决经济困难：温同志的指示是：“打谷仓、打运粮，和向大、中地主用说明的精神，一软一硬的办法为筹一万担军粮而斗争”；“筹一亿元的生产资金”，“控制公路、河流、圩镇收税”。照他的意思是积草囤粮，然后造反的，但规定我们的兵力如此甚少，而要做的事如此甚过，他们能做得来吗？一万担谷向地主要，每家平均十担，就要向一千家地主说服，一软一硬，一县只有三、五十人，合起来做，每天一个，一年也筹不到，分开来做，有力量吓得住人吗？打谷仓、打粮船，打得下吗？搬得跑吗（一万担粮要千五百人挑夫才挑得跑）？搬出去又藏得下、保得住吗？一亿元也可以筹得到的，那就必须做许多非法的经济活动，违犯政策的活动，即使搞来拿去做生意，还是拿来办一些必须的供给，以济燃眉之急呢？如果我们不想有天下，而只想在敌人统治的城市安居做生意，那么我们就可提他们的钱出来，迫使他们天天去打船打车，扩大勒索；如果我们要得天下，那就让他们少搞这些非法经济活动，让他们留些钱来做目前急需之用，因而部队可以有穿有吃，能够扩大。一亿元可以买三四十挺轻机，可以供给一个五千人的部队两个月。如果现在有一亿元，我不计划拿去做生意，而宁可立刻拿去购几十挺机枪，拿去做部队的伙食，如果我们多三十挺机枪或把二千人的部队发二个月，我们就可做许多事，打出大的局面来。控制公路、河流、圩镇收税，这也是没有大力量做不到的，我不必详述了。

我们既然要决心搞出个局面来，进行红色割据，我们的领机就必须整个下去。但照温同志的来信，他和第一次不同了，第一次来信是要我在湛江找房子，似无下去之意；二月初五来信是说要下去了，却又叫我派人去廉博山地周围发展些村庄，作为领机住地、电台、交通站之用，必须不要暴动，不要刺激K，以免K常来扫荡，如此则我们领机大有问题云。照这段话的意见，他们所谓领机下去，充其量只是

下一半而已，我们要领导红色割据斗争，而领机及电台不放在根据地的中心，而放在其外围的灰色村庄，不靠我武装力量的保卫，而靠秘密工作来保护，这是可能的吗？我们能从这种地区对红色地区、对流动的武装实行具体领导吗？这些根据地外围地区能搞成灰色吗？即可搞成灰色，敌人就不来吗？就有保证吗？我们这里的情况和区党委完全不同，区党委较高的领导机关，要照顾地方很阔，故不能不建立〔在〕交通较便利之城市（而且也要环境较好的城市）。但我们这里的工作则除了农村外，简直没有其他。将来斗争发展起来，从根据地跟着部队行动，去联系各地的工作是比之白区更密切十倍，而且也必须亲自入根据地入部队去，才能真正接近下层，接近实际，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温同志这种想法是有害的，抗战中华中局和新四军长期在〔皖〕南军区，这个军区部队很少去铁路、出来，敌人也少来扫荡，因此这个后方颇为安静。温同志的意思，也许许多是想这样的。但是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靠几万兵来保护的，是有公开政权的，而且各种工作是红的，而不是灰的，那个地方是华中的模范根据地，而不是什么秘密灰色的村庄。

关于中心根据地问题，温同志来信虽言及建立廉博边，但仍拟以十万大山为最后之归宿，对于廉博边的建立只言是作为我们进一步建立十万大山战略根据地的前进阵地。关于我们的中心根据地必须建立于廉、博、合之间，而不是建于十万大山，我前次报告已说到，十万大山虽高大，但远离我其他工作地区，周围极少基础，山区内亦无工作，故不能取得各地的策应，亦不能策应各地。惟有东出数百之程，始到现有合灵地区，如此实难以起战略作用。因在此种情势，我如将主力集中于彼；则目前的合、灵、廉、博、化、遂等地工作必将因缺乏主力支持而大形削弱，其结果是我放弃现在有条件搞起来的地区而远去未必能搞得大的地区，此不合算之事也。我们目前南路的力量要分散去搞二个大根据地，其力有所未逮。因此我的意见，我们宁可不在十万大山，必须坚持合、廉、博边的中心根据地工作。在目前敌人兵力薄弱的条件下，我如集中合、灵、廉、遂、化、吴的大部兵力向此区推进，是可能占领此区，使之略为稳定的。我预计再一个月后，

我各县兵力可能发展至二千五百乃至三千人之间，这些只是乌合之众。但以大力去压入敌尚只有一些人数不多的地方，只靠联防队驻守之区，是可以实行占领。此时我仍未可能实行确保此地区不受敌集中兵力的侵入，但可坚持这个地区政权的斗争，而我之主力或可以在此区利用有利的群众条件与地形条件，对来犯之敌击败其一两路，因而迫使其撤退，或则集中主力乘敌之虚，或入合、灵，或下遂、廉，或出化、吴，帮助当地发展，而迫使敌自我中心区撤退。如此则我虽仅有三数千兵，似可以使目前之合、灵、廉、遂、化、吴各地亦俨如有三四千兵。因而我们不但坚持了合、廉、博山地中心区局面，而且坚持了目前的合、灵、遂、廉、化、吴的局面。在这些地区，我不但可以坚持武工队式的活动，而且可以保持我在乡村之政权，这不但是山地可以如此，那平地也可以因山地的支援与主力兵团的策应而可以坚持下去，因此我认为廉博合根据地比之十万大山区更有坚持与发展的条件。这里发展起来，其活动圈可以很阔，而且可以威胁敌后方之城市与交通线。在敌人进剿时，更有机会以敌进我退之战术，调动敌之兵力，而且可以影响更多群众。搞得好，这地区半年到一年时间内，可以搞出一万武装，甚至超过此数，而四五千之众则是可以保证搞得出来的。因此我提议你们调第一团来这边而不要放在十万大山，此时我们若得第一团来，声势更大，力量更大，则半年内的发展定可突过五千的。

阳茂电边山地，温同志来信云要停止公开的武装活动，只留少数武工队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信电茂三县完全停止公开的武装斗争，一切照旧云。他没有说什么理由，我问负责传达的林明同志，据云，温说因为那里的组织已经能隐蔽了，如果只这样简单，当然不能成为理由的。难道俄国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前的组织已经暴露的吗？问题是时机与力量，而不是什么可否掩蔽。信宜及茂北，我们的力量很少，过去未有武装活动（茂北有过一点），群众受影响的少，又远离我现在武装活动地区，其势尚孤。因此我也是不准备于此时举事，其他茂、电二县我也不普遍举事。而是目前有些地方，已经有部队活动了，而且有些地区是过去经过几次起义的，有些地区现在已有相当准备，群众也有要求，而我在军事上，也有此种需要，因此我意见，阳茂电山

地的部队必须坚持，不能遣散。该部队去年九月以后因采取了消极政策，没有打过仗，就垮了一半，去年底经派王老五同志去收拾五十余人。因在思想上尚未彻底变过来，王出来见我，几天后回去，便又跑了十个人了。但王回去之后，向干部传达要搞公开局面，扩大部队并讨论了燎原之火，以后干部、队员的情绪极高，他们计划二个月内无论如何，发展超过二百之数，已编了一队土匪六十人，派人去做政委，完全肯听我调动指挥，该部准备发展五百余人。这几天因要给你们写报告，未暇见王（王约这几天来），未知他们发展如何。但据三县负责人涂同志云，听说他们颇有些活动，则此时终必有发展。他们的发展计划，据我看来是可能达到的，他们现在据我所知有把握动员几十支，发展与收缴少数敌之乡保的枪支，如果于此时忽然下令叫他们停止，则这一批同志这个队伍会得到如何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没有对他们传达温的意见，因为那必招致全盘瓦解，而干部将因此大骂领机（其实领机对他们不住）、动摇、逃跑，而最主要的则是我们将必然失去这支队伍与这地区的工作。

阳茂电边的山区是可能建立一个较小型的根据地，如我们在化廉边有强大力量，则他们可能做得更顺利些。我不过份想他们搞得很多，但在半年搞出三百至五百人却是可以的，即使如此，也可以控制山地一部份地区（因那些山地地形很好，而且很偏僻，我们已有基础），牵制数县之兵力，而有利于化、廉等地的发展。电白因为是最接近此山地，过去经过几次起义，群众有影响的，我准备将在二个地方配合部队的活动举义，而容许部队活动。过去给部队死死规定一个防区似的分界是不合理的，规定部队只准在狭少的山地活动而不允许他出来，不允许他取得地方党的帮助，这完全使部队难以发展，也难以支持。一个几百人的游击队的游击，尤不能限死于数十里的山区之内，这样我们的活动“划界”划死了，会把部队置于死地的。在一些地区为防部队活动暴露了地方党，我们宁使地方党勿公开与部队接近，不使之有横的联系，而部队少去住自己的村庄，这是可能的。

茂南及梅菜东边、南边，现有梁部（梁振初弟）、容部、李部三股共二十余人，李在沙龙江北电茂边，容、梁在覃巴、飞马一带，梁

属化州领导，其余二部属阳电茂领导。我拟将三部统一指挥，划归化州领导，因这边领导近些，联络容易，目前他们在此尚可坚持。化州方面，我之活动始终逼近梅景，完全是平坦河叉之地，敌尚无可如何，故这些地区的坚持当是可以的，但这些地区将来亦不准备建立公开政权（除非我力量很大），而长期作为游击区。有了这个地区的坚持，则将来阳茂电边部队与化州部队活动可以配合起来，而尤其化州，在必要时我可以调集较大的兵力来坚持此地区，威胁高、梅，发展人枪，以迫使敌进入我区之主力，退守其重点。茂西与化州接境，去年化州部队活动到达，现在也有部队在那边活动。此地是有几个党员，地区过去是起义过的，我拟将其划为化州领导。总之，茂、信、电三县，目前非我之主要武装活动区，但武装斗争不是原则上停止，而是有可能发展的地方还须发展，可能坚持的地方仍须坚持，一般的地方是积极准备力量。我对这三县的工作布置的原则是这样，不知你们以为然否。

对于建设南路的局面，我很有信心，各个干部也很有信心，我们认为目前这半年是很有利的机会，但也不是似此以后就可以一帆风顺太平无事了。我的看法是K在今年内无论北方战争是否可结束，也难得调大兵来，因而我们便可乘机搞得多一点、大一点。蒋大抵要在今年内败到被迫求和的，即使美帝再积极帮他，再给他大量军火，他也没有条件再连续打几年的。但此后的局面，我们这里或和或战，忽和忽战，现在尚难预测，但总还是红色割据与白色割据对峙的局面。我们要保持这种红色割据，也许尚须再打三几年，或者忽和忽打。我的想法是我们如能于今年内搞出万把几千人来，则在将来也就不怕他，而取得可和可战之势。如搞一年也只搞得千几百人，则将来只有被打、被剿，即有战无和。因此我的想法，此时确是要以武装为第一，要集中全力来搞，越大越好。因此我听了林明同志传达你们的政治意见后有几点意见，未知是否系林同志传错了。林说中央曾要求广东党起义，但区党委认为起义是需要的，主要的工作是公开的群众爱国民主运动；又说武装原则则是小搞。如果林没有传错，则我的看法和你们是不同的，也许你们只是说，全省不要到处去搞无条件的暴动。但既然有些

地方，而且在全省又有几个地方是可能建立根据地，而且必须建立的，那么武装工作，在全党工作的重要就增加，从地区来说，他只是少数地区，从份量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譬如在南路，我们是搞武装，搞根据地的工作来得重要些，还是公开的群众爱国民主运动呢！他没有说公开的群众爱国民主运动究竟如何搞法，只是说在农村是反三征。但我们是一般的反三征，还是主要的在一些地方配合人民的反三征斗争进行武装斗争或以武装斗争推动人民的反三征斗争，决不比在化、遂、廉地区的武装行动配合的反三征斗争重要些。而后一种斗争，即是建军、建政工作，即是起义的工作。如果我们在南路建立一支相当大的队伍和政权，则这些地区实际就是南路的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心，而在组织这一工作时，领导机关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这边。林同志的解释，似乎是说我们全党或领导机关主要的是要做些抗议，请愿、罢工、罢课、抗税、抗丁之类的斗争，而不是主要的精神在搞武装。未知这是你们的原意否。武装原则是小搞，我也觉得不妥，如认为不要到处普遍无条件的暴动就是小搞，那是可以说得通；但是如此便不要这样说才好，因为这样会使人误解的，以为不要把部队搞大了，不要把地区扩大了，不要放手动员群众了，那种缩手政策之误。我以为我们不去普遍地小搞，而是在有可能条件的几个地方大搞，要搞就要大搞，而且小搞到大搞则是搞的过程，这也是必然的过程，部队是从小到大，从各县分散的游击战到建立主力兵团，政权也是从抗丁、抗税会之类的组织起来的，用原则上大搞的精神来指导各地，勿盲动冒险，而是按规律去发展，则大家有信心，有前途气魂，而局面可以建立，不会右倾，也未必容易左倾。如决定原则上是小搞，去向各地普遍传达，必致引起干部无信心，可以搞的地方也不敢不〔再〕搞，应该大搞的时候也不搞，不会发生左倾，但必然走向右倾，我从这里的实际情况感觉得是如此。如你们现决定要建立粤桂边根据地，则在其规模与内容来说则是大搞的（南路历史上未有过如此大的任务，即在以前起义时计划未必这样大），而却又向他们传达原则上是小搞，这不是很矛盾吗？

我们去年错过机会，八月温同志去湛时，我曾提议由我去安南将

第 团带回来配合钦廉之五百人实行大搞，在化、廉、遂各地则就地扩大以策应，以民军名义搞军，以地方自治会名义去搞政权。我此议温同志去港后未向你们提出，却带回了九月的指示，此时我遂、廉、化诸地兵力，在一个月已由未足二百人扩展到近千人，此时是不能再照样执行九月指示的。当时我曾建议不行，待我亲去港或写信去。温同志未允。因此硬要各地解散复员，不准出击，尽量避免作战，不准在群众家里煲饭，要到外面去煲，叫同志们去挖坑，带半个月粮食藏在里面。初期还允许各县保持三、五十人的集中部队，后来连这也被取消了，不准带枪，不准超过五个人一组活动。对化州的指示，甚至各部之间绝对不许有任何联系，在合灵在两个月内全部队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而高雷这边损失十分之八，人死了，枪失了。这种影响到去年底未能使干部情绪恢复过来，当时许多人想走，廉江队的负责人也要去香港，这同志历来表现很好，现在也很好。合浦等部受影响最早，因此在合灵部队中损失最大。

在灵南，因传达较迟，且他们不肯执行分散，原集中百几十人一起行动，故保存数量最大。钦阳部队此次阿丁来谈，云当时因联系不到，根本未有传达，所以该部数月来自己搞，由三十人发展到百人，搞了二挺轻机，这是全区唯一的战绩。从这些事实完全解散取消主力队，但决定本身仍是错了，这是无可讳言的。因此我前次要求你们对此作自我批评，以使干部思想清楚，只保持领机的威信则必要的。去年为了执行你们的九月指示，我曾流了泪，现在温同志的两次来信又使我几天睡不着，他的来信是没有一条可以执行的，因为每条都和实际离得太远。而指示得非常之死板，硬是非如此不可，毫无可以商量之余地。

温同志给我写的指示信，可以完全不理我的报告，这种领导作风，是很危险的，即使我的意见全错了，也不应如此。他的来信可分二部分，一部分是永远正确的，即抄袭了一些毛主席或其他负责同志说过的一些原则，如我们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而不是脱离群众的领导？我们要纠正过去的倾向，同时又不能放松注意及时纠正将来可能发生的偏向等等。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

地方，而且在全省又有几个地方是可能建立根据地，而且必须建立的，那么武装工作，在全党工作的重要就增加，从地区来说，他只是少数地区，从份量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譬如在南路，我们是搞武装，搞根据地的工作来得重要些，还是公开的群众爱国民主运动呢！他没有说公开的群众爱国民主运动究竟如何搞法，只是说在农村是反三征。但我们是一般的反三征，还是主要的在一些地方配合人民的反三征斗争进行武装斗争或以武装斗争推动人民的反三征斗争，决不比在化、遂、廉地区的武装行动配合的反三征斗争重要些。而后一种斗争，即是建军、建政工作，即是起义的工作。如果我们在南路建立一支相当大的队伍和政权，则这些地区实际就是南路的爱国民主运动的中心，而在组织这一工作时，领导机关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这边。林同志的解释，似乎是说我们全党或领导机关主要的是要做些抗议，请愿、罢工、罢课、抗税、抗丁之类的斗争，而不是主要的精神在搞武装。未知这是你们的原意否。武装原则是小搞，我也觉得不妥，如认为不要到处普遍无条件的暴动就是小搞，那是可以说得通；但是如此便不要这样说才好，因为这样会使人误解的，以为不要把部队搞大了，不要把地区扩大了，不要放手动员群众了，那种缩手政策之误。我以为我们不去普遍地小搞，而是在有可能条件的几个地方大搞，要搞就要大搞，而且小搞到大搞则是搞的过程，这也是必然的过程，部队是从小到大，从各县分散的游击战到建立主力兵团，政权也是从抗丁、抗税会之类的组织起来的，用原则上大搞的精神来指导各地，勿盲动冒险，而是按规律去发展，则大家有信心，有前途气魂，而局面可以建立，不会右倾，也未必容易左倾。如决定原则上是小搞，去向各地普遍传达，必致引起干部无信心，可以搞的地方也不敢不〔再〕搞，应该大搞的时候也不搞，不会发生左倾，但必然走向右倾，我从这里的实际情况感觉得是如此。如你们现决定要建立粤桂边根据地，则在其规模与内容来说则是大搞的（南路历史上未有过如此大的任务，即在以前起义时计划未必这样大），而却又向他们传达原则上是小搞，这不是很矛盾吗？

我们去年错过机会，八月温同志去湛时，我曾提议由我去安南将

博合局面，或暂时去搞一时期再会合，究竟此时应开始推毁K政权，代以我之政权，部队中的军事纪律如何建立，此项目前很迫切需要，下边来问，我亦无法答复，我打算下去；最好能搞二个月，然后他往。因现在现情摸得较熟，干部也互相了解得清楚，而南路的中心地区及我主要力量也在这里，……并且将我们力量发展到三、四千人之间，这样，我们地区就企得稳……。

关于党的组织，我提议在化、遂、廉、合灵、钦防、电茂信各地恢复县委的组织，下面也恢复支部的组织。因要领导公开武装及政权的斗争，单线领导障碍殊多。至这些区域仍然必须单线领导之关系（如敌之城镇里的组织）则仍照旧，军队的组织番号，我以为南路人民解放军为宜……。党在部队中的地位，也要保持现在半公开的地位，因为此时未否认这支部队不是党的领导的，不论如何做不到，而且并非必须或者待将来部队更大，组织性质高时再对外公开提出，发表宣言接受党的领导。我下去后，或者暂时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来指挥各部，因事实上已到了需要统一指挥配合行动的步骤。今天报载粤桂联防会议决定派二营桂兵来南路加紧“剿匪”，故我觉得我于此时及时下去，一则可以振奋干部心理，一则掌握部队指挥作战。

政权打算第一步先用抗丁、抗税会来搞，将来如何搞，用什么名义，尚未能凭空想定。在目前半年内作战目标，主要是扫荡K乡保武装及其政权。在我可能建立政权之地，务须反复数次，集中火力，他搞起来我又拉掉他，使敌之乡保政权难以站得稳，或硬建立之据点，却再无法以一纸命令或三几个人便下乡收丁、收税，这样我的政权就可站得下来，乃至即使敌占领圩镇，大乡村组织了武装保护乡公所，而我之乡长却因得群众的掩护与我武装部队的活动，仍能在敌据点之外行使政权。在遂、廉、化的平原地区，这种情形将来是可能出现的，而在山地及我中心区，则我可做到全无敌之政权，而只有我之政权。

温同志来信曾提及半年内审查干部计划，要想在半年内，各级干部都审查完，都做了结论。我认为此时来做这工作，势将影响我们的整个发展工作，因现在是开辟根据地的初期，工作应以大刀阔斧为主，对于干部，系应放手任他们做，而在工作中考验他们。华北在抗战初

却没有说及（其实在那里写指示给我的，而不注意我提出的问题，就是个典型的脱离群众的领导）。过去的倾向是什么倾向，将来可能发生的倾向是什么？也没有说到。第二部分就是如上所述的不能执行得通的具体指示。我以为在这时候，我们必须小心认真来办事，不可马虎，想也不想来决定问题，尤其不可说空话。温同志是要回来这里领导工作，因此我很希望他以后能更细心的体察情况，并且老老实实下去向下面的同志学习。南路下层干部有些同志是很实际，而且有创造力的，即在去年我们整个领导路线错了的时候，化州的同志，也还能自出心裁在化南六个乡实行减租减息，廉江去年九月以后的工作布置，没有一个县级干部不是皱着眉头去被迫执行的。由于他们比我们更接近下层群众，因此他们所做的比我们实际得多。然而，他们过去很少有机会向领导机关发表不同的意见，很不敢提出问题来讨论，因为领导上的片面态度使他们怕，这是我问过目前各个单位的负责干部得出来的千真万确的实情。一个领导人使下面如此局促，则他的领导工作无疑是失败了。尤其单线领导的特派员制之下，负责人如不主动地和虚心地去和下面研究工作，其结果无有不成为官僚主义者。我这信是有点言词过激，但我宁愿提倡这种作风，而不愿意闭口无言，明哲保身。这一段话可算作我对温同志的批评，也是对我自己的警惕。

我现在未知我去钦廉何时去，去以后又如何做。但现在我尚负起这里的整个责任，而部队又大了，许多问题，要我立刻下去解决，现在工作发展中几乎隔几天就要根据新的经验去改进自己领导的。如关于如何发展部队的问题，个多月来，我大约提过四次原则性的指示。这种问题的发现，不亲自到下面去，有时是很困难看出来的，因为我的经验也很缺乏，很难把所有主要问题都顾虑到。现在掌握部队指挥战争的问题又比发展问题来得迫切需要了（发展问题现在算是换上可行之路），这问题却更不是在这“危城”里能实行“具体指示”。而最近因湛市紧张，要检查户口了，交通来往，亦诸多不便，故我打算早点下去。我打算先到这部队搞一下，然后带这部队去廉江，与他部会合，召集干部开个会，交换经验，决定建军、建政的一些办法，使之能更合实际，一致执行，然后看情形或汇集全力与钦合灵共同打开

般的审查干部。如果半年审查干部的计划，是你们的全省性的一般的决定，那末我请求你们考虑这时的情况，允许我暂未能在半年内完成这件工作。半年内，我们也许亦可以对干部有较好的了解，但我是从工作上看的，而不能经过写自传、找〔材料等〕方式来实现的。比较平时的安全秘密的地下组织（如湛江市），这种审查工作，当仍很需要，因为他们有工夫这样做。

关于武器问题，温同志来信云，主要靠缴获，这在目前条件下，我们的力量未够大，战斗力不强，指挥还拙劣，要大量的缴械是困难的。现在武装的来源，主要靠动员民枪，廉江有一条村，自愿组织一个连，武器由他们出，要求我们派该村的同志回去做连长，但他们附带一个条件是，我们不要将该连分散。我们的活动更扩大，这种情况会更多，我现在正就此经验写信叫各地学这样做。现在我们只买机枪和子弹或炮，现在我们用土法造手榴弹及地雷，只用土火药，不必用铁铸雷壳，并不用拉火雷管，其法甚简单，不用特殊技术。现化县已造出一批，廉江试验成功，亦已改造一批，大约半年内搞几千人的武器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经济问题，我打算以到那里食那里的办法来解决粮食，部队一到，即找当地乡保长及士绅摊派几天的粮食，原则上不是单向地主要，而且较普遍的要，每家少许，集之便多，群众是不会觉得负担太重的。我们还要派人员跟去逐家做政治工作，说些好话，群众吃番薯，我们就要吃番薯，吃米要米，给好的不要，多给了也不要，这样会使群众觉得我们很好，不以为苦，而我们却因此就养得起大军。打谷仓之类我们已行，但力量尚少，不能搬跑，只能让群众搬走一部分而已，而且我们也必须让群众去替自己搬，而不单替公家搬，这样才能激动广大群众。向地主征粮，去年已经做过些，成绩很少，也是筹不了许多。我上述的办法已叫各地开始行，现在做得怎样尚未清楚，但我觉得是较温同志提的办法更可靠些。化州部队上月曾在化梅江开始收税，每日可收三、四十万，但前几天报载税站被破获，未知是否。我目前力量尚少，未足以真正控制一个地区，故设卡收税，困难尚多。目前我决定各地少搞非法经济活动，尤其是打车，每打死了客人，群众颇难

期，有后补党员做县委书记，华中亦有二年党龄便作区党委书记者。盖用人之秋，有时实不得不如此。在此半年内，如我们的组织工作不以发展为主，而以审查干部为主，不以大胆提拔干部，分配干部专做发展工作为主，而以审查为主，其势必使领导机关及各级干部聚精会神于写自传、搜集材料、搞证明文件、个别谈话等等工作，因而就分散了不少精神。而且今天的干部间发生了一种对领导机关“敬而远之”的态度，所谓“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组织部找谈话”是也。如果干部之间发生了这种倾向，势必影响其工作的积极性。干部审查工作，是一件很麻烦的工作，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如无思想准备，其结果是会发生反作用，并且也做不好的，延安在和平环境中审查一两年，尚不能全部做出结论。我们在此十分动荡紧张的情况下，要在半年内把干部都审查清楚，而且做个结论，恰如其份，并且经过审干达到教育干部的目的，我以为是不可能的，勉强去做，势必致马虎了事。

南路的组织大部经过了几年武装斗争的考验。因此，我认为我们对之实在已可以大胆信任，化、遂、廉等地早就是比较清楚的勿论，即以合、灵而言，过去二百余人，经过几年的武装斗争，现在只剩下三十余人了，可是我们仍未正式承认其党籍。合、灵负责人覃同志，曾叹息地说：“几年来，合灵的同志，只有死，没有生，合灵没有党员啊！”去年底，钦、廉特派员阿丁来信说到这种情况。我当时去信向他提意见，凡过去党员，几年来仍与党联系者为党员，他已这样做了。据说，干部都兴奋了许多，现在也发展了一些新党员。合灵的组织情况，是较为复杂的，但我以为此事实应在如此简单而办理之，放手让他们去工作，打出个局面来再说。目前我们这里是有一批经过考验，可以靠得住的干部的，靠这些干部做骨干，掌握住各地的领导机关，我们就可以放胆发展。党的组织，我以为也还是要大胆发展的，不然我们撑不了这个局面。根据地搞起来了，部队搞大起来了，然后再来审干。我的意见是：譬如一个党员并无可疑的证据，放他出去搞，立刻可以搞一个连出来，他自己做连长，此时我们是先把这个人审查一两个月，才放它去，还是就放他去呢，我的意见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对于确实可疑的分子，则无论何时都要审查清楚的，但这不是一

人出来，化队人枪即可超过五百，月底可能到六百。茂电队尚无报告来，但从化州方面知他们在覃巴区活动之容部，前几天搞到三十余支步枪，故覃巴队目前当已有五六十人以上。又化州去宝圩方面联络了一股土匪二百人，有二百条枪，但离我区还远，当地无工作，尚未能确定有把握，现已派二个同志去那里工作，可能争取过来。化州实只有机枪五挺，前云六挺错了，但最近可能买到两三挺，已拿了钱去买，五挺中有一挺未修好，现拟交给廉江配用。目前各地情况是，干部提出学习带兵打仗后很有进步，掌握队伍指挥作战，都较前有办法，已经很少打被〔动〕仗。情报工作自从我向各地提出建立情报网、情报站之后，也较前灵、密得多，因而使我队不易上敌之当，目前是比较有保证不再被敌人打碎打散了。经济上各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充足些，也不必过虑。化州队打了陈卓华后，群众杀了二口猪慰劳我们。武器方面，现各地人都有枪，以化州为最多，陈振奕队是大部一人两支枪，一长一短，兵源本来就不成问题。因此只要我们去加以限制，三月底我全区武装必然达到三千五百人以上，可能超过四千人。

现在正与各干部研究如何建立政权问题，这个问题急不容缓，最迟三月份内我们便要搞了，但搞法大家都无经验，下去以后，打算与下层同志及群众多研究几次才最后决定。故现在在此间召开“剿匪”会议，准备先剿遂溪，我拟于敌扫荡前，将遂溪主力带过廉江与廉化队于大圩区会合，扫荡K之下层政权，以破坏敌扫遂溪计划，而敌一调定（驻梅之保十总队部部队及二个连已调回湛市。又茂名军兵也有一中队调来），我各地部队都乘机大发展。敌现在的兵力计保十总队三个大队已全部到达南路，桂军二营传说来未见到。合浦警训一个大队，也调来遂，已到二个中队，敌兵少，此实则彼虚，愈集中于一地，则我可乘之机更多。

目前我在物色一些在乡军官，有二个同情我们者，当过营长，军校出身，打算收买他，主要是要他来整训部队，暂未使之握实权。你处派来之干部宜快点来，又各种技术干部、电讯、医药等人材也望尽快派来。

第一团未回来，为什么这样迟呢？如果他们能够于此时赶回来，

谅解。

对地主，我们的政策还是争取，目前主要口号是抗丁、抗税，甚至减租减息，我也准备过些时候才强调他，但现在也不是不去向农民宣传，有些地方可行的还是要行，尤其是现在租早已交了，故这个口号暂时对农民未有以前热烈。因为在蒋的压制下，群众普遍愤恨，不需分田，此时亦足以动员广大群众，则我们可以把很多地区争取中立甚至站到我们这边来，未知你们以为然否。

此外极缺乏武装干部，温同志拟派来的几个人，未知是何种人物，我们极需要一个有正规军学识的人来做参谋长之类的干部，未知你们那里有没有，如没有，我们只好自己摸一个时候。我们意思是如有一个正规军官（受过K的军事教育就成），来替我们做些军事技术的训练组织工作，那会快些把我们的乌合之众搞得有组织起来。我不是打算把这样的人来做实际指挥战斗，因为他们不会打这种仗。

我这信断续地写了三天，前后言词如有些零杂重复之处，我很热心等待你们的指示。我希望你们根据我所提的诸问题，给我明确的答复，因为我的意见，现在事实上指导着这里的工作，不需要变更，我希望你们说一声，我的心才更拿得定。需要变更，也希望你们指出其所以然之处，才能做得完善，而又不使工作受损失。温同志早点回来才好，其他来的干部也望早点来。我虽然批评了温同志的错误，但对他本人我无成见。至于他曾经犯的错误，我永远也说那是错误，不会说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我们还在一起工作，我们尤须在思想上取得一致。我觉得我们在这样复杂的斗争中，我们谁也很幼稚，稍涉空谈，不去研究下层同志的实际，反映出来的意见，我们就谁也担不起这方面之寄的重责。

我本很想亲自在你们那里面陈我的意见，但目前此地情况，实在使我暂时未能走开，因而写起来就很长。

又今天接遂溪报告：遂溪现已有武装七百人了，计我与符共四百，各区地方队及武工队合共三百。自铁胆死后，民众兴奋，纷纷携枪来参军。三月中旬相信遂队定可达到千人以上。化州队数目前已有四百余人，另尚有步枪百支，系近日缴获者，未动员人来扛，这几天动员

对南路工作一点建议

——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发动农民参加
武装斗争结合起来*

(1947年3月18日)

我对南路的工作完全不了解，但南路是我的故乡，余于一月间回到别了十年的南路一行，从侧面的观察了解了南路的人民比十年〔前〕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党与南路人民解放军在南路有了很好的发展与影响。如廉江、合浦、博白、灵山、遂溪、陆川等县的广大农村都有党的组织，大多数优秀的知识青年及贫苦农民都参加了党的活动，以及由于我党和南路人民解放军的艰苦作风，保持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给人民很大的认识与影响。如去年南路的人民解放军第一团撤到安南，路经廉江、博白一带时，老百姓以及一般绅士都同声称赞说：“这样的队伍并不是土匪，纪律的严明，有知识，刻苦耐劳，我看国军是比不上”。尤其一般老绅士看到大批的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参加了党及部队的工作，不怕任何艰苦与牺牲，他们更为惊奇与赞叹。党在南路有了这些力量与在人民中间有这样好的影响，在目前只要将武装反内战的斗争配合党中央的土地政策结合起来，把南路人民的武装斗争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结合起来，我认为会有很大的发展。这里我只是将我这次回南路粗枝大叶所了解的土地集中情形及其解决的办法，贡献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作为你们研究工作的参考。

南路的土地集中情形，我这不打算作长篇大论的学院的分析与研究，我这里只举出一个有代表性的较典型的一个村的情形供你们参考：

南路的土地集中，除了一部分集中在极少数地主兼劣绅恶霸的身上之外，大部份是集中在所谓“蒸尝”（即祠堂的大公田）的手上，

则我们是有把握在半年内搞出六七千人来，乃至万把人来。为什么他们那么迟还不见回来。

我认为我的计划确实是较合乎此时此地的实际行得通的。希望你们详加考虑一下。

铁胆死后，群众兴奋之情，据化州方面来人云，平日食番薯粥的，听了消息也改食一天饭来庆祝。港市方面颇有买烧酒饮者，群众可能于此时一振，可能因此推动有些发展。

吴 1947年旧历二月二十日
(3月12日)

人讲话准数），如何开支其他人是无法过问，甚至开支的数目也不公开。为了这些“蒸赏”，年间不知闹了多少纠纷，但闹只管闹，这些朴实而又穷苦的农民也无奈他何，也有闹着要按人口来分“蒸赏”的，但地主恶霸们就一个不孝子孙的帽子加上给你，便无人敢说了。

这样的情形，不仅九福村是如此，在南路各县的乡村都是如此。南路的乡村大多数都是宗族集居的乡村，每一村都是一姓人集居，土地大多数都是由始祖将一部〔份〕分下来给各房子孙，一部分留作公共财产，叫做“蒸赏”，而子孙愈发愈多，所分得的土地也就愈少，甚至到了后来无得可分，而所谓“蒸赏”愈积愈大，这些穷苦的子孙的田地又渐渐卖回了给“蒸赏”。这点和陕甘宁边区的情形大不相同，而南路解放的程度又不相同，我们还没有公开合法的能给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政权。所以我认为目前解决南路的土地问题，应该通过农村的党员在各村发动合法的清算祖赏数目和分“蒸赏”田运动，把这运动和发动农民参加武装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据我所知道乡村间没有土地的农民，受恶霸压迫的农民大多数都有这种分“蒸赏”田的意识，但没有人去领导而搞不起来。而分“蒸赏”田在乡间也不是不合法，只要在本族的子孙有人去领导发动，政府是不能干涉的。因为乡间的习俗，“蒸赏”算是众人的家产，子孙要分家产，政府是无法过问的，社会的舆论也不会干涉。我以为这是在南路的情形下，合法和缓的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一种办法。当然这种办法不是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但在广东南路和桂南这种情形下，起码可以做到在农村中大多数人有田耕。如我们能帮助农民解决这一问题，南路的农民会以更大的力量来支持我们对反动派的斗争的。

最后我得声明：我对南路的情形因为隔别了整整十年，对党在南路的工作完全不了解，这只是我这次回南所见到的情形写成这个意见，也许有主观主义存在，但看到和想到的，不管对不对，应该提出给你们参考。

此外，反高利贷斗争目前在南路也是最好发动农民的办法，但这些工作据我看到的当地很少注意。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于港

“铁胆”死后余音袅袅(湛江通讯)

(1947年4月5日) ①

何 灵

自戴朝恩被人民武装击毙后，广东国民党当局于痛失股肱之余，深感南路局面动荡，镇压不可一日无人，当时就叫追随戴氏秘书宁可风代掌遂溪县篆，但是宁氏惊魂未定，那敢膺任这份“好差事”，所以复了一个电报上省，说自己同时遇险负伤，亟待医理，无法胜任为辞躲开了。该地军统最高负责人师管区司令林英和湛江市市长郭寿华会商结果，觉得戴“铁胆”的胆实际是靠他的副座梁传楷，便以“各界绅商”之名，极力保荐梁氏接任遂溪县长，俾可完成戴氏未竟之业。不过梁氏经常要带兵在外，里外兼顾，又非所宜。于是一想就想起省府参议陈汉华，因为陈家一贯在湛江地面财雄势大，这个时候不能不“借重”一下，同时为讨好起见，由省府表示，过去以逆产名义查封了的陈氏胞兄在湛江产业二十五处，也可“斟酌”发还，只要他或他的胞兄肯出来主持。陈氏财多命贵，怎肯披上“虱姆衫”呢，便婉词谢绝。跟着又想到要当地大绅袁学伟出任巨艰，袁氏也同样设法推却了。

这样直到现在为止，戴氏死后的继任人选，还是悬而未决。据局内人谈，张罗及邓龙光等人都为此大伤脑筋，曾不惜“纡尊降贵”亲自挥函敦劝，可是替国民党当局“做”过“事”的都有大叹笨种的惨痛教训，那个肯再做猫脚爪呢！

官方报导不是时而说南路情势严重，仿佛岌岌不可终日，时又说

① 按文章发表时间刊印。

那里“治安”不成问题，一若满有把握么？其实故作镇静不过想安定人心，大家都知道那是自欺欺人的。

戴朝恩的出殡虚惊，就最足以说明今天湛江市内国民党当局风声鹤唳的惶恐心情。

大概是鼓励“后死者”效法戴氏尽忠“党国”的缘故，戴氏出殡那天，林英、郭寿华等人主持的“治丧委员会”勉强抑压心上的颤惊，极力铺大排场，各界人士、各校学生都奉命参加执绋。长达数十丈的送殡队列在市内行进，人人心里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暗自希望不要发生什么事情就好。蓦地里一部驶过的汽车擦近队列中部，那里的人连忙散开闪避，行头、殿后的见中间人群走动，以为真个发生什么事情，立刻倒泻箩蟹似的抱头奔命。待查明真相，吹哨集队，已少了小半人。出到寸金桥时，更加人人戒惧，凑巧不知那里一声响起，送殡的又吓得唇青嘴白，头也不回的拔脚就跑，连叫也叫不回来了。出殡巡行只好就此草草完结。

近几天来，市面又盛传附近集结了千多“红军”。林英、郭寿华等更显得手忙脚乱了。人民却冷眼带笑地去瞧官儿们那副狼狈样子。

（原载《正报》第32期，1947年4月5日）

△△关于吴同志对区党委及 温同志批评意见的报告

(1947年4月) ①

我现在把吴同志对区党委及温同志来信的批评及其自己的说法做法报告：

本来这问题我是不打算作文字报告的，因为太拉杂（他当时不是有系统的正式发言，而是在谈工作或其它问题时逐个逐渐反映出来的），是比〔所以〕作起文字报告来一方面很困难，另一方面又恐怕与其原来意思有出入（他当时是口头讲，我现在却用文字写）。现在区党委既然要我作文字报告，为了党的团结，路线统一，以求今后工作之开展，我还是负责地把我所能记忆的写出来。

他对时局的认识及总方针的意见——他认为目前应该大搞，K在解放区战场打得要命，后方现极度空虚，再不能在前线抽调军队，就是抽调兵来也不足怕。同时人民痛苦到极，再不能生活下去。而中央的方针无疑是要在蒋管区大搞的。他引证“燎原之火”这篇文章叫我们研究，他很肯定指出我们应该“大搞”的方针是“绝对不会错的”，叫我们“大胆下决心大搞下去”。因此他批评区党委九月指示是损失力量断送部队的死路（他引证化、廉……各地损失都是因九月指示之传达所映〔影〕响，他说他曾因这指示”激到“哭”），和中央政策极对立的。他说：“正是南路传达九月决定，说要过十年八年黑暗世界的时候，而周恩来同志却向美联社记者谈话指出：一年内击溃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中国政治、经济将起大的变化。”又说“正是南路分

① 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散、隐蔽、精干、避免战斗、不敢刺激国民党……的传达和做法时，恰恰中央解放社社论就发表了《燎原之火》，要求在蒋管区开辟第二战场，配合解放区斗争。”这是在他十二月间当温同志离南路后给我的意见，并说明他既向区党委提供了整个意见计划，“已得到区党委批准”，同时区党委要求扩大这意见计划，“准备调安南资本回来”，他说区党委“已修改了九月决定。”这时他很兴奋，他叫我们即刻扩充部队，愈大愈好，叫我要在一月内恢复九月以前部队人数（查九月以前四属据说有五百左右的人数，到十一、二月间是只有二百余人，他的意见就是要我处从二百余人扩充为五百余人左右），三月内要扩充到数千到一万。要我把四属的民间地主武器在这期间全部或大部弄到手，并叫我们不可犯“精兵主义”。并指示“避免作战”之不对，“要主动的随时随地准备去打人，不可只等人来打我”。讲解了一篇关于游击战争的问题，同时说明区党委不久当有人到和整个计划到，现在还是他个人给我参考性的。

到今年二月间他派了交通到来找我，叫我到湛江见他。一见面他便很扫兴的报告温同志的来信，他说：他接到这封信以后三数天睡不得觉，他即逐个逐个提出意见，叫交通带回香港，跟着他就拉拉杂杂的发表意见：

(1) 他认为温同志这封信的办法是“自己制自己手臂的”，不放手动员的，他说信上指定“你钦、廉四属只得存七十人左右的主力，廉江若干，化州若干，高州不搞。真是笑话，你四属既有四百余人，有十六、七挺轻机，你接到这指示怎么办？又来解散他，或埋武器，过去的痛苦经验还不够吗？高州不搞，其理由是说能隐蔽下去了，真是毫无理由。”其意思是说温同志这信不敢放手大搞，只是小搞，局部的搞，是不行的，所以还是认为和过去九月指示一样是“自己制自己手臂”的。

(2) 同时他指出温同志信上“从小搞到大搞”不对。他说目前大搞温提出四个困难：①是干部困难；②是兵源困难；③是经济困难；④是武器困难。他认为这所谓四大困难都是不成问题的，这就是不敢大搞，无胆量无魄力的似等待组织的说法做法。

(3) 他不同意“不可刺激”的说法做法，他认为怕刺激就是怕引起斗争，他说要反“三征”，有什么办法不引“暴动”，怕刺激国民党，怎样去开展反“三征”，反“三征”是必然会引起暴动和刺激国民党的。他认为是不怕引起暴动和刺激国民党，怕刺激就是不敢放手动员群众来造反的。

他又说：“温的来信真奇怪，既限定各地主力只得百几十人，而又规定许多大任务说：△△在一月内搞到一亿元的经济，一万石（或一千石我记不清楚了）谷，控制交通河流、公路。这样少的人要他做这么多的事，你说做得来吗？更有更成笑话的，他说叫我们把电台……等搬到△廉博边境，那里做领导机关，说不要在内里暴露刺激，而是在外围活动。这样做法真如遂溪沈（或就是遂溪的现任负责人），说他做梦，”这一段话就是他批评温同志的主观梦想。

我听到这里向他发话：“区党委的总方针未必错吧，这是温同志个人来信的毛病吧？”他说：“都错，你看他们领导机关人物，我在报纸上都见他们亲自去参加反暴行集会（是不是说反暴行集合；或其他名义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总之意思是说他们领导机关的人物的精神视线是主要放在不紧要的民主集会讨论上，而不是放在农村武装斗争上）。

我又说：“从小搞到大搞这方法未必不对吧，因为这是合事物发展规律，要从小处做起，怎样一下子便能大搞起来的”。他说这仍不对，照他们的这种小搞办法就是如他的来信所说，能说这样搞得世界出来吗？”我说：“你和区党委和温同志的意见有这么大的出入，你能够到香港去一行，尽量把南路的情况和你的意见、做法提出和区党委讨论，求得路线统一，使我们干部执行得也乐意放胆。”他说：“我已提出了意见，静待答复，但目前照我的办法做去绝不会错误，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事实证明，只有这样做才是活路，除此只有死路一条。”我又说：“据你所说，温同志不久将啣区党委之命回来，假如他仍是如你所说的那一套，那么我们将怎么办？”他说：“这大家可以充分提意见，准备召集一个会来检讨一下。”

这次见他除了主要如上的说话外，他还和我谈了一些其他地方搞

的经验及如何“带兵打仗”的问题，并草率地报告一下区党委由林明同志回来的政治问题传达，他对这次传达也不满意，认为国际问题一大堆，国内就小了，广东更少了，南路一点不提。意见是说不合实用无补于实际的一般的東西，所以他向我报告时就是不重视认真，只是草率了事，他还拿出一篇他自己写的关于游击战争的问题，这篇文章都是针对南路军事特点写出的，写得切实生动，大家都当他至宝。我见了他便匆匆返到防地，基本上我是执行了他给我的意见指示的。但我始终认为，在钦廉四属还必须从小搞到大搞，目标是大搞，但要从小到大，因此我不放弃积聚力量，不消耗力量的稳扎稳打，逐步扩大力量的方针。大概吴同志见我回来以后个余二个月来，而他们遂、化、廉则干得蓬蓬勃勃，而我们四属则还是息息无闻，无多大的进击展开吧（这是我个人的估计）。所以在前约定的时间他便派了一个高唐同志（是化、吴、梅的负责人）到我部队地区来找我，并携有吴同志的亲笔信，叫我把四属部队交唐同志率领带到化、廉集中使用，说唐同志是他（吴同志）司令官的代表。和唐同志相处数天，便从唐同志口里反映出更多材料，唐同志除发扬、强调了和吴同志一样的对区党委和温同志来信的批评意见外，更提供了更丰富的材料，他除了发扬吴同志如何了得如何有本领、有实学、有胆有识，“大家当之如神”。同时他很尖酸批评过去大周和温同志的领导，认为他们二个都无胆量。”过去起义，在化州打了一次败仗，便缩回湛江，一切交由一个参谋长去搞，自己不敢亲自跟部队生活，亲自来领导部队，领导部队自己不深入部队，一味主观的发号施令，有什么法子不误事”尤其对温同志的领导作风，认为是八股、官僚，没有做过下层干部实际工作，一下子就提拔为广州市委组织部干事（并说当时是吴同志为组织部长，他只是干事），以至省委组织干事，以后派出来南路当组织部长。温在南路所有的干部，没有一个人对他好，不能团结一个人，自己不知不晓又不行多向干部学，一味主观，什么都想得到，但什么都是空想”。他说到这里用一句很尖酸刻薄的讽刺比喻说：“这样的人只有放到火柴盒里，好象木奶儿〔乃伊〕一样是不能见光见空气的。”我说：“据吴同志说他不久又将派回来负责主要工作，那末对他今后回来领

导工作，你们应该怎样办？”唐同志说：“如果他叫我到湛江来见他，我们将对他说不待闲来见你啦，”这时我心里想：“那末他们不是准备反党反组织了吗，那末自己应该怎样办？采什么立场态度呢？”我经过一夜的考虑，便决定采取自己应有的立场，觉得不应无头脑的轻率地跟他们做尾巴。我便郑重地向唐同志表示态度，叫他转达吴同志说：“我没有接到区党委的正式通知以前，暂时不承认吴同志对四属组织的领导关系，他目前所组织的司令部，四属部队不在其发号施令范围内，四属部队暂时不能东开”。后我便决定来找区党委和温同志，我要弄清目前究竟党的路线怎样（中央的、区党委的），究竟对形势如何分析和估计。

二个半月以来国民党军政措施情况

——蒋管区军政情况变化、党的组织工作*

(1947年4月) ①

甲、十月份以来蒋管区军政情况的变化

(一) 过去四六军留下的一个团已调走，九月底则增调一五六旅（六四师其中的一旅）到南路，为大规[模]“清剿”屠杀的主力，旅长刘镇湘，司令部设广州湾。兵力分布：合浦四六六团；雷湾四六七团；化、吴、梅四六八团。每团约在千五百人左右。配备是和各杂牌军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美式装备。这个旅（整编前）于四、五、六、七[四]个月期间曾有两个团驻防雷湾、防城，担任“清剿”工作，但表现不积极，以后则调走整编。这次重来，对于“清剿”工作表现特别凶恶、残暴、积极，大概是经过整编后许多中央化的人物打进去的原故。但是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清剿”工作，仍然没有达成他们“清剿”的任务，又奉令调走去华中，等候着毁灭的来临。由十一月底开始紧急军运，闻说他们的计划仍留下四六六团于雷湾一带，继续进行“清剿”，等到别个部队来接防时才调走，以后是否如此，不得而知。这次调走之时，官兵士气颓丧，逃亡甚多，闻说有一团长辞职不去，他们都认为新一军这样精锐的部队都被打垮，我们是更不用说。一般商民、市民很高兴他们快些走，免遗累地方，认为他们老去打共产党，给共产党来消灭也好，也算是我们吐了一口气。

县区指挥的地方团队没有什么变化，有改变的是各军所组织的联防队（几乡联防）最近决定解散，以增强乡的自卫班的战斗力为基础。

① 原件未署作者。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乡自卫队人数由二十人至四十人，限定每乡要买一支机枪，每保组织五个至十个保队担任放哨、卡守、巡逻，这个计划现在开始进行，这是国民党计划今后不需要国军，依靠地方武力便可维持治安及能够经常的进行“清剿”工作的步骤。

（二）行政人事上有了一些变化，十一月份撤换了化州、吴川、海康三个县长（闻徐闻县长也预定了撤职），新换来的县长：化州是前任惠阳县长任永辉；吴川县长李敏（据报载是K中央派来当库田粮处做什么长，罗卓英不接受而改派为吴川县长）；南路县长又多了几个中央化的人物。当前行政的中心，是“清剿”、征兵、征实、征粮。征兵、征实十一月份开始实施，征兵大概每保二名至三名，仅广州湾而言，人口约有二十七万，第一期要抽390名，限十二月份完成，每保要抽二个人，其办法是各保收壮丁费，缴交市府便得，每名壮丁约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另外每保还要出送壮丁入营费三十万至四十万，大概每一保最少要缴交八十万元（有些地方一个中农就要缴二万五千元的壮丁费），市府就去捉当地流氓、难民、乞儿去当壮丁，他们就因此而大发财。广州湾中有一保收得壮丁费值千余万元，但实缴交的壮丁费最多不过百余万元而已。就广州湾市民对征兵态度而言，一般认为K的“坏政府”比日本仔坏得多，法国人统治最好，不然被日本仔统治也好过K。对于抽壮丁，市民都知道是为着打内战，不愿意去当壮丁，如果是无办法被抽去打仗的时候，就走过红军那边来，一种想法是因为红军会优待给路费回家，另一种想法是可以掉转枪头痛快的来打蒋军一下。

K的特务统治是逐渐加强，我们在水东已发现K收买当地流氓当特务，每一条街指定一、二个特务负责管理该街的户口，广州湾则开始实施联保统治，约三保至五保设一个联保主任，另组织十名保队，为执行维持该保治安责任，规定每个保甲长要负责调查管理各户口，如是商店的则要调查其生意情况，是否真正做生意，凡是有可疑的户口需即呈报，如不报则受连坐处罚，并规定实施联保连坐法。现在对于户口籍管理已进到户口异动登记，各个县城、市镇都随时抽查户口，白天临时戒严，施行检查，十一月广州湾抽查户口中无户籍而被捕者

几十人。

乙、蒋军的“清剿”与坚持斗争。

(一) 过去由六月至九月是以地方反动武装为主进行“清剿”，但未能达成肃清任务，而且“匪”风更炽。在K地方当局屡次电省府行营派国军来剿，终于九月底调了一五六旅来，K当局曾对其部属说：必须于国军驻防之时，努力协助肃清“奸匪”，并迅速完成扩大地方团队，使今后能够单独担负“清剿”任务。国军驻防时间仅数月而已，我们可以看出K的计划要在蒋军驻防的几个月间迅速扑灭我的主力，同时在大军压力之下迅速组织起地方反动武装，使蒋军调走后能够继续“清剿残匪”。几个月来蒋军“清剿”的布置上，首期是着重于化州和合浦，这两个地区表现得也特别残酷，这是由于过去几个月，该地区我的队伍积极活动，对K刺激最大之故（九月中我在化州集结部队有三百余人）。蒋军一到便即开始进行“清剿”，直到现在未曾停止过其屠杀。兹以化州为中心，报告蒋军“清剿”情况如下：

对于化州的“清剿”，是划分为三个地区部署，化北、化东南、化南与化廉边境，而首先是集中兵力搞化北，其次是化东南，再其次是化南、化廉边境。当时在化北我军有百余人，蒋军一营及自卫队二个中队、二个联防队，约共兵力六百余人。蒋军找到我们三个目标，一个是在化茂边境山地六皇嶂，这是我最近组成的新部队二十余人，集中二百余人向我进攻，激战竟日，结果我被俘二人，牺牲三人，被缴获枪枝四五杆，我部队被打垮了，只余干部数人带枪转移别地，尚能保存的枪支则埋藏下来。蒋军在我部队活动的乡村进行大屠杀，杀了五六乡民，捉了十余个老百姓。我新开辟的阵地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另一个目标是在化北之那雾、新江乡，我刚刚组织起来的部队三十人，蒋军也派了同样的兵力包围，我军没有作战就瓦解，地方青年群众领袖被捕（是该部队的组织者）而英勇牺牲，队员被捕三人。在这样残酷进攻之下，队员纷纷自首十余人，这样我新开辟的阵地遭受打击而丧失了。最后一个目标是在化州中部官侨、中洞、林庆一带，是我化北主力队五十人活动的地区，该部队有二十人左右是曾经坚持斗争有年余，其余则是最近动员的新兵，该部队过去曾和蒋军、自卫队战斗

过四次，结果我军都打退了蒋军的进攻，他们初期是采取了主动打击K军和坚决自卫的，士气情绪相当好的，但当蒋军后一次进攻之时，干部动摇逃跑，解散队伍，埋枪，结果二人受伤被捕牺牲，埋藏的武器被缴去机枪一支，长枪二十余支，这是我最大的损失。蒋军打垮了我各部队后，即进行逐乡“清剿”工作，主要是强迫自首，我队伍中一个交通员被捕叛变，供出了许多地区和人名，过去的地下军组织和复员人员遭受了很大的威胁，我又无队伍与干部坚持领导，因此，许多队员、复员人员不得不自首（约有数十人，真确数目未能统计）。这样情况下，K当局便宣布已完成肃清化北“奸匪”的任务。我目前整理尚能坚持化北的队伍约有二十余人。同时在化东南进攻的约有二个连和二个自卫中队、一个联防队约有四百余人，我队伍二十余人。蒋军对我活动地区进行穿梭扫荡，凡是到达一个村庄时，即开枪扫射，如发现逃走者即追击及逮捕。其扫荡目标不仅是在我暴露地区驻兵清剿，而且在暴露地区外围，即使是蒋军认为是没有我军活动的地区也驻军，一方面是防止我军突围而出，另一方面则是使我军不能分散，由暴露地区转移至隐蔽地区，以避免蒋军的“清剿”。蒋军于穿梭扫荡中是见人便捉，见山便搜索，见河渡便封锁，捉到的人就用刑迫供我军情报。扫荡战中同时出动的四五路，然后再汇合成一路，有时同一地区的扫荡是经过四五次之多。出动的时间多在半夜就包围村庄，待天明后即入村搜索，如找不到我军则逮捕该地的保甲长、队员家属、地方士绅，要他们供出我军情报及引诱威吓我回家队员、干部自首，并强迫队员家属出花红悬赏通缉，少者三十万，多者百余万元。在这地区扫荡中，队伍没有什么大损失，我所受损失最大的是牺牲了一个队长陈球（是该区队伍的军事首长，是优秀干部），这是由于他离开了大队，只留下二个队员在一暴露据点打算去捉一个反动地主，这个据点为K所包围，后突围而出，又为K军追击，这时他仍在病中，但要游水过河始能脱险，他便叫一个队员顶K，他自己先游水过河，不幸就在河中溺毙。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先有一个小鬼的交通员被捕叛变，供出了许多关系，陈球驻地被包围，就是由这个叛徒供出的。此外的损失大的就是在该区队伍有一个小组三人在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

新据点隐蔽，当时群众对他说附近有K军不宜驻，老百姓的话不睬，仍是驻下去而又不放哨，即遭敌人包围。二个队员突围而出，另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逃出敌人的包围时没有坚决抵抗，就手软脚软走不动，就束手被捕，很快就叛变，带了蒋军去捉人。二个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农民党员就给他出卖了而被捕，英勇牺牲了，最后这个叛徒也被K军枪毙。

蒋军在化北、化东南的“清剿”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就集中兵力扫荡化南、化廉边境、化吴边境，化南与吴川一带K军集中的兵力差不多近二营人、二个自卫中队人数约八百余人左右，其扫荡的区域约有六七条乡，是在纵横四十里内，副团长坐镇指挥，县长亲自出动打气。他们认为化南是最难搞的，而又是最重要的。化南是化州部队发源地，坚持斗争已有二年之久，是化州党坚持斗争的主力，群众最好的地区。九月中曾集结百五十人，经过整编复员后留下坚持的武装工作人员就有六十人至七十人。因此蒋军对这个地区的扫荡准备工作时间最长，布置周密。九月底十月初K曾经集结化、吴、廉三县的团队共约二百余人向我化南据点甘村进行分进合围的进攻，不料我军早已转移。化州自卫队进入甘村后，我即向甘村K军攻击，同时廉江自卫队、联防队也向甘村化州K军攻击（以为是我军），化州K军便在我军与廉江K军夹击之下死伤十余名，我毫无损失，激战至夜九时结束战斗，廉江K军已弹尽，怕我军追击，狼狈而退，吴川K军则鉴于火力太猛不敢加入战斗而退。这件事引起K内部打官司，从这次后K军就未有进行大扫荡，主要是进行特务活动，派出的特务有蒋军的、县府、乡公所的。特务的打扮有各种各样形式如乞儿、牛客、猪客、担观音、各种小贩、占挂、算命，统计起来有十七种打扮，其任务是暗杀我干部，侦察我军活动。其次是组织机动部队对我打游击，约在二十人至五十人，昼夜都出动，如发现我部队活动（特务和他有联系）即进行突袭，同时其他部队同时出动协助，这个机动部队有时是便衣的。到十一月中旬蒋军就开始向化南及化廉、化吴边境进行大扫荡，其战术和化北、化东南一样，但表现更残酷。由于找不到我军的目标，而毫无办法之时，就把我据点周围的保甲长、绅士、我队员干部家属

捉起来（无论大小老幼都捉起来做人质），要交人才放，对我队员干部家属实行以烧屋屠杀来威胁，要找我的队员干部回来自首，要凡是出外营商的限期回家具结，否则当“奸匪”论罪。蒋军的军粮由驻地居民负担，仅甘村（二千人口）一地每天就要交十五担白米。另外则强迫组织保队，凡是有枪的和壮丁都要参加，放哨、警戒、卡守。与军事扫荡同时进行的就政治进攻，由四六八团副团长亲自负责，进行造谣、分化、挑拨等一切卑污手段都运用到，其方式是找保甲长、绅士、自首分子、我队员干部家属来训话；或个别谈话，其内容：剿匪是为着安民救民，匪的罪恶，没有前途，宣扬K的法政，只要自首就不追咎，并可写保证书，保证生命安全，造谣说某某人已缴枪自首，如何优待，同时写标语，大字写着自首者不杀，缴枪者不杀，某某人已自首，如不自首杀无赦，在群众中普遍散布我的队伍被打垮了，某某人已经自首，某某队伍缴械投降了，企图在我部队内外造成投降自首的热潮。并规定保甲长每天报告一次情报，保甲长呈报该保参加我军的人名及我军活动的情报，如隐瞒不报则杀几个保甲长以为警戒。更重要的是利用叛徒对我进攻，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向我内部进行收买、自首、叛变。在K军、政进攻双管齐下底下，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未能打垮了我们的队伍。在化南地区共发生如下的事件：（1）蒋军在某一天的搜索中，我三个队员与之遭遇，二个坚决抵抗而逃脱，一个是动摇害怕，束手缴械被捕。在蒋军严刑之下叛变了，供出了我队伍活动的地区和队伍的详情，并带蒋军到吴化边境的一个交通站逮捕了一个群众（做交通站工作的），这个群众表现着不屈不挠的精神而英勇牺牲了。继续又带蒋军到我部队活动地区捉了一个以前代我军烧饭的老农夫，这个老农夫当面斥叛徒的无耻，指出这是他当时用枪来威胁不能不烧饭的，后来释放。从此，蒋军对叛徒有些信任，便给他一支枪，成为蒋军的士兵，在蒋军无法找到我的主力的时候，叛徒献计对我打埋伏，蒋军便叫他如计执行，但为老百姓所知道，报告我们而失败了。（2）另有一个叛徒，就是化南另一个部队中参加队伍不久的队员被捕而叛变，供出了许多复员人员的姓名，蒋军更借此来威胁保甲长呈报参加队伍的人员，保甲长见我们的队员也叛变，他们本

身也受很大的威胁，因此不得不照实报告（初时对蒋军是不承认该保有人参加的）。在此情形下，许多复员人员遭受了严重威胁，我又无干部在原地区坚持领导，解决问题。因此许多复员人员被迫去自首。

(3) 蒋军更利用这个时机扩大自首运动，派了一个当地士绅去进行引诱我某一个小队知识分子干部自首，由副团长给以保障安全的文件，并要他潜伏在队伍活动，进行动摇与引诱他队伍的首长自首，这个知识分子接受了蒋军的自首，但没有公开暴露。后来他队伍的首长发现他表现动摇、苦闷，故意骗他说自己很苦闷，表示无法坚持，想自首，但不知自首后有无安全保证，他便说出副团长曾委托他向你保证只要自首就保证生命安全。后来我们扣留这个叛徒，搜出蒋军给他的证件。

(4) 蒋军捉了化南主力队军事负责干部的全部家属，强迫他的家属到外面限五天内找他回来自首。否则全家杀掉，他的哥哥被迫四出找他的弟弟回来自首，后来被他找到，便跪在地下大哭，哀求回去自首，以保存一家生命，保存种子，全家生命都在蒋军手里有什么办法。这个干部精神受着巨大的打击，动摇了，自己拿了一支左轮去自首，自首后遇到队里的人时鼓励他人继续干到底，没有表现积极叛变的行为，这个干部是化南坚持两年来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干部，创造了相当的成绩，这次的投降是由于在二个月独立活动中没有取得党的领导（负责人没有见过他），在蒋军的残暴政策下徬徨苦闷而走向动摇。他的自首给予我政治威信巨大的打击。(5) 一个交通站被破坏，交通站负责的一个群众被捕叛变，供出了许多复员人员和地下军人员，致遭十余人被捕，被迫自首。(6) 一个流氓在我军活动昌盛之时参加了队伍，在蒋军进攻之下自首了，并带蒋军掘起了我军埋藏的枪支二十余杆。

敌人此次对化、吴进攻二个月来的情况总结如下：(1) 蒋军几调动了近一个团的正规军和三个县的自卫队约三个大队、三个联防队约共兵力在千五百人至二千人之间，向我军二百人进行二个月全面的大扫荡。其所运用的阴谋是继承及发挥了过去二年来的“清剿”的经验，是更有组织、布置更周密更残酷的一次。初期以军事进攻为主，后期以政治进攻为主，有时则是以军事进攻与政治进攻双管齐下。军事进攻是以消灭我军主力为主，同时在军事压力下动员与组织地方反

动武装来配合。其军事进攻有时是集中兵力层层包围，有时则是分散（以排为单位）于各个据点进行侦查搜索，有情报有目标必出动，无情报无目标也出动，不仅对暴露地区扫荡，即使不暴露的地区也扫荡。其扫荡战术是穿梭犁耙式扫荡，分路合围，游击活动，打埋伏、军事高压底下捉乡保甲长，强迫报告情报，组织保队协助清乡，同时大举逮捕了二个乡长、三十余个保甲长，杀了三个保甲长，被捕乡长未杀，正实行勒索，有被杀的可能。逮捕了一切没自首的队员家属（无论男女老幼），一人杀，出花红悬赏（由二十万至百万），烧屋、充家产，来威胁、强迫子弟自首，反动份子以此来报复，施行造谣、分化、挑拨、收买、奸细政策，造成了我队伍内外的投降自首倾向。在找不到我主力之时，便以此为瓦解我部队的主要方式。（2）在敌人的残酷进攻之下，我队伍被打垮了，二个新的队伍，一个老的队伍共约百人，被捕二十余人（连群众被捕的近百人），英勇牺牲的十余人，被迫自首的六十余，干部自首的二人，积极叛变的八人，被缴出掘去的长短枪七、八十支，轻机一挺，干部牺牲二人，损失最严重的是化北和化南。

蒋军对于雷州区的扫荡，只动员一营的国军和一个机动大队、四个联防队进行扫荡，在这期间，实际上正规军即出动二次，只是在遂溪南部，地方团队则在遂溪之西部，东部及中部都没有扫荡。这次扫荡还只是局部性质，还未有发动全面的大规模的扫荡，主要是由于找不到我的主力，更需要长期的准备、侦查、布署，以期一网打尽。但是他们苦闷的是始终找不到我部队活动的具体情报，驻防在东部的一个营长对人说：“真麻烦，派出了许多人去侦查，命令各乡公所送情报，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接到真确的情报，真是难办。”在南区的扫荡，找不到我部队，就在扫荡目标的地区逮捕了保甲长，先把正副保长捆起来，要他报告我部队的情报及这条村何人参加部队，保甲长都拒绝供给任何情报，蒋军就把副保长拖出去进行假枪决，真的打了数枪在副保长的耳边穿过，并用一个席包包着这个假死的保长，并命令他不准动，对群众宣布保长已经枪决，你们如再不说也一齐枪决。这时全村大小老幼都呼天叫地，大家一块跪在地下，要求连长不要枉杀无辜，

使得那个连长没有办法，后来把全体保甲长押上连部，那时全体村民联名保释，被捕的保甲长经获释放了。这个连长就此事对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坚强不屈的乡民”。在另一次扫荡中逮捕了暴露村庄的村民十余人，其中有四个农民同志。在西区的扫荡中，牺牲了一个武工队的同志，这是我派出一个武工队去开辟新地区被敌发现，当时由于麻木，不立即转移而被包围，就是在突围了而英勇牺牲了一个优秀的同志。蒋军大部调走，但仍留一个团驻在雷州，大概是由于二个月来对于“清剿”没有丝毫成绩而必须继续“清剿”之故吧。

对于合浦的扫荡是首先集中二个营的兵力扫荡合浦南部（公馆、南康一带）。当时我集结在南部的约有百人（包括收编地方土匪在内），蒋军分水陆路二路包围，但没有达到其消灭的企图，遭受了一些损失的是收编那部分土匪首领被捕牺牲，这个队伍也瓦解了。还有一个区级的农民干部（是公馆区的负责人）晨早在蒋军包围的村庄中被哨兵逮捕，以后情况不明。蒋军是在计划解决合浦南部的部队之后再集中兵力扫荡合、灵部队，在这个时期，K是以地方团队来扫荡合灵部队，灵山县政府曾组织以当地流氓、土匪为骨干的部队配以相[当]强的火力为扫荡我灵山部分的主力，据报有一次向我黄文法部队进攻（五十余人），激战竟日，黄文法（部队首长）就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队伍是遭受了相当损失，大部队是被打散。其他各个队伍情况不详。

其他对于廉江、茂电部队的扫荡，动员兵力正规军一连至二连及地方团队一大队，我部队未有什么损失，只是逮捕一些群众，廉江有四个暴露同志被捕。茂电部队原有五十余人，有三十余人转移山地，留下坚持原地（茂南）的部队，因失掉领导及遭受蒋军不断的扫荡底下，负责人把队伍解散，把枪支埋藏。

（二）如何领导坚持斗争

第一，七月中根据区党委五月的指示及南路实际情况，坚持斗争布置如下：遂溪、化州重新各集结部队百人，并各建立主力队五十余人，对K地方反动武装坚持自卫斗争，在自卫原则下，争取主动打击敌人，坚决镇压地方反动分子，保卫地方暴露党的组织和群众利益；另一方面积极开创新地区，尤其是化、廉、茂、海、徐之山地，建立

长期坚决斗争的据点。在九月初，我赴港之时，吴同志把这个布置改变为扩大集结队伍，进行推翻K反动政权，建立解放政权。我于九月底回到南路时，遂溪已集结部队二百五十余人，化州三百余人，廉江八十余人，茂电六十人，并已调动遂溪主力到化州与化州部队会师，准备袭击县城K的军械库，此时化州经过三个月来的努力开辟的新基础，如化北山地及化州之中部，都因进行缴械集结队伍而暴露。在此时正是K大军压境，情况突趋严重，在此情况底下，根据区党委的指示进行紧急的布置：

一、一方面把已集结的部队大部分复员（都是新的队员），留下适当数量的部队坚持，化州、遂溪各约一百人左右。至于留下坚持的部队则进行分散的活动，以三种形式整编：武工队、地方队、主力队。化州的主力，一个三十余人，坚持化南、化廉边境一带，开辟新地区，并逐渐发展和化北主力队汇合，一个在化北约三十余人，其任务是一方面坚持原有的基础，掩护武工队开辟化州与广西边境、化州与茂名边境的山地，准备化州主力于旧地区不能坚持之时则转移到山地新的隐蔽地区。化东南的则保留二十五〔至〕三十人专负责做经济活动，控制鉴江河收税。遂溪的其主力则放在遂溪泥地（即遂溪中部），约三十人至四十人，另一个主力约三十人，准备将来开辟徐闻山地据点，准备工作未完成时则主要在海、遂边境作分散隐蔽活动。一个经济队二十余人，是坚持西区及进行海上经济活动。此外派出大量武工队到海、徐开展山地新基础。廉江部队分为二个部分，一个部队约三十余人转移到廉、博边境山地活动，主要是开辟廉、博边境山地工作；一个是经济队约三十余人，在安铺至遂溪的公路两侧及廉江之海岸展开经济活动。茂、电部队则把一部分约三十人转移到茂东云谭山脉到电白之阿岭一带山地活动，开创新基础，另一部分约十余人，留下原地茂南坚持活动，并另外准备组织一个海上经济队，进行海上经济活动。至于合、灵部队的处置：（1）合浦南部（公馆、南康一带）的部队百余人，原有在合浦北部转移下来的则迅速转移北上，原地的部队约四十余人则转移到合、博、廉边境活动，如不可能，则转移到合浦中部山地（新地区）活动。（2）合浦北部的有二部分：一部分约

六十人，是仍然坚持白石水至灵南地带活动，同时派出部队至由白石水至西场之间的山地及合浦至钦州之间的山地开辟新基础，准备于部队于原有地区不能坚持之时则转移到这新的山地。另一部分是小江部队约三十余人，仍坚持原地活动，同时也派出部队在合浦至博白之间的山地活动，开辟新基础，准备原有地区不能坚持之时则转移到这新地区。（3）灵山部队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坚持灵山东北，一个是坚持灵南，一个是坚持灵西。总共约二百人左右。上述的布置是根据精干隐蔽分散的方针出发，但是我们强调的是积极发展新的山地基础，不断发展新的力量，才能隐蔽，才能保存力量。对这方针的执行不应该是消极的，而应该是积极发展的。我部队的坚持斗争，大部分是减少原有暴露地区活动，转移到新的地区，一方面是为着开辟新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为着隐蔽（对敌人来说），使敌人找不到扫荡我部队的目标。同时对于原有暴露地区，即部队原有活动地区仍然留下一小队或武装工作人员坚持，一方面是联系群众，领导群众进行反扫荡斗争及侦查敌情；另一方面则镇压地方的反动分子及特务。

二、另一方面加强部队内反扫荡斗争的政治动员，加强对长期积蓄力量的基本方针的认识（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坚定坚持长期斗争的信心与决心，同时加强群众中反扫荡斗争的动员，我和群众结合起来进行反扫荡斗争，并展开上层活动，争取乡保甲长采取两面政策对付K的扫荡。我们的目的是使K军得不到群众任何的帮助，乡保政权不起作用，使其陷于孤立，使我队伍的活动保持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援助，使我们能够克服困难，坚持斗争。

三、地方党的负责干部仍然继续负责领导部队，而且是当时的中心工作。对于全南路的武装工作仍由我们直接负责，当时实际上不可能由新提拔的干部负责整个武装工作。

这是我初期对坚持斗争布置的简要报告。

第二，各地对坚持斗争的执行情况

一、各地党（除合灵十一月以后情况不明外）对坚持斗争的布置都依照决定执行，除化州损失较大外，基本上保存力量。目前各地保存部队情况如下：遂溪110，化州120，廉江70—80，茂电30—50，

合灵350（十月底的统计），钦州20—30（这是根据合浦同志的报告），防城101（这是防城同志于七月底时的报告），总数是700至750人之间。各地部队装备：合灵部队机枪约五挺至八挺；遂溪轻机一挺，重机一挺（没有软疏），驳壳约五十支，炮（不知是什么炮）四五门（炮弹仅二十余枚）；化州轻机一挺，驳壳约有七十支左右；茂电部队轻机一挺，子弹平均20枚左右，手榴弹甚少，驳壳弹也少，平均十枚左右，轻机弹平均几百枚。部队中有战斗力〔的〕：遂溪约有三十至五十，化州三十至五十，廉江约二十，合灵约百五十左右。总共可整编为主力战斗部队（对K地方团队而言）约有二百至二百五十人之间（这是最低限度的统计）。目前部队的军政干部都是两年来坚持斗争锻炼出来的知识分子和少数农民干部，但是主要的强的干部都已跟主力团撤退到安南及北撤。目前部队干部中可以提拔为大队级干部：遂溪四名，化州四名，廉江一名，合灵的约五名，茂电二名。各地部队和干部的特点：合灵部队和干部是经过近两年和K正规军、地方团队不断战斗过，而且战斗都是山地的阵地战为最多，每次都是数倍敌人，每次都能打退敌人的进攻，每次战斗结果都是敌损失大，我损失小，亦曾打过几次伏击战、袭击战，也相当成功。长期都是集中活动（以一个中队五十人以上为单位），不善于分散活动，不会做武工队活动，开辟新基础。长期脱离党的领导（党的组织问题尚未正式解决），干部对党的政策和目前情势了解得很少，政治落后，内部常闹意气。遂溪部队约有三分之一是经过敌后斗争的锻炼，其他都没有打过什么仗，部队内党员成分占三分之二，政治认识较高，内部较巩固。目前的中队级干部都是新的，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是缺乏的。对于开展群众工作是有经验的。化州部队有作战经验的约三分之一，党员占三分之一以上，有许多中小队级干部作战是很坚决很勇敢，常常一个小队几个人在十倍于我的敌人包围之下安然突围而出，但对于指挥打大仗，如合灵部队一样的作战的经验是缺乏的，他们的特长是善于做分散活动，开辟新阵地和开展上层工作，有大刀阔斧的作风，在这方面是有很大的成绩。在另一方面则造成他们的骄躁轻浮轻敌和过左的作风。茂电部队的建立仅一年时间，过去是没有经验，脱离群众，不敢大胆

开展工作，怕暴露，所以食和住都不能解决，后来跟化州部队学习，才有些改变，活跃起来，亦有了信心坚持。廉江部队的建立的时间来说有二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地方主要干部北撤，地方主力队的转入越南，地方负责干部又调动，一个时期留下地方的干部是很弱的。因此，在五月至八月中都陷瓦解的状态，后来派了干部，坚决恢复部队，经过积极的动员之后，又把散在各地的武装人员集结起来，有战斗经验的约三分之一，但没有强的政治干部，队伍内部党有不团结的现象。各地部队和干部都有坚持斗争的精神，没有和平的幻想，在最严重困难之下一般的表现是坚定的，但必须有明确的方针，使他们在思想上一条心去坚持斗争，他们就能发扬坚持斗争的精神。如果方针不明确，如要坚持而又强调隐蔽，避免作战，就使他们在思想上混乱不清，在复杂严重情况下则会不能掌握正确的方针，有走向右倾，放弃斗争，脱离群众的危险。譬如这次化北主力队的负责干部就在敌人的进攻底下埋枪解散队伍（当时情况完全能够自卫的），这就是由于要隐蔽，避免作战的方针给予很大的影响（虽然当时我们对化北的布置的精神是坚持，但是又传达到区党委的隐蔽，避免作战的方针）。这是说明目前的干部的头脑是简单的，领导方针的明确是很重要的。

以上所述就是部队和干部的概况。

二、二个半月以来，坚持斗争过程反映出我们领导上的严重弱点，对坚持斗争方针掌握不明确，对干部的领导是主观主义，没有注意干部的思想 and 能力，解决问题，不能事前防止干部错误的发生。同时又反映区党委武装工作的方针是消极的，实际是朝向复员方向走，被动的，是妨碍着坚持斗争。由于领导上的弱点，就使各地干部在坚持斗争中不自觉的产生消极，放弃斗争，脱离群众的右倾危险。我们认为此次化州部队所遭受的损失的主要根源，我们对化州武装工作的布置，虽然精神上是坚持斗争，但同时又须要根据区党委的精干、隐蔽、分散的方针和避免作战、避免刺激、强调不要政治化、不暴露面目、不发展组织等意见来布置，这样就使干部精神上陷于很大的苦闷。因为区党委的意见就限制他们的活动和发展，使他们走向消极的隐蔽。在敌人扫荡期间，只是隐蔽，不敢接近群众，不去广泛的揭发K军的

暴行，怕暴露（和过去大胆接近群众开辟工作的作风不同），对于叛徒和特务活动不敢坚决镇压，是因为怕暴露、怕刺激K，对于布置坚持原有的暴露地区的武装工作人员也不敢坚持而转到新的地区去隐蔽，使K横行无忌。没有干部联系群众、领导群众斗争，许多群众和个别党员因无人领导失了信心，被迫去自首，领导干部也去收埋隐蔽，脱离对各部队的联系和领导，几个月都没有见过部队负责干部，许多问题不能及时具体的处理（如对于埋藏的枪支没有检查是否妥当，发现了自首分子，但没有紧急转移自首分子所知道的枪支）。这时干部的精神是消极的，萎缩的。化北负责军事干部的解散队伍逃跑的就是这种精神反映的典型。如果让他们继续发扬他们过去大刀阔斧、敢作敢为的作风，不给他们以隐蔽的压抑，相信不会有这种损失（日本投降后敌人也曾以一团以上的兵力大进攻，我们也没有损失，且当时没有现在这样群众基础），实际上他们是有着应付敌人扫荡、分散活动的经验（当敌情严重时都是以分散为主，在情况松懈之时则较集中），有着广大活动地区和广大群众基础，是可以没有多大的损失坚持下去。各地党对我们的领导有这样的意见，认为没有一贯坚定的方针，曾经三变（一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复员，一是五月指示，坚持斗争，一是九月的武装工作指示），使他们的精神时起时伏（这个问题口头再详细报告）。我们认为区党委一年来对武装的领导应有彻底的检讨，总结经验，以教育干部。

第三，我们于十一月底根据对目前情势的认识（全面内战、全面分裂）和南路当前的实际情况及几个月来坚持斗争的经验，向各部队提出如下的武装工作的意见：

一、必须坚持斗争。首先肃清目前存在着消极的放弃斗争、脱离群众的右倾倾向，指出凡在任何严重情况下必须坚持自卫，不能埋枪，解散队伍、逃跑。在敌人包围之下，只有坚决突围才能生存，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加强革命气节教育，反对投降自首，对于一切叛变分子采取坚决镇压，必须保存现有的武装力量，并重新整编，划分为三种形式：一种是游击队，一种是经济队，一种是武工队。各县组织一队至二队的游击队（每个队以三十人为单位），展开游击活动，其任

务坚决镇压在蒋军扫荡期间积极的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援助人民进行反抗征兵、征实、征税，破坏K的乡政权。在有利情况底下进行主动打击K地方反动团队，以达到恢复和提高部队和群众的情绪。在这三种武装形式的活动过程中创立各县的主力（以五十人为一单位）。茂电部队则转变成武工队，开辟信、茂、电、阳春四个边境的山地，并选派一个强的干部负责领导这个地区党的组织和武装工作。化北部队重新整理，恢复到二十人，可能时由化南抽调一个小队到化北，协助恢复化北阵地武工队，继续恢复与发展化北山地基础。遂溪之徐、海边境山地大胆派遣大量的工作人员或武工队开辟该区的山地工作。各地应积极努力，迅速争取时机，恢复过去因扫荡而受损失的地区的力量，同时更积极扩大发展新地区，巩固旧地区。充分准备力量应付敌人新的扫荡，对于扫荡地区群众进行广泛的抚慰救济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帮助农民进行减租减息，以此广泛展开爱民服务运动，广泛展开宣传教育工作，揭发K的暴行与阴谋，发扬过去的大刀阔斧、敢作敢为的作风。

二、在党内外积极进行人民起义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工作，从群众观点出发，动员群众自己救自己，从群众利益出发，组织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反抗K统治的斗争，目前主要是对抗征兵、征实、苛捐杂税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充分准备力量，到解放区军民自卫斗争全面反攻的有利时机和K统治动摇之时进行起义。

三、展开瓦解蒋军工作，重新整理和瓦解蒋军的一切关系，在适当时机，组织蒋军反战起义。

这是我们武装工作的三个方面。

第四，合灵部队领导干部不解决就是不能实现党对合灵部队的领导。

由于合灵地区辽阔，部队分散，党的组织未正式解决，长期失却党的领导。目前即使有联系，有领导，但是目前负责的谭同志只能做联络工作，不能负责领导，不能解决问题。地区距离我们太远，地方情况复杂，斗争又尖锐，该地区又是我们武装工作的中心。因此，必须解决一个能够独立作战坚强的干部负责领导。二年来都没有彻底解

决，决心解决，丧失时机，增加了目前领导上无限的困难，实在是很大的损失。我于今年六月开始接收合灵工作之后，曾叫谭同志见周同志时，要求由我们在安南干部中调一、二个强的干部到合灵去，余同志到安南时我又是这样提出，同时要求撤退到安南的主力应完整保存并准备转回十万大山再搞，但是都没有获得解决。我不明白南路几个北撤的干部不北撤而调去安南，而不设法调到合灵加强领导。我认为区党委对钦廉四属武装工作是严重的忽视，我要求区党委重视四属武装工作，具体解决四属党和武装问题，要求把撤退到安南的主力调回十万大山，与此有关的广西党问题希能获得具体解决。

丙、党的组织隐蔽巩固工作

(一) 整理组织

(1) 遂溪组织划分为四种形式整理：第一种是完全隐蔽约有120，这就是地区不暴露，党员面目不暴露的，这都是一年来开辟的新地区。这种形式由一个隐蔽干部负责。第二种是半暴露20余，这是在群众工作活动上有些暴露，和暴露村庄有些来往关系，一般人是知道，但党员不暴露，这种形式由一个半暴露干部负责。这二种组织形式由我们直接负责领导。第三种形式是暴露的约600余，这是地区完全暴露，党员的面目在群众中暴露，对K反动分子一般的不暴露，但会遭受清乡扫荡的威胁，这种形式由一个暴露干部负责领导。这种形式和前二种形式完全隔断关系。第四种是必须撤退的约250人，交第三种形式负责干部处理。第一种形式是准备任何严重情况下都不受破坏的地下组织。第二种组织形式在逐渐改变作风，使转入完全隐蔽。第三种形式是要坚持阵地，停止暴露活动，使暴露和缓，使K麻木，不把它当作清乡的目标，以保存基础，但亦准备不能坚持之时的撤退，这部分是目前遂溪基础最大的，保存这个基础是很重要的。第四种要撤退的那部分，目前只能解决很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是不能解决，这是由于实际困难的存在不易解决：一是农民没有撤退求生存的关系，亦缺乏谋生的技能和经济，二是农民家庭观念浓厚，不愿意离开家庭，而实际上若离开家庭则没有人生产，维持家庭生活，同时有许多是全家都暴露的，全村全家撤退是不容易的。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解决办

法是这样：①仍然继续设法撤退大部分暴露农民到徐闻、海康开辟山地工作；继续扩大徐闻的关系，同时利用秋收解决经济。②暴露严重而又不能撤退的则利用其一切社会关系隐蔽，或不在村、不在家宿，经常在村外，郊外宿。③全村暴露，全家暴露的又不能撤退的，准备K强迫自首时，全村自首，有些遭受叛变分子的威胁而不能撤退者的一般党员在K强迫自首底下，以群众面目出现自首。④缓和地方反动分子的斗争，在给予反动分子打击之后，则进行拉拢、谈判，我们作必要的让步，使我们暴露分子及其家属能够回家生产，有些地区就是如此解决的。

遂溪隐蔽和半暴露的组织划分为二个单位管理：一个是由我们直接领导的干部负责，一个小部分交由海康负责同志领导。

干部重新调整，原来负责整个遂溪工作的沈同志解除其负责隐蔽部分党的组织工作，改调任负责整个武装工作，原来各区负责的干部都是暴露的干部，除每区留一个至二个负责该区的暴露关系及做公开活动的干部之外，其余都调到别个地方去，或负责武工队开辟新地区工作。

隐蔽组织部分是依照决定建立单线组织形式来整理。

(2) 化州组织的整理，原来以前有许多地方组织可以隐蔽下去，我回去见到化州同志时，亦布置了整理的办法，解决了隐蔽问题。但是结果起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在我离开南路时，他们就进[行]广泛动员参加部队，组织部队，把以前隐蔽的地区都搞到暴露，可以提拔的地方隐蔽干部都暴露了。加以K大军围剿，人心惶惶，同时又许多党员被捕，而又直接影响原来隐蔽的组织暴露。因此在敌人扫荡的情况，化州党的组织完全无办法进行整理，现在情势缓和底下，开始重新审查整理。

廉江的组织：地区大部分都是暴露的，整理办法大致是如遂溪的一样。

(3) 茂、电、信三县的组织负责干部已调整，交区党委派去的同志负责，整个组织大部分是隐蔽，过去都已有整理的基础，现在大致已完成整理，仍未解决的是电白六、七个暴露同志尚未彻底解决

撤退问题。这个区域组织的整理主要特点：一个就是把三个县山地连接的山地区组织划成一个单位，派一个干部专门负责该单位的组织，由我们直接领导，因为我们是计划要在这区域的山地建立我们的根据地基础，准备长期斗争，要加强领导。另一个就是把城市及其附近乡村划成一个单位由徐同志负责。

(4) 钦廉四属的组织工作已于十月中旬派丁同志去负责，主要任务：一方面是原有组织的审查、恢复整理；另一方面则是准备发展新基础。关于这边的组织关系已通知他去找周同志，如在十二月底找不到周同志时则仍到我们这里报告工作，解决问题。这个地区工作的严重困难是地区暴露，没有隐蔽地方干部可用，叛徒特务的威胁，地区的辽阔分散，长期失却党的领导，对情况不了解。这个地区组织的重新建立是个极端严重的困难的工作。

(二) 审查工作

由于各地党主要时间和精力是应付敌人的扫荡，审查工作计划不能执行，我们过去是做过了多次，如果没有从整风基础上及适应实际环境的审查，恐怕再来一次的审查，其效果和过去是差不多的，过去区党委一般的提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三) 党的教育

(1) 我们对各地干部进行过下列问题的教育：①传达区党委对目前时局意见及对南路工作的指示。干部的反映认为对长期积蓄力量的方针有进一步的了解，对政策的掌握上有了很大的帮助（了解过去左的错误）。②总结了各地几个月来坚持斗争的经验，强调反对消极、放弃斗争、脱离群众的右倾危险，强调群众观点和革命长期性的教育，帮助干部纠正坚持斗争中的偏向。③根据群众十一月份中几篇文章的研究分析，目前全面内战、全面分裂的形势，坚定党员干部对自卫战争及实现和平的信心（是用个人研究《群众》几篇主要文章所得的意见的方式提出，不是当作指示而是当作研究问题的参考），及提出今后工作的意见（主要的在武装问题中已提及），主要指出今天我们的工作定要配合今天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动员和组织人民的力量，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反抗K的反动统治，主要是反对征兵、征实、

苛捐杂税，以此配合与援助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加速自卫战争的胜利，以达到和平。

(2) 对于党员的教育，主要是在于加强党员观念的教育和实际工作的教育。关于加强党员观念的教育，是根据新党章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二本小册子为基本教材，现在已分发干部阅读，并大量油印给党员阅读，然后有计划的领导讨论。关于实际工作的教育，主要是如何了解情况，如何开展群众工作，中心就是群众观点问题的教育。对于党员教育的方式，主要是由我们和各地干部谈这些问题，再由他们具体计划进行，过去由于敌人扫荡，进行教育工作很困难，如情势和缓之时，则可能依照计划实行。

教育工作的困难，是敌人的扫荡，特务的威胁，环境动荡不定，没有较为安全的隐蔽据点给我们训练干部。缺乏已经整理、适合实际的教材。这种困难希望区党委能够适当的解决。

温△△致吴耀翔的信

——关于敌我情况及解决干部问题*

(1947年5月14日) ①

吴耀翔同志：吴带来指示信收到，台的工作人员亦安全抵达，勿念。兹把最近情况报告如下：

(一) 目前K军援到南路来的约有三千五百，保十总队约六百五十，保九总队（最近从广州增城调来）约七百，六十九师九二旅二个营约七百，广西二个保安队及广西地方团队约七百余，准备由东兴调来之华侨总队约九百（是其中内部人员说的）其兵力分布主要是集中于高、雷、湛，其调动计划是这样，合浦原驻有保十总队一个大队，若保九总队到达时则推进廉江，化州则有保十总队二个大队，保九总队则于十二日开到化州，广西的保四总队则开到廉江北部石角、三合一带，六十九师二旅残部有二个营（番号“壁山”“昌隆”），一个营及一个连守湛江至遂溪之麻章墟，其余二个连可能跟韦镇福到化州去。由一五六旅长刘镇湘组织之华侨总队K国防部调他到湛江来，其总队长为简春华（黄埔十四期），已派人来和林英接洽，林英叫他即刻调来编为一个机动总队。各县的地方团队最多是茂名，有八个中队，最少是信宜，一个大队，其他则是二个大队，每个中队的人数都有六十五至七十，每个中队最少有二挺轻机。韦镇福于四月底到达湛江策划扫荡，于五月三日到化州和林时清决定其计划，调保十总队二个大队和化州一个自卫大队集中扫荡化北中洞山底，把我化北主力打垮后，则留化州自卫队在化北进行清乡，保安队则回师化南和保九总队汇合，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扫荡化南及分区扫荡化、吴、廉，计划化、吴、廉边境驻二个大队编一个支队，化州中部至北部（由新安至中洞）二个大队编一个支队，廉、遂边境二个大队编一个支队，梅菪至茂名之鉴江河以东则由茂、电、信地方部队负责清剿，河之两侧由保安队负责，韦镇福亲自率队到化北扫荡，等到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到来后则交由他直接指挥，其企图是集中搞化州，打垮我主力，然后进行清乡围剿。对于四属则放松，对于雷州则由林英负责，韦镇福不管。林英与韦镇福不能合作，韦镇福说林英自私，今后只给林英一个情报就算，林英除抓住九二旅守湛江外，其余则管不到，保安队则不能指挥。九二旅之一个营现在湛江外围建筑防御工事，准备坚守。这个正规部队除必须调动到遂溪扫荡外，大概不会远调到别处扫荡，他亦不能长留于此，要调回去的。广西的保安队主要的守住广西边境，防我进入广西，将来华侨总队调来则可能为雷州围剿的主力，二个保安总队则为化、吴、廉的扫荡的主力。林英回来搞二件事：一是成立湛江、西赤两区之警备部及守湛江之布防；一件是郭寿华切戒后东打落水狗。他和郭寿华（湛江市市长）同是军统人物，而矛盾很尖锐，现在则闹得火并。K对争取陈学谈的阴谋完全失败，陈学谈这次回来，公开骂K政府的贪污腐败，宣传我力量大，不应打内战，军事不能解决，应以政治解决，表示坚决不与现政府做事。他这次回来给予我们有利的影响，过去反共的人物，经过他这次的宣传也动摇了。他不久仍回港。

（二）目前我们的情况：高雷部队现已达四千一百左右，雷州一千三百余，廉江一千一百，化州千五百，茂、电二百余，编为主力约一千至千五，各县自己编的遂溪四百至五百，化州三百至五百，廉江三百至五百。但实际上除遂溪较象主力外，其余实质仍不能起主力作用，能够编为精锐的主力约有五百人至七百人左右。这时的准备并没有什么改善，以分兵发展为主，其次则是进行了一些整训工作，和K军没有进行过主力战斗，较大的战斗是前几天遂溪、海康K军集结五百余向我海、遂边境活动主力进攻，结果被我击退，敌伤亡四十余，传敌人死中队长和小队长各一人。此役对湛江震动很大，我没有什么缴获，我一英勇连长重伤阵亡，其余则是对K地方团队的战斗，战斗

力最弱的是廉江部队，打败仗多，给广西地方部队及廉江的进攻时都有一些人被俘及伤亡，茂、电部队也是如此。目前各地部队很少会打游击，今年以来都没有打过一次成功的伏击和袭击，不会夜袭、夜战，都是白天作战，遭遇敌人进攻时都发展成为正规战，每次都是消耗大（弹药）缴获少，作战以来一个连长阵亡，二个连长、三个连副受伤。还有则是硬攻，茂电部队围攻一个乡公所达三天攻不下，自己伤亡十余人，化州主力到吴川打一个乡公所被敌人几路增援，自己受了一些损失。由此可知，各个部队军事指挥员的游击战术的思想很差，目前最严重的困难是没有干部，尤其是对游击战有经验的干部没有。没有干部就无法做巩固工作，十分之八九都是新兵，若离开主力独立战斗，则多是一打就散的，若不能加强干部，尤其是没有游击战经验的干部，在敌人大规模扫荡之下可能遭受相当的损失。各个地区的团长都缺乏独立指挥作战的能力，独立去搞都很少会搞出很好的战果。收缴民枪扩大部队则做得好，工作积极性和英勇战斗的精神一般的都不错。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司令部的组织很困难，这就是没有人，因为各地部队都要人，目前我们主要的加强各地干部，而不是抽空下面加强上面，主力团和北撤的干部不能迅速回来以及你们不能及时增派干部，将对部队的巩固和发展、打破敌人即将到来的围剿都会遭受很严重的困难，希望你们充分注意这点实际情况。其次的困难是弹药的缺乏，攻坚武器的缺乏，目前每支步枪、驳壳仅有子弹十余颗，补充远赶不上消耗。我们虽然在各方面积极活动购买，但有很大限制，一不能大批买，即使有钱也不易买到；二则是有得买时我们则无钱。我上次给你们的信中提及你们借给我们一张机帆问题，主要的意思是用来运军火弹药，我计划是要到澳门、香港购买大批军火武器弹药的（香港和澳门军火比这里买容易，而且大宗，现在此间有军火商人专做这项生意，可惜我们找不到关系）。造地雷爆炸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这影响作战很大，我们很想能够在澳门买到雷管、炸药、乌丝的原料，如果有这些原料，就有办法搞。我们有五条日式机关炮，但没有炮弹，正设法改造，不知能否成功，不知澳门有炮弹买否。日式重机一支而无软梭也等于废物，现正设法造。轻、重机、炮、七九弹、驳壳弹、机关炮弹及造地

雷爆炸的雷管、炸药等东西，你们若有办法可介绍我们买，则我们无论如何节衣缩食都要找钱来买的，如果有帆船运，大概不成问题。再其次是经济的严重困难，目前都是分兵就食，但是正在青黄不接，分兵就食也不易，最穷的是遂溪，所捐的军粮已食光了，过去期间都靠捐军粮来维持，自己很少买过米，若用钱来买就不得了，那里有这么多钱来买，现在部队这样庞大，K大军也要军粮，人民穷困到极点，给养确成了严重问题，在K大扫荡或我集结主力北上之时这种困难是更多的。现在设法在湛江进行募捐，发展新地区，继续非法的经济活动来解决。

(三) 你们四月二十九日的指示信到达时，我、吴、欧都已分散活动，未能集中讨论（迟一下集中讨论），只将指示原文分给吴、欧诸同志看过。来示前我们曾有一次较详细的讨论当前问题，大致上是和你们的意见一致，不过没有明确的提出向着北流、容县以南，廉、化、茂以北的方向发展，我们只提主要的向着廉、博、陆的方向发展，对于强调给予群众以切实的利益不够等等都是我们对中心问题掌握得不明确和了解不深刻，我和欧对指示基本上是同意的，吴的来信则说仍有不同意的意见，但是没有明确的指出是什么，他是提出目前不可能立即北上，勾漏山脉是什么样，群众怎么样一点都不知道，连地图一份也没有，他认为即使去也要一个准备，欧则表示同意北上发展，但要有步骤，我的意见则是我们发展主要方向是东北和李济深力量汇合，发展更大的局面以创立粤桂边区。但是由于我主力不强，干部弱，广西没有基础配合，仍采取稳健前进的方针，不可孤军深入，和自己基地脱节，目前仍须在粤桂边博白、陆川打稳北上发展的基础，搞好情报交通，和广西地方党取得联系配合和主力的整训，才集结大军北上，准备于五月底六月初开始行动，对于K军的扫荡则采取在K空虚的薄弱的分散的地方发展，消灭敌人以保存自己壮大自己，避免主力决战，发展游击战，我们要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使敌人由集中被迫到分散，我们则找到敌人分散的弱点，集中我优势力量，进行突袭歼灭之。我们要在敌人的包围内外打游击，主要是在其外围，留一少部分在其圈内活动配合。化北主力则向着广西北流发展，化南主力则向廉、

化边境朝向东北发展，和遂溪主力北上配合。和化北主力配合，廉江主力则打开廉、陆边的基础向陆川方向发展。遂溪主力则在廉、化，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时，则成为北上部队的主力，向着化、廉之东北发展。北上计划中须要解决的问题，是桂东南组织迅速交给我们统一领导，以布置斗争的配合，同时介绍李济深的关系给我们取得联系和配合，他们的力量及其分布行动计划如何，希望给我们一些材料。四属的部队向东发展，和我廉博部队取得配合，减少我在西部的压力和吸引敌人的一部分力量。我觉得目前广东各地的发展配合得不够，如目前调来的保九总队是从增城调来（是否确属不清楚），广西的异常空虚也调一个总队来，广西没有发动是主要的原因，闻说K也可能从琼崖抽一二个总队过来，希望琼崖方面积极发展来吸引牵制他的兵力不能调过来。由于四属没有积极的活动发展，K就把华侨总队，保十总队一个大队调过高雷，则证明四属部队没有吸引他一个主力了。目前各地不能很好的配合，使高雷处于孤立的形势，希望你们对于配合问题有切实的解决和迅速的达到配合战略作战的目的，则我们将更快的完成建立边区的任务。

（四）解决干部问题是当前一切问题的中心，我们提议在安南的干部和北撤的干部立即大部或全部的回来，事在速不宜迟，这是时机问题。没有大批强的干部支持，可能垮一步或大步，我们希望由庄田带安南的主力 and 干部打回来，这是最好的办法，望你们加以考虑，这是南路人民的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的要求，每个要求我们觉得很合理的。欧初同志提议下列人员调来此。二乌龙是过去珠江纵队的宣传科长，闻说准备去南洋，陈启、杨子江（上海去山东途中被捕，连贯管理），在香港中学教书的有甘保芳、刘秉佳，汉华中学的黑鬼钟，华侨部门的张茅，闻说东纵、珠纵流落于香港的大、中、小队长很多，对这些人加以详细的检查会有许多可调来的。这里若有一个有经验的军政干部就当宝贵，南路留在香港的干部希望督促迅速的动员回来。现在广州的程永光是遂溪人，在K军当过连、营长，打过很多仗，有经验有办法，思想很早就进步，此间许多人对他很熟悉，我们决定他叫回来，他说和港有关系，可能就是陈信材的关系或和你们有关系，

请你们通知他即回来。如他有组织关系，则请介绍及应该分配什么工作，请你们提些意见，我们打算分配他在司令部任作战科长或团长之职。黄文炳在海防，我们觉得他回来有作用，此比在安南好，他在此间关系多，对于瓦解敌军工作、情报工作及争取地方势力上是有作用的。对于湛江市党的组织，我提议交给我们直接领导，因为目前很急切需要在湛江动员人力物力支持战争，目前负责湛江的同志是很不了解的，是为城市工作本位着想，不能配合，譬如说动员一些知识分子到部队，他则说没有，但实际上是有的，关于建立情报工作，他则说没有关系，对于发动群众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他也说没有办法，这样的观点是很难和我们配合，他若说没有办法则我就没有奈何的。实际上今天湛江市区仅有五万人口，广大都是甲村，和内地丙村并没有什么特别，市区的基础则在学生、汽车司机、小教而已，并没有产业工人的对象。你们考虑这个提议，如果可以则由小林写介绍信来说明。对于广西东南组织的关系，希望迅速介绍过来，四属下同志希望即回来，先到我处讨论关于如何配合问题，然后由我处转回合浦，你们派来研究工作的应安置在什么地方，最好能够到各地方了解才能深刻。高雷在广州的反动派很积极活动，你们在广州的工作，希望能够注意去瓦解、分化他们反动阵营，我们也设法进行瓦解工作。关于欧初夫人的补助费问题，由吴口头转告，兹付上五百元港币作为我们的党费，兹我们约定于十八日开始联络。

致

敬礼！

温

五月十四日

（另付上给社同志一函，托他代买零件，最好能够趁这水船一齐付回来，否则以后就不容易搞。又我由港派专人到广州去找程永光回来，你们若有信给他可交我内子转）

容关于南路群众斗争情况的报告

(1947年6月26日)

我到了南路七个月，不是干群众斗争工作，所知的事实很少，尽我所知的记出来吧！

我曾和一位干地方工作的女同志谈话，她负责十多条小村庄的群众工作。上级有命令，要发动食地主、食富农运动，因为其他地区也发动起来了，而她的地区群众还未觉悟，没有这样的要求。她在几天内很匆忙的时间，便召开群众大会，因事前没有进行深入教育动员工作，未能真正做到发动群众起来，开大会时她演讲完了，叫大家进行诉苦，发表意见，群众很害怕，不敢作声。在这十多条小村庄里，找不出地主、恶霸来；有个富农在民主政权下，他不能反抗，见其他富农都是如此，他便自动拿自己的猪给农会，自动磨白米煮饭招待群众。几位工作同志认为这次发动不起斗争，这样便不是吃富农运动，与他妥协了，不能提高群众情绪，加强群众阶级仇恨。后来便鼓动贫农缚那位富农，说他是高利剥削者，发动群众打他，不许他与群众一起吃自己的饭及猪肉。这样的群众斗争，并不是群众自动自觉起来的、被迫的斗争，既不能加强阶级仇恨，反而增加了敌人，搞坏工作。

又一个地区，群众把一家中农的猪吃了，把他的衣物分了，还要求把他全家杀光，他的儿子参加我们的民兵也要杀（原因是有个群众与他有私仇，便鼓动广大群众要求农会长这样做）。工作同志自己没有主意，不知怎么办，便写信请示上级，县委书记回几个字给他（群众要点办就怎办）。结果便执行了群众意见，那中农全家连我们的民兵被杀光了。此事传出，广大群众及我们的民兵非常不满，走群众路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断的。

线不是跟群众尾巴走，不是不要领导的，那位上级领导太不深入了，双方也要负责。

我把队伍群众工作（即士兵群众工作）的一个例子记出来。

一个新组织起来的队伍，农民士兵们初离开家乡及自己亲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参加到革命队伍来，他们工作了相当时期（约一年），思家情绪便出现了。因有些家乡被扫荡后受了损失，他们的挂念更利害，最初由几位战士向连长请假不准，便情绪低落。后来全队都散布了思家空气，经数次请假不准，部份同志便公开要求交回枪给连长，我们要逃跑了。经指导员数次说服无效，结果有几位战士逃跑了，连长执行纪律把要走的战士缚起来。全连战士也不愿上政治课、军事课，说参加革命不能看看家庭，大家没有心机。此事弄到连长、指导员没有办法。后来我接近请假的战士，深入了解情况后，便和他们全连开会解决，答应他们请假，教育他们要执行纪律，具体办法是：近家乡的、有重要事的、家庭受损失的先回去，要分批去，依时间回来，互相督促，执行纪律。此事解决后照着执行，部份同志回家去依时回来，逃跑了的被劝告回来，大部份同志觉悟了，结果自动没有请假。此事平息了，现在是最勇敢战斗的一连。

再把一个领导问题记出来（虽然不是群众斗争典型也好）。

有位班长要求请假，连长不准，他非常苦闷，以前是模范的班长，现在却怠工起来。指导员不但不去深入了解情况，只是批评他思家不应该呀！班长要起模范作用呀！你比以前退步了呀！使他背上的包袱更重了，他没有心机工作了，连长便革了他班长的职，他当了队员更苦闷了。战士们同情他，此事对连长非常不满。当时我负责党的工作，我问他为什么要回家？他哭起来，告诉我，他的屋被敌人烧了，父母亲流浪，大嫂上吊死了，哥哥被敌人杀死，现在我又不能进步啦！班长也没有资格了，不知我犯了什么罪呢？我与连长、指导员研究领导问题：要了解情况，不要机械执行纪律，要从实际出发，目的要解决问题，放下包袱才能提高工作情绪，不正确的批评反会加重包袱，革职不是办法。他们的思想通了，检讨自己的领导方法，后来给他请假两天，回来后安慰他、教育他、鼓励他，他在士兵诉苦大会诉苦，他

兴奋，他仇恨，他更努力地工作。连长、指导员也向战士们检讨自己的领导方法的弱点和错误，再给他班长责任，不久他又是一个检模
[模范]班长，比前更勇敢。在长行军中，他勇敢地到河里筑桥帮助同志渡河，他和连长、指导员也得到同志的尊敬、爱护和信仰。

林美南给方林的报告

——南路敌我情况、干部情况和方针政策*

(1947年7月10日)

方、林二位同志：

电台器材至今未到，兹先给你们报告。

我们二十七日抵遂溪，见温、吴二人，欧在廉江，六日钱赴廉江，拟准备接收五属关系。不日我拟与温、吴带遂溪主力与化廉部队主力会合，然后向五属发展。

(一) 首先反映这里具体的情况：

(1) 敌情方面，无甚变化，外传省府来电调一个总队返省，似无此理。敌自保九到后，我正分兵活动之际，即开始扫荡，其扫荡先集中九、十二个总队在化县开始。约半月后，留保十继续扫荡清乡，恢复政权，组织反动武装联防自卫，保九则移向廉江，与广西二个大队集中扫荡廉江。此时我遂溪部队进击东海岛，威胁广州湾，保九又驰来广州湾，广西部队留廉博边境扫荡，预料敌不久即可能扫荡遂溪。以此观之，敌扫荡之特点，以分区开始渐展至全面，以集中兵力开始渐走向平均分散兵力。在此次扫荡中，我化北部队被打垮，海康小部被打垮，但大体保存力量，主力无损失，化南反扫荡打得很好。

(2) 我部队方面，数目四千至四千五百之谱（四属不计），发展得很猛烈。老地区及其周围都动起来，士气极旺，作战勇敢，群众情绪很高，东海岛之战，二三千群众动员起来，县级团级以下干部很好，遂溪党的群众基础很强大，控制了三分二以上的地区。化南基础也强，化北廉江、海康较弱，茂名、电白方面就更差了。但是部队骤然膨胀，尚是乌合之群，比较有组织有战斗力的约一千人，一般纪律

性、组织性很差。各部门工作各种制度未建立，队伍乱纷纷，终日忙于缴枪征粮，虽然新部队必有此现象，干部缺乏，有事无人做，但领导上只知发展，不知巩固，只知干部少，不知提拔干部与善用现有人材，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3) 各种政策方针方面，我认为有极大的错误。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委员会、雷洲军分区、雷州行政专员等名目都已宣布了，一般地建立县、区、乡、村政权，专署以上是空名的，县以下是实有其机构的，村政府设村政委员会正副村长及武装、土地、经济、民政、卫生、优抗、文教等七个委员会。提出没收反动分子土地，分给抗属与贫雇农，实行对地主、富农清算，农民不敢动手时则强迫行之。化县决定农民借债不报者杀，农会及雇农工会，一般带强硬性组织起来。对于领导群众适当进行斗争以解决经济问题如破仓，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过去很忽视。部队几乎全不做群众工作，遂溪我部队及工作人员二千以上，在我控制的中心地区粮饷出在地主、富农身上。因此地主、富农负担较国民党统治区重几倍，中农也加重许多。当此春荒时际，粮饷不继，不单集中来整训很困难，甚至迫得非将主力拖走不可。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尚未建立，遂溪主力团自干部至士兵约一半是伪军符春茂部下，符本人不参加我军，部下以整连、整排、整班系统完整参加我军，但却编为主力，目前主要依靠他们作战，因他们配备较好、勇敢并有经验之故。我们初到时，看见部队一团纷乱，认为高雷部队当前应以巩固为主，吴则主张由他带队向四属发展，他认为他如果在四属二个月又可发展三四千人。当我们提出巩固高雷部队向五属发展时，吴又主张应向四属发展，因为老地区较新地区有把握。当估计敌扫荡中心将移遂溪，我们主张遂溪主力移往廉，与化廉主力合击敌之北廉弱点时，吴则主张遂溪主力就地坚持反扫荡。化县负责干部高佬唐来信不赞成北向五属发展，主张集中兵力打开廉江局面。他所谓打开局面，因廉江现不及化遂之可自称解放区也。总之，凡此种种，你们一见可知。吴是想在高雷地区建立解放区的，在港时方同志曾有此看法，我以为不至如此，现始知正是如此。原来吴以前所提向五属开展建立根据地问题，与我们看法大大

不同，他根据华北的事实说平原可以建立游击根据地，可以成为解放区。因此可以有一面政权，巩固平原解放区后，向边境山地发展。

(4) 吴的表现方面：他对接受中央二月指示的决议不表重视，看过后就说那里面是专在批评他，以后就不看了。我们和他个别研究了工作时，他说粤北的做法是很蠢的，他调皮地说，让他南路自己搞，把敌人吸引来，让北江、西江等地轻松快活好了。他说九月以来，没有一天同意区党委的意见，说我们除说一些永远正确，如坚持武装斗争、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之类的大话之外，实际问题都是错误的。他很自大暴躁，问题如果提得尖锐一点去批评他，他就发脾气闹吵吵。雷州区的负责干部姓沈的也站在他方面与我们争论，就说他县负责干部高佬唐也是拥护他的。不过近来吴已有点转变，我觉得他已经有些地方考虑我们的意见，这是因为和他争论中坚持了长期游击战争，迂迴曲折的游击战争，波浪式的游击战争，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由小到大由分散到会后的游击战争，山地与平原配合的游击战争，以及由游击区到根据地到解放区的发展过程是长期曲折的等等原则方针之后，又经过化州扫荡受打击，东海战斗群众大受摧残。我们召集遂溪县委会议反映许多群众意见，如负担过重、对政权无信心等以及遂溪部队的粮饷无着、不巩固现象，所有这些都使他觉得确实有些不妥。但这并不能表现他的反省，他还是基本上坚持他那一套的，我打算候到廉江与欧会合后，开一常委会总结过去的工作，其效果将如何，殊难逆料。

(二) 关于当前工作问题

我们到后听取温、吴报告，并四人开一次会议，又召开一次遂溪县委会议，已经决定或着手进行如下各种工作：

(1) 停止一般建立村政府，停止对地主、富农的清算运动，阻止吴带队向四属发展，阻止遂溪主力在当地坚持反扫荡的企图。

(2) 提出巩固高雷部队，准备向五属发展的方向，队伍争取时间整训，建立政治工作，建立党，改造主力团（不能依靠符部为主力），遂溪目前暂不发展脱离生产部队，有枪发给工会、农会，建立不脱离生产群众武装，以减轻（人民负担），将旧日广西籍份子组成特别队

伍，先向博白侵入活动。

(3) 积极发展群众斗争，实行退租退息和准备减租减息（破仓已失时机，仓谷多被搬走），用我政权接管官产，以代价租与农民，地主荒地准农民开荒，五年免租，增加雇农工资等（各款有具体办法，不赘）。

(4) 党的组织形式为适合目前斗争，改采用一无化领导制度，区以下划分双重系统，地委拟北移至化廉之间，主持粤桂境斗争。先设雷州区三县特派员。并开始审查党政军县级、营级以上干部。

(5) 布置遂溪反扫荡斗争，主力准备移向廉江，配合化廉主力，打击廉江敌之弱点，期望能在此次反扫荡中消灭敌一部分力量，如能消灭敌半个总队，敌之扫荡即可阻止，造成我向五属发展更有利条件与更可以巩固老地区的工作（遂溪反扫荡办法不赘）。

(三) 对你们提出一些意见：

温、欧基本上是拥护区党委领导的，但过去吴的意见已统治了南路的党，温、欧能力不能批判他的错误，故二人到后至今，不能挽回大势。我们估计在领导机关克服吴的意见是有把握的，但吴个人的反省如何则未敢预料。如我们有较长时间驻此，则深入下层去克服吴的错误，我也有此信心，如我们不久走了，温、欧能否将这区党委方针坚持到下层去，保证吴不违反决定在下层再起争论，则殊难乐观。因此望能快点将周、庄调来，以掌握军政方针。这里干部确实缺乏，百事待举，有经验的干部不多，温提出安南干部应一半，至少三分之一回来，我们同意这提议，最好组织一队百人或六七十人的队伍打回来，出发前先派人至四属丁处联络，这样比较快些。如分批化装回来，周手内有广西关系，可经横县、博白、陆川等地关系回来也较快点。前次答应可能时派一参谋长来，果可能否？望快点派来。吴的军事能力有限，尤其主观、自恃、轻敌、治军无方，先来一个参谋长，也可稍为支持此事的局面，钱提出三个人可来，请你考虑一下。一个谭镇帮，健全小学教务，宣传人才；一个罗培元，培侨教员，宣传人才；一个龙世雄，也在培侨，医务人才。如可来，路线问题可叫东平与温太太商量。

我们拟到廉江开常委会后，布置了向五属发展的工作之后，就可以回港。大约七月半前后，可否钱先回去，我暂留此，或顺便到四属帮助工作，各节祈复示。

美南十日晚（一九四七年七月间）

另者，关于吴对区党委机构不满一节，尚未向他提起，但已多得一点材料，一是吴对下面说区党委集投降路线之大成，二是拟与中区联络反区党委，但此点温说是雷州湾干部讲出来的，未可深信。我拟常委会后向他提出此事。

革命军民一家亲 (南路通讯)

(1947年7月26日) ①

李 明

一、“我们到处有妈妈”

战斗结束后，部队进驻△△村，当入到村的路巷时，有一个同志不小心，跌了一交，后来他跑到一家农人的屋里取点水把手上的泥洗净。一个老农妇问他要不要水“冲凉”。他答复说：“我们军队不准用民众家里的水的，这是群众纪律。”那个老农妇说：“哎唷！用点水有什么问题呢？我不信有这种纪律，你就在这里，我叫暖弟给你烧点热水‘冲凉’，如果是说犯纪律，等我和你们的长官说”。那个同志忙说：“不要去说，千万不要去说，说是不成的！”那个女人说：“不去就不去，你在这里冲凉吧，鬼知你是在我家冲凉呢？”同时叫他坐下食烟。她的丈夫刚好回来，和那个同志在倾谈打仗的故事，这妇人却偷偷地走出来到部队里去找长官谈话，大家都莫明其妙，以为有什么事情，政治指导员忙走出来见她，她说：“你是长官吗？”指导员答：“怎样呢？”“唉！你们的‘律’真太利害了，怎么一个士兵冲凉也犯律呢？”指导员问明之后说：“这是因为我们军队人多，恐怕用了民众的水，累了你们没水用，同时我们也有人担水的，如果你一定要给水那位同志冲凉，这是可以特别准许的，你回去好了。”这个女人高高兴兴地回去告诉那位同志说：“我已经和你长官说过了，他说准许你在家冲个热水凉，你们打仗辛苦，满身泥，满身汗，没有热水怎去得汗气呢？”这个同志听了之后，立刻跑出来逃回队里，

① 按文章发表时间刊印。

不肯在那里冲凉。后来这女人又到连部问，指导员对他说：“我不是准了他冲你的热水凉吗？你还有什么事情呢？”她说：“你明准暗不准，他已跑回去了，不肯冲凉。”指导员问：“你识得那位同志吗？”她说：“你几百人我怎识得。”后来指导员查出那个同志原来是刘祥。叫他去冲凉，他对那女人说：“我们都是自己挑水冲冷水凉，我一个人去冲你的热水凉，好意思？”她听到了立刻回去叫她的婶婶嫂嫂都烧了热水，再走来说：“兄弟，谁要冲凉的都来吧！‘大把’水了，大家来不会不好意思的，你们打仗辛苦，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给你们，烧些热水不用钱，大家来冲个热水凉，松松身吧！”大家都觉得：我们到处有妈妈。

二、“认错人了”

当部队进击某地，途经△△村，该村民众逃避一空，剩下几个小孩子，我们问其原故，他说：“你们这些国民党杀人放火！我们村已给你们扫荡了三次，当然怕！”我们告诉他：“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人民军队，快叫你们爸妈回来！”他眼睛睁看着我们的军服，我们知道他是怀疑不敢去。便告诉他，这些军服是从国民党那里缴来的，他才放心。不久成群的男女拉牛拉猪回来，一个老太婆说：“唉！你们怎样穿起狗衫来？吓死我罗！我们以为又是国民党军来扫荡呀！”同志们说扫荡是扫荡，这回是我们扫他了，这些军衣、枪械都是国民党好心送来的。”老太婆说：“怎么不早说，让大家欢喜欢喜呢？死鬼！”

（原载《正报》第48期，1947年7月26日）

粤桂边区党委 关于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的指示

(1949年10月8日) ①

一、武装斗争问题

部队应该分散发展，建立多多据点，开辟广泛农村基础。不可过早集中，不可局促一隅，这是第一。发展起来的力量，不可过早暴露。据报：横县用起义形式，集中行动，虽不宣布大名义及公开政权，也是不正确的。应该组织群众，掌握武装，联系上层，保持灰色，为群众多做好事，并组织小股精干武装，作为主力，分散活动，才是正确的，这是第二。不可打大仗，不可过早打城市，以前打东兴，现在闹打灵山，都是应该检讨研究的，是否是对的？打仗应该以肃清反动武装，消灭自卫队、联防队、民团联保队、地主家丁等为主，尽量不与保安团队作战。行动上应该分散又能很灵活迅速的集中，分散发展群众，开辟地方，集中打击敌人，如有把握就下决心，就应集中五、六倍于敌人的兵力，迅速解决战斗。我们目前只能打小股敌人，不打阵地战，不打运动战，应打游击战（伏击与袭击），不打消耗战，应打歼灭战。情况不明不打，无把握不打，损害群众利益不打，群众不同意不打，这是第三。

二、群众问题

你们对于群众斗争做得不够。革命不是军事打天下，武装斗争是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在群众基础上进行的。应该到处发动群众，为群众生活和目前的利益而斗争。如反三征、退租退息、破仓分粮（开仓济贫）、分耕等斗争，废租废债；分粮办法等，你处不一定能实〔行〕，这是应大有修改的。但你根据地方具体情况，自己研究处理，原则是不可过早过“左”，最好先减租减息。废租废债、分粮区县应停止实行。该办法在研究中，似以分耕、减租减息较为妥当，你可以参考。当你们领导群众斗争时，应反对用强迫命令、恩赐包办等办法，一切群众自觉自动，自己起来实行党的口号为目的。群众中以中间和落后成份为多，故接近、倾听中间及落后群众，了解他们，教育及提高他们，是发动群众自觉自动的正确办法。凡和群众商量，依据群众的意见做事，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走向群众中的领导作风。

三、党的组织问题

第一，旧的组织要审查处理，这很重要。过去组织问题搁置拖延到今未解决，都是错误，领导上要负责。你们应从速解决这问题。

第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农村秘密党的基础。这一点是党务工作的中心任务，但反对拉夫。

第三，是提拔干部，斗争已展开扩大，干部不能多量供应，不能支持。

四、策略中心

最后，对策略方针问题，再提一点意见。工作应该照顾两面，一面发展，一面掩蔽；一面进攻，一面防守；一面为了争取胜利，一面为了应付困难，避免损失。因为，目前全国更接近胜利，但未来的困难，可能逐日增加，切不可忽略这个基本特点。

（一九四八年五月收到）

我们对于处理南路问题的意见

(1947年10月) ①

第一个问题：如何建立山地战略据点，保存平原旧有基础，保存主力问题：

一、南路的主要特点：

1. 在地理上是一个夹长地带，南面沿海与平原，山地狭窄，建立广大的山地根据地受地理条件所限制。

2. 我们的基础在平原（遂、廉、化），接近敌人的统治中心，山地基础薄弱。

3. 山地县份反动势力强大，而我们的力量又薄弱，如茂名、信宜、合浦。

4. 桂东南各县，我们基础薄弱，地方反动势力大（如陆川）。

二、由于这些特点，因此，把我们的主力压缩在平原，山地据点至今未能好好建立起来，特别是有意义的战略据点，未能建立起来，因此，又发生以下问题：

1. 将来敌人实行重点进攻，如美南同志所说：“万一不支，将无险可据”，保存力量成问题。

2. 主力集中在平原旧地区，兵多粮少，加重群众负担，为解决给养，如陈学谈所说“将会影响中央政策的执行”，我们的各种具体政策（如筹款政策、征粮政策等）弄得不好，也多少是由于兵多要吃要穿所逼出来的。由于政策弄得不好，结果又多树了敌人，目前各地地主纷纷组织联防就是这个缘故。

3. 主力集中在平原，敌人集中力量来扫荡，加深旧基础群众的

① 原件未署作者。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痛苦，保存旧有基础成问题。

4. 至今还未能创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据点，万一将来困难增加，难于应变，而将来新形势到来，直接也发生困难，今天保存原有力量已不易，继续发展更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建议：

1. 创立云浮支脉的战略据点：

A. 范围：在茂名东北、电北、两阳西北、信宜以西之间。

B. 条件：电北、茂东以及两阳边境有基础，当地反动势力弱，敌人统治弱，地理条件好。

C. 意义：南下茂名，北进四邑，西进桂东，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一个好的战略据点，应以此为南路、中区间的重要据点。

D. 挺进兵力：据我们所知情况估计，可以挺兵一千主力，太少无作用，太多未能容纳。

E. 为了创立此据点，应统一两阳与茂、电、信五县的领导，因此，我们觉得在领导上高雷应划分两个地委，把两阳划归高州，与茂名、信宜、电白三县共同建立一个地委（国民党行政区两阳属七区，两阳群众生活与茂电关系比与四邑关系密切），兼顾罗定和桂东的岑溪等县；雷州三县、湛江、化、吴、廉共建一个地委，兼顾陆川、博白。这种划分有几个意义：（1）要把两阳划与电茂信统一起来，才能创立这个据点，主力挺进，开始立足，主要要依靠两阳基础，今天中区力量弱，无力创立这个据点，而南路主力在平原，应该挺上，这是两全其美的事。（2）两阳划归高州后，地区太大，从两阳到三雷，距离太远，一个地委难于兼顾。（3）划小地委范围，加强下面领导。

2. 建立化、廉、陆、博四县的游击区：

（1）这个地区，在茂名、郁〔玉〕林、湛江三大据点之间，而广西与湛江的交通要道又直贯其间，要在此建立公开割据颇困难，只能建立游击区。

（2）留一团主力配合地方部队在此分散活动，主要发动群众，蓄积力量。

3. 建立三、雷、湛、吴以及化南、廉南的掩蔽根据地：

(1) 这个地区是平原，又是敌人的统治中心，但我们基础强，应转变为掩蔽根据地。

(2) 活动方式：秘密游击队、武工队分散秘密活动，建立两面政权，两面联防，结合群众的合法斗争。

第二个问题：如何转变具体政策问题：

一. 筹款、征粮政策：

(一) 建立统一的征粮制度：

1. 过去采用派粮办法，先开出大数目，然后与之讲价。这个办法不合南路的乡情，南路各阶层普遍有一个这样的传统观念，对派捐这件事，认为是不正当的“搞[敲]榨勒索”，不加重视，可有可无，总是设法抵赖的。而且怕派了这项，还会派那项，怕一项给了，第二项又来，第一项能抵赖得过，可以阻止第二次。但对官府或军队的正式征收制度，他们则认为他们是应尽的义务，是正当的，而且也不会怕再有第二项，缴了一项就安心了，同时认为大家普遍如此，自己也不能免了，因此他们就比较甘心缴纳。所以应该废除派粮办法，建立统一征粮制度，公开颁布，统一严格执行。

2. 名称定为公粮之类（回去与当地各阶层人商量之后决定），定出征收数额，只收地主、富农，暂时不收贫中农。用累进率征收，中小地主的数额，要比国民党征粮数额低，大地主的数额，则可与K的征粮数额相等。我们初步商量，暂假定以下的比例，但不一定行得通，要回去和群众商量之后才能定出，说不定累进法也很难行：

五十担以下的收百分之五，一担收五升（五斤）。

五十一担至一百担收百分之七。

一百零一担至一百五十担收百分之九。

一百五十一担至二百担收百分之十一。

二百零一担至二百五十担收百分之十三。

二百五十一担至三百担收百分之十五。

三百零一担至四百担收百分之二十。

四百零一担至五百担收百分之三十。

3. 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地区，设法打国民党征粮人员，使其不能

来征粮，使地主乐于缴粮给我们。

4. 公开颁布我们的征粮制度，声明：凡地主缴粮安分，我们保护其安居乐业，号召逃避的回家，保证不再另外派捐派款。

(二) 建立统一的征税制度：

1. 公开颁布统一税则，严格执行，税额要比国民党税额轻。

2. 由商人报价，照价按税则征收，但为对付商人虚报，公开宣布：如发现虚报，我们则照其报价收买货物。

3. 发统一税单，不可重收。

4. 保护通过我地区的商旅安全，争取商人通过我区。

5. 小贩肩挑者免收，规定五十万（或另个数额）以下的货物不收税。

6. 教育税收人员和气待人，不可加重商人的麻烦，更不能暗事勒索。公开声明，如遇税收人员有坏行为时，得向我军报告惩戒。

7. 规定商人到税站纳税，不可久留时间。

(三) 打反动：

1. 规定真正是大多数人痛恨的才打，否则不应随便打。

2. 打反动，应规定经过一定领导机关批准后才打，不得随意打。

3. 打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运输。

(四) 应停以下的行动：

1. 停止派款。

2. 停止打车（K政府的除外）。

3. 停止绑人、圈头（众人痛恨的可绑）。

4. 停止没收商旅的货物（反动派的除外）。

二、征枪政策：

(一) 对各种不同的人，应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坏分子的枪可以硬取，对中立分子的枪，应以理取（如通过私人关系借用等），群众的公枪，或以理取，或动员群众自动取，不能硬取。

(二) 基本群众的枪握在我们手里的，不一定拿出，留给群众组织民兵，或白皮红心的联防。

(三) 应立即停止绑人、圈头、逼枪的行动。

(四) 同情者手中的武装不可缴。

三、肃奸政策：

(一) 停止乱杀人的政策。

(二) 教育全党、全军认真执行毛主席的九条方针。

四、对付地主联防的政策：

(一) 因我们具体政策弄得不好，引起中小地主也反感起来，加以国民党联防阴谋的推动，现在南路各地的地主都酝酿着买枪组织联防，这给我们很大威胁，如何对付地主的联防，是当前的重大问题。

(二) 各种联防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坚决反共的；有只为自卫，不积极进攻我们的；有被迫不得已而应付国民党的。因此，我们的态度也应各有不同；对第一种则坚决消灭之；对第二种则以利害说之，争取其中立，或与之暗订互不侵犯协定；对第三种或争取其中立，或争取其变为两面派。

(三) 在我们不能控制或掩蔽地区，积极建立革命两面联防，或由灰色党员组织，或动员同情者组织。

第三个问题：如何团结与发动基本群众：

一、立即停止损害基本群众利益的行动，如迫自耕农缴过多的粮，没有收肩挑小贩及小商人的货物等等。

二、教育全党、全军认真照顾群众的痛苦，解决群众的困难，如设法避免群众不受敌人摧残，救济灾难，帮助受灾群众耕种等等。

三、关于清算运动问题：

(一)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材料还很少，可能是一个好的创造，也可能是一个行不通的运动。总之，这个运动应在群众自动自觉之下去搞，使群众真正获得实际利益，不能命令主义，徒有形式，而无实效。

(二) 据吴同志自己村中的情况，因我们去搞清算，引起敌人来逮捕奸淫、劫掠，反而使群众遭灾，这说明在敌人统治严密的地区，清算运动是不能搞的。

四、关于反对征兵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的也很少，只知我们下令各乡不得交了，

使群众觉得不缴则违反国民党的命令，缴则违反共产党的命令，进退两难。这种命令主义应该停止，原则上应教育全党全军，从实际上设法帮助群众真正能够避免缴丁，发动群众自动起来进行反征丁斗争（如福建的五县壮丁团，但自然不能搬用）。

五、关于减租减息问题：

这个问题材料也少，只知群众不敢减，我们下令硬要群众减，这种命令主义作法也应停止。原则上应打通群众思想，发动群众自动自觉的去搞，使群众获得实际的利益。

第四个问题：关于总结工作问题：

一、我们从最近经验中体会到：如照回去立即由我们把山东的总结写出来，放手发动干部讨论，必然引起一种不好的结果：干部对领导机关失去信任，甚至提出撤职和处分干部，变成对人不〔对〕事，弄坏团结，影响当前的斗争，在目前残酷斗争的环境下（与华北解放区不同），弄出这样的结果，是非常不好的。

二、因此，我们觉得：为了贯彻毛主席“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应采取以下的步骤：

（一）不立即发动干部讨论山东的总结，一方面在干部中进行思想酝酿，搞通干部两点思想，使大家对总结工作确立对事不对人的正确态度。这两点思想是：（1）南路路线错误，在党史上是有历史根源的，是上行下效的，是在第三次在倾路线与抗战初期投降主义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不是任何人自觉搞出来的。（2）错误路线是全党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不是任何个人的事，不然，我们为什么也积极执行这个路线呢？这就是由于我们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这个错误路线相结合的结果。另一方面先把我们在山东的总结，拿在领导机关讨论，与美南同志具体商量讨论办法，领导同志搞通后，由他们自己用自己名义向干部报告，不用我们作报告，由我们作报告，会引起干部对领导同志不满，不信任。由领导同志自己当作自己的检讨总结拿出去报告，作自我批评，会引起干部对领导同志的好感，会提高领导同志的在干部党员中的威信。报告后然后发动群众讨论，既是领导同志自己作报告，下面干部又经过了思想准备，就不会引起不团结的现象

了。

如领导同志在下面搞不通，则叫他们来此搞，搞通后回去才由他们自己作报告发动讨论。

(二) 我们回去除都在下面作思想酝酿与和领导机关讨论总结之外，集中讨论如何搞好今天的具体政策，暂时不检讨过去，也暂时不提高到路线上去谈，这点留在将来讨论领导机关的总结报告时才提出。

吴△△关于南路工作情况报告

——1946年5月至1947年10月工作情况及南路党内
在军事、政权、经济供给等问题上两种意见的分歧*

(1947年12月30日)

说 明

一、这个报告的目录：

- | | |
|---------------|----------|
| (一) 去年概述 | (六) 经济供给 |
| (二) 今年概述 | (七) 补述分歧 |
| (三) 军事活动 | (八) 我的错误 |
| (四) 清算斗争，减租减息 | (九) 倾向 |
| (五) 农会、政权 | (十) 写在后面 |

二、这个报告是我个人的而不是代表南路特委的。

三、这个报告偏重于讲这期间南路党内的两种意见的分歧，对此时期南路的具体情况与具体工作的做法及其经验，缺乏详细的报道与总结，是这个报告本身的一个很大的偏向。

吴

1947年12月30日

(一) 去年概述

去年五月，我初到南路，传达了区党委“五月决议”及“七大”。时东纵未北撤，“五月决议”是尖[针]对着各地武装已经发生放弃

斗争的倾向而强调坚持自卫斗争的。六月，我到水东布置工作。先是自撤退、复员令下后，茂南部队二十人，于年初奉令退至信宜，用土匪形式活动。路上给打垮了，团长郑奎及付团长黄△都牺牲了，残部十二人，由连政指带着逃回茂南，住在海边的一只船上，不敢在群众中露面，垂头丧气，无衣无食。我见了那指导员，告诉他：“你们有枪，就拿出做统治者的气概来呀，没有粮食，向保甲长、士绅要，没有情报，迫他们做，没有弹药，要他们买。不准住在船上，一定要住在有群众的村子里；拿着枪，去那些新村庄住，把那些保甲长、地主征服，要他们掩护你们，替你们做事。要他们召集全村人来听你们讲话。你们就宣传共产党好，国民党坏，鼓动抗捐抗税、减租减息、组织农会、穷人会，来实际控制乡村。武装还要发展，想办法发展；梅菜国民党的机枪，既有条件缴就去缴，不要怕。搞到他天下大乱。国民党的天下越乱越好，解放区越太平越好。这地方是国民党的天下啊！”那指导员听了很高兴。一个多月后，我再见到他，他们已经袭击了梅菜的蒋军，缴到了那挺机枪了，部队扩大到六十余人，筹到了五百万款子，开辟了四十多条新村庄的工作，天天有保甲长、士绅招待吃饭，气概大不相同了。以上这一段话，〔体〕现我当时对时局的看法、工作方针、方式等等。当时温同志也是同意的，我们合作得还好。

当时南路各地武装的情况，都和茂南差不多。遂溪县五十人，廉江十八人，化县四十人，只有短枪，三、五个或最多十个八个一组，天天给人赶。遂溪特派员沈汉英同志曾说：“自有解放军以来，干部的牺牲，以此时为最大了，每星期总要死一两个人。”四属方面，虽仍有四百余人，数十人一股，带长枪，但那是因为合灵的党还未被承认，因此未尝叫他们撤退、复员之故。

北方内战再打起来以后，南路蒋军一五六旅亦已开始北调了。我和温商量：“现在一则是时机，二则我们老是这样每星期三几个人牺牲下去，是条死路。”当即决定每县重建一两个主力连，坚决进行自卫。并向区党委提议于三个月后将撤往安南之第一团调回来，以民团之类的名义搞武装，地方自治会之类的名义搞政权，扩大发展，实行割据的。当时我们是认为这次内战，不同从前，蒋是准备好了才打的，

一定打得比前一次久，而且必要打到蒋大败而后能和：打得久，蒋就无法兼顾其后方，大败而后和。周恩来在南京做了部长，也还能让蒋在同南方纵容剿共吗？温于八月间来港，准备将这种意见向区党委提出。

温走了以后，除四属交通未联系到外，高、雷两地，都布置发展武装了。1. 团干部士兵都闷得生气了，早说：“丢妈，只[要]让再带上驳壳筒子走一天路，死也甘心了！”一听再集中队伍，带长枪去打人了，大家都非常高兴，集结过程中又打了几次小胜仗，便更兴奋了。2. 因此时国民党刚恢复征兵、征粮，人心怨恨，秋收将近，减租合时，民心思变，土匪蜂起了。化州的农民流传着一句谣言：“民国有三六，大小官员一锅熟。”又说天上新生两颗明星，就是朱、毛，这星正一天天高升，升到中天时，共产党就得天下了。农民最讨厌圩场上的收税佬，我们一下子就杀了他许多个，化南几个圩都没有人敢收税，群众就高兴了。上述茂南式的活动，到处行起来，都很见效。向那乡保长发出和战书——要和就接受我们的条件，要战你就买多两挺机枪，筑起堡垒，把家眷也搬进堡垒里去住吧！许多乡保长、地主在我们的“吓叱拆打”之下，做了两面派，向我自新，写下了自新书。这些家伙一低头，群众就愈胆大。化南的农会，在个多月里组织了万余人，有些村子组织了抗丁、抗粮会，站岗放哨，实行抵制国民党的法令；有些村子，则划出部分公款来作护丁基金，有些人甚至送钱送粮给我们，说国民党来抽丁时他就将子弟送来入伍，这钱粮是预先送来准备他的子弟吃的。这样，一个月里，高、雷的部队便由百余人扩大到约一千人，计化县五百，遂溪三百，廉江一百三十，茂南七十；机枪也由原有埋起来的两挺扩充到八挺，计缴获两挺，买一挺，收编三挺。各县武装名义，没有统一，我们也暂不想去统一它：化州的叫民军，茂南的叫侠义铁血团，廉遂则未有定名；群众组织亦不统一，有农会、穷人会、抗丁抗粮会、护丁会、同心会、红（军）民（众）两合会等等名义，实际控制乡村，而迫使国民党的乡保甲长做两面派。其间：曾计划袭取化城的军械库，那库里有步枪七百，轻机枪二十余，重机六，手榴[弹]万枚，后因内应有了变化而自动放弃了。不过当

时我们还没有主张建立一面政权，预计这袭击胜利以后也不集中大兵，不搞政府。

正在兴致勃勃当中，九月下旬，温由港回抵湛，传达了当时区党委的指示，于是又来一个大变。这个传达，约有如下几点：

1. 革命是长期的，战争是长期的，广东要准备再过十年八年的黑暗时期。

2. 目前蒋后的情形和抗日时期的敌后不同；那时是民族敌人，敌无社会基础，现在蒋比当时的日寇更有社会基础，而我则较抗日时为狭；和过去苏维埃运动时期也不同，那时蒋的统治，未深入农村，现在则到处有特务化的乡保甲组织，有二十年法西斯统治的基础和经验。

3. 我们远离主力、很孤立。

4. 这就造成我们在蒋后武装斗争的极大困难，不要以为凭我们现有的力量就可以搞出象过去东纵那样的局面来，“一年打你不死，两年，两年不死，三年，三年不死，十年，总会把你消灭了的。”（据温说这是梁嘉同志说的）

5. 部队尽可能复员，每县最多只许保留五十至七十人；部队内不许发展党员，不用党的名义，避免政治形式，绝对不许主动出击；冲淡目前紧张对立的局面，争取和平共处的局面；部队与地方党切断一切联系，各县部队直接与特委联系，不准再与各该县地方党有横的关系。将来区党委另派军事特派员来时，则特委亦要与部队切断关系了。

我掉了泪对温说：“这样做会死人的！”要求慢点执行，待我来港一次。温说：“已经决定了，必须执行的，去也无用。”这样就执行起来了。到十二月，高雷部队缩回只剩二百，四属的也缩了一半。损失最重的是化州，有一个连七十人，遣散回家，被保长告密，除了四个人以外，全连被捕，四个人被杀，其余都被迫自首了，枪也全部给敌人挖去了。化县被敌挖枪有几起之多，共被挖去百余枝。有些部队则在遣散的过程中被敌打垮了。化北一个连，在未接到这个传达前，和敌人打了四仗都打胜了，而且总是在我寡敌众的情况下打胜的。但在接到这传达后，一次碰到六十个敌地方联防队，指挥员就下命埋下枪逃命，结果失去全部长短枪及一挺机枪。化中有一个连也是这样被

敌人打垮了的。此时敌一五六旅又调了两个团回南路，准备扫荡两个月然后走（我们有情报）。但敌实只以九个连的兵力放在化、吴、茂出动扫荡，其另一个团则驻在湛、遂，未曾出动，廉江也没有扫。故廉、遂两地只是自己散了，死人还少。此次化、吴、茂约死了百余人，其中我队员及地方同志约四十，与我有联系的土匪四十，其余是群众。四属方面未有正规军去，也垮了，干部听了传达后，组织了老婆会，互助介绍娶老婆，据说是作长期打算。合南大队九十余人，发生敌情，就纷纷往海边跑，想找船去安南。这一下就垮得只剩大队长带着几个人了。

区党委这次决定基本上是错了。我不同意象林美南同志那样说法，说什么“方针是对的，因为我们是提出坚持斗争的。只是坚持斗争的办法上有些错误”。尤其不同意他在讨论这些问题时那种不讲理态度，“谁叫你们搞起来的呀？我们没有叫你们搞起来的呀！”这样实在难以弄清是非，接受经验，对革命没有点好处。他又说：“照你说，牛哥是最右的了，这个路线如错，他就应该错得最彻底。但是他亲自领导的西江，并没有象你们这样损失呀”。我不知道西江，但知道南路。南路的事实就象上面所述的这样，死人比今年这样大规模的起义半年的战争还要多，失的枪就更多了。是不是我们“不自己解散就一定损失得更大”（钱兴同志语）呢？我以为这是无稽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上述化州那两个连，在坚决抵抗的情况下，非全军复没不可呢？何况我们即使在那时候，也还不是一点也不会游击的呢？当时我曾向温提议，将化州部队撤过廉江来，不肯！分散到各地去，不肯！硬是要遣散、复员，绝对不许主动出击，甚至各部队之间绝对不许有横的联系（对四属曾这样吩咐）。禁止在群众家里煲饭（怕连累群众），叫各人都在山野挖下窿，带半个月粮食藏在里面。这样的战争指导，虽起孙、吴于地下，也无能为力，只好拱手就擒了。当时区党委的决定，并没有文件，我不知对别的地方是否如此。但据温同志这个传达，显然它是错了的。

(二) 今年概述

去年十一月后，因为败得太惨，温亦略有改变了，北方战局和全国形势也更显明朗了；因此又有再集结扩大部队之议。当时拟首先恢复每县有百人左右的主力队，积极活动逐渐扩大。温抵港后写信给我，云“港方同意我们的营业计划，并建议扩大”。我接信后极兴奋，即依原函抄去给各县干部，告诉他们这次是不会再摆乌龙的了，这样我们便积极布置今年的起义。

时南路毫无外来兵，敌人又很空虚，但乡村反动分子仍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以前两面的家伙，大部分变为向敌一面了。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坚决镇压这些乡村的反动份子，在化南一夜间就杀了八个，几天里就杀了十多个。于是地主们都怕起来了，几乎整个地区的地主都搬了家，有些走附近圩镇，大部份走化城、梅菜及湛市。有些走了以后，又派人来问我们准不准他们回去。地主已被我们吓跑或投降，群众又高兴、胆大起来了。过旧历年时，我和遂溪沈汉英、化县唐多惠（高佬唐）二同志在湛市谈了七日，决定今年起义的计划。计划预定两个月内，在高、雷扩大武装至二千人，半年内发展至四五千人。计两个月内，各地分散来发展，不动声息，不事吹擂，收民枪，编土匪，缴国民党一些乡保队的枪，先搞到了千余二千枝枪再说。两个月后，部队已有二千人了，便整编队伍，拿出解放军旗子，搞政权，减租息，虚张声势，扩大影响，乘敌不备，指东击西，集中部队兜一个圈，进入山地建立基础，打下局面，然后又分兵发展。这样半年内，搞得好的，可发展到万把几千，搞不好的，也有四、五千。一切大致依照预定发展下去，人枪都发展得很快。化南国民党保队的枪，在几天里被我们几乎全部缴光了，打了两个警察派出所，缴了一挺机枪和数十条步枪。此外还打了几个仗，都打胜了，也有了些缴获。遂溪的部队，攻下了江洪港，缴了二十枝枪，袭入沈圩圩缴了几枝枪，又袭过城月圩，另也打过了几个仗，也都打胜了。二月十七日，遂溪的部队打死以铁胆，群众高兴极了。遂溪部队三天内扩大了三百人，群众十余个，三、五个一起自己带了枪来入伍，甚至化南的群众，也闻讯食餐干饭

(他们平日吃粥)庆功。为了领导的方便，我已经不能住湛江了。因此二月下旬，我便离湛江到遂溪去。

时敌因铁胆之死，甚为震动，敌保十总队刚到，拟扫荡化南，此时又全部调来遂溪，我决乘敌调动，争取主动，因即将遂溪部队整编，抽出五百人编为新一团，拿出解放军名义出来了。整编后练兵三百，打下了当时仍在遂溪坭地区的敌唯一的乡公所，并缴了当地另一个保队的枪，第二天与遂溪县府来援之敌打了一仗，毙伤敌十余人，缴了几枝枪，把敌人赶了二十余里。第三天便全团上廉江。与廉江之三团会师于廉南，打开了同南乡公所，缴枪三十余枝，俘三十余，分仓谷二千余石。同日，打退了由廉城及安铺两路来援之敌，毙伤其数人。同日下午向南转回遂北，占遂溪北安乡公所，毙敌一，缴枪数枝，当晚又即转化、廉边。三月初九日，一、三、四团会师于廉东南之歧岭寨村，攻占东桥乡公所，击毙其乡长，缴枪数枝，分仓谷二千石。同日以三团兵力一千二百人与由廉城来援之保安团及县兵一百八十八人大战，真是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毙伤敌约九十余人，俘五，缴轻机一挺、掷筒二、枪留弹筒二、步枪十余。于是出布告，委出廉、化两县长，并出了安民布告，揭示我们的主张。第二天，分兵出发，数日中占石东、榕树、良光、平坦、良、两家滩、出校等乡公所。缴枪数十。有些是围起来打下的，有些是闻风而逃了。计自入化、廉边以后，数日之内，占了敌九个乡公所，打了一场大仗，许多场小仗，纵横九十里无敌踪，声威大震。但我们已觉得再这样集中，妨碍各地发展，并易使敌得以集中兵力来截我赶我了。当即召集干部开会，决定三团全部调回廉江，主要向廉西、廉北山地发展；一团抽出一挺机枪及派出干部回遂溪继续发展；四团只留五个连和一团一起跟着我，其余四个连分散回地方活动，作为地方部队。我则率一、四两团共八百余人自化南挺进化北山地，计划帮助化北部队打开化北局面。因此又即派了高佬唐去合浦，约他们一个月以后在博南会师。我的意思是我们向西活动，他们向东活动，合高、雷及钦、廉之力，双方向博南这个山地挤，可能乘敌之虚，在这幅山地打下相当局面，然后又再分兵，留少数部队在这山地里坚持，各部队仍各回自己地区继续发展。大约是

三月中旬，我率一、四两团抵化北，打下了化北大镇中圩，俘敌三十，缴枪三十余，分仓谷二千余石，敌孔△、山底两乡公所闻风震惊，派代表来请去缴枪，当即派两个连去收缴了山底的十五枝枪，孔△的因情况变化没有缴到。在中住了三天，化北部队三天内扩大了百余人枪。时敌已集中七百人追上化北来了。我到了这个山地，我才觉敌已有备，这样孤军远征，容易上当。因又开干部会，决定南返，分兵发展，大家都同意，因即又和敌人来一个换防，立即返回化南。于化、吴边之金村与刚由湛调上来的保十总队的两个大队打了一场大仗，毙伤敌百七十余人，缴掷弹筒一，步枪十余，军用地图一份，俘十，我亦伤十、亡二。这是兴师以来最大一场仗，缴获虽少，但对敌的打击与对群众及我士气之鼓舞是大的。打了这场仗以后，一、四团便分手，四团留化州分散游击，协助地方搞政权、搞清算、搞地方武装。我带一团回遂，路上又和敌遂溪县兵打了一场遭遇战，毙伤敌十余，便直入坭地，和刚组织起来的第二团会师于坭地中心的城里村。这次出征，前后月余，来往约行了四、五百里，大小十余战，搞垮了敌十三个乡公所，分了八千余石仓谷，毙伤俘敌约四百，缴了约二百余枝枪，开始建立政权，开始搞清算运动，对廉、化等地局面的建立，影响是很大的。回到遂溪，一团已发展到三百余人了，大家见了面，情绪很高。三团分手回廉江后，也打了两个乡公所，发展得很快，半个月，由三百余人发展至八百人了。此时我全部武装，计雷州千二，廉江八百，化州千五，合共约四千五百人。

当我仍在化北时，温、欧已回来了，欧已抵遂，温仍留湛市。温一回来后，遂溪正在搞政权，布告、印信都准备好，各地也已布置了。温知道了，便叫立刻停止进行，把布告追了回来，下面的同志，甚为惶惑。我因回湛见温，商谈了几天，温原则上同意继续进行了。我便又回遂，带兵南下，准备向海康、徐闻游击，扩大活动区域，发展人枪，因敌兵力此时方集中化州，雷州空虚。行到半路，接温自湛市来信，云得情报，敌保九总队于三天内在水东登陆，即开化南扫荡，目前韦镇初正亲自率保十总队及化、茂、信等县保警队七百余人，自化城出发去化北扫荡，叫我“即带一团赶上化北，乘保九总队未到之前，

从屁股后给保十总队残部以打击，歼灭之；然后回师化南，乘保九总队立足未稳之时歼灭之”。我接到这样的命令，真有点啼笑皆非，当即复一信说：“前头部队已走远了，即使未走，从遂溪到化北，要走五天，是无法乘保九总队未到之前歼灭保十总队的；回师化南再乘保九总队立足未稳之时歼灭之，就更没有可能了”。又说：“我们现在的兵力，以两个团打敌人一个大队是较轻松的，以两个团打敌两个大队就很吃力，很勉强了。金村之役，不可为训！”又说：“我的分兵发展，乘虚而入，比你这个专找敌主力打，想几天内就歼灭人家两个团的计划稳健些”。我当然没有听令会去化北，赶下遂南，又西出遂西南，袭击河头圩敌据点不下。第二天，以八百余人的兵力与遂、海两县来援之敌大战。先集中约五百余人，在十余分钟内打海康一路百余人，打垮了，毙其中队长；然后又集中全力压迫遂溪一路之敌二百余人，伤其中队长，是役计共毙伤敌约四十，但无缴获，我消耗亦不大。此时本可乘战胜之威直下海康南部的，因河水涨、天雨、道路不好，不敢以大军深入；因再分兵，留二百余在遂西南，百余人回遂南，逐渐向化南蚕食，又另编一海、徐游击大队九十余人（海康人），挺进海康南部游击，我则率其余部队回遂西，一则牵制敌兵，二则我想见一见温，把问题谈清楚。回遂以后，曾和温谈过我的军事活动计划。因为我病了，没有详细谈到其他问题。不久，美南、钱兴二同志便来了。

林、钱来后，便展开了“长期”的争论。一停下来就开会，大约连续开了二十天。争论未决，敌已准备扫荡遂溪，又恰恰此时接到了区党委叫我们组织千五百人去勾漏山的指示，林等当即主张立即将第一团全部拖上廉江，会合三、四团，一同入桂。我认为目前来说，立即组织大军入桂，为时尚早。我说：“区党委叫我们入桂，作为我们一个发展方向，一个方针，是正确的。我们是要去的，我早就想去，如果我不想去，我就不会去化北。可是我们在这里做着实际工作，了解这里的具体情形，对于如何执行这个指示，我们是要负责的。那边的地方是没有准备，我们连一份最简单的地图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了解那边的情形，勾漏山究竟在那一个县也不晓得，没有子弹，没有医

药，没有鞋子（走山路不象平原，是一定要有鞋子的），怎样去呢？一团前次北上，全团只跑了几个人。这次不同，一定大批逃亡的。”我要求最少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做准备。林等没有同意。故开始扫荡了，林、温等先率一团第一营又两个连去廉江。我留遂率其余部分，任务是练兵五天，争取教育这些原由土匪、伪军改编与新入伍的士兵干部自愿北上。但在敌扫荡中，无法练兵，因听说第一营又回至遂境游击，仅离我处三十里，曾去信调他们回来配合伏击分路扫荡之敌。此时敌出动扫荡之兵力，比我们预计者为少，每路仅有百余人，同时分两区扫，五路出动。但当时第一营实在廉、遂边境，离我处四十里，在温等附近，我信一去，引起温等误会，当由林、温、钱、欧四人签名复了我一信，由一营带回来，信里说：“我们原来对敌兵力估计是正确的——千五百人。”（敌确有如此兵力，但有一半驻在广州湾及遂城等地，出动的始终只是七百人）又说：“希望你尊重原来的决定，立即率一团全体北上。”我接到这封信，当即率一团到廉南。此时三团、四团已先到了。当即照他们意见，抽调整编，以一、四两团为主力团，一团六百余人，轻机四、重机一，每人平均二十颗子弹；四团三百余人，轻机二，每人平均十颗子弹。我又说：“这样少子弹是去不得的啊！我这样的人来做指挥官，到那人生地疏的地方，路又那末远，假使路上打了一个消耗战那怎么办呢？我是难保证不被迫打个把被动仗的，即使主动去打人，有时也会打成消耗的。换个别人来当司令也未必行，我来当更一定不行。”林说：“一面派人去买子弹，赶紧送来，一面逐步推进。”这样，一团、四团、司令部直属队，连三团，共约千五百余人，开始浩浩荡荡，向桂边进发了。在廉南等买鞋子和药品，没有等到，到廉西几天，也没有等到，又计划去打一个反动联防队，筹半个月军粮，也搞不成；敌人已追上来了。敌人特选了遂溪县县长梁传楷做指挥，因为他在廉西驻防了四、五年，情形最熟，所部铁胆旧部，也是最熟廉西地形的。梁带了二百余人，赶至廉西牛头营附近。时我正打下了牛头营乡公所后，又留在该地打一个反动地主筹粮，便和梁部打了一仗。时我们已与由合灵过来的第二十四团会师了，我共有千五百人，约有千一百人投入战斗，连机枪也比敌多，但因地形不

熟，各部队联络不好，迂迴部队跑错了路，给敌人跑了。是役敌死四十二，伤四十六，我亦伤亡十人。仗是打胜了，但消耗了四千多发子弹，没有缴到东西，从战场上下来，我就提议撤回廉南。大家同意，当即北走，打下了沙铲乡公所，缴枪三十，然后转向东南，回至廉南。这次路上，也还是未停争论，开过很多次会。回到廉南，又谈了几天，就由温同志做结论，说我是“政治上左倾幼稚病，军事上冒险盲动主义，组织上自由主义。”这个结论，林、钱、欧都完全同意。我声明：“我接受对我组织上错误的批评，但对于所谓我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对温这个结论所说的我一句也不同意。”过了两天，便接到区党委一个指示，说如我对这个指示的目前的工作方针仍不同意，即来港；如对过去的不同意，则停止讨论，待以后再做结论。并叫我停止将我的不同意见向下面传播。我同意区党委这个指示，这样，我们便没有继续争论过去，当即又决定由我带兵去化北，伺机入桂，林、温等则暂留廉江。我率一、四团，取道廉东，打下了那良乡公所，直趋化、廉、陆边之山底，本拟自平定附近渡江，深入化、信、北（流）边之大山区活动。但天雨水涨，不能渡江，转辗于南岸半月，敌已调集大兵来追。被迫打了两次仗，第一个是掩护退却的仗，毙伤敌二十余人，我伤亡数人；第二个原想打人的，我以两团打敌二百余人，已把敌人压在低地，势将合围，但我子弹已尽，只得自动撤退。是役毙伤敌八十余人，我亦伤亡十余人，为作战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自廉西回来后，部队只补充过几百颗子弹，经过这次仗，有些连队平均只得二颗了。时敌已调集千余人追上化北，〔我〕弹药既缺，病员又多，恐为所乘。因此，我未得林、温等同志，又率一、四两团南返，路上经数月前第一次北上开会议定分兵发展的那个村子，躺在前次做会场的那间地主花园别野里，望着那四面壁的字画，心里真有点辛酸了。南回后，在廉东南打了一次伏击战，我以两个团打敌人两个中队（九十余人），打得他只剩十五人跑回去，我无损失，缴轻枪一、电台一、步枪十余。士气复振。回到廉南见了林、温等，我又提分兵发展之议，林、温等同意了。因此又将四团调回化县，我和温带一团回遂溪，林、欧留廉江。此次一团自遂溪出发时原有七百余人，转辗月余，跑了二

百，死伤二十余，病了成百，回到遂溪时，只剩三百余人了。

回遂溪后才开始在遂溪做清算斗争、减租减息的工作。长期沉闷的萎缩的局面又渐见活泼。但此时我很闲，除了指挥打过几个小仗之外，没有什么事情做。一则是因为温同志做得太多了，二则是我回到遂溪后，发觉温等在我这次带兵去化北之时，曾用地委名义发了一个检查半年工作大纲，列举所谓半年来两条路线的分歧，要各地检查半年工作，并已实行在各地进行此种检查了。此事事前既未征求过我的意见，事后三个月也没有通知我。我心里很闷，又生了病，一路拖着，没有医治。后来温去廉江，我留遂养病，又因敌扫荡，住地环境不好，撤入湛市，以后便来港了。

当林未来之时，敌集中力量扫化州，计有保十、保九两个团及信、茂、化、吴、廉三〔五〕县地方警察及其他反动武装，共二千余人，期间一个多月。我们的反扫荡计划是由高唐带四团主力转出外围游击，丁留地方领导其余部队在地方上坚持。唐率四团入廉西，出廉北和三团配合，曾入桂境和桂保安队打了两个小仗，游击了将一个月，再转回化、廉边。丁留化南，将部队分为无数小队，分散游击，发动群众，组织农军，深入清算，甚有成绩。在我普遍的民兵战下，敌约被毙伤百余人（其中有六十余人是被用毒药毒死的）。故敌虽在扫荡后重占了化、廉边中心之良圩，但敌无法控制我区。这次扫荡，是化、吴、廉边工作的极大的考验，他们在敌人扫荡以后，不是小了而是大了，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垮了而是把各种组织更普遍与健全起来了。这在以后再详述。高唐回化、廉边后，为了配合遂溪的反扫荡，曾集中八百余兵力，在石东附近伏击扫荡后撤退之敌保安队二百余人，唐不幸于是役中弹牺牲了。是役本来敌已中伏，但因距敌据点近，敌援军数十人赶到，我去得太迟，阵地未完全布置好，打了一个钟头未解决战斗，唐在指挥中牺牲了，丁只得撤退。敌死伤闻达百二十人，我伤亡甚少，但唐之牺牲，是不可弥偿之损失。唐甚有创造性，其对于工作之热情是罕见的，在南路党内威信最高，对南路这个时期的工作，建树也是最大的。在其影响下的化、吴、廉干部，至今仍是较其他各县干部更有创造性与热情，而且也最有办法。在敌这次扫荡中，化州

部队在吴川很有发展，建立了吴川县府。

2. 当敌方拟扫荡遂溪时，我以两个连自遂南跨海入东海岛，此役意义：一是要分散敌兵力，扰乱敌集中扫荡遂溪的计划；二是主要的，要收缴岛上的几百枝枪。岛上共有四个蒋军据点，并过去法国人发落在民间的枪枝很多，敌已下令收缴这些民枪来组织自卫队。在东海几日，打下了三个敌据点，缴枪数十，机枪一、俘数十，又和来援之敌九二旅部队打了一仗，毙伤敌十余，击毁其机枪一，缴枪榴弹筒一（后自炸废），枪数枝，收集民枪百余。是役计我在数天内，增枪约二百余枝，人也增百余，约二百三、四十人去，回来时候已近五百之众了。我突在东海出现，使敌很警愕，集中了近千兵力入海进剿，我们却已全部安全撤回来了。是役我仅亡一伤二。我去东海，纯为军事需要，不是要盘据孤岛作海上霸王的，故在岛上虽用区长名义出了布告，但实际只是虚张声势的作用，并非真的要做。目前又派了三十个武工队回岛上活动，但仍不打算在那里搞政权。

目前南路的情况是：

武装方面：

第一军分区（雷州半岛）千五百人（今年六月时千八百余人），控制遂全境三分之二、海康北部一部、湛江西南通平区一部、海康南部东海仔地区。海康南部有武工队百人活动。东海岛上武工队三十人。海面游击队四十人。

第一团三百余人，第二团二百余人，第十二团三百余人。另民兵百余人。民兵与团及各区乡村合计当为千六百余人。

第二军分区（化、吴、廉边、化北、茂南）三千二百人。其中约有千至千五百人是农军（亦脱离生产），其余分属各团及县区乡队。分布：化北五百，茂南百余，其余在化、吴、廉。控制吴川三分二、廉东南、化南三分之二以上。化北平定江以南大部分、江北、江西只有武工队式的活动。茂南一部分。

四团二百余人，十团四百余人，独一团二百余人，化北独立大队百余人。

廉博区（廉江、博南）八百人（今年六月时千二百人），无民兵。

控制廉南三分二、廉西约一半、廉北约一半。博、白南有约百人活动。

三团四百余人（原有七团，后缩编取消）。

茂电区（茂名、电白）武工队约百人。分布于茂南、茂东、茂北、电西北、电中。

政权方面：

第一专区（雷州）遂溪县政府，约能控制全县三分之二乡村。海康县政府，乡村政权建立起来的还很少。

第二专区（化、吴、廉）化县县政府，约控制化南、廉东南三分之二以上乡村。化北办事处，约控制化北平定江以南三分二乡村。吴川县政府，约控制全县一半以上乡村。廉江县政府，控制廉南、廉北、廉西约一半以上乡村。（以上俱是估计，未有过统计数字）

（三）军事活动

根据上述，可见温给我下个“军事上冒险盲动主义”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如果我是冒险盲动，那末他是个什么呢？以其说我冒险，不如说我由于军事知识的浅薄，而常常太心虚胆小，不敢出奇制胜，因而放过了一些机会。如今年四月之南下海康，本可以掠雷城东边平原而入海康南部，使我主力突出现于海、徐边，乘敌不意或可搞开海徐边局面而未致撞板的，当时大多数干部都主张这样走法，但我不敢同意，宁愿转趋西海，徐图蚕食。为什么呢？我自己清楚自己有多少斤两，诚恐打败仗。我写过一个小册子，讲游击战争的指挥问题的，在温等未来之前，这小册是当地干部研究怎样带兵打仗的唯一蓝本了，因为他们并没有其他的书。无疑地这小册子的思想影响于当地干部是很大的。这小册子的结尾处有这样的话：

“这样，我们对于敌人，是以多打少，以强对弱，以全力对分兵，以主力对次力，以主动对被动，以有备对无备，以包围对被包围，以发扬火力对不能发扬火力，以突袭对被突袭，以有情报对被封锁消息，以有利地形对不利地形……这样而不打胜仗，真是未之有也了。”

（大意如此）这个小册，可以说是我全付的八宝了。我是从来没有带过兵的，一出手就亲自带千几百人在战场上打，我不是在房子里写命

令，而是在离敌人几百米远乃至三、四十米远的地方指手划脚的，我凭什么本事敢于冒险盲动，凭什么本事既冒险盲动而不被敌人打垮呢？在那小册子，我曾说：一以当百，拿来作部队内的政治动员的鼓励士气的口号的，是个聪明人，拿来作指挥原则的是个傻子。”因此，大半年来，一切较大的战斗，无论是我指挥的或其他干部指挥的，没有一次不是以最少两倍乃至十倍于敌的兵力作战的。这一条，我坚持得最牢，影响于各干部的也最深，因为其他的道理深一些，而且需要更多的技术条件才能办得到，而这一条，是简单的，容易理解，也容易执行的。我们不象温同志那样，坐在湛江市，幻想在三天内，以数百疲兵，歼灭人家一个团，“从而”又歼灭其他一个团（温当时还另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建立粤桂边区而斗争》，也是以这样的精神提出粉碎敌人的主力的口号来的）。我们从来没有敢这样想过，我们想的是将来我们是要这样的，但这绝不是目前的现实。目前的现实是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本领。“金村之役，不可为训”这句话，我不是对温才讲第一次的，那个仗一打完，我就对当时的干部讲的。我说“如果我事先知道他是两个大队的保安队，我是不打的。”我们从来也没有敢提出个歼灭敌人主力的口号，相反，我们提出的是一句很不威风口头禅：“专打豆腐兵”，又用另一句成语来补充是“强凌弱、众暴寡”。那些干部，大多数学会讲这两句话，尤其前面一句。我们自称为“乌合之众”，这在我那小册子上也这样写出来的，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看得了不起，以为包打天下。因为是乌合之众，所以常常在战斗中即使我有了地形条件，人力、火力等等条件的优势，我们也还是常常不能打得很好，因为有许多事情我们还根本不懂。打完仗，不会搜索战场，让敌人丢下的东西放在那里，第二天才给敌人来拾回去的例子，已经不只是一两次了。金村之役，本是个伏击战，敌尚未进入我伏击圈，就因我不善于掩蔽，暴露了我的埋伏，因而演成硬打的。在化北，去伏击敌人，却自己和自己误会，打响了起来，敌人很自然的跑了。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还不是个冒险盲动之人。我们只是承认自己蠢，低能。大半年来，自我起，直至许多带兵的干部，小心翼翼和敌人磨，除了个别一两次外，还没有给敌人打败过，难道这些也是冒险盲动的

成绩吗？温给我作这结论前，我直接指挥或布置的战斗十二次，毙伤俘敌约五百，缴获各种武器亦近二百件，我仅伤亡二十余人，未损失过一件武器，未失落过一个人。各县同志分散的战斗，其成绩并不比我差，他们指挥过很多小规模的战斗，而实际上，这些战斗才是那边的主要战斗。今年三月，我曾作过一个统计，当时全区对敌作战的伤毙俘比例是一比四十余，而化州一地，一、二、三三个月，单缴获敌乡保兵的枪就达四百枝以上，这些枪当然不是敌人送给我的。是的，我们约有一半以上的枪是从收集民枪来的，而其余一半，以后又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收集民枪，也是一部分是在地主手里，在反动地主村庄里，要经过战斗，弄些手段才得来的。南路的特点是：农民很穷，一般的农民是很少枪而且几乎是不会有好枪的。而地主的枪并不是很容易缴的。温等也看到，在廉西我们缴两个地主的几枝枪，都打了一天一夜才解决的。温等显然是没有认真去研究事实的。如果我们军事上的错误真如他所说的那么严重，则我们不应该是由二百余人增加到五千五百人（温给我做结论时总数），而应该缩为五十五人乃至五个人，他们也无法在那里放几个团在外边保护着慢慢地开会来做我们的结论的吧？

我以为讲毛主席是易的，行起来就难。温等最大的毛病，是先自称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便来定计划，下命令，而不是研究敌情我情，看看路行得通不通，才来叫人开步走的。这次老左下去时，适逢敌伍入我坭地中心，以三个中队保安队的兵力协助一队乡兵驻在城里、调村两村，建筑堡垒，准备长期盘踞。左是来传达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的，传达了以后，就批评我们不懂得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喜欢打硬仗。他和温商量了，起草了一个命令，给第二团团长，限期于一个月內，拔掉调村据点，并以伏击打垮城里村之敌，迫敌退出泥地。他这个计划是最“打硬仗”的了。因为第一，敌约有二百人，据说有二十几条机枪，有掷弹筒，而我们的第二团团长只有一百人，即使把他的团全团调来也只有二百余人，一挺机枪；第二，敌两据点相距十里，每日在高山上放哨，望得很远，我很难找到伏击的有利地形；第三，指定要拔掉的据点之敌，七十余人，另乡兵二十余人，约有八挺机枪，

或最少六挺，住在一间祠堂里，有炮楼，三面是水田，一面是河。敌驻地系一高地，比周围都高，筑有工事，又斩了周围的竹木，使袭击者无法掩蔽接近，我又毫无内应。我当时问左：“你知道这种情形吗？”他当然是没有问过的，而我却曾经在这些地方来去不下十余次。我告诉他：“你这个命令不要了吧！行不得的。我们不要坭地了，敌人喜欢住就让他住下去吧！他舍得放三个中队来这穷山林里的两条村子住。那末，他愿意住久一些我们也就让他住久一些。我们部队不拉回这里跟他磨，我们要开出去，到敌人现在还没有兴趣去住的那些地方去，又搞我们的世界。他要了我们两条村子，我们要回他两百条，他要坭地，我要他海康，看他出去不出去，他出去了，我就回来收拾这几个做乡长、保长的家伙。你不要管他：坭地也还是我们的，他能把坭地百多条村子都住上兵啦？”

有两种情况，使他们口讲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而做起来就走了样：第一种是“太天真”；第二种是太粗鲁。太天真就把事情想得太如意了，忘记了路是要用腿来走的，肚子饿是要吃饭的，子弹会打死人的。我上面所讲到的几件事实，是很可以证明他们对这三句话是足以当之无愧的。要去广西，一想起来就要去了，没有子弹，没有鞋子，没有医药，没有响导，一切都可以不管。一想拿下个据点，马上就要拿下寨了。九月，我带一团在遂西北，打了一个伏击，俘了百七十几个壮丁，把由安铺护送壮丁到遂溪的两个警察中队也打散了。战斗一结束，温就要我当晚就去打安铺，我说：“打不得的，另花心机去想吧！”他说：“你怎样知道打不得的呢？象你这样，一辈子也打不到的。”我没有再解释，只好把安铺的情报员找来，让他们去问一问。自然，后来还是没有去了，因为安铺还有二百余敌军住着呢。这些同志，总是那么心急。他们要去广西的时候，就说我留恋平原。广西去不得，回到平原，敌人来占了我们这个平原两条村子了，他们对这两条村子忽然又那末留恋起来了，下命令限期一个月内把敌人驱逐出境。我说，这种思想也是有个根源的，这是和入桂挫折回来以后提出以巩固工作为中心的问题有关联的。为了这个“以巩固工作为中心”，我在遂溪和温断断续续争执了两个月，我曾经说：“这好象叫化子拾了个破铜

钱，挖个洞埋起来，最巩固了，可是也变不成富翁呀！”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地盘还少，基础还不大，把坳地“巩固”得比延安还模范，也还是得不了天下的。胡宗南打来，延安还要让他占呢？难道城里、调村这两条穷村，比延安还名贵了？我没有冤枉他，因为城里、调村给敌人拿下据点之后，我们确增加了许多不便，如过去可以白天走路的现在非晚上走不可了。交通站非搬不可了，驻地非经常转移不可了。因此当时温就非常焦急，几次要我调第一团回来打，真是有点要灭此朝食之概。他们不但不懂得什么叫做“争取山地”，而且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留恋平原”哩。

温那一篇《为建立粤桂边区而斗争》的文章，可惜我已经把它掉了，我本来保存了许久，是一次在打仗时候过河才被水冲走了的。这篇文章，提出要在六个月内建立了粤桂边区，怎样建立呢？1. 粉碎敌人的主力。2. 建立我们的主力，机枪愈多愈好……。我忘记了其他了，因为沈汉英同志是看过他这篇大作的，这“机枪愈多越好”，就至今尚为沈的口头禅。如果我们不这样天真，不这样粗鲁，今天我们也许已经把这个边区建立起来了。我说的不是如温已想的那什么巩固的根据地，而是说我们的游击区已经扩大到比现在可能大一倍，人枪也可能增加一倍或二分之一了。我决不是空谈，如果我们当初就实行分兵发展，各种政策上也不开倒车，海、徐的游击战斗是可能扩到比现在大许多的，高州方面也是可能搞起来的。而合钦、廉与廉江之力，并从各地抽出些干部去，派些得力的人去主持，廉、博、合之间的这块山地的游击战争是可以普遍起来的。这样，那举国迁都式的长征大可以不必举行，或到此时再来搬家也不迟。自然就是照这样的计划去做，也还不能想便在勾漏山坐得很稳，而且也可能还不能到勾漏山，因为我们就算在南路有了万余部队，这些新搞起来的乌合之众，战斗力也还有限。不过，人多了总好办些吧了。

我们有过一个“专打乡保兵”的口号。这口号，春天的时候吃香，夏天不大时兴，秋天才又再提起来。起文以前，我们就研究过：怎样才能使敌无法控制乡村而我得以控制呢？这个研究，就使我们提出了“专打乡保兵”的口号。这口号是和我们搞乡村政权有关的。我们认

为只有把敌人这些最分散的爪牙剪掉，对于我们建立乡村的统治才是最有实用的，而这些家伙，也是最豆腐的，我们用一句话形容它——又甜又香。拔掉一个有百几十人的敌区据点是难的，只有三、二十人的乡容易些，而那些只有五个八个的保据点最容易，打不下，困也困死它。因此，我们又提出：“不让再有敌人的保队存在”。没有了保队，敌人就无法实际控制乡村了。初期敌人并没有警惕到我们这种计划，因此正、二、三三个月，所有在我老区及其附近的保队全部被扫光，尤其是化州为最彻底，三日之内，就缴了百几枝枪，这就是说，歼灭了敌三、四十个保队了。我在正月写给温同志的信，曾讲到我们计划在化南缴二百枝保队的枪的事。我们这些计划没有落空。我下乡后亲自指挥的第一个仗，也不是打其他而正是打保队的。当然那时在敌人防不及防的情形下，我们也解决了许多乡队，因此当时敌人曾下令不准保队再分散驻，全部集中乡公所里。而在化、吴、廉边，敌人直至现在，还是并两三个乡队为一个据点，以增强其防御力量。在遂溪除了极少数地区我活动较少而又较接近敌人据点者以外，也没有什么保队了。敌人没有了保队，而我们则有了民兵，这是化、吴、廉之所以在敌最严重的扫荡下能屹立不动的主要原因。根据这种思想，因此我们在部队的编制里又有这样的原则：我们准备每县建立一个团，团下不设营，直辖五个连，我们称之为“大连小团制”。大连，是每连配足百人左右，准备分散活动时，对敌三数十人的乡兵可以进行歼灭战的。小团是准备集中作战时可以对敌区兵（敌较大的据点，有县兵分驻）进行歼灭战的。我当时曾举孙宾与齐王赛马，以下驷对上驷，上驷对中驷，中驷对下驷为例，提出以民兵游击小队对敌正规兵，以区兵大连对敌乡兵，以县兵（小团）对敌区兵，以数县县兵（几个团）对敌一个县的县兵。几个月来的活动，我们大体上还是照着这个原则的。因为这样，我们很少打败仗，干部、士兵都有信心。有人问一团的士兵为什么这样勇敢，他答：“现在打仗不同以前，一听到枪响，就知道一定打胜仗的，因此就不会怕。”我在部队中之所以很短期间便建立了威信，主要的也只是因为有了这一套平庸自卑的而不是贪功好胜的打法。

因为过去的工作基础在平原，边区山地的基础甚至没有，这就使我们建立边区山地根据地，不能不多化些时日，多化些心血。今年正月以前，高雷共约有党员千六百人，其中在遂溪的一千，在海康的五十，在廉江的百余，在化州的百余，在茂、电、信的二百余。廉江北部山地是几乎没有党员的，化北有十个，信、茂、电的山最大，约有一半以上党员是在山地的。但今年正月温同志的来信及由林明同志（由港派回作信、茂、电三县特派员的）的口头传达，都说这三县不作公开的武装斗争，一切照旧，要我把当时在茂、电、阳边山地活动的那个连调回来（此时他们在那里活动已经几个月了，这块山地是南路最高最大的山地，里面的基础是一九三九年香港学生工作团建立起来的，在山区里有五十五个党员，过去南路解放军时期，起义部队占领了这块山地约半年）。在这三县区域里，那些不公开的部队的组织和地方的组织仍是两条头，单线领导的。所有这一切，其理是——这个区域还可以掩蔽。我在今春二月给温的信已经驳过这种观点了。不过，因为这块区域既被列为“禁区”，我们不能不存有戒心，尤其是没有地方党的协助，即使不公开的少数部队的活动也是困难的，而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今年七月以后，在那边活动的那个连因为没有地方的协助，挨了几次打，把子弹打光了，退回化南（今年三月他们退回来一次，后来我派他们再回去的）。这样，就把这个连留在司令部教导连，派干部回去搞地方武工队，才开始将部队与地方两个系统统一领导。但地方工作的负责同志仍然住在水东，部队系统的负责同志则住在山里。可能仍是两个系统吧？对这种布置我没有参加，温等也没有和我谈过，我不能肯定的说，但显然，这三县工作的发展是落后了的。当然，就算他早就按化、廉、遂等地的精神搞起来，也未必就有比得上今天这数县的规模，但如不被划为禁区，总会振作一些吧。强要我们入山，却又把这块最大的与最有基础的山地划为禁区，这不是很矛盾吗？在今年正月，我们在这块山地是保留着有和廉江一样大而且战斗力更强的部队的。而今日的结果，两者之间的差异如此甚大，廉江发展至最高峰时曾有千二百人，现在也还有八百，而这三个县到现在还只有约百人的武工队，难道这三县的敌情比之廉

江还严重吗？这三县，从来没有外来兵去剿过他们，茂名现在还有一个县警大队，信宜有一个中队过来化州，电白也曾调过一个中队来，很明显的，他们是比任何一个县也空虚的。因此，骂我们“留恋平原，不注意山地”实在是冤枉的。我们有什么办法不留恋一下平原呢？我们对于山地工作诚然还是进展得很慢，这是由于我们对于山地的知识很少，初期还表现得太心急，因此曾企图用大兵去打。在我第一次上化北之前，高佬唐是带过四团几个连去化北兜过一个大圈子的，三团也是在廉北山地里集中〔整〕编组成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研究出山地的特点，因此还定下了那个北上化北，西出廉、博边与合、灵部队会师的计划。打下中以后，停止了这个计划是必须的，当时我曾留一个主力连在化北，组织了化北独立大队（他们不久以后就发展到五百人）。然而由于干部的幼稚，他们在五月间敌人的扫荡里被打垮了（有一个干部自动解散了一个连，以后被枪决了），主要是散了，只剩下二百多人。如果当时舍得从化南抽去若干干部去增强他们的工作，也许他们是会搞得更好一些的。然而就是当时的化南，也是没有许多干部的。不过，今年的廉北、化北山地也还总算已经立下了根基了，凭着这种根基，我们可以继续向前发展。有些同志，在创立这种基础上，应受到很好的鼓励。今年正月，高佬唐派了陈宪同志去信、茂、化、北（流）边的山地里活动，那里原来是一点东西也没有的，陈扮作看风水先生去那里活动了几个月，便建立了许多关系，听说他们现在已经建立了武装了。这也可见我们早就想去那些地方的，不然，我们从化南派出这末一个人到那遥远的冷清清的地方做什么？

南路的山地，以我所知的廉北、化北而言，一般是人口较少，粮食缺乏（化北沿江粮食不少，但那些地方地形又较差），地方城堡坚固，而且利用氏族或其他关系，大抵都有些武装组织，依山把径，自成土皇帝，如果我们没有地方上的长期的工作，是不容易分化的。今春我占中垌之后，敌百五十人退守距中垌八里之高峰城，几乎每晚都派出些小队伍来向我们骚扰。敌人为什么那样大胆呢？因为他们是本地人，他们那一套反动组织由其保甲制度直至各种封建的宗姓亲戚关系，并没因我之入伍而便告解体，因此敌人仍有手脚。我们则由于是

外来的，人地生疏的，缺乏地方基础的，即使群众同情我，也不是三两天内便能动员组织起来的。这样，我虽兵力比敌人大，而在这种情形下，反而暂时比敌孤立。这里有一个问题：假如我们能有一较长的时间（如一两个月）在那里保持了兵力上的优势，情况当然又不同，然而我们目前却没有这种条件，因为我们还未能阻止敌集中千几百人追上来。

有时我们是集中跃进然后就地分散活动的，我们将来必然采取这种方法，使我们的游击战争能迅速散播得广阔，建立更多的支点。目前对于化、信、茂、北边、阳、茂、电边，已是应该考虑这种方法的时候，组织比较轻便的精锐的几个连，配备了干部，挺进这些地区，配合当地已有了一些准备的地方同志，迅速将群众发动起来，搞出一个新局面。但就是这样，也还要准备一个较长的分散流动时期，而不能希望一下子就能把整块地区完全割据起来。对于山地里那些反动的城堡，如果没有当地群众起来长期和他磨，困到他死，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下，还是很难打得下来的。不过以前的两次入山，我们都还没有这种条件。第二次上化北伺机入桂的时候，第一团全团只有一人会讲那山地里的客家话，他们实在根本难以做群众工作，甚至要借根针线，找个响导都困难。在雷州，这些兵分散下去甚至是可以当干部用的，到了这种地方，连干部也当不上个兵来用；在这种情形下，显然是很难分散活动的，分散下去，谁也不会有信心的。因此，要进行这样的跃进，必须在部队里有更多的准备，马马虎虎随便拖一支人马去，大概是撞板多过食饭的。过去南路解放军时期多次长征的失败，也不少这样的经验。我以为我们如就现在的情况来组织这样的一次挺进，譬如跃进阳、茂、电边山地，还必须注意，不要全力以赴的迁都式的搬家，而是必须在老地区仍保留有相当的力量，向边缘出动或向其他方向游击，或造成威胁敌较重要据点的形势，以牵制分散敌之兵力。这种在后边的部队，必须并不弱少于出征的部队，只要这样，才能保证出征部队进入新地区后不致在几天内就被敌人大兵赶上来，遭受敌人的大压力，忙于应战而无法进行发动地方群众，消灭地方反动势力的工作。关于这种经验教训，温等显然是还没有真正了解的，因为他们

到底还未肯批评自己。温曾对我说：“那次去广西是正确的，假使在廉西那一个仗打得好些，就不同了。”这种说法很危险，因为照这样说，那一次如换别一个人来指挥，那么我们便可以长驱直入勾漏山，而他那个六个月建立粤桂边区的计划就百分之百完成了。

美南同志曾提过这样的经验，以证明他们组织大兵远征勾漏山的正确，据说，李先念他们是千几百人一股到处游，兜的圈子越大越好，他们的豫、鄂、陕、新解放军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相信李先念他们可能是这样的，但，“他们是可以这样的。王震从延安带了九个连就回广东来了呢。可是人家是什么部队，我们是什么部队啊。”我当时就这样和他讲过。林当然也承认我们的部队远不能和王震的比，于是又争论到建军的问题。他们要急于把我们这批乌合之众建成主力了。

原来我们的建军计划是：今年正、二两个月，完全是分散发展的，在各县分头搞，各县又再分区搞，此时各县虽逐渐形成了一两个叫做主力的连，但仍未有团、营的编制。从三月起，各县陆续抽调编成军的主力（团），然而我们还没有编边区的主力，就是三县会师，南征北讨了个多月了，我们也还没有组织起司令部，只是我自己带了两个保卫员，到那个团就利用该团的组织来指挥其他团。我们这样做是根据我们的分兵发展的思想来的，是根据从下层做起的思想来的，是根据承认由地方兵发展到全边区性的主力游击兵团还有很长的时期来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不想过早勉强建立直接置于我指挥下的非地方性的兵团。三县会师后三天我们就把三团全部遣回廉江，四团及一团都部分遣回原地了，就是去化北的时候，我们也还是准备游了一时便再行分散的。我们的更大的注意是放在建立地方团，发展地方部队而不是放在建立“野战军”这方面（我们这种计划，被林、温等否定）。他们因为要立即“长征”，故对于立即建立直属于司令部的千五百人的主力团的要求，就愈觉迫切。准备入桂之前，勉强把两个所谓主力团建立起来了。第一团七百人，四挺机枪，一挺重机，每人二十颗子弹；第四团三百余人，两挺机枪，每人十颗子弹。部队里地方观念非常重，一往北走，第一团一天就跑了七十多个，一个多月跑了二百，普遍的说，“这次卖猪仔了”，遂溪兵怕的是又到安南去了，化州兵因为用

了东江的代号，就说是到东江去了。有些连队里除了指导员以外还没有一个党员，因为那是新搞起来与由土匪伪军改编的。有些连队从来还没有打过一次仗，新兵则各个连都有，站岗放哨也还是没有学会的。在这种情形下，为了急于把这些乌合之众变成劲旅，于是除了空喊加紧政治教育、军事训练之外，还来一套提高待遇的办法，规定主力团及司令部直属队每日八百元菜钱四两油，而地方团则只有六百元菜钱两两油。这个办法一执行，便引起无数的风波。我曾经带着一团一个连和二团一个连同住在一个村子里，两个连的伙夫同在一个厨房煮饭，他们发觉了这种不平之后，二团全体骚闹起来了，他们说：“我们是前娘仔，一团是后娘仔。”在一团当个勤务兵，比二团团长，比分区司令还吃得好。这怎不岂有此理呢？放哨的时候，他们就说：“叫那些后娘仔去放吧！”地方同志、地方群众也都把这些主力叫做“司令部的人”了，说他们吃得比人好，小仗不打，大仗又不敢打，只保护几位大人物转来转去问要东西吃。因为人多，待遇又高，就要得特别多，人们怎会喜欢他呢？化南的群众是最好的，很高兴替部队做事，但自从他们的四团变成主力的时候，回到地方上，群众就不愿帮他们做事。因为种种条件“主力”是不能不分散在各区活动了，从化北回来后一、四团各分回原地，丁、沈两个都不敢再指挥他了，虽然这部队是他组织起来的，一个月前还是他的部下，此时他也不敢对他们发号施令，因为照规定，他们是没有权力来指挥“司令部的人”的。为了要驻在化南的四团配合打个仗，丁曾写信到遂溪来问过温，要求他的允许。我曾亲自听到有些地方同志向沈要求住在遂溪的一个团配合他们活动，沈说：“那是司令部的人，要问过二叔公才成；万一死个把人，他会把你骂死的，还是叫二团去吧，搞不下就算了”。这样所谓“主力”的干部也觉得苦闷了，因为他们和地方同志之间平空添了这一层隔膜。也因为这样，这些主力在地方上的活动，也就增加了一些无谓的困难。这样的建设主力，无疑是失败的，因为他们不是按发展的规律生长起来，而是被“宋人掘苗”式提拔起来的。仅仅三个月，一团由七百人缩小到三百余人，四团听说也人数不多了。绝大部分是逃了、病了的。在战斗中伤亡的只是约二十人。我曾经对温说：“连

日本投降前的太行山前方总司令部也没有我们这样威风呀，那时候他们也还没有建立野战军，只是把各旅团分配于各分区，要打仗时调集起来打，打完以后又分回去。而我们一下子就建立两个团的“野战军了！”我的话说得太讽刺了。

跟着这种建立“野战军”精神而来的，还有一套正规化。欧同志到那里约二十天后，就写了一个小册子，名曰《论革命军队的组织》，跟着以后，就陆续划分等级，生活待遇，统筹统支……什么一级科员，二级科员，这个科那个处，上头一天天大，下头一天天细了。他们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整编部队，这些整编工作是怎样进行的，我不清楚，但其结果我是听到了一些。他们到廉江一个多月后，我路经廉江，县委书记（三团政委）高佬黄偷对我叹气说：“丢那奶！这也说不好，那也说不好；你们到了那里，要粮食有人搞好了送来，要情报有人探好送来，要放哨有人给你们放，要打仗有人去打，那不就好了，硬要说不好，整呀，编呀，一个多月，我千二百人只剩下八百了！丢那奶！千二百不好，硬要是只剩八百才好？！”究竟那四百人是怎样“不翼而飞”的，我没有听说过，大概是跑了，因为我听欧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队伍，少个比多个还好。”大概他们最痛恨的是那些流氓、土匪成份。遂溪的情形我是比较清楚的，人是比原来少了三百了，一个时候少了四百。第一团是最好的例子，跟着司令部“正规化”了三个月，就不见了一半了。从化北回来后，缩编为两个营，原来是要全部集中整训的，后来因为我的反对，把第二营放出去活动，留第一营跟着司令部转来转去两个月，由百五十人缩到只剩八十个战斗兵了。天天谈话，天天计划，还是不能挽救这种危局，为什么呢？不但是病的跑的多，干部里面也不团结了，连教导员也消极请了假了。而第二营呢？他们出去以后，我写了个信给他们说：“你们放手发展啊！要生存就要发展，要部队巩固也要有新的发展。队员看到局面一天天大，群众起来翻了身，也就不想跑了。”这个营，在两个月里，增加了百余人，部队情绪很高，部队内政治工作也很活跃，经他们的手，建立了百余村的政权，在几十条村实行了减租减息。应该补充的是：第一营是由我们的老游击小组扩充而成的，老队员最多，党员也最多；第

二营大部队是由土匪、伪军改编的，党员很少。后来温又要我调第二营回来整训了，我对他说：“你不要管他们好了，难道你又要把他搞垮吗？”我真是有点生气了。

在遂、廉都萎缩的期间中，化州却例外的由千五百人发展至三千二百人，增加了一倍强。化南和化北过去是被隔断的，现在逐渐涵〔衔〕接起来了，吴川过去是很薄弱的，现已被我控制了三分之二了。茂南方面也因化州部队过去活动而加强了，不久以前他们还在那里打了一个乡公所，缴了三十多枝枪。化北平定江以北地区的部队也搞起来了。敌人对化、吴、廉边的压力始终是最大的，保十总队全团驻在他们那里，还加茂名、信宜的县兵，而且几次还增加过保九总队、九十二旅等部队去协助扫荡，战斗是最频繁的了。去年夏收以来，敌人积极向我们区抢粮，天天有战斗，为了抢粮，敌人大约死伤了百多人，抢了不足四百石，而我们的反抢敌粮却抢回来千余石。在化南，没有二百人敌人是不敢出来深入我区十里以上的。出来也常不敢走正路，要走田里，走坡地里，翻山越岭的跑。因为我们的地雷战已经相当普遍了，在今年八月的反抢粮斗争中，我们造了一千个地雷。化州分区的工作，是被温同志等认为错误最大最深的。美南同志曾厌恶地说：“自称为解放区最多的就是他们！”大家都认为高佬唐是我的第一大徒弟，而接替唐的工作的丁则是高佬唐第二。不容否认，这几个月来化州的工作是违反温等的意志而行的，在军事上也是如此。因为温等还没有到过那里检查工作，而他们所发下去的那个所谓检查半年工作大纲，化州的主要干部十余人签了名提出了书面意见，没有一条是同意他们的。化州在军事上最大的成就是他们普遍建立了民兵，在三千二百人中，属于四团、十团、独一团的化北大队仅千二人，而属于区乡队及民兵的约二千人。今年三月，打下了化南的局面后，我们就提出这样的发展原则“主要是搞民兵、地方区乡队，这些部队为数要比县主力还大，要做到村村有武装组织（村武装委员会、村队），村村站岗放哨，村村做情报，一定要群众起来武装保卫自己，自己救自己，让农民有了枪，他们就敢去欺负地主，就能彻底进行清算斗争，保证减租减息，而且为他们这些利益而斗争到底了。”根据这种方针，我

他们就普遍进行组织农军。农军标明了是农民的，他有明显的阶级性，在执行清算斗争中，他们也就是清算队，对敌作战中就是民兵，一入化、吴、廉边，就可以看到村村有哨岗，群众被编组起来担任各种后方勤务（支差制度）。情报是灵通的，一有敌情，村村通报。农军的作战，主要是消耗敌人而不是打死灭战，不因为他们缴获不到东西而批评责备他，相反，我们是鼓励他们逢敌必打的。在五月敌我扫荡中，还下过这样的命令——敌人经过而不打者杀，敌住下来当晚不去扰敌者杀。因此敌人一出据点几里就要挨打，走一、二十里经常要挨几次打，有时则踏着地雷。一次，良 敌七、八十人出来五里抢粮，被我农军打死伤八个，只在晒场子里抢去了四斗谷，抬着死尸回去了。一次驻新安之敌百二十人出来八里抢粮，被我附近农军闻讯赶去打，敌仓惶逃跑，只给割去两亩田的禾，掘了一亩田的笋。敌人是没有粮食了，乡仓谷早给我们分掉了，因此他不抢就没有得吃。就是这种情形，也可见那里农民的气概与敌人的窘状。因此，在这区域里，敌力虽大，地势虽平，而我们的环境，比其他的地区都要安定。丁在我区中心一个村子里住了个多月没有搬过家，第十团曾集中五百人在一起练兵一个多月，这种情形，在遂、廉等地是不可能的。司令部在廉、遂等地转来转去，多么奔波啊！遂、廉等地是差不多没有民兵组织的，因为在那里没有清算斗争，没有减租减息。只是最近重新提出这种阶级斗争以后，才又搞起一点。遂东、遂西北、遂南也都组织了民兵了，全县民兵大约还未满二百人。但有了民兵，总也就不同了。廉南有两个乡是早期就进行了减租减息的，这地区没有民兵，但有村队（十数村合组，约等于保队，脱离生产的），也很起作用，这区域离廉江城最远，但直至现在还是廉江最“巩固”的地区，林、温等在廉江时，大部分时间是驻在这里。目前化州的农军是脱离生产的，其供给由政府负担一半，村自筹一半。遂溪有一部分也是完全脱离生产的。我们的经验，有了民兵，群众的胆子便很大，什么事也敢做出来了，而地主也纷纷低头了，因为他们的枪到农民手里了。在化、吴、廉边，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地主能回到村子里搞得起他们的反动堡垒，所有的地主炮楼也都给我们烧光了。直至现在，他们的乡兵也还不敢分散

住，在新安住了三个流亡乡公所及其乡队，在良也住了三个。农民对于我们的主力部队，虽然看到你人多，有机枪有“小炮”，但他们说：“这些人半天兜的，他们会走的。”只有当他们看到他们当地人带的区乡队及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民兵，他们才更有自信。在建立农军的号召下，化、吴、廉边的农民在一个月里搜集了七百枝枪，有些枪是他们自己的，有些是他们知道地主、富农藏起来的，有些人说：

“如果这枪拿出来是给我们农军用的我就说出来，如果又编到你们主力去的我就不讲了。”当群众起来造了反以后，他们是非常关心到武装他们自己的。我们的经验，大概用农军这样的名义，更为一般农民欢迎。

化州分区不但在发展数目、民兵战争这些方面有成绩，而且在部队的政治工作方面也比其他各地做得更好。第十团组织起来两个月，没有一个逃兵。入桂之行，一团逃了二百，四团只逃了六个，而这六个里面有四个是刚由三团编过来的。我在第一次北征时，带了一团、四团，开始搞清算斗争，减租减息，组织政权，农会，把这当作部队的工作任务，并且曾规定如我们住的村子未有村政权、农会等组织，未有进行过清算斗争，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天以上不把它搞起来的，部队首长要受处罚。这种作风，一团以后是消失了，而四团却一直保存着。入桂到了廉西，住在新地区也没有谁叫他们做，他们在第二天就把驻地几条村的村政府、农会搞起来了，开了群众大会，倒退了些租息，群众在大会上讲话有讲得流起泪来，有八个人被动员参加了部队。介绍给当地区队，去化北时，半路上只歇了一宿，他们就在驻地发动了清算，组织了政权和农会。因为这种作用，化州部队的一般队员阶级意识都是较为明显的，他们有一些士兵到了遂溪坳地，很惊奇的问：“怎么你们这里还没有减租减息啊？我们那边……”他跟着就给你讲一套他们如何斗争地主的故事。我见过几个都是这样的。

同样是个第一团，为什么第一次北征只跑了几个，第二次却跑了二百呢？第一次北征时，这队伍是刚由分散潜伏集中起来的，他们有些是老队员或受我领导的群众，有些是土匪、伪军，长期给国民党迫得走头无路，带着很简单的愤恨，只想和国民党拼命，刚好我们又打

死了铁胆，提出了“开出去，那里有国民党就到那里找他打”。一路之上，也真的今天一个乡公所，明天另一个地打了下去，他们都高兴。但出去一个月，在化北、化南都打开了局面，有了政府，开仓分粮，清算减租息，这些工作他们都一路做着的。因此全军便很自然的发出这样的要求：“回遂溪、海康搞呀，不能只帮助人家打天下，自己家里不管呀？”他们之中，很多人还是秘密出来的，离家的時候，他们村子里还是国民党的保甲长在那里作威作福，他们欠下地主的租债没有减，冤仇没有报，是难怪他们这样想的。回家两个月，起初是听说不能象化州那样搞了，后来虽然勉强让把政府的布告贴了出来，但清算成罪，自称解放区犯讳，地主依然盘在农民头上照旧吸血，自己家裏的人无衣无食；忽然又叫去广西了，传说是去安南了，这样而只跑了二百，还算少呢。原由符春茂部伪军改编的百余人，第一次北征时一个也没有跑，第二次我早就说他们会大批的跑的，而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只是想报私仇，那里是为了革命呢？”“我们必须改造他们！”甚至说：“他们只是对你这个司令官好呀，那里是对党好呢？”我还能再说什么话呢？他们还确实只是对我个人信服而对党的认识还是很浅薄的，但那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是什么人物出身，跟着我们有了多少时候啊！我曾比较用“手段”一些来拢络他们，譬如有时候送几瓶酒，当面给夸奖几句等等，因此他们跟你打了几个月仗，很听命令，打得也顶勇敢，立的功最多，牺牲的也最多。有一个连长牺牲的时候说：“我为革命的任务完成”了，可惜的是临死未能再见一见团长和司令官的面！”这个人是很好的，他临死只喊打倒国民党，没有讲半句牵挂他自己家里的事。当我把这事情讲出来的时候，温却给我回了上那一句话，你说他懂得半点士兵心理吗？懂得对这些人的政治工作应该怎样做法吗？

空喊加强政治教育，加强政治工作，那什么“建立党军的三个原则”，我听得忘记了。可是究竟做了些什么成绩出来呢？做过了那一些有实际意义的政治工作呢？温同志是政治委员，几个月来，他有和任何一个指导员个别谈过话，了解与布置连队的政治工作吗？和士兵那就更不必说了。出版科除了翻印香港来的小册子、新华社电讯之外，

有印过一篇关于如何做我们目前部队的政治工作的文章吗？有过任何一个文件讲到我们的连队的政治工作的吗？对于几个月来“主力团”和遂、廉两地的大量减员，他们有任何一个有效的“巩固”的办法吗？而这些，在他们未来之前，我们是做了一些的。最少，我们那时候还出过一些给士兵看的用地方话写的小册子。

不过，虽然如此，今天我们也还是有了不容易被消灭的基础的，我们现在已不是几十几百人而是几千人，下面的干部也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了；我们也已经摸出一条道路——农民游击战争。只要我们领导上不再犯错误，不要搞什么别的战争而搞真正的“农民的”游击战争，那么，凭着现在的基础，我们可能发展得比我们意料的还大的。

补充说明：他们说我只收编土匪、伪军而不注意改造他们，是没有根据的，以受我收编的符春茂部为例吧，这部队受编最早，但从受编到温、林来时也不过两个多月，他们来了以后，这政治工作是他们来做还是我做呢？我曾经要求温做一元化，但把部队的指挥和政治工作给我管，温则多化些工夫去管地方党政及其他活动，没有得到同意，因此我在他们来了以后实际只是个单纯的军事指挥员了。我曾经写一篇如何做连队政治工作的文件，已经写了一部分，是下面的干部要求我写的，也因温、林下来，我便没有写下去了，这当然我也是不好的，这是意气用事，我应该反省的。但当时我是无权来继续进行我预定的“改造”计划的，这也是当然不容否认的事实。一个原是伪军大队长接受我收编的营长病了，我原来打算写了一封慰问信给他并送他五万块钱，因为温那一句“他们只是对你这个司令官好呀！”的话，我就没有寄去，这个人以后病好了，便不愿归队，逐渐消极了。原来他是对我个人很好，要求跟我做卫兵的。

(四) 清算斗争、减租减息

不知是林或温，起草个讨论“七·七宣言”提纲，他叫秘书抄印，那秘书发现里面有“争取地主参加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这句话，很奇怪，拿来问我，我说“这不通的，你拿去告诉他，涂掉吧！”那秘书拿去告诉温，温把它改为中小地主，印发下去了。这文件在化州的同

志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反感，他们反对这种提法，说地主阶级是我们目前的革命对象，我们怎能说争取他参加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呢！他们不特反对争取地主，而且写了一个意见书，要求立即分田，这意见书由化州党军政领导干部全体十余人签了名，送给了地委。此时我在遂溪养病，他们也另抄一份送了给我。这是今年九月间的事。九月二十日温、林到了化州，二十五日阿丁写了一封信给我，很简单的几个字，说“此间现有重大问题，几日不能解决，整个干部徬徨苦闷，不知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要我无论如何都去，不能行路就雇轿去。他没有写明是什么事，我猜大概是为了分田的事他们挨了骂了（大概也涉及温他们发的那个半年工作检讨大纲的，因为化州的同志看了他们列举我和他们之间的分歧以后，没有一条是同意他们的。他们讨论的纪录，也抄了起来，连同上述对“七·七宣言”提纲讨论的结论一并送给地委的。同样地也另抄了一份给我）。这事情我不清楚他们后来有没有解决，因为敌人扫荡，温等又退回廉江去了。双十土地政策发表以后，丁又给了我一信，说他们接到了这个文件，党内外都欢天喜地了。我临离湛江前一刻钟，又接到雷州分区中心县委书记来信，要求我立即回去，他和沈彬（专员，海康县书）、李民（一团政委）、金克平（一团团长）在等我。他们要求清算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大约他们也收到土地法大纲了。

我们的分歧是什么呢？实质上就在争取地主还是征服地主这上面。

旧历新年我和沈、唐在湛江商量起义计划时，我们是三番四复的研究过对地主的政策的。我们决定“征服地主”“舍得不要地主，然后取得农民”。“只问农民喜欢不喜欢，不管地主喜欢不喜欢。农民都喜欢我们，我们就有行了，地主都喜欢我们，那就糟了！”“要搞到农民称王称霸，地主垂头丧气。”“农民皇帝，不准地主话事。”

“要让地主看到我们的人就心惊胆战，但嘴里不敢不奉承。要做到他们敢怒而不敢言。那一个地方做到地主敢怒而不敢言，那个地方的工作就做好了。”“什么开明士绅呢？他会自动减租减息吗？没有一个地主自动减租减息的。地主被征服了以后，就只好来做开明士绅了”。

“一定要把地主打在地下再踏上一只脚”。“用尽一切办法，千方百

计搵地主笨斗”。“对地主，我们有四大手段，就是吓、叱、拆、打”。

“对地主，一定要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些都是我们当时讲到的话，可见我们对地主和农民的态度。

我们也研究过分田的问题，当时曾假定把分田和减租减息作个比较——分田，农民的积极性会提高多少？会因这种积极性的提高而增加多少力量？地主会因我们分田而积极反对我们到怎样的程度？会增加多少阻力？研究中，我们自觉材料不够，曾叫沈英同志回遂溪去，立即亲自找下属的同志及群众调查。他就近找了遂东区的一个地方作典型来查，估计该地的地主共有十个，在减租减息中积极反对我们的两个，甚不满意但不敢出头的四个，微有不满，但也还同情我们其他方面许多措置的四个（这后一种人，有些是主要的经济来源不是靠地租而是兼营商业的，有些是对当权的另一些人仇，对国民党的抽丁、抽税、贪污等不满的）。假如我们便分田，这后一种人完全没有了，积极反对我们的变为四个，而甚为不满但不敢出头的占六个。这只是很粗糙的找了些人谈了以后的估计，当然未必很正确的。但我们觉得这也还可以作一个根据，因为暂不分田，是可以减少些阻力的，而农民则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不致因一下子为太大的阻力所阻，就更容易搞得起来。我们又研究，真正做到减租减息，农民的动员也还可以相当广深的了，这样，主地方面阻力少些，而农民方面也还能保证普遍动员得起来，我们便最后决定：目前还不是分田的时候。但我们还是准备将来分的。我们曾研究过：“难道李先念他们在陕南也不分田吗？初时我们以为李部有十二万人。到我们发展到有抗日时期的东江纵队的规模也还不可以分田吗？”因此，我们还是拿“北方已经分田了，我们这里将来也要分的”这种话来鼓动农民的，化州有些农会还秘密自称为分田会。不过，最初两个月，分头招兵买马的时候，我们还有意暂时连减租减息也未搞。三月初，一、三、四团会师以后，用县政府名义出了布告，才乒乒兵兵的搞起来。歧岭寨大胜后，我带了一、四两团在廉东的犁壁塘村，开始第一次清算，斗了一个恶霸，倒扣租息，当众烧了些老契，划了些田（他过去用诈陷手段搞来的田，迫他吐返出来），解放婢女，还迫这位“绅士”当众悔过。跟着当场就组

组织了村农会和村政府委员会。这些事，我们之中，是谁也没有经验的，我们说这是开头，大家都要来学，除了两个团的政工人员之外，还调集了许多个地方干部来参加。就是这样，把这个锣儿打响起来了。我离化南回遂溪之前，又召集过干部会议，强调把减租减息普遍搞，保证村村做到。四月以后，敌集中两个保安团扫荡化南，化南的部队和地方干部，在丁同志的领导下，组织了很多个清算队（当时把全部留在化南的部队都分散了，一二十个、十个八个一组），到处搞清算。这样敌人扫荡了个多月，我们的清算工作也在化、吴、廉边普遍起来），村村建立了农会、农军、村政府，群众并没因敌人的扫荡悲观失望，反而到处打起来了。这个期间内，化、吴、廉边这小小地方里，共解放了四百多个婢女，可见清算工作是做得很普遍的。为什么我们不叫减租减息队而叫清算队呢？因为清算比减租减息包括得更广的，换句话说找地主算帐，不但算私帐，还算公帐，祠堂数目，人命官司，无所不清，无所不算。我们提出了“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口号。因此，清算队一到，便如县长下乡，老百姓都来告状。

回到遂溪，这种运动是跟着“平原地区不搞政权”而被干涉停止下来了。林、钱来了以后，更为严重，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清算成罪了。林说：“清算，是华北解放区才实行的，我们的政策，只是减租减息。我们讲清算，就会使人家怀疑——啊！你们在华南也要分田地了？！”我说：“这名词在化北，是抗日时期就用到现在的，难道那时候华北也是分土地了吗？我们现在还没有分田，是事实，但将来也不分吗？半个中国已经在分着了，难道还能掩饰说我们这种政策将来是不施用于华南的吗？人家会相信吗？”他又说：“香港那边听说你们要分田了，你写信问土地政策怎样。”我说：“我是想分的，为什么不想呢？”这样辩着，林就要我报告我们清算斗争的真相，要我举例子，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团刚从化州回来几天，派五个人去里岸村征粮，里岸村的一个地主，平日原是国民党特务，过去几次报信捉过我们，这次又假意招待我们派去的五个人在他家煮糖粥吃，他却叫一个做过汉奸土匪的同村人去带国民党兵来，把屋子围住，打死我们三个人，其他两个也受了伤，受伤的人回来报告，我们当即开了两

个连去，把那报信的捉起来枪决了，那地主已逃走，我们便把他家财抄没，田地也没收了，宣布今天耕他的田的不用交租，以后准备把这些田再具体分给农民（另外还说了一个在化北的例子，那也是没收了土地的。这是我们在那里的清算运动中仅有的两个没收土地的例子，是最左的两个例子）。林对于这件事，认为：一、那个报信的人可以不杀，应该教育后释放，不要让这些人觉得只要做了坏事就永远也只有死路一条，因而也只好坚决反对我们到底。跟着他就解释了许多宽大政策的意义之类。经过争辩后，他后来改变了说法，说杀也是可以的，但要宣布他是汉奸，这是他最大的罪状。二、对于那个地主，其浮财可以没收，收充军用，其土地则不能没收。这样，我们当然又争起来了。当时我和遂溪的同志研究过坭地的情形，这坭地，土地是比较集中的，其中最大的两条村，城里村四百人中，雇农占九十余人，调村，九百人中，雇农占百五十余人，有些村子，则雇农占全村人口一半以上，这些雇农，贫无立锥，而坭地却又无数荒地。我们是有了雇农工会、工卫队，而且是颇起作用的，我们曾想，如果把田分给他们，他们打到死也打呀！沈汉英同志曾说：“不让多分，分一点也好，只要有些田来分给他们，他们就不同了”。在这次谈话里，我也把这种意见向林等提出来了。我们要求把官地、公荒地及个别反动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这些雇农。林同志没有允许的，我问：“假如铁胆有土地在坭地，就在我们这个村子外边，由我们的同志或群众耕着，我们是不是也规规矩矩，只减二成五，其余的每年照数送到遂溪城给他呢？”林听了，突然从床上站起来，扬着手，大声说：“我肯定的说，铁胆的土地是不分的，这是已经决定了的政策，错了不由你们负责。因为我们主要的是反对四大家族，铁胆虽然反动，和四大家族是有区别的。不但是铁胆，就是邓龙光这些人的土地也是不能分的，我们要争取这些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四大家族有矛盾……”我问：“遂溪的四大家族是谁呢？蒋介石在这里没有亲戚，孔祥熙在这里没有生意。照你讲，我们打死铁胆是错了？”林说：“在战场上打死又是一回事，如果捉起来，是不同的。”我说：“捉起来也要杀，拿去给人民公审，他做下了多少罪恶，和多少人民结上直接的深仇大恨啊！如果他去华

北打仗，捉起来是罢放了的，在这里，你能放他吗？如果捉起铁胆来也不杀，这些兵你看你还能带下去不？群众还相信你是革命的不？”我们争到面红耳赤了。从会场上退了出来，沈汉英同志说：“这简直是蛮不讲理的，怎能把问题弄清楚呢？这些话，最好叫他去部队里，去雇农工会、农会里说一说吧，人家会打他一顿的。”

当然，他们也还不是不准减租减息的，他们也曾叫沈等找寻适当的办法来减租减息。但是，租是已经在去年就交了的，今年的还没有倒，要像化州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硬去地主家里盘回来，地主没有谷就拿他浮财，没有浮财就划他的田来折算，这又叫做过左，违反争取地主参加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原则了。沈汉英同志叹气说：“还是叫他们干脆地说吧？如果是要农民的，那就让地主难过一点也算了吧！老是替地主打算盘，难道他就饿死了？如果是要地主的，那末就把部队遣散的遣散，带走的带走吧，养几千兵，那里来的饭吃呢？”在遂溪个多月，除了城里、调村两村工会增加了一点工资，减了几担花生花（高利贷之一种）外，没有给群众任何东西，却天天在那里警告“爱护群众的利益，第一步而且最主要的是避免他们受敌人的摧残”。说：“我们给了群众东西，他们是否可能接受呢？如果因为我们给了他们东西，敌人来扫荡，他们不但失了这得来的，而且还失了那本来是他自己的，那就是我们累倒他。”“不要累倒群众啊！”在这种警告下，谁敢给群众什么呢？我曾经说：“天天怕累倒群众，试问我们曾给了他们什么呢？如果他们老是这样在地主、富农的盘剥下，所谓他们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呢？尤其是这占坭地人口百分之二十的雇农，他们自己除了一条光身以外，还有什么呢？老婆也没有一个，房子也没有一间。他们损失些什么呢？”显然，他们是并没有懂得什么是群众的。在争论中，沈汉英同志就问过“什么是群众呢？”我以为我们的群众是不包括地主的。”这个问题，自然又被那一套“我们主要的是反对四大家族，要利用一切矛盾，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越广泛越好，我们目前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是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广阔的”等等似是而非的话支吾开去了。

化州在此时的反扫荡战中，是以普遍深入作清算斗争来粉碎敌人

收复失地的企图，这种做法，正如上面所述，获得了极大的成就。而遂溪在这次的反扫荡战争中做了些什么呢？在林、温、钱的领导下，开了三天县委会议，据说林、温、钱的报告发言，都是反左倾路线的，要求全体同志团结在区党委的路线下前进云云。究竟是否如此，我没有参加，不得而知，但其结果是看到的，会议刚结束，各个干部奉命到各村去开紧急动员大会，动员群众搬家藏东西，以免“群众受损失”了。于是到处发生了谣言，说国民党两个师到了廉江了，三千兵到了那里，六千兵到那里，五十车兵到了那里，风声鹤唳，都说共产党又要撤退不打了，调村一个地主公开对人说，“从前我看得起共产党，现在我一点也看不起他们了。”林、温等在敌扫荡第一天率了第一团第一营及学生连、警卫连去了廉江，我率第二营回到坭地中心最大的村子调村，全村不见一个人，连平日最积极的工人自卫队（几日前他们还捉了七个特务）也散了，乡政府的房子堆着十几枝枪，也不见一个人；两个月前敌人也扫荡过这村子，杀了四个人，可是那时的老百姓完全不是这样的呀，那次敌人兵力比这次还大得多，有六百人进入这村子住了一天，这次只有一百六十多个人，而且还给我这营人打得他不敢入这村子，只在村口人家门前打烂了两只锅头就仓惶走了的呀。我站在那静悄悄的村子里，叫人找乡长不到，买东西也买不到，回说老百姓通通走光了，心里真是有点凄凉，回头对沈汉英同志说：“几个月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基础，敌人没有打得垮，我们自己一个晚上就把它搞垮先了！”这次扫荡，群众的损失是严重的，这还不是说敌人抢去了好多——敌人并没有敢在坭地住了下来，而是一直到了以后几个月，我们还没有开始减租减息，政权垮了，农会、工会统统垮了。

入桂之行，也有好处，因为温等离开了未开始减租减息的遂溪，到了和化州同时进行了减租减息的廉南。在廉江这唯一的小小的一块地方（仅有两个乡），他们住了半个月，甚至住在离廉江城十几里的地方也还很安全，因为有村队替他们放哨到城边，敌人一出就打响起来了。这地区的群众情绪不同的，送猪送鸡送酒，还有慰问信，表示了那种“变了世界”以后的群众情绪，他们也经过了属于化州分区的廉东南，在那里看到的情况也是不同的。尤其是部队从化北经化南回

来以后，部队里上至干部下至队员，都交口称誉说化南工作做得最好，是模范，这就使温同志也不能不在一团的干部会议上说：“化南怎样做你们就怎样做吧！”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清算的名词也允许沿用下来了。因此回到遂溪以后，就组织了清算工作队，开始积极来做这种工作。虽然由于温此时在领导作风上的包办官僚，把干部抓得紧紧的，还没有做到让下级同志敢于发挥其创造性与积极性，做起来还生怕二叔公反对，因而工作的进行仍是很慢，但总也搞起来了，局面完全不同了。城里村刚清算了第二天就给敌人占了，我在路上碰到了一个该村的农民带了几升米逃难，他问我们：“没有吃饭吧？这几升米拿去吃吧，饿着肚子是打不得仗的。”沈汉英同志说，从来也没有见过坭地的农民好到这样的。这农民在昨晚的清算会中从地主家退回了七十斤糖，这次敌人占了村子，他那些糖并没有能够搬出来。沈问他怎么样，他说：“由他吧，看他国民党的日子长还是我们共产党的日子长。”我住在沙螺圩村，那村子有一个农民去参加了清算另一条村子的地主，退回了百几斤糖，他高兴极了，回到村子就发动本村的农民组织农会。他们在那一村的地主家的客厅开会，吵得很大声，我问为的是些什么，清算工作队的同志回说：“他们是在议定章程，说那个农民私通地主，明减暗不敢[减]，就罚他咧。”要说明的，这种罚，就是几个月来，我们是因此被林等批评，说是“强迫”，违反群众路线的。第一次清算是在迈旺村开始的，群众跳起来指到地主的脸上去骂，地主给吓得面都青了。调罗湾村有一个人，过去给这家地主做了三年长工，这次来参加清算，分得一头牛，吆喝着回去，村里的人看到说：“那年我如果做了他的长工，这回也应分得一头牛呢。”敌人在这次扫荡中，用三个中队保安队的兵力，在城里、调村两村住了两个月，恢复了他的乡政府，可是只敢出动过一次，抢了一条村子的东西；政令不出据点外。而我们的清算工作队，两个月里没有停止过工作，在敌人的据点以外的其他村子里转来转去，民兵也组织起来了。遂南区一传达了清算，三天内就退回八百石谷子。遂东区有一个同志，半个月里发动了十几条村子的清算，退回四百石谷子。遂西北、遂西、遂西南也都搞起来了。

(五) 农会、政权

我在化、廉委出了县长以后，就写信叫遂溪搞政权。已经发了通知，印信、布告、人员都准备了，刚好温同志回到湛市，便立刻叫沈停止进行，说“平原地区只能搞两面政权，不能搞一面政权。”这件事给遂干部情绪以很大的打击，以后虽然又让搞了，但许久也提不起劲。旧历五月，化州出的布告，里面有打倒蒋介石政府，建立人民的政府的话，这布告已发下去，有些地方已贴出来了，林、温等知道了，立刻叫去追了回来。林说：“中央也还没有提打倒蒋介石政府，我们就提了，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不能提的。目前只能提建立联合政府。因为这战争有两个前途：一个是一直打下去，二是讲和，实现政协路线，建立联合政府。建立联合政府，对于蒋介石政府就只是改组而不是打倒。将来我们还是可能和蒋介石共同组织联合政府的，虽然那也还是过度性质的，但如果那时真的又这样讲和了，你们怎样办呢？而且就一直打下去，也只是打倒蒋介石而不是打倒他的政府，因为蒋介石的政府和蒋介石个人是不同的，和四大家族是不同的，他里面有很多派别，如冯玉祥等。也还有许多人不是死心塌地替蒋介石服务的，我们要争取这些人，因此只能提打倒蒋介石，不能提打倒蒋介石政府。因为提打倒蒋介石政府，就会使一切在蒋介石政府里做事的人都认为连他们通通都要打倒，他们就更坚决反对我们的。有些事情我们是做了不说的，譬如我们实际可以去打了他的乡公所，建立我们的乡公所，但我们不提打倒蒋介石政府的口号，这是策略运用……”我不想先来辩他这种理论是否正确，我先举出把这布追回后下面干部的反映，我曾听到第四团付团长黄飞同志对人说：“丢那妈，搞乜鬼啊！人家已经占了延安，连毛泽〔东〕也通缉了，我们连叫句打倒蒋介石政府也不准。”要补充说的是林等追回这布告的时候，约是新历七月，已经接到了中央的“七·一宣言”、“七·七口号”以后。

“打倒卖国专制的蒋介石政府，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口号，是在今年旧历三月初编成第一团的时候开始喊的，那时还只在部队里喊，没有出布告，同时我们还喊了些打死梁传楷、打死李养锋（遂溪

警察局长，铁胆的死党）、打倒陈宏揆（海康县长）、打死何麟书（海康最反动的警察队长，杀人最多，和符春茂部仇恨最深）等口号。进军化、廉，委出县长以后，出的布告就写着“本府为本县唯一代表人民的政权机关，”“在本县内之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切党军政组织，俱是反革命反人民的组织，本府本团决坚决消灭之。”我们为什么这样呢？一方面固然是根据已经全面分裂的全国形势，虽然我们还没有在中央文件上看到打倒蒋介石政府这样的字眼，但我当时曾经说，“我不相信在华北、东北、华中解放区里也不用这样的字眼。”不过，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武装起义，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了。此时我们对我们的面前的这些国民党的县、区、乡、保政府怎么办呢？是打倒它还是只如林同志所说“只反对其卖国独裁的政策而不是打倒其政府，”以便留有余地，准备将来和他们组织××县××区××乡××保的联合政府呢？显然的，后面这一种态度是不对的，因为它足以模糊了我们的斗争，堕丧我们的意气，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梦想，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失败情绪。我曾经说：“即使是将来还有和蒋介石合作的可能吧，难道在我们这里喊出一句打倒蒋介石政府就足以妨碍那将来不知何年何日的国共谈判了吗，过去内战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口号喊了多少啊。”即使中央还没有提这个口号，我们这里还是可以这样提的。尤其是在今年七月这样的时间，化州这样的地点，提出这样的口号，我实不明白何以要看得如此严重，要火这派人去把布告追了回来。群众没有我们这样教条的，他们看了这个口号，就知道这是起来毁掉骑在他们背上的这些小蒋介石的时候了，而我们在目前的斗争中，最需要的正是这个。用另一句话说，这个口号就是“起来，毁掉山底皇帝（山底乡的反动头子）的乡公所吧！”之类的具体口号的一般化，这个口号是很有鼓动性的，是很有力量的，因为它为群众所非常欢迎，而且和我们所做的工作也非常吻合。没有那个傻子会因为这个口号便是等于把国民党的乡、保、甲长一切公务员官兵通通杀光的，因为不特群众没有这样蠢，我们也没有这样蠢，就是国民党里面的人也没有这样蠢，如果他们这样蠢，我们能在三天之内把化南保队的枪通通缴光吗？我们能捉到那么多的俘虏，缴到那

么多的枪吗？我们在同一个报告里不是另有一条讲到欢迎蒋军及其各种机关各级公务人员起义反正，弃暗投明，放下武器的话吗？这里我并不是说我们必要在中央未提打倒蒋介石政府而我们就必提，我自己起草的几张布告都是有意避免这个字眼的，我所不同意的是林等这种追回布告的浇冷水的措置及他们这种追回布告的思想上的右倾观点。

平原地区能否搞政权，这问题现在已经不辩自明了，因为已经搞了起来，到现在没有垮，而且还在发展。不过，就是我们在未搞之先，也没有看到它会站得这样稳的；我们曾经准备它垮了若干地区，垮若干回，我们只是相信它必能站得住，垮不光，而且垮了的也必能恢复吧了。计划举事时，我就说过：“政权的斗争，大概是这样的，目前敌人还没有防备，我们一下子起来，可能搞垮了它许多乡保公所，建立了我们的乡村政府；但经过些时日，敌人必再组织起力量向我进攻，恢复其政权；这样有些地方，我们可能全乡又散了，有些可能散了一部分，给敌人钉下了据点，但敌人兵力不足，不能每个村子都钉下了据点，一个乡最多只能养几十个乡兵，能够保得住乡公所，但他们是很难保得住保公所的，因为要一个保都有几十个保兵是不可能的。敌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不能打游击，过去他是可以发一纸公文就抽兵抽粮的，在我们的游击战争已普遍发展起来，尤其有了民兵以后，敌人便不能那样写意，他的公文是不生效了，要抽个丁，要抽个钱，也要派几十个兵出来，一弄不好，就要大败而归，或根本没有得回来。这样，敌人就只好守着据点，轻易不敢出来，一个乡几十条村，敌人只控制一两条而我们却可以控制其他，或敌人控制一半，我们控制一半。在这一半，敌人只能时来时去，他也不敢常来，而我们却是常来的；一个月三十日，他来一两天，就在这一两天，也是白天来了，晚上回去的。这样，这村子还有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我们统治的，你说这村子是我们的还是敌人的呢？我们可以有游击乡村长，敌人却是不能有的，我们的乡长一个人自己带条枪就可以这个村那个村去办公，敌人的乡政人员要这样做是不成的，农民用锄头也砍死他啊！这样两个政权对峙着长期的磨，到后来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有些敌人就是这样磨到熬不住垮了的，而一有可乘之机，我们还可以集中兵力来打，又

把他吃掉。连续给吃掉过几次的，自然就难再搞起来了，只好全部让我们了。对那些一次也还没有吃掉的，也可以这样来蚕食他，和他分天下，以后就吞掉他。”我曾经这样问：“国民党的一个乡公所被我搞垮一次，还能再起第二次吗？”沈汉英同志说：“很难，不先来问过我们，谁敢去做保长呢？他不要命？”“一个乡公所被磨垮两次还能再起得成吗？”沈说：“很难，难得枪，也极难招人了。”高佬唐同志说：“做乡长的，几乎全部是地主，有些是大地主，太大的地主也没有，他们只做太上皇，或出外做更大的官。做保长的，很少是地主，大多数是富农，有些则甚至是贫农。杀了个乡长，可能还有人出来做，再杀一次，第三个就难找了，一个乡也不能有那么多不怕死的反动地主，凡是地主，多是最怕死的。至于保，搞垮他一次，就很难再搞起来了，没枪没炮，谁不怕呀？找中农、贫农来当，谁替他当？富农也不那么积极吧？即使能看到几条枪守住个炮楼，他能不出来做百姓（耕田）？能不出来趁圩？不打死他，拉了他一只牛他也哭几天几夜了。只要说搞，几天之内，定可以把化南全部保队的枪缴光。这以后，在化南，保险没有人敢做保长。”我们是经过这样的研究才着手搞政权的。唐的话是合乎实际的，以后化南保队的枪是在几天内就给我们缴光了，直到现在，敌人还没有能够在他的据点外建立任何一个保政权，新安圩住了三个流亡乡公所，良圩也住了三个。关于这些话，以后我也和温他们说过的，尤其是和他争论平原地区究竟能不能搞一面政权的时候。

我们也研究过，究竟用什么名义呢？这里的群众是有政治经验的，他们见过共产党在这地方起过，也见过共产党在这地区倒过。这次见我们又集结队伍了，他们说：“你们要作反就真的作反，不要像以前那样搞一下就散了。”群众对于改朝换代的要求是迫切的，而且是有相当认识的，他们制造了“民国有三十六、大小官员一锅熟”的谣言，这句话可以看出他们对国民党统治的愤恨与斗争意志。总之，他们迫切要求着换一个政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估计，拿出政府的名义会比之用其他的名义更好些，因为这种形式非常明显地表示了我和蒋介石政府势不两立，足以表我们作反到底的决心，而且这个政府的名

义，其本身就是一个口号，一说是委出县长、区长、乡长了，群众就会懂得是要起来彻底毁掉国民党的那一套政治机构了。过去南路解放军力量和声势都是相当大了的，一个时期也有了相当安定的地盘，但他们那时候没有搞政权，初期有些地区还奉国民党的正朔，没有宣布废除群众最愤恨的国民党那一套政权机构，而只是用联防区之类的令人看了不明不白的名义；村政权的弃旧建新就更没有。这样，群众无疑的是把他看成假作反的。我们也研究过，古时候的人作反，当他们还只是鼠窃狗偷，拦路剪径的时候，叫作什么名字是不多大讲究的，但当他们由小股成入股占山立寨攻城夺池的时候，总是自称大王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名字一出，就表示他们要和那个坐在京城里的正统皇帝分庭抗礼，要夺他的天下了。经过这样的反复研究，我们才最后确定用人民解放政府的名义。群众对我们这种做法的反映怎样呢？化县县长就职布告出了之后，有一个地方干部写信给高佬唐说“我们这里的群众，听说我们的县长委出了，欢喜若狂。”又说：“你快点送布告来这里贴吧！”像这样的反映，不只一个地方。在化北，布告贴出了以后，三、四十里外也有群众来看布告，中圩里的布告前面总有一堆人在围着看，他们说：“这次是实在的了，连县长也委出来了。”化县副县长在中圩住了第二天，就有人来打官司，化南的群众也纷纷找县长打官司，群众的谈话，都讲我们的乡长、我们的区长了，见了面都叫区长、乡长，群众是欢迎政府这个东西的。当然，也有些人是反对搞政府的，那是以前在农村里比较有“地位”的人，如在遂溪的城里村，那些富农们就说：“遂城还有国民党兵呢，你们就在我们这村子搞县政府了。”但我们问过占该村人口四分之一的雇农们，他们却说：“好，发枪给我们放哨看路，国民贼来就打他。”我们那里的群众，是把国民党叫做国民贼的，在化、吴、廉边尤其如此，他们不说兵来的，而是说贼来了的。群众把国民党军不叫做兵而叫做贼，这表示了旧的正统观念的完全破坏了，群众是不承认国民党的政府是政府的了。

怎样搞呢？我们有一句话，叫作“招牌挂得大，工作做得细，”挂大招牌为的是张皇声势，发号施令。我们是先委县长后委区长的，

第一个县长出的布告这样写着：“案奉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委令解字第五十一号内开，兹委罗培畴为廉县县长。”所谓粤桂边区政府就是这样出现的（我们还没有用边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出过布告或发过其他任何文件），不写一号而写五十一号，也是这种故弄玄虚之一。这样做是为的长自己威风，灭敌人意气，是强调了一种唯我独尊，一切服从我的精神，即是说，我们想在党内党外都造成一种取天下的气概。这是曾经有起过些作用的，起义之初，国民党许多下层乡保甲长都摸不清我们的根底，惊慌动摇，给我们吓服了，而群众也高兴起来了。不过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做法对于我们的干部与战士的胜利信心是很大的一种鼓励。我曾和沈、唐等研究过，想法做到耳目一新，以普遍造成一定胜利的决心，发挥一切工作最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我们当时提倡要有大志，当时我们有了几句口头禅是“共产党是要得天下的，”“这天下是我们的，”“这回我们一定得天下了。”然而我们这样做是有分寸的，因此我们又提出“工作做得细”，这就是说，招牌不妨挂得高，工作一定要从低处做起。我曾举过一个中国人造房子的例子，造房子是从下边做起的，但却不是做到顶才上梁，而是打好了地基，撑了几条柱子，看准日子便把梁先上了，然后继续做那些下层工夫的。我这种思想是受刘少奇同志讲过的几次话影响的。王震同志南下时，少奇同志做报告，我曾参加听，他说：“你们到一个地方，就先拣大的官做，先委专员，后委县长，先做司令，后做支队长、团长，不要到个地方缩手缩脚，先做乡长、区长，这样你就没有气概，没有那威风，因为人家还有县长，他比你更大呢。因此，你一定要做得比他大，他是县长，你就说我是专员，我比你更大，你要服从我，他不服从，你就打他，看打不过，你就避开他一下，暂时让他在那里，你一边做你的，做到打得他过的，你再打他。总之，你们到了那里，就首先宣布这块地方是我的，所有的人都要服从我。”一九四〇年初华中开始建立政权的时候听过少奇同志的一次报告，大意也是这样的，他说：“老百姓都很奇怪，从来的军队到处都是委县长的，为什么你们新四军不委县长呢？老百姓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就委了，明天我们的县长就走马上任了。”

那时候华中的力量还是不大的；四、五支队合起来还不足一万人，而国民党的力量则很大，日本人就更不必说了。第一个县长是在皖中定远县委出的，委出了以后几天，四、五两个支队就全部开过皖东了，只有留下少数地方游击队在皖中坚持，然而少奇同志还是先把县长委出才走。我现在还是觉得我们这种模仿还是大致上没有弄错的，这还不是硬搬，我们并不是搭了个架子就算的，我们并没有忽略从下面做起的工作。而且我们也并不是连地基不打就上梁的。事实上挂招牌以前，我们已有了相当的准备工作，有过长时期的两面政权的活动。

跟着上述的“招牌挂得大，工作做得细”的原则而来的，我们还同时提了另一个原则，是政权的组织要“上小下大”。这合成一句话，就是“上大下小，上小下大。”这也是我们当时的一种口头语。怎样“上小下大”呢？边区政府是偶用其名而并无其人的，专员公署也是屡用其名而并无其人的（雷州专员有其人，化州专员则并无其人，但无论雷、化，却实在并未有人真正在做着专员）。县政府是有县长，而且也实际做着县长的的工作，但并没有什么县政府的（没有政府委员会，也没有什么科员科长之类，最近开始有一些），区政府人比较多，乡政府又更多，村政府人最多，有很大的村政府委员会，里面分很多工作委员会，大的村子，有一百个政府委员，小的也有十几个。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呢？就是要使它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只有一个农民出来做事，他会怕的，只有他一个人出头嘛！农民是不像学生哥那样爱出风头的，他怕惹祸，也确实太孤单，而且也确实没有那么大的本领。这样，地主、富农就会欺负他，收买他，地主富农是比较有政治经验的，一个对一个，农民会斗不过他们，这样，就很难办事。如果一条村子选出十几个人乃至成百人出来办事，就不同了，人多势大，就不怕得罪人，也不怕国民党来了，大家都一样嘛！一开起会来，百几十人一起商量，办起事来，百几十人一起办事，就是最不会做，最不积极的，多少也会做一点的。人多了，也就不容易被少数份子操纵出卖，地主、富农无法个个都收买得来，尤其在新村庄，在我未有党的组织的村庄，一定要选出许多人来，这样就算有些坏分子混进来，但总是好人多过坏人，好人多，坏人就难作怪。这些村政府，大多数

是这样组织的，由部队或工作队去，召集群众，开了清算大会以后，就选出了大批政府委员与农会委员，组织了村政府与农会。以后经常派人去领导他们工作，这样就逐渐地基础建立起来了。化州就是这样逐步逐步向敌人蚕食的。最近他们创造了这样的办法，对太接近敌人据点的村庄，派出部队去封锁了敌人的据点，然后召集群众大会。有些则甚至把群众带返我区开了会，组织好了然后送他们回去。对那些有了敌人组织的民团放着哨的，他们则派了工作队去，隔着山头讲道理，首先敌人是开枪的，看他动摇了，便边讲边向他走近，那哨兵就自动走了，我们便进村工作。对这些村子，开始的时候大概还是不能起很大作用的，实际还只是两面政权，但逐渐我们便控制了。他们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打开化南与化北之间的隔断地带的。这样的方式，比之完全秘密一两个人活动快得多，而且更有效。问题是：我们看准了群众是我们的，我们很信任群众，他们有一种天生的对我们的同情，当我们的政策真为他们了解接受的时候，最落后的分子也会积极起来的。今年正月，整个化南，仅有四十个党员，如果我们仅靠这四个人来办事，什么事也办不成。用我们这种办法，一下子就在一个村子里出现了几十个干部了。虽然他们并不很会办其他的事，但他们往往比“我们的人”更会做他自己村子里的事。这样的吸引大批农民参加村政权的工作，就使我们的村政权不能不有很大的群众性，因为它不但有了大批农民出来做事，而且经过这些人，我们可以和广大的群众联系得更密切，群众的意见可以经他们反映上来，而我们又得以经过他们动员群众。

温、林等曾极力反对我们这种做法。认为我们这种做法，会累死群众的。“你们带着枪到处逛的，敌人来的时候可以溜，这些群众怎样走啊？！敌会点着名捉他们的，到那时候他们会恨死我们的。”他们可以说一点也不懂得敌人，也不懂得群众。有那样规矩的敌人，一定是村政府委员、农会委员才捉的吗？这样的敌人，过去有没有我不清楚，我到南路一年多，却是还没有见过的，去年我们没有搞政权，没有搞农会，他应该一个也不捉了，但去冬敌扫荡廉西南时，捉了二百多人，其中大部队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根本没有工作的村子里的。今

年，有哪一次扫荡不是见人就杀的呢？敌人扫东海，杀了二三十人，我们在那里是一个政府委员、农会委员也没有逃出来啊，被杀的人，也并不是什么红出面的份子和我们的党员啊！几个月前敌扫遂南，有几个群众自以为从来没有和我们来往过，留在村子里没有走，敌人来了看到说：“不是共产党，你敢留在村子里？”通给杀掉了。那些王八旦，是看到在田里做活的也开枪扫射的呢。一般的群众都是没有我们那样“和平观念”的，尤其是那些老地区的群众，他们在多年的经验中，已经知道国民党这些家伙是禽兽而不是人类了。遂西北老地区的群众，已经两年没有在房子里睡过，家家都在蔗田里搭了小茅棚子，天黑以后就到那里躲“国民党贼”，有些村子是被抢过几十次的。最近我和沈汉英同志到那里去指导他们搞民兵，抽出了三十枝枪给他们，他们多高兴啊！以后我们也可以“在房子里睡觉了。”为了自己的解放，群众宁愿忍受最大的艰苦，而且也挨得起的。两年的时间不可以说不长了，然而他们没有向敌人屈过膝。我就是留在这个地方养病的。我到过一个村庄，那时候我们的修械所正放在那一个村庄，那是不能叫做村庄的？因为它已经没有一间房子，完全给敌人烧光了；现在敌人的据点离他们也只有几里地，我在那里那一天，说是有情况了，我走出村外去看，一个老农民对我说：“在我们这里还用怕啦？东西南北都有人在地里做活，敌人出来还不会有人来报？做活的就都是哨兵嘛。”我说温他们不懂得群众是没有说错的，他们把群众看成鼻涕虫一样。

可是，由于他们这种干涉，遂溪的政权及农会的组织就和化州的两样了。在化州，这种村组织是群众性的，即使它还有很大的缺点，但他吸引了较多的农民起来做事那是不容否认的，而在遂溪，这种组织就只是我们几个人在那里作单人跳舞。为了怕人家点着名来捉，每村只准设一个村长，一个农会长，不准有其他委员，或仅准有几个已经暴露的份子随时可以背着包袱打游击的份子来做委员，千叮万嘱叫我们的党员不要暴露，要准备些开明士绅将来来做两面派的乡、保长。我曾经对他们说，“整个坭地只有二十八个党员，这些人不出头露角来搞，谁来搞呢？敌人能每个村子都占得住吗？”还是去年，我们在茂南、化南就强迫保甲长召集群众组织农会、穷人会，也是那么选出

了一大批委员来，规定全村都参加，全村共守秘密的。这样组织起来的村子，在去年敌人的扫荡里并没有垮。茂南这样发展起来的四十多条村子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在那里只秘密的吸收一两个人做“地下军”的村子在那次扫荡里大部分垮了，有七个这样的地下军被杀了，因为我们秘密活动，而地主、保甲长就公开去告密。但是那四十多条新发展起来的村子，论理是全村人都知道的，保甲长也完全知道的，可是一点损失也没有，因为没有人去告密。我以为这里只有一个理由，是在这些村子里，地主、保甲长被我们征服了，而群众则是普遍的觉醒了，组织起来了。这些经验我以为是有考虑的价值。然而它没有被考虑，而在“准备第二次撤退”的情形下，在坭地实行准备做两面派，迎接那“即将到来的黑暗局面”。

那么，我们是否已经否认了一些地方进行两面政权活动之必要呢？我以为我们并没有，我们只是认为在一些地方，当我们已经有搞一面政权的力量与时机的时候，我们就坚决的把它搞起来，而在还没有这种力量与时机的地方，我们仍然采用两面政权的活动。我们当时也考虑过，可能因我们挂出了招牌而引起敌人对我们的特别注意，集中力量来搞我们，但我们认为我们如能把敌人兵力吸引在南路，则其他各地又可乘机发展。当然我们也希望其他各地发展得比我们更快更大，以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们也曾认为这一定是可能的。——东江一发展起来，就会比我们大几倍的，我们当时是这样设想的。在今年三月以后，化、廉、遂等地的建立政权，是否还为期太早呢？我到现在还认为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两千余武装，搞下了十几个乡公所，而在以后两个月中我们便又发展了一倍的武装。然而就是在那时候，我们也还没有取消两面政权的活动，在化南，我们打下了石东乡公所，全部缴了他的枪了。但以后国民党又迫那乡长回来恢复其乡政府，我们就划定了两条村子做他的地盘，要他做两面派，这个重建的乡公所是直到最近见他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了以后，才又第二次把他缴了械的。在吴川，直至最近我们还保留着一块两面政权的地区，作为我们伤病员的寄养及其他活动的地方，钱这次回来，就是经这块地区出来的。在茂南我们也没有搞一面政权，在化北也还有几个乡公所和我们有两

面派关系。在·广州湾近郊，在东海岛，我们都有部队活动，但也没有建立一面政权。这些事实，我以为是足以证明我们还不是毫无分寸的。我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一方面是两个政权的对峙，另一方面是两面政权的活动。有了这种对峙，后面这种活动更好展开。”我曾经举过华北的例子，冀中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绝大部分又重为敌人控制了，然而我们没有取消我们的一面政权，我们是坚决的撑起这块招牌的。我曾经听那时的人说过，有些县是没有一个乡我们能完全一面的了，然而我们的县长还叫做抗日县长。这并没有妨碍到我们在当时普遍于冀中的两面政权活动，他们那里的运用两面政权的成就比任何地方都大。林、温曾说，李先念他们在鄂、豫、陕边也还只有搞两面政权而没有搞一面政权，据说他们有十二万武装，控制了十二个县，有六个县（是否此数记不清楚，但至少不只一两个）的县长都是两面派，表面上还是国民党的，实际上是我们的。我对此事不很相信，我曾经问：“他们是否仍叫新四军呢？那些县长是他们委出去的还是原来国民党的呢？他们在那里搞不搞减租减息呢？发不发动群众呢？既然说他已经发展到十几万人了，已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那么多的县份了，连县长都是我们的了，有什么道理不可以拿出一面政权的招牌来呢？为什么一定还要奉国民党的正朔呢？”我是不相信这种传说的，我以为他们即使有些县长做了实际上是我们的两面派，但如县境已经实际为我新四军所控制，则这个县大概在乡下还是有另一个解放政府的。彭德怀不是已经宣布他们那里是个新解放区了吗？我曾问温：“难道像坭地这样的地方，已经没有国民党政权了，只有我们的军队在这里住着，而且是公开在这里住，在这里收税的，老百姓早就没有向国民党纳粮纳税，谁都知道这里住着的是我们的军队，这里的乡公所、保公所的枪是我们缴了的，像这样的地方，我们也还是非请个开明士绅出来做乡长，奉国民党的正朔，让他重新组织国民党的乡队保队，在这里收捐收税，而我们则退居于“地下活动”，争取他做两面派吗？你那里去找这种“开明士绅”呢？”温说：“我们可以任由它成为无政府状态。我们不建立政权，国民党回来建立我们就消灭了他；国民党又一定来扫荡，他的军队来了一定奸淫虏掠的，这样，一定有些地

方有正义感的人士，因为想地方不受摧残，出来徵求我们的同意，组织两面政权。”我说：“你这些是空想，事实上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事的；没有这样‘好’与这样‘够胆’的‘开明士绅’。如果我们能屡次消灭了国民党的一面政权，则我们实际已有力量控制了这块地方了。就算国民党还能来扫荡（要使他根本不能来扫荡，在目前我们就躲进怎么大的山里去也还是做不到的），但一个月；他控制一天，我控制二十九天，他控制一条村，我控制百几条村，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来做官，而务必要请那些‘好地主’来做官呢？群众看起来，你们这些人是搞什么鸡巴的啊！你那里去找这样的‘开明士绅’呢？在国民党看来，大动刀兵，也占不了这块地方，而这位老先生，赤手空拳就在这里坐得稳稳，搞得掂掂的，共产党为什么对这位仁兄那么有感情啊！”这是温初回来时我们之间争论中的一席话，是我回到湛市见他的时候谈的，特照录出来，以见我们的分歧之一斑。

在政权工作中，我们发现过这样的经验，这是丁同志和我说的，他的意见，认为村政权和村农会是不宜分得太清楚的。原来我们开始搞的时候，是把政权和农会分开的，政府委员会会有很多委员，农会也有很多委员，这样，做起工作来，就叠床架屋，职权不分，大家都不起作用。那时候还有一种想法，以为政权是较带统一战线的，农会则是完全阶级性的。起初我也曾经提出即以村农会当作村政府的问题来研究过，我还讲了陕甘宁边区一九四〇年前是只有村农会没有村政府的，乡有乡政府，但村则只有农会，农会主任就是实际的村长，但那时连村长这个名词也没有。一九四〇年以后，实行普遍，才取消了农会，组织村政府。我们起初是打算村一级也只设农会，不设村政府委员会的。但当时还想表明我们不是农民专政性质的政权，而是统一战线的政权，因此就决定不采用这种形式，而采用政府委员会与农会平行的形式，并规定农会委员应大部分同时也是政府委员，并把农军置于农会底下，以增强农民对于村政权的操纵力。这样做下去，据丁的反映是不好的。因为那村政府虚有其名而无其实，农民不喜欢，而在一个村里同时建立了这么的两种权力机关就必然要实际的引起些磨擦。因此，丁等就在一些地方，把村政府委员会取消，只保留一个村长，而

村长则规定由农会主任来兼，这样，村政府与农会就变成实在是二而一的完全统一的组织，村长完全利用农会的组织来办事。这种政权组织形式，阶级性很浓厚，办事也有实际效力。这个意见是他于七月间和我说的，我当时非常同意他这种意见，不知他以后做得怎样。同时他还提出了，村农会里各种委员会（如文化、生产、裁判）设得太多也不是好的，我因为当时只是带兵路过他那里，匆匆之间，他未能详谈，我亦未有仔细研究，对这一点我尚未置可否，未知他们实际做得怎样？

最近沈汉英同志到遂南区检查工作，发〔现〕那里有这种现象——我们已经委出了村长了，但对过去国民党的保长很客气，是相待以礼，请他下台而不是打他下台的，这些家伙在下了台以后，还是和我们的干部交游来往，我们的干部也对他们客客气气。这样，群众看起来，这些保长是倒而未倒，还有余威，他们在群众里面俨然还有为人之上的那种地位。其实这些家伙是在做两面派，他们还秘密去参加沈圻圻敌人召开的保长会议，回来就散布谣言，说国民大军快要来，我们这地方不得了等等，恐吓群众，阻碍与破坏我们的减租减息、组织民兵工作。另一种是村里的父老，在遂溪叫做公公，他们多是比较有钱的（没有钱在乡间是不能真正的做成父老的），平日管村族的公数、尝产，在村中话事。这些人里面有一部分是实际反对我们的两面份子，一部分是落后份子，他们利用他那种地位，在村族里散布不满我们的言论。而我们的同志，因为过去利用这些人来进行掩蔽工作的时候，曾经有很长的期间，差不多是一贯的强调经过父老来进行乡村工作的，到了此时，我们还是保持这种“尊重”的态度对他们，不敢得罪他，事事问他，这样，他们就愈卖弄权力，离间农民和我们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村长，便实际上未能掌握了村中大权，这样是有一半很明显的仍在那些所谓父老的手里，另有一部分是掌握到那些倒而未倒的保长手里，我们所能掌握的实在很少。沈说“村长不象个村长样。”根据这种情形，沈在那里提出了进行清算公数、尝款，斗争那些旧保长，把一切公数、尝款交给农会管理，把原来由富农承批的公田、尝田抽出分配给贫农种（过去这些田地是绝少给贫农种的），把这些公公在

乡村的权力夺回给农会，提出了一定要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不准人批评农会。这样做了，减租减息进行得很顺利，农会也健全了，农民很喜欢。我曾把他寄回来的这封信抄给遂溪其他各区。这个经验我以为是很有价值的。这个原则本来在今春就提出来的了，我们曾提出过反对一切问过父老才做的作风，说：“这些人是最落后的，而且大部分是有钱人啊！他们是旧的封建势力的一种代表，他们并不是革命的，一切问过他们才做，就等一切不要做了。我们应该是一切问贫农、雇农，问那些原来在乡村中没有地位的人而不是问过父老。靠父老是不能革命的。”这种态度，在化南贯彻得早些，因为他们那里早就普遍进行清算减租减息，在群众运动中干部便自然接触到这些问题；但我们并没有及时把这种经验总结。遂溪的群众运动最近才开始的，因此他们发现这个问题较迟，沈这封信是很可贵的，我曾说那是非常实际而又理论的。这些干部，在群众斗争中是进步得很快的。

关于把国民党的旧保长打下来的问题，我们在初期也曾经考虑过的，那时我们考虑到究竟我们仍用保甲的名词不用呢？研究的结论是不用它，理由是要在群众中表示我们和国民党是完全不同的，对国民党这种旧制度（群众非常讨厌这种制度，保长临门，不是遭灾定是破产）是根本反对的，把它打烂，再建新的一套。这样，我们就决议不但废除保甲制度而且也不用这种名词，并取消了保一级的政权组织，而将村政权直辖于乡政府之下。我们出了布告，发出信，叫那些乡保长把“印信交与本府，武装交与本团，”乡长这样顺顺掂掂投降是没有的，保长就很多。在化南一些地方，开始时我们是这样接收的，召集了群众大会，当众把印信毁了，把粮册、丁口册等都烧了，要那些保长们当众悔过，发誓再不替国民党做事。群众对于烧粮册、丁口册是最欢迎了，对于毁印信，迫保长悔过，也给他们以改朝换代的真实的感觉。对于那些乡、保公所的房子，我们也很多是烧毁了它的，主要是毁了它的碉堡。

取消了保一级的政权，可以使乡政府直接领导村政，更为密切。我们完全废除了甲、邻的制度，而以拥有多数村政府委员或农会的委员来代表村政府联系群众，这是对旧统治制度的很大的破坏。不以保

而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政权，容易集会，容易办事，人也易齐心些，做起事来常较积极些，而且适合于乡村的习惯，乡村的许多事，习惯上是以村为单位办的。一村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较密切，有许多事情是带共通性的，如村公地、村公产、村公益事业等等；但太小之村，也不勉强自成一单位，而与邻近之大村或数小村合并为一村，村置于乡直辖，如按国民党的乡制。但辖村太多，不易管理，故我们又把乡划小，在化南的如何划小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在遂溪最近也划小了。最近我到遂西北区，那里的同志都觉得乡太大了，不容易管理。那里共有二百多个村子，只划三个乡，有的乡几乎管成百个村子，这样，村里的群众会成个月也不见乡长的面，那关系就疏了。因此我们就把它划为七个乡，并且增加了乡政府的人员，每乡辖地不阔，大约于横直十里为度。这样，就可以保证乡政府的人员经常穿插于各村之间，成为亲民之官，下情得以上达，而我们的政策，也将以有效执行。国民党的政令是靠公文来办的，而我们则是靠我们的官直接去到群众里面动员的。这种不同，更加上游击战争的环境，就使我们必须改变国民党的全部制度，国民党这种腐败到透的家伙，简直是没有什
么留得下来好用的。

国民党是取消了区一级的政权的，我们却把它恢复起来了。因为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里，没有区一级政权，县政府是很难进行对各地的实际领导的。

对于各地政权工作的现状，我是知道得很少了的，因为自从温回来后，我便没有管理地方工作了。以上讲的这些，有些是后来我在遂溪养病时所知道的一些经验，有些是举事以前及举事当中的主要是在化州时候的计划和做法，以后做得怎样了，我没有听过报告，不晓得究竟。但化州的政权比其他各地起作用，则是事实上可以看出来的。这几个月来，虽然进展不大，但政权的建立大体上还是较以前普遍的。在遂溪也有些发展，廉江也有些，不过都不大，在化州大约发展得大一些，吴川县政府是这几个月中建立起来的，据说能控制全县一半以上的村子，化北有些发展，化南也有些发展。我们对于搞政权的工作较之搞武装的经验更少，我觉得我们必须更仔细来研究这大半年的经

险，想出更多的办法才能把政权真正办好。

目前我们有了县政府的只有遂溪、廉江、化县、吴川四个县，这四个县是实际有了一面政权的，海康也有了一些，其他地方都还没有。茂名县长的布告是高唐在四月间敌集中两个保安团及茂名、信宜、电白等县县兵扫荡化南的时候派武工队挺进茂南去贴起来，想混淆敌人的视力的。这事有点夸张得太虚张了，但在当时也略收了些效果的，因为它曾使电白的县兵一来到化南便立即调了回去，茂名的县兵也回驻茂南，电白的以后一直没有再来，茂名的以后又来了。

(六) 经济供给

今年正月，我和沈、唐研究怎么养兵的问题，当时定下下面几个原则。

一曰就地就粮，这话不大解得通，但我们当时是这样说的。其意思是：到哪里吃那里，那里有得吃到那里去活动。因为估计一发展起来，老地区本来不大，又吃了很久了，许多地方都给吃过。那时又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地方上存粮也不多，是没有什么好多得吃的。但主要的还不在这里，主要的是敌人也不容许我们坐定在一个地方吃的。为了发展，我们也要出去，“要生存，就要发展”，我们当时强调发展，还不但是发展人数，而且要发展地盘，即：要把游击战争搞闹搞大，“共产党满天飞”；“搞到国民党天下大乱”。我们这个原则是和温那时来信叫我们筹一笔重生产基金，一万担军粮然后举事的精神不同的。因此我在二月给温的信里就将他的想法很加以讥笑，说他办法是富人造反，先积草粮然后举事的，而我们的办法是穷人造反，先造了反然后筹粮的。我当时给他的信就说到哪里吃那里的办法。这办法在举事之初是不得不如此的，在目前很多地方也仍然要如此。这几个月来，不但为了扩大游击战争要分兵发展，就是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我也不断提出要分兵就食，反对集中部队在我们“内地”移来移去，把什么都吃光了。这种到哪里吃那里，就地就粮的办法，在初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起初各地的干部，很为没有东西吃发愁，不敢发展部队，不敢离开老地区去外边游击。有了这个办法，粮食问题解决了，

大家的进取心也强了，对于去新地区活动也觉得有把握了，现在的部队，没有带钱带粮也敢出门的，而过去是不敢的。我开始带第一团自遂溪出发去廉江时，全军只有六万块钱，团长、政委都非常担心，我说：“怕什么，天生天养，有了几百条枪怕没有饭吃？”就这样带着走了。那时候，我们一路上，专住新村庄，住地主村，向地主要饭吃（农民是不负担的）。一个多月，吃得很好。

二曰当兵吃粮。因为过去南路解放军不是吃粮而是买粮的，许多带兵的干部不习惯于吃不化钱买的粮，不会自己去筹粮，也从来不想法去筹粮，过去人数少，还化费不大，人数一多，就很难供给了。而且我们现在没有过去南路解放军时期的那种环境，那时候他们安坐在廉南，几个月没有搬过家，单从广州湾到广西的那一条走私路上收税，每日就收二百万，因此他们有钱买粮吃。而我们现在是不会有这种条件的，有了那么多钱也不拿去买粮。根据这种想法，我们就下令不准各部队买粮吃，只发菜钱，不发粮钱。这样，我们才能在当时钱很少的情形下养得起几千兵。

三曰人民养兵。这一条我们规定为我们努力的方向，提出一定要做到人民养兵。我们这样说：“地主养国民党，农民养我们。农民都肯养我们的时候，地主也养不得国民党了。”初期是不能叫农民养我们的，因为我们还没有东西给我们，他们怎肯养你呢？用什么养你呢？初期一定要强迫地主不养国民党而养我们。以后，农民把地主的東西拿过来了，他们就会自动养我们的。要做这一条，就一定先要侵犯地主的東西拿给农民，所谓“欲取先予”。这就是沈汉英同志因为林等不同意分部份土地给泥地的雇农而发牢骚，叫索性把部队遣散或带走，不然无法养的意思。这一条，化州是做到了，遂溪、廉江则还大部分没有做到。

四曰自己解决。这是针对着那种依赖上级统一办理的心理而提出的。因为我们如此被分割，经济无一定的来源，支出也难有正确的预算，要统一筹办是不可能的。过去各地都有依赖上级解决的传统，许多东西应该他们自己去办，而且一定要他们自己做才做得好的，他们不知注意去做。以前各地买东西，连一枝铅笔、一本笔记簿之类，也

总是叫特委交通站代买的，在广州湾管各地交通的周仔，被称为二叔公副官，买炸药、医药、油墨、蜡纸，无非他经手，他对我说他总共代内地的人买及修过五十几次表。另一个负责遂溪和我之间的交通在广州湾见我，他买了一百颗驳壳弹，用茶叶罐子带着，直带回和我接头的那间屋子里。这可见那种作风之一斑。这种作风大概也是遗传甚久，而且是上行下效的。温对这些问题向来都不知注意，譬如他在司令部的时候，几次写信叫我的老婆替他买东西，一次是买一条洗衣肥皂，一次是买支毛笔，一次是买两个汤匙，一次是买两条内裤。那时我的老婆是在广州湾管理着全部的秘密交通和广州湾的情报系统的。这是一种依赖性，完全不就地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难道在遂溪的乡下，不经过这种组织关系去，就真的没有办法买到一块肥皂、两支毛笔之类的东西吗？

自己解决这个原则的提出是有用的，它使各地不能不自己去想办法解决困难，建立本身的供给系统，布置筹粮筹款。这不但对各县如此，各县对其各区也是如此。这样，使我们的各地工作，各部队都逐渐培养出自食其力的能力。这个原则是和统筹统支的原则对立的。我们将来是要统筹统支的，但现在则没有这种条件。温等未来之前，我的司令部是没有供给部门的，但各团、各县则是有的，如果温等不来，大概我到现在也还不会把这个军需处建立起来。那时候，部队到廉江，就由廉江供给，到化州由化州供给。我这个司令部没有发过一个钱，一粒子弹。第一团出来个几个月，子弹是遂溪送来的，衣服是遂溪送来的，人员也是遂溪补充来的。下面能够自己解决，上头就轻松了。而且那时候，非自己解决是毫无办法弄得通的。

要各地、各部队自己解决，则下面必须较之上头的组织更健全，司令部可以没有军需主任，但团不可不有军需员，连就更不能不有事务长。我们的伙夫是比一般的军队多的，八路军的正规军里规定十五个人一个伙夫，我们则规定最多十个人便要有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拿着粮票去粮站领粮吃，而是天天要自己动手去筹的，事务长去交涉，几个伙夫去担、磨、舂，其余的留在家里煮饭。事务长都要配备了自卫短枪，有些伙夫也有，不然就要派武装跟着去，因为他

们是要经常单独活动的。温等曾提出要减少伙夫，美南同志起草的一个部队组织法，规定每连百二十人，只配五个伙夫，他们实在不晓得温食之艰难。当然，后来也已经知道了。

大概，现在自己解决这种精神，在部队及各地是已经有了相当修养的，也已经有了些经验。现在一般的连队派出去单独活动，大致上还是不致于饿垮的。

温、林等来后不久，就提出了“统筹统支”，我曾经对温说：

“华北的根据地都是搞起一两年后，才提出统筹统支的，我们现在有这种条件了吗？”温解释说：“我们是向统筹统支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立即就全部统筹统支。”这种工作后来做成怎样，我不清楚，因为这是温管的，他很少和我商量，但有些事情我是提过意见的，如今年的冬衣计划，大约是旧历的八月初开始提出来了。温的意见是筹四亿元，统一由司令部军需处办，派人来香港买美国军毡和棉毛卫生衣，一提出来我就不同意，我说：“不依靠各地自己想办法解决，而想靠军需处这三两个人到那外国的地方香港去买这种洋货，你一时也筹不了那么多钱，筹得来了除转送到司令部然后再带出广州湾带到香港，不知经过若干时日，运回来又不知经若干时日，到那时人都冻死了。那广州湾又不是我们的，几千人的被服，你怎样走私回来呢？”我当时提出取消这种统一筹办的计划，而下令给各区各地，叫他们“就地取材，就地用各种关系，买、捐、发动队员回家拿，破的、旧的、土的洋的，什么都要，这样是可以解决的，冻不垮的，及早让他们自己来办吧！我保证是解决得了的。”温没有听我的话；仍然叫我带钱来香港，并叫各地把钱付来司令部，集中去香港买，各地都等着司令部代办的美式装备，直到九月中，还没有开始自己动手准备的。我留在遂溪养病的时候，才接到温等从廉江来的通知，说今年的冬服一部份由司令部办，一部分由各地自己办。我住在离广州湾五里地的村子里，刚好是住在第二团第二连连长梁彪老婆的外家，彪写信来说部队冻病了许多了，要求赶快发下冬季被服。我对第二团团政委说：“阿彪带的兵也弄不到被子盖，这不笑话吗，他这个连都是广州湾附近人，在广州湾附近活动，天天在公路上收税，又不是没有钱怎会冻得着呢？叫个群

众到广州湾买几十斤棉花几匹布回来发动妇女会的人一缝，不就都解决了吗？不然叫他自己的老婆进广州湾趁一次圩也把东西买回来了啊！”

此时他们还在集中钱，准备再叫人到香港买，我制止了，说通知沈，叫一、二团和各区乡队都就地解决，买了三包棉花几十匹布，分头来搞。半个月后，我离开湛市的前一天见了那负责搞冬衣的军需员，据他说，雷州分区的被子都解决了，一团并且已经做了衣服。我叫他通知温等，叫化、廉等地也这样办，不晓得办得怎么样。我以为事实证明我这种分头解决，就地取给的办法是比他们的统一办理显然是更为实际有效的。如果我们及早就通知各地这样“未雨绸缪”，又何至于挨冻呢？从香港把一两千张军毡、旧军服走私回到司令部，然后分发各团、连容易些，还是叫他们就近搜购些土布、棉花，分头发动妇女群众帮助缝制容易些呢？我以为很显然是后一个办法行得通，而前一个办法是很难行得通的。现在五百张军毡放在香港，一张也没有运出去，难道是这里的人没有积极想办法运吗？

“在向着统筹统支的方向发展”当中，主力队司直和各地地方团、地方机关的待遇差别也定出来了，如前面讲过的，它曾经发生过很坏的影响。最近又颁布了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制度了，这是酝酿已久，最近才正式颁布的。它的影响如何，我尚未看到，我所知道是当他们要制定这个制度的时候，我曾叫温问过第一团的团长和政委，他们都是认为现在颁布这种制度还是为时尚早的。我的意思也是目前我们尚不是花大把精神来整顿这些东西的时候，暂时让他保留一些“平均主义”，也还未至于垮台，而且还是有这种进步的，需要的，这样急于来分这些等级做什么呢？这个制度的订立，大约在新历七月准备入桂以前就提出了，那时我没有同意，未有成议。八、九月间我和温在遂溪接到美南同志的通知，要制定这种制度，拟了表格送来，我和温都没同意。温回廉江后，十月，却以司令部的名义发出了关于这个制度的通知了。这也是“向统筹统支方向发展”的一种表现吧。不错，我们的经济制度还是很混乱的，有些干部有浪费的倾向，有些干部也贪污起来了，但要整顿这种现象，却不是夹硬用司令部去统一起來就能办到的。譬如收税的人，很多是发现过有些贪污行为的，大贪污还没

有发现，小贪污则几乎到处都有，这种现象初期是难免的，要把他弄好，只有把各税站置于各地方的党政军机关领导之下，使他们得以就近指导监视，这才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温等的整理税收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把各地税收机关整理成另一个系统，直接置于司令部的军需处领导，由军需处派出巡视去检查监督，规定各站收入抽百分之四十给司令部，百分之三十给地方团，百分之三十给其他县、区、乡机关及部队。虽然也说地方的党军政机关有协助与监督税站的义务，但原来是纵的关系的现在变成横的关系了。在遂北的税站就因为一下子成为司令部的人，而引起比他们少吃两钱油、二百元菜钱的地方干部与部队的不满。当然这种情形也还不是普遍的，因为遂溪其他的税站的生活待遇还未及早改变，只是这个站离司令部近些，大概得风气之先而已。最主要的是这些税收机关，在游击战争环境里，不分散置于各区委、各区委政府的领导下，是很难工作的，经过这种改制后，在遂溪我们已经听到不少税站说地方干部、地方部队不协助他们收税的事了。没有地方的协助，他们怎样独立活动呢？地方政府、地方党不来监督他们，他们贪污了，浪费了，那云山阻隔的司令部又怎样知道呢？我在遂西北的时候，一团的团政委、遂西北的区委书记都来讲过税站的人大吃大喝，但他们都来讲罢了，他们不敢去管，因为那规定了不是他们管的，尤其是那区委书记，这些人本来是天公地义该为他管的啊！

温的作风上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非常集权的，在他底下的干部，简直不敢而且无权去处理甚至很小的事情。温离遂去廉后，我接到遂溪县长给他的报告，说以前没收一个地主的十多只牛，现有人出若干价钱，是否可以卖了，希温速给指示。我把那信烧了，没有转给温，堂堂一县之长，要在怎样的价钱下卖出十几只牛，也必须请示二叔公，可见这种“向统筹统支的方向发展”是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了。遂溪中心县书、第一分区司令沈汉英同志那时是和我住在一起的，温则已经带司令部到了廉江许多天了。这县长不把这件事情请示于沈而请示于温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牛，照温的吩咐，是“直属于司令部”的。我不是讲笑话，温确是这样吩咐过的，因为清算那家地主，是县长带着清算队会合直属于司令部的“主力团”第一团去搞的，因此温

曾经有过这样的吩咐。

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向统筹统支的方向发展”，除了自己增麻烦以外，我看是不会有好处的。

关于粮食的征收，今年的夏征，遂、廉两地都失败了，但化州却是成功的。我和温回到遂溪的时候，根据林、温等原定计划，是要在遂、海两县征粮一万五千石的。本来以当时的部队从夏收到秋收的时间是吃不了那么多粮的，温等的计划，是要从这一万五千石粮里面抽出三分二拿出变卖来做冬衣费的。这数字一提出来我就说是不可能完成的，其原因是：一、这个数字根本超过我们控制的地区的群众所能负担的能力。我们在遂溪控制的地区虽不少，但遂溪的耕地多是旱地，种植的是蔗、花生、芝麻、番薯等的，有许多种禾的地方，也是只能种秋季而不能种春季的，这样，早造的谷物收获量是很少的。如遂西北我控制的村子很不少，但那里的粮食怎么样呢？今年八月我住在那里，几十家人家的村子里都是买不到一升米的，老百姓吃的是番薯粥，主要的产品是糖蔗，而糖蔗却是到冬天才斩的。二、遂溪还没有进行减租减息，村政权和农会是未能起作用的，没有群众的支持，这样大数目的税怎样收得来呢？我和温讲了，温说：“把数目开大一点不要紧，开得少他们不着急来进行，会弄得更少的。”后来还是改为万二石了。但结果呢？大约只征得三千石以内，刚比零头多一点点，遂、廉两地的征收都是摊派式的，由司令部定出数目给县，县分给区，区分给乡，乡分给村，按数目追。本来这种办法，在村政权未有基础的时候，只得如此：未可厚非，温等的缺点只是把事情想得太容易，没有调查研究，便量出为入，开了漫天大价而已。

化州的征收则不同遂、廉，其办法是预以户为单位，按收入分为若干等，收入最多为甲，次为乙；又另以户为单位，按人口数目分为若干等，人最少者为甲，次为乙。依此，如某户收谷一百担，按收入表属丁等，而该户共有十人，按户口为己等，则此户口属于丁己等户，比之同样收入而全户只有两个人的甲等户，其负担的税额是轻得多的；政府预按累进的原则，制定了一个表，列举甲甲户、甲乙户、乙甲户、乙乙户……应纳税数，而村政府和村农会则负责评定村中各户的两种

甲乙，征粮时按表一对，照数缴纳。这办法是我和丁同志议定的，当时我们议定的两个表都分为九等，这样，按收入与人口的比例定出了的不同纳税等差，便有八十一级之多，这样做是容易做得公平的。我离开化州回遂的时候，这种征收办法已经公布了，据丁的反映，农民都说，轻得很，公平得很。以后他们进行征收的经过，我没有听到报告；九月中旬丁给我一信，说他们除了祖尝的未收之外（大约这些难以评定。因为它没有人口等级可算），其他全部收齐了，现仍存粮七千余石，收齐了祖尝的即可达一万石，粮食毫无问题云云。现他们是收得有成绩的。

除了征粮之外，还有敌人的抢粮与我们的反抢粮的斗争。自七月至九月，化州的敌人不断出动抢粮，我除了展开麻雀战、民兵战以反对敌人的入我区抢粮之外，还发动了抢敌粮的斗争。计这三个月中，敌共抢去我粮不满四百石，我抢敌粮千余石。在秋收以前，敌各据点是很缺粮食的，因为过去的乡仓都给我分了，没有分掉的，他们在当时的纷乱中也下令把存粮变卖了。我在化北的时候见到的，敌塘蓬乡的乡兵困在据点里不敢出来，没有饭吃，只好由家属送饭去吃，简直有点像坐牢了。

目前最困难供给的是弹药。子弹，主要的来源只好靠买，因为是很难有大批的缴获的，因此如何保证弹药的经常供给是供给工作中的最大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几个月来领导上却未见重视过，最少未见有人像制定生活待遇差别那样热心来研究与布置过这件工作。这件事现在可以说是分散经营的，但完全没有集中领导。现在，在领导上是必须舍得亲自花精神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温一回来的时候，我就提议派人来香港、澳门买弹药，抽出干部来专门搞这件事，当时还叫欧介绍他们以前在澳门买弹药的关系。如果那时候肯以来买美国毡子的精神来办这件事，今天这个工作大概是有了些成绩了的。

今春举事之初，我们是相当注意弹药的供给问题的，那时我们派人去合浦买机枪，请修械师傅，尤其是我们积极研究自造手榴弹和地雷，为了“发明”这些东西，死伤了十多个人，这些事以后虽没有再被领导上加以注意，然而各地还是做出了些成绩的。化州的地雷已能

大量出产了，在反抢粮扫荡中我们造了一千个地雷，遂溪、廉江的地雷也都有了些基础与收获了的。在今年正月，化南已有了自造的地雷和手榴弹，廉江在二月也开始制造了，遂溪则是在三月开始的。我和唐、沈商量的计划中对于这件事有下列几个原则：一、各地负责干部亲自负责把这工作搞好；二、用土材料，不用洋材料洋法，因为那些东西不是易搜购得到，那些技术是不易学得来的；因此它就不可能普遍使用；三、自己研究，自己创造，不依靠什么地方派来、请来的高手。这种精神是相当贯彻的。从我起到各县的负责干部，都极注意此事，目前我们的土地雷、土手榴弹的原理，还都是过旧历年时我和唐、沈两人在湛市买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爆竹，反复研究定下来的。唐在化南的地雷、手榴弹作坊里住了十天，亲自监督与试验，把第一批地雷与手榴弹造出来的，当时直接负责雷弹所的人就是现在的化县县长叶卓琼，而新安区区区长李应东则在试验自制炸药中受伤的。廉江的雷弹所也是在县书黄文德亲自领导底下搞成功的，那制造所就设在他住的那个村子。化州雷弹所在不断的改造研究中，有了三件重要的发明：一、用松香混合洋硝、炭、硫造成块状的炸药，这种炸药浸水不潮，火烧不爆，只是用雷管才能爆炸的，其爆炸力比不混合松香时的硝炭硫炸药约大一倍，我们把它称为土造黄色炸药。二、用松香混合蜡造成防潮剂。这个发明解决了初期最苦恼的防潮问题，那时候造出来的地雷放几天就不发火了，现在造的，放在水里浸一夜拿出来还可爆炸。三、用木管黑药造成的延性雷管，这使我们能由只能制造落地碰炸的有尾手榴弹进步到造拍噫手榴弹。这种发明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三个发明者都已经在制造这些武器时失事被炸死了。南路要造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别的地方可以买到黄色炸药、雷管，而南路却是很困难买得到的。这就迫使我们连“黄色炸药”也要“土造”。自造的雷管为什么不用铁管而用木管，不用白药而用黑药，为了这小小的道理，也流了几个人的血了。

目前，在这一门功课里我们是有了一些基础了，如领导上肯加以注意，把地雷、手榴弹的使用普遍起来，制造技术更提高些，这将是未来作战中的主要武器。

(七) 补述分歧

旧历五月在遂溪，我拟了一个给第一团第二营的为期五天的练兵课程表，叫秘书拿去给林、温看，许久不见拿回来，我问为什么，那秘密说：“林同志另写一个咧。”我很奇怪，他怎么另写一个呢？他不认识这部队里任何人，也没有向我或其他人问过这个部队的具体情况，而我却是一下乡来就一直带着这部队南来北往，昨天才从他们那里回来的。就是这样，我拟这个课程表时，也还是和派去这部队里负责这五天的教练工作的教官及跟着我三个月的秘书一边商量一边写下来的，并且嘱咐那教官：“团长不在这里，这课程不知究竟合不合用，你到那里，把这给他看，只作为参考，如他认为不合用的，可以更改，可以另搞一个。”我的态度还是这样不自专擅。林同志根本不知道这部队的情形，也没有问我一声，怎么就把我的不要而亲自动手另写一个呢？果然，不久他就把他自己写的那个拿来了，内容是否合用姑不去说他，但那作息时间是通通改了，我的原稿是上午四时半起床的，他的却变为六时二十分了。我当时就说：“四时四十五分就天亮了，为什么要在天亮以后几乎两个钟头才起床呢？天下也没有这样懒的军队呀！”我对温讲了，温说：“看你用什么钟呢。”我说：“奇怪，难道在这里还要用香港时间吗？”

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的分歧的根本。最近我写过一封信给他们说：“你们最大的缺点是你们并未了解情况的，但你们敢于决定政策”。我这话说得带刺激性一点，这也确实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关于在实际工作中的分歧，上面已经讲了许多了，这里我想补述一些比较“理论”的分歧，藉以把问题弄得更清楚些。因为这些“理论”，正是几个月来他们对我斗争中最被重视的，是他们多次发言中的帽子。

第一个问题是说我是速胜论，否认长期性，据钱兴同志说，家长同志曾讲“南路的同志一听到长期就头痛”，用地委名义发出的那个检讨半年工作大纲的头一条分歧就说一方面认为革命是长期的，要作十年八年的准备，一方面认为应强调胜利，没有十年八年那么长。究

竟我是怎样讲起没有十年八年那么长的话的呢，那是今年正月，杨子仪同志（现任吴川县长）从香港回去，说在香港这边听说毛主席说过还要十年至十五年才能打倒蒋介石。化州同志听到他这样说了，很是怀疑，高唐同志写信来问我，我给他回信说，毛主席是不会这样说的，大约毛的话是说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完成要十年至十五年，而不是指军事上打倒蒋介石，新民主主义的完成和军事上的打倒蒋介石，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是两回事，随即举出晋察冀边区我们是在一九三七年冬便取得了政权了，但要到一九四〇年彻底实行了减租减息以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才取得优势。因此我说，蒋介石是没有命支持到十年至十五年，我们是无需再挨十年至十五年的黑暗时期的，我们要准备再打三年五年游击，那时天下大概就是我们的了。就是我最初的“速胜论”。

三月初九，我写的化州县政府和四团的联合布告上有这样的句子“内战打了几个月，三成兵失了一成。眼看势将丧命，临死犹打脚撑，”这是第二次的“速胜论”。

四月，我在遂南的村代表欢迎会上讲话说“北方大军的反攻不会再等太久的，到那时蒋介石国民党就死了。蒋介石共有二百二十四个旅，打了半年损失了五十三个旅，再打半年那时候他损失多少呢？这是可以拿算盘计出来的。解放军不但没有在战争中弱下来，小下来，反而更大了，因为人民拥护他，自动来当兵，到处起义响应，又捉了蒋介石大批俘虏，缴了大批武器，现在的解放军已经比开战时大成倍了。一个打过仗的人，根据常识就会知道，假如我们一个连和敌人一个连在战场上对打了一点钟，敌人死伤了一半，我们又有一个连的主力军赶上来了，这时候的仗是怎样打的”？这是第三次的“速胜论”。

以上都是温等没有来或初来的时候的，以后刘、邓南渡黄河，打到陇海路的时候，我在一团的干部会议上说“战争形势已经转变了，北方主力已到处反攻”，温立即更正说：“只是反击不是反攻”。后来刘、邓已打进了大别山，陈、谢也渡河了，而且在一个贺电上也看到战略反攻的字眼了，温还说：“不是战略反攻，这是个别地方的，不是全国性的。在整个战局来说，未到战略反攻的时候。”我当时驳

说：“还不是战略反攻？蒋介石拿什么来继续他的战略进攻呢？”这是我的第四次“速胜论”。

现在就是温他们也应该看出，不是我的“速胜论”错了，而是他们的“迟胜论”错了。

温等很大的错误，就是他们把敌人看得了不得，而把人民的力量估计得那末低。钱兴同志说：“英美蒋是有矛盾的，然而，在反共这方面他们是可能一致的。美国人是重视湛江和由湛江到四川的这条铁路的，现在已经决定筑了。你们在这里搞得这样凶，美国人是可能象对青岛一样，派两三个师来湛江，保护建筑这条铁路的，那时机械化部队，坦克都来了，这平原上，坦克是可以开的，最方便了，你说你们搞得住吗？那时候你们怎么办，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些可能呢？”我当时笑了起来，我说：“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怎么办。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本领。假如我们竟搞到蒋介石也无法保得住湛江，而非他的美国老子出几个坦克师来，我看我们的力量也有山东解放军那么大，最少有十万人马了，我李强的名字也象陈毅那样响了。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老蒋大事已去了。你说我怎么办呢？！”

因此，温同志对遂溪县委提出“要准备第二次撤退”是有根据的。钱又说：“这次战争的结果，一个是可能一直打下去，一个是可能打到蒋退却了，退守在城市和长江，我们收复失地，但我们还没有力量收复大城市，因收复大城市必须打阵地战，要有许多新武器和重武器，和有训练的军队，而我们都是缺乏这种东西，我们要攻下大城市还是很难的，这样，蒋无力继续进攻，我们也未有力量攻大城市，此时或就讲和或仍是两者对峙，蒋不采取攻势，就可以缩短战线，因而就可能从前线抽调几十万——最少可能抽出三十万大军回来扫荡化南。蒋是重视华南的，他一定抽兵回来的，到那时，几十万大军压在你们头上（当然不是全部压到你们头上，但抽十万人以上回广东来是可能的），你们怎么办呢？象这样话我听得多了。在林、温初到的时候，初期的争论差不多都是这种“怎么办”。我确是不晓得怎么办了！温曾经分析过，认为这次战争是持久战，是三个阶段的，即其中有个相持阶段

的。去年冬他也曾和我说过，说北方战场解放军现阶段的战争是游击战争为主，运动战为辅。我当时就驳过他，我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也那么落后，连日本帝国主义也打垮了，难道现在对蒋介石这小子，又要从头由游击战争打起吗？因为想着有那么样的一个相持阶段的，或那么样的南北朝局面的，是那样谁也吃不下谁的，因此，他们对在蒋后的游击战争的胜利，实际上是没有信心的，他们之所谓长期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可想而知了。因此“第二次撤退论”就不能不出来了。三个月前我到遂西区，区委书记还和我说：“那时候我们真是不知怎样好，大家都说，要第二次撤退呢！”谁也没有心机来做工作。丢那奶，为第二次撤退而斗争，边个肯去搏命呢！？究竟那时候是怎样搞的啊！”从这话里可以看出他们这种失败主义思想给予工作上的影响是如何之大。遂、廉等地工作的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不能不是拜这种理论之赐吧！现在他们是否已经真正认识到他们这种错误了呢？照我看，新华社宣布全国性战略反攻的电讯有点使他们手足无措了，收到这电讯以后一个多月，直至我离开的时候，还没有看见过他们对这件大事有任何的指示。下面的同志对于他们对这件大事之如此冷淡是觉得奇怪的，此时下面已在到处开庆祝大会，沈汉英同志在遂南召集了一个万余人的群众大会，群众兴奋极了，对敌人政治攻势也展开了，但等了个多月，还不见上级对此事有任何一句话谈及，怎么不令人奇怪呢？

第二个问题是主要是反左倾还是反右倾呢？林等传达了区党委的意见，对去年的工作是认为主要的错误是右倾的。那末，目前在党内应该是主要是反右倾了，因为以前的错误既然是达右，则这种右的观点影响于党内的思想是深的，正如走路已经向右走错了几步，现在发现走错了，一定是向他说“向右走是错了，”而不是说“向左走是错了。”然而林等的理论却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必须将两条战线的斗争主要的放在反左倾，强调反左倾，因为右倾是过去的错误，没有发现它的时候，他当然是主要的危险，现在既然发现它，它就不成为主要的危险了，现在最紧要的是提防向左倒。因此必须将主要的锋芒向着左的倾向斗争，使左的倾向不能萌芽”！钱甚至说：

“右倾是比较保守的，他只是不敢放手做事，发展得少些，放过些机会，但给党危害是没有左倾那末大的；左倾，不应放手大搞的时候就放手大搞，一下子就什么都搞光了，亡党亡头亡国的。”我当时就驳他，难道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对党的危害也不大吗？显然这是强词夺理，不能服人的。他们因为事先不调查，不研究，便胸有成竹，指定我们是左倾幼稚病，要把主要的锋芒放在我的身上，是先派定了我的不是才来打理由的，这末一找便不能不找出了这些右比左好的谬论来了。

我也不否认我们工作上有个别过左之处，但是否已经到了如此严重地步了呢？群众起来免不了有过火的行动，一些想法也常免不了幼稚，有些是我知道的，然而我宁可暂时纵容他。在遂溪有几个战士中捉到了两个俘虏，他们商量说：“押回去司令部一定把他放了的。化州敌人捉到了几多我都放了，遂溪的我却不让他放。”就这样，他们在路上把那两个俘虏杀了。这两个战士是错了，然而他是错得很自然很有分寸的。在东海，群众把战场上蒋军的遗尸都割破了肚子。那怨毒是多末深啊！这种情绪也反映到党内一些干部的思想里来的。但很明显的，它那时还不是统治党内的主要思想，除非承认温的“第二次撤退论”和林的“争取地主参加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就是左倾，不然，他们的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是没有根据的，他们这一套反左倾理论是不足辩的。

第三个问题是靠自己还是靠别人呢？有一个人很有力量的推动了林等不顾一切要到广西去，这个人叫做李济琛。当我反对立即冒险远征勾漏山时，钱说：“李济琛他们在那边潜伏力量是很大的，他们也是决心搞了的，但是我们不去，他们是搞不起来的，他们只等我们一去，就搞起来了，我们不去你说他们会搞得起来吗？”我回答他说：“那里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他有本领，他搞得得来，我管不着他，他搞不起来，那是他的事，我犯不着为他赔自己的本钱。”温二月初在港写给我的信，也提到李济琛的事，叫我准备和他们配合，并用括弧括起来说：“他们也已积极准备了。”温回来以后，谈起我已经用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司令的名义说：“现在就挂出粤桂名衔太大了，区党委大约有个计划和李济琛他们一起搞的。大约是准备公开用李济

琛出头，现在你用了这个名义，连广西也包进去了，将来他们用什么名义呢？”

他们这种观点没有更多机会表现，因为我们始终还没有碰到过那些同盟军。

大概全部的分歧，政治上他们比我右，军事上他们比我左，这是较合事实的。如果大家能虚心研究，是是非非，是会合作得好些的。温同志未回来的时候，高佬唐、沈汉英等同志曾拟联名要求不要再派温回来，我阻止了。我说：“人错了是会改的，我们是可能合作的。”我二月给温的信，也说“工作还是要我们做的。”我前后两次和温争论中大闹过，而每次都是我再找他说：“吵架还吵架，工作还工作，我们是应该再考虑自己的意见，把工作做好下去的。”这样，又和解了。最近，我写信给他说：“大家按实际办事，我们是可能合作的，我是多么要求这种合作啊！”半年来因为我们之间没有能够好好地合作，我精神上非常痛苦。尤其是有许多事件，我是眼见往错误上走而无可奈何的。我曾经对温说过：“我的情绪很消沉。”在这种争论中，我也是有错误的。我常用讽刺的态度来讲话，几次的吵骂都是我先骂起来的，当面骂，背后也骂，这就增加了弄清问题的困难。争论之初，沈汉英同志曾向我提议开代表会来解决，我没有同意，现在想起来，当时如召开这会，也许好一些。

温等争论的态度也是有错的，第一，既然我们之间有这样大的分歧了，为什么不把这些分歧全盘报告给上级，请求上级判断呢？交通来了那末多次，没有一次通知我将我的意见写出来，这是不对的。所有写给分局的电和信，没有一次是问过我，给我看过一下的，就算我真的如他们结论所说的“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军事上冒险盲动主义”，也不怕让我把意见向上级讲呀。第二，区党委叫我们停止对过去的争论，并不准将我的意见向下面传播，待以后再作结论，我既然同意这样办了，为什么我刚走了几天，便用地委名义发出检查半年工作大纲，列举分歧，在各地进行这种检查运动呢？发这个大纲和在各地进行这种检查运动，事先既未问过我一声，事后几个月也没有通知我，没有任何人对我讲过半句，这是为什么呢？在遂溪县委扩大会议上据说也

检讨我了，听说在廉江也召集过干部会议检讨我，事先事后都没有和我讲过。这些可能只是我的道听途说，未必是事实，但这次的检查大纲和在各地进行这个检查运动，不和我商量，不让我知道，就算我完全错了吧，难道这样就能把错误改过来的吗？第三，那末忙于做结论做什么呢？

我的思想是和当地几乎全体干部一致的，或如林的话是统治了全党的。而他们的意见却是没有一个人同意的。温同志未回去时写信给我，就抄了一段“我们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等话，他们究竟是怎样来怎样去的呢？在司令部直属队流传一句话：“二叔公一分钟想出二十几个办法。”在遂溪流传一句话：“二叔公对于任何问题，一定提出不同的意见的。”这两句话不十足描写出那种钦差大臣的态度来吗？

我以为林、温等的错误，有些是区党委要负责的，有些则是他们要负责的。

（八）我的错误

我以为我的错误主要的是组织上的而不是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因此对于温给我做的结论，对于其组织部份——自由主义，违反组织原则，不尊重上级领导，小广播，非组织的批评及因我这种作风而影响到党内许多个干部对区党委领导的不尊重，形成我个人的威信很高而区党委的威信很低等等结果。我是完全承认的，同意的，对于温等对我的组织错误这方面的结论，我不但现在完全同意，即在当时我曾声明接受，而且以后几个月，事实上我也相当改变了这种态度，我也告诉沈、黄、丁等，我以前的这方面的态度是错的，叫他们不要学我。当然以后也并不是没有再犯；但对区党委诸人的非组织的批评是少了的；《正报》及《华商报》的文章说刘、邓的南下只是以分散对紧缩，是反击不是反攻，主要的战场仍在山东而不在鄂豫皖。我看到了以后曾对遂溪县委一两个同志说是错了的；也曾写信告诉丁——因为他写信来问我。我曾经对沈说：“他们是听到反攻两个字就有头痛呢！”态度也是不好的，但这时期的态度和前一时期的态度也还是已经有了

区别的。

关于我这种错误，还在温未给我作结论而且他们还没有提出批评我的时候，沈汉英同志已经批评过我了，他说“你对组织上的态度是不对的，是违犯组织原则的。”这个同志，无论他也在看了方方同志的文章以后骂：“方方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家伙啊！”他心里也还是明白的，对上级不会真正有什么成见的，所以发生了这种错误的态度，一方面是在于在意见的分歧中的感情的冲动，一方面是由于我的自由主义的态度的影响。受我这种影响最深的高佬唐，他不但在许多工作作风上学了我，而且在自由主义这一点也学象了我：他是对我支持得最热心，而对区党委的领导批评得最烈的，其行动已有点近乎宗派；当然，他还不是有意识的。我知道他发起签名挽留我做司令员（那时原决定调我去四属）以后，曾经写信批评过他。当然，那时候我自己也还是那样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因此对于他的批评，也不全是很彻底的，他这件事，使我开始觉得我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危险。当时我曾对欧同志讲过，我曾经对欧说：“现在就来换我的司令是不好的，别人大概没有什么，高佬唐这个人最冲动，敢作敢为，他会闹起来的，先要想办法解释，让他改变了观点才好。”我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唐在南路当地干部中最有威信，化、廉、遂各地干部无不听他的话的，一搞不好，恐怕会招致了更大的不团结。我当时是很想来香港的，但我怕我离开后会闹得不好，我曾对欧说：“他们对温是很不满的，我在这里，他们自然推我为头，我不赞成闹，他们还是会听我的话的。我走了，怕他们一方面有点张皇，另一方面没有人讲得他们听。”后来唐牺牲了，我在廉江的时候，又曾和欧谈及，说：“唐已牺牲了，温、林等已来到了几个月，现在就是下面仍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大致上是不会闹出什么来的，你跟温说让我去香港吧，我到那边把争论的问题解决了才回来，或者我不再回南路，迳回中区工作。”以上这两次谈话，我都是要求欧向温等讲的，我说：“你是个第三者，好讲话些。”我不知他有对温讲过没有。

我讲出这些事实，不是想证明我早已把自由主义改正了，而是想藉此以见我的自由主义对当地党内的影响的实际程度及我如何从实际

中认识我的错误的。我对方、林的攻击，是始自去年九月温回来传达撤退复员的方针以后的，当时只是对温骂，还没有传播下去，影响不大。那时候批评我这种错误，我可能是口是心非——难道不该骂吗？因为这种态度在原则上之不对，我不是不晓得的，但一冲动起来，就会忘记一切；我之为人，热情有余，冷静不足，主观既定，是不容易为人折服的；因此，尤其当我认为我自己的意见大的方面对了的时候，对于其他，我就视为细节，虽或承认其错，但不会有决心去改的，事实上，这就无法认识这种错误的真正的严重性及其本质。我是每次骂了以后都自悔的，你们看了我上面所说每次和温吵骂了以后都是我再提出“讲和”，可以看到我当时的心情。我这一点也对温说过，这次和他分手的时候，临走了，我病着，把他叫在我的床上，对他说：“你有错，我也有错的；掌握时机，开辟局面，你不如我；日常工作，经之营之，我不如你；我们团结起来，是可以克服当前的困难，把工作做好的。去年九月以后，我们合作得很好，后来因为意见的分歧，大家都闷，也就形成了两人之间的隔膜，不高兴在一起商量，因此两人之间的个人意见就多了，这就妨碍着我们现在的合作。现在下面的同志许多都知道我们闹意见，他们见了你不敢讲话，这是很不好的，我希望你注意改变你的领导作风，一定要使他们敢于亲近你。你这次去化南，特别要注意这一点；他们因为过去高佬屠的影响，对你是有很多意见的，而他们这个时期里的工作也确实比别的地方好，他们是比较肯听我的话的，但我这次不能去；因此我希望你到那里，对他们要多鼓励，少批评，不要一去到就把关系弄坏，这样就不好工作了。”温说：“我们大家都是有点缺点的，这时期我们之间的关系很不好，你很闷，我也很闷，我看到你闷了，工作又如此复杂，我们两人又不团结，真不知如何是好。这种错误，主要的是由我的作风上的官僚主义来的，我这种作风，使你难过，也使很多干部对我都不好。我们过去能够合作，为什么现在不能合作呢？我是首先要作自我批评的。你现在病着，希望你好好养病，早些好了，我们再检讨反省。我们是团结起来的。”这一段话，可以看出我们当时大家都是真情流露的。这是事实的教训的结果。但经历了那么多的时间，影响到工作那么大，然

后大家才走到这一步，还是太迟了。这些，主要的不是温负责，而是应该我负责的；政治上的意见，我是比他对的，组织上的态度，我比他错得更多。他对上级的领导是尊重的，简直没有过什么非组织的批评，而我则在这方面是一一切都离了谱，在争论中，他很少发脾气，而我则经常发脾气，所有的吵闹，都是我先发火的。由于我对他的当面斥骂及背后批评，便更加助长了干部中的拥我排他的情绪，这就大大妨碍了我们之间客观地共同来研究工作克服困难的精神。在我方面就有你反对我吧，看有没有一个人拥护你？在他方面则自感孤零，对我也就不无戒心。大约他发出检查半年工作大纲而不对我说，是有这种心理的。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而不是普通的人，当我们一冷静下来想一想因我们的不团结而引起工作的损失时，我们就不能不闷，这是不能象我以前在家里和父亲吵了架，一跑出来就十几年不回去，断绝了关系，若无其事那样简单的。

为什么我懂得这种自由主义是不对的，但还不免时时犯呢？一般的说，当然是组织观念不够，党性不纯，小资产阶级意识，个人英雄主义等等，但我以为这还只是其一方面的表现。我在延安整风时也曾经检讨过这些，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是不知过的，然而总不能改，为什么呢？彭真同志看了我的整风笔记，曾找我谈过，他说：“你这个人，对革命是热情的，对党是忠心的，也懂得自己的缺点，但为什么又常会犯呢？我看，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如果你做事的时候，完全客观的，从各方面去想，从全面去想，深入去想，多想几回，就会及时发现错误，认识了错误，不会重犯了。”我显然是把他这种话忘了。古大存同志和邓发同志一次为一件事商量要批评我，古说：“老吴这个人，有些聪明，他不是不懂得那道理，只是他那种名士派头，自以为这些小事没有什么，因此你跟他逐条逐条慢慢讲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只有把他大骂一顿，让他回去自己想为什么这样严重啊！他自己就只好细心来检讨一下，真的把错误认识了，他就不得不改了。”后来邓发同志真的把我找去骂了一个钟头，我很难过，回来自己细心想想，也就只好真的下决心了。我以为现在我的错误，也正是以前的重复。当然，在我过去历史上也还未有过象这次这样严重的违犯组织

原则、组织纪律的事，这次可以说是发展了，那又是为什么呢？

第一，由于工作上的某些成就，本来一贯已经存在的自高自大的英雄主义的成份就增加了。为了证明自己的高明，很自然就会把别人谈得糊涂些。因此就出现了许多“方方过去在延安上大会讲话给人家嘘得下不了台”呀，“方方在延安的绰号叫小戈尔洛夫”呀等等的小广播。也说到“温这个人，过去我做组织部长的时候他做组织干事，我知道他一贯就是教条主义的”等等。

第二，由于独当一面的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和上级的关系很疏隔（这在我过去的工作历史上是未有的），许多事是自己在哪里独断独行惯了的，这就助长了组织观念的淡薄，产生了一种没有你的指示我也做得不错呀的心理，因而对上级的尊重就谈不上了。这种倾向已经影响到一些同志，如九月中旬丁给我一信说：“几个月来，上级没有任何指示，但我们……”他所指的当然是温而不是我。可见这种毛病，尤其是在分散的游击战争下最容易传染的。这种话，沈汉英同志是不会说的，因为司令部经常在遂溪。

第三，由于某些工作意见上的分歧，助长了情感的冲动。如我从化州回遂溪，第一晚见了欧，我问他区党委的意见怎么样，他说：“方、林的意见，平原地区不搞政权……”我听完了就骂！丢那妈，他们两个为什么不辞职呀，广东党由他们两个来领导，真是广东人民的不幸！”又说：“闷死了，现在我最怕的是三个人，第一个方方，第二个林平，第三个二叔公。敌人，几多来我都不怕，来了就打呀，打不死的。可是这三个人，他一个命令叫你解散队伍，你就只好等死了！”又如当去年温同志传达，说梁嘉同志说“一年打你不死、两年，两年不死、三年，三年不死十年，总把你消灭呀！”我拍着桌子骂起来：“丢那妈，叫他找个火柴盒子把自己藏起来吧！这样革什么卵子命？！”无论我的意见的正确与否，这种态度，就充分表现出我之不能冷静。因为这种冲动，使我逐渐增加了与上级对立的成见。为什么我那末久没有自己把分歧意见写到上级来呢？这种冲动所形成的对立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心里想——写去还不是一样，他们会接受吗？我也写过几次（现在还有一个原稿在那边）但写了以后，看看那语气太不

象话了，也就没敢寄来。这种对上级不信任，不依赖组织上解决问题的态度，也就增加了我们弄清分歧纠正错误的很大的困难。对林、温、钱三个人我都是当面吵闹过的，而且不只一次。我这种态度，实在也是令他们望而生畏的。

我这里只说出了促使我这种非组织的态度发展的环境，我并不是想拿这完全推之于客观环境造成（本来连主观的思想意识也是客观环境造成的），而只想藉以说明这个时期这种本已有之的错误意识为什么特别发达的客观的因素；因为本来已有这种毛病，过去一向没有彻底治疗，这次放在这样一个新环境里，便不期而然的一齐爆发了。这对我是一个好处，这使我开始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这个毛病的严重性，但其代价则未免太大了。

我是否对方、林同志有成见呢？是有了的，但并未至如传闻之甚。所谓我曾联络四属反抗区党委之类的传闻，是有点失实的。我对区党委当时的政治领导很有不同意见，是事实，而且不择场合讲了许多批评的话和小广播，也是事实，但总未至于要打倒方、林的程度。钱同志准备回来的时候，我曾要他回来把我的意见全盘向方、林说，并且请他代我说——我对方方同志骂了些话，这些话是骂错了的，但我为人如何，我希望钱根据他这时期对我的观察，给对方同志解释，我当时说：“广东工作无论如何也应该是他们来领导的，无论我此时对他们有过怎样的分歧意见——这些意见很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之误的，我也还是这样看法。不然，难道由我老吴来领导得通吗？”我不知钱同志当时有没有反映了我这种意见。我这期间里对方、林之所以有了成见，其实主要是由于此时没有正确的组织态度来应付此时的意见的分歧形成的。但究竟也只是临时冲动起来、粗野从事的多，存之已久、古已有之的成见还少，因为我不可能有那末多的现成的东西，我和方、林过去接触的机会极少，对于方，还可以说在延安看到了一两件堪作小广播的事，对于林，简直无所知，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也多说了几句关于小林的好话，去年九月，温回去传达撤退复员之后，他说牛哥说这个决定和五月的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我问：“小林的意见怎样？”他说“小林现在管城市工作，对我们这个系统的工作他是不管的。我

看他也有点闷气，我对他讲的时候他不愿意对我们的工作多谈”。我说：“他大概是不会同意这个方针的，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这又不是他管的，他现在只还挂着个名字在那里做区党委吧了。”以后在其他场合也讲过这样之类的话。我为什么特别问过小林的态度呢？因为五月决定的精神和九月的确是不同的，前者比较强调坚持武装斗争，而后者事实上是取消这种斗争的（如五月决定要各地主动出击，以进行自卫，而九月决定则是主张绝对不许主动出击，两者的根本不同是很明显的）。至于说区党委只有一个工人干部但没有被重视这话，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意思，讲小林是个工人，和讲他只是挂个名不是同一个场合说的，可能是听的人以后把它拉在一起了。在我则从来没有认为他是个工人又如何如何。我希望不因我的错误引起任何其他误会。

南路地方干部这期间里的非组织态度的错误，也是由我影响的，希望不必对他们责之太甚，因为他们现在即使态度如何不恭，也还未真正成为成见。看遂溪县书沈汉英同志自己也骂方方同志，但他仍批评我，可见一斑。他们都是从未离开过南路的土包子，都是有些土粗气的。在工作中积极热情，舍死忘生，好处总比坏处多得多。即使就对组织的态度而言，他们也还没有闹独立性闹到违抗命令——平原不搞一面政权，他们是不同意的，但也奉命停止了；立即去广西，他们是不同意的，但也奉命把部队调去了。他们对温同志，原来是有了积之多年、数不胜数的意见的，然而以我所见，他们还没有任何一次公然违抗温的命令。我希望能从多方面来了解这些同志的本质。目前要解决这种不团结的现象也还不难，一方面，要从政治上、军事上使得双方思想一致；一方面，要从我起作自我批评。这些同志是容易接受批评的。

（九）倾向

我们也有过左的倾向，记得我在四月给方、林的信里已经讲到有这种萌芽了，但那时大多数还只是群众运动初起时的一些必然的过火现象，即还未超过矫枉必须过正的限度；林、钱来后，我也承认我们是有些村过的，我只是不同意说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过左的倾向，第一是表现于三月间计划从化北入桂与合灵部队会师于廉博之间，打开那一片山地的大计划。如果说我有军事上的冒险盲动主义，那末这个计划可以属于这一类。但这个计划是刚行了几天我们就自动修改了。即，完全把原来的计划停止而另定了一个分兵发展的计划了。打下中 可以说是当时我们集中打局面的攻势的最高峰，这个圩，是我们攻占的最大的一个圩，这个仗也打得最漂亮——几小时内，用强攻占了敌人的堡垒，敌全部就擒，而我毫无损失，此时我们的声势最大，锐气最高，然而我们没有冒险向广西前进，立即全师而归，实行分兵。因此这个冒险的计划就只是个计划而未有成为行动。在中 之战后我召集的干部会议，第一段话就说：“我们原来的计划错了，是主观主义。”我不是不承认我的错误的。但因此而说在此以前集中兵力扫荡敌人十余个乡公所（包括中 ）这一截也是错的，那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当时几乎是毫无损失的情形下把上述任务完成了，化、廉的局面也确因我们这种乘虚而入的行动打开了。但由于我们的军事知识很少，由于我们初期的胜利，由于敌人暂时的张惶失措，因此就产生了我们的贪功之念，因此才有继续集中大兵向广西游击二十天至一个月然后分兵的计划。如果我们不在执行中自己时时警惕按实际修改了它，继续依计而行，是可能撞板的。这种冒险主义的思想，在我们的脑子里不是没有的，但它不是我们的基本思想，而只是个别时候、个别地方的一时的倾向，这是要说明的。

第二，虚张声势有时是用得太过的。边区委员会的名义是可以不必出现的，虽然我们始终没有用这名义出过任何文件，而只是在县长就职布告中提及过它；但这是可以避免的。不仅因为拿出这个名义来增加了敌人的注意，而是这个名义拿出来没有什么真正是以增加我们活动的便利条件。县长是要委出的，专员以后也是要委了的，因为这些都是当时的斗争中确定了它的实际意义的，但边区委员会则是迟些挂出来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这和司令部不同，司令部是不能不早点挂出来的，因为事实上要它来指挥，而且要他来号召。打开了化南以前，我还是没有自称司令的，只是自称为司令部派来的代表，但因我事实上是指挥着他们的，上至干部，下至士兵，他们就只叫你做司令

而不叫“代表”。后来张启彬（张炎的侄）上呈文来要发委任状，这样，我们才赶着连夜刻印，制委任状，我这个司令才不能不当起来了。可见司令部招牌的挂出来，在事实是需要的。有些县长的委出，如茂名是过早的，因为它当时只因为军事上的缘故，想藉这样来虚张声势以牵制、迷惑敌人，但收效也不大，因为我们在茂名的活动还少得那末可怜。茂名县长的委出和东海区长的委出还略有不同，在东海，我们是以相当的兵力过去，搞的声势也确大，而且牵制敌人的效果也很大的，而且在东海是不需要再搞什么大的武装活动来控制它的，它是个在军事上毫无作用的孤岛，茂名则完全不是如此。海康县长的委出也和茂名不同，委出海康县长时，我们是集中了近千部队下去的，虽然，半途回来了，但声势总不同，而且我们以后还有过两次数百人的兵力下去游击过两次，现在我们也还控制了该县的一些地方。

第三，肃反政策已经有过左的表现了。开始几个月是没有的，那时候也杀了一些人，可是还是运动初期必需的镇压，还没有怎样超过限度。有些则是一些群众性的报复行动，但也不是很普遍。有些小特务甚至只是嫌疑的特务分子，常因为捉起来后用了肉刑，在游击战争中无法安置（没有监狱）也就杀了。不过初期这些为数不大，不普遍。下半年以来，敌人的扫荡愈残酷，特务活动也愈厉害了，因此我们的肃反政策也就愈往左歪。这以化州最烈，因为他们那里斗争更尖锐些，农民的报复性反映到党内更严重些。听说化北山底的群众经过七月那次的大扫荡后，群众损失很大，非常愤恨，因此只要有生面人进境，就一定捉起来，如没有当地肯保的，就都杀了。我这是从在那里回来的伤病员的口中听来的。又八月间丁给温的一个报告，说他们在月余以来，杀了百多个特务，破获了二十五个特务站。我曾经叫温写信去叫他们不要乱杀人。我留遂溪养病的时候，也写过一封信给丁讲到此事，向他提出了“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句话。我曾和沈、温等都谈过废除内刑这件事，但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是不易做得到的，因为有许多实际问题是难以解决的：一、我们不能有什么地方可以把犯人看守得很周密而不时时流动，能使我们有可能做较长期的审讯与教育工作。二、我们没有专门的侦查机关。因此，各地就都有滥捕的现象，

看看可疑就捉了起来，捉起来就用刑，用了刑以后，供与不供，便都不敢释放了。我在遂溪养病的时候，曾叫沈调集十余个经过挑选的干部士兵，组织个专做保卫工作的训练班，和我住在一起，一则可以借他们就近保护我，二则我可能藉便训练他们。此事因环境及我的病势不许可没有搞起来。我当时是想，有了这种专门组织，可以使我们这一门工作科学些，不致如此原始，滥捕的现象也会少些了。要把肃反工作搞好，这个专门部门的工作的建立是必需的，不然，捕风捉影，严刑峻法的现象，实在很难避免。象化北山底那样，群众自动起来站岗放哨，拘留生面人这种精神是好的，这说明群众已比切身的经验中体会到反对特务分子的重要性，已经对这个问题自觉起来了。化南的现象大概也如此，但没有专门机关的协助与科学方法的指导，这种群众的自觉就只会流为农民报复性的单方面的镇压，一定会过左的。我因为自四月以后就没有管理过地方工作，这种材料，知道得很少，也没有机会加以研究，而且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最缺乏。不过，这种倾向我是感觉到的。

群众起来斗争渐趋尖锐的时候，杀多了几个人，甚至杀错了一些人这种现象，常常也是难以避免的。不过我没有及时加以注意，林、温等也没有及时注意，而且如不能拿出办法来，则这种倾向还是会继续严重下去的。这工作不象俘虏政策那么简单，是要多花些脑筋的；初期我们的士兵乃至下级干部也有杀俘虏的现象，但当时我没有处罚他们，以后这种现象逐渐就没有了，因为军队的政治教育与军事活动的经验，是容易使士兵了解优待俘虏政策的需要的。而在地方上分散的反奸斗争，则是没有这种方便条件的。

化州分区的对待逃兵的政策也是过左的，大约是四五月间敌人大扫荡时，他们为防止在敌人扫荡下的逃忘现象，曾宣布逃兵枪毙的命令。七月我经化南时，曾叫丁修改这个纪律，与一、三等团一致为拖枪逃跑与组织逃跑者枪毙；一般的逃兵则只罚做苦工、监闭等，未知他以后改变了没有。逃跑者杀这一条在某一特定环境、特定时期是有些作用的，一般的行起来，也必然演成滥杀。化州一般的军纪是定得较严的，杀人也滥些，不过不能因此就否定了他们对的一面，他们的

军事纪律是建立得最好的，已有令出必行的气概，这种气概，在革命军队里很宝贵。今年正月，我们就开始强调建立军事纪律，因为过去南路解放军的历史与以后潜伏的游击小组时期，对军事纪律是很不重视的，群众纪律很好，但打起仗来，你叫他东，他偏向西，官不象官，兵不象兵，对于上级命令，马里马虎，可行可不行。这种情形很使我们伤脑筋，因此在化南就开了军人大会，宣布了军事纪律；在执行这种纪律中，当然也杀了些人，这些人是应该杀的，不能和肃反的过左倾向相提并论。如今年五月间在化北枪毙了山底区中队长董尚英，这个人，不只应枪毙一次而应枪毙两次，因为当时在敌人集中扫荡下，化北大队长命令他率一个连分散出去牵制敌人，他不执行命令，走了几里地，到天亮的时候又跟回来了，跟着就发生了战斗，他和大队部断了联络两天，他就自己下令把全连遣散，枪枝埋藏了，这一个连是给他这末一下就搞垮的。这两条，按当时公布的军纪都是死罪，尤其是后一条，那是我们鉴于过去两三年来无数次的自动下命令解散队伍的情形特别定了下来，三令五申了的。歧岭寨战斗，我们枪毙了两个临阵退却的士兵，其他多次的战斗我都是叫人用驳壳押住那些畏缩的往前冲锋的。这些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真正能够战斗的队伍所必须的，不能算是滥杀。问题是在于我们的政治工作没有能够配合这种军事纪律来做，或做得很少。

(十) 写在后面

这次南路举事，将及一年了，其成就离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远。我们目前的地区还很窄，武装还不大。我当初是没有想到在这个期间内在化、吴、廉边这些地区已经建立了如此“象样”的规模的，但也没有想到这末久我们还只是在这几个县里兜圈子而没有能发展到更远更广的。如对海康、徐闻，我原来的计划是要在一年内把它搞成象遂溪那样普遍的，而且计划把徐闻山地做得比遂溪还巩固；阳、茂、信、电，我是计划在半年内发展至五百人，一年内发展至千五百人，控制六潭山地的，桂南、廉、博、合之间的山地，也是计划控制了它的。但目前我们在这些地区的成就，显然是离计划太远了，有些甚至未能

开始。今天我们来检讨这种情形，我以为不是我们的原来计划根本是主观主义的，而是我们曾经放松了发展的机会。敌人对南路的兵力是逐渐增加的，当我们开始分兵发展的时候，敌在南路外来兵仅有保十总队一个团的兵力，这个团是被我们打败了几次，颇有损失了的，此时它正全部被牵制于化州。此时如坚决实行分兵发展，发动群众，发展的条件仍是很有利的。保九总队来了以后，不久又来了九二旅一个团，以后很久才又来了独二团、保二团、保一团。我们是应该步步棋都比敌人先走的，但我们都自己走慢了。集中入桂走错了第一步，于是以后的棋法便乱了。四属方面的发展没有能够配合得起，使敌人得以集中兵力来对付化、廉、遂（四属方面一年以来只牵制敌一个保安大队，一个时候连这个大队也曾调回廉江来），这也是我们很大的缺点。南路这次举事比其他地方早，也较突出，其吸引敌人的兵力是意料中的，然而就是这样，这一年內，南路的形势，仍应当是继续发展而不应当是停顿的，就是在现在，只要我们办法搞得对，我们也还可以继续发展，以我的估计，仍可以半年之內获得一倍的发展。地盘扩大一倍，人数扩大一倍。而敌人在半年內是绝没有办法增兵一倍的。不过，就算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南路与敌兵力的对比，也仍是敌优我劣，不但配备比我好，人数也还比我们多。但到那时候，敌人将被迫更分散，因而我就更有发展的可能与一步步削敌之可能。

我的意见，要实现这个计划，应该是：

第一，要实行土地改革，使我们的斗争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性质。我们目前活动的大多数地区已经是立即可以分田的了，在预定发展的新地区也必须拿这个政策作动员农民与组织农民的武器，无论在什么地方，农民接受我们这种政策是比接受其他口号更快更积极的。地主当然会更积极反对我们，但目前已经大部地主都反对我们了，尤其是分粮，在地主看起来实际上也是分田了；地主的政治眼光比农民快的，他们是知道是今年不分明年总要分他们的。目前要采取较温和的政策也不容易麻痹地主了，这是和年初的时候不同了，不但我党的土地法已经公布，就是全国总反攻的发展与我们这一年来在广东各地的斗争的发展，已经使地主都惊心动魄了。如果不分田，地主由于他们

这种早已警惕，可能比农民先走一步；如果分田，则农民会跳起来，地主是赶不上的。我不是说我们要跑到广州湾近郊来分田，而是，我们要扯起大旗，写上这末鲜明的口号，到我们能发展的地区去做。这个政策一提出，许多作风会是不同的，气概是非常大的，群众自发性的斗争与闻风响应的情形和目前当然也会不同的。在农民中的秘密活动也会更有基础的。跟着明年全国性反攻的发展，这个口号对农民的动员就更为有力。

第二，仍然是实行分兵发展，必须确定在半年以内，分散活动是极主要的，集中作战是极次要的，暂时的，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得更大更阔，才真正能够取得主动。在半年内仍不要想建立成功任何巩固的根据地，也不想以集中兵力来粉碎敌人的主力。停止建立全区性主力兵团的想法，这事等再过半年再说。目前我们无论如何集中，也没有办法对三四百人以上之敌（尤其是其主力）作歼灭战的。我们要极力避免任何较大的战斗，一定要做到小敌则打，大敌则走。我们目前的情形和过去内战时中央苏区的情形是不同的，那时中央红军是运动战而我们现在的则只能是游击战，虽然原则相通，但总不是一样的。只有把游击战争搞得更普遍，把蒋的下层保甲政权及其武装摧毁得更多，农民动员更多，我们的力量就大了，敌的主力才被迫分得更散更孤立了。那时候，即使敌人仍然有四个团或更多两个团在南路，而且我们还没有歼灭其任何一个团甚至大队，敌人也是无法挡得住我们的发展的。自然，我们力量更大了，敌更分散了，我们就更有条件集中歼灭敌这些被分散的主力，那时再来摆布也还是不迟的。

第三，钦廉、中区方面的发展要和高雷配合起来。这以后半年内，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可能较高雷的速度快的，以现有的条件看应该如此。

第四，要舍得从旧地区抽出干部去新地区活动，让它影响，旧地区工作有了相当损失也不要紧，大概是垮不了的。一定要从化、吴、廉、遂等地抽大批干部出来，不但是上层的，而且也要更多的下层的，初级的，不但要知识分子而且要农民，党的与非党的，一定要多，要办干训班，这干训班不是为了训练出来巩固旧地区，而是为了发展新地区的。同样更主要的是发挥干部的创造性，放手让他们搞，搞错了

不骂，鼓励勇气，务期造成一种蓬蓬勃勃，敢作敢为的朝气。这样，一个人可顶十个用，办法也层出不穷了。

照我的想象，半年之内，可以在信、电、茂、阳之间的山地创立一个新的游击中心，有二千以上的武装，其为我控制程度略如今天的化、廉、遂等地；雷州半岛的中心将移至海康、徐闻，化县的中心将移至化北；廉江的发展将深入博白、陆川；四属方面，可以做到实际控制这四县的一半以上乡村，并在桂境内取得若干发展。武工队式的活动可能普遍于高雷钦廉全境。旧地区做到已经分了田，新地区开始分田。这样，配合着各地的发展与全国反攻的胜利，我们可以做到在解放军主力来到之前，我们就实际控制了全区大部分的乡村，而把夺取城市的任务，留待与解放军主力一起来做。

以上这一段，只能说是我的希望，还未能作为计划，因为它太简单了。在实际中究竟如何做，一方面希望由于我这个报告得到上级较详细具体的指示，一方面，还要待以后在工作中根据变化着的情况修正。譬如半年内不集中行动，这可能不久就不合实际的，如半年内反攻军竟到达华南了，情况就显然不同；如半年内我们的发展速度较快，其他各地更快，甚至迫使敌不特不能增兵南路，甚至还要把现在南路的兵抽走一部分，情况也不同了；或者为着发展的需要，我们亦已具备了条件，必须作主力转移，那也不同了等等。总之，这一段话，连我自己也觉得它是不成熟的，粗造的。

关于建立粤桂边区的军事方案

——应以云浮山脉为主要发展方向*

(1947年12月) ①

甲、发展方向

(一) 方针：为建立粤桂边区，我以为今后南路的工作，应以云浮山脉为主要发展方向，以十万大山为次要发展方向。待这两个根据地创立之后，再各以主力共同向勾漏山及大容山发展，会师于桂东南，创造粤桂边区。至于留置高雷等地之武装力量，仍应以小股游击队及武工队分散活动，坚持老地区的工作，发展力量，壮大自己，配合主力，以期最后整个解放粤南。

理由：为什么要以云浮山脉为主要发展方向，以十万大山为次要发展方向呢？

首先就战略形势来说：云浮山脉绾毂、两阳、三罗、四邑及高州五属进可攻，退可守。南下可腰击粤省西路陆上交通线并进逼茂名、湛江；北上可横断西江水上运输线，威胁肇庆、梧州；东出珠江三角洲，可附广州之背；西进浔江南岸，可席卷桂东南，是一个四战之地。至于十万大山，则位于粤越桂边境，虽进可沿江东下，解放瓠江两岸富庶之区，退可同守山地，仍置瓠钦、瓠龙两路及南宁于我威胁之下，但因偏于一隅，较之云浮山区，其重要性稍次一等。

其次，就地理形势来说：云浮山脉是西江南岸重要山系，叠嶂重峦，形势险要，且与粤桂边境云开大山及桂东南之勾漏山、大容山相

① 年、月是整理档案时确定的。

连，形成大片绵连不断的山区，使我有广大活动回旋的余地。十万大山，亦极险要，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但南限于海，北阻于江，一般说来比较缺乏广大回旋的优越条件。

再次就经济条件来说：“西江南岸，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水陆交通辐辏〔方便〕，如果工作开展得好，可以打下雄厚的经济基础，十万大山则比较贫瘠，人口稀少，物产不丰，缺乏优厚的经济条件。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的主要发展方向，无疑的应选择云浮山区，但由于十万大山仍然具备攻守两利的条件，且该方敌人力量较弱，便利我之发展，故仍应选择为仅次于云浮山脉的根据地。将来邕江两岸（永、横、贵）等地的开辟与经营，尤其要依靠该区力量。

乙、发展步骤

（一）云浮山区：首先应在山区及四周乡村广泛建立各种形式的大小据点。打开局面之后，应留置一部分力量在原地继续巩固工作，发展力量，使之成为坚强的根据地。主力则应四出分散活动，向四邑、三罗、茂信及勾漏山扩展，继续开辟新地区，最后则按情况，以主力打开桂东南，与四属主力连成一片。目前，我东进主力，已在两阳开始活动，以后应有计划的向北向西发展，创立山区根据地。

（二）十万大山区：首先应以主力经营山区及珙龙路以南地区，使之成为开展四属工作的重要根据地，然后将主力挥戈东向，推进至合灵及珙江两岸开展工作，最后则按情况的需要，进入桂东南，与云浮山区主力会师，把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在我西进主力配合钦防地武开创十万大山根据地之同时，合灵地武应特别注意向珙江两岸（尤其是横县）发展，设法将散落在民间的大量武装（尤其是数十挺轻机）组织到我们的领导之下，不要落入反动派的手里。

（三）高雷平原地区：我主力部队大部转用〔移〕到新区去后，留置下来的武装，首先应以小股分散活动方式，坚定老地区群众信心，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的抬头，为保存与巩固原有基础而奋斗，并积极发展力量，壮大自己，待到敌主力分向我新地区（山地边区）进攻时，应乘敌空虚，积极活动，截断敌之后方交通，并威胁其后方基地（如

湛江、茂名等），以援助我新地区部队的反扫荡战斗。以后如情况需要，在我东西两部主力进入桂东南时，应极力展开对敌大据点的佯攻，以牵制敌人，或派出有力一部北上协同作战并壮声威。

丙、发展方式和要领

（一）根据目前敌我优劣形势及为避免过早刺激敌人，招致敌人的扫荡围剿起见，我之发展方式，仍应以小部队分散活动为主；但不放弃在有利条件下集结主力消灭敌人。

（二）一般的应避免打敌之保安队，而要集中力量，消灭敌之地方反动武装，但不放弃在有利条件下与敌保安队作战。

（三）严格遵守毛主席“每战必须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的原则，与敌保安队作战时，我应有五倍以上的优势，与敌地方反动武装作战时，我应有三倍以上的优势；但地形、敌情及其他条件有利，而我又在必胜把握时，则虽未达绝对优势亦可行。

（四）因此，我们必须改善各地情报工作，切实掌握敌情，以伏击战、袭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尽量避免与敌主力打大仗，尤其禁止与敌“扎住阵脚”拼消耗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我们有的是广大的地区，应高度发挥游击战的机动性。

（五）依据过去经验，我主力部队到新地区开辟工作后，应不待敌主力部队前来围剿，即留置若干短小精之游击小组和武工队在新区，而将主力迅速秘密转移到另一新地区活动。这样做，其利有三：（1）可避免与敌主力打大仗；（2）我处处立于主动，敌处处立于被动，迫使敌人处处追随我之行动，久而久之，必可使其疲惫，造成我“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良机；（3）可到处放种，到处发展，到处生根，并使敌人无法集中扫荡，使新区人民免受摧残，以致情绪低落。这种形式，今后应为我各地部队之主要活动方式。

（六）积极实行部队整训工作，依据分局指示之“三查三整”方针，并参照解放军整训经验，积极提高干部及战士的阶级觉悟与胜利信心，并应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与机会，施行四大战斗技术的锻炼，以提高战斗力。对一切非党武装及土匪部队，应大胆加以领导，

或和他们取得联系，但应注意整饬他们的纪律，不准他们侵犯人民的利益，并积极争取对他们的教育与改造，使之逐渐转变为人民的武装。

(七) 把收缴得来的地方武装，武装青壮贫雇农，用各种形式组织民兵，以担负肃奸、镇压当地反动势力及支援我主力部队作战之任务。

(八) 积极开展各地群众工作和党务工作，随时随地发现积极分子。大胆培养和提拔他们，使之成为群众领袖，并吸收他们中的优秀份子进党里来，使我主力转移之后，他们在游击小组或武工队的支持与帮助下，仍能坚持并发展当地工作。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 茂电信两阳指挥部招兵布告（粤字第□号）

（1947年）

照得如今嘅百姓，	受苦捱寒饿死人。	万恶皆由蒋政府，
大小官员好贪吞。	征粮未了又征税，	还要下乡拉壮丁。
卖国换来美军火，	揭我人民打人民。	内战至今九个月，
蒋军败了百万兵。	投降过来三十万，	调转枪尖做好人。
蒋军就是运输队，	送来军火数有匀。	南路蒋军同一样，
一败涂地无班兵。	那些保安自卫队，	拉来做味无用神。
蒋家天下摇摇动，	不久将来一定崩。	大家若想做世界，
赶快起来当红军。	无论贫穷老百姓，	无论读书识字人。
若是蒋军官兵等，	拉枪过来更欢迎。	中央军里纷起义，
第一英雄高树勋。	打倒老蒋反动派，	我的穷人得翻身。
今年胜利新世界，	大家就有田地分。	

附招兵条例如后：

一、组织五人有枪者委班长。二、组织十五人有枪者委排长。三、组织四十人有枪者委连长。四、有枪带来最好，徒手参加也欢迎。五、官兵待遇平等，衣食足，熟烟够。

此布

指挥官 黄丹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月□日

南路武装情况

(1947年)

一、部队情况

(一) 化县区：1. 化茂边大隍山新区部队二十余人，经激战一日，被打垮埋枪，只数个干部转移别地，乡民被杀五、六个，被捉十余人，地区阵地大受摧残。

2. 化北部：三十余人，没有作战被瓦解，领袖被捕杀，队员被捕三人，队员自首十余人，地区阵地全失。

3. 化中部主力队五十余人（其中有二十余人曾坚持过二年），过去主动攻击敌人，四次击退K军，士气高。但于K最后一次进攻时，干部则动摇逃跑解散，埋步枪二十余枝，机枪一挺被敌起去，二人受伤，随着敌迫自首与交通员被捕火供及无干部关照而致队员、复员人员自首者数十人。

4. 另有一队队长陈球因离队（只带二个兵）而被包围牺牲。

5. 另一个小组三人不听群众意见劝说要离开而被包围，二个突围，一个被捕叛变及带兵捉二个老农民党员枪决。

6. 化南农村二000人口，每月担军米一五00斤，并有枪有壮丁，都会参加部队。

①化南原有一百五十人，经过整编复员后尚有六十至七十人，十月初被大扫荡，但K自误冲点，致我无甚损失。

②化南自首小队长一，并作奸细，一个中队级干部携手枪自首（过去是积极的），我政治大受损害。

③一个交通站被捕叛变，致十余被捕自首。

化州共计损失：（1）被捕二十余，连群众被捕的近百人。（2）

牺牲十余人，被迫自首的六十余人，干部自首二人，干部牺牲二人。

(3) 损失长枪七十——八十枝，轻机一挺。(4) 几个地区被摧残。

(5) 一个交通站被破坏。

(二) 遂溪区：损失较少，因K军要调动，只南、西区被剿。

1. 南区一个村庄保甲全体被捕后释放，另一村庄被捕十余人，其中农民同志四人。

2. 西区牺牲一个优秀的队内同志。

(三) 合浦区：南部公馆、南康一带，我集结百人（收编土匪部队在内），土匪首领被捕牺牲，这队伍也瓦解了，还有一个区级负责干部也被捕，生死不明。

(四) 灵山区：黄文法部五十余人，被激战竟日，黄文法牺牲，相当损失，大队被打散，其余各队不详。

(五) 廉江、茂名、电白地区：

1. 廉江四个暴露同志被捕。

2. 茂、电队原有五十余人，中有三十余转移山地，其余留下在茂南坚持原地区，因失领导及不断受扫荡，负责人把队伍解散及埋藏枪枝。

二、目前实力状况

目前存：七〇〇——七五〇人。

计：遂溪一一〇人

化县一二〇人

廉江七〇——八〇人

茂名三〇——五〇人

合灵三五〇人

钦州二〇——三〇人

防城一九人。

有战斗力的：遂溪三〇——五〇

化县三〇——五〇

廉江二〇

合灵一五〇

三、七月至九月

(根据区党委五月指示)

1. 于七月遂溪、化州各集结百人，各建主力五十余人。九月底遂溪集中二〇〇余，化县三百余，廉江八十余人，茂名六十余人，并且调遂溪主力到化，与化队会师准备袭击化县城的军械库。

2. 方针：自卫原则下主动出击敌人，镇压反动，保卫暴露地区及积极开展新地区，建立长期坚持据点。

九月吴改为扩大集结队伍进行推翻K政权，建立队部政权。十月底始据区党委指示精简、掩蔽、分散活动。化、遂各留百人左右，分武工队、游击队、主力队三种活动。指出不应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发展新山地基础。强调区党委的“复员、避免”方针的错误，并指出区党委对武工方针是不明确，是消极的朝向复员方向走，使干部右倾危险，使干部苦闷，因为区党委限制他们的活动和发展。是上消极的隐蔽？不敢接近群众，不揭露K罪行？与过去大刀阔斧、敢作敢为的作风不同，因而不战而瓦解或埋枪，或被捕牺牲及自首，士气低落，无信心坚持，被包围而不坚决突围与自卫战斗，大受损失。在我离开南路时他们已进行广泛动员参加部队，组织部队，把前一时期隐蔽的都暴露，隐蔽干部都要暴露了。加遭K军围剿，被捕牺牲很多，现化州党无法整理。

关于南路战略据点的地理和经济情况

(1947年) ①

南路整个地理形势，已在上面作概略的报告。现在根据形势的客观条件，假定南路的战略据点分为中心的、侧卫的三个地区，那三区是：（一）中心的，以化县和廉江之北部一带山地。（二）侧卫两个区：左以茂名之东北部至信宜北部之一带山地；右以合浦东北之山地迤邐而北，而西，连接灵山、防城之十万大山为止。从这三个地区由东至西，构成一条曲线的犄角形势，更向南北两面展开，可成为一个面。

兹将各个区的地理、人事、经济略为说明一下：

（甲）中心区：东由化县东北之那雾、合江为起点，沿着绵亘的山脉至廉江之西北部青平圩止，成一个锯形，由东至西约二百余华里，自南至北，阔狭不等（北连广西之陆川、博白山地，南面平原、岗陵地带）。

“形势”：这区内多径形谷地，山脉绵亘，水田足以自给。内有两河流：一、罗江：经那雾、合江，纵贯化县，南流出海，冬天可徒涉，春、夏、秋三季可行驶载重万余斤之木船；沿河两岸，人口稠密，区内多竹、木，山势斜度平急不等，大都可以超越的。交通道路，多属小径，各入口处多隘谷，前面平原或岗陵地。二、石角江：起源于广西，经石角圩迂迴县属之吉水圩、石岭圩入安铺市出海。经常可行驶载重一、二万斤之木船，下游颇深，上游冬季间有渡口可徒涉。沿岸人口稠密，水田亦多，粮食可自给。山间树林颇少，间有小松林，山势斜度颇急，如著名之仙人嶂、灯草岭等不易扳〔攀〕越，素为土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匪巢穴，区内多碉堡，祠堂、庙宇甚多，差不多每村都有一样的公共建筑物。

区内圩场颇多，每圩相距不过二、三十里，惟大圩镇颇少，除化县北部之中、合江、中定，廉江北部之石角、塘蓬、石岭、青平之外，其余均二、三十间铺屋之小市头。

“人事方面”：乡村势力，建筑在大氏族，大氏族的权力集中于一、二族老或土绅士之手。凡所谓族老、绅士，大都从地主脱胎的，即所谓有财则有势，故做了族老式土绅士，那发财的机会又更多，如操纵尝产，利用尝谷放高利贷，收息中饱，更有浮支滥帐，藉故贪吞、勒索佃户批头，剥削弱房丁胥等等。而其他的弱房父老，亦不能分其杯羹。由于此，构成每各大族内之矛盾，当有人领导各氏族的弱房子弟，用民主的力量去清算那独裁独占的族老和土绅士的旧帐，则更容易触其自觉，进而至民主运动的斗争。

查该区最大的氏族，如合江的黄，中的刘、傅、张、李、陈，石角的李，塘蓬的黄、罗、林，青平的曹、罗等族，均为垄断地方的恶势力者。除他们族间有矛盾之外，族与族之间也有矛盾，由于他们分赃乡政不平均或霸占无契税之荒山的界线问题，或风水的“旺杀”问题，时引起纠纷，间有至诉讼，但械斗很少。

“文化与教育”：这区内教育颇发达，各族的乡村都设小学，间有中学的。学校经费均由各族尝产拨充，学生很少需缴学费读书的。

或因交通关系，一切文化仍保守在封建的形式范畴上，如青年人对所谓“入孝出悌”的成训，守得很牢固，尤其是男女界线更划得严格，甚至普通的宴会、访问等场合都有他特定的仪式，倘有一位洋博士入到他们的场面，未懂得他的例规，都不能博得他们的看重，但他们——绅士阶层对K政府已表示敢怒而不敢言矣。

“经济方面”：那地区的贫富阶级很悬殊，凡地主必兼任债主。农民的负担租额甚重，大多在十五分至二十分之谱（如一石种田收谷租十五石者为十五分租），贷息大都六分至对倍（如借一石还一石六斗者为六分，一石还一石者叫做对倍），农民除批耕外，以砍柴烧小炭为付业。自公路破坏后，间有出门当脚夫。

这区土地不甚集中，但粮食完全囤积在地主手上（如租谷债谷）。但近来恐有侦查囤积，大都密囤于他们的耕丁（佃户）家里，耕丁们只有替他们囤的义务，无囤仓的报酬。

“人民情绪”：人民对反对政府的抽丁、征实及绅士们的压迫，已蕴着将爆的火，由其南路起义后，更促进其自觉。据知道的，在该区里动员起参加斗争的农民已不少，地主、绅士亦颇知大势所趋，除少数甘为K的鹰犬外，大部份都作骑墙态度。

“对该区工作的部署问题”：根据上述的人民情绪，动员他们起来不成问题，但仍采取过去消极的动员方法，恐难配合时间的需要。我们意见，应派武装部队辅助工作的展开，同时，要提出人民迫切要求的口号，如：“有冤报冤，有仇复仇”等等之类。并明白颁布联合政府组织的办法，使开明的绅士明了党的政策，上层统战工作要普遍展开，争取绅士、地主的不逃避（据传南路现在凡我们势力展到的地方，绅士、地主都逃到城市去）。同时要建立秘密基本干部，在K军进攻扫荡时，仍能保留在乡工作的画星，改变过去“只为播种而不生根”的浮面工作作风。政权应采取公开，作邻区的示范，同时使区内的中间分子了解我们的做法。

左右两地区的说明，未有详细调查，无法作具体的报告，仅附上两页地图及简单注密。（原文无附件——编者）

一、战略根据地（桂南与粤南）

十万大山区战略根据地似以建立于防城为宜，而在防城则以大直为适当，其理由如下：

1. 防城在粤、桂西南边境，与越南之海宁省相邻，顽军不可能以军力进行夹击：顽军不可能绕道越南从后攻击防城，且十万大山分隔防城与广西之一段，势非大军可能行动者；此不第〔但〕山路难行，实以稍一露风，我人民武装事先埋伏通道隘口，一批人带备三内枝机枪便可令彼一两团人马片甲不回。故桂军从来进入防城必经钦县（从广东来之军队也必经钦县）。

2. 防城依山临海（东京湾），与是区各据点联络固易，即与雷州半岛、海南交通也殊不难，兹向防城海岸渔盐船只多已接受人民武

装指挥调度。

3. 防城民间枪枝子弹素称之足（依据一般估计，各类枪枝约近一万杆之数），历年来也不乏私造枪枝与翻装子弹之徒，且接近越南，购置弹药器材与卫生器材也复易了。

4. 防城山地多，平原少，因而乡村疏落，万一顽军集中强大军力克通过钦县进入防城县境，则每一乡村山头，彼俱须集中兵力使用，断不敢分兵并进；人民恨顽军刻骨，不为之报告人民武装行踪固不待言，即其粮食已无从解决，裹粮深入势也难在每一山地乡村停留五日以上，何况千里裹粮正兵家大忌，是必师老无功。十多年前有匪首苏延有者，结伙百数十人立于百鸡（本图称“白鸽”，普遍地图称宝鸡者是）之平隆山，打家动舍，掳人勒赎，横行凡数年，官军无奈之何。抗战初期，政府命两广协剿，约用今之一旅兵力，维时一月有余，最后里应外合击毙该匪首，余众方散去。然此乃民众乐于协助而始克奏效，若夫今日则民众之恨顽军者，正复与往日之恨苏延有同，民众之乐于协助者，乃为彼谋利益之人民武装矣。前年抄保安队曾开兵一团到剿人民武装，人民武装避不与之对垒，该团率无功而返。去年一五六旅奉命围剿，维时整月，结果各也只在报告上徒然称功道劳而已。顽军到防城每每无功，固然有其他原因，然兵力使用与粮食问题发生纠结，实一重大因素。

5. 防城人口约共十六万，每年缺粮三分之一，此为现在之短处，但此种短处并非绝对的，如土地能有彻底改革，则粮食当不虞缺乏。再则半年，越米与钦米，甚至桂米均有余挹注。

6. 防城所以以大直为中心者，盖以：a. 对外交通俱不过远，各方联络容易，策应容易；b. 具有易守难攻的一般形势；c. 此为防城境内粮食生产充足之区，且环绕大直附近乡村颇多公田，著名之马召（读作笃）山，即在大直，陈济棠主粤时代曾建一军垦区于此。在根据地休养训练之武装干部大可以藉此开展生产运动，解决本身之粮食问题一部份。

（请参阅原印地图）

二、土地政策（原件缺页——编者）

中共南路地委关于广泛发动群众 反三征斗争的指示

(1947年)。

(一) 反三征与减租减息是南方革命斗争现阶段所采取的具体中心政策，在我十万山区，则反三征是我发动群众斗争，建立广泛的农村统一战线的中心的行动口号。减租减息在我区来说，一般的还是用来宣传教育群众，准备秋收时普遍实行的口号。只有在我已经确实控制，农民已经发动起来，敌人不易进犯，经过周密调查与深入动员的地区方可立即付之实行。但反三征则是马上可以在我老区、新区普遍发动的，这一个群众斗争发动起来，将使农村中广大社会阶层，除开死心塌地为反动政府效忠卖命的贪官、恶霸、捐棍、走狗之外，都团结在我周围，卷入斗争，打下我之群众基础。把反动政府完全孤立，以利于我和人民一道去打击它，消滅它，并为进一步推行减租减息准备好之客观条件，同时使反动政府兵粮两缺，加速溃败。

(二) 目前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大放“和平”烟幕，一面积极重整战备，以便养好创伤，卷土重来。今天无论广东、广西，反动派都是在此阴谋之下加紧征粮、征兵、征税，本年度山北上思一县要兵一千名，山南防城一县要兵二千五百名，平均每保至少要兵十名以上。征粮由去年一亩田赋折谷七十斤加至八十九斤，南宁征收房屋自卫特捐每户出米由两三石至六七石不等。此外食监、咸鱼、土产入市均被拦截收税。反动派在此鸡飞狗走，各自逃难当中，自知统治日子已不长久，抽剥迫勒空前厉害；如防城有些地方征兵要钱不要人，广西则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中签壮丁被“优待”编入“华中剿总第一纵队”之后，空出名额仍要依次递补并无已时。所以各阶层人民对反动政府的毒恨仇视已达顶点，下层群众自动武装抗征者在上思境内已数数发生；上层反对者，有珙宁伪省参议杨某之公开和伪县长肖某冲突，声称“领导民众造反”；下层群众则准备武装抗拒，群众斗争情绪如火自燃。只要我们好好地去组织他们，领导他们进行斗争，大势马上可以燎原，烧死反动派的。

(三) 但我各地工、武工、部队政工人员对此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各级领机虽偶有此感，亦不重视，实在是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死命运的严重现象。

(四) 为此我们郑重提出：各县工委、各团军政首长，于接到我们这一指示之后，立即进行发动反三征斗争的讨论与布置。

(五) 首先干部必须深刻认识，今天发动反三征斗争就是我们为人民服最迫切之务，是坚决保护人民利益的具体行动。任何消极旁观怠工者，都是人民的不肖子弟，自己在思想上弄通了之后，即进而对所属干部党员、指战员、工作人员作广泛深入的教育动员工作，务使大家一致知道发动反三征的必要，并热烈从事领导群众反三征斗争的工作。其方式可以举行演讲会、讨论会、在上政治课时详为讲解等等。

(六) 在发动具体斗争之始，领机对反动政府进行三征的实际情形（如迫征数额、时限、办法、作弊情形、征粮集中地点、拉丁囚禁场所、运送押解所经路线、负责三征的反动派爪牙何人等），群众反三征的斗争情绪（下、中、上层人物的态度），群众自发斗争的实际材料（其采用的方式，胜利或失败的经验教训）。据这些来作细心的全面的研究，以制定我们发动反三征的计划和步骤的草案。

(七) 在军事上，我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武工队必须和各乡村群众密切联络，不断主动伏击、袭击反动政府下乡征粮征兵的警兵，捕捉其收税人员，打破其粮仓和囚禁新兵的处所，协助和应援那些敢于武装抗征的乡村打击敌人。务使敌人三征人员为之裹足却步，不敢随意出城下乡。

(八) 对于那些死心塌地地为反动派政府进行三征的贪官、恶霸、捐棍，和为了一份微薄的薪金或想捞点油水而执行三征任务的中小公

务人员及被迫进行三征的乡村保甲长应该区别开来。警告第一类的贪官、恶霸、捐棍，警告无效即坚决消灭之；劝告第二类中小公务人员，着其停止殃民害己的工作，不听则加以逮捕惩戒；对于第三类的乡村保甲长，则要为他们设法推卸这个责任（如我开部队去游行等），着重在为他们设身处地解决困难中争取他们。

（九）武工队和地工组人员要深入群众中去，把群众反对三征的怒火煽旺起来，把他们见不到自己力量的信心提高起来，把他们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把他们已经自发行动的斗争提高一步并坚持下去。根据敌人统治力量的强弱，我保护力量的大小，群众情绪之高低和决心的程度，以及发动范围之是否广泛等等，来决定采取“合法”斗争，请求减免、缓征，抑或死拖硬赖，逃跑规避，武装反抗。组织形式则尽量把一切抗征的力量都组织到广泛群众性的“抗征会”、“饮血同盟”里去，但在这些广泛群众性的组织中必须注意发现积极可靠分子，加强教育，组织成核心，作为支持斗争的骨干并为进一步提高时奠定基础。党员必须参加领导斗争，并时刻努力于展组工作，这是关系群众祸福休咎的严重斗争，群众会发挥其智慧创造出合乎实际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来的。只要我们善于向群众学习，我们就不会犯“老一套”。

（十）对于壮丁逃避兵役走来队要求庇护者，要尽量设法收容安屯，加以照顾，并必须给以时事教育和灌输一般的政治常识，愿留队入伍者可以考查吸收，但不要勉强。拉丁威胁过去，他愿回家时即欢送回家，并教他做些宣传组织群众或做情报等他愿做能做的工作。须知不一定留他入伍，教育影响送回去，也等于我们多放一粒种子，对工作展开也很有利的。

（十一）各城市、大镇工作同志，要特别注意抓紧商人对苛捐迫勒的不满，组织他们进行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在那些地方进行“合法”斗争是完全有条件的，一定程度的“非法”斗争（如欧打税收人员等）也常为商人的自发斗争所采用。其斗争的弱点是缺乏坚持性，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有组织有计划去领导他们，取得斗争的胜利，提高商人的觉悟。

(十二) 在城乡的斗争中，我们都要注意团结上层公正士绅，社会贤达，发扬其维护地方反对暴政的正气，群起反对三征，推动他们前进一步，以便和下层群众的发动取得配合。我们所处还是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类人的号召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必须充分加以利用。

(十三) 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要不断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材料，暴露敌人的残暴，传播各地人民反三征的消息，鼓舞群众斗争情绪。宣传手段由口头访问、漫谈、演讲以至传单、标语、“白头贴”、歌曲、漫画和容易表演的活报都可以灵活地多种使用，现下群众自己已经创造了好些亲切感人的歌曲到处流行，我们要好好采集加以充实，广为传播流行。

(十四) 各县工委、各团军政首长必须经常检查反三征工作的进行情形，认真督促，关于每个月底报告工作时详为报告其概况及经验。对此工作消极怠工者，要受严格批评或处分，积极有功者受精神与物质奖励。

李某对南路工作的意见

——过去工作的教训和今后工作任务

(1947年)。

我在南路时，和组织的关系是单线的，有许多事情我不知道的。现在将我所知的事，和在政策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提出我的意见。

(一) 对进步人士不信任的关门主义。

当〔民〕三十三年秋季起，我在张炎办的世德中学做教导主任，不久张炎由桂林返吴川，和他同返的还有曾伟等。那时敌人向广西进兵，截断了中央和两广的联络，他的内部酝酿着对抗战的事业要怎样做的问题。我问负责吴川的黄同志，我们对张炎要采取怎样的态度？他的答复是：“不要理会他，他是靠不住的；不可把他的领导地位抬高”。没有决定希望老张对抗日民主事业要怎样做的政策。假如决定要他怎样做，我对他的内部也可以起作用。

我把曾伟的进步性和工作的态度告诉黄同志，他怀疑曾伟是托派，叫我要提防他。没有好好利用进步的力量。我那时相信曾伟不是托派，和他合作，在学校里，做了很多进步的事情。

(二) 不能和党外人士合作的孤立政策。

当解放军在各地起义的时候，张炎也乘机起来，他曾经表示接受我党的领导。但当时负责工作的同志忽视了他有广大的群众，有领导南路的条件，自己高高在上，没有和他组织民主联军，各自为战，任他自生自灭，以致张炎灰心，脱离部队，而遇难身死。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影响了士气，增加反动派的声势。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三) 对武装暴动的政策，不向下级解释和讨论的命令主义。

在起义前几个月已有准备，是哪一级机关决定的，为什么要决定这个政策？我没有听过。

(四) 虚构情报，欺骗群众。

在起义前，虚构某地起义，某地起义力量怎样庞大，起义后，说新四军已到了某地，夸张我们力量的庞大，后方的巩固。事后证明，使群众失望，损失了自己的威信。

(五) 滥用干部，破坏了地方的组织。

起义时，动员了全党，许多干部都暴露了，事后不能安居家乡，影响了地方的组织。

(六) 使用干部不适当。

在大革命时期，我被地方政府通缉，逃亡在外。这次又在张炎的学校做事，当然更加受人注意。在吴川事变后，我没有适当的工作，上级机关叫我到广州湾陈学谈那里做秘书，当时陈学谈已做了汉奸。那时我在郊外和一个领导的同志庞谦之接头，我说明我有过去的历史，和新从世德学校出来，恐怕不适当，而且负了汉奸的名义，对个人和党都是不利的。他说：“我们不久就胜利了，我们说你不是汉奸，就没有问题了。”又说：“你的生活艰难，又没有适当的工作，如果到了广州湾陈学谈那里，那些起私的人，只要你点点头，便把钱送给你，不但整个家庭的生活可以解决，而且还可以发财。”问他我到那里的任务怎样，他也不大清楚，是上级转来的，要我即刻决定，明天就起程。那时我勉强答应了。但我想汉奸的名义，不是我们说他是不是，群众对你的认识，是有没有做过汉奸的事实。而且那时国民党正宣传共产党勾结广州湾的敌人（后来把伪军称做八字脚），倘若我去了，对党也有影响，我决定不去。第二天，我去找一位和我通讯的同志，请他转达上级，说昨天决定的事我不能去。这事我对组织上指定的任务没有执行，虽然不对，但是使用干部不适当，我始终承认是上级的错误。

(七) 恐怖政策。

梅菜市附近的窑地，有一个富绅，叫做秦文初，他以前做过商会

的主席，他虽然结交官场，乘机发财，但还没有直接做过反动的事。他家里藏有多少乡公所的火，在〔民〕三十四年春，解放军白日到他的家里缴械，没有抵抗而枪杀死了他一个约莫十四岁大的儿子。

〔民〕三十五年冬，化县牛湾村李某，他有一个已经死了的儿子，做过海康县县长，晚上被解放军把他家里的男女老幼杀死和杀伤了好几个。

同村还有一个做医生的叫做李眉生，同时在这一晚也被解放军杀死。

也是〔民〕三十五年秋或冬，吴川有一个退职的团长姓李的，在职时曾带兵打过解放军，有一天也被解放军的队员到他的家里，把他枪杀。

遂溪地方有一个军队驻在一个堡里，被解放军围困了很久，后来谈判投降，答应了保存他们的生命。投降后，卒之把他的队长打死。

最近化北各地的乡保长和已离职的乡保长，常常有被解放军杀的消息。

（八）土匪政策。

吴川博厚村陈祝三（他有一个儿子名陈柏森，中大毕业，现在审计部做官），他以前虽然是一个土劣，但现在也年老有钱，很少理事了。解放军曾到过他的家里缴枪罗款。在〔民〕三十五年秋，一天他从家里出外大便，被伏在那里的解放军捉去，但附近没有解放军的根据地，晚上便把他抬着兜圈子，经过很久的日子，走了几县的地方。他吃的要好，便天天割鸡割鸭给他吃，他要女人，便雇了一个女人给她。后来勒索一笔巨款（这是我的学生李钧烈说的，说是一个队员告诉他的）。

〔民〕三十五年冬季，往来梅菪、广州湾的汽车，被劫的次数最多，往往伤毙多人，其他交通线的汽车和船只，常有被劫。

现在化北方面传来的消息，仍有掳人勒索的事情。

（九）利用党权，供给私生活的浪费。

根据一个无线电技术人员说：党的负责人没有钱时，便写一张条纸叫人去找同志，见面了，便问他袋里有多少钱？命令他拿出来，得

了钱便叫他返去，于是便拿去大使大食。这种情形，我相信未必是高级的同志，中下级干部可能有这样的人物。

根据以上的事实，今后应该注意的工作：

1. 欢迎进步的人士合作。
2. 扶助民主的力量。
3. 听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
4. 正确的报导。
5. 审慎使用干部。
6. 爱护干部。
7. 制止恐怖政策。

应该杀的反动派，尽可能采取人民公审或听取人民的意见，然后执行。对退职的军人和俘虏，尽量避免屠杀。对反动派的家人尤其是妇孺，绝对不能屠杀。制止下级干部的复仇行为和凶莽的行为。

8. 消灭土匪政策，施行合理的经济计划（如合理的税收和征粮）。我们要走群众的路线，凡对人民有害的，都不应该做，不然他不但不替我们掩护，还把我们当作敌人。要注重干部的政治教育，组织干部政治训练班，使他明了了群众的路线，然后去教育下级的同志和队员，才能纠正过去的错误。

9. 对债主只能取消他的利息和债权。但不能清算过去已得的利息，要债主赔偿损失。

报载南路婢女解放后，还要他的主人每月给她的米若干，这不合理。解放后，倘不再在主人那里作工，就不应该再要他的给养或报酬。

10. 南路应该急切执行分配土地政策。

过去有人主张南路的封建势力过大，不能实行分配土地，只可减租减息，这是不对的。

我们要动员广大的群众，起来打倒独裁的政权，就应该执行中央的土地政策。现在我们虽然未有巩固的解放区，但必须要以分配土地来号召，使多数的农民起来保卫他们的土地，以扩大解放区和建立根据地。但干部首先要研究分配土地的方法和技术，以免执行时发生困难。

11. 在军事上要向吴川、茂名、电白发展，不可局限于廉化，以免给养困难。

李

温焯华关于南路敌情问题报告

——东纵北撤后国民党对我的军事“围剿”和奸细自首政策*

(1947年) ①

一、东纵北撤后K对我活动区的政策及做法：

(一) 七月至九月底期间，四六军留下一个团与一五六师之一一个团都调走，此时南路没有正规军。K的政策是依靠地方反动势力建立地方反动武装，为“清剿”的主要力量，各县各区乡建立治安委员会，由地方反动份子来主持。其主要工作是通过治安委员会来动员地方反动势力来支持剿匪工作，解决剿匪经费，建立地方特务网，利用封建势力关系对我部队队员及其家属进行挑拨离间、分化、收买、自首政策。但是实际上治安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很少，剿匪工作完全是由派出去“清剿”的部队去包办。建立地方武装一方面是扩充县的自卫队，由各乡抽二个壮丁带枪到县城集训后补充自卫队，合浦、灵山各增编了一个大队，遂溪一个机动大队；另一方面各县各区则组织联防队，大概每一县约有四个区联防队（主要是根据我活动地区来组织），联防队约在四十人左右，同时强迫各保组织保队，每个保队约十人至二十人。这个期间，县的自卫队与联防队都经常出动扫荡，因为他们都是地方人，对地方情况熟悉，出动容易，相当达到扰我的目的。这是在我部队采取隐蔽方针时期的做法。但是八月底九月初，我活动积极，部队集结，给K一个新的刺激。K于九月底便调了一五六旅（完整）到南路进行大规模的“清剿”，这时便以正规军为“清剿”的主力，以地方团队协助配合。同时利用其军事压力强迫地方势力建立保队，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扩充乡自卫队和县的自卫队，这时则进行取消了各区的联防队（认为没有什么大作用），扩大乡的自卫班，大的（甲等）乡要组织四十名的自卫班，最少买一挺轻机，小的则要二十名，经费由乡自筹。K认为这样乡公所可以守也可以攻，即使没有正规军和县自卫队的时候，这是K长期打算的做法。

（二）九月底后，一五六旅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其特点如下：

（1）集中兵力扫荡一个据点或一个地区，同时则以地方团队在其他地区“清剿”，形成分区“清剿”的形势。当正规军达到消灭某个据点或某个地区的时候，则转移兵力到别地区“清剿”，这是由于兵力不足及对地方情况不了解的原故。这种情形，如合浦有一个团，其中有二营集中于合浦东南部地区扫荡，对于主要力量的合、灵边境部队主要是由地方团队去搞，等搞完合东南后则集中去搞合灵；在化州则首先是集中力量去搞化北，其次是搞化东南，搞完化北、化东南后则集中力量搞化南（这是我主要基础）；对于遂溪则放二个营来监视，进行个别的“清剿”。我们估计等到搞完化州后则以二团兵力来搞遂溪的（这是南路的主要基础）。（2）其第一次到“清剿”目标地区所运用的战术则是穿梭扫荡的。穿梭扫荡时凡见有逃走的则捉或开枪打，或发现我撤退转移时则穷追，达到消灭而后已；第二次的扫荡则填空格，把扫荡目标地区层层包围，不仅对暴露地区围剿，而且同时对暴露地区外围也“清剿”，使我不能突围转移，因此包围的地区是很广的（三、四十里的范围）。以上战术不能达到战果时，则以游击对游击，组织了轻装的便衣队，经常突然突入我活动地区搜索或晚上包围、袭击或伏击，K军如发现他的游击部队和我发生战斗时则立即出动进行。（3）K军到达了他们的“清剿”地区，就立即动员保队放哨、卡守盘查，并调动他们进行搜索，如合浦东南部“清剿”时，仅就一保就在高压下调集了四百余保民上山搜索，使群众和我对立。

（4）K军的扫荡都在夜间出动，晚上十二时后就将“清剿”地区包围，到天明时则入村搜索，搜索不仅只在村庄，而且在村外逢山搜山，并强迫村民斩山烧山。

（三）军事扫荡不能达到消灭我的目的以后，则以政治进攻为中

心，政治进攻主要则是施行奸细自首政策：（1）扩大宣传自首政策，强迫自首份子写悔过书，在党报上发表，K军当局对乡保甲长威胁恐吓，使其自首，供出我部队的情报。逮捕队员、干部家属，威胁其劝子弟自首，否则要出悬赏通缉或将家属杀掉，或通过地方特务或地方势力和我队员干部家属或其本人接近，进行挑拨、收买工作，强迫自首份子积极叛变打击我。（2）建立地方特务网，准备每保派二个人去受特务训练，毕业则派回地方活动。

二、你们二千武装如何掩蔽，各地各种形式如何？

日本投降后，集中于遂溪、廉江敌后的部队，则分散返回他们原来地区去活动，遂溪、合灵初仍以原有建制，如一营或一连的单位来活动，主力团则转移到十万大山去坚持斗争。在敌人强大兵力进攻之下撤退到安南，吴、化、茂部队除小部份集结外，其余都以武工队的形式分散活动。到东纵北撤后，除合、灵外都以武工队为主要形式活动。他们的隐蔽方法，一是分散于群众中，二是和群众生产，获得群众支持隐蔽，在我活动地区群众严守秘密。我部队有三百余人复员，他们回去耕田、做生意，东纵北撤后我们就停止用解放军的名义对外活动。但老百姓的了解则是一样，我们进行劫车、打地主等虽以土匪形式出现，但是K的认识和群众的了解，都认为我部队去搞的。在K军向我地区扫荡时，我的部队则突出敌人的包围，在敌人扫荡外围据点隐蔽着，K军是很少能够找到进攻扫荡的对象。

三、你们接到中央十一月指示后，采取什么方式行动，而各地各种形式如何？

我没有接到中央十一月指示，指示内容如何我不清楚，仅就我们于十一月后的做法来报告。我们根据十一月全国分裂大打的形势和十月份我们的斗争经验，及看了《群众》、《正报》一些文章，觉得过去强调掩蔽、复员的消极方针不对。目前形势应该采取积极的坚持斗争方针：十一月底的布置，把各地分散了的部队重新集结起来，建立地方主力，遂、化州各约五十人，应争取主动消灭地方反动武装（主要是指联防队、乡自卫班、保队），镇压地方反动份子，领导群众反对征兵征实斗争，在群众中进行准备起义的思想教育，而大部队仍着

重采用武工队形式开辟粤桂边山地区及其他新地区的基础。另组海队、经济队来搞经济活动，并适当的扩大部队。目前我部队曾经解决了一个警察所，缴获轻机一挺，解决一个乡公所，缴获十余支步枪，俘虏一个乡长，并在遭遇战中打死了遂溪县长。这是就我今天所知道的事实报告而已，详情以后再报告。

四、K对我们行动采取什么对策？

我部队重新积极活动后，对K有很大的刺激，K当局认为南路治安最严重。南路内外，反动分子都天天叫嚣，要K当局派兵“清剿”。在这样的激荡底下，K对策是这样：（1）调保十总队到南路，另调广西二个保安大队到廉江、湛江进行大规模“清剿”。（2）林明清（七区专员）到化州组织指挥所，督队“清剿”（过去没有率过队剿匪）。（3）湛江K开紧急会议，讨论遂、湛统一武力“清剿”，并准备起用地方势力头子陈学谈（铁胆死后，他是唯一的地方势力领袖）剿共。

五、K在粤桂之地方武装力量、保甲特务、统治力量如何？

在南路的地方武装力量，直属县府指挥的团队约在三百人至六百人（这是在去年十二月前的情况，以后就不清楚），广西有五个保安总队，各县兵力很薄弱，县府的直属部队不过百余人而已。

K企图建立保甲特务，训练保甲长就是训练特务，但是我活动地区保甲长以至乡长都多在我控制下，在群众的监督底下，地方坏分子以至特务分子都不容易活动。在农村广大地区都在我掌握底下，K的保甲统治基础是破坏的。许多乡保甲长都变成了两面派，保甲政权成为两面政权。这种情形，在化州、遂溪二县表现得最明显。若非在我控制下的农村乡保政权，一般的都执行K的特务政策，如茂名、电白、信宜、合浦等县。在我活动的地区中小地主都不敢积极反动，许多维持了中立、两面，即使K大军扫荡的高压底下，他们仍不敢积极反动，因为一方面我的政策没有危害他们的生存，而且在我部队活动地区能够维持治安，没有土匪来抢，K军来则抢。另一方面，他们几年来的经验，K虽然用尽了一切方法和调集了一切力量来进攻我部队，但我部队始终坚持而且发展，K军来时是找不到我部队来打，K军走后，

我又积极活动，因此，地主觉得我们是没法消灭的。K曾经几次督促各乡保建立保队、联防队，但地主并不积极起来支持，只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应付。对于K的征兵、征实，很多和我们在一起反对。K的统治力量是不平衡的，在县城则强，在农村则弱，在我活动地区则弱，在非我活动地区则强。特务活动在市镇、县城则猖狂，但在广大农村则不能深入。

六、粤桂有否自发民变，次数、参加人数、经过结果与我们关系。

根据去年十二月以前的材料，南路及广西边境没有民变发生，以前新华社发表广西民变的消息，据广西同志的报告不是民变，而是K组织的土匪，准备到安南做破坏工作的。

温京（丁英）关于南路工作的报告

——南路组织领导、工作状况*

（1947年）^①

一、我来这里的目的拟解决如下的几个主要问题：

（1）解决钦廉四属的正式领导关系问题。

（2）解决政治路线和工作方针问题。

（3）反映南路干部（尤其是吴同志）对区党委的领导及过去大周及温同志的领导意见，以求内部团结，路线统一。

（4）报告四属的工作情况。

我在去年十一月间，由温同志传达区党委的决定，我由高州调到钦、廉负责四属工作，同时说明以后四属工作由海防大周领导，和南路脱离关系。但如果没有找到大周以前，仍来湛江找温同志解决问题。

当我到钦、廉之后，我即派人去海防共写了二次简单的报告，最后还派了一个主要的干部四眼刘去，但都找不到大周，并没有得到答复我的报告。因此，我又把此情况向温同志报告（当时温同志仍在湛江），当温同志离湛时指示二个办法：（1）是到湛和吴同志联系；

（2）或直接到湛找区党委。找人的办法是：到《华商报》找张枫生（即蒲特，我过去是识得的）叫转找王，说是钦、廉邓找区党委便知道云。

四五个月来，我是照他第一个办法和湛江吴同志商量工作，但他几次的秘写文字指示都声明未得区党委正式决定前，是给我参考性质。因此我在这四五个月当中是未曾有过正式的政治传达和正式的工作指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断的。

示的，只有友谊的和吴磋商和联络。但过去我对他的指示意见，虽说是给我参考，但我是完全尊重，当上级指示一样执行的。假如吴同志的领导不和区党委的及温同志政治路线和工作方针不发生分歧（据他反映和批评是有很大的出入，究竟出入处怎样，这我打算面告，因一言难尽），我还是继续和以前一样尊重，当上级指示做下去，是无急急来找区党委的必要的。

同时我所以急急来找区党委的原因之一，还因为在离今天约二十天前，吴同志派了一个高唐同志（化、吴、梅负责人）来到我部队见我，持有吴同志亲笔信，内容是叫我把所有四属部队由高唐同志代表他——司令官率领，带到廉江、化州集中使用。同时我和高唐同志相交数天中，反映了他们更丰富的对区党委及周、温同志的批评意见（概括意思是：行不通，是和中央政策不符合，和毛同志的思想作风相对立，只有照他们的做法才对，才有前途。这我有许多地方是同意的。到目前，我个人还是觉得吴同志的说法、做法是对的，非如此是确实行不通的，详情面告）。但我再三思考：究竟区党委的路线、办法确实是怎样，是否如吴、唐同志所批评，我在没有得到区党委的完整传达前，我觉得不应听片面之词。就是决定要反区党委的路线，也只有在证明区党委的路线做法确实错误，和中央路线相矛盾时，那时来跟吴同志一齐来反不迟，但没有弄清以前，我觉得不应粗率地就跟吴、唐等同志做尾巴，轻易地私相授受把四属部队交出。同时要集中到廉、化实际上不容易，虽有七八百人，但主力三百余人是开向钦防边境十万大山周围，其余则分散为四五个单位。因此，我郑重地向吴同志派来的唐同志执〔质〕问：究竟吴同志是否根据区党委的决定，四属归其负责领导，是否得到了正式通知？唐同志的答复是“大概没有吧，如果既接到正式通知，吴同志的信上就不是写‘代表他’了，是会写明既得区党委决定了。”是此，我又再郑重向唐同志声明并叫他转达给吴同志：“我在没有接到区党委正式决定前，暂时不承认吴同志的正式领导关系。他目前所组织的司令部，四属部队不在其发号施令范围，你们的说法、做法基本上我同意，我将参考实行和友谊合作。”同时在我决定来找区党委时，曾写一信给吴同志（离目今约半

个月)，主要内容是说我决定来找区党委，并说明来的目的，并要求其在我没有回来前，暂时不要来四属发号施令（因他是有好些地方和干部，他们可以找到的），并说明四属部队暂仍坚持原地发展，暂不东开廉、化，到我确实弄清区党委的路线确实错误，回来时再和你合作共同的反。但目前我暂不能即附骥尾，粗率地作违反组织原则与纪律的做法。到我发出这信后三数天，恰值“山东轮”到北海，我匆匆地从部队中出来，从旧历三月初二日从北海开轮，至前天（共一星期）安抵港。

在轮上将起岸时才撞见来高州接替我以前工作的涂同志，才知温同志既返港，并曾打电给我，但打不通，因此我全未知道。同时我向涂同志要求和我通知区党委，但我在绍荣行等了许久不见他来，而该绍荣行久住是不妥当，因此我又不得不另想办法找区党委解决问题。因此我又照温同志以前给我的找人方法，即打电到《华商报》找张枫生（蒲特，七八年前是相熟的）叫转找王，殊不知不能找到张枫生，因此又不得不找谭，不料，在湛〔广〕雅中学遇着温夫人，便要求她转达。

三、周、温二同志既回南路，可能我所提的如上几个问题，既成为已解决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了。但我要求：我已然千里来此，请区党委尽可能亲自或派人来见我一面，因为许多问题是要面谈才谈得清楚的，同时尽可能尽快召之，因为南路斗争尖锐，多一天便影响可能大一点，快一点搞清楚了，便能够快一天回去。其余同志要求面谈，因七八天来在轮上风吹雨打又晕浪，身体与精神都不佳，详细的有系统的文字报告，一时是办不好。目前只把我的来意上述。

四、我原名是温京（在省及北江工作时俱未改），来遂时用邓，在高州时用丁英，调钦防后用邓。组织约定通讯符号是“大欧”。

△△关于南路敌我情况的报告

(1947年夏)

一、兹将个多月来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 四月下旬保一团五百余人从防城调到灵山，又由合浦调自卫队二百余人到灵山配合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如城东北一带便是，若发现我主力便跟踪追击，使我不能休，不能给养。

(二) 以小部队吸我主力，则全力分数路围攻。

(三) 进行点线封锁，占据我外围重要据点，即使战斗结束，K军没收队继续封锁整个战斗山区，外围放卡，构成横直五里的封锁线，在这样的扫荡中，我部队没有大的损失。我部队于五月初旬曾与保一团作战二次，一是护送经济遭我伏击，我缴获三百余万，毙团部军需一人，连长一人，排长二人，士兵十余，敌为之胆寒；另一次运谷遭遇战，我无缴获，影响敌士气甚大，表示无信心，曾电请省保安司令部调多一个团前来围剿。最不幸的于敌反复扫荡中，党员干部群众九人被捕，内有邓业兢、许家骅……他们的被捕主要由于麻木不仁，在敌情严重下不宿山，不避敌、不警戒，集中多人住在一起，在被捕当中没有从事抵抗（有八枝手枪一枪不发），当时我部队已在附近，如果响了火，是足可援救出来的（谭报告中的意见）。他们被捕影响中间阶层群众的情绪很大，悲观失望，使地方工作陷于停顿。他们被捕后K积极进行诱降，一方面向被捕同志诱降，另一方面向梁振威投降。陈公侠特派周立齐（灵山人）返灵山实现诱降任务，一回到灵山即行请地方父老绅士饮酒，企图以地方力量来协助其解决问题，可是结果都遭受失败，K把被捕同志押至城进行所谓集体公审，同志们是英勇的揭发K的阴谋，博得很多群众及父老绅士之同情，他们的英勇斗争精神使群众大受感动。当时同志们提出自己是政治犯，当用政治解决

(反对提解到八区)。敌人很害怕父老出来主持正义，仍进一步向兢等提出诱降条件，找梁振威、莫平凡投降，如他们肯出来时则保证安全等等。虽敌人反复威迫利诱，然同志们始终不为所动，没有说出半句党的秘密，最后他们从容就义了。此事发生后，梁振威动摇到极，偷偷地和敌人进行秘密商谈，一天欲把队伍开到K区域谈判，敌人向他提出条件是：(1)划地区给他管理。(2)由灵山父老捐款二千万给安居乐业。(3)如不信任政府则父老保送到广州。梁中光(我们派去梁部工作的干部)见此情形，即将梁部内我掌握的队员全部拉走。这[时]梁振威对敌谈判开始动摇，追回中光，表示痛改前非，认错，要求团结干下去，声明他个人直到最后只有出走，不投降。经过无数次严重的斗争，和梁部差不[多]整个掌握在我手中(约六十人)及敌人屠杀我们同志的教训，使他有了些改变了，清除了一些坏分子，经济也较公开了，这是梁振威的变化经过情形。灵山部队在敌人残酷的扫荡下已转过小江，并与小江部队出击过五次，牺牲同志一，队员三，曾经打入小江，打算继候进攻广西太平后开回灵山。

九个月来，合浦方面清乡方面没有成绩，谨在小部分地区成立保安队，所谓清委会是有名无实。地方反动武装是没有普遍强大的组织起来，这是由于目前地方反动势力采取观望态度，在这情况下，K召开了保安会议，其后则包围了南康镇公所，扣留副镇长及所有职员(镇长已逃)原因说是镇长通“匪”及执行政令不力(事实也是如此)由自卫大队长李柏云自廉镇长，由县长特务车叩兼副镇长，K这样横行，地方人士极度不满，K认为公馆南康区我军活动最厉害，专署下了几度密令：(1)镇压我们在这些地区的活动。(2)扣留这一带沿海地区小教。(3)搜捕活动最力陈铭金，估计在此地区K就快要进行清剿了(过去未有做过)，K近委任黄质文(合浦参议长)当钦廉四属联防主任，组织四个自卫大队约二千人，配备轻机四十挺(一说二十挺)，重机四挺，重炮二门，其余是向敌伪接收的五六步枪，保一团将调返广州，闻已调回合浦，今后以组织地方反动武装为主，进行长期的经常的清剿活动。

雷州区的扫荡，海康一般说没有，在遂溪的扫荡是以联防队、乡

自卫队为主，K挑选了射击手，由联防队、自卫队配合乡村特务、反动分子的情报，经常出动袭击、搜索，在此期间西区牺牲了三个同志（其中一个干部），被捕一个，南区牺牲一个干部郑仲，中区牺牲一个，队伍没有大的损失。化、吴的扫荡是比较少，目前主要的是各县组织联防队，各区组织一后备中队（五十余人），在化东南我一同志被捕。

高州郑奎部队于去月底调往信宜搞经济，在信宜境中途被敌人发觉截击，同志三人被捕，吴勇牺牲（可能郑奎在内），王佐贤（一个王副团长）因失队在高城附近被捕，现押在茂名县府审讯，直认不讳，K问他识得什么人，他说出过过去一切朋友同学（连老参在内）的名字，问他的同党是谁，他说失了关系很久，不知道，敌人吓他要杀他，他说最好快点杀。陈子和主张杀他，林时清说慢一些。茂、电现分为三个清乡区：一个是在茂南，是极反动地主当清乡区主任；一个是在茂北；一个是电白沿海。每清乡区组织反动武装一中队为长期清剿的基本力量，初期则由县府派一政警中队去协助，组织和协助清剿，此外派出便衣武装特务到清乡区活动，随时配合地方武装施行袭击。现在四六六团调返广州，五二团接防，闻保七大队亦将调走，高州各地没有正规军，海康仅数十余，钦防四六七团如何不清楚。现在南路各县这半年来除遂、徐、吴等县外都换了新县长，新县长又多是从前吃党饭的外江佬，表现是实施中央化、特务化统治的人物。详情以后再告。

二、各地部队：遂溪六十余人，廉江四十人，化、吴六十余，茂名二十以上，都是整编后便衣武装短枪活动者，和以前的计划保持我数量，有出入者主要是遂、廉二地，其原因是短枪少，长枪不能活动，经济困难，K军经常围剿，而主要的是干部缺乏坚持斗争的信心。合、灵部队据一月前的报告约保存着四百余人，灵山占二百五十人，谭认为要撤退的二百七十人，可留下合灵坚持的一百六十人左右。我们对部队的领导曾传达了新方针中的停止组织领导的决定，对于干部情绪发生不良影响，彷徨苦闷没信心，如黄飞、何盘，廉江的干部表示要走，不愿干了。在遂溪表现得最严重的在这期间我们的党员干部的牺

牲是比K初期大扫荡时较多，这是由于干部对坚决自卫斗争采取消极态度，士无斗志，对敌情没研究，麻木，被联防队、乡自卫班挨打，对于反动分子又没有积极的坚决的镇压下使反动派更嚣张，不积极打我们的也积极搞我们（如张德安初时表示不理，后来积极来捣。南区胡须陈对处理部队复员之时则只叫各人自己想办法解决，赶跑了百儿人，使无家可归，无饭可食，怨声载道，有些个别干部队员怀疑了撤退的干部搞得钱就走，他们也要准备些钱好走，发生对党不信任，干部与队员之间不团结，部队的政治工作与组织生活也停止了，这种现象在遂、廉部队表现得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指出恢复组织领导、恢复部队政治工作和组织生活，检查和纠正干部的左倾偏向，展开积极的自卫斗争，对各地干部重新布置尽可能建立一中队主力，使能够可以解决联防队、乡自卫班的力量，来镇压反动派，保卫我们的基础，这些已在传达布置中。各地暴露党员干部的撤退问题，遂溪百儿人左右，廉江十余人，高州十余人，这些撤退的人多是撤退到安南、广州去。撤退到安南的关系本来没有搞好，但是由于情况的紧急，不能立足，只得跟赵庆的通讯地址介绍去，去到能否解决尚不知道。去广州的仅是凭一点亲属朋友的关系而去，吃饭、职业问题是毫无把握的，有些去到广州，天天借债度日。这样下去是无法维持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就有被捕牺牲的危险，现在尚待解决。撤退经济和撤退地点的，遂溪百多，廉江三十余，化州三十余，高州各地四十余，合灵二百，估计约有六百余。目前解决撤退问题最严重的困难是经济和撤退的关系、地点及以后的生活，搞经济各地是积极的去搞，解决了部分人员的撤退经费，而杯水车薪，要候老余回来才能知道能否彻底解决。对于合灵部队的撤退，如安南关系搞妥，则他们可有二百余人，从水路武装撤退。遂溪的复员战士，也从水路退，对于他们生活问题的解决，最好是能够如主力团这样解决，和主力团在一起，当安南兵，这些问题迫切的等老余回来商量决定。

战线的秘〔密〕组织的建立，各地搞起了初步的整编工作，但是最困难的最头痛的是干部问题，整理起来的隐蔽的秘密的党组织中，隐蔽的有能力的地方干部完全没有，如果原有地区暴露干部撤退的话，

则原有基础就会瓦解了，因此不能不由暴露干部继续领导成为过度办法，在这期间中要他们加紧提拔地方的新干部代替旧的暴露的干部。现在各县的特派员已调整的：高州调化州负责领导化、吴、梅工作，拟于近日内调去廉江，候老△回来后调去合浦、北海，负责开创廉工作。目前广州湾干部无法解决，不实际，不能负责全面工作，只能负责一部分，暂时照旧。本来他们在原地已经暴露，但目前又无法找到适当干部代替，因此他们二个人的问题尚无法解决。

由于王佐贤的被捕，对老同志严重的威胁，要他撤退，但是彷徨苦闷动摇，如果他的问题不能解决，如果发生变化，则对我发生最严重的威胁。问题是要处理，尚未知其最后的结果。

遂溪三罗△△△已自首释放回家，K在大光发表他反动的自首供词，究竟有无积极变坏，尚不知道。前年从廉江撤退回来经过三罗时，他可能见过我，如果积极变坏，对我是很大威胁。

三、月来各方面搞经济约有千五百万元左右，我们取了五百万，这些款项都用于撤退还债、部队经费与日常费之用，而杯水车薪。目前各地交通仍是处于极度穷困当中，搞车既已不易，因有兵保护，除此外更难，以后恐怕更困难。我们此时期生意无进展，且亏本，对于我往港带款一事，当努力设法解决，如有款恐带有不便（禁止外币出口），不知你有无妥当兑款办法，或有其他关系带去，如有可能则运牲口往港，可一举两得，这是上策。

关于款事，他并无还款三十万给我这一回事，他借十万是朱在澳交给他的，这笔款是手笔写信和打电报给朱叫留下四十万元给张创用，且说及这笔款他仍负责（意指区党委），朱曾把原信和电报交给我看，这件事你来信所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供给张创二次共七十万元，从来（以前你手的不计）没有收到分文的还款，请你将此事转告区党委。

机帆事，前次去信已谈及，我们决定搞一张机帆，因当时生意大有可为，因此曾打电给你，把机帆留给我们。但是过了一些时间，一方面土产大跌，生意停滞；另一方面朱运过来的火水、火柴被海口扣留，朱要留此搞出此批货，朱不能跟第二次盐船往澳去接洽机帆事宜，这是未能及时解决的原因。现在我们资本有限，对于依价一次付足一

万港币，恐不能做到，最好先交你们三分之一款，以后逐渐付足，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现在机帆生意不甚好，如没有货载，破费大，是很不化算的，但如果机帆自卫力坚固，马力足则生意又不同，不知能否给我们充足的武器，马力如可，需要修正否，船上的水手、带水、机房技工，原有的能否用？这些问题请你复我，同时你认为可以先交我用之时则你可交陈光（他这次押盐赴澳到城益行）处理，协助陈光搞好一些手续，烦载回湛。如你们需款则可取估出之盐款（约百万）（要留下他们回来费用），如有问题则请电告。

各种书报希交陈光带返，报纸尽可能有六份，使能供各地之用。

政治交通一事，我拟找甘初负责，他在港、广州都有亲戚，又兼做生意，来往方便，此外便无适当人选。不知你意见如何？

关于杨的款事，根据吴的报告，他和人原有资本有百万左右，但获利则有一百二十余万元。我当初给你的信，所以提出他投资做盐的三十万交给我们处理，一方面他管数时欠下十余万元，数目不清楚，他自己说还，同时他私人生意的获利这样大，应分红利与应交皮费使用，要他交三十万元给党，并无丝毫过分之处。我和他谈私人生意问题，他仍是不坦白，我对他提出两个问题：一个他个人的生意没有向党报告过，一个是他利用党的关系获得巨利，也没有分给党丝毫利息，这是自私自利不忠实的观点。他认为私人生意过去向我谈过，支吾以对，没有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生意资本及获利，他也不能否认（因有帐目为证）。问他关于利息的处理，他自己不提意见，叫我提，结果我提出十万元，他无意见，连他以前十八万元欠帐，共二十八万元，有无其他贪污事件，目前是很难查，有材料以后再告。

余有电说将从海防返，人出到海防受理生意事，他的地址请告我们，以便取得联络，并用什么符号去找他。关于和△△的关系，是否由你们派专人负责，我们不管，有问题时我们怎样通过你们的关系解决，请示知。我们仍须准备海防为最后的立足点，如在北海移湛更不妥，地方单纯，K统治较严，容易遇到外人，交通联系也不便，不过亦须作一准备。

老昌已撤退到△，在其妻那里，地址如下：△△△△△△△△

(即是他的老婆，现在读书)。找老昌，说是和他同去有四五人，由他负责管理，找到他便可以找到其他人。

其余到广州、香港各地的人以后再告。

我依期到港。此致

布礼

二十二日

再补充报告下列几件事

(一) 林声于前几天到此，报告老吴传达你们的意见，对广西停止组织关系，因此我没有去见他，只叫他写报告过来，内容空洞无什么可告，不过他说及广西党的组织有五个，一个是林声等，属此间的，一个是由东江（最近）派回活动。一是中央文化支部，一是广西党破坏后广东派回去的工作人员，直属广东党，桂沦陷时停止关系，最近恢复，一是旧的广西组织关系。如此复杂，我们很困难处理，区党委对广西组织的处理意见如何，希早日明确指示，如果是继续维持林声关系。我的意见则转到安南，交给老余负责领导处理他们的问题，这样比较妥当，即使他们有问题时不致发生严重威胁，你们以为如何？

(二) $\triangle\triangle\triangle$ 已于十八日早秘密枪决，查并无暴露秘密自首行为，在狱中表现英勇坚定，说是到东江集中北上，许多绅士、青年设法营救，买东西及给钱到狱中慰问，他对他们做了许多党的宣传影响。他被秘密枪决后，绅士、青年大受感动，有些青年表示要发表抗议书，异常愤慨，又郑奎在去信途中被截击，英勇抵抗，弹绝被掳，受刑坚强不屈，在被枪决时英勇高呼口号，沿途宣传，群众感动得流泪。海康被捕之洪视尧，在狱中病歿，地方绅士、青年甚为叹息，要举行追悼他。他在狱中替同狱的写信、写告状，同狱的囚犯对他的死悲恸不已，同时被捕的 $\triangle\triangle$ 闻说可以用十万元左右赎出来。

我党员这种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英勇事迹，K的暴行，我已通知各地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表扬并写成通讯到港报发表，揭发K屠杀人民的罪行。统计几月来，我们约有二十个党员干

部作了壮烈牺牲，这是党很大的损失，也是党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光荣。

（三）谭负责的合灵关系必须将他们撤退到安南去，撤退中审查才能解决问题。谭说以前从合灵转到遂溪来的，合灵……已由三叔恢复关系。此事你是否同意恢复，你即复。你们可否派一个收译人员来此？

关于南路各地情况

(1947年)。

1. 南路区域，范围辽阔，现在讨论的暂限于高州六县，雷州三县及廉州四县。
2. 上述整个地区，平原、丘陵地带占了三分之二，山地仅占三分之一。
3. 山地绵亘于整个地区之北部，平原与丘陵则分布中部、南部。

茂 名

1. 茂名之东北两面成弧形山地，这山地南接电白之黄岭、沙壆一带，东连阳春之八甲、双滘，北与信宜之怀乡、白石毗邻，南面则降低而为平原，与丘陵互相交错。

2. 这山地居民多住于盘谷间，人口约为十万，最大氏族有吴、邓等姓。

3. 这山地生产以农业、林业为最大宗，粮食是自给自足的。

东北两面山地抗拒，终于保存了我们的实力，现在我们的武工队，仍活跃于茂南，闻政府已不敢到该地征粮收税了，它要把“三征”政策集中于茂北，茂东也燃起人民强烈的反对了，因此该县虽有那么的反动力量，然而在这样的群众基础和东北两面山地的优良条件之下，我们必需赶紧展开该县的工作是不容稍缓的了。

信 宜

1. 信宜全境成脊梁形山地，有窦江向南流与茂名鉴江会合，△

① 原件未署作者，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江向北流与西江会合。

2. 信宜东接阳春、罗定，南接茂名、化县，北连罗定，西连广西之岑溪、容县、北流。

3. 该县分新图、旧图两部分（地方称呼），东镇以北为新图，以南为旧图。

4. 新图崇山峻岭，多植杉树，地形险阻，民性强悍，如马鞍岭，杯教岭最为险要。民国以来，居民每因抗捐抗税反禁种烟苗据此以武装对抗县府之督征团队。

5. 该县人口约三十万，生产以农林为主，粮食过剩，重要圩市以望失、沙望为最大，为通阳江、茂名之要地。

6. 南部以水东为出入要港，其它如博贺（俗呼北虾）溪头和滨海一带，产盐最多。

7. 全县人口约三十余万，粮食自给不足。

8. 公路横贯中央（南路干线）可通北海、通阳江，支线亦多，均未修复。

9. 北部大氏族有陈、黄、王、谢、崔等姓，现有军阀王德全，南部较大氏族为邵、许、杨等姓，巨绅有邵馨府。

吴 川

1. 全境为平原地带，分东水、西水两部分，有梅菪江流贯其间。

2. 南部和东部界海，北连化县，西与廉江、遂溪毗邻。

3. 主要市镇黄坡为县府所在地。

4. 坡头、南二、南三三地过去属法租界。

5. 全县人口约二十五万，粮食不足，人民业农外，以小贩、捕鱼为副业。

6. 山地区内的山底村为陆川、廉江、化县的交叉点，全村居民均为刘传族，而且有许多进步分子，可为我们的优良根据地。

7. 该县民性刻苦耐劳，战前虽属文化落后，至抗战时已大为提高，当时参加张炎学生军之青年，该县约有百余人，同时在该县培植起来之青年小学教师也很多，因此县内民众工作做得相当普遍而深入，及

南路起义时有二十余乡武装起来参加斗争，现在化北已树立起强大之武装力量。

廉 江

1. 北接陆川、博白山地，东连化县、吴川，南接遂溪，西邻合浦。
2. 北部为山地蜿蜒，南部为丘陵地带，石角江斜贯县境，由石角经安铺，南流出海。
3. 北部山地区内有许多狭长山谷，东起石角，西至清平（约百余里），南包太平、急水、武陵、塘蓬、长山一带，北连博白之龙潭、陆川之盘龙，其间犬牙交错，为游击之优良。

合 浦

1. 东以山口和廉江接境，西连钦县、灵山，北与广西博白毗邻，南濒于海。
2. 北部山脉连绵，中部、南部为丘陵地带。
3. 境内南流江有船可通郁〔玉〕林之盐埗，该河发源广西泾县之东北，向西南行，与武利江会合出海。
4. 该县人民的氏族性地方色彩均极浓厚。
5. 全县分上八田（小江、福王、张王……）、下八田（公馆、石康、闸口……），上八田的地方势力建筑在氏族关系上，下八田势力建筑在新兴地主、绅士等关系之上（现著名军阀官僚）。

新兴地主产生的因素：

1. 官僚、军阀加紧剥削人民，将人民的财产变为自己的土地。
2. 流氓、市侩乘机发国难财，藉比购买土地。
3. 其他。

新地主与新地主的矛盾：

1. 争地方政权（如邓龙光与陈沛……）。
2. 争购土地（如邓龙光、邓鄂争着标价售田）。
3. 其他。

新地主与旧地主的矛盾：

1. 争购土地（如邓龙江、梁变坝……）。
2. 新地主操纵地方政权，削弱了旧地主的势力。
3. 新、旧地主掌握着地方政权，自己不肯出钱就得向旧地主落手。
4. 其他。

如何部署战略据点：

据点选择的条件（看附件）

1. 目前以容易巩固并利于发展到平原去的山地为适宜。
2. 粮食给养比较容易的。
3. 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

部署方式：

为了加速发展我们的根据地，为了对其他未发动斗争或武装起义的地区来一个有刺激性的示范，我们就决定采取公开部署方式，积极放手而有步骤的去做。

部署工作：

1. 军事方面：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部署（附件）。

2. 切实保障地主的合法利益（如交租交息），鼓励并帮助他们经营各种生产事业。

如何解决地方氏族问题：

1. 南路氏族与氏族间的关系，虽然错综复杂，但其矛盾并不如中区各地之尖锐化。

2. 解决氏族间矛盾，以统线工作为原则。

3. 积极的争取各氏族的开明分子，孤立各氏族的恶霸并清除之。

4. 通过各氏族的知识青年，积极分子的关系，帮助他们为解决该氏族内部问题（如祖尝、奖学金、学谷……），而进行和族绅团结及斗争。

5. 各氏族之反动地主、族绅等要予以打击并清除之，以争取该氏族的大多数弱房、弱宅的子弟对民主的自觉性。

6. 为了统线工作的顺利进行，首先用谈判方式，才好放手去做。

7. 实行二五减租之后，有些学校因为校租减少而影响了经费，

为补救这些学校，我们得以各民族的祖尝或某些庙产、公产等来弥补之。

8. 保护商运旅途之安全，为保障商人利益最容易做到的办法。

党及群众组织应注意什么问题：

1. 过去不敢放手组织和信任群众，因此，在工作上是一个大大的损失，在组织上也不能有利发展。

2. 过去的党外民主人士工作做得不够，今后我们应该根据统线原则，推动党外民主人士领导群众工作，我们只要求他们执行我们的政策，我们不一定要做领导它的上级，但我们仍要站在主动的辅导地位。

△△关于茂名电白信宜工作报告

(1947年)

我到南路后，即派往茂名、电白、信宜三县负责工作，领机是设在电白水东，去年旧历九月初一日开始接收。经过半月以上的时间，接收工作算是做完了。当我刚到达湛江的时候，与温同志首先第一次谈论政治形势和工作问题，到水东二十天后，才与吴同志接触。在这二十天内大部分是放在了解目前当地情况、组织情况和接收各地组织关系，讨论工作进行。我到南路是七个月的时间，与吴同志的谈话一共五次。

第一次谈话着重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如掩蔽问题、领机迁移问题、干部撤退等等工作。工作上的指示，多着重搞群众工作，如在乡村里组织族务会、文会、学务会、诗对社、三老馆、舞狮会、保丁会、生理会、巡夜队，恢复反糖税会（茂名裤花在〔民〕34年冬曾搞过反糖税，有千余户农民组织反糖税会），组织神坛卜卦算命，说世界大势已去，现在要转变朝代了，引用古时某僧人的一首诗，以新内容来向群众解释。那首诗是这样的：“红鸡啼后鬼生愁，宝位纷争半壁休，幸有六鳌能载主，旗分八面下徐州。”意思是说红军出动，日本鬼投降，中国地方被我军解放一半了，幸有救星出来，八路军现在延安。总之利用乡村迷信封建习惯，自己编下了一些奇形古怪的民谣，如“民国没有三十六，大小官员一锅熟”。利用乡村迷信封建各种各样的旧形式来组织群众团体，教育群众，运用群众，培养群众领袖，以便时机到来，号召一齐起义。组织方面审查恢复关系，调整撤退，分成两个系统，争取岗位。军事方面着重短小精干，编成主力连、武工队、海上队，人数以五十至六十为原则，开入靠山乡村开展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团体，在掩蔽下大刀阔斧，不是公开的暴露。训练部队学习

生产，搞经济先向大地主摊借，或向他打单绑架，如经济困难，也可打车打船。

第二次谈话重新决定部队人选，检查以前所布置工作，和督促执行，顺便调换一些人员，解决某些具体问题。这次多谈部队经验。把八路军、新四军的实际例子举出来，如何布置打仗，用什么方法来开展群众工作、搞政权。对部队内部，应纪律严格，赏罚分明，再谈到地雷战、地道战，特别研究地雷的做法。指示部队开到阳春、阳江交界地方丫兽山脚金坑、银坑等地去建立根据地。首先以武工队化装农民以走征兵、走征粮逃难为名，上山逃难，趁此宣传区方残暴，赞助我方爱民政策，然后以较大部队开去，要他们为我军保守秘密，不报官府，帮助我军探听消息，全村举行宣誓，秘密组织同心会、穷人会、保丁会（反征兵）、将全村组织起来，召开大会，公开宣传、演剧，这样子做法在梅菜潭已有几十条村做成功了。当敌人几次清乡扫荡，民众保守秘密，你不说我，我不说你，结果那里损失最少。

第三次指示切实搞群众团体，根据朱德同志在庆祝高树勋起义的演词：“解放区力量、高树勋运动、蒋管区民变，这三股力量会合的时候，蒋介石就崩溃了。”特别要搞蒋管区的民变，因此，我们要搞群众团体，领导群众反对三征，以便时机到来，有了基础，有了力量，立即可以发动起义，那时我们已建立起三老馆四间，打球队二队，打虎队、打猎队、拉排队、砍柴队四队，保丁会一个，重视群众工作，把它作为目前工作中心。部队恢复长枪组，编成主力连，人数稍可增加（以前指示高州部队不能太多人），工作地区不限于山脚，认为山脚附近有群众基础的都可以去。

第四次着重检查地方工作，和加紧督促执行，以及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特别督促部队干部开紧急会议，决定今后工作计划，对外的如何搞两面政权，打好统战，联络各乡公所，搜索情报，展开群众工作，宣传组训群众，提出反三征，甚至可以布置部队人员（以群众面目出现），配合当地民众抢征兵、抢征粮，警告税收人员，镇压反动分子，对内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新的做法，学会带兵打仗，训练刺刀术，学会袭击、伏击，提高战斗力，清算过去不良倾向，将经济队以及派出

各地的武工队集合起来上山过年，以便进行短时间的训练，这些指示我们都执行了。

第五次见面是今年正月初九日，为了准备起义，我曾到湛江去，这次谈得很详细。当时根据一本《群众》转载一篇《解放日报》社论“燎原之火”，内容是（大意）“内战中有各省民变了，虽然是星星之火，但快要到燎原的程度，二十多万农民拿起了武器，在国民党区到了这个地步，被统治者已经活不下去了，统治者已经统治不下去了。指出农民运动还只在开始，力量分散，组织性、觉悟性还需进一步提高，但这运动的正确性和目前的有利条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解放区与K力量的对比，保证K方必败我军必胜，并指出这个农民运动直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是粉碎K有力的一翼，呼吁全国应作有力声援，尤其号召城市民主运动，要和农民斗争密切联合起来，一切民主人士要更多的为农民服务，并为自己的运动确立牢固不拔的基础，来配合解放区军民的胜利”（详细请参考《群众》第十二卷，十一期《燎原之火》）。我们曾抄了许多份当作政治报告，吴同志跟我们讨论这篇文章，强调蒋管区应该发动民变，配合解放区自卫战争，因此，我们决定准备起义。当时也曾谈到这期《群众》是去年十月六日出版的，这篇“燎原之火”是《解放报》的社论，估计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在九月间。当时也谈到区党委的九月决议，和这篇文章的出版差不多上下时间，为什么区党委的九月决议做法这么慢，觉得有点太谨慎小心了，不敢放手大胆的做起来，这是内心的感觉，他并没有提出反对区党委的决议，而且他还嘱咐我们在还没有得到更正确的证明时，不能作任何的批评，认为《解放日报》是党报，有些文章是中央方针、政策的指示，文章里已要全国同胞作有力声援，把蒋管区城市民主运动与农民斗争联合起来，民主人士要更多的为农民服务，因此感到九月决议没有学中央那样放手大胆的搞起来。除了这些，也检讨南路过去的做法，他认为以前南路的起义，条件是最好不过的，一起义就动员了四五千人的，我们应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而南路的起义恰巧相反，他是从有到无，从大到小，把毛主席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割去了一条尾巴，却把化整为零化零为零了，把南路的主力实行长征。

他很痛心的说，自九月决议后南路的部队的确损失很大，把化州、遂溪等部队大大减少了，当时曾与温同志争论过几次，我主张把原有的部队保存起来，如不容许集中，将它分调到各县去，当作武工队活动，已搞起来的部队尽可能不复员，但温同志坚持自己意见，于是以“不刺刺激老K，不主动出击敌人，分散活动”决定，大部分部队被打垮了，复员了，搞到复员的战士和干部回家又红，住不得，在外无钱挨饥饿，许多战士很不满。还举出一次例子，化州部队被K攻击的时候，把机关枪埋起来，溜之大吉了，后来机关枪被K军拿去，部队被打垮。这显然是不准主动出击敌人的所赐。又例于〔如〕叫军事干部挖地洞，不给百姓知道，不能干部共挖，终于挖了二个月，只做好二三个洞，始终干部又没有去掩蔽，白白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一些干部很不满意。甚至有些组织观念强的同志说“只有做到死为止”，不敢提出任何询问。最近（吴同志指今年正月间）温同志来信说，各县的部队要缩小，每县规定的数目一共不过二三百人左右。目前各县的部队已不止此数，差不多二千人了，好似高州仅是四十余人，而当时温同志的决定要把二十人拨过化州，剩下少数的编成武工队，到靠山边的乡村去活动，吴同志问我那边有条件搞不？我说有的。我认为高州反动力量大，地区孤立是事实，但不是没有开展的条件。后来我们觉得有条件，不一定这样机械，在正月下旬我已决定大量发展部队，到我来港前不过是二个月的时间，已发展到二百人了，地方党准备到一百支长短枪了。当然这个数目不够起义，但这不是没有条件可搞。我们也曾注意到已搞了起来，如何支持下去呢？我们相信如果方针、政策没有犯错误，又能以群众为基础，注意巩固工作，没有不能支持下去的道理的。他又说温同志要他准备一千担军粮，〔可〕以向大地主捐借，多用说服办法，一万万（？）基金，控制河流、公路、圩场设立税站。试向南路那么阔，二三百的兵力去控制那个地方好？一千担军粮向谁捐呢？要是这样做，单是地方势力也可打垮我们的。因此化州、遂溪的军事负责人感到自己的武装搞这么少，给我们的任务又那么重，实在搞不通的，批评温同志叫干部拉牛入石；又谈到来信说搞武装必需注意三大困难：一、枪械困难；二、经济困难；三、兵源困

难。中国共产党的枪从来是敌人送来给我们的；只要你有资本，将来一定可以赚钱，自己有了武装，经济就没有问题了，难道手里拿着枪要怕饿饭吗？兵源困难是说不通的，共产党的军队从来没有人不喜欢当的，尤其是在南路（当地人民喜欢当兵的）和饥荒的时候，更没有问题了。谈到这里，吴同志说为了这件事曾流过两三次眼泪，做了几十年共产党没有流过泪，我宁愿在农村牛栏阁睡觉也不愿在城市享受。

吴同志搞武装是很有兴趣的，但对领导方面，有了相当的改善，他没有八股一套，很注意实际问题，因此，有许多干部对他反映得很好，化州干部接到吴同志调差的消息，说要哭一大场，许多同志说，与吴同志工作是很愉快的。

欧△△关于南路情况给温同志转区党委的报告

(1948年初) ①

温同志转区党委：

别后月余，现各地工作如常联系，没有什么大损失，合浦方面旧历年十二月下旬亦有人来过。你去后第一次来信，我开始在高、雷两地作过进一步布置，接吴带回信后，最近又亲见了化、遂、高方面三人，详细讨论布置。最近拟要派人去合浦，化、遂部队现在发展中，廉、高平常。现分别报告如下：

(一) 敌情方面，各县敌之兵力，无甚增加，据琼崖调来一个保安大队据称仅到了一个中队，据报纸上说其任务是拱卫湛江，兼防南路；又广州方面最近调来一个保安中队，闻其军官闲言谓将调一个总队来，人数二千人，未知确否。目下这两个中队，外来兵都驻湛江，未去各县。目前化县县长告诉各乡长云：“不要期望有正规军来了，一切要靠我们自己”。各县长中以化县“剿匪”最积极，他计划将其原有的警察，五个中队扩充为七个中队，每个中队由原有的五六十人扩充至九十人，即将县警扩充至六百人以上，以两个中队守城，五个中队轮流出动各乡扫荡，每乡停留不超过三天，并云“每乡组织四十人乡队，全县有乡队千六百人，加上各保队，连县警，共有三千兵力，化县奸匪最多七十人，且都是短枪的，何愁不能扑灭”，这只是他的想法。目前他只有五个县警中队，以两队守城，三队轮流去各区扫荡而已。化县各乡队多已组织起来，人数三四十人，化南各乡队一般不敢积极反动，化北有两乡较积极，化南保卫队，大多要求与我来往，遂溪、廉江、高州等县兵力未见扩充。目下茂北又拟组联防队，尚未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组织成。合灵据丁来信，亦无增加，合浦有县警四百，灵山三百。照我的估计，敌是可能再调一个保安团来的，但即使再调一二个团来，也只能集中去各县轮流扫荡，想分兵去防卫各县是防卫不住的，月来因我各地渐渐积极动作，敌各地方团队、乡保人员更为动摇。前月我遂溪海队在徐闻麻罗港搁浅，被警察来检查，我先发制人，打死了两个警察，俘获一船军米而归，此事震动海、徐。海康有个乡长，告诉乡兵，以后凡遇有年青生面人，切莫去检查他，以免惹事。又吴川程队派人去塘垵，打猪税老，路上被乡兵检查，我即开枪击毙其二人。最近遂队袭沈塘以后，影响更大，化南有一乡长原较反动，我去信问他要和要战，要战则要把家眷都搬到乡公所筑起堡垒来，要和则答允我之条件，二十四小时内答复，结果只好依期来了。目前的情势是我声势渐大，对敌下层组织威胁更大，故其下层较前动摇，而其上层则更着急，更积极，化县的情况是如此的。

(二) 我之武装力量，随着近来的积极活动，已在逐渐恢复中，现分开来讲。

一、化县方面，目前尚未恢复至九月前数量。你走了后，我共见了高唐二次，第二次是旧历新年，几天前他才回去。化州在前次敌扫荡中，失去步枪统计百余支，机枪一挺，我尚存步枪仅百支，计化南六十，化东南二十，吴川十余，化北长枪是全失了，除黄飞丢了的外，其余是被抢去的。这些情况你过去已知，你走后我曾叫高唐将吕部集中回化南，重建长枪连，比较集中活动。但因干部思想一时难变过来，因此直到去年旧历下旬始集中回来，挖出二十余支长枪及机枪一挺，又新买了一挺，共二挺，在化南活动。十二月下旬化南我总计吕部三十余人，别动军（全驳壳）十二人，另其他带枪人员十余人，约有六十余人。化东南中队三十五人全部驳壳，配冲锋机一支。化北黄队十二人，吴川程队十五人，俱短枪，总计去年十二月底化州只有武装人员一百二十人，轻机二挺，冲锋枪一支，驳壳七十支，步枪二十支，尚有步枪七十支未挖出来用。去年旧十二月二十二日，我把解放日报社论《燎原之火》及周恩来同志关于半年来作战目标的谈话，写给高唐，在化南几个干部开会讨论过，情绪更兴奋些。他们原预定

在旧历正月底集中两个连一百人，合短枪共二百人，二个月内扩大队伍，总数三百人以上。第一步是把原有的长枪挖出来集中于化南，以振志及崩口仔分任连长，配轻机二挺，活动于化南、吴西北、化廉边境一带，准备首先以实力开辟此纵横百余里地区的工作，化中以及化北，暂未组织长枪队。准备布置袭击两个乡队，解决些枪，扩大影响，数月前已袭击了长版乡公所。高唐未有信来，据一来买物之队员云，缴得轻机一挺，步枪十余支，国民党报纸上已载此事，当是属实了。

化州部队活动，以中队部最为积极，情绪亦较好，与化北、化南不同，因他们始终是小股活动，没有过如化南、化北的集中扩大时期，因此前几次大扫荡中与分散掩蔽，未十分影响情绪，而国民党正规军一撤走，为了搞经济，他们出动的较多，故目前情绪较好，前月打电船，打死了化州党部书记苏大德及一个连长带士兵四人。十二月下旬打东营梅六车，因该车上有军队，廉江县警一个班九个人顽抗，展开对战，被我全部歼灭，毙八人伤一人，缴枪九支，另打死了其科长、主任等三个人。此役梅菜一带人心大震，我队战斗技术比前亦有进步。

化州部队要两个月内发展至三百人，尚须搞百余条枪，预算想在袭击、伏击战中缴获四五十支，其他因为数月前他以收枪的办法解决。以前我们原拟收取之枪，因执行长期掩蔽方针停止了，现决继续去收取，预计两个月当可完成此数，或可超过。我经和高唐研究过，认为上述之目的是有把握做到的，这几天他们可能购到一支机枪。

遂溪部队旧年底已在泥地集中了一个中队，七十人，由区集中了一个中队三十余人，该中队长拟于正月初集中到五十人，旧年底时统计遂队共百三十人，除上述二队外，其他为地方武工队。计西区二十，东南十余，南区十余，派海徐边活动之武工队，被敌袭击，死一人，被俘二人，回来情绪很低，认为这样做怕不成。我意原拟叫他暂缓回去，但沈已令他们再去了，未知再出发去了未。部队计划于两个月内武装发展至六个连，预计原有力量集中并设法缴取些枪，可能搞到百五十人以上。此外叫符部集中百五十人，符区被蒋扫荡得很厉害，何麟书部下乡扫荡，凡遇姓符的女子，都被强奸，因姓符女子嫁别人为妻者，亦有被在路上强奸，故许多姓符的因此都对蒋军不满。但符

部因前我叫他集中了又复员一次，颇有损失，现一时联系不起来，符等对我有半信半疑的表现，方恐坚持不下，符族之人对符等云：如你等与共党真有关系则可回来搞，如没有则不要搞了。目下其齐王一队三四十人尚经常集中与我有联系，但十二月底我袭沈塘时亦来相帮，此队与我较接近，完全肯听我指挥，估计我如坚决积极斗争下去，符部两个月内集中百余二百人，是不成问题的。我现决极力抓住这股人马，派阿金去做政治委员，准备将符部独立为一个大队，我队三个连编一个大队，由黄郑任大队长，由李任政委。目前部队分在各地集中人枪以后，则全集中到泥地去，准备首先在泥地打开一个局面。目前部队最难者是枪，现仅有步枪百支，此地收枪条件不如化州，在南区及湛市之铺仔太平略有些路数，现在又尚未能搞。旧十二月二十三日我与沈计划袭城，如事成可搞到步枪七十支，机枪三挺，已破壁入内，有内应接应，因在外边接应队伍为敌门哨发觉，打了一枪，领队干部临时将队伍撤回，遂至功败垂成，甚为可惜。二十五日我部又袭沈塘乡公所，此次又因没有策应部队，故未能全部解决，仅缴步枪十余支，俘其乡长而去，我牺牲队员一人。时敌由雷城派兵去援，我援兵亦至，打了一场，我安全撤退。目前遂部连符之齐王部有机枪二挺，另有损坏者一挺，化州亦有损坏者一挺，我叫沈派人去合浦叫撤退回去之修械工人回来，准备把这两挺机枪修好，都交遂部用，另想法去买，最近可能买到一二挺。经我与他研究，遂部扩大至正规部队二百人（两个月内），大致上是没有什么问题，我打算达到五日之数，目前亦有此条件，但我盘算一时还未能打得太大。化州方面估计亦可能超过原定计划的。此外遂部尚拟就现各区武工队基础，西东区各建一中队，南区建一个至二个中队。

廉江部队，旧年底接王来信，云拟两个月内发展至二百人，缴二条机枪，来信未说到具体搞法，我怕不能完成，已去函提了些意见，并着阿王来此见我。廉部肥王队上山去，不敢在群众中露面，天天住山岭，没得吃，白天去村中给百姓做工，又不敢带长枪，每队只有一两个有带有短枪，故意给人看到，其他的人则装假有枪样子，队员情绪消沉，无信心，甚至肥黄也提出要回香港去。有一个班长自动把一

个班遣散了，该队原有三十人，遣散了十人。后来我叫王即回去（你走后几天王曾来），叫他们把步枪扛起来，分开活动，不准装假，积极活动。十二月底王来信，云黄部已复集回到三十人，活动过的村子有百余条了，景况可能有改善些，去年底廉共计有黄部二十人，树德队十五人，共有人枪四十余。九月前廉部原已有七十余人，当尚有三十支枪，埋藏下来，估计两个月内可能再组织至百五十人左右的。此计划尚须与王见面后才能肯定。

高州方面钟部撤退云潭后，未曾作过战，住在山上不敢见群众，没饭吃，弄不到钱，饿急了去偷牛，又偷了自己人的。部队可说毫无斗争精神，现在也未恢复过来。你去后王老五来报告，说得情势甚严重，什么“山地日夕在敌人扫荡之中”等等。但敌人只在云潭有一县警中队而已，云潭乡兵十余人，经常出动，找去我地方群众地下军的人，我毫无想法对付。我当即去电白见了老王叫他们把队伍拖回丫髻岭，当地敌人没有什么兵，情况尚好，现部队全集中回丫髻岭，共有五十余人。钟部撤后，留覃巴活动之刘仔（杨辉之弟）及欧仔等九人，自动将队伍遣散了，刘、欧都逃去香港，欧且寄信来说南路革命没有希望了，两人走去香港，现此队尚未恢复。马踏队由杨负责，亦以遣散待命为名解散了，此队现已恢复，目前在马踏筹款被敌袭击，现亦撤回丫髻岭。钟中队枪未失去，人现较前共少十余人，目前他们畏首畏尾的现象较别处严重，因干部较弱，隔得又远，领导上不密切，王现提议将部队集中活动回去游击，我原则上同意此议。但认为中心还主要霸住这块山地，在目前是可能在此地区缴一些乡保的枪以及零星收取一些的，打算在云潭把原有的十余支枪动员起来组织一个小队，在覃巴活动，派周亮回去恢复覃巴队（又高唐方面尚只有一小队在覃巴活动，田振初之弟带的），与化州方面取得联系，我给王的任务是两月内发展到百五十人至二百人。田阿涂传达此意见与他，并约他出来见我，在未亲见到他时，此计划能否实现尚未把握，估计扩大到百人左右，是可能的。

合灵方面据丁旧〔历〕十二月中写的信，云存二百二十人枪，有轻机十挺，冲锋机二支，文法部因文法阵亡，队员星散。现由莫平凡

负责此队，收集了五十人左右，文法如何阵亡，他未报告及。琼前已向你们报告，部队内逃亡之风甚盛，悲观失望，据来信中附谭写的报告尚要贯彻长期埋伏方针，把部队再分散，计灵保持一个五十人之主力，合保持一个五十人之主力。据其报告，拟分散后统计各队合共只得百九十人之数了。我当即去函与丁，因我对他非上下级关系又不明具体情况，故只用我个人名义，给他提了意见，叫他负责在两个月内把部队恢复至九月前之数，并告诉他一些化州、遂溪等地的经验，抄《燎原之火》及九省民变两文给他，并提出我对时局问题的一些意见，又把你第一次来信的意见告诉他了。这几天我准备派人带信去给他，他们与大周仍未取得联络。丁之对武装工作办法少，无魄力，而合灵干部同志政治水平较低，目前尚在消沉中，又没有群众工作基础，经济又困难（已经有卖枪换饭吃及卖三支步枪换一支短枪现象发生了），未知能在两个月内恢复原有力量否。钦防方面未有报告来，情况未明。

总计高雷我全部武装人员，目前仅得三百七八十人，仅约等于九月时化州一县之数而已，合灵部队，亦已减员一半，损失可谓惨矣！目前要恢复原日力量，尚须一番功夫，故建立主力团之议，尚嫌过早。我的意见两个月内先在化、遂、合灵建立三个主力营，主力营建立后，亦不必急于集中于一个地建立为团，而是各营就地放手大胆去发展，扩展为团，此计划得须半年功夫，然后酌量地调精纯集中建立一个更具规模的机动主力团，各地仍有一个地方团，这样，半年以后，便可具有一个军分区的规范，可以霸下一块比较固定的地区，有较正规的政权及他其各种组织。如果安南的主力团回来，则做法可能略有不同，但我以为上述方法，可能更坚实有力些。

又目前正在想法争取些土匪，计化州可能争取得一宗二三十人，电白一宗现较无把握，二三十人，遂溪一宗三四十人，现在尚未准备给他们名义，打算在我主力团发展相当程度时再将他们编入较正规部队内，这样可能把这些土匪部队快点改造过来，此是对目前这几个可能争取之政策。将来我声势更大，可大量收编时，我意可宽些。

（三）其他的工作：各地党的工作无甚变化，不须详述了，如要起义，高州之县同志所能起的作用可能很少，前天我见了阿涂，他不

知在何地方能掌握到一支半支枪否，仅电白一个村近领导了反丁斗争，可能掌握四支枪，准备起义工作早已向他传达（你离湛后我即去过水东），但他对这些工作，可说毫无去做，注意的只是这个教员那个教员的“岗位”，党的领导机关的任务，简直是个小学教员介绍所了。同志们脑子里没有点“造反”的观念，各级领导干部尽是一些秀才们，就是阿涂也觉得这些人有些怕。高州方面的领导机关是要换人的，但目前如换不倒着去，怕也好不了很多，此人太少魄力，没有大想头，目下高州欠缺的不是这样的人。交给高唐，怕也兼顾不了，真是有点为难。

群众工作，遂、化二地略有做些，化县做得较好，化南我经常活动的有六个半乡完全减了租，其他乡也有部分减了的，在正规军将走之时，卓琼等用减租团名义出了通告，去各村宣读，因过去组织过农会，宣传过，因此能把农民组织起来，扣下应减的租不交，更加上正规军一走，我们地方武工队恢复活动，杀了些反动派，有些地主吓跑了，有些跑了以后又问我能否回来，因此我有条件控制住地主，助长农民之威，又国民党确有命令到乡公所，因此租便减成了。因为以前组织之农会取消了，他们没有取用农会名义，只用同心会名义，有些地方则还是没有什么名义，也没有组织形式。计由武工队组织之同心会现参加者有万余人，地方同志组织者未详。同心会一般都宣誓饮血，有些还科了会费，准备应付敌人，反丁反粮，决定不再交丁交粮了。因第二期抽丁，有些地方如海康从前七百人抽一个，现在抽三个，广州湾原一保二个，现抽七个，一般农民最怕的是抽丁。地方则有些也参加我之抗粮的，化县有些地主参加同心会，因参加了农民可替他放哨，国民党来就跑，这些地主除今年粮外，还欠旧粮，把今年全部收入交去，也未足数，故只好拖下去。据调查化县有些小地主，减租后又要交粮，原有一担租，只实收二斗五了。故地主对国民党的征粮，负担很重，对国民党不满更深了。遂溪在泥地，月前开始用联防名义，组织了部分乡村。电白马踏附近一个村，有我们的同志，领导了全村反丁，不肯交丁、交粮、钱，乡公所派兵来捉，被他们打跑了。当时电白领导同志知此事，告诫该村同志不要再搞，不要扩大，现未知是

否已被我们“平抑”了。该村附近几条村千余人亦大部不交了，本可与之联络，又附近有些村自动发起抗粮斗争，系有些地主搞的，亦可联络，现虽已由涂告钟去纠正，但恐此事已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各地原来是没有群众工作的，现在也还是这样。大约化、遂两地斗争尖锐些，无论怎样，也要做些，不然就掉命了，因此有些成绩。而其他各地，因环境安定，不做也成，做了反惹麻烦，故始终搞不起来。总之，没有造反之心，即做亦不容许做出什么来的。领导干部作风与此很大关系，如阿涂到现在他尚不知茂南有个同志领导一个生理会，也不知有个同志当保长，其两村减过租，成立过租规会，问他，他说忘了有这些人，不知是否有这些人，这样怎会做出东西来呢？

目前我们尚未敢提出政权问题来，因未知你们的意见，如要大搞，此是不能不弄起来的，目前我叫各地凡我武装活动所及之地，在群众中公开组织抗丁，抗粮，组织抗丁抗粮委员会，工作方法如以前我叫化县覃巴等地组织农会方法相同。要想使抗丁抗粮委员会实际成为支配乡村的机关，迫国民党乡保人员为两面派，在化南及遂溪泥地地方，则准备两个月后公开解决了该地之国民党乡保组织（不是屠杀而是取消），建立一面的抗委会。我以为由武装队伍活动组织之农会工作，如数月前在化县等地之农会方式，方是带群众性与合于掩蔽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这些乡村，变成为“两面村”，才能使我们在实际上控制其全部群众，才能保持秘密。覃巴区公开组织农会之新开辟四十余村，至今未被破坏，而过去秘密活动找两三人组织地下军的地方，在钟部离后，据不完全统计已牺牲八人，给搞垮了，因为那种方式是难以控制全村的。

目下一两月间，反丁是最易动员群众的口号，我已通知各地无论已有武装斗争或无武装斗争之地，都以这种形式来推动这项工作，组织群众。化、廉、遂是可能做出些成绩来的，其他各地现在看尚没有什么把握。

经济方面，月来除化县方面搞得千万，遂溪方面搞到几百万外，其他都搞不到什么，玉老五处最困难，连伙食也赶不上，但尚较前些时期略好些。除遂溪交来百余万，化州交来二百万外，这期间中我没

收入，还给了三十万给丁做伙食。两个月内，如部队按计划扩大，在未能建政权收税养兵情况下，暂靠目前办法，伙食当尚可维持，长此下去则非靠政权来养兵不可了。目前各地买机枪要花钱，故我没再抽他们的钱。

目前我已向各地提出用土法造手榴弹及地雷，限半月试验成功，一个月造出第一批成品。此事经已与高唐、亚沈详细研究过，认为是有保证成功的。数月前，遂溪做手榴弹的办法太洋化，一则技术难搞，二则原料难买，在目前我们条件下只有广泛采用土法制造，始能大量生产，普遍生产，以供需要。此问题解决，可增我们部队火力两倍，而且可使武装斗争更普遍起来。我已下最大决心，必使它在最近成功。

此外，还拟用土法制些燃烧弹、催泪弹之类，这些更简单，必可成功的。

区党委九月的指示，是肯定地错了的。假如九月以后我们继续采取积极的方针，今天我们的力量最少也比现在大几倍。现在又要积极搞起来了，我以为区党委最好在新指示中对以前错误有所批评，使同志们有清楚的认识，也较郑重些。我接第一封信后即从积极方面布置工作，但下层同志多有未信者，怕再来一次转变，如遂溪同志他们都认为九月以前和九月以后的搞法，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但是他们还是恐再来个转变。直到我接到你二封信，将内容转达给沈，沈并拿了我的信给干部们看过后，他们始肯放心去做。化州亦略似此现象，他们虽然承认这次失败，主要由于我自己不坚定，但也说：“上级也要负多少责任吧！”看到了《燎原之火》后，他们自然会觉得区党委九月指示和中央精神是不同的。因此我希望新指示中略有提及，较郑重些。

我对目前国内形势的了解是：蒋军在几个月内乃至一年内必遭受决定性的失败，但由于中国政情的复杂，将仍以和局结束。一个时期，反动势力将仍可以控制其原有地区几年，广东的胜利，今年是未能取得的。但在今年是个决定关头，我们若能在此期间内，占下相当十县八县的地方实行革命的割据，则这些地方即使将来广东全省尚在反动派支配下，而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是民主力量的中心，将加速在将

来斗争中广东局面的变化。现在既然决定起义，我以后必须如过去抗日时期建立根据地似的来做，要有一整套政策，大胆放手来做，稍有点畏首畏尾，就会做不成局面的。你来信提到建立主力团，建立粤桂边区武力，但未讲到其他政策，因此我们感觉到有点茫然，下面同志也未敢放胆，多少还有点怕搞错了，未敢自己做主。新指示希望就能提到各方面政策的问题，并确定要做成怎样的局面。

我以为目前南路我之力量已较弱，但如放手去做，政策搞好，半年内扩展武装至四五千，割据相当于一个乃至两个县的区域，还是甚有可能的。如安南部队不回来则困难多些（他们应无论如何想法回来），即使不回来，仍可能实现上述的目的。我的计划是目前两个月各县地普遍做准备。其中遂、廉、化、合、灵几个地方，两个月来尚可扩展至共有千人以上，此时仍不必将各部集中，而是各部在自己集中力量，并扫荡国民党下层乡保武装，相机歼灭其县警队之一部。普遍动员群众抗丁抗粮斗争以动员民枪，收缴地主之枪，收编土匪，其目的必须远在我活动所及之地区之枪械，绝大部分被搜罗于我手中，同时派出队伍去附近未有我武装活动之区，策应并配合当地同志领导的起义。这时期可能发展，是必须摧毁国民党区乡政权，建立我的政权的，如此将由日前较为狭隘的活动转入更广大的群众性斗争中，具有很明显的面目，并由于此时我军在北方战场已经不可掩饰的胜局，对群众的鼓舞，与统治者的动摇，我必有很大发展。我上述的预计是打算国民党再调两个团来进剿，我们仍是有可能做得出来的。在目前第一步，发展的地区要在老地区及其附近，而不要奔波到遥远的山地，因为那里没有这样好的群众条件，是难以在短期间内发展起来的，地方性的部队逃跑到陌生的山地，战斗力与战斗情绪都会减弱的。两个月后我的意见或可酌量抽调廉、遂、化一部兵力，协助廉江部队去打开廉江北部粤桂边的局面。我意将来系以此地为我之中心区，因可以南联遂溪，东联化、吴，西联合灵，北出广西，山虽不很大，但以我之力量分布言却不孤立。化北近信宜之粤桂边，地形虽好，却是孤立的，我又无基础，发展条件是较差的。雷州之徐闻山亦有些毛病，且毛病很大，故我意遂溪发展方面要向北，而不是向南。

我意以为我们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领导机关必须立即下乡，最少你回来后，我即下乡去组部队，如仍长期留在城市，必致坐失时机。目前我们军事干部虽然缺乏，但如在作战战略指导上给予以指导，在战术上改进过去那种漫无目的打半天枪，打不死一个敌人的乡下佬械斗似的打法，加以近战，专门学会打伏击、袭击两套办法，合意则打，不合意则不打，是可能很快进步的。如我下去，最少可以给他们介绍一部分道听途说的华北经验，总会好些。如区党委不能调军事干部来，我希望暂时试让我来担负这个责任，可能比阿沈好一点，因关于打仗的事，无论如何他知道的要比我少些。最近我拟写篇文章，要在干部之间发起学习带兵打仗的运动，希望能经过这种研究，从过去经验提高一步，目下没有人，只能从这些人打算盘了。合灵方面需要有人去，单靠阿丁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如安南的人不回来，我看要从阿沈或高唐中调一个人去，直接跟部队，而不在城市，这样那边当有保证发展。

高州方面，我提议如没有人派来，则调现负责湛市之阿李去，如阿沈不走，则沈彬亦可调去，沈彬如在遂，因干部多，工作已上轨道，又接近领导机关，可能调张贞素代沈的，或竟调阿丁回高州，亦是一法。我如下乡主要系在遂、化队，故高、沈二人勉强可推动，或我自去合灵，你下乡随遂化队，亦是一法。总之想法派人入合灵队去也。

部队名义，希望能考虑准许用解放军名义，因此名字香，群众都懂了，不要另改别名较好。又党在部队中之面目如何，亦希指示，对政权问题亦希指示，或仅以抗丁抗粮委员会之数代替政权。但我以为初期是可以如此，我武装力量已经可以相当控制一县数县之乡村时，则建立政权有利无害也。

今日接丁来信，钦、防共有人枪七十人，机枪二挺。丁意拟将合灵部队调去十万大山，以安南为后方，以钦、防为活动区。我拟去信要他不要调去，不但是现在合灵部队必须留地方坚持始能有根据地扩大，并且我认为将来我南路之根据地中心必在廉、合、博之粤桂边而不是十万大山。至所谓以安南为后方，则更无理了，钦、防部队目前情绪较合、灵好，据云九月方针对他们传达很慢，且很肤浅，故未有

什么影响云云。照现在看，丁不能再调回高州，因新人去，又要搞许久才能熟手，但我看他应入部队。

希望你快快回来，并希望即让我入部队去！时间实在太迫切了，斗争展开起来，如不下去，是搞不好的。

今天本拟再就情况及我个人意见补写一些，因没有时间，只得写了。我现在还很有信心，迫切希望区党委的指示，望你即回来。

阳春民武显威 (阳春通讯)

(1948年3月)

海 客

阳春是西江与南路之间的一个偏僻的县份，交通不便，地瘠民贫，经过国民党反动政权长期残酷的剥削统治，现在全县三十多万人民反抗的火焰已象冬天山岭的野火迅速漫延壮大起来了。就在去年十二月五日伪县长邓飞鹏上台那一日，他召集下属及地方士绅训话，大抛浪头，说什么主席“宋公”挽他出山，如何有办法剿灭“土匪”云云。不料那天下午一时许，人民武装的一部分带着四挺轻机，就来袭击距县城三十里的马水圩。当时人民武装附搭由阳江驶上的电船，恰巧伪县保警中队长严镇球带着几名卫兵坐在船上，看见人民武装仿佛飞将军从天而降，吓得慌忙要跳水逃走，但已来不及了，被武装人员喝声“站住！”便只好俯首就擒，当堂缴获长短枪四枝。船到马水圩，武装部队直扑乡公所，兵不血刃缴获长短枪十二枝。随着部队打开谷仓，将存谷八百余石全部分给贫民，远近数十里内民众纷纷走来担谷。人民武装在圩内活动了五六个钟头，驻在附近的伪保警一个分队始终不敢动弹，直到第二天人民武装走后，才装模作样的踏着龟步来一个“追剿”。邓飞鹏受了这一下迎头痛击，恼羞成怒，下令要将这个分队长扣押泄气，但那分队长听到了风声，一溜烟的开小差走了。邓飞鹏便乱拉了几十个民众，按照财产罚了一回谷款，这一事件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恨。

马水破仓之后，邓飞鹏向阳江请到救兵二个中队，再凑上自己三个中队共二百余人向春北“扫荡”，被人民武装在溜洞打了一次截击，死伤十一人。反动军慌忙退却，沿路抢掠人民财物，因为分脏不匀，主客匪军发生冲突，几乎火并起来。溜洞反扫荡胜利后，人民的胜利

信心更提高了。一月二日下午六时民武扑击春南河口，摧毁反动乡公所，缴了六条长枪，并将仓谷四百余石分济贫民。一月二十日深夜又围攻古良税站，俘警兵九人，缴步枪八枝，子弹七百余发，其他军用品甚多；撤退时并把抽剥人民的税站放火烧毁。

邓飞鹏经人民武装这一连串的打击后，威风都扫尽了，但后来当着伪省府视察李某到县的时候，他又老着面皮，硬充好汉，亲自偕李某和警察局长张达寰等百多人向蟠扶进攻。然而这时人民武装主力已转到了春北，并与△△部会师，随即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在云浮县属富林地方把云浮伪保警第一、二两个中队全部打垮，俘中队长巡官以下五十余人，缴轻机两挺，步枪三十余枝，获得空前大捷。邓飞鹏闻讯率师驰援，刚走到春、云边界，山凹里机关枪阁阁的响起来，吓得这班狐群狗党失魂落魄，争路狂奔，总算便宜了他们逃出性命。

由于人民武装胜利的鼓舞，阳春许多地方的农民都自动自觉组织起来了，到处实行武力抗征抗粮，破仓分谷；有些地方已减租减息，实行民主改革，连地主也不敢下乡收租催债。青年学生和农民纷纷参加部队，人民武装更加声势浩大，仅距县十里外便可纵横自如。邓飞鹏手下的反动武力不过是五个保警中队，合计只得二百余人，而且武器窳旧，战意消沉，在处处告急、地地请兵的情况下拖来调去，实在弄得筋疲力尽了。最近伪七区清剿司令部派出伪副司令周万帮来县，成立所谓“两阳指挥所”，从两阳各抽一个保警中队组成所谓“机动部队”，意图再作垂死挣扎，但这批残兵败率能顶得什么事吗？广大人民都要起来自求翻身解放的时候，什么反动力量也阻止不住的！

（原载《正报》第80期，1948年3月13日）

吴△△致方方的信

——粤桂边武装斗争情况

(1948年4月14日) ①

方方同志：

因为交通立刻就要走了，我没有时间给你多写一些话。现在我只两个钟头给你写这封信，我的话也许未能一次写完，而且可能有些地方写得不够考虑。

我们的武装工作几个月来（自今年正月以来）是有些发展的，尤其是最近一个月来我下去自己当起司令来以后，带了千把人在化、廉、遂来回兜了一圈，打了几场较大的仗以后，现在我们的声势要比实际力量大了很多倍。现在在化、廉边我们已控制了纵横八九十里的地区，包括九个墟场无敌踪，廉江控制了十个墟场，遂溪控制了整个泥地。在这些地方K的乡村政权已经没有了。化、廉县长已委出，在我控制的地区已建立了乡村政府。我们准备这几天在遂溪也开始搞起政府来了。我们的行动已引起K当局十分注意了，公开说目前匪情以南路为最严重，而且其兵力亦已逐渐被吸引南来。因此我希望你们也于此时特别注意南路的工作，目前全省其他各地的情况我并不详悉，但从表面看，及根据一些道听途说，其做法是和南路有些不同的。不管对与不对，南路几个月来的工作，总是有些特出吧。我本来打算把我这几个月来的做法想法，尤其是我下去随军以来所接触到的实际情况多写点出来，以供你们的参考。但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已经不可能。现在这里的同志都有一个疑问，其他的地方为什么这样沉寂呢？他们怕别的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地方的活动不能与这里配合得起，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大概有些地方的同志，是放松了当前的许多有利的时机的。我以为区党委一年余来的武装工作指导上的错误就是根据欧、温二同志所传达的已经总结过了，但是这个总结所表现的，仍是未能彻底从思想上清算了这些错误。如对旧年九月决定，仍有“作为方针是对的”等话。而只承认这是工作布置上的缺点。我以为象旧年九月决定之类的决定，是与当时的实际政治形势没有丝毫吻合的。它曾经使我们的工作遭受过如何严重的损失，这一点不已经是很好的经验教训，是很明白的证据吗？如果现在我们还来勉强去把那些在事实上已暴露出完全错误的政策安上一个基本上是对或这样提法原则上是可以的等话，我们将无法在今后的指导工作上改正过去那些错误，无法使同志们对于当前及今后究竟应该怎样做弄得清楚明白。我以为目前区党委已经表现出由于未能彻底清算过去一年余以来的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因而在目前的工作指导上也就不可能不残存与继续了过去的错误。而这条“尾巴”将再度影响我们对广东全省的指导工作，影响各地干部的思想，影响各地的斗争，因而使各地的工作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可能再放松无数有利的时机。

这次区党委（或南委）关于武装斗争的原则是从小搞到大搞，我前次信里已经指出我不同意你们这种提法。我曾经指出从小到大是武装发展的必然过程，而小搞和大搞，在我们（尤其是我这里）干部习惯的了解上却是两种不同的内容的东西，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范畴”。一年余以来，我们所提出的与在实际中做着的那种消极的武装政策，这种做“小贼”的做法，正是小搞。因此现在这里的干部，一听到小搞二字就害怕，恐怕又来那么一套了。而事实上在你们的指示布置上也多少还残存着那末一套的一部分。即使如你后来所解释的“放手小搞，准备大搞”，我以为也还是解释不通的。放手小搞究竟是怎样的搞法呢？既然规定是小搞，它就是在其规模及内容上都有限制，没有这种限制，就不叫做小而叫做大。既有这种限制，则所谓放手，就实际上不能不成为空话。在这里我更希望你们注意到这样一件情况，即：由于长期以来我们领导上的右倾，因此目前党内普遍的倾向，不是过左而是过右，许多党员在思想上已经不知造反为何物。他们习惯于象

乌龟一样缩，而不肯象鸟一样飞。我们这里表现的是许多同志比群众还落后，如我们打了乡仓，群众纷起抢担，而我们的同志却有很多不敢去担，为什么呢？他们怕暴露。遂溪有千余党员，现在有成千部队了，而党员参军的离一百之数还远，化九牛二虎之力也动员不出来。根据这些情况，我以为我们此时所应当注意的是如何使全党从右边拉过来，而不是“及早”预防他们过左。是要集中声音大声去喊他们起来大搞，而不是生怕他们一下子搞得太大，因而预早提出小搞。而现在我们这样做，事实上就不能不束缚干部的思想，使他们仍然想不开来，仍然不敢彻底造反，提不出勇气，没有认识到过去的消极政策的错误。因而就正如对一个熟睡了的人，不敢大声喊醒他，便害怕他醒得太快太猛，因而就想事前告诉他，你只能慢慢的醒过来呀。难道他能听得到我们这种好心的教训吗？我以为目前我们必须舍得放下小搞这个“不祥”的字眼，大胆向同志们大声喊“造反呀”！拿这种态度来指导当前的各地武装斗争，始能真正把党员与群众动员起来。不要怕他们搞得太左，为着他们从右倾中翻过来，事实上也需要某种程度的“矫枉必须过正”；过早提出防止“过左”，事实上将使我们的指导方针仍然停留在过右。这点道理，你知道的当较我更为清楚，我希望你再加考虑一下，即在我们这里，左倾可能发生得更早些，现在已开始有些萌芽，但我暂时还不打算普遍去反对它。我的原则是先把大家唤醒起来再说，决不在他们未醒以前在他们耳边喁喁细语。我现在再迫切要求你们改一改你们关于小搞大搞这个方针，不然它会累事的。

根据你们所提的小搞的方针（不管怎样解释）你们对于目前的具体工作布置上，也就还表现着畏首畏尾的态度。譬如关于政权问题上，你们对平原地区的原则是建立两面政权，这在事实上是行不通的，譬如现在我们在化、廉边、廉南及遂溪已经摧毁K之乡保政权，K至今尚未能“收复失地”，难道我们不是去建立公开的一面政权而是要去请一些“第三人士”来建立个可左可右（事实上不会有这种第三人士）的政权，或简直让K回来再建立其政权而争取其做两面派，或我派人去出面建立个K的形式而我们的内容的政权吗？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而且不需要的。我们现在的斗争和抗日战争时不同，那时是国共合作

时代，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抗日而不是打倒K政府，因此那时候初期不建立我独立的政权（不与K申明敌我之分），群众也还不觉得什么，也还有群众跟我们跑。而现在，我们的武装活动的直接目标是打倒K政府，这在群众的了解就是造反。如果我们不全个造反而只造一半，你就休想发动整个广大的群众。化、廉的群众在以前我们长期掩蔽的政策下，在一些两面政权下，总不敢积极动作，只有这次我们出了布告，委了县长后，始见耳目一新说：“这次老实了，连县长也委出了。”他们见我们坚决，他们也就积极起来了。我以为两面政权决不应于此此时提出，即使在平原地区，除了有特殊作用者外，我们决不搞两面政权。我们首先就要摆得旗帜分明。我是我，你是你，有我无你，必须有这种态度，才能把“反”造起来。如果造起反来而又自己去建立一个面目不清的政权，这是徒目以混淆视听，迷惑群众，其结果将使我们的斗争不能得更大的群众的支援而软弱无力。我并不是反对争取我们尚未能完全控制的大的政权为两面派这件工作，而且在事实上我们这里现在还是很注意这种工作。但第一，我们既控制了这个地区，那怕是暂时的控制，我们决不去在该地建立企图永久存在可以反齐反楚的两面政权；第二，在我们有办法控制其一部分的地区，我们即搞两个政权（即我之政权与K之政权并存）作对立的斗争；第三，我们目前第一件急务是唤醒群众，把群众动员起来造反，而不是未造反前群众根本未动前就谨小慎微地去耽心群众造反起来了会遭受K之扫荡摧残，因而想事先留一条后路，不为已甚，不让群众出头，而想于几个中间分子来挡阵（事实上不可能有这种理想的中间分子），这样是永世也动员不起群众，因而我们就无法在群众中起得力量以坚持当地的斗争的；第四，我所了解的政权的建设过程，决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很曲折的，我们可能把K现存政权摧毁，因而建立我的一面政权，跟着K主力回来了，又把我之政权赶散，建立了他的政权，有些地方可能是，乃是经过多次反复的斗争最后始能站稳下来的。而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也可能由我之一面，又变为迫得不能不采取K之外形、我之内容的一种两面的一个阶段，有些地方也可能不必经过这个阶段或无条件经过这个阶段……没有办法再写了，时间不容许。

以后有时间再另寄，现在我迫切要求你们的详细指示。关于其他的问题我不及提到的，我也希望你能根据我的精神给我以批评与指示。

致党的敬礼

(此信不及复看，或有词意根本错误之处)

老吴

旧三月初六日 (四月十四日)

温△△给美南转方方林平的报告

——敌军和我方情况

(1948年4月24日) ①

美南同志转方方、林平同志：我和欧同志七日晚平安抵达湛江，并于十日电告你们，欧同志已到部队工作。兹将各方面情况报告如下：

(一) 目前K的军政情况：现已开到南路来的有保十总队全部，二十一日又开到六四师一五六旅整编九二团一个整营，约有五百余至六百人，编制为五个连，每连配轻机三挺，其中有一重机连，配重机六挺、手提机二支、驳壳十五支，都是湖南人。据其营长李明说，将有一个整团开来南路，这个团是驻在九龙。本来要整编才能调动，上峰命令紧急，不能不来，K则吹牛皮说广西增援二个保安队大队，广东二个大队，但未见到。K各县的地方团队约三四百人左右，仅就湛江、遂溪、化县的兵力来说：湛江现有自卫大队二百三十人，计划扩编至三百六十人，每个区公所二三十人，约有二百余，警察四十余名，师管区直属部队有二百余人，原驻有保安队二个中队，可能已经调动，新到的正规营已到遂溪，留湛的不多。目前湛江全部兵力不超过千人，这些兵力只是用来守湛江，不敢远调，只能日间出动，不能在别处过夜。在遂溪保安警察约有一百，各乡镇约有四百余，目前遂湛边境驻有保安队一中队及一个营蒋军。化县县府的警察大队约三百，各乡公所集中起来的武装约五百，驻有保十总队二个大队，现已被打垮，仅存百余人。(据报)还有一个整训大队约二百人，大概每个县的地方团队，由县府直属到乡公所的全部兵力在千人左右，整个南路十五个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县二个市约有地方团队一万六千人左右（这还不是精密的统计），K的主力为保安队及正规军，目前全部兵力不超过千五百人，如依其吹牛皮则可有三千余人。二十一日以前K的军事弱点是兵力薄弱、空虚、分散，兵力不足，保安队大部分是新兵，战斗力不强，指挥无能，普遍士气低落，士无斗志，对我军惊慌害怕，军事活动有些被动。如保十总队向我主力到处追踪，不是追不到，就是追到了向我进攻，而结果则惨败。K军现在是集中兵力守城市、守碉堡，如化县就把几个乡公所联合集中在一起（约一百人）驻碉堡，不敢分散，怕逐个被消灭（以前就是如此）。现在是不敢全面清乡扫荡，因为兵力不足，若全面扫荡则兵力分散就被消灭，现在兵力少是不敢出动，要集中大兵才敢出动，相当小心的。K目前主要企图是找寻我主力，集中兵力来消灭我主力，但我主力摸不到，大概仍认为在化州吧！K对我实力的估计认为约三千人，主力是琼崖庄田支队的一部约一团。对我企图不明，认为化州最严重，集中兵力来搞化州，林英表示坚守湛江和各县城，乡村则无办法。K当局甚感头痛，廉江县政府曾伪造情报打急电到省府，说我军已攻入县城，要求火速增兵援救，高雷在广州反动势力不断向省府行营请愿增兵，林英这次到广州是要解决钱和兵的问题，表示无钱无兵就不能剿匪，据K的宣传，行辕决派保安司令参谋长为剿匪副指挥（林英为正），罗卓英、韦镇福南巡督战，邓龙光又要回来，以此来壮壮胆色，安定人心，稳定内部，鼓励士气而已。目前K正在尽其一切可能集结大兵，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可能于五月中旬至五月底发劫。目前其内部矛盾尖锐，林英（粤南师区司令，兼粤桂南区剿匪总指挥）和林时清（七区专员）争做司令、争兵而闹起来，林时清认为剿匪总指挥应属于他，林英是没有资格做。林英又把在化州的保十总队二个中队和总队部调回湛江，使林时清异常愤激，上月在湛江召开剿匪会议，林时清愤愤不出席，以后就消极，再三坚辞专员，省府以无人愿做，再三慰留。高、雷在广州的反动势力主张邓龙光回来做总指挥，因为他主张大杀，自己有武装，是地方人，可以号召地主组织武装来搞，而接近中间派的地方势力则支持林英做，认为他较温和，主张不乱杀，要把逃到湛江的地主赶回去，要其筑碉

堡，组织武装和我对抗，照目前情形大概仍是由林英做，湛江市的铁胆残余势力和市府，已派人到港促陈学谈回来主持。新任遂溪县长梁传楷并无实力和实权，县府的部队都是铁胆旧部掌握，县府一切人员都是铁胆时的人马，他表示消极，无办法。廉江县长、化州县长则被省府各记大过一次，以其虚报、瞒报匪情，及剿匪不力之故。目前K在遂、化、廉、吴等地区，无法征兵征粮，政令不能下乡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二) 目前我们的情况：目前南路武装约有四千人，枪枝三千余，机枪约三十挺，分布如下：钦廉四属六百，遂溪七百余，机枪六挺，廉江八百，机枪一挺（可再增二挺），化吴千余，机枪六挺，茂电二百余，机枪一挺，其余则是武工队、政工队、交通情报人员，现在编为主力团的有遂溪四百余，化州三百余，廉江还未正式编成为主力，可能有二三百。除主力团外则编地方团，遂溪一团，廉江、化吴一团，各团直属为连，共五连，其他还可收编土匪约有三百余人，旧伪军同时也结集旧部约二百余人。吴同志于三月中到部队后，则用解放军司令部名义来指挥部队，他自称司令，但司令部实则由他一人负责而已。经过一个月来的活动和战斗，部队有很大的发展，增加千余人，和敌人历次战斗都获得胜利，士气旺盛，战斗力逐渐增强。于三月底集结遂、化、廉三县主力于化廉边境和化南、化北活动，曾经有二次大规模的战斗，一次是在三月底，保安队和地方团队约五百余人，向我廉化边主力进攻，结果敌人惨败，敌人伤亡百人，俘虏十余，缴获轻机一挺，掷弹筒四个，枪榴弹筒三挺，步枪四十余枝，子弹二千余发，战马二匹，敌败退回廉江，残部不足一百五十人。又四月十四日保十总队二个大队，配合廉化地部队约七百人，向我化南主力进攻，上午激战至晚，敌人全部被打垮，敌人伤亡大队长以下一百五十余人，保安队仅余残部百余人，逃窜到吴川街收编，但此役我缴获少，仅得掷弹筒二支，步枪十余支，俘敌十余，军用地图及其指挥部印信。最痛心的是执行清扫战场的一个连没有坚决执行打扫战场的任务，认真搜索，结果天明给敌人散兵取回轻机五挺、重机二挺、步枪二百七十支、子弹七八担，这次打垮的是保安队的主力。其他小的战斗胜利，于四

月九日我主力挺进到化北，打下化北重要据点中洞，这是攻坚第一次胜利，我先由神枪手用步枪来打破堡垒的一个大孔，然后掷手榴弹解决战斗，残敌二十四日投降，缴手提机二支，驳壳五支，步枪三十六支，子弹二千四百发，马二匹，救济品大宗，打开仓谷千余石，发给贫民。这期间打谷仓约有一万石，分发农民，摧毁廉化乡公所近二十个，占领墟市八个，吴同志委出了廉、化、县长、区长、乡长（用粤桂边区政府名义），凡是摧毁了的乡政权及敌人撤退的乡公所，地方都委派了区、乡长，完全是华北的一套做法。目前我的政权大概尚能坚持，将来当有变化，吴同志认为必须建立一面政权，有了政权就可发号施令，K的政令就不能到乡，我就依靠政权来养兵，只有如此才能提高群众信心。目前民众的情绪确是很高涨，比前有信心，尤其是新地区的民众比旧地区情绪好，打破了的谷仓，就涌进了成千成万的农民来担，农民认为这回有希望了，一定胜利了。K内部则更动摇了，当我主力打下中洞之时，化北许多个乡公所就请求我们去缴枪的。目前群众工作主要是组织农会，过去军粮的解决主要是靠地主征借，有经常税收的，最好是化州，我控制由梅菪至高州的鉴江河，每天可收税三四十万，如果江河水涨，每月可有三千万，各墟市建立税收，但仅系几万元而已，目前最困难的是遂溪，以前向地主征粮已吃尽，税收则甚少，吴同志的政策是到那里食到那里，并没有注意长期的经常的打算。目前司令部是空空如也，靠政权收税，一则政权不巩固，二则地主走光，民穷财尽，当不能乐观，不易解决，将来主力兵团到廉江大搞时，经常军粮当有严重困难，须下番功夫解决。前月捉到二个大地主，估计可能搞几万万。现在各地主力都转回自己地区活动，合灵部队则已西征十万大山，地方负责干部没有跟部队去，闻离灵山城二天路程的地方打了几天，可能受损失（灵城杀六个头示众）。四月初吴同志曾派化、吴负责干部唐同志到合灵去，把合灵主力拖到博廉合地区和高雷会师，负责四属的丁同志不敢同意吴的做法，要到香港找你们（我已去电阻止，现在他是在彷徨中，吴同志须迅速回去主持才妥。现在各公路桥梁都已破坏，电话线都已破坏，这使K相当头痛。目前我部队最感困难的是军政干部缺乏（二年来坚持斗争的战士都升

为班、排、连长），团营级干部最少，部队政治工作很差（干部相当忽视），弹药缺乏，补充困难（遂溪主力团每枝枪仅十余粒子弹），手榴弹更少，地雷装造仍未成功，没有攻坚武器，敌人守碉堡就很难搞，没有医生，救护人才甚少，经济困难，各地分兵就食比较容易解决，但大兵团集结则成问题。目前部队中各种制度都未建立，处在混乱的状态，指战员的战术思想仍是打正规战，伏击、袭击、夜袭不会，一个月来的战斗都是打正规战（虽然带着运动战性质），自己消耗很大（弹药），但是缴获不大，子弹的消耗比缴获多，弹药补充很难（要买，一方面钱少，另一方面买不到大批的）。干部的骄气、自大、轻敌，过去的胜仗主要是依靠士气旺盛，干部英勇果敢，敌人士气低落，指挥无能之故，但每次战役结束都没有很好的检讨教育干部，改进战术，只是生长了轻敌骄气作风，吴同志的大刀阔斧来发展的精神是好的，但是忽视注意巩固工作，他对南委精神仍不了解。干部的思想问题须经过相当时间深入下层和干部漫谈，逐渐搞通他们的思想，目前一下子来使他们了解南委的精神是不容易的。目前主要是解决当前实际问题，在实践中来教育他们，如对于政权问题，吴已委出县长、区长、乡长，造成了既成事实，且目前我的政权今天尚能坚持，如此情形，若把它取消是不好的，我则表示政权可坚持下去，以保卫和争取群众利益来巩固政权，同时准备一面政权不能坚持之时则改变为两面政权。一面政权在我力量较强的地方，且有干部能够坚持的，而不是孤立的则建立我的解放区政权，如K统治强，我力量弱，不易坚持的则主要是两面政权形式，这是接受了他的一部分意见补充了边工委讨论的决定。对于发展和巩固问题，他们则只是注意发展而忽视巩固，我则认为目前有利时机则放手发展，坚持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同时又注意争取时机争取时间来整训、练兵，巩固部队，主力团除有作战和发展任务外，则积极加强练兵工作。吴同志提出应把四属地委和高雷粤桂地委统一建立一个领导机关；集中力量来打开合博廉粤桂边区，我则同意目前集中力量（四属和高雷）来打开粤桂边区局面，但是仍是分为二个机构为妥，因地区阔，领导困难，四属到廉博边来搞则是协助性质，仍是要回去搞自己的根据地。吴同志认为十万大山没有群

众不能做根据地，南路力量应向东发展而不是向西，认为西南总的根据地应在广东，因为广东条件好，我有力量，他不强调靠山，我则仍坚持南委的决定。过去领导的检讨还未详谈，不过他已有了意见（欧同志和他谈过一下）。对于这些分歧的意见，须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漫谈又根据实际来解决，不能操之过急。目前主要的是大家集中精神来组织我们强大的力量，粉碎敌人的大进攻，巩固已得胜利，又继续向前发展我们的力量。无疑的干部思想的分歧、不团结，增加了领导斗争不少困难，但在中央毛主席的思想领导下一定能够克服。

（三）我根据对目前南路情势的认识对于当前斗争提出如下的意见：

今后一个月南路形势仍是处在有利时机，目前形势特点：一方面表现着K统治危机的严重，另一方面人民力量的强大发展加深了K统治危机的发展。由于几个月来人民武装反对K的斗争的结果，使K统治力量空前的削弱，许多乡村政权已被摧毁，不能再实行残暴的三征政策，支持其内战，其军事力量是日益削弱，目前增援二个营的到来，亦不过补充保十总队的损失。目前廉、化、遂我的地方团是可以和K的地方部队相持对抗，如果我能继续发展则能比他们占优势（士气和数量），我的主力兵团逐渐形成和强大发展，从过去历次的战斗中，我的主力团能够打垮保十总队主力，这是由于我的士气旺盛，干部英勇坚决，有群众的支持。如果我战术有更大进步，装备弹药更好的改善和补充，主力团更大发展和巩固，则即使K增加一个团，我主力也可和其主力对抗，且可打垮它，更大歼灭它。目前可以说我们已经站得稳，且能继续发展，目前我们可以有力量来创立粤桂边区，虽然K正不顾一切集结粤桂力量，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企图歼灭我的主力，但K兵力薄弱空虚，分散不足，士气低落，经济困难，人民反对等等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他的困难就成为我们发展的有利条件，因此目前是我们建立粤桂边区的最有利时机，我们是有坚强的信心来建立粤桂边区的。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准备一切力量，组织一切力量来建立我们的粤桂边区。目前的方针，就是充分的掌握有利时机，放手发展部队，争取主动，坚决消灭敌人，壮大自己，把敌人的力量削

弱到最大限度，如此则可转变敌我形势，使K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我们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那么即使敌人大军增援也不可能挽回其颓势，我则能够胜利的创立粤桂边区。我们的计划就是这样：由目前到五月底全南路武装扩大到六千人，建立一个一千五百人以上的主力兵团，建立化、遂、廉、合、灵各县独立作战的地方兵团，各地方兵团人数在五百人以上，其战斗力能够和K的地方团队相持对抗，且能消灭它，我的主力兵团战斗力最低限度和K的主力相对抗，且能更大的歼灭它。我们的作战部署：准备于五月中集结遂、化、廉、合、灵（合、灵主力不一定能够回来）等地的主力于合、博、廉、化粤桂边境，来打开粤桂边区新局面，建立粤桂边区，我的主力就在这个山地边境地区和K的主力相持和更大的歼灭它，各地方兵团的任务就是积极配合主力作战，积极活动，争取主动出击、扰敌，有消灭K的地方部队条件就坚决消灭之，最低限度则能牵制、分散、吸引K的地方团队以至一部分K的主力。这个部署，尤其着重于遂湛边境、化茂边境及合浦南部（较接近县城），派遣精干的地方部队，进行游击活动，作威胁和佯攻湛江、茂名、合浦及各个县城的模样，使K不能捉摸我的企图，处处要分兵把守，不能集中主力来进攻，同时彻底的经常的破坏各条公路、电线，使其一切也要用两腿来跑。这样我的主力集中于博、合、廉、化边境的机动地带，可自由活动，可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消灭敌人主力。这个计划如果遭遇敌人强大兵力的进攻，地方基础薄弱，不能配合支持之时，则各地主力团可转回各原有地区坚持，再行发展。目前这期间各地主力团的任务则是争取时机扩大发展到千五百人的数目，用最大努力来改善装备，努力目标达到每连轻机二挺（缴获和购买同时进行），大量补充弹药，搞好地雷、手炸。这期间除了有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坚决消灭敌人外，则争取时间抓紧时机加强整训、练兵（总结这时期战役的经验教训，研究歼灭敌人的新战术，改造正规战思想，精通三大技术，这是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则是进行南路形势和任务、目前时局的宣传教育，纠正指战员轻敌骄躁硬打的观点，同时又鼓励和发扬战斗英雄的英勇战斗精神和模范战士的群众作风，巩固官兵间的团结），以巩固主力。同时整编各县主力团

使走上正规化，各县地方兵团则放手发展，建立和扩大民兵组织，除了战斗和发展的活动之外则不放松整训、练兵。主力团协助地方团作战，使其学习战斗经验，今后能够独立活动，独立作战。地方团和武工队积极努力更广泛的摧毁K的乡村政权，消灭特务活动。对于政权工作，我的主张是：摧毁K的乡村政权，又〔可〕能建立，我力量大，又能坚持的，则建立我的一面政权，我力量薄，如K力量强还能摧毁的话，则使之成为两面。如果我们搞好了粤桂边区时，初期则用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筹备会的形式准备干部，准备基础，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工作才转到建立边区政府。目前已建立政权的地方则加紧巩固之，主要的是更广泛的动员农民组织农会（或其他形式）来支持民主政权，进行保卫自己已得的胜利而斗争，积极努力于改善群众生活工作，如赈济饥民灾民，解决春耕困难（水利、种子、肥料、耕牛、人力），进行减息，确定佃农与地主的新地租条例（根据二五减租原则），可能时举办贷款，组织劳力集体生产，调解民间纠纷，慰问民间疾苦，清算恶霸、汉奸、反动分子的财产分配给贫民（包括土地），此外建立税收，如向大地主征借军粮、墟税、河流、货物税，建立民选村政府，建立和发展民兵，巩固政权。目前经济政策，就是向地主征借，购军粮，建立税收，改善农民生活，减轻农民负担，非法经济则个别进行。对于目前已经建立的政权则努力坚持巩固它，如形势困难不能坚持之时，则准备建立两面政权。以上这些问题的意见是和吴、欧二同志讨论过，对于任务、方针和搞法，意见是一致，对于政权问题意见，我和吴未能完全一致（可能一致），欧大致没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希望你们给予具体指示。由于目前形势的发展，我们今后的做法，我和吴间意见的分歧（欧和我基本一致），特请示你们解决下列问题：

一、由于目前部队的发展和形势的要求，正式建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来指挥各地兵团和建立粤桂边区。目前由各地党来领导部队已搞不通了，这个解放军司令部的范围则是包括高雷粤桂边地区，至于四属则另组织司令部（这个组织可慢一些），同时则建立三个指挥所，一个雷州区，一个吴、化、茂区，一个茂、电、信区，这

是指挥各地方兵团的。至于司令部的人选，如你们同意建立司令部则请委派，我的意见是由安南回来的唐政委为司令，如唐未回来则由吴代，欧为政治部主任（他自己表示做政治工作），参谋长则没有人了，各个指挥所则由各个中心县委书记兼任。这样目前就公开用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的名义来活动（实际上吴同志已用了）。

二、吴同志提议，目前应集中合、灵、遂、廉、化主力来搞粤桂边区，四属地委和粤桂地委合而为一，我同意他目前集中力量来搞粤桂边区，暂时仍合而为一，过一个时期分而为二。因为地区辽阔，领导困难，必然顾此失彼，我们过去对四属领导就是如此，且应该分开发展，目前为着突破一点，我同意合、灵主力暂调来此协助，把合、博、廉打成一片，则将来配合更易，将来则是发展他的中心为主。如果合、灵主力不调来，我们这里力量来搞则困难些。所以我的意见是目前暂时合而为一，打开粤桂为边区，然后再分而为二。

三、对于政权问题，吴的意见就是到处搞一面政权的，我的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来搞一面和两面，而当时边工委讨论的决定就是只有建立根据地时才建立一面政权，平原游击区则建立两面政权，这三方面分歧的意见请你解决。我前面提出搞粤桂边区政权的形式也须要你们指示解决。

四、土地政策问题：我们的意见认为是在我建立政权的地方，力量强的地方，把个别大地主（千租以上）的土地，和霸占农民土地的恶霸、汉奸的土地，反动分子的土地，操纵在反动势力手上的公产、土地，分配给贫苦无土地的农民，对于中小地主的土地则暂时不提出分田问题，是要经过相当的准备工作才能搞。

五、我觉得周同志远处边陲，领导此间斗争很困难，我们和你们的联系较易，可否目前仍由你们直接领导，请你们考虑。

六、目前斗争复杂尖锐，问题甚多，我要求立即和你们建立电台通讯，不要再迟，能够经常获得你们密切的领导，则我们会有更大的发展的。兹特派吴同志来带他们，请你立即转涂同志把电台人员介绍给吴同志，时间要快，赶船期，不然就要等许久了。兹附上缴获美国电台的全副图样，请即转给电台工作同志研究是否懂得用，如技术不

熟练则请即研究解决，以免到此发生困难。去年所缴获特务电台的全部密码，对你们有无用处，如需要则送给你们研究。

七、要求你们派一个能够掌握全面军事的参谋长来此指挥军事，这里这个干部不能解决。我提议庄同志最好能够到这里领导军事，如果没有强的军政干部来领导，则虽有好的时机也会丧失，在安南的干部希望通知周同志迅速派他们回来。没有大批有经验的军政干部来充各团，则部队在敌人大进攻的时候会遭受挫折的、损失的。

此外尚有个别问题告诉你们：

一、家长派来此间工作的涂同志，现在调回给他，现已到港，请即通知家长去找他。他是依照家长给他的地址去找，各问题我托他再详细转达，可由家长问他详情，我托他写些关于南路问题的通讯，并付上通讯一篇转上《正报》发表。

二、医生及救护人员很缺乏，希望你们能够在港动员一些同情者来此帮助，即使不能长期留此，短期来此训练一些技术人员也好，你们在港可否就地训练一些人输送过来。

三、南路撤退来港及广州的同志和群众都急切要回来，我另外通知负责这方面联系同志来处理，希望你们协助解决。留港的重要干部梁昌东（香岛中学教书）、车捷（南光校长，由市管理）、叶春（车捷知道他）能够早日回来最好。

四、留港的手摇机及其他器材，等搞好运输关系后即派人负责运回，派去运输的是林同志，是初到香港，情况不熟，要你们协助运到船并指导一切才妥。今后有许多军用品要在港购买，自己没有船运输甚困难，目前又没钱买船，你们的机帆可否借给我，以后按月付款还给你们。

五、曾伟和梁传楷的谈判有无新情况，陈学谈对反动分子的威迫态度如何，若你们有材料请告知。

各项问题希望你们给予具体指示。时机紧迫，希望迅速给指示交通带回来，交通最好能够乘原船赶回来，回来越快越好。谨致党的敬礼！

温四月二十四日

另：一、目前K调来的正规军是属于六十九师整九二旅的，现已发现有二个营到达，全部约七百余，照目前情形来看，K除琼崖外是集中力量来搞南路的。希望各地都迅速的大搞起来，以牵制吸引K的主力，减轻南路的负担，使南路不致陷于孤立，各地都能起战略配合作用。

二、运手摇机的关系已搞妥，经已派人去搞，请即通知涂同志设法交给他，并指导他们如何安全的运到船上，而必须赶这次船期回来，否则会发生变化的。

兹付上吴同志给方方同志的信。

南路东征队进军总结

(1948年4月29日) ①

这里，仅打算概述东征队出发及到达前后情形。从整个过程中，研究转移作战的一般必要条件，出发前应有的精神和物质的准备。转移前进中与原地区（在这例子是廉、遂老区）的坚持斗争互相应和及所到之处与地方活动的配合关系，并探讨行军及行军中打仗问题，坚强的领导问题以及到达目的地初期立足生根问题。

从出发到抵达目的地

东征出发前后的大致经过是这样：敌在吴、化、遂、廉压力很大，我初考虑远征十万大山，继续指示东征，创建西江南岸根据地。后取得上级同意，决定东征为主，西征为辅。先后出动，老区留驻起码力量，坚持斗争。虽然上级指示，远征是胜利的进军，不是失败之溃退。但部分干部仍是对东征无信心，对坚持老区斗争困难估计过分严重的。只有经过讨论后，全体干部基本上积极支持组织东征的布置。可是由于经验缺乏，一般认为出征简单，留守方面反觉严重，多觉催促提早出发，加上当时敌尚在扫荡中，我内部交通联络困难，从接受指示到出发，虽有两个月时间，而我们的准备工作，如集中整训，贮备给养，筹划弹药、医药、经费，补充面巾、鞋子，以至配备宣传物品等，都极不充分。我们的布置工作，如联络高州地党（东征总领队负责人还以为高州地区是最后目的地），联络两阳总队（后来才知道其实当地只有很小的部队），调查行军路线，沿途敌情及布置之联络站等都极欠周密。实际目的地中区方面，对主持接应任务并不清楚（甚至东征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队抵云浮飞地时仍估计须两月后才来)。只有精简编队，调回坚强干部，减少杂务人员、女同志及不能跟队者改从公开路出发，多拨开辟新区工作干部等，算是准备工作上做得较好的。

出发当天到廉江境，即打了两仗。战斗充分表现了部队的凌乱。因而转回头来，重新调整部队，充实部队弹药，增加了一个较有威信的团级干部。约十天后才又有第二次正式出发，并约定五天后，老区应即有军事行动配合。

东征出发后，在进军中的情形是这样：我们坚决执行了分局指示，对地富不过早刺激的政策，沿途实行破仓分粮，使民众得益，我也解决部份财粮困难，不随便没收民枪，对打击坏蛋份子，也很小心（只在信宜县对一个坏蛋打击过甚）。所到之处，随时发信与接见当地乡绅，群众宣传与群众纪律即颇重视，每营配有政工组边行军边宣传，并进驻较大圩场，振奋群众情绪。遇士兵吃了民众的粥水、蕃薯，亦一会再算。留小部在云开一带发动当地群众斗争。

直至我们到西山入驻云浮新圩，才与两阳派来联络干部碰上头，要我们转入两阳。当时还不知道原来任务是走向中区的。为情势所迫，决定暂时转过去，仍留一营在茂、信坚持。到了两阳与中区会师后，随即通知留电白、信宜一营转来。他们经过三罗，迂迴而下两阳，恰对当时三罗起义起了很好的客观配合作用。

总括的说，从出发到抵目的地计约二十天，走过千余里，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消耗子弹约六千发，逃走及伤亡人员约二十人，初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全体同志为此感到光荣与愉快。

完成任务的胜利因素

我们东征队能够胜利地初步完成任务，分局正确坚强的领导是一个主要因素，由于分局敢于提出和明确指示，乘敌空隙挺进中区，不但可以开展西江南岸游击战争，而且是对南路老区粉碎敌之重心扫荡的最有效办法，并指示防止群众工作政策的过高口号，确立我们行军中的群众观点群众纪律。又由于分局指示，我们重视出征部队的组织火力和干部配备的加强，同时在精神上给予鼓舞，物质上给以援助，

使我掌握了胜利的基本保证条件。

其次第二个因素：就是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执行任务的决心，全体指战员旺盛的不怕前途险阻的向着敌人一切封锁线冲的无畏精神，领导克服犹豫，克服动摇，坚决果敢，在思想上和实际问题处理上解决了远征出击与留守坚持两方面斗争的配合斗争，并做到队伍精悍轻装，行军搜索、驻地警戒的组织严密性。所有这些贯彻地表现于东征的全过程中。使得我们，能够通过许多意外、曲折困难而终于胜利地抵达目的地，仅出不大的代价。

再次：也是一个胜利的最基本因素，就是由于整个广东基本形势决定敌区空虚、兵力不足、地反武装薄弱无能，而我有老区坚持斗争与西征出击的呼应。有三罗起义的直接互助配合，加上全省各区胜利斗争互相影响，又取得所到之处当地民众的欢迎拥护。因此我们才能避免敌人的重大打击，达成我们的任务要求。

从经验中提出几问题

由政工组负责赔偿，沿途民众一般是拥护我军的，尚有一些农民甚至个别知识分子参加了我队，但民众心理仍怕我们象张炎起义时一样的失败。

敌人方面，在我到达化北后，他们大致已知我的远征行动。当时已调动一个大队来打，并通知化、茂各地方临时集结武装应付。有个别据点集中近百人。我过了信宜至高州之间的一条河流之后，敌派了一个敌警大队，早在那里等着迎击，一连追踪我队七八天，其时敌人有后方有情报，但没有调集很大兵力，处处反动武装比我军事力量少得多，因此打仗的主动权是控制在我手上的。

关于我们军中作战问题，我们采取尽量避免战斗原则，遇阻挡去路的地反武装则冲跨过去。我们的队伍实得七百五十人，行军以前卫营，为了没有地方工作基础，又恐敌追击部队赶到，因而决定全部采取日行军，全夜休息，平均每天走六七十里。初时下午三时左右即停步，驻息弄饭。饭弄刚好，敌兵追到袭扰。后改为拂晓前饭后行军。进至下午五六时才停驻弄饭，全夜休息，随路查问老百姓，考察敌情

(因无地方组织可联络，敌盘查严密)，派出密探又不可能)，驻地加强警戒，普遍派一个连哨。行军路线，我军中无人熟悉，只按五万分之一军事地图请教老百姓。途中或说服或强迫民众当向导。初时每个向导走约二十里为一站，逐站寻找替换。后知敌人捕捉原响导，引路追踪，才决定给钱、供饭，雇请走全程或大半程的响导。我们自以为走向高州地区的，因而路上逢人便说，我们要到两阳和三罗去，甚至在通过两阳公路上走他〔一〕程半程，本意企图迷惑敌人，怎知正遇敌人，为切断敌人之通讯联络，特许队员轮番拆去敌电话线，出卖得款为个人零用。在给养方面，出发两天后，钱用光了，只好到处就地筹给，吃粮仓谷，吃伪乡公所祖尝，再无办法，就吃大户，问一般民众要米则给回代价，破仓卖粮得款时，发点生活费。有可能时，还弄点猪肉补给战士体力。

这样前行八九天路程，抵达云开山。该处地形是十分好的，但作根据地却缺了群众条件。原来地方工作基础薄弱得很。我队一到，派出干部去找联络，反被伪自卫队捉去。我们与高州地方党始终联络不到，茂名、电白各方面都无动作配合，显出我们仅是一个孤军的火头，以至干部信心开始动摇了。因而就去云开山顶开了一次会议，坚定大家的斗志，继续在该地兜了几天圈子，又企图分散活动或拖过电白境。以下级干部无信心，与部队已异常疲劳，只好作罢，最后决定大部拖到云浮西山休息。

决定主力转移作战的时候，必须考虑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应有精神和物质准备问题。

精神的准备是从基本形势的分析和认识得来的，也从对当地军事斗争方针的了解和掌握得到坚定的保证。这次东征经验证明，分局的明确指示，曾给了我们最好的精神鼓舞，没有满怀希望的乐观情绪，胜利的进军是不可能的。同样出发前后，途中到达前后，可能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曲折是不会没有的，事前有愈高度的预见，才能有愈深入的精神准备，全体队伍就愈能在任何时候保持思想上的坚定。

物质的准备则应就当时情况尽量达到充分。由弹药到医药，由面巾到鞋子，由经费到宣传品，若果准备太少，必不够用，增加途上困

难，而不足以壮行色而坚定军心。当然经验也证明，准备充分，困难可以减少。但无论如何不会无困难的。准备不足，困难必然增加，但困难仍可克服的。

第二，周密的工作布置配合斗争问题。

这次东征布置工作极欠周密，使得整个过程带有若干冒险性和盲目性。从经验看来，各地斗争仅仅形成。客观上的配合是不够的，若能经过有计划的布置呼应，则不仅东征队本身取得顺利前进的条件，而且各地也会取得许多打击敌人的时机，目的地点及沿途交通联络，以至地〔方〕党接应工作的准备（中区在这方面执行分局的指示是太差了）。我们这次的布置呼应是全部落空的。假如布置得好的话，行军中多打几次漂亮歼敌胜仗，以致开辟和帮助建立加强许多邻近地区的新工作是很有可能的。

第三，行军及行军中打仗的问题。

日行军还是夜行军呢？这次是实行了日行军的。在敌人没法调动大军迎击或包围的条件下基本上于我是有利的。一能迅速，二少疲劳。假如沿途有工作基础，则夜行军可达到掩蔽自己并××××××解决敌人，当更有利。

这次行军中敌追踪兵力不大，天天踏着足迹，步步跟随，但我们坚持避战原则，没有布置在周璇中歼敌，放弃了一些有利的歼敌条件，这是值得研究的（有利、有把握应该打）。当然，我们在坚持原则上，因目的地情况不明，顾虑沿途消耗，同时，在作战中除了某些地形有利与敌兵不大外，其他条件都不具备，生怕妨碍本身任务的完成，而不从积极方面设法实行有计划有把握的痛歼追踪之敌。以壮长自己威风并取得若干补充，又能斩断尾巴，摆脱后患。这是犯了机械执行作战原则的错误，是无疑的，但是行军中打仗的条件：第一，要目的地有工作基础的地区，万一打了消耗战，托空枪到达，也能找到机会补充。第二，要不妨碍本身过路的任务。第三，要有主观指挥上的坚强及行军作战经验的保证。而如果条件不具备了，不成熟而又站在主要为了胜利抵达目的地区观点上看来，我们认为这个弱点不应强调。

第四，坚强领导前进问题。

经验告诉我们，相当规模的长程主力，必须精选最好的武器与队伍，必须减少非战斗人员与笨重物资，使部队左右周旋，进退自如，而尤其是要坚强的军事领导。因为遥远的旅途上，任何意外问题的发生都可能超出预计和事先准备的范围的。往往原定计划在许多细节上甚至大的目标上，会因情势的变化而起变化。当到了与后方脱节而又接驳不到其他各方面的联系的时候，象这次东征的全过程一样，是须要独立解决问题的。

我们这次唯一的老师，就是一副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每晚上就要向它集体学习。这时领导者还应有坚决的意志，在每个困难关头，容易引起干部波动情绪之时，做中流砥柱，坚定大家共同排除万难，不断前进。同样应有调查研究，细心深入布置行动的精神，应当集体商量，发挥军事民主，共同作出基本决定，就要果敢行动。在行动中继续了解情况再修整补充，坚决执行下去。

还有一个问题，到达目的地初期问题：

老区坚持斗争，应看做远征行动的一个部队或一个方面。因此，必须留驻一定数量的兵力，并且确定积极的斗争方针，才能取得两方面的胜利。不然的话，两方面都要陷入不利被动溃退情况的。这次东征是做得较好的，但出发前还要考虑好目的地的准备接应工作，我们都做得太差了。

假如目的地果真是茂、电、信，因为那里甚少基础，立足问题是不堪设想的。这次东征队到了中区，三月来能逐渐立足是因为中区已经有了起码的基础，而又因准备接应工作布置太差，初期遭到很不少的困难。就东征队来说，疲劳之师得不到休整，病员可怕地发生和增加。就中区说，东征部队把敌人从四面八方吸引来了，增加本区的额外困难，不见其利；先见其害。如何才不会或容易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呢？研究起来，我们认定新区在远征部队未抵达前即应弄好情报，弄好交通，动员组织力量，预先为远征队慎重布置初战（原来对中区有所指示）。只有以集中的远征队伍乘贼不备，打好几个初战，然后转入分散发展与分散休整，什么困难问题都好办。这次远征行动本来是主动地位的，因解决不了初战问题，很快就转入被动地位，把

初期我军民振奋、敌营惊慌混乱等有利条件完全丧失，然后经过五月到九月长期困苦斗争才打开局面，取回主动地位，这是个很大教训。

此外，新区为远征队预先准备相当足够的粮食和医药，也是很重要的，初到时期才不致为吃饭、医病化很大气力，集中精神打好初战。外来队伍与本地队伍，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合作团结问题，也是必须有充分的教育，有正确的思想准备，才能不发生不良现象，或容易克服这些现象，这些都应取得教训，足供转移作战进行布置时参考。

泰山抄发

四月十九日

梁△关于化吴武装斗争的总结

——一年来武装斗争收获及经验教训*

(1948年6月17日)

方同志：付上去年化吴武装斗争的初步总结。

甲、现在与过去一般概况

1. 化、吴人民为解放自己而起来武装斗争，现在暂时是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或者说是暂时失败了），但却不是停止了武装斗争，而且是正在发展和坚持中。我们人民的武装力量，并未被敌人消灭，我们的主力仍在保存和坚持着，不过是暂时撤离化、吴的，如××有第四团，其余则配合其他部队向西（四属）和向东（中区）两方面挺出新地区去发展。就是化、吴县境之内，我们仍有武工队坚持着英勇艰苦的斗争。

2. 在敌人强大力量进行残酷扫荡中，我们和广大民众是受到了相当挫折和损失的，我们的政权是暂时被敌人摧毁了，我们大部分民众武装队伍被瓦解了，我们人民的财物、粮食、耕牛、猪、鸡、鸭、农具的大部分被敌人抢去了，一部分意志薄弱的民众被敌人强迫自新和被强迫征兵去了，个别的坚持英勇斗争的群众领袖及我个别干部及党员牺牲了，如高唐、肥陈、黄区长、叶同志，这是革命斗争过程中难免的。但他们的牺牲是为人民为党忠诚而牺牲，是永远光荣的。化、吴目前是暂时黑暗了，但是它的周围如廉遂、四属、中区广大地区是更光亮了。敌人必败，我们全国全广东的革命斗争必胜，是确定了的，只要我们积极坚持，大胆发动组织民众，领导他们前进，胜利是不远了的。

乙、化、吴一年来的艰苦斗争的收获与成绩

1. 发展人民武装斗争，配合华北、东北、西北解放军主力，配合解放区人民的解放斗争，争取全国革命胜利是对的。这是党的方针与区党委、分局的方针是一致的，因为中国的反动统治政权是不会自己垮台的，只有用人民武装力量去推翻美蒋的反动统治政权，化、吴党掌握了这一原则是对的。

而且化、吴党掌握了有利时机，即是利用敌人空虚和地方反动力量来组织起来，而我发展与扩大人民武装斗争这是对的。与化南、化北、吴川、化东南和主力结合，共有过三千武装队伍。现在虽然一大部分瓦解了，但主力仍在保存和发展中，这是成绩之一。

2. 我们人民的力量曾经控制过广大地区，纵有二百余里，横有百二十余里（华里），人口约有五十万人。曾建立过四十八个乡政权，另有两面性的乡政权五个。这种事实是靠我们广大群众、群众领袖和我们的党员、干部英勇斗争创造出来的，虽然目前暂时被敌人摧毁夺回去了，但广大民众的心情，会更憎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希望我们解放军的主力快打回去，消灭敌人，解放他们。

3. 进行过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减租减息，破仓分粮（蒋政权的），杀了一些压迫人民的反动地主恶霸，解除了些压迫人民的反动地方武装，建立了人民自卫的武装队伍，这些都是对人民有利的，是对的。虽然现在又被敌抢回去了，但群众是会分别的。谁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谁是为人民谋福利的。

4. 在化、吴此次人民解放斗争运动中，教育和锻炼了广大群众及我党党员干部，有过一个时期成功的经验，但也有其失败挫折的经验与组织武装、发动武装斗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斗争与减租减息、建立自己政权等等成功经验和执行了过左政策的失败经验。接受了这些经验，就是准备了将要重新恢复化、吴人民解放事业胜利的基础。

5. 南路人民解放斗争运动是有其政治地位的，麻木了敌人，使敌人集中注视南路民众斗争，使敌人顾此失彼，便利了其他各地人民乘敌空虚而起来，进行解放的武装斗争，也鼓励了我们其他各地的党

员更积极的大胆的去放手发动群众武装斗争，这是有意义的。

以上各点是好的，是有成绩的，参加去年化、吴人民解放斗争事业的积极分子、部队中的指战员及党政人员是有功劳的。

丙、失败的教训及原因

化、吴一年来英勇的人民武装斗争，现在是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或者说是暂时失败了。至于此次失败的原因及教训，是必需严格指出，作为今后南路全党工作的鉴戒。

1. 当时对政治上估计是错的，是速胜论的错误思想估计，把复杂性的政治局面看成简单化的、片面化的，把局部性（个别地区性）看成全面性，把片面单纯的军事胜利观点代替了复杂性的、在发展和变化中的政治局势的思想，如：

①据同志们的报告，在去年二月吴同志号召各地起义大搞，当时传达国内政治形势，说是我解放军已在全国开始大反攻了，华南各省均无正规军，广东更加无正规军，只有十个保安团，琼崖已经去了六个团；南路已无一兵，只有县警队、乡队、保队，而且数量很少，枪支很坏，又无战斗力。在此简单片面的形势分析，就肯定了六个月或一年内一定会打败蒋介石（或一定会打败蒋介石有组织的武力抵抗）。总之，在六个月或一年内就一定会打倒蒋介石的统治了。这个意思即是认定六个月至一年内，中国革命就一定在全国胜利了，于是不顾一切，决定号召各地起义大搞。因此一切错误由此产生而发展了。

②为了使南路全党执行其此种错误思想方针，而反对上级党的指示，如上级在东纵撤退时（1946年）对广东党的指示中曾指出应作三五年甚至十年的工作计划打算去布置。同年的于十一月的指示，要各地党的组织，按实际情况，恢复小组、支部会议生活，并进行分散的武工队小组活动，到处广泛建立立足点，领导和组织、发动民众，反对三征，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但不要过分刺激敌人，过早暴露自己力量，采取谨慎小搞的方式方法形式出现，这是由小搞打下大搞的基础，即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提高的做法，不是一下就大搞起来。这是△△区党委1946年在东纵北撤后指示的精神，上级是照顾到

全面与照顾到华南、照顾到广东革命形势发展的，也照顾到广东民众对革命斗争要求程度的。但我们南路党一部分主要领导者，由于对政治局势认识的错误，不能等待，不能忍耐，而反对上级的长期打算计划，反对小搞与逐步提高谨慎做法的方针。这是不愿考虑和研究上级的指示，以致反对和脱离上级的领导，这是最危险的。

③于是不顾一切，把我们八九年来经营积存的基础全部使尽，作为其冒险大搞的本钱，挂大招牌，自称司令，委派大官，委头招兵，不择手段，虚张声势，大吹大擂，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天下（革命胜利）。这完全是速胜论的观点出发，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冲动，疯狂的作法。四五个月就提出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口号，这是过早的，是违反了党的原则行为的。因为这是原则性、全国性的问题，中央未公布，我们随便提出是不对的，因为这是关涉到全国性的国共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

④眼光只看到局部、片面、一时顺利的现象，没有看到全面局势发展的复杂、迂迴、曲折和困难，对敌人的力量看得过低，对敌人的困难看得太甚，把我们的力量看得太高，把一切问题看作一帆风顺，毫无困难。只有看到可能胜利的一面，没有看到可能失败的一面。

⑤一小局部地区暂时的成功，就作为巩固的基地，不作主动的向外发展，扩大地区，作为真正巩固这一局部地区，而满足于一点，想作巩固建设，这是保守的领导观点。基于一年长的有利时间中，虽然有过企图用大军去打开新地区的行动，但遇到困难阻碍时，就转回原地，不敢再出，也不想其他办法，因此这种意图是勉强的，而不是主观和主动的向外发展，而满足于化、吴局部少地区的胜利。甚至吴川危急时，化州亦不去协助解救，仍取骄傲态度，说：“再来十个保安团亦无奈我何的”。但是结果呢，我们成十年来的经营，积存下来的一切财产，在一个月內全部丧失了（1948年1月至2月初），今天建立是非常困难了。

因此总结以上这一年来的政治领导，表面上是“左”的，其结果是右的，是错误的，是违背了上级党的决议指示的，是脱离了上级党的政治路线的。

关于政策问题

为了实现其错误的速胜和大搞方针，其政策指导思想方针，亦是错误的，如谗、吓、拆、打，命令主义，大杀小赦，这是其整套所谓政策指导思想，实质上是无政策，不讲政策，不讲道理，不分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不分中立（中间）分子和同情分子或积极帮助我的分子，不分我自己民众或领袖，不分我党党员或干部，是无分界限的。总之，不从我意者除之（甚至杀之）。此种政策是流氓欺瞒“不择手段的恐怖的政策”，其具体表现可分为以下几项研究：

（一）民众斗争要求问题，革命力量与使用力量问题

化州、吴川经我南路党八、九年来的艰苦努力之下，早已建立有相当民众和党的基础，虽然中间曾有过一个时期的挫折和教训（民三十四年第一次起义）。但不致于丧失其基础，或不能立足，反是我们的基础仍在生长着。到前年底和去年初，我们的民众基础和农会、同心会、吊耕会等及包括各阶层人士，已有十万群众同情或能帮助我们了，游击组（地下军）有二三千人，有数百党员，有这样大的基础。当时由于敌人统治力量薄弱，无正规军，当地的反动武装力量又未组织好，我们的民众及党的工作，正在最顺利的时期，我们掌握有十多二十个乡队和自卫队的武装，民众虽然对国民党的三征政策有不满，但未有直接要求斗争的情绪，要求起义暴动更谈不到。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亦未有如此要求和准备，在全国革命来说，亦无如此要求（未到时机）。化、吴党的领导在第一次起义受挫后，至此次（去年二月）起义之前是正确的有成绩的。

以上是说明化、吴由我们长期艰苦经营保存下来的强大基础。但大搞起义斗争情绪，是未成熟的，因此他们大搞起义是过早的，当广大群众未有起来时，我们要起义大搞，一〔定〕会使我们孤立。脱离群众，没有广大群众支持，斗争结果一定是失败的，是不能长久支持的。

这里，同志们一定会问，如果当时无此种条件，为何又大搞得起来呢？而且规模并不小，坚持时间有成年（十一个月），他靠什么力

量搞得起来和支持的呢？这是有道理的：1. 在客观条件方面，我华北、东北解放军主力在各个战场上大量歼灭敌人的胜利影响。当时我南路遂溪部队打死了铁胆的胜利消息，给我南路广大民众的兴奋与鼓励，人心背向更加明显。加上反动力量的薄弱，并有遂、廉同志起来大搞的推动与鼓励。2. 在主观条件方面，我有数百党员及干部，有现成掩蔽的武装队伍八十人（化南、吴东北），有二千六百人——三千人的地下军，有农会、吊耕会等，包括各阶层同情及能帮助我们的十万民众的基础，此次，已经彻底一个不留地使用出来了。3. 为了使广大民众及青年学生都卷入这次起义大搞斗争运动中，是采用了不正确的流氓手段，如食地主、打地主，如该村无地主也要找出较富裕的人家作地主打食（结果中农、贫农、小商人都被侵害了），只要你有一只大猪，就会有被打被食的危险。摧毁教育机关，恐吓、强迫，委官，公布名单，用阴谋手段等等，不择手段。总之目的要拖其落水，使其不“革命”就要反革命，绝不容许有守中立或中间的人民存在我地区，如逃走又有被嫌疑反动，有被抄家的危险，如参加反革命活动就会被杀、被抄家的处罚。同志们，我们做老百姓的又如何感想？这是他能搞得起来的因素和条件。

由于我党有高度的政治威信，我们有强大力量的基础，我们要搞起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搞起来的，只有等候时机或需要根据程度而使用。当时要发展和领导民众斗争、武装斗争是对的，但未到最后取得胜利时，是不能把我全部力量使尽，应有长期打算，不从思想上、政治上动员团结民众，而用流氓政策、阴谋手段去动员民众，是非我党政策，非群众路线的。

（二）开始就挂大招牌问题

一开始就挂起粤桂边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军分区司令部、司令官、团长、行政专员、县长等等。其目的是：（1）为了统一各地区军事指挥；（2）为了封官封将；（3）为了宣传扩大政治影响；（4）可以命令群众（强迫民众）。现在我们来研究当时是否一定要挂起大招牌，然后才能指挥和封官封将等等呢？如果照他估计中国革命在半年或一年内就会成功了，在这种速胜论观点出发，采取这样的政策办法

是必然的。现在我们照实情去检讨一下，大招牌是摆出来了，官也将也是封了，统一是统了，影响也扩大了，命令有得发了。结果如何呢？有大招牌，有大官，但大事无人理，大计无人定。官、将是封了，但如何做官，如何做将，如何办事，是无人管他的。统一实际上是统一拖民众落水，命令实际上是压迫民众，扩大影响，结果是招致敌人向我们进攻，招致地方反动势力团结来反对我们。

这里，同志们又要问，照如此说法，大招牌、封官封将、统一指挥、扩大影响、使用命令都是错误的了。是否不应该如此做法，如果不应这样做，又如何做法才对呢？照我的见解，要确定名义，委派将官，统一指挥，统一领导，使用命令，要扩大我们的影响，这都是需要的。没有名义是不成，没有将官等于没有头，凡做一切事业都应有头有主，没有统一指挥，不使用命令也是不成的，扩大宣传影响是应该的，不然我们的政策主张，是不容易使民众了解，如果是需要，是对的。为何又说他错呢？问题就在这里，这是实际内容问题，应要名符其实，要理大事，要有大计划，要有领导，有指挥，要有明确的方针政策（我们的主张），要有计划有步骤去完成任务，要有检查有总结，命令要合情合理，不然就成为压迫人民的命令了，我们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

那么，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上面已经指出了的，有了大招牌，大官，有了统一，有了命令，但大事无人理，大计无人定，无领导，无检查，无总结，如在开头起义大搞，一直到失败时止。去年新二月到今年一月，共有十一个月时间，未曾有过一个有系统的口头或书面的方针政策指示，并未有过一次检查或总结。因此对各级各地区的实际工作有什么真正好的成绩和犯了什么严重错误，有什么困难，吴同志一概不知或不理。阿丁（三叔）可能是知道一些的，但真正深入了解亦不见得很清楚（地委其他同志亦然）。吴同志自称为粤桂边区司令官，但他的工作只是带一部分部队（三几百人）去打打仗，下象棋，清闲无事，吊儿郎当，一切大政方针的策划，一概不重视，只有自己心照。如各地区工作发生困难，无枪，无钱，无粮，向其请示时，二个大字“抢之”，就算解决了。丁同志身为化、吴两县党政军主要

首长，一切大权在他个人身上，但他从未到部队里住过一夜，政权（县府）、县委亦不容易找到他。会议是形式上的会议，不尊重、不听取大家的意见，说不上民主，只靠他个人的命令。因此：

(1) 挂大招牌、封大官，结果是做成个人的许多权威，个人威信、个人英雄、自大了不起造成他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目无党纪、目无上级、只有个人，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无原则的斗争。

(2) 由于各地区工作无整个明确的方针政策、无领导上的检查、无总结，结果由其自生自灭，无政府状态。

(3) 一开始就挂起大招牌统一指挥问题，我认为不一定开始就要大招牌，才能统一指挥的。因为此次起义大搞，是以我党为主领导和发动的，我党是唯一的领导者，我党是统一的党，是统一领导的，我们的主张和政策是统一的，因此我们不用公开的统一的大招牌，同样是统一指挥的。至于委任或收编外来的武装队伍，不一定用大招牌去收编才有效。因为他的来意不是信仰我们这种大招牌，主要是信仰我党，愿意受我党的领导指挥。因此我们是否可以采用其他名义收编呢？是否要给他“团”的大番号（事实上他亦未有一个团的足够人数，一个营的人数亦未足够），给他一个营或一个大队的名义是可以的。用大招牌收编外围武装小部队，用大招牌吓敌人，这是自己骗自己的。用大招牌是过早的，并且是有害无益的。但是，时机将至的时候，是可以采用的（如在大军南下将至时，和民众革命高潮到处起义时，或其他地方实力派政变——反蒋和我们争民众时）。主要是按照实际情形办事，不是以理想作现实，去决定去观察问题。

(三) 对招兵买马政策

如果站在其速胜论观点，站在他当时大搞到处起义的观点上来说，迅速扩大我军事力量，壮大我声威，这是对的。现在我分为如下几点来检讨：

(1) 我们要招什么兵，买什么马？他的内容意义不清楚。照我个人的见解，应是招收现成集结的土匪为我们的兵，如△△，如△的。但不是收买国民党或地方反动派现成集结的马为我们的兵，但不是胭脂马，也不是病马，而是好的马……（略）（原文如此——编者）

(2) 关于委头、招兵问题。在字面上看来是对的，但主要是在于实质（内容）。象吴川那样委头招兵，是错误的，把那些已全散了的没有了武装的土匪头、流氓、烂仔、投机分子，空头的委他为我解放军的军官，给他们番号，而且在我们控制的地区活动，这是错误的，并且是严重的错误，对我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3) 委了、招了以后，应该要有领导，争取和改造他们，使他们真正成为人民的武装队伍。但没这样做，委了就算，没有领导，没有管理，不理他的兵员、武器来源如何，这是很危险的。另方面造成许多恶果，不择手段，强迫人民交钱、子弹，互相争夺，自己打死自己人，特别引起人民反感，反对我们，造成军队与地方工作系统许多矛盾。

(4) 应该如何做才对？1. 要了解他受编的动机如何，是否诚意或有阴谋，是自动的还是被敌人指使的；2. 我们要有相当力量能够控制他，不然就有被对方融化了我们，甚至消灭我们的危险；3. 我们要委什么〔样〕的头才对，应该委在地方上有地位、有威望、有群众的积极同情分子、群众领袖做头，使他们出来号召，动员他周围的群众参加，使他去动员有枪有武器的人士自动借或捐出来，这是比我们自己去动员更会有利和迅速，这才是群众性的，正确的。

(四) 军事上集中主力问题

化、吴当时已经有成三千人的武装力量，集结五、七百人的主力是对的，应该的。但这支主力事实上不是主力，是个收容所，把不好的分子〔如〕流氓、烂仔、地痞、食鸦片的和土匪等分子送到主力团去，领导上又不重视主力团。党员入伍后，一切组织生活、政治生活无人管理，无人过问，等于开除了党籍，什么情报都不给他们看（团级干部），只有丁同志个人看看了事。战斗经验少，干部新，经验少，因此要起军事上的主力作用是困难的。但他能保持整个不会散，并且保持到现在，这是一个大的胜利和成就的。这支部队和工作干部，是好干部，我们应该鼓励他们的。

但领导上对建立主力部队开始时思想上是不正确的，不顾实情，不顾干部能力如何，企图单以军事力量打天下，不顾一切，一开始就

建立大主力，结果成份复杂，干部能力薄弱，经验少，不能控制，自身难保，对部队的管教无办法，结果成为一个大包袱，要他起主力队的作用去打仗，一定是会失望的，这是过早的做法。

要如何去建立主力才对呢？如果当时我们有强的有经验的军事干部是可以照这样去做，但我们没有这样的军事干部，应该加强小股的民兵领导和活动，有计划地指导干部，有步骤的提高。但只看需要而不顾实情，死硬去做，是弄不好的，甚至会失望的。如果有了干部，有了相当的条件，逐步提高，形成主力，方会成为名符其实的主力。同时兵要精干，好的干部，好的党员，好的队员，好的武器，应该集中到主力队去，减轻他的负担，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才能使他们发挥其主力的作用。有了基础，有了骨干，再扩大其数量，才不会影响其战斗力。主力的扩大是应该的，但领导上应该加强，要以它为中心，有计划有步骤，主力才能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精华。

至于民兵问题，应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或半脱离生产的民兵，必要时建立适当数量脱离生产的民兵（如区队、乡队或村队）来负担其经常的自卫警戒工作。并且各种民兵组织，应有经常的教育、训练，提高其军事水准，不应妨碍农村生产，不应加重人民负担，这是我们对民兵的方针原则。但我们当时不〔是〕这样做，凡是参加民兵的，甚至不是参加工作的老百姓，也可来食饭或者号召他们去食地主等，结果使广大民众对我党的主张〔认识〕模糊，以为共产党是如此了，做成对我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了解。对过去地下军、游击小组的组织形式，现在化、吴仍广泛采用。应总结研究过去地下军的经验，进行恢复工作。

（五）一面政权与两面政权问题

中央分局和区党委的意见，认为〔在〕我力量能完全控制的和较为稳定的地区，可建立一面政权，如在我力量不能控制和未稳定的地区，可建立两面政权（白皮红心的）形式，待将来力量能控制和稳定时，再进一步转变为一面政权。当时南路有些同志反对两面政权的意见，以为这是对我革命力量估计不足，不敢胜利，对敌人力量估计过高，害怕敌人，向敌人妥协，这是投降路线，认为只建立一面政权才

对，这种思想在其速胜论的观点来说是不足怪的，而是必然的。如果同分局、区党委一样见解，那才是奇怪的。虽然后来说亦有两面政权，如化、吴有四十八个一面的乡政权，另有五个两面的乡政权，但这五个两面的乡政权，我个人的估计不是出于主观计划的，而是出于无可奈何的。现在我们目的是要弄清楚思想问题，而不是计较两面乡政权多好，一面的政权多好的问题，更不是说要我们一定要建立两面的政权，然后再建立一面的政权问题，是效果的问题，是站得稳的问题。

问题在于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和对敌我力量的估计问题，对于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的长期打算，还是六个月或一年内就胜利的问题。现在一年过去了，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证明了、了解了这个问题。最近中央、中央分局的指示大家已看过了，我不再重复了。现在我们来总结一面政权的经验，在整个高雷地区，目前已经没有一个乡是一面政权的存在，虽然这是有许多原因，特别是我们政策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主客观条件未成熟，时机亦未到，由于我力量少，无经验，地区小，而且是平原，不是山地，是中心地区，不是边沿角落，如象一支小硬刺，刺在敌人手指和眼睛，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有感觉的，因此他们一定不顾任何痛苦，任何代价，把它拔去才得安慰的。但如果刺在他不容易看得到的，又不容易感觉到的地方（边沿角落的地方），可能会坚持得下去的。

在这一年来的经验，根据敌我形势的处境，在平原地区（雷州半岛）由两面政权进到两重政权的形式，现在仍是普遍的存在和发展中，二重政权的形式是以（调耕委员会、农会、吊耕会、同心会等）民众有事找我会长解决，只有共产党人讲话才信服，不去国民党政府投诉解决，就是在国民党政府解决了的亦不算，要我们解决才算。因此，调、农、吊、同心会等实际上是我们民众的政权，民众是我们的群众。国民党政权只有向人民拿东西，而没有事做，就是要做区长、乡长、保长也要问我们，取得我们同意后才敢做，要做的事也要先通知我们，要征求我们的意见后才敢做。象这样的形式（两重政权的形式），在平原，在敌力比较强的地区，是可以普遍采用的。

（六）对经济政策问题

吴同志的思想领导：（1）到那处就食那处；（2）食地主、打地主；（3）以民养兵；（4）征税。简称之为人生天养，不忧无饭食，无得食就抢之。总之经济政策是无“人道”可言。

1. 收军粮（土地税）开头初期有发动群众讨论，是群众路线来确定，这是对的，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机械的一般规定：耕家（指一般的农民和贫农）每石五升，地主三十担以上即开始缴纳，三十担以下不要缴，三十担以上分等级，地主三十担以下免缴军粮，这是没有阶级，没有立场观点的。比如贫农有多少的人收入有三十担谷以上呢？大多数是三十担以下的，但他们普遍都要缴交军粮，这是什么政策。

同时，这原则是无分我中心区、边区、敌区等，是一律施行了，这是弄不通的，这是千篇一律不讲政策。

2. 对敌人来我区抢粮，我们给他打击是对的，但我又到敌区去抢粮（抢民众的粮）表示报复，并认为这是好的杰作，普遍传达，鼓励多做，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抢到的是民众的粮，非敌人的粮，如果我们抢的是敌人的存粮，敌人的粮仓，敌人的运粮船，是可以的，是对的。

3. 在经济上，我们是没有必要的打车劫船，禁止一切物资出口，作为对敌经济封锁政策，这是自杀政策，帮助了敌人，损害了自己。

4. 没收学校的教育基金，没收祖尝基金，特别没收学校的基金是不对的，就是祖尝的也是过早而不妥当的，使敌人及地方反动分子有借口来反对我们了。

5. 在对罚款方面，有许多严重的错误，如不分贫富，只有借口，就可以被强迫压榨，甚至数重处罚，军队罚了他，政府又去罚他，或地方民兵或农会等又去罚他，奔走谈判或带信人又去强迫酬劳费，甚至数量比正式被罚之数大一二倍，如不满意时，被罚款者的房屋，仍要被各种方法破坏，对犯人，罚了款又不放人。甚至罚了款又枪决，枪决后仍要他的家属拿钱来赎尸体，甚至我们的部队要渡河，撑船的人来迟了一点，我们就说他有反动分子的嫌疑，立即枪决了，仍要强迫他的家属拿钱来赎尸体。这些错误的做法是无法使广大民众同情和拥护我们的，这是做成化、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6. 我们的经济一切收支分配，是没有计划的，或者表面曾有过规定但无实际执行的，是零乱无章的，如有些是丰衣足食，有些是捱饿抵饥，衣衫褴褛的。这种现象，是无法管理，无法团结的。

以上几条简单例子说明了在经济政策上也不讲道理，不讲政策的，但由于没有经验，有些错误弱点是要原谅的（因为财政经济政策是更复杂的事情）。

（七）土地问题

1. 在去年起义大搞，初期进行了减租减息，清算斗争，这是对的，虽然仍不够深入普遍了解实际情况，但是比较是合乎情理些，征求过少数农民意见，同时亦有个别过左过分的现象（如损害中农甚至雇贫农的利益），但不至于影响多数的人反对我们。其弱点主要是：不及时迅速纠正弱点，并且是普遍平均采用，无明确划分等级地区，无明确划分阶级、阶层不同的处理，无总结，无研究，这是不妥的。

2. 由于在初期顺利，没有遇到困难，冲昏了头脑，只看当时本地区地顺利，没有看到全面局势的发展，和将来能否长期坚持。因此在后期，特别在土地法大纲公布后，普遍发动了停租废债、分粮、分财、分田等斗争，结果不仅对地主富农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照顾（计口受粮），只得半饱，就是中农、贫农也被侵犯了。

结果引起广大民众不满，直至反对和离开我们，使我们孤立，使我们今天完全不能立足。

这是化、吴工作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但应该在什么情况下，才好发动停租废债、分粮分田等这样的斗争呢？中央最近（五月二十五日）的指示，已经很明确的解答这个问题了（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

第一，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业已全部消灭，环境业已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

第二，党的土改工作在干部数量上和质量上，能够掌握当地的土改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

第三，当地基本群众（雇贫、中农）的绝大多数业已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是少数人有这样的要求。

如果某一个地区，在上述这三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即不应当将该地区列入土改工作范围。

（另说）在实行分配封建土地及封建财产，实行分配的最后结果，必须使一切主要阶层感觉公道和合乎情理，地主阶级亦感觉生活有出路、有保障，这是中央最近指示中所指出的。

（八）统线问题

在去年起义大搞时，宣布取消统线政策，不要统线了，连看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都不准看，只准看《水浒传》、《三国志》，理由说是在抗战时期，被统线害死了广东党的工作，因此要取消统线政策，说是现在无所谓中间阶层、中间分子，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两条路，不站在革命这条路，就是站在反革命这条路，绝不容许有中间这条路的，凡是不愿站到革命这条路的，一律要打倒。于是把过去甚至长期同情我、帮助我、掩护我、袒护我或者有时协助我，从无反对过我的各阶层人士（开明士绅、失意的官僚政客、商人、地主等），同反动的恶霸地主、坏蛋分子一样对付，一样打击，戴高帽子游街，被公开审判，在公开民众面前受鞭打、清算、抄家，甚至枪毙，迫到他们走头无路，迫到他们不得不站到反革命方面，不仅是这些阶层如此对付，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个别的工人、雇农、贫农也被认为是高利贷者被清算了，贫农被认为是中农、富农甚至地主，中农被认为是富农、地主，这是不少的，清算不是民众自觉要求，而是“施恩”。民众不说我们好，反而说我们害了民众。

以上这些事实，就是不讲道理，不讲政策，不讲统线，不分阶级，不分界限，不分好坏，一律打击，全面打击，结果是帮助了敌人，壮大了敌人，孤立了自己。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党中央在许多指示和决议中，都有着重指出，坚持统线方针政策，除了以四大家族蒋介石为首的，政治上极反动的极少数反动分子清除出统线范围之外，我们的统线更加深入，更加广泛，更加巩固了，并要我们全党重视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中央分局今年二月的指示中仍在强调要各级领导机关加强和建立统线部门工作，中央在今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指示中亦有着重指出，我

们的统一战线政策，要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及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在这类地区（我们南路现在的游击区），目前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财（调整耕地是不同的），我们应该集中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力量。

要联合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我们应该缩小打击面，因为社会上现在仍存在各种各样思想的人的，有全面的，有局部的，如反蒋不反共，不反美，有反共反美不反蒋，有反蒋反美不反共，有反蒋反共不反美，有些可能上山参加革命集团的，有些可能落水走到国民党的反动集团的，但有很多是不敢上山，不敢落水的中间分子，有全国性有地方性的。我们联合他的目的，是为着打击和消灭主要的敌人，正因为社会上仍存在着有各种各样思想见解不同的人，我们怎样去争取他，联合他们或中立他们呢？我们不管任何一种思想见解不同的人，只要他的思想见解有一点对人民对革命有利的，我们都应该联合他这一点共同行动，比如他是主张反蒋不仅共不反美的，我们应和他联合反蒋，教育他亲共，不能强迫他反美。比如他主张反美反共不反蒋，我们应该和他联合反美这一点，不要强迫他要反蒋、亲共这两方面，应该争取教育他，影响他，使他不要积极走向反共帮蒋这方面。比如他们可能上山参加革命集团的，我们应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联合他们，使其积极大胆敢做。比如可能落水的，我们不应乱批评，乱打击他们，不然就会推他们更快落水，更反动了，我们应该谨慎的找到，政治上最反动的首脑分子，是少数的，个别的，给他适当的打击，以便拆散他，分化他们，中〔孤〕立他们。比如他们不敢上山，也不敢落水的，因为他们是中间分子，同时他们又可能上山又可能落水的，我们就不应随便打击和批评他们，而应争取他，教育他，影响他，帮助他，最低限度我们要做到要他们保持中立，不会被敌人利用或争取他们。

（九）对肃反政策问题

对肃反杀人问题，吴同志的思想领导，就是现在我们要做统治者，多杀几个人（地主）也不成问题，革命一定要杀人的，不杀人，反动

分子、地主是不怕我们的，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我们多杀他几个是不成问题的。

这种粗枝大叶不负责任是不对的，错误就由此而生，由此而发展了。

初期各级机关对犯人的处理，是有把案情向上级报告，请求指示后，才确定如何处理，这样做法是对的，是合乎手续的，这仅仅是初期。但后来，我们的上级首长就不耐烦看报告、听报告了，干脆处置杀之了事。再进一步，你们不要征求上级意见，由你们自己解决后再报告上来好了。于是一级再传达一级，照样办事，结果解决了，杀人也不向上级报告了，造成士兵、保卫员、交通员大家都可以不经任何批准有权杀人了。不但如此，杀了人，上级知道还要传令嘉奖，认为越杀得人多，此人对革命就越坚决，拿这种例子作为对党员、队员、工作者的教育材料，到处传达，鼓励大家学习这样的“英雄”，甚至在会议上或见面时第一句话就问“你杀过人么？”“杀了多少人？”造成大家为了要表示自己对党对革命的坚决、忠实，于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大家都要求或寻找杀人的机会去杀人，甚至食人，把杀犯人作为部队中的正式教育课程（刺枪术）。

这里同志不知道实情的，一定要问，何来如此多的犯人？这是容易明白的，凡是被拘留的犯人，有个别释放出来的，这是极意外的事，只有三分可疑是反动分子，就有被扣留，被杀无赦，这是成为扣捕和处置犯人的原则，凡是经我地区过路的小贩，讨饭吃的，特别是敌军的逃兵，甚至我们自己的过路工作同志都被杀害了。为了使工作人员坚决革命，于是发动他们相互间烧自己的屋，理由说是敌人来时也会被敌人烧的，造成广大群众人人自危，不可终日。这种无法无天，毫无法纪，绝无人道的所为是破天荒的。化、吴的失败和今天的结果是必然的，民众反对我们这种做法是对的。

这完全是违背了我党的主张，违背了我党的道德政策方针的，简直全无人性，发了疯狂的人的所为。

蒋介石杀的人够多了，是否能镇压倒反抗他的民众运动呢？是不能够的，结果蒋介石失尽了人心，使广大人民更憎恨他，迫得人民起

来武装自卫了。由于人心的背向，蒋家天下的灭亡，现在大家看得到的。

不是杀得人愈多，就可以得天下的，只有相反的结果是一定的，吴同志是参加过江西苏区肃反错误学习的，也参加过陕甘宁边区（1942—1943）的肃反工作运动的，当时我党的肃反政策是怎样的呢？

我党的肃反政策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八个大字，是采取“宽大政策”的，如何判决亦有我们的原则，重证据，不重口供，主要用政治上说服讲道理，不容许用刑迫供，尽可能不用武力镇压，而主要用群众力量（这是群众运动，群众斗争），而只有杀是镇压不了的，是错误的。

（十）对敌军工作问题

第一，同敌军斗争，目的是要消灭对方，要使自己生存和发展。要消灭敌方，斗争方式是有多多种多样的。用战争形式是一种，这一形式是普遍的、主要的。另一种是用智取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很复杂的，如用政治宣传说服，用经济收买，用阴谋诡计，使他兵变，使他瓦解，使其不能作战等等。这种斗争形式是重要的，有时成为主要的，在我们共产党的立场来说，这种斗争形式应该是主要的，用战争形式去取胜是不得已的，因为战争就会浪费财物，就有不少人的死伤，这些士兵和财物，都是我们的劳苦大众，是我们人民的财物，真正敌人是很少的，他们的死伤更少了，他们利用战争来发大财，绝不会把他们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作战争用费的。

第二，我们要了解敌我两军性质，敌军的官兵，特别是兵，他们都是被强迫的，雇用的，或被欺骗而来的，主要是被强征而来的，受雇用的，因此他们当兵是打工性质，是被迫的，不是自愿的，因此他们有好处就去，有机会就逃跑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的官兵呢？我们的官兵是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是有主义有目的的，是自觉的，自动的，自愿的，简称是自愿兵役制度，而国民党是强迫和雇用的制度。

第三，我们对敌军俘虏和逃兵的政策，是采取欢迎、优待，争取他们，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给旅费他回家乡，除武器之外绝不杀他，

不取他私人任何物资的。

第四，我们化、吴的领导同志，在去年起义大搞时，是不懂得这些道理，杀俘虏，杀逃兵，甚至我们派去做敌军内应工作的同志都被杀害了。这是错误的，愚蠢的，结果是帮助了敌人，巩固了敌人的队伍，加强了敌人的战斗力（因为投降也死，逃跑也死，不如坚决打）。

第五，我们化、吴领导同志，完全忽视了敌军工作，仇视敌军工作，不去研究了解敌人的政策；不去研究了解敌人的战略战术，敌人的优点和弱点及其行动的规律，而只靠自己这一点微弱的、不健全的军事力量，作盲目的、冒险的去打天下，结果是必然只有被敌人打，自己只有挨打，只有被动，只有保守，只有失败。

丁、关于团结问题（组织问题）

同志们，我们南路党的不团结，特别是化、吴党内的不团结，反对组织领导，无原则的斗争，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严重的，这是化、吴此次失败主要原因之一。此种现象是从去年起义大搞时就产生和发展了，直至现在我们化、吴党此种现象仍然是存在的。

一、根据同志们的报告，同志们的反映，同志们的表现，总结起来，有如下各种表现：

自由主义，合我者从，不合我者拒之。自称英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目无组织，只有个人英雄命令，不讲民主。目无上级，上级的指示决议，不合我意者不看，不讨论，不传达，也不给别人看，对上对下隐瞒。目无党纪、军纪、法纪，不分是非黑白，大骂上级是取消主义、投降主义，领导无能，不能领导广东革命斗争，就是县委本身的决议也不执行，另别作自己一套，当面不说，背后大发牢骚，违抗命令，借故犯法，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假借名义，侵犯民众利益，使民众离心而孤立了自己，许多事是在环境顺利、工作顺利时，一切事情都有人出头负责，但在发觉错了，不对了，就互相推诿，无人负责了，明知故犯的。但另一方面又不准别的同志接近上级，害怕揭露其错误，而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提拔干部是无原则的，奉我、顺我者亲之，提拔之，不顺我者恨

之，打击，少理。高高在上，官僚主义，不愿接近上级和群众，不接受不尊重干部意见，军阀主义，随便打骂，随便处罚，要则奉承，不要就一脚踢开，甚至毫无根据的怀疑、侮辱他，如想做官做县委书记者，要亲近吴司令，如想做县委者可亲近阿丁（三叔）。比如化南有一个原是交通员，后来要他当乡长，由于他打人、杀人、命令有成绩（有功劳）就提拔他为化北督察人员，他的权力要扣留那个，那个人就被人扣留，扣留了許多人（区长和乡长），甚至化北所有工作人员（除△△一人外），任何一个人他都有权命令他这样就这样。如吴司令认为化州阿丁（三叔）是个最有能力、最可靠、最忠实、最好的干部，但阿丁（三叔）被提拔作县委书记时，化州干部无一个不反对他的。因为丁同志在化州工作很久了，大家对丁同志过去的表现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是最令人不满的一个人，但当时吴同志并不介意，只从感情及〔与〕自己思想意见一致出发，不从党性、思想意识、威信、能力的条件提拔干部。

由于当时（初期）发展比较顺利，有了一时表面的成绩，于是更加骄傲疯狂，英雄自大，除了化吴之外，任何地区，甚至区党委、中央分局的领导，都被他们瞧不起。但内部的矛盾，不团结的现象，始终是存在着，而且是发展的，如我瞧你不起，你瞧我不起，你不满我，我不满你，执委不满常委，常委不满执委；化北不满化南，化南不满化北；吴川不满化州，化州不满吴川；你说我不是，我说你不是，甚至有意的对甲说乙不是，对乙说甲不是，感情拉拢，小组织式活动，甚至派系式活动，自成山头，自成系统。你说我是某人派来监视你，我说你是某人派来监视我，互相戒备，口是心非。我找你的错处作为攻击你的本钱，你找我的错处作为攻击我的本钱；我又怕你揭露我，批评我，你又怕我揭露你，批评你，大家都在苦闷中。但这种苦闷不是正确的，不是积极的，而是互相隐瞒，不愿讲内心的话，不愿讲实话。对总结过去一年来的工作与惨败的经验教训，找寻真理，以便改正过去的错误及缺点，是没有兴趣的，部分同志仍取消极态度抵抗。

此种现象是我们广东党在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现象。毛主席说得好：“要大喝一声，使同志们

大吃一惊，出一身冷汗，使同志们觉醒过来”，回到党的正确道路而努力奋斗，应该虚心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虚心的学习，找寻真理，以便改正过去的错误及缺点。

二、以上的严重现象何以严重的产生？这是应该检讨一下，过去南路党的发展过程，过去南路特委的领导过程是有其缺点、有其根源的。

在南路党发展过程方面，是不平衡的，有其长期复杂的环境过程，如有公开合法的环境，有半公开半秘密活动的环境，有完全秘密活动的环境。因此在发展上有发展得慢，有发展得快，也有发展得更慢，更小，甚至无发展的时期。于是党员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水准是不一致的、不平衡的，在成分上亦有其某些弱点，知识青年占主要的成分，工人、农民成分很少数的。

因此在我们党内，一般农民生活，农村状况及工人无产阶级思想是很薄弱的，由于知识青年占主要成分，于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我们南路党，特别化、吴党内占主要地位，同时这些青年，大多年纪很轻，正在学校里放下书本的学生，对于一般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尚未了解，尚幼稚不懂事的，只凭着一股热情去做事，因此他们是容易发生冲动，容易有偏向的，是容易犯错误的，这是我化、吴党发展过程的一方面。

至于南路特委的领导过程，亦有其许多弱点的。南路特委领导同志，他们的工作中同样是缺乏了党性，其党性锻炼是不够的。省委领导机关距离南路特委领导机关很远，由于交通往来不便，因此对南路党的领导帮助是不够，不密切的。南路党历来都是处于独立工作、独立领导斗争中，在皖南事变之后，我党在蒋管区的党为在公开、半公开的活动转入秘密活动，保存党的组织，避免敌人的破坏，因此广东党的组织和领导形式，普遍采取单线个别联系的形式，停止了集体会议的形式。在这个时期，我们广东党的进步是受到阻碍的，这是一方面。

但南路特委的领导同志，在领导上、作风上，在日常生活和态度上是有许多弱点的，下面许多干部、许多同志是不满的。如在领导上

缺乏民主，往往许多事情只有个别少数人知道，缺乏会议制度，甚至必要的会议都甚少召集，如总结会、检讨会等，习惯于个人包办的作风。互相尊重的精神是不够的，对下面的领导是不密切的（就近领导的地区，也许是好些）。缺乏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党的思想教育，直至目前，仍有不少干部对组织系统，对上级领导机关的关系，仍是模糊不清的。这是由于过去省委给南路党的指示和决议比较少，另一方面特委的领导同志过去对下级传达时，说明不够清楚，也许因为秘密工作关系，但这是太机械了。传达上级的指示和决议都不敢对党员干部宣布，因此使同志们模糊，以为特委上级就是中央，许多同志误认吴同志是中央派来的大员，甚至个别干部以为他是中央委员。官僚主义的作风，虚心倾听下级同志报告的精神是不够的。批评多，鼓励少，虚心接纳下级干部党员的意见是缺乏的，对下级干部帮助和指导是不够的，不深入，不够具体，特别对同志间、干部间的困难及生活的艰苦，缺乏同情心，而且照顾他们是不够的。

向下面拿东西多（经济或物资），但照顾和给下面的东西少。处理事情常常偏于主观出发，不够重视实际情况。因此常常对下级干部、党员，批评责备是有过火过严的，但对自己的自我批评是很少，甚至没有自我批评（现在已改正）。造成普遍干部不满，成见憎恨很深，见面时敬而畏之，阳奉阴违，在会议上不发言，不讲话，有事情不向上级报告，不讲老实话。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造成了特委本身丧失了威信，这种现象是再不容许发展下去了，大家应该进行坦白自我批评，弄清是非，消除成见，放下包袱，团结在新的特委领导之下，为党为人民服务而努力奋斗。

三、现在我们检讨省委对南路党的领导同样是有弱点的。

南路党和上级的领导关系，曾有三个时期：（1）在1942年秋冬以前，是属于广东省委领导的；（2）在1942年冬天以后至1946年初，这三年多是属重庆中央局直接领导的；（3）在一九四六年以后，又回复广东省委领导。

在第一时期（1942年冬天以前），广东省委给南路党的书面指示

和决议是很少的，并不是完全无，凡是重要的会议和决议是有特委同志参加，决议一定会有传达。

在平时是很少用书面指示，多是根据特委负责同志的口头报告，给他指示回来作口头传达，但这种指示多是粗枝大叶，不够具体，不够深入的，亦没有派过人来巡视。到后期曾派过人来，这里下面再说。同时他亦未有叫过县级干部来了解情况，使下面许多问题未能了解，不能及时反映，不能及时解决和克服。这种领导作风，使南路党对省委领导的印象是不深刻的，责任由我（梁广）来负。因为当时省委是委托了我负担对南路党的指导的，但我未有负起应有的责任。

第二个时期（1942年冬至1946年初）是属于重庆中央局领导的，为何要转到重庆中央局领导？这不是省委的意见，也没有征求过省委的意见，是由中央局通知我们才知道。这是谁的主张脱离省委转到中央局的呢？是省委后期派到南路巡视工作的黄同志所做成的，这种举动是不对的，是闹独立性的行动，这主要是黄同志负责。但南路特委领导同志也要负责任，使南路党在抗日战争后期所领导的各种斗争，不能如广东其他地区的斗争互相配合，互相帮助，互相交换干部经验和意见等等，如张炎参加起义的第一次大搞时，省委是不知道的。因此南路党脱离了省委的领导。在这时期的好处多，还是缺点多，今天我不敢作这个结论，但在我个人的看法，南路党脱离了广东省委领导之后，在实际工作中是有阻碍的，有损失的。

第三个时期（1946年后），即在抗日胜利之后，南路党又复回到广东省委领导之下工作了。省委在一九四六年初（三月）政协会议至东纵北撤时期，在领导上政治上是有过某些弱点和错误的，如在政协会议前后一个短时期，对政治局势的估计，是偏于乐观方面的，只看到好转好的方面，没有看到困难坏的方面。当时认为国内局势即将和平好转了，建立和平民主联合政府就要实现了，于是，武装斗争亦将结束和停止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政策亦停止采用了。这种估计、认识、布置是错误的，不对的。原因是省委对当时的几次大变化，对中央的指示没有深刻的了解，片面的认识，掌握不稳，如日寇突然投降，把我全盘计划弄翻，又要重新布置。国内局势日益恶化，这时期又要从

恶劣形势作布置。我广东党在抗日期间创立的武装有数万之众，但这些武装部队在民族抗日战争环境是可以活动生存的。如果突然转入国内战争阶级战争中的生存活动，这一变不是简单的变，而是战争性质从民族战争变为国内战争、阶级战争。因此思想上、一切动员上、宣传上、一切给养来源上及我武装活动斗争和组织方式方法等，整个改变是不容易的。我们党员干部大多数已暴露，一旦转入内战，我们的损失是不可想象的。又无钱疏散，如何对党对人民负责呢？因此当时省委各同志非常焦急。这时是困难的，我们干部能力差，战斗经验少，人民生活又苦，距离我解放军主力这么远，局势仍未明朗，突然全国局势又趋于好转，召集政协会议，颁发政协纲领，全国有迅速好转之势，但很短时间，好象是昙花一现，又突然恶化起来了，破坏政协会议的协定事件发生了，直至发展到分裂内战。当时我党又争取广东我军北撤的谈判问题，时急时缓，反复无常，最后谈判已经确定了，琼纵、东纵两个纵队北撤，只有东纵北撤成功，在准备撤退期间，本来限一个月，结果拖至三个月，又是反复无常的，神经战非常紧张复杂。我们省委的领导同志由于经验不足，能力不够，在这样大的变化复杂环境中，掌握不紧，犯了偏向的错误，如在政协会议时期，对政治形势估计是偏于好转乐观的一面，采取了右倾退却的政策方针，但对停止采用白皮红心的两面政策问题，很快就改正了（约十一、二月）。至于武装斗争的坚持，当时未有明确方针，但是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在东纵北撤时，干部撤退过多，影响各地方工作的坚持，这是有偏向的。但不是主要弱点，因为北撤保存了大批干部，他们在华北学习更多经验，提高了能力，将来对我广东革命事业会有极大帮助的，这是我广东党的光荣。在东纵北撤后，省委在领导上过分强调黑暗的一面，因此省委当时对坚持武装斗争和党的组织领导上的方针布置是有不适当的，有如对武装斗争的坚持方式方法须用多种多样办法，但其中是有缺点的，如改变名义，甚至用土匪劫富济贫等形式出现，停止党的领导，对地方党亦疏远领导，取个别联络，这是不妥当的，结果造成好的同志队员徬徨苦闷，思想意识不纯、有坏习气的分子，这时弄得更不好了。但在几个月时间之后，已经改正和克服了，这是有偏向的。

省委当时强调黑暗的一面是有其原因的，因为广东党此次大的发展过程，是在公开半公开的环境发展和长大起来的，现在要完全转入秘密活动环境下是没有经验的，而且大多数党员干部是暴露了，麻木一下就会危险的，打响警钟使其警惕是必要的。一年多来的事实证明是有收获的，同时省委领导上的错误和弱点，去年（47年）一月已作了检讨总结，并向各地区党委传达过，南路温同志亦参加该会议的。

同志们，我们大家都要紧记住，要学习，要重视学习，要提高我们的政治水准，要学习分析时事，分析时局的发展规律，这种时事局势不仅是对南路，更不仅是只看化、吴这样小地区，而是广东、全国的，甚至国际的政治趋势，如果对时局趋势估计和认识错误了，我们一切事情就会跟着错误的，因为一切工作方针、组织形式、工作形式，一切斗争形式都是要服从于政治方针，如果政治形势有了大变化，一切工作方针、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形式又要跟着政治形势转变而转变了。如果不注意时事，不注意学习，就不会进步，就不容易辨别是非（去年曾有人反对谈政治形势，反对看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反对学习党的文件，这种非党的态度，完全是错误的，是不容许的）。不进步就只有盲目地被别人领导，别人要行左就行左，要行右就右，别人错了你也会跟着错下去的。南路这次错误，就是如此产生的。

四、吴同志的不正确思想，为何会控制了雷州、高州，特别化、吴、廉、遂的干部思想？

1. 吴同志有他好的一面，热情，有能力，有魄力，有自信心，有牺牲精神，大胆，敢作敢为，聪明，能接近干部和群众，没有铁的面孔，日常生活能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没有锱铢计较小事情，有雄心，想做大事，做领袖，这是他的好处。

2. 有雄心，大胆，敢作敢为，想做大事，做领袖，在吴同志本人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思想，是标新立异的思想，是流氓思想，他想以自己为首，建立一个特殊局面，特殊世界，为此理想目的，采取流氓政策手段，不顾一切，不走正路，明知故犯的蛮干。这〔里〕从何解释，从何根据呢？

（1）南路党过去的领导，是这样多的弱点（或是错误）干部普

遍对地委的不满，有很深的成见和仇视，造成这样严重现象，温同志是要负全部责任的。吴同志来了南路之后，是知道明明白白的，吴同志应该以身作则，帮助纠正克服这种现象，使南路全党团结一致，为人民为党工作。但吴同志不这样做，也不向省委报告，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利用过去特委领导的弱点，和干部对领导之不满，加以批评打击，不是采用治病救人的精神，利用自己的长处，提高自己，夸大自己（说是中央派他来大搞的）。然而由于南路党各地区各干部、党员，在长时期对领导不满，特别对温同志（二叔公）的不满，有很深的成见仇恨，又惧怕，有很多的冤屈，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大家都在苦闷彷徨中。吴同志来了南路之后，由于他能接近干部党员，生活上能同他们打成一片，同情了他们的苦处，能替他们泄泄气（我们是应该要诚意正确的同情他们，要替他们泄气的），又能反映华北的许多具体、动听的故事，又能讲，又能写，又能理论，在战场上又勇敢。因此，在许多干部党员的眼光中，从未有过这样好的领导者（事实上是如此）这是给同志们在精神上、思想上起了变化，有了寄托，从此已被吴同志俘虏去了，从此就盲目服从他了。这里并不奇怪，是很自然的事，主要是过去特委领导不良的结果。

(2) 由于其理想目的，取得初步顺利成功，以为他的一切举动做作都是对了，使其更冲动，更疯狂，更英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的精神更为之发展了，于是不顾一切，脱离党的立场，诋毁侮辱上级省委及中央分局的领导同志，如林平同志、方方同志等等。同志们，方同志是中央分局的书记，林同志是中央分局的副书记，同时是当时广东省委书记。方同志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在大革命之后至现在一路负责县委、特委、省委、中央分局的主要责任，经过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日战争的锻炼，东纵北撤他是负主要责任的代表，贡献不少功劳的，始终在他整个工作过程中对党对革命还没有离开过岗位，没有犯过大错误，是有能力、有经验、有威信同志，我党中央是很重视他、信任他的。虽然过去方同志在领导上、作风上、态度上及武装斗争上，是有过某些弱点的，但在延安和吴同志同期学习过整风后，是有其更大进步的，如在东纵北撤斗争的过程，如在这两年多

的对华南，特别对广东的领导有很大的贡献，很大的帮助，就对我个人帮助亦很大的。吴同志此次返分局总结工作及反省其错误时，其自己的观感与吴同志在南路时所理想的完全相反的。林平同志是内战初期参加的老党员，党曾派他到闽南，坚持了几年的游击战争（他是江西红军出身的军事干部），是抗日时期广东第一届省委委员，负责过东江特委书记，开辟东江工作是有成绩的，坚持广东抗日游击战争武装工作，创立东江纵队他是有很大功劳，很大的贡献的。粤北省委被敌人破坏后，他是广东临时省委书记，恢复区党委时，他是区党委书记，他对广东党的工作，对广东抗日民族斗争，是忠实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是有成绩、有功劳的，虽然他在实际工作中有某些弱点或错误，这是难免的。但这些不是大错误，同时他是会进步、会改过的。

以上是方、林同志的历史简单介绍，吴同志只是一知半解他们的弱点，就拿来攻击上级，拿来作借口反抗、拒绝上级的决议指示，借中央名义抬高自己的地位，这种思想不是共产党员的思想，是流氓思想，是个人英雄高于一切的思想。吴同志对党对革命有何功劳呢？他入党以后对党对革命的贡献，连吴同志自己亦说不出有多少贡献。但他给党给革命的损失是很大的。给南路的损害，是第二次大错误了。

吴同志虽然现在已经承认了，反省和了解了他的错误，但是仍要由他在他的实际工作中去证实他的觉悟。有些同志说，南路现在我党的力量有这样大的局面，全为吴同志的功劳做出来的，我认为这样见解是不对的。吴同志来南路工作的时间，仅仅一年三四个月，如果原来没有我党工作基础，他能搞出这样的局面，有这样的本领，那他的功劳就不少了。但我相信吴同志有天大的本领也做不到，今天我南路党的力量，是由我南路党全党的干部党员十年来的艰苦经营得来的，有些同志说得很对，我们有南路党和广大群众的基础，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搞得起来的，而且规模会更加大。

由于吴同志的不正确思想，流氓思想给了南路党内干部、军政、民众干部坏的影响是很严重的。直至现在一年多长时间，停留在党内思想极端混乱，互相攻击，互相埋怨，互相猜疑，互相戒备，互相对

立。互相推卸责任，幸灾乐祸，贪污腐化，胡思乱想，不负责任，消极怠工，自作自为，不守纪律，阳奉阴违，埋怨上级，离心倾向，悲观失望。总之，是说不清的不良现象，不团结的现象，有同志（军事干部）说：如果吴司令不离开南路，我们是不会弄成这样的局面的。同志们，这种认识是不对的，这是幻想，我们要认[识]清楚，吴同志的思想领导，政治方针，工作方针是不正确的，如果吴同志的领导思想，政治思想不弄清楚，不纠正其错误，保持至现在，同志们，今天南路的局面是很难想象的。

五、同志们很愤怒的责问上级为何拖到现在才解决，这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是完全对的，是正确的批评，我完全同意，我诚恳的接受你们的批评。同志们，中央分局、区党委要我来向你们承认错误，这主要是官僚主义的领导，错误不能及时制止，纠正、克服这种错误，使南路党和民众损失这么大。虽然分局、区党委曾有过不少的书面指示，和派干部传达（欧、左等），并参加实际工作，又派秀琳同志来巡视传达意见，但都没有彻底执行，或被搁起来了。分局、省委缺乏了解下层实际具体情况，南路地委一年多来没有一个完整系统的报告给上级，对南路党的领导和帮助是不够的，这是一大遗憾。

在这一年多来，南路地委的领导，仍然是停留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圈子里面，这里主要是指△同志来说的，△同志对执行分局和省委的指示，是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是不坚决执行，又是机械的，不明确和有偏向的。吴同志的错误方针政策，有许多问题温同志是同意了，或默认了的，没有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方针，向吴同志作思想斗争，而相反的在某种程度上，同样被吴同志的思想俘虏了，温同志在政治上对党的政策方针上执行是模糊的，是摇摆不定的，甚至束手无策，消极等待的。这原因由于温同志长期满足自己的进步，不虚心向上级和下级研究问题，不倾听群众意见，官僚主义领导作风是很严重的，老是在上层少数干部兜圈子，离开现实作主观无谓的争论，这是无用的。不接近下层干部，许多同志都感觉怕见他，因为他（象铁的面孔）态度不好。如果不改变这种态度，是很难和下层群众打成一片的，不深入下层了解实际情况，对下级没有具体领导，甚至等于无领导，由

他们自生自灭，自流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去年大搞的错误，及拖到现在才作总结，使南路党受到损失，民众受到损失，造成今天这样许多困难等。吴同志应该负责任，吴同志已经向分局向省委反省，承认了错误，要求处罚他，上级对吴同志的错误处置，是取宽大态度的。只要吴同志自觉了解，反省承认了他的错误，肯虚心学习，肯改正他的错误，上级党本着治病救人的宽大态度，给吴同志的机会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去学习，给他的机会去向党向人民立功，去填补他的过失。上级党没有给他任何处罚，现在调他到△△工作。但温同志对南路这次错误，是应该负主要责任，温同志是南路党的主要领导者，他没有负起主要领导者的责任，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没有及时制止纠正和克服这种错误的发展，没有及时总结停止这种现象的发展，没有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没有及时把这次错误实际情况报告反映到上级去。温同志的官僚主义领导，对各地区下面许多严重现象是不知道的，许多严重事件直至今天在总结会议上才知道。南路党内的不团结，思想混乱，干部和党员的思想为什么这样容易被吴同志的不正确思想俘虏了呢？这不是偶然的，是由于过去特委领导的恶果。另一方面温同志对南路建党的工作，他是有功劳的，南路今天的基础，今天的局面，他是有功劳的。

温同志最近是有了些进步，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反省了，他在总结会议上承认了这次严重错误的责任，他是要负全部责任的。但现在只是开始觉悟，我们希望温同志仍须努力，要作更深入、更深刻、更有系统的总结过去领导上的弱点和错误的反省，在会议上作有系统的反省报告，向党承认，向党坦白，并希望温同志写成书面的反省报告，以便教育干部，教育全党同志，这不是打击温同志的威信，相反的，温同志能这样做，温同志的威信只有更提高，只有更进步，吴同志是一个突例。我党对于干部政策是宽大的，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只要温同志有进步，肯学习、肯改正，上级党一定会给温同志机会去改正、去立功的。现在党一样信任温同志的，希望他在实际工作中去改正过去的缺点。

六、造成化、吴革命斗争今天的严重局面，主要是在南路地委领

导的错误，特别是吴同志和温同志应负主要责任，而其他地委负责同志，亦应负相当责任。温、吴同志思想上是对抗的，其他地委同志则采取消极态度，对工作放任不理，生活上自由散漫，互相之间不合作、不团结，不是积极寻求方法来解决温、吴同志的谁是谁非，在领导机构内取得一致意见去领导工作，以至任其自流发展，这同样是对党对人民未负应有责任的表现。

同时化、吴党的领导机关（县委）的领导同志，亦应负责，特别是丁同志（三叔）在某些程度上比吴、温两同志应负更大更严重的责任，如造成许多（无人性）的严重错误，隐瞒上级，不向上级报告，也不许其他领导同志接近上级和报告上级同志，以个人的地位威迫其他领导同志，用不讲老实话，阳奉阴违的态度来对付上级，明知故犯，自作自为，讲话做事不负责任，造成党内不团结，互相猜忌，互相仇视，个人英雄自大，目无党纪，目无上级，这种思想完全不是共产党人的思想。

按照我们党的纪律，铁的纪律，为了教育全体党员，党应该给丁同志（三叔）的处罚，最低限度，在丁同志未了解、未承认、未反省、未有表现之前，不能给其负责任何领导工作，此次组织上委他为东进队的政委是不妥当的（因为他还未了解承认其错误）。我同意取消其政委资格，并转达中区党委负责处理和帮助教育、改造他，我希望丁同志进步，为党为人民继续努力。

至于其他县委领导同志和军政首长，其责任虽比之丁同志有分别有轻重的，但不能把所有或缺点错误完全推于丁同志个人身上，而认为自己是毫无缺点和错误。如果有这样的思想见解是不对的，这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这里起码是同意或默认和执行了此种错误工作，大家都是实际工作的执行者，甚至某些错误是同志们做出来的杰作，丁同志也错误的同意你们的错误，或更发挥了你们的错误思想。因此过去一年来所造成各种错误和缺点，是组织上领导上大家做出来的事，我们大家都应该要负责，我们不应该只有检讨别人，批评别人，要求别人反省承认错误，我们应该首先好好的总结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先作自我反省批评，然后批评别人，帮助别人反省。自我批评或批评

别人的事，不是为了抵毁自己，打击别人，如果有人企图用批评别人（打击别人）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和地位，这是假公济私或私人报复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正确的检讨和批评，目的是为了互相帮助，互相教育，弄清是非，找寻真理，克服弱点和错误，求得一致，求得进步，求得更顺利的去完成党所给我们的任务。

如能本此精神，则南路党的正确领导作风才可以建立，党内更能团结一致，要恢复我化、吴工作是不难的。

最后，以上的总结，现在只作为初步的总结，因为此次总结会议到会的同志，只是县级及部队中团级的一部分干部参加（如化南、化北、吴川、第四团及廉江、遂溪县委书记和地委一部分主要干部参加），而化、吴的县级团级干部仍有一部分未有到会（他们因工作关系或地区距离），故未取得他们的意见和同意。同时这个总结是根据上级干部的报告、反映总结起来的，因此对全面问题作更深入的，更客观更具体的了解来总结是不够的。因为环境关系，我们只从上而下进行检讨，未能普遍的从下而上的检讨上来，去作更深入更彻底的总结，这都是我们这次总结的遗憾和不足的地方。

这次总结是必要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如在总结中所指出的许多严重现象，特别是不团结、不合作，这不仅是化、吴的问题，而且在南路的个别地区至今仍自流的存在着这种现象。此种坏倾向，我们不容许它存在了，应该立即停止，立即纠正，克服过去的弱点和错误，团结一致，才能负起当前对敌斗争的重大任务。

摆在我们领导者面前首先要纠正和克服的：

1. 为加强团结，粉碎蒋、宋向我进攻计划，应立即停止与纠正党内各种不团结及无原则的斗争，以至消极怠工等等不容许的现象，如：互相不团结、不合作、互相乱骂，互不尊重，目无组织，无上级，无纪律，极端自由散漫，极端民主（但亦有至今仍怕上级报复和开除而不敢讲话的），看不到前途，无信心，以消极或表示疲劳来对待工作，当面或在会议上不讲话，而在事后则到处乱骂，到处作小广播等等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敢于到处骂人，骂上级，甚至入党几日的党员也乱骂上级，敢于到处进行小广播，敢于到处拉拢别人，反对和要求

撤换领导者，造成极端民主等，这种现象，不是发扬了民主，而是帮助了敌人捣乱我革命队伍的阵容，削弱了我们有组织、有纪律的阵容，造成党内思想混乱，这正是便利于敌人利用与收买我人员，打入我革命队伍内来活动，此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全体党员干部，应注意严密提高警惕，立即纠正此种现象，而各级机关的领导者（干部）首先要以身作则，负责任领导并督促检查下级，经耐心解释说服，如有违抗，不愿纠正者，要执行党的纪律，按其程度，给其处罚，甚至开除党籍。为了巩固党组织，执行纪律是必要的。我党领导作风是要民主的，在党章上已有明确的规定；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每件重大工作的决定都是要收集大多数党员干部的意见，也就是广大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实事求是的去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做成决议，又给各级同志讨论实施后再来总结，就把实际工作提升为理论指导了，这就是我党的组织原则与领导作风，因此会有进步的。

在会议上，每个同志都有发言权利，可以充分发扬民主，对上级决议可批评，对任何同志可检讨。但当会议中经多数人决定的问题后就要一致执行，如果自己不同意，仍可保留，要求再向上级提出意见，可是一面仍要执行原来决定，不能借此怠工或不负责任。当上级判决后，要改则改，如同意原来决定时，就要无条件执行。

对某个同志有不满时，应积极去寻求解决，当面谈清楚或开会解决，这样才能使党内更团结更集中，更一致更坚强，这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任何党员都必须遵守的。

目前还有同志对民主误解的，对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的意义不了解。对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不重视，常表现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有意见不讲，但对决定又不肯执行，同志间没有友爱，对人不对事，没有从爱护党、使每个同志进步为出发点。

每每把某一个有弱点的同志，作为仇敌，不了解他们还是我们的同志，仍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若能使他进步，党就多了一种力量，反而以投井下石的办法去对付他、孤立他，不去帮助他，更有些因为对某个同志不满而对整个党的领导不满，甚至失去信心，以至动摇，就

把个人作为整个党。因此由于个人闹意见而致影响革命事业，这种例子在南路党中的教训已深重了。同志们，应作重新的了解。只有团结，才能战胜敌人，才能完成党付给我们的任务。

2. 要进行整军工作

我军中普遍存在的弱点，目无纪律，目无组织，命令可以不服从，互相埋怨与猜忌……的不团结现象，表现于日常的公差、勤务讲价钱，一切要平均，干部也要放哨，宿营地也要平均，上级住好一些地方都要想用机枪来驱逐。生活无纪律，有空时就小广播，找寻上级与个别同志的空隙来攻击。对党的会议及行政会议毫无重视，甚至发展到离心倾向，不愿于该队工作，由此产生了几种坏思想：一种是因见了各种困难，以为漆黑一团，束手无策，就采取消极态度；另一种就想到别个地区去，别个单位去逃避一切，有的更发展到想拖队伍去当土匪及投蒋匪，这种危险多么严重呢？怎样能够对敌作战呢？

目前进行巩固部队工作是中心的一环。

应先巩固现有基础，停止发展，先解决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不团结问题，应从上而下的进行检讨，互相反省，首长要以身作则去作自我批评，再来推动全体，在互相坦白真诚检讨之后，工作上的真理求出来了。个人弱点或错误，应该大胆承认，大胆改正，一切误会也能消除了。要进行整军，这一项工作一定要先搞好，才能使大家意见集中。

经过思想教育、耐心说服后，那些个别仍不肯改变过来的分子，应分别予以处分或开除，不要姑息坏分子，而留存害群之马。我队素质应提高，贵精不贵多。

思想上基本求得一致后，就需要在军事上积极行动，从实际斗争中去锻炼，以提高他们的战斗力，同时可在斗争中来考验他们有没有进步。

当队伍已能守纪律能打仗的时候，这时候可以考虑逐步去扩军，有了干部，有了好的骨干时再补充一些新血液，那么我们就能战胜敌人，就有条件去恢复我们的地区，解放在敌摧残下的人民。

整军工作不是一次过的，应该经常去进行，如制度的建立，对同

志们的政治认识与军事技术的提高，同时要不断和他们洗脑，不要让他们思想上又堆积新的灰尘。这都是各首长要经常研究去进行工作的。

3. 要加强对上级指示的学习与对实际工作的总结

南路党在吴同志到后，就强调不用学习，不要看我党的理论书本，不用讲国际国内形势，不重视上级的指示和决议，只把自己意见作为方针原则，把自己听来的片断经验作为策略，这就是脱离党的领导行为，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因而也就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那么工作就不能不失败了。

在实际工作执行中，没有去总结，求得经验，当反映了某些弱点时，又不及时去纠正，因此错误重重，一犯再犯了。

为了要纠正这种弱点，为了提高同志们的政治理论水平，能负起更大的历史任务，因此今后：

各级干部对上级指示一定要研究，不容许收到上级指示文件就放到公文袋里去“学习”。各级党要建立支部组织，特别要加强军队中党的领导，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贯彻到每一个党员、每个群众中去，一切干部要过支部小组生活，进步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互相学习与互相督促。

至于每项工作，决定前要有计划、有中心，执行后要及时总结，得出经验来教育同志，也可帮助上级的了解，并可指导其他地区。

同志们，这个总结得出来的教训是由无数同志的血换来的，希望你们细心去研究，配合自己的工作来反省，以此作为借鉴来照照自己。

抱着为党为人民的革命意志，把我们的缺点克服，优点发扬，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会进步的。

黄海关于南路半年来斗争总结

——东征前后的情况*

(1948年7月)

这半年来的斗争可分三个时期来总结：第一个时期是东征前在南路的准备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东征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到达中区以后。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东征前我是准备调到茂电信去工作的，但因恰巧为敌人重点扫荡期间，路不通行，去了两个多月也去不成，回来不到十天，东征队就出发了。对这时期的斗争我知道的很少。其次东征队到了云浮飞地分两路进军，我带了二营（约三百人）单独活动，比先头部队迟半月才到中区的阳春北部，到达时已四月初一了（农历）。部队休息了七八天，又继续游了成个月，到四月底才到达恩平的四区，直到我出来的个多月中一共病了五次。所以对于这个时期的斗争，我知道的也很少。

东征前的环境是这样，敌人集中两个半总队及其他各县地方团队约四千人，向化州作重点扫荡，化州主力三个连突过廉、遂边境活动。当时廉江因部队集中太多，粮食缺乏，更兼敌人分兵抢粮，敌人扫荡中心也渐由化州转向廉遂，兵力集中于廉遂边境，机动的观察我们的兵力调动，随时准备向廉遂作大举扫荡。在廉江粮食异常缺乏，三县主力被迫集中于遂溪一角（约二千人），一方面情况严重，另一方面粮食因部队集中很觉困难，整天都是考虑到食的问题，有些部队连粥也吃不饱。同时各同志（特别是地方党）因见敌在化〔州〕作重点扫荡，甚感害怕。对于反扫荡斗争只作消极的退守，如精简部队，准备掘地牢，分散活动，连必需之交通站也缩成一两个人，找一个交通员带信或带路也感觉困难，晚上十时以后就很困难找得着交站了。当时

各地方同志及留在老地区坚持的武装同志都希望东征队提早出发。一方面是由于分局的指示，但以我估计，他们当时存在着两个错误的观点：第一，以为部队不出发，集中在遂，每天所耗的粮食不少，会增加老地区将来粮食的困难，所以当时有些个别地区有粮食也不肯拿来供给部队，有些个别工作同志甚至不敢来部队，怕要为部队找粮食。第二，怕部队集中给敌人扫荡，专门想到敌人进攻自己，自己不想去进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同时单想东征队出发后可以牵制敌人一个至两个团，减轻老地区的压力，不想到东征队在出发前准备得不充分将来会遭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会被打垮。这表现在东征队与茂电信的地方D未取得联络，经济很未解决（只得几千万元），弹药还未补充（平均每人二十发左右）。一些必需之用具还未购买（如行军必需之鞋及雨天必需之雨具等等），就迫着我们出发，这时，连主要干部还未决定，他们紧张的情形真使人把许多必要办的事也放弃了。后来只补充了几千发子弹，买了几百对鞋及得了两亿元就作第一次出发了。这时部队才集中整编才一天就开始出发到廉东南（大塘区），这天才吃完早饭，敌人百人左右就向我进攻，一接触我们就撤退，避免与敌作消耗战，浪费子弹对于东征是极不利的。撤退几里路后，就分在二条村休息做晚饭。吃饭时另一股敌人约八十人又来扰我们，给我们打退，缴了两担六五弹（约千余）。从这两次小小的战斗中，我们感觉军事干部仍很缺乏，有加强之必要。同时对于敌情不明，进军路线有重新研究之必要。火力要加强，弹药及经济要补充，更兼对于分局指示下之大搞，老地区如何搞法，我们想详细与坚持老地区的同志讨论一下，并作明确与具体地决定一下。因此，我们决定折回头，因转回新塘区时（廉南），适下大雨，河水大，渡河困难，由深夜二时起直至次日上午十一时才全部渡过。渡河地点距敌人据点仅八里路，因敌震于我们的声势，不敢来进攻，但全部力量为敌发现。三天后，敌集中八百至一千人来作全面扫荡新塘区，黎明即与敌接触，团部与一、三营在天未明时即撤退，未与敌接火，二营另住一条村，通知他撤退后即为敌所隔，一个连与营部为敌冲散，营部与数十武装被敌围于一盆地，后为我们突围冲出，只有七个队员为敌困于村庄，围了三

日夜，直到弹尽粮绝才为敌人用炮打开门，其时七人中已有两死两伤了，我们的损失只是这七个同志（内有一轻机手），七条步枪，四个轻机弹角，其余的队伍在隔天已全部收集。当时我们决定由涂团长明绅同志带二营去救他们的，但由于他们存有恐区病，不坚决执行此任务，以致造成这七位同志壮烈的牺牲，民众及同志当时也有很大的反感。后来，与茂电信地方党取得联络，补充了二千多发子弹及二亿五千万元（实际在出发时只有一亿八千万元左右）与及讨论了坚持老地区的问题，由地委作一个大搞方针的指示，我们就作第二次出发了，团级干部增加了黄飞团长，留下了郑世英团长。

部队是这样组成的，廉江三个连编为第二营，内中只有山东连战斗力最强，人数最多（百二十多人），党员最多（二十多个），其余四连（八十多人），五连（七十多人）战斗力就较差，四连的队员素质好，多数是贫农，但干部弱，配备差，连长是一个老国民党兵，在联防队当过班长，因他组织了几十人，才给他做连长，入伍年来，军阀作风仍然很重，指导员入党时间短，意识差，能力低，常与连长争吵，不合作，而干部缺乏，无法调换，因此影响这连的进步。五连的队员素质差是一部分由国民党中投降过来的，一部分是刚由地方队编来的，地方性很重，不愿离开家乡，干部也很弱，连长是投降过来的，在国民党当过连长，军阀作风极严重，看不起同级的政治工作者，在连队内以唯我独尊的态度出现，对下级动不动就打人，唯一优点就是配备较好。化州二个连以及茂电信一个连（六连）编为第一营，内中以六连为主力，干部有作战经验，曾单独与敌人作战数十次（绝大多数是打硬仗、消耗仗、阵地战），队员大部分当过多年兵，全连人数六十多人，有二十多个党员，配备好，与山东连同为东征部队中主力之主力连。其次化州的二个连也不错，二连人数共九十人左右，三连百人左右，配备三连较好，干部二连较强，两连亦曾打了数十仗（与六连一样都是打硬仗）。遂溪的二团由三个连编作二个连，在东征队编为第三营，共百六十人左右（连营部）郑团长留下，由该团参谋作营长。由于政治工作差，三营的纪律是东征队全军较差的一个营，在平原及本地作战较有信心，对山地极害怕，全军三个营、连、团部共

七百五十人左右（一营二百八十多人，二营二百七十多人，三营百六十人，团部十多人）。领机的组成由黄飞、我与涂明绅三人负军事上责任，三人均用团长名义来指挥这个团，黄飞负主要责任，我次之，涂又次之，以丁同志（三叔）为政委，陈配隆为政治处主任，欧初同志则代表地委来领导东征队。

第二时期为东征期，农历二月二十几由廉南大圩区出发。出发的第二天，由于估计敌情错误，及途中二、三营发生误会，自己打伤了三个同志，致在天光时还未抵达目的地，又遭当地保队阻击，被迫转移，二营四连失去一个排的联络。吃完早饭，当地乡联防队百余人来扰，为我打退。队伍又即时继续进军，避免作战，我带二营作后卫，本已联络到四连的那一个排，因为敌所隔，同时部队又要继续行军，无法再联络回，迫得交由地方部队去联络（因此四连失去一排十八人，只得六十人左右）。后卫部队又与敌增援部队接触，打了个多钟头，敌死伤不明，我只有一个班副受伤。由廉北经过廉、陆、化边境，第三天到达化北，在山底又与敌作战，由下午二时左右打到黑，这仗因吃饭而被迫与敌打消耗战，消耗了二千多发子弹，伤一人，而敌则死伤三四十人（传闻的）。连夜继续行军，因天黑大雨，向导又不识路，致整夜也行不到十里路，天明又为敌当地之联保队百余阻击，我们只用二个连掩护渡河，这时我们决定，以迅速的进军挺进到达目的地（当时的目的地为茂北或信北）为主，遭遇敌人原则上以少数部队掩护，继续进军，避免与敌作消耗战。因此在东征全部过程中皆是避免作战，敌人追来就走，以致士兵直到营级干部对作战都没有信心。他们没有信心，除了这个原因外，还因为（一）指挥不统一；（二）对任务不明白，因准备工作差，连领机也未向营级以下干部宣布，任务更不清楚；（三）觉得日夜不断行军，不知道究竟去哪里，甚至有些怀疑去东江，去山东，去东北等等；（四）因日夜行军太疲倦，士兵（甚至连、营干部也提不起精神来）连搜索也不愿去了。

到了信北，刚与地方取得联络（但未与主要负责人王老五取得联络），而黄飞在这场战役中负伤，留在当地医治。队伍留在这地区几天，因敌人始终追击来，虽敌人兵力不强（约三百余人），但我们因

消耗了几千发子弹无法补充，又找不着王老五，群众因敌人紧紧的追随着来，害怕得很，不敢起来，而队伍又太疲倦，大多数部队对高山又害怕（他们完全没有过这样高山的作战经验），无法给敌人一个较大的打击，迫得又向云浮飞地进发。到了飞地敌人又赶来，我们把部队分成两股，由我带二营迂迴到信北，坚持及发动游击战争。欧、丁、涂、陈等则带一、三营挺到中区。后因他们挺去后，敌人则回师阻击我们这一股，使我们无法迂迴到信北。在飞地停留几天，打下几个圩，缴了一些枪，发散了两个乡仓谷左右，与两阳总队的西山大队（陈亮明任大队长，梁昌东任政委），会合后，敌人即集中千多人来合围飞地（包括三区陈文的省保安团，茂信的县警及可能由南路赶来的省保安团），于是我们与西山大队开始突围，第一天向西北迂迴突向信宜方向而去，与敌遭遇两次，当夜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先突到三罗，看情况再决定到中区，还是回信宜或者与三罗部队配合开展那地区，因在那时候突围，信宜敌人一定追击，那处基础薄弱，恐被敌人拖垮。我们又从陈亮明处得知欧初同志亦叫我们到中区与他会合，那里条件较好，我们连日行军，过飞地经罗定到云浮本境，欲与三罗部会合，恰巧敌人三路围攻三罗部，我们恰当其两路主力约五百余人，大部份是三区的省警。战斗由上午十时左右发生，打到天黑才撤退，据后来三罗同志称是役伤毙敌四十余人，我们因敌集中千余扫荡这区（扫荡飞地的K军因发现我们突出，即回师追击），又无法与三罗部会合，迫得连夜行军，准备突到中区。次日又接二连三的为敌阻击，又在石岗（云浮地）与敌县警三个中队及联防队三百多人激战数小时，而敌追击部队百余又赶到，而我们利用天将黄昏及地形向敌猛攻，结果敌死伤四五十人，大队长亦负伤，而我只伤一队员。我们在天黑后又连夜行军，企图在天未明前渡过莫阳江，但因路难行，同志数日夜不停行军，没有得到休息，甚至饭也没得吃，吃也吃不饱，因此行了一夜只行得得十多里。天亮后离河还有三里，当时情况是很严重的，因渡河地点离作战的地点不过八里，离春湾（阳春的一个大圩，经常有一个至两个县警驻防的），离合水圩不过十二里（也是阳春的大圩，经常也有县警驻防）。当我们到达河边时，敌人六七十人在河边伏击我

们，当我们还击后即向沿河撤退，找寻渡河地点，而昨天战斗的敌人又分三路向我包围，渐渐进迫，形势很严重。我们要被迫作背水战，队伍又饿又疲倦（在机枪声未响前已有三十多个队员不愿行而坐在路旁睡觉了，战斗发生后才跟回队伍）。后来我了解情况得知敌人在我们那一边岸伏击我们，就马上决定渡河，用一个连做后卫，二小时后，我们已全部渡河了。除了西山队有一个伙夫失联络之外，其余连昨天受伤的同志也安全撤退过河，并无一个人受伤，把敌人抛在后面。上午十一时，我们就与两阳总队的曹广大队取得联络了，结束了个多月的长征，全营安抵春北。与一、三营分手半月，一连打了大小十余仗，伤毙敌人八十余人，我只负伤二人。

到达春、恩边境后，因全军的脚都肿烂，一方面休息，一方面整顿队伍，召开干部会议，这样过了七天，又接到吴（有恒）、欧（初）的来信，叫配合当地部队开展地区，打击敌人。于是又转到春江边境来，打击进占盘龙（阳春地）的两个县警中队之后（是役敌死伤七八名，内死了班、排长各一），又转向阳江的大八圩来（阳江第一大圩），开展附近地区，打击反动武装。这时，一方面粮食困难，另一方面春江边境杨非同志领导下的武装大多数是土匪收编的，又无干部协助去改造他们，以致损害到中农甚至贫农的利益，当地民众甚反感。这时，二营因疲倦过度，病人甚多，发展得很利害，每天都要寄十多个病人，最多的一天寄了二十三个人，几天之间病了六七十人，而且病势继续发展下去，迫得把队伍拉回青湾（恩平地）休息，与吴、欧会合。他们决定由东征队的三个主力连组成一个主力团，以我为团长，吴杰人为政委。这时因敌人已调了两个保安团来扫荡了（十一团及九二八二部队之一团），队伍过大，容易为敌人发现追击，同时山区粮缺乏，有钱也没有得买。于是就决定分散活动，我带山东连（约九十余人）与郑锦波同志突到恩平的江南区，想与台南部队会合。经了三日夜的行军才得与江南队会合，又因敌人正扫荡江南区与台南区，台南部队已分散活动，队伍又无法到台南，又突围江北（即恩平的三、四区），在三区休息三天，转四区。这时队伍大部份病了，我与郑同志也病了，又休整几天。五月十三晚攻沙湖圩（我因病没去）不成，十五日不战

而攻入有反动武装三十人的南坑，缴了十多支长短枪，但因执行政策过左把该村之县参议及一个千余租的大地主的财产没收了，谷分了。本来这村过去有几个人参加部队的，交站曾在此设立，后为这两人（县参议及大地主）所收买，逃跑回去参加国民党军队。同时该村组织三十个自卫队，经我们警告后，这几个人已回家不当国民党兵了，村里的自卫队日间集中，夜间分散回家住。自卫队长又向我们保证不反动，我们军队开入去不开枪，这村其实我们还可以争取的，自从没收了这两人的财产，三天后该村即建立六十多人的武装，买了三挺轻机（县参议和大地主买的）。过了几天，四区的武工组又杀了一个自卫大队长的助手，这大队长过去与我们有联络，曾供给情报给我们，答应将沙湖圩所收得的税分一半给我们，曾交过百元港币，以后因敌人扫荡而终止。以后的行动较为反动，原因是看不见我们的力量，本来是可以继续争取的，他是吴同志的同房兄弟，他当大队长也得吴同志同意的，他与我们联络是靠他的助手，而我们把他的助手杀死，他很害怕，怕我们也杀他。杀了他的助手后，次日我们就在那里与敌省警二百余人打了半天，敌死伤三十余，我伤连、排长各一，队员二，死一班长。以后我就分配落地方，主力团的各连也全部分落地方。开了几天会议，会后敌人就来扫荡，而我又病了，在三区掩蔽了成二十天，病好了就出来。这时决定实行减租减息，布告及办法已公布了，但因各区干部弱而且少得可怜，县一级干部只得两人，我又病了，吴枫同志（团政委）只带部队，以致各区工作无法展开。有些地区因敌人分兵抢粮，害怕得全部撤退，所以能够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会的只有一个区。

目前最严重的事情是病员太多，又无人关照，这些病人大多数病了两个月，身体很弱，病好了又病，特别严重的是两阳的青湾区，经常有几十至一百的病人。山区经济粮食都很缺乏，当地武工组的成份是复杂的，平时的工作是只顾找枪找钱，对于病人是不大理会，使各病人连粥也吃不饱，甚至只有自己去找野菜来吃，营级干部见了我们也只流泪说不出话来，同志们经常说不回南路，一定饿死在中区（这指病同志），这种现象不及时处置，发展下去是很可怕的。现吴、欧

等同志已知此情形，我在出来前几天才知得较详细，因交通很不健全，消息很难知道。

总结：

第一时期——东征前

(一) 军事上是退守、消极的分散活动，对K的重点扫荡存在着严重的害怕心理，单纯的想东征队提早出发，可以吸引敌人的兵力，不想主动的向敌人薄弱的环，集中相当兵力打击之。其实这时敌人自向化作重点扫荡获得一些成绩后，就猖狂起来，没有以前的谨慎，三、四十人就出来扫荡，而且经常很有规律地经过我们的老地区，如果我们加强一下侦察，集中一些兵力便可以给敌人一些较大的打击，由左的作风转向过右。过去无论什么敌人也打，不论强弱，不论大小，不论有准备与无准备，简直逢仗必打。到那时则消极的避免作战，使敌能从容部署向我进攻。侥幸敌人兵力在我未东征前已抽调一些去了，无法再向廉、遂作大规模的重点进攻，只把兵力经常调动虚张声势，我们才不致受较大的损失。

(二) 政治斗争与及群众斗争也随着军事上的退守而消极，甚至停顿。这时同志单顿顾着分散掩蔽，对K害怕，群众因我们这样，就更加害怕，老地区也怕我们的军队及工作同志去住，田间有一两个人走得快一点，也害怕得全村走起来。我们在这时不单没有去教育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进行反扫荡斗争，且与群众脱离起来，政治工作也陷于停纯状态，部队里的生活也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也没有，甚至东征虽然准备了成两个月，但事事都等到出发前才去搞。如弹药的补充、武器的调动、筹备经费等等，以致到了出发无法搞得到的，队伍事前又没有作政治动员，干部又没有具体决定。总之事事差不多都临时决定。

第二时期——东征时期

(一) 军事上坚决执行迅速挺进到达目的地，沿途避免作消耗战，这是正确的，而且掌握相当紧，弱点在于有些毫不费力就可以打下的据点不去打，可以消灭敌人的仗不打，指挥不统一，遭遇敌人对于战与不战有时还犹疑不决。后来分二路进军后，二营单由我指挥，要打

就坚决的打，要退就坚决的迅速撤退。所以干部与士兵提高了作战信心，能在云浮的云容之役及阳春石冈之役打得敌人丧胆，敌人两役死伤共七十多人，大队长也负伤，而我在两战只伤两人。

(二) 政策的执行还有些过左，过早打击敌人，过早收缴民枪（而且是强制收缴的），如在信宜的北永没收了民社党在信的特务头子底家产，缴了当地一些枪，这个民社党的特务头子虽坏，但地方人不知，对我们又不了解，见我们一到就没收他的财产，还缴了地方一些枪，所以很反感。当地民风很强，很团结，枪很多，我们缴得的枪不及百分一。如他们起来反对我们成立民团以后，我们就很困难在那里活动了。他们那里的地形又很好，由于我们到处缴枪以致有枪的闻风而逃，不敢接近我们。

(三) 由于进军时队内的政治工作及党的组织生活全部停止，以致纪律一天坏过一天，干部队员不了解行动的意义，失去信心，犯了纪律，营、连长不敢去处分也不来报告，有些政治鼓动又不结合实际，使同志反感，对上级失去信仰。

第三时期：

(一) 山区的粮食缺乏，部队被迫分散推出平原，一般的只是推出平原游食，而没有计划的开展新地区，只是游到那里食到那里，甚少做群众工作。大多数的战斗是被迫作战的，是敌人来袭才打，又是打硬仗打消耗战。有些战斗虽然是自己主力去打人，但往往由于准备不充分，侦察不详细，作战部署不周密，又会变成打硬仗（或攻坚）、打消耗战，收获甚少。

(二) 执行政策也是过左，大搞冲昏了头脑，过早打击敌人，扩大了打击面，如没收南坑县参议及大地主的财产，杀死沙湖圩自卫大队的助手等等。还有如缴枪收粮，损害到中农甚至贫农的利益，有些地方一个中农被收粮五、六次之多。这由于干部少，许多地方只由一些新入队的武工组乱搞，过去的作风多数只接近地富阶级，在上层打圈子，不做群众工作，在大搞前准备工作做得很少。

(三) 群众工作做得很差，北撤后干部一贯的作风是不注意做群众工作，有个别同志在一条村住了成年，只组织得几个人，在该村什

么也没有做，只是饮饮食食，连群众也觉得奇怪。在恩平几个区当中，直到现在只有一个区成立了十多个农会，有些成绩之外（能够进行减租减息），其余的有些只建立一两个农会，有些简直一些也没有，至于减租减息工作就简直没有做过。

（四）组织工作很薄弱，最近才把地方与武装统一起来，但地方党弱得可怜，有些地方还未接收，有些地方斗争发动起来，地党很多害怕，逃跑到广州或香港来，军队的党最近才建立起来，也弱得很，恩平的几个主力连当中每连至多十余个，少则几个，山东连本来有二十多个，因有些受伤或牺牲，有些干部补抽调出来，有些病了。

附注：

（一）在几年的武装斗争很少执笔，所以写得很凌乱，在开始写之时，本来准备先起草，但因没有时间来得及修改及抄正。

（二）在这半年当中，除了因调动及生病而离开工作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在东征过程中，故所得的材料很少。所以这总结很容易会有偏向，同时无法写得详细、完整，只可以说得是凭我个人所知道的一些作一个简单的报告吧了。

（三）关于总结的第二项——各项统计，因我与丁、李两同志综合起来，由丁同志执笔，所以这里不另再写了。

黄 海

（48年7月）

丁△关于东挺作战情况谈话材料

(1948年7月)

一、东挺情形

1. 部队组成：化州二个连，廉江三个连，遂溪二个连，茂电信共一个连和山东连一个连，合七百五十人，编为三个营，第一营260人，第二营240人，第三营150人，附轻机十二挺，重机一挺。

2. 领导机构：团长黄辉（负责指挥作战）。另设团长二：黄海（负责全队的警戒，布置防地，联络等）；陶△△负责全队的给养卫生等；陈负责政治部主任；丁英负责政委；全军由欧初率领。

3. 挺进情形：旧历二月初，由廉东南出发，中途发生遭遇战，我方因当时指挥不统一，各营营长动作不能协同，十分混乱，情况亦不明，且此时廉江地方的方针决定分散掩蔽，东进队则决定大搞，步调不齐……等原因，于是全军决定回师，经数天的整理，了解情况，并请黄辉负责军事上的主要责任，参加东进后，继续出发，取道化北转向茂、信边进发，斯时从化北的石角开来二百多敌人追击我方，发生激战，我六个连役入战斗，互无损失，我则消耗弹药千余发。到信宜边，我第三营营长不执行命令，在大山下的小村煮饭食，被尾追的敌人袭击，恶战半天，虽阻击了敌人，唯我方黄辉团长受轻伤，战士受伤者亦达七、八人。进入云开山境后，干部队员情绪低落，无信心，经济困难，粮食不断，情况不明，无地方同志配合，因此决定分为两股：欧初、黄辉、陈及丁等一路，率五百人继续东挺；黄海率二百余人留茂、电、信县区活动，分散敌的目标。

(1) 欧、黄、丁等一路到达阳春境合水圩时，知该处刚集结伪自卫队百人防守，我军因执行“极力避免战斗，保全元气，以达成东

挺任务”的方针，对要不要围歼灭合水的伪自卫队呢？曾有所犹豫，后决派一排人入圩驱走伪队。当我方的一排人到达圩市时，敌已退过对河。虽该圩颇大，少数人实不易完全控制，天明前敌又潜渡河据守炮楼，企图等援军到方即将我方消灭。天明后我方大队到达该圩，出乎敌方意料之外，于是被迫作战，敌凭炮楼顽抗，我方也被迫作强攻，伪阳春县保警也赶来了，我方虽将敌赶退，但自己也无心恋战，退出合水。此战我方五人受伤，与吴、谢叔等会面后，欧、吴、谢等决拟打一次大仗，攻入恩平县城以壮声威。但须了解情况，若大的队伍于是拖来拖去，以等候机会。有一天拟进入萌底（恩平的老区），路经低林时，队伍摸入周汉玲匪部营地，发觉后，又犹豫不决，被敌占有利高地，威胁了两个连，进退不得，全队大乱，吴、谢、欧诸兄均极狼狈。结束战斗，我失踪二人，伤四个人，失轻机一挺，步枪十余，行李、物资损失大半，经此战后，士气更低。此时病员日渐增加，团、营、连级都病倒了，战士病倒的及伤的达三分之一以上，最多的一天寄留在民村休息的达二十人以上。营、连级干部见到负责人也流泪起来，哭着要回南路去，也发生了逃跑的事情。战士们说：“留此也死，逃跑也是死，但逃跑还侥幸可得生。”由于粮食更加困难，敌人的追击也紧，适黄海率领的一路也得吴的通知赶到中区，于是即分散活动。

(2) 黄海率领的一路二百余人，初拟转回茂、电、信坚持，惟据传敌自我军东进后正拟组织兵力穷追，且回去活动亦有困难，干部们决定在三罗一带活动。在飞地休息数天，伪县警及反动地武共千人包围飞地，仅小接触，后我方转入云开大山，敌又分三路围攻，伪三区专署陈文匪部五百人为主力，配合乡保地反武在千人以上。附炮二门，掷弹筒甚多。在三罗边作战竟日，击溃敌的一路，据民众说敌死伤四十多人。此次战斗，我方士气颇高，民众至另别眼相看。为了跳出敌的包围圈，在阳春北松柏圩附近强渡小河，击退在河旁伏击之敌地反武装及尾追的敌军。旋与我地方队马平同志汇合，留春北活动，并推向平原，围攻过二个地反中队，毙伤匪分队长以下数人。以后接吴同志命令，进入恩平与欧等汇合。

4. 部队的情绪与军纪、群纪情形：

第一次出发时只带得二亿元，新回后再挺出时仅得一亿半，很快钱用完了，粮食供养一天天的困难，有几天每天吃二顿粥，有时一天只得一顿粥吃。进入山地后，困难更多，军纪与群众纪律愈加坏了。当到达化北，第三营分配到一个小村住宿时，该村民众相率逃避，因仓惶过度，有一个妇人误将小孩子的尿片布浸在水缸内，队员取水煮饭，发现水中有尿，我第三营营长竟误会认为村人有意毒害他们，于是将留在村里的乡民绑起来，民众吓得恐慌异常，后经上级排解，才将村民释放。我队人员沿途采摘还未成熟的包粟及芋种，到达村乡时，又往往将村民的粥抢吃干净。在信宜境内病伤的人，战士因太疲劳且需作战，不能兼顾，战士又多不愿抬病床，只好请乡民帮抬，但无论出多少钱，民众也不愿帮忙，最后只好强迫了。可是例子一开，以后就变成惯例了。绑、打、喝、呼尤甚于K。因此，小村民众闻风而逃，大村民众枕戈以待，自己所遭的困难亦愈多。到中区后病员大增，无法处理，只好强留在民村掩蔽，无药无食，靠采摘野菜及草药来吃。个别的战士因伤口溃发死去。最近冯叔、谢叔诸同志已注意此事，着手布置医站及交通站，并发给病员的医药费了。

自进入山地后，因为是高山大岭，又遇雨季时节，战士一向生长在平原，看到耸入云端的山峰已两脚发酸，适[偏]又连叠发生战斗，被敌唧尾直追，有时要脱出敌的包围圈，或赶快突出危险地带，抢先渡河等原因，需连续行军二夜一昼，战士们的怨语怨言发出了，连指及干部们有些不敢解释，有些借战士的口来发泄，这样军纪就完全松弛了。例如前面所述第三营营长不依行军的程序，不顾全局，擅自休息煮饭食，至遭敌袭，在战斗中黄海命令他带全营抢高山，掩护全军的侧翼，可是他爬了一个钟头的时还未来登上岭顶，反给敌人先占领致黄辉团长受伤。这种情事不断发生，带来的重机，战士不愿扛，变成了赘物。

留在民村掩蔽，现已好了的病员均不愿留在恩平，要求回南路去。

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据丁、黄二同志总结是：

(1) 挺进前，事先没有做政治动员工作，连级干部也不知到[道]为什[么]要离开老区，有些人以为到东江去，甚至有些以为到华北

去。一出老地区大门便遭受困难，于是对前途无信心了。

(2) 部队党工作一向不被重视，没有党的工作（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绝大多数战士没有受到政治的教育，也不知政策是什么。

(3) 南路队有过去大搞（其实近于乱搞）的传统，生活亦〔未〕有如此的困难与流动，特别是不惯山地作战，怕爬山岭涉溪流。

(4) 长时期疲劳、饥饿，伤病了无药物，无人照顾，无地休息，这对士气的影响为最重大。

(5) 领机组织不健全，有分歧意见，指挥上亦不统一，传达命令也不统一，欧、黄分令。

(6) 中区事前也没有准备，无交通情报组织，地方队一向无群众工作，人数固不多，活动地区亦狭，对自己的活动情况极不了解。东挺队到达后，情报、供养、交通等工作均要靠地方同志帮助，因而使地方同志们认为东挺队来了是他们的负累，活动比前困难了，因此地方队与东挺队之间有意见，各种困难又增加。

二、作战次数、战果及己方伤亡数字

1. 全军由南路出发到阳春北部止，较大的战斗十二次（只打合水圩系主支，余均被动），缴获乡级和地反武装：长枪十五支，左轮短枪三支，驳壳枪二支，子弹一千余。开乡谷仓二个，保谷仓五个，没收二个反动地主浮财，连上合计共得谷约二千五百石。毙伤敌（据民众说）九十人，我方牺牲排长战士各一、伤黄团长、排长以下共十五人，消耗子弹六千发。

2. 欧、黄、丁诸同志的一路（到两阳后至重与黄海同志汇合时）较大的作战八次（均是被动）。

缴地反武装长短枪二十支，敌死伤约十人。

我牺牲三人、伤八人，失轻机一挺，步枪九支，消耗弹药五千发。

3. 黄海的一路

(1) 与欧分兵后到春北与马平队配合时：

与省、县级匪警作战八次，敌出动总数一千四百人以上（番号重现者不算）。

与乡级及地反武装作战在十二次以上，毙伤敌约八十人，一伪大队长受伤（均据民众传说）。

缴获步枪十五支以上，驳壳枪一支，步枪弹四百多发，驳壳弹一百三十发。

(2) 到阳春与马平队配合后到再与欧、吴汇江合时。

与县级匪警及地反武装作战较大的五次（四次我主动），敌军总共一千人以上，毙敌中队长、班长各一名，另死伤敌五十名，缴获步枪五十多支，短枪十三支，驳壳三支。

两处共没收谷约二千石，但分给贫民及部队所得实际约七百石。我牺牲战士三人，伤连长、班长各一。

4. 由出发到现在全团人数仅存二分之一强，因为病员多，沿途留下掩蔽未有归队，有些病好了，也不愿归队，要求返南路去。

逃跑的有排副二，轻机手一（系党员），战士一，共四名。

三、目前情形：

冯、谢、吴、欧各同志会商后，将东进队与地方队混合编配，分散各县活动。

1. 两阳成立一个团，约二百人（内东挺队约一百二十人）政委吴杰人，团长马平，副郑毅。

2. 新兴一个团，原一百五十人，现发展到二百人，政委杨子江，团长陈带仔，团副冯△△。

3. 恩平一个团，共一百九十人（南路来的占一百三十人），另病员三十人，团长黄海（现与丁同志来港医病，并请求参加学习），政委吴枫。

4. 阳春北一个独立大队约三十多人。（地方队）

5. 恩平（江南）一个独立大队，原二十多人，现有发展。

6. 电白、阳春边一个独立大队，连东挺队约共二百人（确数仍不详）。

东挺队的干部及战士也认识到只有分兵发展才能生存，不过他们不同意把一班一班的分开，而主张以连为单位，一般说来，干部及战

士们都无信心在中区斗争，思乡病颇深，又因为与地方队不协调，近将干部互调，将南路来的干部调落地方负责，而把地方干部调入部队。可是问题又来了，南路干部不熟悉情况，无法着手，工作苦闷，地方干部又不懂带兵作战，地方性的矛盾产生，工作也难开展。

新兴方面的一团较好，有了发展，手头上存有两万多港币，经济上有把握。

恩平队工作较困难，敌人压力大，经济现不至恐慌，手上有七千多港币。

两阳队较困难，工作无开展，经济困难。

队的待遇：

恩平队 每餐十两米，另二两米作菜钱，生活费连级以下每月米贰斤，连级以上四斤。

两阳队 每餐吃米九两，一万元菜钱，无生活【费】发给。

四、敌军情况：

全中区有四个团：伪保十一、十四两个团，绥署警卫团，周汉玲的共约一个团，正积极布置对中区我队作全面扫荡。

各县实力：

伪阳春县五个中队。

伪阳江县有六个中队，每中队五十——七十人，各乡约可动员三百人。

伪恩平县保警有四个中队，每中队六十——八十人，全县有反动地武约一千人。

第一次打人大城市(湛江通讯)

(1948年8月)

金宗

南路人民武装在一年半以来，都担当着由罗卓英到宋子文所长期地使用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兵力实施所谓重点进攻的压力，并采取各种各样的惨杀、活埋、烧村、连保等酷辣手段加以摧残，然而人民武装不仅没有让他消灭，而且相反的，却日益壮大起来，并扩大了活动地区。这一次湛江之战，暴露了残暴者的懦弱，并且使人们感觉到广东战局正在旋转着一个新的角度。

张瑞贵的鼾睡

人民武装的袭击行动是七月十日下午二时开始的，但其实九日黄昏时分已经抵达赤坎市区了，只可惜国民党的反动当局还在睡梦中，一点也不知道。袭击之前，人民武装有了严密的布置，此次袭击的目标主要是赤坎市内保十总队的一个营部，但因湛江地方辽阔，交通便利，敌人除在赤坎市区几个地方驻有兵力外，距离赤坎十余里的西营也驻有相当的兵力，同时保十团团长还正在带领着队伍进行向遂溪人民武装进攻，一旦赤坎有事，也容易驰回增援，因此人民武装在对该营实施攻击之前，不能不派出兵力分送牵制袭扰，使其没法增援。故当攻击开始的时候，人民武装已象撒下了天罗地网，叫敌人动弹不得。在不足半个钟头之内，就迅速解决了营部，歼灭了全部的敌人。

该营营部的驻地是靠近海边的一座煤厂，共有两个连的兵力（另一个连不久之前才调到西营去），附近数十码的地方还有一个自卫队的队部，人民武装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该营的两个连，故对自卫队及其

他警察所机关除派少数队伍加以监视制压外，未发动攻击行动。当人民武装的前锋队伍接近该营部的门口时，尚有二十码的距离，敌军的两名哨兵已经发觉，并即开枪企图把人民武装吓退。但人民武装以机警敏捷的行动还击，马上将该两名哨兵击毙，那时营房里面的敌兵已被枪声惊醒，开始举起机枪向外扫射，火力炽盛。但人民战士奋不顾身，跳跃冲前，一下冲进营房门口，随即投掷手榴弹，敌机枪手即被击毙，射击停止。其余敌兵登时像被捣的蜂巢一样，纷纷夺门而出，人民武装遂即完全占领敌人的营房。这时，营房附近的自卫队，听到枪声，知道事情不妙，纷纷起来，但在人民武装的监视之下，不能出动应援，只得由房子里面向外盲目发枪。恰巧就在那时候，营房夺门逃出的敌保警官兵，四散逃命，自卫不知底里，见人就开枪，因此敌保警官兵死于他们自己手下的，为数竟达三十余名之多，其余三十多名被人民武装生俘外，全部或当堂打死或溃败逃散，至此，敌人两个连的兵力就全部被彻底解决。后来统计被人民武装所缴获之武器，有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七挺，掷弹筒七枚，枪尾炮五支，长短枪一百七十多支，子弹一万余发，炮弹两大箩，及其他物资一大批，敌共死伤八十余名。人民武装倒只有数名轻伤，除消耗若干子弹外，可说并无损失，算是一次完全成功的袭击胜利，给了在哀怨叫苦中的敌人以重重的一拳。

诛巨恶、散孽钱、纵囚役

又在攻击该营营部的时候，人民武装还另派出少数人员，一部分出动去捉拿国民党特务刽子手军统驻南路专员张辅森，一部分出动去捣毁四大家族的中央、中国两银行。当抵达张辅森的住宅时，张已经听到市内枪声，穿好衣服起来在家里倾听消息，人民战士走到他的门口，立即叩门，张还不知死期已到，满以为是他的手下来报告消息或来卫护他，乃迅速开门迎迓。不料门一打开，来的不是别人，竟是他所日夕殚思竭虑想尽办法企图杀尽灭绝的人民战士，不禁大吓一惊，浑身发抖，继而想作最后之挣扎，企图顽抗并夺门逃走，人民战士被迫，只有当场把他击毙。击毙之后，检查他的房间，发现有一个叫做

秘密室，里面藏着许多罪恶的陷害人民及革命者的秘密材料，人民战士乃把它全部检拾起来带走。张辅森这个残忍嗜血、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在特务里面已有长久的历史，其一手所植的罪恶实在罄竹难数，革命志士牺牲于他的屠刀之下的也无法计算出来。去年在普宁，曾经一度险被人民战士拿获，幸得逃脱，乃调往南路继续其万恶罪行。此次终被击毙，凡知道这个刽子手的罪恶者，无不附掌称快，纷纷议论：“这一下可把阎罗王的簿子收去了。”

另一部份就是出动去捣毁中央、中国两银行的，他们一抵达时即破门进去，在中央银行搜出好几亿元法币，人民战士统统把它散发给穷苦民众；在中国银行则搜获几万元港币和若干法币，除港币外，所有也都分发给群众。

和市内的袭击同时，人民战士知道在赤坎郊外一个地方，有新兵三四百人，都是国民党强征强抓来的，很快就要送到前方去当炮灰。人民武装为解放这一批无辜待罪的羔羊，也派出一部队伍，包围该壮丁集中营，把守卫人员加以缴械，并把所有壮丁全部释放，几分钟之内几百名壮丁就都逃得无影无踪，使国民党费尽几许心血然后才抓到的一把赌注，尽付东流。这也是给国民党的一个不小的打击，如果按照最低价每名壮丁值三百元港币来计算，那么单单这一注的损失，国民党就要失去十万元港币以上了。

爱百姓、民武扬名

人民武装在赤坎市内停留的时间，前后共达九个钟头。开始攻击的时候是上午〔凌晨〕两点钟，因为当时正深夜，市民在熟睡中蓦然听到枪响，自然不免受到一点震惊，但枪声很快就停止，人民武装在解决了敌人之后，马上分派队伍出动维持秩序，防止歹徒及国民党的散兵乘机抢劫捣敌。故天亮之后，市内秩序就已逐渐回复，虽然个别地区仍有断续枪声，但市民已开始来往了。市民对于这次人民武装在市内的纪律与行动，一般上印象都很好，其中有一段小小的故事，特别为市民于事后所津津乐道并传布得很广的，就是：有一个烟店的老板，当人民武装还在市内的时候，他就已开门营业，有一个战士拿了

现钞很有礼貌地向他买烟，当时这位烟店的年近七旬的老板，态度很好，觉得与国民党的军队显然不同，很受感动，当把烟递给战士之后，坚持不肯要钱，口口声声要送给他，认为一包烟值不了什么钱，作为慰劳你好了等语，可是这位战士以他不要钱，也坚持不要他的烟，双方相持好久，都没有解决，终之，这位战士送还他的烟，拿着钱走了。当这位战士走了之后，老板忽然难过起来，想了一想：也许是这位战士觉得不好意思吧，我再拿去送给他，他一定会收下来的，于是又拿着那包烟追出去，大声叫喊那位战士回去，战士站住，他快步走上前去，把烟塞在那位战士的手上，并说：“我是真心要送给你的，不要紧，不值什么钱，你拿去吸好了。”那位战士听到他这样说，心里也难过起来，但想想人民战士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白吃人民的的东西不给钱，于是忽然严肃地对这位老板说：“你不要钱我也不要，这是我们部队的纪律，我不能违反。”这时老板已把烟塞在他的手上，他只得又把钱掏出来递给老板，老板依然坚持不要，把钱推事推去，这位战士无法，迫得把钱丢在地上，一溜烟似地飞跑了，老板眼巴巴望着他走远了，才把钱拾起来回去。这一件事当时有人看见，事后把它传开来，不少湛江市民都拿来作谈论人民武装的资料。

这只是此次事件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关于此次人民武装在湛江的行动，都留给湛江市民的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武装的纪律严明，与对人民的和蔼态度，和除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武装、特务及捣毁四大家族的银行以外，对于一般商户和市民，绝无任何的骚扰和妨害，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而且在军事行动一停止之后，立即注意到维持治安与秩序，这一点使许多人对于今后人民武装的行动，就完全放心了，国民党对于人民武装的诬蔑宣传，就在这一次行动中完全给轰毁了。

树立了城市纪律

此次人民武装的行动，主要在消灭敌人这一营孤军，予敌人以准备最近即将开始集中大股兵力进行扫荡南路解放区的企图，以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故除结集全力去围歼该营以外，对其他据点的敌人只取监视牵制，未予歼灭行动。同时，又因攻入大城市的行动，在南

方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南方的城市人民都还没有这个经验，恐怕战事波及的范围太大，影响市民不安与损失，故人民武装在行动之前，尽量地把作战的计划及范围缩小，力求迅速结束战斗，不然，这次行动的收获将会更加巨大的。

但是仅就事后的战果来说，也不算小。可以说，此次行动基本上是成功的，这不仅限于军事方面，由于南路人民战士的这一英勇行动，将影响于其他各地的人民队伍今后将更加大胆的向着敌人的一切弱点发动进攻，而且在政治上的影响，尤为巨大，他将给一切人民队伍，作出一个城市纪律的模范，使一切人民队伍今后在进攻与袭击城市的行动中，以这个模范做基础，更好的掌握与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他一切人民军队所应执行的城市政策与城市纪律。而南方人民在此次行动中也得到了明白的认识，人民军队所颁布的保护工商业政策以及其他一切城市政策，不只口说，而且实做。做得不够的地方，还愿意接受人民的批评，不断改进。关于这一点，大概今天再没有什么人可以再怀疑了。

(原载《正报》第100期，1948年8月1日)

罗涛涇关于南路东征部队工作总结

——东征部队的组织、四个月来的斗争经过及战绩*

(1948年8月3日)

甲、四个月来的斗争经过（由旧历二月底从南路出发至六月底）

一、东征部队的组成及其内部情况：

当敌人重点进攻化州、吴川和整个化、廉、遂的经济和粮食遭受困难的时候（去年旧历十二月底），就接到分局叫把部分的主力赶到茂、电、信去的指示。当时全体干部都一致热烈拥护这个指示，同时也想能尽快执[行]这个指示则愈好。惟因经济及弹药的关系才拖到二月底才执行，原来东进这部队的组成，最初完全是依照分局的指示以化州及遂溪的主力来组成的。后黄其江同志说遂溪部队向东不适宜，于是改变从化州抽二个主力连，廉江抽三个连，遂溪抽一个地方团第二团，实际是二个连及茂、电、信一个连。这八个连中，茂、电、信这个连约六十余人，战力较强，有轻重机各一挺及一个坏波兰机，士兵质素大多数是贫雇农，班、排、连级大多数都是[民]三十四年参加起义的同志，士兵同志也完全是去年春参加部队的。党员数量占全队四分之一强，但党员质素差，领导不强，在队伍没有起得作用，相反有时做坏事的是党员。其次是遂溪的第二团，共一百三十余人，轻机两挺，这团是地方团，战斗力原来不大错的，队员质素也是贫雇农占多数。士兵同志的队龄也有一年的。但这两个连主要的缺点，过去一贯是无政治工作的。士兵受教育很少，觉悟程度很低，雇佣观点很浓厚，过去该团长郑世英同志，只以一种感情及金钱来团结他们。象准

士兵同志自由返家，供给足够的烟酒，有些较为困难的干部及士兵则私自给一点钱，甚至不遵照上级的规定，而特别给士兵、干部食得好一点，穿得靓一点。遂溪部队原来较化州及其他县的部队生活是优几倍的，当时他们每日伙食四千元，生活费每日也四千元，每人有一套衣服及一对建国鞋。化州的每日伙食只一千二百元，无生活费，但经济困难起来，其他干部已不能依照规定这样支，他这团仍然要依照规〔定〕这样支。兼且该二连士兵从参加部队也从未受过苦，即从未吃过粥，每天也未曾行过五十里。由于这些原因，故该二连到中区后问题则更多了。再其次是廉江的三个连，有一个连有一百二十余人，二挺轻机，士兵质素是农民，政治教育较强，战斗力也较强，党员有二十五、六人，过去曾跟司令部做警卫连的。有一个连有八十余人，轻机一挺，连长不是党员，是一个国民党自卫队小队长出身的人物。士兵质素大多也是农民，该连原来也是廉江的主力，但是是最弱的一连，政治工作不强，党员人数很少，只得八九个人，质素也不大好，战斗经验不多，加以连长无胆量及缺乏经验。还有一个连六十余人，连长是由国民党军起义过来的。这由三个不同的单位组织成的，一部分是国民党乡公乡〔所〕起义过来的，一部分是廉南的地方兵；另一部分是廉西的地方兵，因此内部无形中成了三派。政治工作不强，加以党员人数又少。只得五六个人，质素有〔又〕不好，有一个党员在出发前曾拖枪逃跑的。再其次是化州两个连，这两连共有二百二十余人，是化州的主力连之一。党员有五十余人，队员质素有一个连则较为复杂，土匪、流氓、国民党的老兵，但这些人前、去年即加入主力，经过一年的改造，该两连战力则较强，干部也强，因过去是由三个主力连编成的。但化州被敌人扫荡，受到很大的损失，及他们退到廉、遂时，经济特别困难，吃了几个月粥、番薯及无生活费，同时弹药奇缺，每人只得十颗八颗，故情绪不好，作战情绪也不高。以上这些是当时决〔定〕抽来参加东征的队伍内部大致的〔情〕况。还有几点共同的特点：（一）弹药一般缺乏，每连平均最多是三十余颗，最少者则成十颗至几颗。（二）这些部队完全是打惯平原仗，过惯平原生活的。没有过山地生活打山地仗的经验。（三）完全是去年大搞参加队伍的，

没有深入教育、动员才入队，入队后又无经过彻底的改造和深入教育，故雇佣性一般尚浓厚。（四）特别党的工作不强，党在队伍很少起得核心作用。（五）但有一点最好的，就是全体大多数都愿意打出去，这点内中也有一部分不好的，有些是见到南路的困难，想避开这个困难的。

团级干部最初决定参加东征，只是三团的团长黄海、徐明坤，政治干部是四团的政治处主任陈沛龙和遂溪第二团团团长郑世英、政委陈△△，后来又裁决，我和黄飞参加。遂溪的第二团政委不参加。

二、东征部队的编制

东征部队由化、廉、遂三个单位组成，同时有三个团长参加这次东征。因三个团长之间又没有一个能起领导作用的，因此最初欧初同志决定把化州和廉江的部队编为一个团，遂溪二团留他成为一个团，统一指挥机关则由黄海、徐明坤、郑世英、我和陈沛龙、欧初同志等组成一个临时军事委员会之类来指挥。后郑世英决定没参加，调黄飞参加，于是又决定把整个部队编为一个团三个营，遂溪部队编一个营，廉江部队编一个营，化州和茂、电、信那一个连合编为一个营，黄飞为正团长，黄、徐为团副，我负责政委，陈沛龙负责政治处主任。

三、出发前的准备及东征过程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就我所知道的很不够，出发前的所谓准备工作，只是如何筹备经济及筹备弹药方面着眼，至于部队应如何进行政治动员，对于茂、电、信方面应如何准备，队伍到后各方面应如何准备配合，及部队到去〔后〕具体应如何做，对各方面的策略如何等等很重要的问题都无大注意到，部队只作过简单的动员：须要打出去，茂、电、信只叫他们派人来接部队及如何迎接部队，至于部队到后具体如何做，则从无讨论过，这个问题待部队出发后到廉东南走不通又返遂溪才简单讨论过。当出发之前有两种意见：东征的干部认为须搞妥经济及弹药才能出发，留守的干部认为再拖下去敌人扫荡化州而转过廉、遂来则无法挺出去。因此无钱也该出发。同时参加东征的干部认为分局的大搞方针也适应于老地区，东征部队出发后老地〔区〕也应该积极起来，放手大搞，以配合东西两面。留守老地区的干部同志大

部分则认为，新地区应该进攻，老地区则宜退守；同志参加东征的干部，认〔为〕东征的部队一定要干部要强，兵要征〔精〕，武器要好；留在老区的干部则认为应该带多一些地方队出去，一方面可以减轻老区的负担，另一方面这些地方队到达新区是有作用的。由于几种不同的意见争论了许多时间，关于老区、新区的问题直到出发前一日才得到解决，因此影响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不小。

旧历二月初八部队已决定出发了，但由于事前并未集中来整编过，当临行这夜才把部队集中。因此刚行了六十里，到达廉东南，给一个连保安队及一些自卫队追击我们，搞得队伍非常乱，觉得这样的队伍非整理一下无法出发，于是把队伍暂时拖返廉南整理一两天才再出发。到达廉南后接到一个情报，说有一个保安团已开到茂名去，但又不见茂名的负责同志的来信。事实在未出发之前，茂、电、信我们的工作如何？有多少地区？有多少武装？可以动员多少武装？党的基础如何？队伍到达到何处先？到何处联络茂、电、信的地方同志？均未有知道，只是到达某某区便可找到人了。至于那一据点可以拔，那一反动的地主武装可以缴，则更不清楚。

退返南廉整训了几天，一亿五千万已用完了，不能不又要另筹一笔钱。在这候钱的时间解决了过去一切不同的争论，于是于二月底才改由廉北经化北而入茂名。

在未出发之前我们曾讨论过，在未到达茂、电、信找着茂、电、信负责同志之前原则上是避免战斗的，到达之后如何做呢？当时也作原则上的决定，到达目的地之后，了解清楚情况，集中队伍先打几个大的据点，先来个下马威，扩大政治影响，然后分散扫荡一切反动的地主武装，广泛发展队伍。即是首先以军事为主，其次是建立各县的政权、乡政权，但机构不宜过大。发动民众减租减息，对地主武装及民众武装决定一律收缴，不过收缴地主和农民武装有分别，对地主武装采取收缴办法，对农民武装则采取借用办法。对于五百租以上的大地主，一律破其谷仓分给贫民，五百租以下的地主如是反动分子、恶霸或群众最愤恨者也没收其浮财分给贫民。

由遂溪出发经九天才到茂北一个联络站，中间只因搞粮食和广西

的保安队及化州自卫队打过二仗较大的仗，到达茂北的交通站找不着茂、电、信的负责同志，于是决定把队伍开到信宜东北部找他们。到达信宜北部五天时间，又因食饭问题不能遵照时间行动，被迫又打了三仗较大的仗。队伍内部在这十多天日行夜行，无饭食，天天要打仗，兼且最主要的是出发前队内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而完全停止了，同时这次东征究竟到达那一个地区呢？不单止士兵没有明白，连营级干部也不明白，因此问题就发生了，士兵闹不照顾士兵同志的辛苦，天天拖着走，连饭也无得食；说上级无胆量，敌人没有一百人，我们就飞着跑；同时又说团部指挥不好，有事情有时连守兵都不收就拉队伍走了；又说团长时时都没有一个营打后卫，给敌人时时打，临撤退时无掩护退却；又说上级官僚，官到村就可以叫小兵找米汤饮，士兵如入村取米汤饮则骂。群众纪律到达茂西时差不多完全没有了，沿路挖群众的番薯，入村把群众的米汤饮光不足算，有时连群众的宴粥也完全食光，都不给一个钱就走了。干部看了这种情形，有些则同士兵同志作批评，但给士兵回答几句：整日无得食，又要行成百里，真是叫我们死吗？这些干部就无法再解释了。有些干部对此种严重的情形，简直是作旁观态度或同情，原来当此种现象发生之后及时加强党的工作及政治工作，也可以防止继续发展的。但我这时也作一旁观及想等待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才来同他们作斗争。至于到达信宜东北又找不到茂、电、信的负责同志，不能了解全面的情况和确定全面的工作，敌人又集中两个自卫中队紧紧地追着我们，也不能找到半天时间来休息，士兵同志最初也大[都]以为到信宜是到目的地了。一定可以见到我们的队伍。殊不知到达只见到几个地方同志，没有见一个队伍，天天也要给敌人追，日日仍然要跑路，又是大山大岭，于是内部问题更多了，逃兵就开始发现了。遂溪的部队在这时二日逃了四人，当时主要还注意如何在茂、电、信来展开我们的工作，对内部的政治工作一样被忽视。

在未找着茂、电、信的负责同志及未了解整个茂、电、信的情况下，如何活动及展开工作呢？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留一部分兵力在信宜东北帮助建立地方武装，把主力拖到云浮飞

效天，等候茂、电、信的负责同志来才作整个的决定；

意见把兵力分为两股，一股推到茂、电山地去活动，发展茂、电的武装，一股留在信宜发动信宜的武装。讨论结果，采取第一种意见。事实当时部队已相当疲倦，那怕不休息，一休息即大部分在路上睡熟了。六七百人的队伍，行军时时都拖着成十里路长，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很少能够一连完整到达的，因此不能不采取第一种的意见。同时二亿元的经费也用光，也不能不分散找食，于是留黄海同志带着一个营于信宜东北协助组织地方武装，我们则拖过云浮飞地。殊不知到云浮飞地即接到中区吴有恒同志的来信，说中区相当空虚，发展条件相当好，叫把队伍全部拉过去，因此把过云浮飞地这部分主力开过，留在信东北的一个营仍然留在那里。

抵两阳休息了三天，只在干部思想作了一次检讨，因没有粮食也[没]有办法来对士兵的整理。事实当时领导机关对经过长途远征的队伍应紧急的争取时间来休整一下，然后才行动这点上注意得不够，当然这时粮食缺乏也是一个困难问题，但也未至到完全不可克服的。当时主要的仍然坚持在南路出发前这种错误观点：集中兵力打下一二个大城市，以扩大影响之后才分散发动武装。由于这种错误观点所得的结果，由于地方的情报交通未建立起来，对大城市的情况没了解，要打大城市不能把队伍拖来拖去等候了解大城市的情况，这样队伍已经疲劳得不堪的，则更加疲劳了，士气更低了，敌人也警惕了。结果只有挨打，但我们疲劳，士气低，没法同敌人打，只有拖着跑。最后大城市打不成，自己则反被挨打了，群众情绪也低了，士兵和干部情绪则更低了，病员则像瘟疫一样快发展起来，最后拖到詹团等来尾追我们，方分散。同时到达中区时，大家除想来一个下马威之外，还忙于建立一个完整机构，忽略了南路部队到来这个时候，反动派正在惊惶失措，民众情绪空前高涨，敌人空虚这个时候，迅速争取时间休整队伍，分散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发动群众组织，打下我们的基础。当时能这样做，我们今天的困难会减少许多的，武装力量也一定会扩大许多的。因当时整个中区两阳纵横二百里的山地只有三个小据点，两个是几个人至十余人，另一个是数十人。各县的自卫队紧缩在一二个

大城市惊惶失措，地方干部和民众情绪空前高涨，地主武装未有一个组织起来。这些情况对我们的发展的确是空前有利的。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南路的干部和地方干部未能了解及掌握分局的大搞方针与政策和策略，除上述的想集中打大城市之外还犯着普「遍」的单纯军事观点，在五月中旬（旧历）以前大家的目光都注视在发展武装方面。布置工作、检查工作都集中在这点，平时闲谈也集中在这点，已发展起来的武装，教育几乎也是这点，很少注意到如何发动群众这方面。如对群众解释我们的政策、主张，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反对蒋介石，实行减租减息等工作，就我所知道见到的几乎没有就「做」过，一切都想用军事解决。如阳江的大八圩，过去我们的武工队可以去饮茶的，这个地方原来可以用武工队慢慢可以把他霸下来的，但我们的地方同志和南路一个营，在完全不了解情况下，硬想把这条圩吞下来，结果吞不下反引起他们的地主武装组织起来。恩平南坑一个地主原来不极端反动，过去我们有交通站设在这条村的，后来他村里组织有三十余人，这地主自己津贴养五个兵，本来一方面是应付K，另一方面是防御性质，还可争取的，我们的队伍把这地主作为反动派打，把他的家完全抄了。结果抄后第三天该地主自己即买三挺轻「机」返来，组织六十个武装，造成一个祝家庄。还有一个也是恩平沙平一个警察局长，他上任时曾得到我允许才做得，他开赌博，愿意同我们二份平均的，已交了一百元港币来，我们的队伍不知为什么把他派来和我们联络的人杀掉，还要抄他的家，因不识屋而反抄错一华侨的家。两阳有一个地方同志竟在不够两保的地方内被他开入黑名单的有六十余名，要抄家的。阳春流一地方，凡小地主的浮财都被没收清光，相反大地主一千租以上的地主则丝毫不动。有些同志问他为什么大地主的浮财不没收呢，他说大地主的难食。对土匪、流氓则大量招收，既不同他们的土匪、流氓意识斗争，有些也不加领导，结果弄到捣国民党反动派不足，扰民破坏我党的威信有余。如阳江有一个地方同志组织有二三股土匪共数十人，完全不派人去领导他「们」，任他挂着我党的招牌勒民众，搞得民众叫苦连天，敢怒不敢言。最奇怪的有一个土匪来要求参军，他初则认为未了解不敢派任务给他，叫他留队

食饭，跟着他。殊不知第二他〔天〕，他该土匪即拿着一个文化教员
的短枪返去杀掉他一个仇人的母亲，又不报告，后经我的地方同志查出，
但对这件事并没处理，只用好好的态度和该土匪谈了一次话，说他
不应这样做就完了。后来土匪们说他们有胆，我的地方同志即要他
为一个土匪中队的中队副。对搞粮食有些地方同志并没有派干部去
搞，只叫一二个流氓替他们搞，这些流氓从中取利是不待言的。他
们有时只向中农、贫农来收的事也在个别地方发生。以上这种偏向，
目前中区两阳事实已存在，但也只是一种偏向，目前还未成为一种
左倾路线，而且目前已有许多被纠正过来。

队伍已在旧历五月中旬分散活动了，其分布是这样：两阳两个连，
春南、电白边境一个连，恩平两个连，新兴一个连，团级干部也完全
调出到各地方去；黄海调到恩平，负责以南路两个连为主组织一个
第五团团长。徐明坤调去开平，指挥开平的军事。陈沛龙调新兴，
仍然负责政治处主任。我则调两阳，最先负责两阳副特派员，现
特派员取消，建立两阳中心县委，我负责副书记。目前两阳也组织
一个第六团，马平任团长，吴子仁任政委，郑毅为团副。恩平则是
第五团，黄海为团长，吴枫为政委。新兴也成一个团，团长为带仔
（原姓名不清楚），政委杨子江，政治处主任陈沛龙。我们到中
区后约半个月，两阳本身已发展有四五百人，现在连南路这两个
连最多不过五百人，恩平连南路两个连也是二百余人，新兴在分
散后他们有发展，人数不详。

目前南路部队经分散之后，一般较为安定一些，但由于病的关
系，各连均减少一半以上，有些减少三分二也有。目前仍然无政
治工作，无党的工作，群众纪律虽然较集中游击时那种买东西〔不〕
给钱、随地拉夫抬病员、打骂群众、随便拿群众的帽、衣服等等好
了一些，但经济困难，他们许多无帽、无鞋、无蓑衣、无熟烟食，
不能得他们解决，故目前群众纪律也未能搞得很好。特别是地方
基础未建立起来，百余个病员无人照顾，无饭食，无菜吃，无情况。
特〔别〕在初期，将近二百病员散在四五县，有时几天连粥也不
得食，要病员自己上山拔野菜来充饥。春北有三十个病人成个月
无人理，总算有得食也是三个人九两米一餐。由于这个缘故，加
以队伍无政治工作无党的工作，

局面打不开，相反地区也部分缩小，又要爬大山。因此队伍的情绪目前非常低，连级干部也无信心，私〔思〕乡情绪非常浓厚，这是队伍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我们到达中区大约不过十多天，周汉龄的三百余保警就开到恩平来，这时他仍然以守为主，不见什么国防军詹团，即开到恩平来，这时我仍然集中，他们也集中来追我们，及采取分路出击的办法来扫荡，后来我们分散了，九二八部队和詹团即拖走了。继着保十一即来扫荡，仍然以恩平为主。扫荡方法则是分区扫荡。由于我们的分散活动，他们也没有效果。当我离开之前十余天，上〔面〕又调广东绥靖处的警卫团到恩平、两阳。计目前中区两阳及三罗所知道的保安队：有保十一团警卫团、十四团及周汉龄的一个大队，六邑“剿匪司令部”的什么搜索大队和宋子文收编中山的土匪大队，大约属于省一级的保警最低限度有四个团。又传高鹤方面广西曾有两个团到来，这是未证实的消息，据队〔点〕未出来敌人的动态来看，敌人这次中心好似是想对我们控制的山地进行全面的抢粮，以及实行碉堡政策，这个已在阳江、阳春边境山地实行了，恩平则中心只是抢粮，建立碉堡则未见实现。由于湛江及沙鱼涌的影响，敌人这次企图又会失败的。因我出到开平时，K的报纸已登载保十一已决他调。

四、目前的群众斗争

恩平、两阳的群众对我们有认识的，知道我们是比国民党好，国民党反动派不被打垮他们无生路，这点认识是有的。但由于我们坚持中区两阳工作的同志没有做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动他们斗争的工作，同时我们队伍到来时初期也没有注意这件工作，至对群众工作整个政策如何，是分粮废债或是减租减息呢，也无一个确定。初期只有一二个负责同志在闲谈里说今年六月山地一定要实行停租废债啦，于是弄到有些同志竟在某些地方发动农民组织停租废债委员会。这个问题直到五月才确定减租减息的政策，因离夏收的时间太近，过去的群众又未有组织，地方工作同志又少，在这短短的一二十天时间，一面要组织农会，一面要对群众进行宣传动员，一面又要征求群众的意见来确〔定〕减的百分数，因此搞到我出来夏收已收了百分之七八十还未搞

好这几件准备工作，而敌人的抢粮已开始了，故减租减息斗争能否在我们的山区完全实行起来也成问题。但农民的意见如何呢？就我们控制的山区，据我所得到的材料，一般说农民完全赞成的，其程度就又〔有〕分别，如恩平的清湾区农民认为能够减得成则很好，但担心国民党会来抢粮，如敌人来抢粮，希望我们能开队伍打他。阳江珠环区的农民认识也很好，特别是对减息要求更逼切，许多农民要我们快快出布告，有些则预先杀鸡请我的地方同志吃饭，他说假定你们真正能够做到，我则不会年年给财主佬逼死了。他们也一样怕K会抢粮，要求我保护。阳春流、湖文等区也是一样，只有阳春盘龙乡和阳江石梯区就有些不同，盘龙原来是老区，但敌人最近则在这里筑了二个碉堡，派有二个自卫中队在这处住，因此群众就对减租减息不特不敢，连拖租拖息也不敢。石梯区则也是接近敌人，一般农民说减什么租，今造的禾未知能否够割得起，只有快快派兵来，等我割禾就可以。对减的百分率各地也有不同，对本地方的地主一般是赞成减二五，对外来的地主，如离敌人远些的地方则要求减多些，减百分之五十、六十以至八十。一般贫雇农则要求减多些，中农则要求减少些，平原地区或红白交界地区的农民对减租减息无信心。而对拖租拖息则有信心。

五、政权工作和统战工作

当冯叔未到达之前，原来也决定建立县的政权及在山地建立乡区的政权的。当冯叔到达之后，他觉得群众工作未建立起来之前建立政权无什么好处，于是取消这个决定。关于统战工作据我所知道，自大搞方针传达之后，差不多完全停顿了，被忽视了，直至五月之后这种倾向才开始纠正，最近已显现了有一些成绩，像过去阳春的平坦和那乌曾组织有成千的壮丁队，后展开统战工作，争取广大保甲长及一些较为开明的绅士，与打击拖一些动摇中立的地主之后，这两乡的反动武装就绝大部分瓦解了，剩下一部份也来和我谈判。

六、我们的活动地区，就我所知道的，茂、电、信、三罗、两阳、恩平都比大搞之前缩小了，比南路部队来到之后成个月也缩小了，像恩平的四区朗表、信宜的东北部、三罗的云浮飞地一部分，两阳的盘龙、大八、头堡等区，过去我们是可以横行无忌的，现在有些则完全

丧失，有一些则活动困难起来了。武装数量，就我所知道的恩平和两阳五月之后也比以前减少了。两阳过去有五百余人，现在只剩三百多人，过去恩平许多地方都有地方队的，现在许多地方队也瓦解了，其主力减少了多少，我则不大清楚。

不过目前广大的山区，敌人仍然未有建立山〔起〕许多的反动武装来，纵横二百里的山地仍然是空虚的，山区以外的平原除恩平一部分已组织反动武装，阳江的地主大部分也未组织起来。阳春大部分地主也未组织武装，许多地主对反共是无信心，害怕我们的。假定我们今后能彻底纠正过去一些左的偏向，把队伍巩固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中区还是一个有很大发展条件的地方的。同时虽然今天遭受一些主观造成和客观必然产生的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主要条件是我们的本钱——主力还完全保存着。

七、总结起来说，我们这股部队能胜利地到达中区，现在还保存着是有成绩的，但距离完成分局给我们的任务：发动西江以南的广大群众及广大武装，建立西江以南的根据地，还是很远很远的。但不能迅速完成分局给我们的任务和造成今天所遭遇一些困难，我觉得有几个弱点：1. 我们不能正确掌握分局放手大搞的方针，主要是分散普遍发展。最明显的事实是如我们在遂溪时对茂、电、信的情况完全没有了解，而只凭主观愿望就确定先集中兵力打下一二个大城市，以扩大影响才分散发展。到茂、电、信显明被粉碎了，我们还不觉悟，到中区仍然重犯这一错误，以至造成不少的恶果。2. 对当前的政策我们也掌握未紧，如把打击面扩大了。有许多明天的敌人，我们今天就打了。有许〔多〕明〔明〕是朋友的，我们把他打成敌人。其次对减租减息的政策，虽然在未接到分局的六月指示已确定的，但我们为什么不是一到来即确定呢？而迟迟到五月才确定呢。事实我们有骨子里先时主观上是想实行停租废债的，后来觉得条件未成熟才修改的，这个可以说是被逼的，不是真正领会到今天在南方不能分田地，而要实行减租减息的根据和意义的。再其次如对土匪、流氓问题，我们只看到他们革命的一面，好的一面，而去争取他、团结他们，我们忽略土匪、流氓最坏的一方面，而不去领导他，去同他们坚决进行斗争，改

造他坏的一面。再其次是对统战完全被忽视。最后对杀人问题虽然不像我在化州弄得那么严重，但也未能做到杀一警百，杀是为了争取，杀真正最坏的人，杀群众绝大多数认为非杀不可的人。3. 初期犯着单纯军事打天下的观点，而忘记了要解〔放〕百姓主要是靠我们动员百姓自己起来动手，我们无百姓一天都不能生存的。我们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动群众。4. 队伍里完全取消了政治工作和党的生活，这点上我要负完全责任。我在东征这个期间工作消极的，我时时都既〔记〕着我在化所犯着自高自大、官僚主义、反对组织、左倾盲动这种严重的反党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由于这些严重的错误造成党及化州人民空前的损失，故我再次向南路地委〔请求〕准许我能够参加一个学习，否则给一个时间与我自己反省一下。同时准许我从低层〔层〕工作做起，但南路地委没有批准我这个要求。后来欧初同志要我同他东征，我答允他，但我声明我不能负什么责任。我只做向导，到达茂、电之后，他能给我一个月时间的反省，同时留我一个人到一个地区去开辟工作。他对我这个要求也不准许，反要我任东征的政委，这时我无法不接受，而我内心里事实失了信心。主要是怕自己的弱点未经过改造，而又负责这样大的任务，不是更糟。因存在这种错误思想，最后只有消极不做。5. 队伍到达中区之后，如对极力争取休整队伍注意得不够，同时照顾病员也做得不够。当然客观上有困难，但能真正照顾也不至于此的。6. 最后当然由于南路这些部队过去是用招兵买兵的方法招来的，改造工作又做得不好，觉悟认识不高，兼且未曾受过苦，不爬过山等等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我觉得这次造成一些困难及不能迅速完成分局的任务，不是大搞方针不对，相反，证明分局的“放手大搞”方针完全正确，有什么事实证明呢？如我们东进之后完全粉碎了敌人对南路的重点进攻，使到南路今天有打入湛江，震动了蒋宋皇朝，同时帮助了广东各地的发展，使到宋子文手足无措。同时对中区人民武装虽不说有很大的帮助，但或多或少也有帮助的。

乙、四个月来斗争各项的统计

一、敌情变化

1. 南路部队未到中区前之敌情：

A. 整个东区、两阳、三罗、高鹤、茂电信，属于省一级以〔上〕的匪军计有：九二八二部队（国防军）四个连，共三百余人于台山、三埠、恩城三个据点流动，及保十一团分驻在三埠、台城、苍城、恩城等候补充兵额，当时也是二三百人。

B. 县一级的匪军计：阳江有六个中队共三百余人；阳春五个中队共二百余人；恩平四个中队共二百余人；新兴三个中队一百余人；鹤山三个中队；高明三个中队；台山五个中队；开平四个中队；茂名六个中队；信宜四个中队；电白四个中队；这几县人数不详。

C. 保队和壮丁队均没有，只两阳、恩平、新兴各县有二三个联防队，人数每个只二三十人。

2. 南路部队到中区后的情况：

A. 省一级以上的匪军，则增加所谓国防军詹团共七百人左右，一区专署的林少亚（南、番、顺土匪头）一个大队，共二百余人及六邑指挥所周汉龄一个独立营共二百余人，这些匪军增来都集中于恩平、两阳、新兴。其次三罗同时也发保安第十四团及三区专署的搜索连，詹团来不久即于旧历五月中旬开走了。九二八二部队亦于六月初调走。继着宋子文即调省绥靖处的警卫团到恩平、两阳来接詹团的防，继续进行扫荡。

B. 县级的匪军无变动。

C. 乡、区级及地主武装则有许多组织起来的。现在对这些武装的数目字及其分布则不大清楚，大概所知的，恩平较其他多些，乡兵过去只几个人至十人，现在留乡都有三十人左右，四个联防队每个也增加到五十余人，地主武装已有组织起来，但人数分布不详，阳江不大清楚，阳春的乡兵也有增加，人数不详。壮丁队过去平坦、那乌、留等乡均有组织，现在平坦、那乌两乡已瓦解。

3. 南路部队未来之前，敌人只以守为主，从来未取到过我们的

山区。我们到来后，而詹团及林少亚未增加之前敌仍然是取守势，自詹团及林少亚到来之后，敌人就集中兵力逼我返山区之后，然后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来消灭我们。我们这时仍集中队伍准备想打大城市，故此到处挨打。后来我们分散了，K这次是破产了，K这次企图破产后，詹团及九二八二部队也相继调走。至警卫团到来之后，他的阴谋如何，上面我已有谈及，这里不再写。

二、战斗情况

1. 由南路至中区这段时间的战斗情况

计由南路至中区和省保安队、县、政、警共打有二十仗（与乡、保兵打不计）这些完全是他逼我们与他打的。我们死一人伤十六人，内有团长黄飞、排长二、班长二，其他都是队员同志；消耗子弹九千余发，破七个乡仓，五个保仓，共发放三千石左右以救济百姓，没收二个反动地主的浮财，缴获地主武装五十余支，敌人死伤据百姓说计有一百六十人。

2. 抵中区集中兵力时的战斗情况

A. 我们先到两个营共打了九仗，一仗是主动的，八仗是被动的，除两仗是同县警打之外，七仗是同省保警打。共消耗子弹六千余发，伤三人死三人，内有一排长，失轻机一挺，步枪十支，士兵的蓑衣差不多失光，鞋、衣服、被服也损失许多。我们缴获地主武装计手拉机二支，驳六支，左轮十余支，步枪十余支，七九弹千余发，驳弹三百发，左〔轮〕弹二百余发。敌人死伤数据百姓说顶多三十名。

B. 黄海由信宜来到这个营共打六仗，四仗是主动的，我们死二个班长、一个队员、伤一个连长、一排长、三个队员；消耗子弹四千余发，缴获反动地主武装八十余支，七九弹百余发，驳弹三百，左〔轮〕弹百余发。

分散之后的战斗情况我没有清楚，不再写。

三、地区的变动

上面我已大略谈过，这里不再重复。

四、组织情况

到达中区，组织的变动很大，现在还未有一个肯定的确定，故许多情况无法了解，不再写吧？

罗涛涇（即丁英）

八月三日

（注）一、这个报告是我个人所见所闻的，有一些材料未必一定正确，如有错误，希其他同志更正。二、这个报告是急急地赶写完来参加学习的，内中材料很不完全，事实例子不多。因急速的关于〔系〕就我所知道，还有一些材料也不〔没〕写进去。三、我这报告有何弱点，请上级给我批评。

温△△致方林信

——刘某被捕后对湛江党的影响

(1948年8月6日)①

方林：

一、已依指示派干部到丁处，派部队到越防边境接周、庄，若经防城交通站找丁，刘被捕，无影响。

二、刘叛变对湛江党影响很大，因湛江党初期是由刘搞的。据说湛江党负责干部李在中山工作时识刘，希通知小林迅速处理，我提议给李把刘识得的、暴露的党员撤退，留下少数的隐蔽的坚持，再重新建立基础。李若撤退，希留给我们分配工作，未知小林意见如何？

三、最近从海防回来的一个同志报告，说有二个同志在海防教书被捕，其中一个姓叶的，这是由周管理关系，详情未知，可能是刘叛变的结果。

四、我们和丁联系很困难，甚难调查刘被捕详情。刘被捕后，丁适在我处，已通知他派人到北海调查处理。据丁说，可能他的老婆亦被捕，派人回北海不易。

五、李莹因病转到吴川后方医院调理，当钱返湛时，我托钱带她回湛医病，她不愿，要回来工作。敌扫荡吴川时，转移到化州团部，要团政委送她回来我处工作。团政委于去月二十五日派二个保卫员及一个交通，白天送她来，途中遇敌地方兵出动，她不走被捉，现扣留廉江良洞乡公所，据查她承认当卫生员，敌颇优待。以后详情待查再告，她不愿去港，要回来，她事前并没有告诉我，被捕后才知道这事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情况。

六、吴带主力到化北打了二次被动消耗战，干部有些伤亡，被迫转回来廉南后，打了一次伏击战，缴轻机一挺，电台一座，步枪十八枝，俘虏七名，尚有轻机二挺掉在河中，在搜索中。现决定分散活动，我和吴带新一团回遂，新四团留廉、化、遂边活动，林、欧留廉主持教导连训练工作，军事活动详情下次再告。

温

八月六日

论湛江与沙鱼涌之战

(1948年8月)

星 星

湛江与沙鱼涌之战，是广东人民答复宋子文二期“绥靖”计划的序幕战。

半年以来，广东人民对宋子文的一期“绥靖”计划，已经胜利的予以彻底粉碎。

宋子文的一期“绥靖”计划，主要在于企图以重点进攻来消灭人民武装的主力。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主要放在琼崖、南路与东韩江、粤北，在战斗计划上，以突击山地找寻人民武装主力决战。

然而，半年来，宋子文在琼崖赔出了三个县长（死一俘二），两个保安总队长以及一团以上的保安总队，造成今天只能扼守几个海口及十几个孤立县城。在南路，宋军除了在化县施行极为严厉的白色恐怖以外，在遂、廉一带，也被歼达一个大队的兵力，而南路的主力更东进入中区，西征到桂属，发展了二十余县的游击战争。在韩江，人民武装既以打入蕉岭县城来粉碎宋子文的闽、粤二省联合对铜鼓嶂、八乡山、南山的进攻，又发展了闽南和潮汕十余县的平原游击战，俘虏了闽粤边“剿总”副指挥张光前及歼灭其匪军总共一个大队以上的兵力。在东江河以北至五岭，宋子文虽然赢得了把人民武力压入山地，屠杀了平原的许多群众，但当六九师一北调的时候，这些地区的主力又出现在宋子文的大动脉粤汉路的旁边了。在这些反复战斗中，宋子文也付出将近一个大队的代价。在东江南岸以至珠江三角洲、西江南北岸一带，虽然半年来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但人民武力则在迅速的填敌人的“空格”，也消灭了敌人将近二个大队的兵力。

铁的事实使一些吸血鬼不能不慌张叫嚣，使黄镇球的牛皮吹破，使宋子文不得不召集一些“破家军师”，重新来考虑他们的又将失败的战略。

二期“绥靖”的计划据说是以“肃清平原、围困山地”为中心，这是过去十年内战广东的刽子手打败人民武装力量的老方案。历史虽然有时可以重演，但这出老戏的角色，处在今天新的形势下，喜剧要演成悲剧，则是可断言的。湛江与沙鱼涌之战，就是这出喜剧演成悲剧的新序幕。

仅仅从人民武装的伟大胜利来研究湛江与沙鱼涌之战之意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下面的几个问题来研究：

第一，湛江与沙鱼涌之战，说明了广东人民武装力量在半年来，由于不断的粉碎了宋子文的“清剿”，锻炼得更为壮大与顽强，它不仅有能力在山地作战中打败敌人的进攻，它而且有能力在平原中向敌人进攻，它不仅不断胜利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它且能组织较大的战斗去歼灭敌人所谓正规军的主力。这种发展，已经是由初级的农民游击战争骚动自卫的形式，逐渐走上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形成一种革命军队正规作战的形式，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第二，湛江与沙鱼涌之战，说明了南宋小朝廷的统治力，是如何空虚与薄弱，庸碌与无能。象这样的蒋朝最后坟地的广东巨镇与要点，象这样为期将近一年的雷厉风行的吹嘘与布置的“绥靖”与“清剿”计划，由于人民武装一出击，不出三四个钟头，便都土解瓦崩，束手受俘，足见在全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之后，敌人到处都是空虚。敌人新补充的兵力的厌战，是敌人内部困难不能解决的事实。

第三，湛江与沙鱼涌之战，说明了中共的政策的正确与一致性，中共固然以反美、反蒋、反封、反官僚资本为号召，为军事上的行动指针，但在执行这个指针的时候，是有步骤和有计划的，它把打击的火力首先集中于反人民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对于其他的人们只要是停止敌对或放下武器，立即予以保护、优待。这在洛阳、开封之战是如此，在湛江、沙鱼涌之战也是如此，固不分队伍之大小，只要是接受中共领导的队伍，就能够一致的执行中共的政策，一切敌人的应声虫

的恶意武断宣传，所谓“洋共”“土共”之分，所谓“大共”“小共”之分，事实给他以彻底的粉碎。

第四，湛江与沙鱼涌之战，说明了人民武装对战争布置的周密，动作的灵活，真正的执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逢弱就打，逢空就钻，以多胜少，速战速决”的基本原则，同时，在“有准备，有把握”的状况下，也善于运用“先发制人”，争取主动的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

宋子文的二期“绥靖”计划虽然一开头就碰着这样的大钉子，但这不过只是说明宋子文的二期“绥靖”计划可以粉碎而已。未来的战斗还要更加残酷，广东人民绝不能忽视这一点。

宋子文又在大叫其八月开始就要进行“总体战”了；宋子文正在考虑：是以巩固铁路交通要道为主呢？还是发动全面的扫荡？宋子文正在加紧征兵征粮，残民以逞；宋子文正在各处捕捉小学教员、开明仕绅以至一些并不开明而只是守中立的仕绅；宋子文正在修筑公路、集中汽车、修筑机场；宋子文正在向蒋乞兵、向美乞助；宋子文正在抢割人民的粮食以及抢夺人民的沙田！……这一切，都说明宋子文在失败以后企图以更凶狂的办法来血洗广东人民。

当然广东人民有了光荣的奋斗传统，广东人民有了长久的斗争经验，广东人民目前又有了强大而不可战胜的武装，这个武装又已开始掌握了毛泽东的胜利的军事思想和中共中央的正确政策，战胜宋子文而最后求得自己的解放是一定的。

不骄不燥，更勇敢更小心，是完成今后任务的有力保证。

（原载《正报》第101期，1948年8月7日）

南路解放军半年来的总结

(1948年8月)

(一)

在半年来下三月中，三月中旬在遂安公路上我军主动地迎击敌人，当时我军即灵机神速地居立于三个较高的小山上，荫蔽着，另一小队即直引敌人深入低地。那时英勇的我军即集中火力向敌人主力袭击，那么十五分钟内即解决战斗了。歼灭了敌人连长如〔以〕下十八名，连长击毙，伤二名，俘虏三名。缴获白玉林轻机二挺，留弹炮一枝，德国步枪十八枝，短枪二枝，子弹二千余发，炮弹十余发。四月初旬我军主动的袭击遂溪洋甘圩土蒋遂溪自卫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如〔以〕下三十余名，击毙八名，伤五名，俘虏二十余人，缴获轻机二挺，步枪二十余枝，短枪二枝，子弹二千至三千发。又在七月十日上午二时袭击湛江赤坎市，歼灭保十团主力二连，缺少一个排，另加一个营部，击毙连长如〔以〕下三十余名（一个连长击毙），伤敌人二十余名左右（重伤连长一名），俘虏敌人三十余名，共歼敌人八十余名，缴获轻机七挺，重机一挺，炸弹筒七支，枪尾炮五枝，步枪一百七十余支，短枪十余支，炮弹二箩，子弹二万发左右，其他军用品很多。同时击毙特务头子张辅森（军统局派来的），俘虏土特务黑鬼生，并在四大家族的中央银行取得国币九亿元，除我战士同志当时分配数亿元给贫苦市民，藉以救灾之外，还剩下三亿元左右，在中国银行取得港币二万五千元左右，并缴特务头子和银行很多文件。以上较大的三次战斗结果，共歼灭敌人一百五十人左右，缴获轻重机十二枝，炸弹筒八枝，枪尾炮五枝，步枪二百余枝，炮弹二箩多，子弹二万五千发左右。此外还在遂、廉交界及遂南、遂溪中区等地方，也获得轻机

四枝，其他军用品也不少。

地区上的发展，我军坚决突围，进入中区、四属，发展了二十余县的新游击区，并继续在恢复巩固我们的老地区及半老地区，甚至已向着湛江的新地区扩大发展了。

人员也在复原和发展着，各老地区和半老地区的民兵并在新区开辟着，每区扩大组织和发展着一个中队和一小队的经济队为目的，尤其是在沿海各海〔岸〕线及细小的港口里，已建立了我强大的海上游击队和税站，更普遍地在可能范围内多建立了陆上大大小小的交通线上的税站起来了。

(二)

如〔以〕上说明我军这半年来，切实掌握与实事求是的执行了二月指示的正确方针“放手大搞”“到处进攻，到处发展。”并切实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思想“逢弱就打，逢空就钻，以多胜少，速战速决”的基本原则，且能运用“先发制人”争取主动的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来击破敌人这次围剿的进攻了。

第一，说明宋子文的小朝廷的统治力的薄弱空虚无能，由于我军大胆放手大搞，不断的粉碎了宋子文的所谓“肃清平原，围困山地”，“重点扫荡”，“全面扫荡”的清剿计划了，这样可见我人民解放军去年来执行大反攻后，敌人到处都是空虚的，士兵是厌战的，内部是困难不可解决的事实了。

第二，更证明了我中央政策的正确与一致，和二月的指示方针的正确与一致。我军进攻湛江这一次战斗，已是证明我军的严明的纪律与忠实执行政策，老老实实的做到“没拿群众一针一线”，所要打倒的是美帝国主义和美帝支援下的忠实走狗蒋介石和他统治下的一群反动派军队，所要没收的是四大家族的中央、中国银行的财产，所要彻底铲除的是万恶的血腥特务分子。于是就粉碎敌人的应声虫的所谓“洋共土共，大共小共”之分，和什么“土匪”之类废话了。

第三，更证明我军不但能够胜利地打击蒋介石的地方反动武装，而且也能组织较大的战斗去歼灭蒋介石的正规军的有生力量，这就是

湛江之役为证。

(三)

(1) 在半年来之上三月中，我们有一些同志还犯着死守老地区，即守死，不肯把主力向东进、西征，把游击战带去二十余县的人民，多开辟二个战场，使宋子文多上了二个大礼包，来分散敌人的主力，这是当时一些同志不肯切实深入去了解“放手大搞”，以致抬[犯]了给敌人任意歼杀我们化州等县的人民和推倒我们群众组织的重大错误。

(2) 由过去到现在我茂、电、信这三个地区，依然是死气沉沉的不敢执行“放手大搞”的方针，尽量发展和扩大组织武装起来，这是缺点之一。

(3) 南路一路来的最大缺点是我党不整，我兵不整，相当不注意到同志们的思想上教育和日常上的学习，于是使一般同志和士兵意志消沉情绪低落。故此许多同志无了解所谓阶级与政策等等，这是必然的。所以以前搞错了各种问题，这也是必然的。于是造成党内的精神不一致，意志不统一。故此全体不团结，士兵留下许多野蛮性质，不遵守纪律等等，这更是必然的现状。但近二月来已开始“整党、整军”，即可见有了好转了。

(4) 由于从前我们没有整党整军的实现之前，我们遭了许多失败，以至牺牲了不少的干部。又至于我们过去没有进行加强各方面的教育和学习，以至我党的干部各种认识和实践的水准很低落，故此各方面的干部是非常缺乏的，这也是一个缺点。

(5) 由于我们还未有一个合理的抽收和税则之前，我们经济队到处抽收和各个税站都是没有一个标准的，乱来一通，这也是个缺点之一。这是不肯深入去了解二月指示的合理负担底政策所至的。

(四)

半年来，敌人集中四个保安团的主力 and 各县的反动势力，合区或全面扫荡攻击我们，我们利用群众“空屋清野”，主力集中，分股东

西分击，分散敌人主力，反击敌人的虚弱小股歼灭之应付他。

其次敌人开始打击乡村一般中立绅士，拉拢一般的地方绅士，我们用“多拉少打”但“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来应付他的。

总之，在这半年来，我们南路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忠实执行党正确政策，击破了敌人的“围剿”进攻，克服了一切困难。因此奠定了我们以后更大的胜利。

粤桂边区党委关于反对宋匪 第二期清剿计划等问题的指示（摘要）

（1948年8月）

一、方针任务：

甲、从普遍发展中建立主力，提高战斗能力。紧密依靠群众，有配合、有策应的歼灭宋匪部份清剿部队，瓦解地方反动武装，以粉碎宋匪所谓第二期的清剿计划。

乙、从纠正过去错误的政策中，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有步骤、有计划的实施削弱封建社会的政策，改善群众生活，打下我广泛而巩固的下层基础。

丙、从推进发展中配合以有利条件的跃进，有方向的来扩大我游击区，向邻县邻省有计划、有步骤去填敌人的空格，建立边区山地的割据局面。

二、为完成上述任务，我们必须实行下面的策略政策，这些策略政策，各级组织须严格执行，不得修改。

甲、集中火力，打击反对人民、反对我军的反动头子、地方恶霸，首要特务，并消灭其武装组织，配合与中立不反对我们目前政策的地主、富农及一切可能配合与中立的社会力量。

乙、社会政策，限于实行反三征和减租减息、生产合作、救灾救荒（具体方案见行动纲领）。

丙、财政政策，应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实施，并保证财权。

三、四大具体工作：

甲、军事斗争：

1. 部队的发展和提高。

从普遍发展中组织主力，使能够进行规模较大的战斗，一部分一部分的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是粉碎宋匪二期清剿打下今后进一步改变敌我形势的基本中心环节。为此，有计划、有步骤的组织以区党委为单位的主力兵团。是当前的中心任务。

坚强的武工队，必须担负对敌作战，开辟新区发展群众，并在领导群众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的任务，但中心问题在于干部的配合与选择。

民兵的发展问题，在于形成民兵中的核心组织，注意培养其领导人，党的区级和支部需有干部参加进行。

2. 战略战术。

继续过去敢于胜利的精神，扩大发展积极进攻并坚决地粉碎宋匪第二期清剿计划，努力填敌人空格，有计划的不断战斗，把敌人压缩于少数点线，向邻省邻县邻区发展，打通邻近地区的联系，成为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

我们军事上所打击的方向是坚决消灭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反动武装，而对于不坚决反动的或敷衍的地方团队，则不是采取单纯军事消灭，而是同时注意研究政治上瓦解的办法。对反动地主武装，当他还能蒙蔽群众时，则先争取，群众能辨清楚，然后消灭之。对那些维持地方治安而不反对我的联防队、自卫队，应争取其中立，不宜作军事消灭。

在交通孔道上，或迫守的据点，而我没有条件占领时，驻守该点之武装如非坚决反动，应争取其中立及暗中助我，待我力量强大，可以完全占领该地时，再下令解散之。

坚持平原，以掩护山地之巩固，这个方针是粉碎宋匪二期清剿的中心问题，故尤须加强平原武工队活动，加强情报工作，使各地区能够合同作战，是打击敌人进攻的重要方法，要认真学会用优势兵力歼敌的方法。

3. 整军工作：

(一) 建立制度、克服游击主义。

(二) 提高阶级觉悟。

(三) 加强群众观点。

(四) 建立良好的官兵关系。

(五) 进行政策教育。

(六) 军事教育要切合实际。

4. 友军工作。

友军工作的目的，就是打乱蒋统治，便于我们去打击推翻蒋统治。

(一) 在我活动地区，原则上不支持友军活动。

(二) 在敌占区鼓励他对敌斗争，但不能助其壮大，在共同对敌斗争中以我政策去影响他们。

乙、社会政策：

1. 反三征与减租减息是南方革命斗争现阶段所采取具体的中心政策，这政策是为了配合与中立可能配合与中立的地主、富农，减少阻力，以达到顺利发动和组织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集中力量，消灭蒋宋匪帮。

2. 略（见行动纲领）。

丙、农村统一战线。

1. 目前农村中，有反蒋宋四大家族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基础，这基础包括工人、农民、学生、自由职业者、中小地主、开明仕绅、失意军官、受打击的地方势力等，其范围是异常广泛的，我们必须是根据其不同对象和要求进行。

2. 在农村统一战线中，我们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华侨家属、开明仕绅为基础，去争取地主、富农、失意军官及受打击地方势力。前者是基本群众，后者是土改以前可以利用的力量，争取其开明分子，以扩大基本力量。

3. 这统线的区别与利用，必须在各阶层的共同要求上求统一，又调整其矛盾。

4. 统线必须有计划的利用敌人的矛盾，扩大敌人的矛盾，必须调查内奸的矛盾，利用各种关系，去扩大这种矛盾，又拉又打，使他们互不团结，互不信任。

5. 各地委必须对统线的人，经常有计划进行统线工作。

丁、整党工作：

1. 严密上下级联系，要严格纠正党内纪律、无政府状态，纠正还有轻视领导、闹独立性、不请示、不报告的现象。

2. 健全各级党委机构，实行集体领导，健全小组生活。

3. 由领导干部亲自动手领导全党各级干部、党员进行审查，把每个同志的政治面目弄清楚。提拔干部要放在适当工作岗位上面，信任他们，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4. 为了发展党的工作，必须做好这几件事：

(一) 选取历史清白、忠诚老实的党员为组织员，加以训练，专门做党务工作。

(二) 各武工队要配备党员，发展组织。地方党员的配备，应适应实际情况，在巩固区乡放在第一线，第二线较少；平原区应多放在第二线；在城市则放在第三线。

(三) 组织青年、妇女组织外围团体。

丁英给香港分局的信

——对南路党委领导问题的意见

(1948年9月26日) ①

我前次给你们的筒信料收到了，我前信说：“前次——去年夏来此，为的是政治方针上的问题，这次来此，则主要的是组织内部和领导上的问题”。

A. 目前组织内部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最少有如下的几个问题。

(一) 关于温同志的被逐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是“群众意见”，但有不少的同志则认为这是“以民主的外衣”拥护下的宗派主义的新发展，有许多同志看不过眼，觉得温同志不应受此一打、再打、三打，不应把一个正在努力改进中的曾经是十余年在南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领导同志（不否认其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和缺点）当一只落水狗打。看见这种情形，许多干部背地里叹气、惋惜、不平、心寒、胆怯、甚而流泪……。

关于黄其江同志一从山东学习回来就高升到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而温同志则已削职降级后连站足都不稳，因而“暴发户”与“破落户”的对照语在干部同志中反映了。

小林同志则是新到任，未深入了解情况，同时许多干部感觉他对问题不够细心考虑周详，所以易受俘虏和包围。

有看过《三国志》的同志这样说：现在的南路领导机关相似“董卓入朝”或“曹操把政”（其意可能是指其江同志做了区党委后大权独揽，而又有计划的扩充势力和排除打击温同志及许多干部），而曹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操用的策略是“挟天子令诸侯”，而我们现在却又正如关云长所提出的“降汉不降曹”（不得不服从党，服从纪律，而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当小林同志宣布区党委的组织和人选的决定时，温同志不被物色，许多干部感到惊奇，我觉得现在这个新成立的区党委所辖地区，除中区这个地委单位外，差不多都是南路原来基础的扩展，而原来南路没有全面负责者参加，对南路过去的建党建军及干部的培养发展过程——即许多党内外情况是不会深入了解的。据此，我曾写一个文字意见交小林同志转分局，表明我意见上建议应物色温同志入区党委领导机构，他的作风在过去虽然有许多是不能满意的，但他是正在改进中的，同时他十余年在南路建党建军是有丰功伟绩的，他熟悉党内外一切情况，我以为假如能把他物色进区党委的领导机构是会使今后区党委的领导工作做得更好的。

在目前党还未完全开放民主选举前，我先来投此一票，这一票是否有当初有效，还望党的解释和教导。

不料我这封信刚一发出，未得批复前，即又闻温同志在黄其江同志的领导下“被逐离境”，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未免太过，未免是“赶狗入穷巷”，这是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和对有错误的干部的态度根本不同的。这个问题的真相与责任，就这样无计划无领导的发到每一个同志的阅读与议论，这样必然的结果是发生广大党员群众对过去南路负责同志（当时只仅存温同志还在南路，其余的都他调了）便成为过街老鼠，而对于该执笔者（其江同志）的“威信”也就陡[突]然提高的主要原因，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自从这个总结发到下边之后，许多干部同志都骚动起来，说：南路党的负责人真该“打老柚”与“捞搞”，就是任何一个幼稚的人来搞也不会搞成这样。……使下边同志只见到南路党的领导同志罪大恶极，百非而无一是了，同时许多问题又责任不清（如四属问题、许多干部认为是其江同志负责时期搞得最糟，但却避开不谈），是非不明（主观成见，或则片面），所以温同志便成了“众矢之的”，这是这个总结这支“矢”必然会集中射在温同志这个“的”的身上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则是黄其江同志的威信的提高，大家互相吹嘘的说：这个总结是其江同志在山东学习做的，经华东局批准的……，有一部分同志（尤其遂溪同志），他们是把其江同志当圣人一样的。

这是所以一个落水狗，一个升天堂的必然结果或规律。

此外则还有许多宗派山头问题——表现在干部与干部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由于处理不妥，如五属与南路未合家前之长久裂痕，五属负责人张蓝哥想吐吐长久郁闷在肚里的苦水，小林同志在遂干王明德同志的否认下，即声色俱厉的起而压止，说有谁再提这个问题就“解散”，说一通过去广西负责人如何干得糟，四眼全如何要不得……，其江同志则认为过去的南路对广西的做法“完全对”。这样一来表面上好象是不成问题了，张蓝哥屈服下去了，但实际上是满腹牢骚，说：“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说“要向上诉，但又无机会无办法”，据其所说五属干部有此同感的大不乏人（按张蓝哥曾被南路某些同志说他是托派，曾把他捆绑起来）。

所谓南路党的宗派山头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又是遂溪干部及遂溪部队与其他干部、其他部队间的团结合作问题，遂溪干部与遂溪部队一般的是大家所公认为“骄悍”极点的，最难相处和合作的，但目前领导上不但不注意到遂溪干部这方面的宗派山头的对工作对团结的妨碍，而都是纵容“骄兵悍将”，说“反小圈子”，而领导上却正在遂溪干部这个小圈子里兜。目前遂溪干部是更进一步的飞黄腾达了，是分布在每一地委单位和地区了，如果不是他们一贯的“骄悍”，把自己当征服者，当鸾凤，而其他的则视为牛马，为一无所能的“寒鸦”的话，那是没有人不表欢迎的。但可惜这些“骄悍”不容人的印象给人太深刻了，许多干部同志与队员都感今后的日子难过了，一个是“天之骄子”，一个是不得“父母慈爱的庶儿”的感觉笼罩的四属、五属、化吴等地区的干部的头脑。

（二）由于党内这许多问题存在，而处理又欠适当，因而许多干部沉闷、牢骚，思想波动，不安于工作（据我所知道：玉林五属负责人的张蓝哥及其下的不少各级干部，如博、白四眼江，过去县书林则真，陆川县委江洪，过去化县县委秀才与阿洪二人，合浦过去县书张

俊先，现在的副县长李廉东……等）。他们反映出来的材料除上所述者外，还有如下的一些：

(1) 有的干部同志这样说：“我们××主义者，是唯物论者，是反对唯心论的，但现在又不能不会使人信命运了。”因此“君子落泊算命教学，小人落泊[阉]鸡补锅”的俗谚也出现了（这主要是化州方面的干部反映的）。

(2) 替温同志惋惜的干部则念着杜甫的唐诗：“十年一觉扬州梦”（温同志在南路十年），“赢得青楼薄幸名”（惋惜他目前受冤被逐的结果）。

(3) 有一首名叫“古怪歌”的，这虽不是当地同志的创造，但许多同志干部看见目前南路许多不公平合理的做法，便很有兴趣的不会唱歌也唱起：“古怪、古怪，这个世界真古怪，去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太阳西边出，月亮东边落，……”（这主要是五属的张蓝哥等的反映）。

(4) 至于要求见上级申诉的则有张蓝哥和李廉东。李廉东同志说：“我自从东江调回南路，数年来和遂溪干部同事，只有半年是精神较畅快的，也只有半年是积极的，其余都是含冤受屈地过苦闷生活。我见他们竟可以把过去东江调来的李参谋长目为托派，缴他的枪，把他捆起来，任队员的用鞋底打他、辱他，我则有过生命都不得保障的感觉，随时准备着他们加罪枪毙。他们看见我提不起积极性，不了解自己的领导，反而说我英雄主义作祟，要当县委和政委，真是太冤枉人。我恨不得机会能见见林平同志，反映下南路的干部政策。”

(5) 过去的合浦县书张俊生同志，看过了《南路问题研究总结》摇摇头说：“起草这个总结的执笔者的立场动机是有问题的，避开自己来攻他人。”这个总结的内容主要是二个问题，一个是说过去方针政策错误问题，另一个是说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问题。但这二个问题，主要是发生在合浦，合浦在这二个错误政策下搞垮了许多工作（如民三十年白石水斗争，西场斗争，南康、小江的米案斗争，以及廉州、化海的过左学生斗争），打击了许多干部。在不正确的干部政策观念下，认为合浦干部通通要不得，只有遂溪干部要得，因此就实行起大

遂溪主义，合浦干部则个个落冷官。如总结上所指出的“受冤屈的干部”主要也是合浦干部，而不是遂溪干部，所谓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问题，主要是合浦干部与其他（遂溪以外）干部之受歧视、不信任、不适当使用的问题，也就是遂溪干部飞黄腾达而再不要其他干部的问题，也是如其总结上所说的“通通干部受打击受冤屈”问题。

这总结的执笔者不正视这宗派主义干部政策的真象，和举出合浦过左斗争的许多材料，明显就是逃避责任，说他是避开自己专攻他人，以反宗派的姿态来实行自觉的宗派。因为这总结做得不妥当，所以提出了反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以后，反而使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更严重的向前发展，这并不是偶然的。

其实这二个问题的主要发生在合浦，而又是在这个总结的起草者黄其江同志负责合浦工作时期，这时期的错误政策（政治的和干部的）执行的结果，其受损失是比任何时期都大都严重的，但这总结并无这样的指出，这是一件憾事。温同志提出这个总结上的错误政策的执行的责任问题，是应该的，由于责任不清，是非不明，我觉得这个总结发出来是益少害多的。因此要求上级“组织南路问题研究会”，“从新公平合理的、实事求是的做过总结……”。

以上一段话是张俊生同志叫我“代他向上级表达他的意见”。

同时张俊生同志还认为黄其江同志是带有“报复”嫌疑的，因其江同志有个时期是受过责备和解职的，目前是向温同志“报复”。

化州县委秀才同志也说：“我也觉得这总结不妥，好象只是‘攻击他人’，学习主要是自己的反省，而不是用来攻击他人。但自从这个总结发到我们地区，许多没有牢骚的同志也发起牢骚来了，好象发牢骚成了时髦的样子，非发下牢骚来趁下热闹不可似的。”

B. 除了以上的组织上的领导上的问题外，就在政策方针上，我觉得也有一些问题。

在一个“五大任务、决定”的讨论会上，他们一致同意“修改这决议”，认为“过左”、“冲动”，“错误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认为目前提出“一切为着土改”，“一切为着农会”，“一切为着民兵”，是“过早”。因此他们也就反对“土改是行动口号”的说法，最初是

根本否定这是行动口号的。后来争论的结果，他们只承认在华北解放区是行动口号，而在华南（连南路在内）则是宣传口号。

他们把宣传和行动孤立起来，分割开来，不了解宣传的目的在达成行动，行动过程不能离开宣传，当行动条件未成熟前，就是以积极宣传教育来达成行动条件，同时宣传本身就是行动的表现，在宣传当中便要作好许多准备条件的行动，如中央所提出的“必须具备的土改三个条件”（干部问题，肃清反动武装，地区安定问题和贫雇农的自觉要求问题），这三个条件如果不经过积极的行动是无法达成的，所以我和博白的张蓝哥同志则始终坚持这是“行动口号”的原则。

至于“一切为着土改”，“一切为着农会”，“一切为着民兵”……我们认为这是目前应该提出来的努力目标，领导是站在形势的前头，如果领导上不会领导朝向这目标上去求发展，只是停留于减租减息或其他低级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这领导便会落在形势发展的后头，成为形势发展的尾巴，而不是以领导上的自觉努力去促使形势的更快发展，所以我们认为目前在华南这地区（南路每一县在内）提出这方针任务是不会错误。不过具体实现这任务时，要估计当时当地内外一切具体情况来具体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进行，而不是空喊土改，空喊农会、民兵……，当土改、农会、民兵……等条件未成熟的地区须要从基础做起，只有积极做好了这第一步的准备工作，而土改……才会有基础。但不能说在目前还要做第一步的准备条件的地区（华南——南路等）提出这方针这任务就认为是错误。我们觉得这是分局同志有预见的站在形势发展前头的正确领导。但他们始终否定我们这意见，始终认为这五大任务的决定是“冲动”，是“过左”和“过早”的，在南路以至华南都不能在目前提出来的错误方针政策和路线，所以要求根本的修改。而我们则认为没有根本修改的必要，只要在这基本方针政策的原则下，考虑当时当地具体环境补充一些较低的第一步的计划，但这较低的第一步的计划是为着较高的第二步（五大任务中所提出的）整个任务的实现。同时这五大任务决定的内容上，也是容许我们先做好第一步然后才逐渐发展到第二步的，其内容中便是有许多是较低级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的，这是分局曾考虑各地的具体环

境的，并不是千般一律的机械的叫我们一开始便就立即来进行土改的。譬如五大任务决定内容中在“一切为着土改”的标题下便有“可以进行减租减息及反三征”的（我没有文件在身边，只是意思的记忆），这样周详考虑到各地的具体实际环境的灵活有预见的方针政策，我们认为不会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的。

不过当今天中央关于土改三个条件成熟，缺一不能进行土改的指示发出后，应根据这指示增加这说明，使下级同志执行时会更明确，更有计划有步骤去执行，而不致盲目机械的在没有准备好条件前，就冲动的来一套“土改”，如化州过去的分粮、废租、废债的错误了解和错误做法。

但他们始终是认为：“今天提出的，就是要今天行，今天不能行的而过早提出来，所谓今天而叫明天口号就是错误。”关于这一点我们提不出什么充分的理由和根据来驳，但我们始终觉得心里未舒服，所以这问题还请分局同志给我们解释和解决。

C. 我在未起程来这里以前，听说温同志已起程来港，未知已到达否？我以为应该使温同志来见见你们，使他吐露他心里的郁闷，我相信他心里是满腹苦水的。据我所知他是曾痛哭流涕者数次，就是这次遂溪干部驱逐他时。他还说：“究竟我怎样错？”同时化州干部看见他这情景，很惋惜，请他吃花生饮酒，本拟和他谈心的，但他一言不发，只是说：“很难说话。”可见他心里有深沉的郁屈的，假如不使他来此吐露其苦水，仍是留他在那里过苦闷的日子是无好处的，虽然他的问题主要是要在当地解决，但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形下在南路本身是很难弄个黑白分明的，非分局同志多费一些精神来研究是解决不好的。我提议：温同志来此一行，使他尽情吐露其心事，也好使我以上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得个是否属实的说明。

我以上反映的是情况的另一面，这另一面的情况可能是有许多主观成见的，但干部中有此不良情绪，有此不良反映则完全是事实，虽然在语气上词句上可能和我现在写出来的有某些出入（因许多又是间接的，同时当时又没有笔记，只是凭脑子的记忆），但组织内部存在着这一方面问题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以上所说的、所举出的各人有不

全部同意，或某些更正的话，那只有我个人全部负责，我是完全有此同感的，把之作为我个人的意见反映也无不可。

目前我是思想包袱最多最大的一个，我要求解包袱，同时希望能调动我们工作岗位。

工作报告容写好后再呈上。此致

敬礼！

丁（小印）

九月二十六日

粤桂边区党委关于掌握部队的指示

(1948年9月)

关于掌握部队，在目前是我们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部队还是官不象官，兵不象兵，军事纪律（不是群众纪律）执行不到[够]严明，部队内建立工作制度不到[够]健全。特别是打起仗来，会随时发现不坚守命令，随便乱跑、乱行，官找不着兵，兵找不着官。这现象如果不立刻设法纠正，则部队的战斗力是不可能提高的，而且有随时被敌人击散的危险，因此我们要严重注意这个问题，望同志们研究做下列几件事：

一、建立军事纪律，群众纪律。因为我们是地下党出头来的，同志们又都是些好人、老实人，这方面的，永远是有传统的，故群众纪律在目前我们的部队一般尚未成大问题，是大问题者是缺乏军事纪律，如临阵退缩，不听命令，执行命令不认真，乱打敌[乱]跑等等。大凡新队伍总是不够沉着的，有时只要被几个敌人一冲就山崩瓦解，不可收拾，听到枪声，落荒而逃。平时没有服从命令的习惯，叫他守，他偏要跑，而且还要振振自[辨]，说这是游击战法。叫他两点钟到，他偏要两点五分钟才到，或二点四十分，甚至迟几个钟头，满不在乎。要他做二件，他可以只做一件，你命令他，他居然敢和你讲个价钱。凡此种种，我们试去检查一下会发现很多的。我们要纠正这个。第一，要严格执行我们暂订出若干条军事纪律暂行条例，犯者予以处罚，决不宽容。但要分轻重，如目前我们觉得临阵退缩是最重威胁，这必须加强这一条刑罚，坚决执行之（几乎无论任何部队这一条都是处死刑的）。这种条例，我们也可以找敌军的来参考。目前我们订出若干暂行条例，也向全军公布了，但纪律教育工作、开会讨论、讲话解释、表扬模范等工作，是做得不好的。因此，部队首长聚精会神做好这件

事，政治工作者尤须负起责任来。党的组织在队伍中不但是遵守群众纪律的模范，而且是遵守军事纪律的模范。不能做后一件，单做前一件，会变成毫无意义的了，只能做笑柄而已，确定干部的负责制度是保证×。第二，军事纪律实行彻底的一环，部队的工作是首长制的，战士与下级有无条件服从的义务。一班犯纪律罚班长，一连犯纪律处罚连长。建立了这样制度，部队才可以通过若干干部去掌握。我们目前尤须先抓紧干部来负责，因为队员还很新，守纪律不习惯，而干部是比较有认识的。因此，有确定干部负责制度，才能健全巩固部队的，比如一班人临阵退缩就处罚班长，这样班长就必须死也抓紧队伍，不使他们跑了。军纪里民主是很少很少的，治军宁紧勿宽，我们的宽在官兵平等，在帐公开，生活活泼，上下级融洽等方面表现的。而于军事方面，只有严，没有宽。只有严明的纪律，则“乌合之众”就可以成为劲旅。我们要建军就不能用组织同心会或挥发会、分田会的态度来搞，因我们的经验很少，工作确是很麻烦的，请同志们注意研究实际，总结经验，得出新道理办法来。

二、建立部队内工作制度

一是分工，指导员管什么，指挥管什么，值星班长或排长管什么，都要各有所司，不能紊乱。一个队伍，只有一个指挥，不能谁都下命令，几个连长一举行动，也只有一个指挥官，不能乱来。工作分配了，各有专责，做得不好，各人要负责。二要有命令制度和检查制度，连长每日要汇报。

南路东征队关于政策策略的检讨的总结

(1948年9月) ①

我们这一总结，是从漫谈研究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怎样分析阶级》及《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有关政策部分之后，根据这些文件的原则精神，来检讨我们在广东琼崖、南路、中区、珠江三角洲各地执行的情况以及其优缺点，并指出其所以成功或失败的根源，作为我们对于中央政策的认识，及为我们今后工作的借镜〔鉴〕。

甲、于此，首先谈到我们执行政策策略的缺点与错误方面。

一、在政策上

1. 不完全懂得与不完全坚持“土地改革所依据的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的真理，在个别地区，我们曾做过损害贫农利益的事情。例如：

①在南路某一地区，进行分粮的时候，采取绝对平均主义，连贫雇农的食粮也一起平均；有一雇农历年劳动，赚有工粮六石，农会当时以其有余，也一起把他的工粮拿来平分分了。

②在同一地区，于进行吃地富运动时，把一贫农的小猪也吃了，因而招致他们怨骂我们等于K党。

2. 不完全懂得与不完全坚持“团结中农，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贫雇农必须与中农结成巩固统一战线”的政策，在个别地区，我们曾做过损害中农利益的事情。例如：

①在南路某一地区，进行分粮时，采取绝对平均主义，把地富粮

① 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食与中农食粮推平分配，吃地富运动时，中农的猪，甚至连鸡仔也被分吃了；因而招致他们对我们的怨恨。

②在中区某一地区，在部队经济困难时，曾向过一些中农强借粮食；虽然部队给有借单，但中农是不自觉与不自愿的。

3. 不懂得也不坚持“土改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因而个别地区曾侵犯过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例如：

在南路某一地区，当进行分浮财、分粮时，曾将一些乡村地富所经营的商店，也一律将其货物分光了。

4. 掌握不住“对华侨应予审慎”的政策，在个别地区曾有侵犯华侨利益的事情，例如：

在中区某个地区，我们曾两次误会没收华侨的财物，虽然过后两次都赔还他们的财物，但已使一般富有华侨对我栗栗危[畏]惧了。

5. 不了解土改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除查有实据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因而在颇多的地区，对于地富，甚至一些不相干的人，都乱打乱杀。例如：

①在南路化州某一地区，有一高利贷地主，因平[时]刻薄吝啬，为乡人所不满。在“农民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号召与影响下，农民竟于一夜把他夫妇两人用锄头乱行打死，后恐其子报复（在民主乡政府当文书），又强迫乡公所交出，用锄头打死。

②在同一地区，于某次对敌作战中，为一顽村从背后打枪，警告不听；于击退敌军时，遂转攻顽村，死我一排长及一机枪手，我军事领导人怒，遂下令：逢屋就烧，逢人就杀；攻入村后，屋被烧数间，人被杀数个，如果不是敌军增援得快，恐怕全村的人屋，都被烧杀清光了。

③在同一地区，有一兼高利贷的富农，有些农民认为他将来也会作恶，不如先下手为强，把他杀了。

④在同一地区，有一些船家，因不大愿意服役与帮忙，被我捆绑，投入海中杀之。

⑤在南路某一地区，有一曾参加大革命农会工作的地主，对我们颇尊敬，常招待我干部食宿，帮忙一些经济，供给一些K党情报；但他恐为K党迫害，于是又一面与K党政府周旋来往；当我们进行分粮分浮财时，他表面接受，但实际又多方拖延，我干部认为他可能与K党勾结，与我作对，于一次招待宴中，我干部出其不意而枪杀之。

⑥至于一些特务嫌疑者，结怨于农民的仇家，甚至一带路者，都被杀了。此时南路某些干部怀疑中央宽大政策，以为不适宜于游击区，甚至有些干部认为不杀人不光荣，杀人愈多则为革命的英雄，蔚成一时的风气。尤其是对于一些被判定枪决者，拿他来作为练习冲刺、投弹、打靶子之用。如是死者数十人，残暴凶狠，给人印象最坏！

二、在策略上

1. 不完全懂得也掌握不住“消灭封建制度应当是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有策略的”，又不懂得“土改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农村人数10%左右”，错误地扩大打击面。例如：

①在南路进行分粮中，不仅地、富不能免，而中农、贫雇农也一样被平分，就是一个尖锐的例子。

②在中区某个地区，有一个乡村，户口仅一保半，我们竟开了六十个地主黑名单。凡一切地富，都要被没收财产。

2. 不懂得“在新区，还必须分地区、分阶段”进行土改工作。例如：

在南路一些尚难暂时巩固占领的区域，甚至一些动荡不定的新游击区，我们即忙于进行土改工作，如分田、废债、分浮财、分粮。结果是冒险的，靠不住的，有害无益的。

3. 又不懂得“在我们刚占领的区域，应当提出和执行中立富农和中小地主的策略，将打击面缩小到只消灭K党反动武装，打击豪绅恶霸分子”，都将打击面无限制的扩大，招致很大的困难与损失。例如：

①在三角洲某个地区，在2月指示前，干部与一些开明或中立的地主，统线搞得不错。及后则认为与这些人搞统线，大失立场，遂与这些人断绝关系。其中有些人要求合作因被坚决拒绝，即要求进步，

也一样坚决拒绝教育，使这些人走头无路，栗栗危惧不可终日！

②在茂、电、信一个地区，有一个地主，在政治上没有与我作对，我部队为了筹集军粮，由武工队用绑票式把他架走，吊打浸水，逼他缴交一千万。结果其家人带K军来围剿，使我人员损失，活动范围缩小，甚至使该区地主害怕起来，给K党乘机组织地主反动武装，打击我们的活动。

③在中区某一地区，有一地主，系该县参议员，当地绅士，管公款，颇贪劣；但怕死，对我采取两面政策，曾给我军粮百多担，任我工作人员在乡留住；后我们怕他与K党勾结，特别是部队经济困难，遂带队进入其乡，没收他的浮财粮物，但粮分不到该乡贫农，尽为他乡贫农分去。第二天，他则煽动农民起来组织自卫队，并引起当地地主危惧，纷纷组织反动武装，与我作对，使我工作地区受到抵制，交通受到障碍。

④在南路某些地区，一般地主富农，都畏怕我们，甚至有些与我联系甚好，除极少顽劣地主外，余都中立；给我工作开展很大的便利，活动范围扩大。及至分田废债，分粮分浮财时，我们既不争取，连话也不准与他们讲，两面派也不要与不管，坚决全面打击。结果引起他们危惧，无可奈何被K党拉去组成地主阵线，组织反动武装打击我们，使我们遭受极大的限制，招致很大的损失。

4. 又不懂得“在新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例如：在南路、中区，我们干部，自土地法大纲公布后，认为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政策为过时，有若干稳健干部提出须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此一先行步骤，则被嗤为落后，于是大搞起来，进行分田、分浮财。及至碰壁后，仍要进行分粮分耕，绝不肯采取抗日时期的经验。

5. 更不懂得“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制度，必须分别地主和富农，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份子和非恶霸份子”。例如：

①在南路、中区，于分浮财、分粮时，既不问地主的大中小，也不问地主与富农，都一律看待与平分。

②在南路、中区、三角洲，对于打杀地主、富农，也不问其是否

恶霸份子，均一体看待与对付（例子见政策部分第五项）。

6. 尤其不懂得“土改直接的目的，是发展农业生产”。例如：

在南路一个地主，当进行分粮时，中农怕分，改吃粥为吃白米饭，地主、富农更是大吃大喝。于是猪牛大宰，甚至连谷种、鸡仔也吃光。而一些贫农也一样大吃起来，以为吃了又有得分，以至大家不事生产，只待均分，因而社会陷于混乱，生产停顿。

乙、其次谈到我们执行政策策略的优点与成功方面

一、在政策上

1. 土改政策：

在琼崖地区，基本上还是执行中央“五·四”指示，从去年五月开始，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

①如何分田？分田地区：

A. 大恶霸份子的田地没收。

B. 反动富农个别没收；中小富农不分。

C. 仇视我们的恶霸地主的田地分。

D. 在解放区内分。

E. 老区的山区也分。

F. 老区的平原，民众已觉醒并有组织的，与K斗争很久的也分。

②分田方法：

A. 有农会组织的地方，由农会分。

B. 有乡民主政权成立的地方，由乡政府分。

C. 按照一保为一单位来分，无田与少田者先分。

D. 召集群众大会，调查清楚，按照农民多少，由贫雇农开会自己分。

2. 减租减息政策：

在琼崖，在非解放区的游击区内，在平原沿海区内，依照抗日时期的经验，进行减租减息。主要对象是庙尝祖尝田地。

①一部分是二五减租。

②一部分是农六地四。

③更少部分是农七地三，视实际情况而定。

3. 公粮、军粮政策：

在琼崖，征收军粮已有九年历史，公粮也已七年了。

①公粮——即农业税，代替旧有钱粮。

A. 标准：在老区，每半年每担收二升，两担收五升，余则累进收税，直至两石。所有人民都照此征收。一担以下者不收，鳏、寡、孤、独者不收。

B. 在新区，贫农收三升，中农收六升，富裕中农收一斗，富农收二三斗，地主则视其大〔人〕力而定。不照累进税率收。

②军粮——半价购买。

A. 老地区：中农以上才派军粮，视其程度而分别负担多少，初照公粮数额分配，后折半照价交纳。

B. 新地区：先向K党政府人员家属收，使K军不敢打击人民。

C. 沿海远区：则收钱代粮。

③处理粮食方法：民众的家，就是我们的谷仓。即将公粮、军粮寄存在缴纳的群众家里，需用时则取用。

4. 对工商业政策：（在琼崖）

①一般的：照5%收税，毛巾在一打、糖百斤、鱼百斤、布一匹以上才收；牛、猪每只以上才收。每项货物只收一次税。

②小市镇：初照资本额5%收税，后改收所得税10%，或照其营业额加二成作标准收税。有些收月捐，但须得其本人同意。

③大城市：

A. 不到城市收，而向他在农村家属收。

B. 如逃匿城市者，于攻破城市时，追收三个月。

5. 华侨政策：在琼崖一般都很好，犯错误很少。

①华侨回国所经我们控制关卡时，其行李不检查。

②华侨回乡时，即举行欢迎华侨大会，或设宴欢迎。

二、在策略上

在反三征问题上，三角洲曾有两个运用策略成功的典型例子：

1. 禺南有一个老地区，我组织了武工队，群众对我好感，恶霸、地主畏惧我们。但我武工队人少，不能大搞，只得替群众做可能做的

好事，曾做成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保，保长系土劣，但对我们还好；保长要农民每亩交禾标（即护耕、护割费）六十斤谷。群众对我们诉苦，要求减交，武工队答应支持，而指导农民须全村人起来向保长要求，谈情说理，群众接受，情绪高涨。同时我们又以第三者地位与保长商量此事，考虑农民困苦，保长亦诉苦，谓非收六十斤谷不够开支，不大愿意减。于是我们通知农民，乡人遂即群集数百人，到保长办公处大事喧闹。保长畏怯，遂又派人与我商量，我武工队答应帮忙，一面要保长低减，一面指导群众开会解决。开会时，由保长主持，我武工队散入群众中去，武工队长上台站在保长背后，名为保护，实则监视。在会中，群众情绪激昂，坚决不允交纳禾标，结果我们做好做歹，允交二十斤，遂一致通过，完满解决了这个问题。自此之后，保长对我好感，群众对我更好感。

2. 中山有一条川〔村〕，有两保人，人数七百多，K政府征收处要农民每亩交税五十斤谷。去年受水灾，民众无法交纳，我干部召集基本群众谈话，指出去年斗争胜利的经验，鼓励民众不交。经数日努力，群众便起来斗争。初，上层动摇，下层则异常坚决。于是群众则四处放哨，见K征收员来时，则打锣通知，农民则散落禾田，使征收员无法收税，第一个回合胜利了。及至禾熟时，征收处派兵来监禁收割，农民则于夜间集体偷割，弄得征收处无法可施，第二个回合胜利。及后征收处派兵捕去农民数人，农民则集体前去要求入狱，征收员恐事情扩大，又无法养活如此多人，不得已遂放人，第三个回合又胜利。及后征收处则捉乡保长去，勒令交纳，农民则又集体前往请愿，要求释放乡保长，征收处主任又不得不释放乡保长，于是乡保长更加坚决起来，大家结成一条心，第四个回合又胜利了。及后征收员又来坐收，以杀人来恫吓，但群众觉醒了，相信并看见自己有力量了。当他来时，群众大怒，即于当夜冲入征收员矛寮中，打死一征收员。事后群众不承认杀人，并大行疏散，K无法找到对手，只得施行怀柔政策，群众只允交一二成税，K只得收手，我终获得大胜利。于此之后，群众为保卫斗争果实，组织起小队秘密武装，用更夫名义出现，由我领导。这是一个由合法到非法，由非法到合法的斗争的范例。

丙、最后，我们认为政策策略的缺点与错误所造成，其原因是：

1. 我们干部不精通毛主席思想，不按照当地当时实际情况，主观地作出自己的工作方针方法，因而作出一系列的过左过右过火行动，表现在：

①过早的进行土改、分田、分浮财、分粮、分耕，不愿执行抗日时期的经验，进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政策。

②侵犯中农利益、华侨利益，打击工商业，甚至损害贫雇农利益。

③怀疑中央宽大政策，对地富、嫌疑份子或不相干的带路者的乱打乱杀。

2. 我们干部政治不成熟，常把趋势作为现实，把明天要做的事而性急地作为今天要做的事情，没有步骤地，分别地来进行工作，表现在：

①不广泛进行减租减息阶段，即马上进行土改、分田、废债、分粮、分浮财。

②把地主、富农无别地，一股脑儿尽情打击。

3. 我们干部的策略教育不够，把政策与策略混同，不严格的区别，于是扩大打击面，孤立自己，招致困难与损失，其表现在：

①不分地主的大中小，地富的恶霸与非恶霸份子，无分别地尽行打击，使地富与我过早对立，给K党利用，组织反动武装与我为敌。

②不集全力去打击K党反动武装，与我为敌的大恶霸份子，而分力去打击可以一时中立的地富份子。

③拒绝对开明进步的地富的统线工作，对一切地主不讲话，不争取可以中立的地富份子。

4. 没有学会分析阶级的本领，因而乱划阶级，错误地扩大打击面，其表现在：

南路某些地区，当分田、分浮财、分粮时，不根据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去划分阶级成份，欲以剩余为标准划分阶级，以致把贫农划入中农，中农划入富农，富农划入地主。有些却又把地主划入富农，富农划入中农。

至于对政策策略上有优点与成功的原因，莫不与上述所做的做法

相反，思想方法相反，问题处理相反。即较善于掌握毛主席思想的原则精神，按照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的工作方针方法，因而能恰如其分，不过早，不过火，不过左，有步骤、有分别进行我们一切工作，于工作犹得开展，犹得成功。这是一个严重而有益的教训，应引起我们深切的注意！

局势发展的新阶段

(1948年10月10日报告大纲)

我们的“六四”报告大纲关于“目前的新形势”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局势发展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但由于形势急转直下的结果，目前形势以〔已〕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即是蒋政权开始崩溃的阶段，人民解放战争走到决定性的阶段。蒋政权这个崩就一直崩到底了的，尽管蒋介石反动集团高呼“太平天国时代”，这不过是他们自欺欺人的幻想罢了。但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崩齐呢？这还须全国人民作几年最大的努力。我们的分析如下：

一、蒋政权总崩溃开始

1. 政治方面：开始崩溃的特点是：内部崩溃，嫡系分裂，喽罗向大王开炮，这是第一，美国准备踢开周身梅毒的老家伙，另外豢养新的奴仆，这是第二。蒋管区民心大变，如各阶层的群众情绪已起基本的变化。离开K，靠近D，这是第三。

比如：政学系高喊“以变求通”，CC要手夺“革新”，青年团抱住“新政”，翁文灏辞职，政院瓦解，军事失败，立、监委直接指责蒋介石指挥无能，吴化文起义，官僚骂军统一无所知，无有能力。蒋介石在三青团首脑×训话大喊：“现在我认清你们决心自己先打，然后才打共产党。”美策动所谓去掉蒋介石的所谓“和平”运动。美报连喊撤换蒋介石的口号，美扶植李宗仁、孙立人、傅作义、阎锡山、马步芳等，直接供给他们的武器。国民党统治区上层分化，徬徨沉默，甚至向我们投降；中层消极怠工，甚至倾向我们，特别是乡村长、小学教师、青年学生，表现得特别明显；下层斗争情绪提高，各式各样斗争不断展开与提高。总之，民心大变，老百姓决心跟共产党走，抛

开腐烂的国民党，所有这些都是事实。

2. 军事崩溃开始的特点是全面惨败，大量战略据点丧失，这是第一。接连不断地大规模的战役，每战必败，全军复没，而且败得非常之快，这是第二。统帅威信扫地，手忙脚乱，束手无策，这是第三。蒋管区人民武斗胜利地大搞与胜利地小搞，蒋军腹背受敌，这是第四。

比如：在短速的时间解放长春、沈阳、锦州、包头、郑州、济南、开封、烟台等，每战时间不过十日，解决蒋军全部干脆彻底，多至十万、八万，少至三五万，俘虏多于击毙，起义越来越多。K统帅部，全面防御转重点防御，组织机动兵团、游剿战术、总体战略等，完全失败。老爷们急得乱叫乱跳，老货居然说出打败仗是因为空军体恤老百姓的话。人民武斗据现有的材料，有湘鄂边、湘黔边、粤桂边、越桂滇边。云南民变，如称“人民解放军”或称“人民解放军”或称“民主联军”，每一个战斗单位，多至数千人，少至百数人。各式各样进行胜利的斗争与胜利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事实。

3. 经济方面开始崩溃特点是：恶性通货膨胀到了顶点，最后王牌金圆券刚才出笼便告破产，这是第一。物价暴涨、市场紊乱，工商业停滞，关门的风暴无法制止，这是第二。广大丰富的资源丧失，靠着一些穷的省份捱命，这是第三。

比如：金圆券一上市就打折扣，不受欢迎。他的威信绑在枪杆上，前方越打败仗，就没有人肯要，近来市面物价扶摇直上，尽管发三令五申限价，取缔囤积居奇，派大批军官捉人杀人，维持金圆券信用，稳定市场秩序，仍然没有实效。南京二十八日电：“食米绝踪、伙食难开”，“京市府十月二十七日停餐，二十八日仍无米可炊，立法院日来亦因无米断炊，二十九日可借到五十袋开火”。东北、华北、华东甚至于华中、除了一些孤点小块的面以外，绝大部分丰富的资源，尤其四川天府之国，府粮原百分之六所仰给的地方，完全丧失，比较完整的地盘要算是滇、黔、粤、桂，是出鸦片的，桂是穷出名的省份，靠着这些地方活命，究竟能榨得出多少油水呢？所有这些都是事实。

蒋政权开始崩溃的事实与条件，就是这些而且这些正在不断地迅速发展。

二、解放战争决定性的胜利急转直下，胜利地进行

1. 解放大军有着压倒的优势、广阔稳固的大后方，两面战场的逐步形成。

比如：六月二十四日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会议作报告说：“太平军战事结束时，国民党军达三百七十万人，拥有步枪一百六十万枝，炮六千门；共军则有三十二万人，步枪十六万枝，炮六百门。现时国民党军共有二百一十八万人，步枪九十八万枝，炮二万一千门；共军则有二百六十万人，步枪九十七万枝，炮二万二千门。人民解放总部总结：公报两年内共歼蒋军二百六十四万余人，内中俘虏将级军官三百二十六人，俘虏旅级上校军官四十三人，俘敌一百六十三万人，加上秋季攻势解放长春、沈阳、锦州、济南等每次成十万人的围歼与缴获，我军不单在数量上占了优势，而尤其重要的是质量大大的提高，士气旺盛，攻坚战术与配备提高，声势浩大，所向无敌。此外，华东、东北全部解放，华北、西北、华中除了少数的点小块的面之外，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块。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党的正确的土改政策、工商业政策领导下，热烈地进行发展生产。同时社会秩序安定，解放大军无后顾之忧。此外，刘伯承部队入川与渡江，配合江南人民日益发展的战斗，两面战场逐渐形成，我们是睇得见的。所有这些，都是事实。

2. 我党已成为全国各革命党派、社会人士公开承认的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全国各革命党派、社会人士一致拥护我们的号召，全国落后的地方与落后的群众已坚信解放战争的胜利并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他们不能也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只是马上行动的勇气与敌政治组织的力量还不够。

比如：我党“五·一”号召，关于新政协组织联合政权问题，得到全国各革命党派、社会人士热烈的拥护，不断加以讨论，现在仍在进行中，继续着这种讨论，并多在杂志上发表公开承认中共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我们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与比较落后的群众中，普遍听到“解放军胜利是一定的，国民党崩是一定的，希望大军快些打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事实。

3. 接收了全国广大的丰富的资源，并在广大工农热烈情绪下发展生产，经济日趋稳固与繁荣，这便是保证解放战争决定性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正在不断地发展中。

三、全国胜利与决定性的胜利

1. 人民解放战争已由农村包围城市，发展到了最后解放城市的阶段，而且已警〔以惊〕人的速度与威力胜利地进行。这就是说，解放战争已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了。我们已有足够条件掌握决定性的胜利，但决定性的胜利，并不等于全面胜利，也就是说，决定性的胜利只能在中国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实现现阶段革命的基本问题如联合政府土地改革等，而不能在全国各地实现，这些问题，这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不平衡性的规定，也是由目前形势、政治组织力量赶不上军事发展的速度的基本特点所规定。在全面胜利的实现，现阶段斗争的基本问题，还须做几年的努力。

2. 蒋介石的做法，仍是一面的更加反动与疯狂，另一面又另摆布他的骗局，“实行耕者有其田”高唱“太平天国的中兴”等等。蒋政权的前途也仍是大路虽有两，坟墓只是一个。第一条，是蒋介石政府被人民解放军的铁拳打得粉碎，但这个老奸巨滑的人民罪犯的头子和他领导的反动集团，很可能来一个“偷天换日”，准备一个小老蒋，混入联合政府去图谋复辟这着棋我们是必须十分警惕的。第二条大路，是我们在北方组织联合政府，蒋介石收拾残兵败将，霸占广东或台湾，苟延残喘，企图死灰复燃。但不论怎样，终归毁灭，这是必然的后果。

3. 大军渡江基本条件更加成熟。（一）一块解放区连成一气，无后顾之忧；（二）华中战场已到了决定性的战争；（三）刘伯承入川与渡江是开辟第二战场的优良条件；（四）秋季进攻不断地大胜利，解放军的声势浩大。至以渡江的时期问题，则决定于解决江北各孤点。组织联合政府的先后问题，这是说假如联合政府先在北方实现，大军渡江可能会迟一些，假如乘胜南下，联合政府在江南组织，大军渡江可能会早些。

4. 联合政府必然实现是肯定的，实现有两种可能：第一在北方；第二在南方。但由于目前形势、政治组织力量赶不上军事发展的速度的特点存在，联合政府在北方实现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如果江南人民努力得够，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已腐烂到不堪收拾的时候，联合政府在江南组织，也是可能。

四、华南形势

材料少不能做更具体的分析，只能原则抽象的提出几点如下：

1. 反动政府加强反动的统治，但力量不够，顾此失彼。
2. 大搞与小搞都胜利地进行，华南党威信大大提高，华南人民的力量迅速的发展。

3. 人民被进一步迫上梁山，他们自己都已准备上梁山，各阶级的情绪起了基本的变化，指望解放大军到来，就象火山一样地爆发。

4. 华南处在全国我优敌劣的形势中，华南又处在内部敌优我劣的形势中。由于这一基本特点的存在，工作不断发展是可能的。但困难也跟着存在，直到华南内部形势起了基本的变化为止。

岑嘉苗对南路解放军的意见

(1948年10月16日) ①

我和南路人民解放军一起过了九个月头，在这期间，我到过政治工作队、医务处、地方文化机关、电台等部门学习替人民做事，其间看到了许些事情，觉得好像是和我所想象的革命队伍、解放区的情形相差太远。当然，我的看法、认识能力很低，也许有不正确或误解之处。但即使是误解，我也要提出来，给革命的先驱者指正，才有去我在喉之骨，才能教育我自己。因此，就我所感觉的、所看到的写在下面：

一、过去——当南路人民解放军初举义旗的时候，直至辗转于合浦、灵山山地间的期间，对于政治宣传及对内的政治教育是十分忽略的。我们的吴、廉政工队是在部队出发的前一晚才临时指派人员组成，而每一成员不是小学教师便是学生，这些人多半是只凭一腔热诚而参加进来的，都是没有经验的人，有些甚至连政工队的具体任务是什么也搞不清，只是由政治部笼统的指定了我们的任务是向老百姓宣传解放军的性质和任务，但从来没有指导我们或领导我们研讨如何接近农民，如何进行宣传的工作技术或方式问题，也没有给我们上政治课以加强我们本身的思想教育及革命理论的修养。因此，我们有许多队员都感到工作上有很多困难——说话的理论名词老百姓听不懂，没兴趣听，说来说去都是老一套，宣传工作等于买膏药，枯燥乏味，陈腐。但除了这八股的一套没有第二套了，只好依然卖下去，越卖越提不起劲儿，后来有些甚至连这一套也懒卖了，爽性宣传时就以找地方洗澡为目的，和东纵在山东一样。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同时，在长期行军中，当战士们在饥饿、疲乏、寒冷交相侵袭，情绪低落的时候，政工队本该以身作则，做顶能吃苦、顶“襟捱”的模范，且更应随时给战士们以鼓励、打气（这是我从长征中知道的），可是当时的事实是政工队还要人家来打气加油！我们也没有知道应该去做鼓励工作的那回事。

因是我们在部队内是失却作用的一群，反之，由于我们不会作战，没有武装，常要战士们分心保护，反成了部队的累赘长尾巴。本来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工作部门，竟成了废料，上级的领导者每当战斗发生时看见我们便皱眉头，而战士们叫我们做“保队”，是白天会吃饭，晚上会睡觉，行军时最给人耽累的饭桶。

在这情形之下，我们全队同志，深自渐内疚，情绪低落，大家都不愿留在这部门工作，稍有可能即要求更调到别个部门去，越弄越糟。

二、在当时的领导者群中，很严重的犯了官僚、军阀主义，当整个队伍还未挣脱敌人的包围封锁，所处的情况还是很恶劣艰苦，大家都在饥饿疲乏中，司令部每当行军到一可住一晚半晚的地点时，如是村庄内，必定杀鸡杀鸭，大嚼一顿；政治部的三位科座，也是在我们政工队员执行睡觉的命令躺下后，驱使小鬼弄吃弄喝，不让司令部寿美于前。

有一次，刚在战斗之后，突围出来，隐蔽在一小山岗上，待司令部及大队一到即要开始急行军。我们政治部一位科长，却命一个小鬼跑到离隐蔽地四五里以外的村庄去取米汤给他喝，这小鬼结果赶不及回队就失了纵〔踪〕。天晓得结果怎样，敌人离我们只有几里路呢。

平日，我们的李司令员（听说是由东江派过来的）很爱发脾气、骂人，我们政治部的科长也一样，当叫我们下乡跟老百姓打交道时，我们不明白、有困难提出时，就要挨骂。而且从来没有很实际很详细的检查过工作，没有坦白的批评检讨。有过两次的叫做自我检讨会，大家客气一番，黔坐一会而散。

我不清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队伍里有没有这种规矩，但李司令员说东江纵队是有的，即下级见到上级一定得敬礼，如遇上级走过身

边，即须起立致敬。这一军纪宣布后，战士们都十分不满，都说他搬了国民党的一套来了。还有一点，在部队经费困难时，所处形势恶劣时，司令部宣布分级支发生活费，引致〔起〕战士们很大反感。当然，平均主义是不正确的，但当艰难困厄的时候，上级干部，应不应该以身作则，共同甘苦呢，我实在有点不明白。

三、习染了国民党官僚的自私贪污之风。

我们调回遂溪整训的时候，我被指派在西区做文化工作，那地点恰好是海边交通站，后来因病到中区医务处，也接近那儿的交通站，后转入电台做抄写电讯的工作，恰巧又是住在和交通站同一村，是司令部人员和那班专做特工的手枪队长川出入的地方。在这地交通站里，凡是缉私截获的货物，都经这儿点收整理后送交司令部。而当时解放区内一切行政经费及军队的给养基本依靠这些截获品。那时我们没有一个圩场，也收不起税，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经济来源，但取这些截获的走私货物是经济的主要来源，是许多人所公认的。当时我亲眼看到过许多住在交通站的工作人员，把缉获的东西不经司令部许可，即拿来自用，司令部内的工作人员，也是随便选用的。我到山家村（司令部常驻地点）时，看见司令部内的人，多是衣冠楚楚，夏威夷恤，西装裤，要不就是新崭崭的丝绸衫裤。而战士们，特别是从合浦回来的廉、化籍同志，他们是给遂溪籍的同志看不上眼的，他们穿的衣服，破烂不堪，有的简直是破布凑成的，这样怎能使他们不起反感？我曾跟一位士兵同志谈过话，他就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话“司令部当然什么都有的呀！”我当时听了很难过，不知怎样去解释。

特别是山家村及东区的司令部人员驻所，每每是座中客常满，盆中鸡不空，最使战士们眼红呢。

自私和本位主义的作风是很普遍的，有人的墨水笔好写，便要征用；自己用的小鬼要机警精灵；自己带的自卫枪要是舶来品，土打的就换给人；自己工作的部门要住得好，干爽光亮，砖石建造；至于别人的呢，好少理。我亲眼见一个领导西区海边界炮区地方武装的陈同志，偷换了由海道自合浦归来的在他住的那条村附近登岸的同志们的枪，当时引起了很大争执，我那时也为他们抱不平，但我也是外来的，

也是地方人眼中的合浦逃来的废料，所以也是敢怒不敢言。

在中区之相村，医务处设在那儿，当地的负责经济行政的樊同志（我记不清楚他是否叫这个名字，只记得依广州音应叫他作呀“盘”），专和医务处为难，不肯由〔当〕地拨给伙食费、生活费，而要陈大姐（医务处的医生兼主任了）亲自跑几十里路到司令部去领取，有时如她因病伤同志多忙不开，抽身不得时，医务处就有断炊之厄。这种不团结、不合作的现象，是解放区不该有的。

四、不注意兵士的思想文化教育，行军中、留驻中没有彻底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抽用了人家的稻草，不好好放回原处，弄得人家冬天的柴草给糟塌透了；打破人家的东西不清算赔偿；又不尊重地方风俗习惯，有许多行动，都使老百姓看来不顺眼。

战士们的品质，由于忽略教育，没有提高政治的觉悟性，因此竟有些兵士习染了国民党军队里的老差骨的流氓气习。在医务处，时时看到有好些受伤同志十分刁蛮，弄得看护们（她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姊妹）非常害怕他们。他们常常以自己的受伤是十分伟大，因此很任性，有一个伤了腿的，竟要脱光了衣服，赤条条的睡着也不肯盖被，使这些农村姊妹——当看护的，不敢走近他，他便高声大骂。这类放任的流氓性的事情很多，不胜枚举。

五、没有养成严肃俭朴的工作、生活作风，行军时每过一村镇圩场，饼食、生菜之类为之抢买一空，日常生活中，各部门不论是文化工作人员、部队内的战士、司令部里的高级干部，一样的是“死食”成性，耗费金钱，且常因此弄出病来，又耗费那十分难得的医药，而且使老百姓看了十分惊讶，会怀疑我们为什么那样阔绰。

六、每个工作人员的个人合理需求及困难，是常被忽略的。

高级干部们有爱妻子、爱儿女的自由，可以常常到赤坎去探望妻儿，但其他的人有这类行为，则被目为自私，个人第一。妻子怀了孕，丈夫不敢去探望，女儿患了严重的病，父亲不敢去看望；父亲病了，做女儿的也不敢叫他留在医务处好好医理；就是平常想托交通人员带一封信，都给人嘲笑是“无聊”，交通站的人把它付之一炬，也不告诉原人一声；甚至有些人寄钱、物给亲友，则把东西收去，一字不提，

人家查问时，则回报一个“不晓得、查查看”。不了了之。

我们的这情形之下，只好这么想：解放区内的工作人员，为了革命，就最好不要丈夫，不要妻子，不要父母、儿女，即是说完全抹杀了人类的伦理之情。

七、处理事情，不照顾群众利益，不征求群众意见。

有一次，我们的部队，在吴川县第一次夺取了一个谷仓，当时为了要维持部队的给养，固然不能无代价散帐，而须靠它取得一笔钱，于是公开平糶，本是应该的。但糟糕的是平糶的办法不周密，给地主土豪多方设法争购去，穷人受不到许多实惠。而且后来不知就地又决定了除拨出一部分作军需支用外，竟拨出一大部份摊分给全队的每个人，每人数斗，于是这笔意外之财，使大家都放任大吃大喝，当地小食即时涨价，给人民很坏的印象。这样的处置直到今天，我还怀疑是不当的，好象流寇的就地分赃，而不象革命先锋队队伍的行动。

还有一次是抄查了一个吴川土豪的家，得到许多金银珠宝，以及毛毡、衣服、手表、墨水笔等物，当时除了金银首饰归公之外，其余的日用必需品如毛毡、衣服、大褸（那时是深冬酷寒的时候）等，不是看谁最需要发给，而是除了高级干部挑选自用外，即拿来公开在部队内用开投方式拍卖，谁出得价钱高便卖给谁，这样不特引起没有余钱的农民出身的同志反感，而且在有多一点钱的中上级干部间，也每因为争购东西，或因主持拍卖者有所偏袒而引起纠纷。如梁同志（曾在吴川县府做什么科长——好象是教育科，后在一次战役中为敌人追击至河边淹死了的）和不知是陈同志（前在吴川石门乡公所自卫大队作队副的花陈）还是梁涛明，我记不清楚和那一个了，他们就因争购手表而几乎闹翻了就是一个例子。

以上所说，完全是事实，虽然很零碎，但我觉得完全是思想意识的问题。我不是一个有见地的评论家，而只是一个很幼稚的，没有革命实践的经验，也没有革命理论修养的群众。而只是感觉到为要使华南的革命队伍在不断磨励中成长得更茁壮，配合着中区、华北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英雄们，英勇地完成解放华南，解放全中国的艰巨伟大使命，我是应该把谄谄之见，提供出来的，如有误解及犯了革命

观点、立场上的错误，愿受先导者们的批评指正。

岑嘉苗 10. 16

粤桂边境人民在血海中（粤桂南通讯）

（1948年11月2日）

林 绍 贤

杀人放火的“总体战”

广东的钦廉四属（防城、钦县、灵山、合浦）和广西的西南边境（思乐、上思、珙宁）一带的人民，在宋子文、黄旭初剿民“总体战”的屠刀之下，现在正淹没在极端悲惨的血海里。

伪防城县长陈克强曾公开宣称：“那里的老百姓都要不得，索性杀光了，再换过‘种’吧！”在防城，保九一个整团和七个警察中队正在积极进行杀尽灭绝的所谓“换种”暴行。他们由县境偏东的十万大山支脉东山山脚开始，沿途纵火，把黄沙水、稔稔、天稔、那马、那座、小峰等村庄烧掉了，随着又西向入大勉、那累、那巴、板蒙、中到处放火。稔稔是一个标本，第一次烧掉了房屋的上盖，老百姓回来收拾断砖破瓦加上些茅草，搭了一角避避风雨。“保九贼”第二次来，再烧，而且连烧得焦黑了的坭墙也推倒；老百姓躲到山沟里住山寨。“保九贼”第三次来，就连山寨也烧掉。其他的被烧村庄也类都如此。烧了好些村庄“示”了“威”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就颁布“并村围阘”的办法，大凡靠近山区或被认为有“通匪”、“庇匪”嫌疑的村庄都要搬，搬到伪县府和“防军”指定的反动据点或认为“可靠”的大村去。搬的时候不论粮食、耕具、家私、杂物，凡拿得动的都要搬。门板、窗格等木料如果留下来都有“济匪”嫌疑，罪至枪杀。可怜老百姓世代生息劳作于其间的田园房屋，就这样荒芜、倒塌以至变成废墟。钦县马笃山周围一带，如大塘、高黎、那晓、稔测

等村庄，大者百余户，小者数十户，现在都满生荆棘蒿莱，人烟绝迹。钦县贵洞乡十二保内十几条大小村庄，只留下空空如也的门口和窗洞让野鸟飞进去。上思的那罗、寺交、那齐、米鸡、桥贡、绿亨等村也都烧光了。上思河以南那畏、芭蕉、祠堂等属于凤凰、平福两乡南部的村庄，一律不准居住。思乐的九特靠山村庄也要长期“清舍空野”。

以上所说那些被烧过和指定搬出的地带，国民党反动派划定为“无人地带”，命令保贼、团匪设卡放哨监视，进出这个地带的乡民一律射杀。假如里面的村庄上空发现有一缕炊烟，就开队伍进去把村铲平。

一部分坚强不屈的老百姓走上高山去穴居野处，把他们能够带得出的一点包粟包、干木薯，混和野菜煮些粥水挨日子。没有盐，更谈不上油，母亲没有了乳汁，好些婴儿被忍心丢到悬崖下去。孩子们侥幸活着的，也孱弱得皮黄骨瘦，五六岁大还不能站得起来。

被迫搬入闸去的乡民呢？闸里没有自己的家，拥拥挤挤才恳求得一角屋檐或和牲畜瓜分猪圈、牛栏。每个闸门都由保贼、团匪派人来掌管，闸内人民出去种田做工，早上九点出去，下午三点就要回来。牛入闸要收“保护费”西贡纸五十元，谷米入闸每担西贡纸五元。入了闸之后，反动派征兵、征夫、征粮都容易了，要那个就拉那个，要拿什么就拿什么，想逃避也无从逃避。住在闸里的人民，简直就是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囚徒，他们不独没有了做人的起码权利，而且连生命的保障也极难预测。防城所有参加人民武装的父母妻儿都已捉进监牢，凡被认为“匪亲”者的住屋都钉上了红门牌，有什么风吹草动，晦气就首先落在他们的头上。

大抢劫和大敲榨

保贼、团匪出发“扫荡”，其目的地的村庄不用说要被大抢特抢，猪、牛、鸡、鸭、谷米、杂粮、衣物自然一扫净光，镬头、碗、盆甚至谷围、箩蓐，也挑的挑抬的抬。一个“扫荡”的队伍如果是三百人，其中起码有一百名以上是强征来挑运赃物的民夫。能够吃得下的便就地剉了来吃。反动派的士兵也这样唱：“保九保九，食肉饮酒！”

“保六保六，餐餐猪肉！”“保八保八，日日鸡鸭！”

除此之外，国民党反动派还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抢劫。今年夏收和现在的秋收，保贼、团匪都到处出动抢割抢粮，夏收时，防城板蒙、 中的田禾被割去大半。上思的板嫩、那累、谭凭，绿滋被保贼、团匪一再抢割。那罗、那亭、百甲的老百姓把谷米藏到山里去，也被搜山剔谷抢个净尽，有些地方抢不走的，就索性一把火烧个净光。广西的保贼团匪还有特殊的一“手”。他们经常成群成群抢劫农民的耕牛，抢了之后，公然赶到大塘、小董一带发卖。一个保八的营长说这是上级命令，“藉以弥补军饷”云。粤、桂两省的保贼团匪又藉口“封锁匪区”，对于来往商人的货物任意抢劫，活动于钦防海面的“海上巡防队”实际就是一群“合法”的海盗，他们封了船劫了货，还说：“抢到你们怕，你们就不敢‘济匪’了”。所以有些未曾亲自尝过蒋[匪]一字军暴行的人，可能以为称他们为匪是出于互相攻讦，但是这里的老百姓却痛感到对于那些两脚野兽称之为匪还是太忠厚哩。

十万大山是出产桂皮和八角的，钦、防两县不少地主年中靠这两种特产作为收入的大宗。陈鹏（伪保九团团长）觉得这也是“财路”之一，于是藉口“斩山清匪”，强征民夫入山砍去桂树、八角树。种有桂山、八角山的地主发急了，走去求情说项，陈鹏又敲了大大一笔竹杆。

烧、抢、杀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里是分不开的。所谓“无人地带”的形成过程，就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惨遭杀戮。当保贼团匪在人民武装反扫荡战中受到打击的时候，他们变得愈加嗜血疯狂。防城那良一个龙钟老头只因趁圩买了几张白报纸，被诬指为人民武装的“采买”，立刻拉去杀头。上思桥贡有两个乡民在扫荡到来时因病走不动，被当做人民武装的病员，给生剜挖出心肝炒来吃了。上思的那良、那天，钦县的洞利，珙宁的三官区圩场，都有特地为悬挂人头而树立的杉杆。每逢有人头挂在杆上，杆下附近就站有一个保贼团匪，强迫过往路人驻足观看，规定要说一声“贼头”才准通过。因为这个地区里可以这样随便杀人，不久之前珙宁台马地方的团匪，就居然因财起意，杀了三个路经那里的商人把头挂起来。

灵山的伪县长黄质胜等反动派，杀人的花样更多。他嗾使一班土豪恶霸组织一个所谓“农民委员会”，要杀人，他就交给那班喝血兽去杀，并由那个“会”出一张布靠，说是农民“公意”要杀的。同时又收买“自新”变节分子，分布各个墟场的闸口认人，其奖励办法是认出一个人民武装的成员或者人民武装稍有关系的，杀了，可以得奖一斗米，那些狗为了要得一斗米，不知几许人民为之牺牲了性命。合浦半年来在扫荡当中，白石水一带地方，也同样被屠杀了大批农民。

保护人民利益的子弟兵

十万山区的人民武装是粤桂边境人民的子弟兵，半年来，他们在艰苦的反扫荡战斗中，把保护人民利益作为最大的任务。为了减轻群众负担，他们宁愿每餐只喝二三两米的稀粥，青黄不接期间，则上山采集野菜薯叶充饥。为了救济惨受蒋灾的老百姓，打开反动据点时所得谷米、物资全部交给农会分发。今年上思那齐百多户的农家，是靠这样解决了春耕的种子粮食的。东安乡、公安乡和钦县的贵洞乡，都靠部队的帮助渡过了最困难的日子。冬天到了，山区早寒，老百姓的衣被被保贼团匪抢光，马笃区部队拔除△峇反动据点时，先把缴获的衣被分给群众，全队的指战员自己缺乏衣被，夜夜靠烤火才能入睡。老百姓没有盐吃，防城部队从百里外设法运盐进来。山南扫荡最严重时，部队已经两三天没有得吃，中山里藏有八十多斗军粮，人民武装二十团团长沙鸿洲把它拿出来，全部用来救济饥饿的群众，部队自己宁愿吃野菜。老百姓得到米，不禁流下眼泪来，感动地说：“我们的苦命合在一起了，只要还活着，也跟部队干到底！”

粤桂边境的人民，就是这样在蒋灾所造成的饥饿、寒冷和疾病中，艰苦地战斗前进着。

十一月二日寄自北海

(原载《群众》第45期，1948年11月18日)

温 △ △ 致方林信

——关于干部任职的请示

(1948年11月5日)

方林：

一、四属与广西边境各县建立分委，我们提议欧初为分委书记，丁为副书记，黄其江则为政治部主任。

二、茂、电、吴、两阳等县边境山地，应为高州区的根据地，目前我们发展的主要方向，我们完全同意把两阳与茂、电、吴组织统一建立分委，我们提议罗涛经为分委书记，陈匀个为副书记。如同意，请即将两阳组织转给我们。

三、广西贵县廖联搞武装百余，他的关系属张云逸、雷擎天，请即电张、雷将廖关系转来。

四、我们建立一个光中（即张炎）团，由张炎侄张启彬当团长，我们认为叶春回来参加军团工作最为适当。如同意，请即转叶春返。以上各项，请复！

五、回南路干部如不能经湛、水东返者，即可经广西陆川转交通站来，地址如下：（原件无下文——编者）

六、军毡可由港到江门，再转水东闻信村，由港到江门有办法，我们由江门到水东可负责。请转△△加强港江线，我们将派人到港和他接洽。

七、关于加强农村斗争的指示中五项三节上段至必须照顾到群众，避免受顽军摧残为止，完全看不见，请即发指示原文希即抄一份由苏带返。

八、我们同意王克巫、南光校长回来工作，梁昌东知道巫的情形，

请转苏与梁研究，大批动员南路留港、穗人员回来工作。如他们离港，请指定专人负责组织动员工作。

温

十一月五日

梁致方信

——内部人员情况和工作情况

(1948年11月10日)①

(一) 湛江事件：起因：李石因收买的一班长暴露了而供石，石立即变节供了适及大骨王老五等，敌不断下刑迫供，扩大战果。大骨、适据说都承认自己的面目。吴安全，不日返港，王克已撤退到我处。希告陈信材即转广州程同志，着他不用撤退，这点意见希考虑。

(二) 符春茂、学叉、宋于二十六日带其手下便衣队十余人公开叛变投敌，事前我们已知道，把五团全部四十余人用拖到化南去的办法，使他们士兵逃跑，武器已全部留下，营长焕英及龙门仍在我队，表现还好。查宋（五团政委）二年前为敌捕下则已变节，早为特务，攻湛计划失败会为宋出卖（前我们得情报说有一高级政治干部为敌利用，可能即是宋）。现继续考察与宋有关人物，便衣亚进已枪决，亦为宋利用的。在宋叛变时，用诡计捉了我地方十余个同志，内有一名宋平，存有八月分局指示文件，同落敌手。

(三) 化州四团经整训后，士气大振，作战英勇。遂溪八团反而士气消沉，现进行整党，清出很多污点出来，为了平息众怒，三名同志要受撤职处分的（胡、陈、唐林、十一）。目前雷州工作中心在于整党，肃清个人主义、地位之争、无纪律等弱点。

(四) 请转杜，伦来后，陈仔不满，宣布停止学密更而消沉，以至发神经病，经调治后好些，但波长、符号忘记了，不能联络，希即重新约符号、波长送来。现敌对遂溪加紧进迫，为便利工作与安全计，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将到廉江继续工作，我仍在遂参加雷州的整党工作与地委会议，迟些会到廉江上面。

(五) 据派去与冯叔取联络的关仔同志及茂名、信宜书记高林同志反映，遂溪东进部队到了那边也是很不安工作。地方与外来不睦，在经济极度困难下，干部强调分等级享受，士兵吃盐，官长吃肉，打骂制度仍存在，以至士兵战斗力减低，枪向天烧，思乡观念普遍，这些现象都要注视的。又茂、电、信的工作与中区的联络极困难，他们要求与我处取联络。现我同意暂时用横的关系指导他们，待与中区取得联络后，才决定这地区的领导问题。

(六) 各地经济都极困难，在计划的经济制度下，以至民穷财尽。遂溪过去还能支持各地，但在敌之重点进攻下，税收征粮都减少自顾己不暇了，对四属的接济没可能尽更大的帮助。

(七) 钦防一交通来报告：十万大山工作极度困难，平原全为敌控制，被困守山地（他们听了李超同志传达后，把海防全部主力撤出，向山地去）。粮食全无，每餐二两米充饥，因而东征部队病员很多，原有七百余入现只有五百余，其中病了三分之二，托得枪的百余人，连、排级干部全病倒，饥寒交迫下已撤入安南。但安南亦极贫困，他们全体战士要求回遂溪来，并急待我们经济上的支援。照此情况，他们处境很危险，怎样解放（以下缺页——编者）来，长期没有地方党工作，一切干部集中在部队，部队干部、团长、副团长、正副政委、参谋长、情报作战、行军等参谋，无所不有。但地方干部由县到乡区级都无人。过去所谓地方基础，即我们能活动的村庄地区，实际没有一个人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所以在长期斗争中大多数没有一个农民党员，各村没有群众组织。但今年陈江到来后，开始注意地方工作，思想上有了转变，可是又保守，不放手去发动群众，替群众解决问题，这样发展又极缓慢。以上是最近的报告，目前正以总结过的，来教育全体同志，扭转局面。

(九) 陈华于四月时曾到遂溪见我，他回去后不和干部商讨工作，也不接见新派去的干部陈其江、汉英，而擅自去港。据他留下的信及当地县级干部反映：A. 他不满“大遂溪主义”，什么都是遂溪人统治；

B. 不满区党委如此处置他的地位问题，从前区党委派他去负责四属工作的，现在居然降低了地位，他不满；C. 他不满二叔问题如此处理，不应提其江做区党委，又是一切由遂溪人做“皇帝”。为此他要去香港“告党状”。他这种表现是不对的，希批评。

(十) 博白又一县委被捕，分局六月指示同落敌手。又听说陈华同志派去钦防联络的人要回合浦时又被捕，并失去报告，确否待查。

(十一) 交通站现继续物色中，临时的由程负责，可先带一批人来。另一交通由吴妻带往港，交通吴不日可返港。由于东海环境恶化，琼崖交通要暂时停止，待我把地点搞好后告诉你们。

梁致方

十一月十日

超关于南路十万山区工作报告

(1948年11月22日)

一、地区的轮廓

十万山区地跨两国（中、越）三省（广东、广西和越南的海宁省），山脉一半在中国境内，一半在越南境内，山脉由东向西，在中国境内的长约二百五十华里，南北宽约六七十里。根据部队活动，十万山区现在划分为三个地区：

山南地区——主要是防城县，包括钦县龙门港一部分。部队活动，在这次扫荡之前，已经控制了由东京湾海边的东兴、江平、企沙，光坡直至山脚的北基、北仑、扶隆、大植、大菜，几乎全县土地十之八九，只剩下东兴镇、那良镇和防城县城还留在国民党手里。海上由西起北仑江，东至西场，也在我海上部队控制之下。

山南地区横直有十万大山的支脉东山和南山，都是山形复杂，林树深密的，滩散中一带，和越南地区连成一片。防城一县人口约二十万，近山贫瘠，海边则富于鱼盐之利。县内地方势力最大的是陈氏家族（陈维周、陈济棠），现在的防城县长、县警大队长以及大部分反动地主都是这一家族的兄弟亲戚或老部下。海边一带的则是刘氏家族（刘镇湘家）。近山一带由于部队长期在那里活动坚持，影响较深，居民亦经锻炼；海边一带则是去年五月刘镇夏起义之后才开拓的。

山北上绥思区——包括上思之西半部，思乐之东一部及绥深县边沿。上思人口约九万，思乐约七万，绥深约五万。思乐和上思沿山一带都很贫瘠，但上思河以北及绥深都盛产米、黄豆和花生，山北有十万大山的支脉凤凰山和堂金山，但是都是稀疏的松树山和光草岭。思乐人烟稀少，每一小村相隔有三四十里，和一般县份比较，地主势力

不大。部队活动的是上思的凤凰、华兰、平福、公安及思乐之九村。

马笃山区 以十万大山最东端之马笃山为中心，包括防城之那天，钦县之洞利和上思的东安乡，东出珽钦路，南下防城，北上南宁，是个四战之地，历来是叛乱农民的根据地，钦防部队在艰难的日子里长期活动于此。那天、洞利本来都产米，经反动派再三烧杀，地方元气大伤，东安乡也全部受过烧杀，这个地区是老区，算得比较巩固。

路东区——以钦县的小董为中心，包括珽宁之三官区及灵山西部、合浦边沿，这地区长期有我武工队及游击小组活动，但因为敌之交通干线，地主势力较大，地区迄未巩固。

路西区——珽钦路以西，由钦县大寺以至防城的那天、钦县的洞利，东接路东区，西连马笃区，才恢复活动不久，亦未巩固。

路东、路西两区都属十万大山外围，地多丘陵，也有不连续的较高的山，这两个地区都比较富庶。

二、部队的近况

现在活动于十万大山的部队共三个团，各团的情况如下：

(A) 二十团——这团全部是防城子弟兵，内有四个营、两个直属连，第一营约一百二十人，大部分是由游击小组艰苦锻炼壮大的，成员都是山区人民，刻苦耐劳，长于山林战。营长陈生，是山区最优秀的营级干部。该营在山南、山北威信都很高。第二营约一百二十人，全部是海边子弟，多是刘镇夏起义时入伍的，全部是洋枪，吃苦精神较差，但素质还纯洁。以上两营是二十团的主力。第三营约八十人，全部是防城东部子弟。第四营约八十人，全部是滩地区子弟。这两个营成立时间较短，战斗力也较弱。直属第一、第二连都是老战〔队〕员，活动于海区和海边，今年六月尾海上大战之后有损失，人员确数未明。全团共约五百五十人。

由二十团领导的防城地武有：（一）茅岭大队，人数约七八十人，海区之战受挫没有减员。（二）那鹤中队，二十余人战斗力顽强。

（三）扶隆中队，二十余人，亦巩固。（四）长湖中队，三十余人，扫荡中被袭受损失，余十数人。（五）江平中队，扫荡中瓦解。（六）

英林队，三十余人。（七）竹林队，原系第五营，后协助越卫国团开辟海宁省工作，人数约五、六十人。

二十团军政干部：

团长——沈鸿周，防城人，家庭是大地主，参加武装斗争历史颇长，曾入越受训。

副团长——刘镇夏，防城人，蒋军六十四师师长刘镇湘之胞弟，起义时还是一个进步群众。今年六月候补期满转为正式党员。

政委——彭杨，穷苦家庭出身，参加武装斗争历史很长，曾入越受训。

政治处主任——黄之英，中大学生，工作积极英勇，今年在海区受伤一次。

以上四人均参加防城党的县工委，尚有一工委林任（宋森）负责组织工作，亦防城人，知识分子出身，历史较长之党员。

（B）二十一团——这团的基干队伍也是钦防子弟，是与二十团一样是从“农民翻身总队”分出来的。编为二十一团以后，才开过山北地区活动，吸收了当地的成员，所以便变成更习惯于山北活动的队伍了。该团内有两个直属营、一个直属连、另一个独立营，其第一营大部是老战士，久经锻炼，战斗力与群众纪律都好，是二十一团的主力。第二营有两个连，〔一个连〕是那天、洞利的子弟，一个连是上思子弟，所以地方色彩浓厚，经常坚持斗争于原来地区。二营营长黄焕华本一失意军官，又曾作半土匪活动的，在我部队最困难时入队，一贯坚持斗争，在该营活动地区内威信很高。过去领导上帮助他进步不够，所以还有落后观点。直属连也是老战士，活动于小董地区，作为维系各武工队的主力。独立营则全是上思的子弟兵，是上思县的主力队伍。三个营及一个连共四百二十余人。

由二十一团领导的小董区有四个武工队：海区龙门港有一小部主力及地方队伍五六十人，海区战斗受挫，海区地方队伍减员即很多。路西地区之游击小组是由第一营派出的。

二十一团军政干部：

团长——朱守刚，钦县人，钦州师范毕业生，小学教师及小公务

员出身，为十万山区政治修养最好的军事干部。

副团长——过去缺此职，目前拟提拔二营政委王旭林升任。

政委——卢文，合浦人，大地主家庭出身，党龄颇长，能力亦强。

政治处主任——林立，广西武林人，中学教师出身，原任横县十九团政治处主任（现决定调回原籍工作）。

独立营营长——黄富煜，上思人，知识分子出身。

二十一团由“农总”分团出来，开过山北活动。去年旧历九月发动上思起义，曾轰轰烈烈打开上思局面，除上思县城之外，全县圩市都已打开，普遍开仓分谷济贫，上思民众纷纷参加队伍，军威大振。后接合灵丁同志命令（一说是防城谢立同志误解丁同志信中意思而下命令），开拔东征合浦、灵山，在灵山受到挫折，牺牲营级干部朱守伦及曾作富（那天土匪领袖改造的，当时任一营营长，朱任政委）。去年年底，退返马笃山区，士气一度消沉，上思原有工作即全部垮台，要重头做过。

(C) 金克平团——该团是雷州西征队伍新三团之第一营（遂溪部队）及化县、廉江、吴川等县队伍组成（合成两个营）。遂溪队伍之苏营全部老战员，听说在遂溪时以善战〔出〕名，枪枝亦好。挺进十万山区后，不惯山地作战，挨不得苦，又兼怀念乡土，营、连级以下士气消沉，所以作战的意志和能力都大大减弱，患病人数很多，但开小差的现象尚少。廉、化、吴人员组成之郭营，因为成员刚从地武民兵中抽凑而成，又不少土匪、流氓成份，干部又弱，到山区后即长期不稳定，数度发生集体反抗首长命令，向东则行向西不肯行，大批逃跑，原二百余人，现除逃跑、生病外，只余八十余人。苏营则至今尚有二百五十余人，全团战斗员共约三百五十人左右。

金团军政干部：

团长——金克平，南路老军事干部，能力颇强。

政委——曲李，雷州人，能力亦颇强、与金未能密切合作。

该团长期在整训，最近精简后，抽出六十余人组成一个生产大队，从事生产工作。划归该团领导指挥的地方队伍有：上思的（一）凤凰队，七十余人，干部均为上思历史较老之党员，队伍较上轨道；（二）

平福队，三十余人；（三）公安队，二十余人。此两队多是土匪收编，极不健全，公安队之队长王秀权在今年六月底为多数群众控告奸淫勒索，公审后枪决，七月敌人扫荡公安区，两队濒于瓦解；（四）思乐之九特队，二十余人，亦未健全。

（D）横县独立营——本为横县起义后新编成之第十九团，撤退到雷州后又西征到十万山区。因为人数减少，故缩编为独立营，该营成员绝大多数为起义时临时参加之农民，甚至有乡中抽签应付加入的，所以政治素质很低，干部虽多党员，对党之观念亦薄弱，所以长期不巩固，但逃跑者尚少。经半年整训，现反较金田稳定。全营共二百余人，横南独立连包括在内，该营原以机枪多著称，拉出横县时，拥有机枪凡二十七挺之多，但除已调出其他队伍者外，该营保有者，由于不加爱惜，颇多损坏。

独立营干部：

营长——苏参，横县人，本一地方小领袖，党员，但政治水平低，能力亦弱，现只挂名义不负实责。

副营长——莫古，军校出身，党员，军事指挥能力颇强，现负全营军事实际责任。

政委——李丹，南京人，在广西桂林飞机厂当机械工人，党员，党性强。该营全靠他长期独力支撑维系人心。

山区全部部队的武器装备：

二十团：轻机十三挺，重机一挺，火箭炮一门（弹二十），冲锋机两挺，手枪约一百枝，步枪约六百枝（步、机枪弹药均缺乏，除“六五”平均有二十至三十发外，“七九”、“美厘”、“三响”等均只有四五发至十发左右，机枪每挺弹亦只四五十发）。

二十一团：轻机十六枝，重机一挺，轻重机一挺，冲锋机四挺，汤姆生一挺，手枪约五十枝，步枪约三百五十枝（弹药情况与二十团相同）。

金团：轻机五挺，掷弹筒两个（无弹），轻重机一挺，手枪约二十余枝，步枪约二百五十枝（全部洋枪多，弹药只五发至二十发）。

横县独立营：轻机六挺，手枪十余支，步枪一百五十余支（全部

土造，弹只三五发）。

合计：轻机枪四十挺，重机机两挺，轻重机两挺，冲锋机六挺，汤姆生一挺，掷弹筒两个，火箭炮一门，手枪二百支，步枪约二千支（连地武）。

部队的指挥机构：十万山区的部队，原定计划是建立一个第四支队，支队部的人员是：

支队长——黄岗（即谢立）合浦人，长期在钦、防工作。

支队副——黎文雅，南宁人，东纵工作一时期调至南路任团长，入越后派回工作，实战经验丰富，惟指挥全局能力较差。

政委——陈明江（即陈江）防城人，抗大毕业，长期在中区新鹤工作。

这个机构一直没有公开，同时因为部队分区活动，故亦不起支队部指挥全局之作用。

部队的活动地区：二十团活动于山南地区，旧历五月后，第一、二两个主力营开过山北向外发展，进入珙宁三官区一带活动，后又退回山北。八月中旬以后，第一营开回山南，第二营及一营一部分开向上思之西。

二十一团活动于马笃山区及路东、路西两区。

金团活动于山北上绥思区。

横县独立营原在山南整训，旧历五月跟二十团一二营挺进山北，在上思活动。

三、党的组织及工作

四属工委：陈明江及谢立率领西征队伍到十万山区后，成立四属临时工委，由陈明江任书记，尚有两负责人就是谢立和陈华（即小丁），陈华留灵合，故实际只得陈、谢两人。旧历八月将灵合一带划出，成立第三支队，另设领机。故于九月总结半年工作之后，改设临时十万山区工委，仍由陈明江任书记，工委人数扩大，除陈、谢二人外，加多彭杨、朱守刚、卢文、陈发（东莞人，王作尧之兄弟）、黎文雅等人，陈、谢、朱为常委。十万山区工委之下设三个县工委：

(一) 防城工委 彭杨任书记，林任任副书记，其他工委是黄之英，沈鸿周，刘锁夏，彭、林、沈任常委。

(二) 上绥思工委 陈发任书记，曲李任副书记，其他工委是严秋（二十团第一营政委）、金克平、李源（原十九团团长），金克平、陈、曲李、李源任常委。

(三) 马笃区工委 卢文任书记，朱守刚任副书记，其他工委是林立、王旭林，张辰（二十一团第一营营长，现路西区负责人），卢、朱、林任常委。

防城的党的工作：

防城党的工作的特点：第一是领导干部党龄较长，经过锻炼，故对于坚持艰苦斗争起了骨干的作用；第二是这些干部都是土生土长的，和本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第三是防城党和武装斗争不可分，并在武装斗争中发展起来；第四是部队党已有一定数量的发展（两主力营党员约占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地方党在山区一带亦已建立比较普遍的支部和小组，这些支部和小组在反扫荡斗争中起了坚持的作用；第五是党员成分大多数是雇贫农。

其弱点则是干部由于长期没有得到领导上的教育和帮助，所以政治上比较落后，作风也是老一套，支部小组新成立者多，还没有进行经常的教育工作（部队党及地方党均同此情形）。

传达讨论了“二月指示”之后，防城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刷新，干部的信心坚定，积极努力，在反扫荡战斗中起了决定的作用。又由于坚决进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在艰苦的反扫荡战斗中考察、吸收积极分子入党。所以地区虽然缩小了，党员的数量却仍〔比〕旧日有增加。

上绥思区党的工作：

除上思的凤凰乡之外，上绥思区其他地方是金团开去之后新开辟的。上思党的组织过去有点基础，目前在地武凤凰队中负领导责任的都是党员，他们都是上思的知识分子，未入队之前当乡长、中心学校校长等的。不过他们政治水平比防城的还低，如反动派目为上思土共领袖的林克，亦对于党的政策、主张毫无所知，比一个积极的进步群

众也不如。其他地方，党的组织还未建立，形成空白一片。部队党则除金团苏营有一定数量党员外，郭营只有一些所谓“特别党员”（南路特有的，都是些顽皮捣蛋的，当时给以“党员”名义，是想其不敢再坏云）。所以对于发展地方党帮助不大。目前加强该区群运工作的干部和领导，希望以之发展地方党。

马笃区党的工作：

马笃区党的工作由两方面合成，一是钦县干部在小董起义失败后到这区来开辟的，除上董留下来的种子之外，绝大部分力量集中在二十一团内，从部队党来说，二十一团做得最健全，发展也快。去年“农总”时代，千余指战员中只有七个党员，但是现在二十一团中党员成分已占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以上军政干部是党员。另一部分则是上思东安乡原有的党的基础，即现在独立营的黄高煜所领导的本地党员干部，成为独立营的主要支柱。这一区的地方党工作，以小董一带做得较好，上思地区还有不少是空白的。

整个山区的党的工作：

整个十万山区的党的工作，一般说来，可以指出如下各点：（一）部队党发展得比较好，地方党发展则差；（二）地方党的发展又不平衡不普遍，山南及山北之东端小董一带做得比较好，其他地区尚多空白；（三）由于过去长期失却领导，所以干部政治水平低，党员更低；（四）因为组织生活不健全，缺乏党内教育工作，所以自由主义的倾向颇为普遍；（五）由于领导中心过去长期未有建立，部队又分离独立活动，有些单位（如上思独立营）发展了颇为严重的山头主义的倾向；（六）各部队未有专门负责组织工作的干部，所以妨碍了党的发展，好些在斗争中数年来都表现得忠心耿耿又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还未有教育吸收入党。

因此，十万山区党的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加强干部的教育，加紧进行整党工作，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四、群众工作

十万山区全部工作当中，群众工作是最薄弱的一环。

做了些什么？在九月总结以前，整个地区的群众工作是没有明确的方向和整个计划的，各个地方的群众工作都是比较零碎的。

防城地区：在部队重新恢复活动至海边起义这段时间，普遍做了开仓分粮。但是那时一面是十足的恩赐观点，一面又大吃大喝，群众并未明显得到什么好处（如防城那湾村，数年来一直积极帮助我们，最近在敌人扫荡中他们“变”了，也坚拒我们到那里活动，理由是“跟你们几年，没有得到半点好处，但是苦处就受到不少了”）。去年十月扩大会议总结过去斗争之后，普遍进行群众观点的教育，各处分头做了一些减租减息的工作，群众的积极性稍为提高。因此，山区一带都组织了农会和民兵，半年反扫荡斗争中，沿山一带的农会、民兵起过不小的作用。今后五月以后，防城把保卫夏收的工作和反扫荡斗争结合，在这一斗争中进行农会、民兵的整理。防城群众工作开始走上有计划的发展。

板蒙（一条小乡，有十余小自然村）在年头分了田。当时本地干部反对，认为条件未具备，但由香港回去的几个女干部极力争持，结果分了。分了田之后，农民积极性确实提高了，只是忧心保不稳。由于该处的田，地主都是远在六七十里外的，所以当时未有什么大反响。到扫荡时，蒋匪入了板蒙，就有一个小地主当了反动，他说是为了报分他的田之仇。此外其他地方未有分田。海边发动过盐工偷盐，山地发动过农民剥地主的桂皮，不过都是个别的，并不普遍。

现在防城地区集中力量保护群众利益，使能减少蒋匪的摧残。减租减息的工作暂时未去进行，因为那里的群众在蒋匪搬村、围阄、烧杀、抢掠之下，最迫切的是生存问题。只有能打退蒋匪的进犯，保卫得住田禾、粮食和生命，其他的才能谈到。

上绥思区：上思思乐地方，在去年九月二十一团上思起义之时，全部谷仓已开光了，金团开到那边，主要是做反三征工作。今年五月以后，曾开始在个别地区展开清算恶霸（多数是蒋朝的乡村保甲长），并有颇好的成绩。但是这一工作才开始不久，敌人即扫荡那个地方，部队转移，工作陷于半停顿状态。

马笃山区：上思各乡都由二十一团开过仓分过粮，人民对二十一

众也不如。其他地方，党的组织还未建立，形成空白一片。部队党则除金团苏营有一定数量党员外，郭营只有一些所谓“特别党员”（南路特有的，都是些顽皮捣蛋的，当时给以“党员”名义，是想其不敢再坏云）。所以对于发展地方党帮助不大。目前加强该区群运工作的干部和领导，希望以之发展地方党。

马笃区党的工作：

马笃区党的工作由两方面合成，一是钦县干部在小董起义失败后到这区来开辟的，除上董留下来的种子之外，绝大部分力量集中在二十一团内，从部队党来说，二十一团做得最健全，发展也快。去年“农总”时代，千余指战员中只有七个党员，但是现在二十一团中党员成分已占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以上军政干部是党员。另一部分则是上思东安乡原有的党的基础，即现在独立营的黄高煜所领导的本地党员干部，成为独立营的主要支柱。这一区的地方党工作，以小董一带做得较好，上思地区还有不少是空白的。

整个山区的党的工作：

整个十万山区的党的工作，一般说来，可以指出如下各点：（一）部队党发展得比较好，地方党发展则差；（二）地方党的发展又不平衡不普遍，山南及山北之东端小董一带做得比较好，其他地区尚多空白；（三）由于过去长期失却领导，所以干部政治水平低，党员更低；（四）因为组织生活不健全，缺乏党内教育工作，所以自由主义的倾向颇为普遍；（五）由于领导中心过去长期未有建立，部队又分离独立活动，有些单位（如上思独立营）发展了颇为严重的山头主义的倾向；（六）各部队未有专门负责组织工作的干部，所以妨碍了党的发展，好些在斗争中数年来都表现得忠心耿耿又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还未有教育吸收入党。

因此，十万山区党的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加强干部的教育，加紧进行整党工作，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四、群众工作

十万山区全部工作当中，群众工作是最薄弱的一环。

扶隆等隘路，本来收入都很大（北基隘三日一圩可收西贡币六七千元），防城队海边起义时，没收了大宗官僚资本的盐斤，得到巨款（听说用几个大皮急担了银币行军）。可是由于粗使滥用，没有长期打算，结果部队经常都在担心没有给养的恐慌中。

征粮工作：军粮的征收工作，过去没有统一的标准，都是根据估计来征收的。又因地方部队各自筹粮，所以征得很混乱，防城在今年四月时，队伍集中过多，去秋征存的军粮已经吃光，于是出之借粮。后来吃到山居的民众也没有粮食了，弄成很严重的局面。山北则由五月到现在，粮食问题都很严重，夏收时征得的军粮随征随吃，征完也就吃完，以后有时买粮，有时以牛换粮，用土造步枪换粮，无办法当中则借粮。结果有些地方弄到借无可借买无可买，有些地方这部队征完，第二个经过又征，有征至三、四次者。所以征粮多而又重，把军民关系都搅坏了。领机一再为改善征粮工作发出指示，并进行干部教育。由于队伍堆积推不出去（主要是西征部队的那八百多人），征粮困难问题，始终未有好好改善。

税收工作：过去税收以海区收入为大宗，二十团、二十一团的绝大部分经费都靠海区税收维持。海区工作垮台，全区经济情形就非常严重，金团及上绥思区经济的扼住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都是靠北基隘的税收。但是敌人封隘以后，那第二大宗的税收也没有了。其他好些水陆交通线，过去没有注意到搞税收工作，现在才着手进行，成效还不大。造成今天的困难，主要是没有长期打算的眼光，没有经济制度，你搞得你使，我搞得我用，贪污浪费的现象很普遍（如北基隘税收过去由地方队伍收，几个月只缴了二千万元给二十一团团部。但整理过之后，每三日一圩，收入达六七千元西贡币）。同时由于各自为政的结果，海区税收就很混乱，二十团与二十一团争，二十四团由合浦跑过来又收，结果发生不少争执，造成嫌隙。税率一般是在百分之五以下，但没有很好执行税收政策，来往商人是不很满意的。

其他收入：除征粮、税收之外，部队出击反动据点没收反动头子谷米、牛只，也是经济来源之一。主力队伍对此还算审慎从事，地方队伍就有为了作经济出击而不大顾政策的事件。还有就是派出经济队

入越搞非法经济，不过这也不是可靠的经常收入，而且一弄得不好，影响就很恶劣。

生产工作：九月总结之后，决定了发展生产，规定所有后方工作人员及家属一律开荒种菜、种杂粮，又从西征队伍中抽出精简下来的人员六十余人组织一个生产大队，分成种菜、竹织、造木、种罌粟等组。罌粟由队员家属合作种植二万株，如能收成，可得二千两，值西贡币五六万元，可以减轻山区群众的负担。但是生产工作能否收获，主要看今后反扫荡斗争能否取得胜利。

六、政策的执行

这个地区过去由于长期没有得到直接领导，干部政治水平低下，队伍中有一部分是由土匪改造的，而阶级斗争在这一带又一向非常尖锐，农民对地主、官僚、恶霸怀有强烈的仇恨心。所以对于政策的执行，一向都做得很差，甚至不知什么叫做政策。传达二月指示以后，加强干部的政策教育，当时就有很多干部这样反映：“有了政策，现在可难做了！”

对于今天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干部们从来是不知道的，也没有人好好地对他们说。加上“速胜论”的影响很深，所以这个地区政策的执行，一般说来是过左的。

红白对立，普遍树敌。在山北上思、钦县洞利，防城那天等地是显著的例子。那里红白对立十分鲜明，村庄要不是完全拥护我们的群众村，就是围闸固守与我为敌的反动据点，找不到保持中立态度的村庄。这固然一方面由于蒋匪故意造成（他们也逼勒村庄坚决与我对抗，扫荡时带了他们来抢掠我们群众村，制造相互间的仇恨），而我们自己不懂得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则为主要原因。防城方面，本来刘锁夏、沈鸿周等人的社会关系，原可展开对许多村庄士绅的争取工作，使他们同情我们，暗中帮助或保守中立。但是我们做得不好，因为一贯不注意也没有做统线工作。上思我们有前县参议长黄维章、有好些乡长、中心校长参加，也可以大大展开统线工作。但是打击对象选择得太无原则，对敌人阴谋未能经常揭发，人家对我稍有违逆（好些是

被迫的)，我们就打人。防城那天、钦县的洞利，我们所收编的土匪队伍，曾损害过不少的村庄，我们没有向人解释、道歉或赔偿，反而时有继续侵犯各阶层的利益，所以就普遍树敌，红白对立。这样的结果，便利了敌人，他可以挟同了那些村庄和他一起来打我们、困我们，而我们的发展推广就受到很大的限制。二月指示传达后，各地区各部队对统线工作比较注意了，如推进珙宁三官区时普遍宣传解释我政策主张，广泛发信各地方士绅登门拜访，结果各村庄与我为敌的现象就少了。上绥思区对政策的掌握也较好，他们开入公安乡公安圩时，对于该乡有名望绅士黄宝庭的家产、家人加以保护照顾，等到敌人进占公安时，黄就仍然对我采取友善关系。

关于打人杀人：对于打人杀人，过去也没有当为严重问题来处理，防城部队对于锄奸政策执行得不好，捉住了小小的特务就吊打，并加以枪决或用绳勒死，同时没有经过一定的审讯和上级的批准，所以杀人的数目不算少（今年五月因查获陈克强派入队伍内企图放毒和勾结士兵逃跑的女特务，就一连杀了六七个人）。尤其在初期，因为杀人比较随便，以致后来争取工作就增加了困难。马笃区对于这个问题，其第二营做得最不好。好些时候，该营营长黄焕华自行杀人，并不先向团部报告，杀得也滥。该区有些反动据点被围攻时死也不缴枪投降，就是害怕被杀，所以硬拼到底。二月指示传达后，一般负责干部对这个问题已引起注意，并规定杀人要经团部或县工委批准，过去滥杀的现象已大大减少。一般说来，主力部队对此问题做得好些，地方部队做得较坏。

对工商业和税收政策：侵犯或损害工商业者的利益的事件还比较少见，各隘路的地武民兵，对于两广商人往来，也尽了保护之责（当蒋匪到处劫掠时，我们冒很大危险也保护客商货运往来）。我队所到之处，土匪即告绝迹，这是商人所公认为好的。上思东安乡在部队帮助之下成立了一个圩场，完全为了便利人民以有易无，流通经济，不收分文税收，使那个圩场一成立就很繁荣，打入圩场，也未有乱拿商店东西的坏现象。税收方面，上面已略为提过，税率都在百分之五以下，比国民党为轻。但是我们收之时，不能把蒋匪赶走，以致商人有

“一只牛剥两重皮”之感。又因税收人员缺乏政治教育和好好的领导，所以就有不满和怨言，征粮政策则是搞得最糟的，也是最严重损害军民关系的问题，那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七、检讨和总结

地区的优越条件：十万山区位于两国三省的边界，是统治者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又有山高林密的山脉为依靠，在地理条件来说是比较优越的，过去历年叛乱农民以之为巢穴，并非偶然，我部队在困难时可以挨得下去，当地干部也承认，得力于地利者颇多。山区内面虽然贫瘠，但是南下防城平原，则面临东京湾，有鱼盐之利的海边区；北过上思河，上思绥淶都是产米之地，每年那里供给广东不少的粮食；西与越南相连，那里可以和国际友军越盟部队取得配合联络；东出钦县接合、灵，可与我南路兄弟队伍携手；东北上南宁，威胁敌人桂南的统治中心。钦、廉四属民情顽强勇敢，是广东著名出军人的地方，桂西南一带，过去也有过农民斗争的光荣传统。只要解决给养问题，是不愁没有兵源的。

过去工作的优点：

（一）十万山区能够开辟成今天略具规模的局面，坚持当地斗争的党员干部的努力是决定的因素。他们在敌人疯狂清剿，没有上级领导的黑暗环境里坚持斗争，不灰心不气馁，点滴积聚力量，团结群众，结果星星火种（“南解”入越后，这里山南只留下七个人的游击小组，山北只有几个干部到马笃山去依靠土匪、马帮），又春风吹又生，烧旺起来。

（二）能够乘敌空隙，放手大搞。去年三四月防城敌人空虚，就组织海区起义，攻打防城县府，打东兴，扯起大旗，到处号召民众斗争，数十人的队伍就迅速发展至千余人。五月至九月的扫荡缩了一些，十月敌调走又大胆进攻，结果控制防城全部之十之八九。两次大搞，把地主武装大部解除了，一方面壮大了自己，一方面使敌人要再次扶植反动地主武装也不容易。上思去年九月起义，也是乘敌之隙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建立了山北的立足点。要不是领导上错误地命令二十一

团东征，上思山壮的局面可能与今天不相同的了。

(三) 普遍武装民众，建立地武民兵，造成浩大声势，到处有我旗帜，有我队伍。纵使那些队伍成份、目的都不很纯正，但只要他们一致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反动派就到处觉得荆棘满途，势力孤单。而我在大量动员参军当中，使部队真正变成当地人民的子弟兵，熟悉情况，和群众有亲密关系，队伍就生了根，牢不可拔。以现在情形来看，山南的防城，山北的上思东部，如果我们不犯大错误，敌人是不易拔起我们的根的。

(四) 坚决打击削弱敌人，在斗争中求发展。这个地区的部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敌斗争，大的仗，小的仗，不停地打敌人，没有消极避战，没有对敌人生过幻想，所以没有被困难所吓怕。那里的干部都惯于这样说：“我们挨惯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几次扫荡，磨来磨去，还是敌人磨输了。

(五) 培养了相当数目的本地干部，负责干部在当地群众中都有很大的威望，成为当地人民斗争的旗帜（如防城的沈鸿周、刘镇夏、上思钦县的朱守刚、卢文，建立了相当数目的队伍。这个队伍并各有一部分主力，地区开拓了山南、山北，东西两端可以打通往来。在较老的地区，群众组织和初步的民主政权已建立起来，虽未整理，却已有了粗略的规模。

(六) 有艰苦奋斗的作风。战士非常能吃苦，经常在饥饿、疾病中战斗，只要两顿吃得饱就可以跑路、爬山、打仗。别些地方的部队认为不能缺乏的毡被、鞋子、毛巾之类的东西，他们没有也安之若素，干部能够和士兵同甘共苦，营长、政委行军背重武器，已是平常得很的事情。因为有这种好作风，所以挨得苦日子。

过去工作的弱点：

(一) 在“速胜论”支配了领导干部的情形下，以为斗争很快就会取得胜利，所以有去年“三月集大队，四月攻城市，五月建立政权”之说。而在工作布置则一律采取完全一面的，公开割据的，红白对立的，地区一样化，斗争方式，组织形式一律化，大吹大擂挂大招牌，过早暴露力量，结果敌人集中力量进攻，自己没有了可资掩蔽和迴旋

的余地。

(二) 部队发展做到了普及，但忽视了提高；群众工作有了粗略的规模，却没有再加精雕细刻，求其深入。如防城部队去年最盛时，超过一千人，没有加以巩固，结果又缩小了。今年防城地武也有大发展，没有加强干部掌握，没有加强政治教育，扫荡到来，好些又垮了。上思和思乐的地武，大都是土匪收编的，没有抓紧加以改造，以致成份非常复杂，纪律很差，做坏事多过做好事，甚至被反动派引诱而叛变。上思东安的农会、民兵虽有相当数目，〔但〕充实整理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就未能大大发挥其效能。

(三) 缺乏长期打算，缺乏计划性。顺利的发展时没有准备发展中的曲折，困难时期又被眼前的困难迷住了、缠住了，不作局势转变时的打算。所以部署工作只是照顾眼前，拖一程算一程，情势改变时又迫得另来一套，这在经济问题的处理上，各种地区及据点工作的经营上最为明显。

(四) 少与外界接触，无由互相观摩，在不自觉中养成了保守思想。对于草创简陋的情形，安之若素，不作进一步提高，精益求精，部队本身是这样，战术使用上亦是这样（如只会打伏击，不想学会打袭击）。单纯军事打天下的观点，不重视政治工作，地方群众工作等缺点，也未决心克服过来。

半年工作总结（由今年旧历三月至八月底）：

敌人今年对十万山区的扫荡，由旧历三月开始，“二月指示”是在旧历四月底五月初传达的，到八月底，敌人在山南的扫荡已经达到顶点，在山北的则已停顿下来。这个时候，十万山区工委召集干部开了一次半年反扫荡工作的总结，结论要点如下：

(一) 敌人的扫荡在三月开始，当时主要锋芒集中在山南地区的防城。在滩洞地区几次大规模的伏击战中把他杀伤相当数目之后，敌人退了回去整补并增加兵力。到五月初又开始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那时春荒到来，我方部队及工作人员粮食发生困难，形势颇为严重。

“二月指示”传达以后，鼓舞起全体干部的情绪，大家都雄心万丈，跃跃欲试，使对于粉碎敌人的反扫荡有了充分的信心，各部门的工作

都作了新的有计划的布置，这对于克服困难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好好地调查研究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去执行“二月指示”。相反地把“二月指示”教条主义的来了解，拿指示里对于全国形势和南方形势的分析当做本地区的形势实况，所以对于本地区的形势作出主观的直线顺利发展的估计。忽视了在全国形势的发展当中，南方形势尚有其特点，在南方来说，还是敌强我弱的游击战争的环境。而四属十万山区，则正在敌人重点扫荡之中，我们本身也尚多困难，部队庞大而不巩固，人民在敌人残酷烧杀之下，粮食缺乏，春荒严重，如果不做好本身的巩固工作，无由争取更大的发展。因此，当时应该在巩固中求发展，领导上要以大力来进行部队的巩固工作，党和群众的组织的整顿工作。另一方面则派出熟悉情况、有地方关系的工作人员及精干的武工队，广泛向外围活动打基础，一步一步地扩大山区外围，冲破敌人的包围封锁。可是我们没有那样做，我们见到眼前两种情况：(1) 敌保九团及七个警察中队全部兵力压向防城来。(2) 防城本身山地一带堆积队伍太多，民食、军食万分严重，于是作如此打算：把主力打出外围，调动敌人兵力，减轻防城山区负担，并开辟新区工作，粉碎敌人包围封锁的企图，减轻山区群众负担，到新区去求战、求食。而对于防城本身的坚持，则过分估计自己的地方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力量，以为主力抽出之后，留下的兵力也可以坚持（防城干部本身也如此估计）。所以当时决定的方针虽然说是“巩固山区，发展平原”，但是整个指导精神是忽视了巩固部队，巩固山区的工作，拿了几个主力营就向不十分明了情况的地方打出去。

(三) 打击去的方向，当时决定是东方和东北方，以为那个方向可以和合、灵的部队取得配合联络，并威胁保九的后方，使他们不能不分兵回去。兵力的具体部署是：二十团的第一、二营开过山北，通过上思的东北四乡打出珞宁的三官区；二十一团的第一营由上思东安乡打出小董，恢复路西区的工作，和二十团一、二营相呼应；金团苏营由上思公安过上思河，打出绥淥，向三官区发展以图打成一片，扩大山北外围。部队的活动决定了保持一部主力，其他分散以连、排为

单位撤出去，在新区里的口号主要是反三征，反对蒋政权。五月中旬各部队陆续挺进，而且都先后到达目的地了。但是除了小董区二十一团原已留有武工队活动，且挺进的干部战员不少本地人，熟悉地方情况之外，三官区和绥淶都没有关系。结果二十团一营出去十多天，遭遇敌人进攻，干部无信心，退回了上思来；二营继续坚持了个多月，敌人苦苦相缠，部队弹药极缺乏（七九打到没有了子弹），人员疲乏，结果留下一个武工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就退回来。挺进绥淶的，也是一出去不久就连续战斗，地方情况完全生疏，队伍畏战，转动了个把月，也退回上思。只有二十一团一营在小董站得较稳。打出去的计划不能完成，队伍反而弄得十分饥疲，弹药消耗，病员众多，而且发生老战士也逃回家乡的现象。各个部队退回上思，则又增加上思老区的负担，粮食是吃一顿愁一顿。

（四）防城的保九却没有调动，并且乘〔我〕主力抽调之后，猛烈进攻山区。第三、四营作战受挫，地武没有主力带领作战失却信心。敌人随即由集中转作分股进犯，到处分兵把守，并打围剿，烧杀群众，诱降自新，加强特务活动，同时烧山斩树，开辟公路进入山区。好些未有十分巩固的地区群众变得害怕，不敢近我，老区群众只有缩山或逃亡。在这当中，干部虽然不断带领队伍打击进犯的敌人。然而队伍战志消沉，发挥的效能不大，防城地区因此敌的据点和控制地区都扩大增多了，我的地区则大大缩小，以致伤病人员、家属及部分群工人员都不能退过山北来。旧历七月初六，敌从尤州调多一个保六营来，配合原有的一个保六营进攻公安九特地区，并加以盘踞，金团大部撤向马笃区，在狭小地区内，粮食问题更严重了。

（五）在军事指导方针上，虽然也指示必须广泛发展，外线作战，不要过份集中主力，要注重做群众工作等等正确原则。但是由于总的方针有毛病，部队出到情况不明的环境里作战，没有武工队或游击小组的配合，没有地方关系，敌人进攻时就被迫应战，而且不敢分散，愈不敢分散粮食就愈困难筹措，行动就愈不灵活，就不能不陷入被动的境地。和原来的主观意图完全相反，队伍拖疲乏，弹药消耗掉，无法进行群众工作。

(六) 党的工作，群众工作等等，半年来都是有了进步，获得成绩的，但是由于军事局面打不开，大部队堆积在狭小的地区里，单为筹措粮食花去了所有干部的时间。其他工作与其人员，在粮食恐慌之下，受了大大的影响，不能按照预期的计划进行。

(七) 所以总起来说，半年来，在敌人的重点扫荡下面，敌人的力量除防城比较强之外，一般说来，敌人并不怎么可怕，他们能够给我们的打击并不十分严重（正因为打不到我们，他就专去烧杀群众，破坏我们的群众基础）。今天的困难，与其说是由于敌人的强大，还不如说是由于我们主观努力不够，特别是领导上的错误所造成的。

八、目前工作

旧历九月做了半年工作总结以后，集中各方面干部反映研究了各个地区部队、党务、群众等工作的实际情况，计划并布置了今后三个月内的工作。

(一) 首先对于山区及其周围的情况，根据各方所反映的情报和材料重新作了估计，认为敌人的半年扫荡计划到新历九月底虽已期满，山北敌人又开始调防和采取守势。但是由于十万大山对南路敌人的威胁，加上美、法帝国主义者的策动，敌人对十万山区的进攻决不会放松的。而且山南的斗争已进入严重阶段，除非我们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扭转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扫荡与反扫荡战斗还要继续下去。

至于对十万山区这个地方，由于地理条件的优越，我又已打下了相当巩固的基础，是可以坚持下去，继续加强。作为发展平原，支持环山地区斗争的一个根据地，所以山区虽贫苦，决不能轻易放弃。但是枯〔孤〕守山地也不是办法，必须扩大山区的外围，首先是把山南、山北四周完全确实控制起来，造成山脚的广阔走廊，使山地不致于孤立，同时就要积极设法到外围县份做开辟点线的工作，逐步把它连结起来，扩大外围的面。

这样，过去忽视山区的巩固工作的倾向必须纠正过来，那种主观主义地不作周密调查布置，急躁地向外边乱冲的倾向也必须纠正过来。

所以决定今后的方针是“坚持山区，巩固部队，积极发展，扩大外围”。

(二) 无论坚持山区也好，发展新区也好，必须把部队巩固起来。金团和横县独立营都不稳定。二十团的第一、二营转战半年，队伍十分疲劳，政治工作也时时停顿。留在防城的部队在敌人残酷扫荡下，也很不稳固。二十一团虽比较好些，但也要休整，要补充训练。如果不正视队伍本身的巩固，难以胜利地负担起反扫荡的任务。那末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目前的工作，把巩固部队，加强军事政治教育，争取战斗空隙进行休整补充，特别是解决寒衣和病员的医治问题，决定用最大力量去进行。部队的战斗位置重新调整：二十团第一营是东山区的子弟兵，于八月中旬开回山南加强对敌斗争并争取休整条件。第二营开到滩地区沿中越边境活动，保护北基隘的税收。金团把人员精简之后开回山北西面公安一带地区活动，病弱人员争取入越境疗养（数目达二百余人），队伍则与左江支队取得联络，以便获得回旋余地。二十一团则和山北东区民众合力保护秋收，求得下半年山区的粮食的解决。同时，并决定在此时期内，尽可能争取以三分一兵力活动出去牵制打击敌人，保护三分二兵力机动使用并从事整训。

(三) 群众工作的加强，首先要求部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斗活动均须极力避免损害群众利益，不要引起群众遭受摧残（未能为群众做出好事，最低限度先做到不损害群众，不贻累群众）。要教育部队普遍进行群众工作，地方工作人员，着重地方知识分子的教育培养，使他们成地方工作干部。因为这个地区语言复杂，外来干部不通过本地干部是难以开辟工作的。鉴于过去群众工作没有专人负责，决定在各个地区的工委（团的团部）内推出专人负责。

(四) 按照敌情、我情、民情等实际条件，仔细研究来决定各个地区的斗争方式、组织形式。即是说，那些山地老区，地理条件较好，民众坚决，我部队可以在那里公开号召打击敌人的，仍旧以“红区”姿态出现，作为号召群众斗争的中心堡垒（如防城的东山区，山壮的东安区）；那些群众条件虽好，我力量亦有基础，但敌人大军压境，务必使之屈服而后已的，我们便采取“诈死政策”，及早布置两面工作，以白皮红心来保存力量，极力争取主动“转变”；至于新的地区，

极力避免过早暴露，避免一面化，尤其是接近敌人统治中心的地区和位置于敌人交通线的地区，我们要用来掩蔽之用的地区，都采取灰色多样，避免敌人的注意和摧残。这种种不同的地区划定了之后，各项工作和政策有了标准，使干部不致左右摇摆。

(五) 但是一切决定于党的工作，党的领导的加强。部队党已发展到一定数量的，充实支部生活，加强党内教育，使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鉴于今年“七·一”纪念时提出开始“三查三整”的号召没有好好执行，决定整军、整党同时开始。但是先查干部、先整干部、地方部队、民兵、农会的党的组织必须建立，干部要亲自动手去教育干部发展党员，各级领机要抽出忠诚负责、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专门负责组织工作。十万山区工委、各地区工委的负责人重新调整，吸收熟悉当地情况、有斗争经验的老干部参加领导工作。继续发动各级干部对半年来（可以涉及到过去任何时期）的领导发表意见，深入进行总结经验，并将总结所得，作为干部、战员及各部门工作人员的训练教育材料。

九、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目前，十万山区有几个急待解决的困难问题：（一）寒衣问题。山区早寒，九月天时已经结霜了，由于地方贫瘠，战士久无衣服补充，天热时已经破烂到衣不蔽体（如独立营几十个战士因裤子太烂，白日不敢外出见人）。秋风起后，已露瑟缩之态，到了九月初，病后体弱的病员冷死了二十多人。目前，甚至团级干部也没有冬衣和军毡，战士住在屋里还可以烤火取暖，但是出外公差勤务根本就没有办法支持。尤其是西征过来的金团和横县独立营，他们生长平原，不耐寒冷。寒衣问题不解决，则无法稳定他们的情绪，把队伍巩固下来。

现在，进行解决采取下面几种办法：（1）准备袭击敌人一个储有军衣的据点，如要找到攻坚地雷就可能动手；（2）和蒋匪争夺隘路税收，把税款全部用作购造寒衣之用（北基隘已抢回来，蒋匪又不准商人来往，现状如何未知）；（3）到港和入越筹措款项。

（二）医药问题。过去整个地区只有两个医生，但是没有一副治

疗器具，也缺乏药品，夏秋之间疾病痢症的盛行，几百病员无药治疗，躺着把健康都弄坏了。以后没有补养，身体就无法恢复元气，成了长病者。伤了时，没有止血止痛药，眼看白白流血，展转呻吟，影响士气甚大。西药本来还可以买到，只因没有钱，消耗量又大，所以结果唯有靠草头医生找草药治疗（也治好了好些人），不过有些伤病吃敷草药是无效的。目前山南病员转到了山北，山北病员达三百余人，单为了找米他们吃已经十分不易，药品更未有办法解决。如果有可能，我们请示领导机关调些医生和卫生工作人员到那里改善一下医疗工作，并希望募到一些药品代金。

（三）弹药补充问题。由于战斗频繁，部队又未能很快彻底改变战斗作风，打有缴获的歼灭战。十万山区的各团，现在弹药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二十团“七九”步枪一个时候有一半以上完全无弹。现在极力补充，平均每支只五至十颗（十颗的已不多），轻机枪每挺配弹只四五十发，重机最严重时只得十八发。“六五”步枪比较好些，平均约二十发（主力连集中六五使用）。俄式“美厘”及法式“五响”，三分一无弹，有弹的只四五颗。二十一团负担战斗任务很多，步枪弹更缺乏。到八月底时，平均只三五颗，轻机枪亦每挺只配四五十发。金团苏营步枪约二十发，轻机也不超过百发（六五机最多，亦只三百余发）。普遍缺乏手榴弹，攻坚地雷亦缺乏。如此弹药情况，使得好些仗不能打。这个地区有钱可以买到子弹（防城、上思及南宁、小董均可买到），我们设立的圩场也有商人运子弹来买，所以只要有钱，是可以买得到的。要改变山区形势，最近补充一下弹药是有必要的。在小董地区，很多私铸军火制造子弹的，我们现在也和商人合作开了一所修械制弹厂，但只投资一亿元，所以生产不大，如果能增加一些资本，那里可以供应好些弹械（小董可以制造驳壳、冲锋机、仿汤姆生、仿卡宾、快掣、各式步枪等，而且颇耐用）。

（四）设立电台问题。十万山区现在没有电台，连新闻电讯也没法收，要获得政治领导，获得宣传材料和干部教育材料成为不可能的事，这对本地区工作的开展影响不小。半年来，音讯隔绝，甚至连蒋报也要二十多天之后的旧报才看到，什么都落在形势发展的后头，实

在是十分苦闷的事。现在山区的情况，有力量保护电台的安全，也向人赊到一付收发报机，就是没有人材。对于电台能否设立，请领机考虑，批准，器材、人材帮助解决。

(五) 过去四属工作由雷州地委领导，实际上地区距离太远，无法照顾。据本地干部反映，地委指示信要半年多才得到一次，到达之时，形势已起了新的变化了，所以帮助不大。现在听说重新划分地区，而且钦、防和合、灵也分开，这个主意很好。不过当地干部有个意见，就是钦、防、合、灵互相间在政治、经济、风俗、人情等等上，关系都很密切，所以又要照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配合才好。

(六) 十万山区西端和越南接壤，中越人民的解放斗争在这里是唇齿相依的，现在蒋、法之间，已经在军事行动上密切配合（蒋匪进犯时，法、越伪军即沿河卡守，并假道蒋匪军进攻或退却）。但是越盟部队和我们部队之间还只限于时相往来，没有在整个斗争上取得一致配合，我们曾建议合作打通中越边境，建立安全走廊地带，越盟地方负责人曾同意接受。不过以后整个斗争应如何配合，请领机加以指示，并和对方中央切实商定具体办法。

(七) 干部问题。本区部队不算少，地区也辽阔，但是干部却十分缺乏，特别是缺乏中级的政治工作干部，组织工作干部，以致好些地方部队搅起来，好些地区开辟了，由于没有干部支持掌握，结果在敌人进攻，困难到来时又垮台了。本来干部主要由本地培养，不过现在连做培养工作的干部也没有一个，所以就不容易解决了。所以分配干部的时候，希望领机照顾到这地区的实际困难。

超

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炎关于我队占领马关县城的报告

(1948年11月25日)

〔港〕广：

一、我主力一个队，皓晚占领马关县城，俘敌代理县长阳河田，敌常备中队放下武器，其余逃走。我缴获步枪百余支，子弹四万发，并控制全县境。现正实行保护工商业政策，商店照常营业，秩序安定。我正大力扩编部队与掌握地党武装。

二、独立大队进入广南（滇东南最大县）后，已立稳脚。由一百人集编到四百人。昨接非正式报告，该大队与地方势力合作击溃敌一个营，击毙其营长。

三、庄、郑、朱部进入邱北、罗平后，尚未联络好，情况尚未清楚。

炎有（25日）

周楠致方方电

——金耀烈部归我指挥等事请批准

(1948年12月3日)

请转方方：

一、代缴分局港币一万元，已于西微交陈福庭转交连贯，并已有收据寄回，已收到否。

二、从雷州挺进十万大山的部队，因不能坚持，有两股转到越境，现正由独立中团助其解决困难。其中一股二百五十人，由金耀烈率领找我们联络，并要求解决其困难，因他们已和十万大山失联络，而和我们接近。

三、滇东南敌极空虚，进军顺利，但大部兵力（两个支队）被庄、郑、朱带去滇东，左江支队不能回调，留下仅二个大队兵力太少，许多地方无法接收，非党武装乘机发展，而该地又无基础。因此，请金部拨归我们指挥，以便集力开辟滇东南。请批准以上二事。望即复。

四、我已和滇南屏边李荣祥（禄）部联络。

周楠

亥江（12月3日）

十万大山的民兵战（粤桂南通讯）

（1948年12月6日）

林 绍 贤

在粉碎宋子文、黄旭初联合进犯的反扫荡战斗中，十万大山周围的民兵，创造了无数英勇顽强、灵敏机智的模范例子。下面就是无数中的几个：

困扰战张午桥割须

张午桥是防城县的老土匪头子，数十年来杀人越货，真是无恶不作。防城国民党反动派看中了他，委他做起“联防主任”来。这次保九扫荡山南地区，张午桥率领他百余匪众充当马前走卒，由东面的大莱、大植向西窜犯到那勤来。入了那勤，张午桥又照老办法拉丁筑碉、围闸固守。日里他的匪徒强迫民众上山斩木，民兵埋伏在树林里向着匪徒开枪，民众象约好了似的，枪一响，他们就往四处走散。拉一次，走一次，斩了好几天，闸还没法围得好。一到夜里，民兵就走近碉堡来打枪。最初张午桥说：“那不过是虚张声势的骚扰，不要管他！”隔了一两晚，除了打枪之外还听见锄挖地声，张午桥是知道民兵的地雷威力的，就恐慌起来，告诫他的匪徒要醒觉一点，当心骨肉化灰。的确，他自己就不敢安心入睡。可是他不睡的时候民兵没有来，一阖眼，碉堡外的枪声又响了。如是搅了十多晚，张午桥那副土匪脾气发作了，当民兵又来打枪的时候，他走到窗口破口大骂道：“丢那妈！晚晚来搅生晒有乜×野本事？好打嘅等天光我开门同你到外面见个高下吧！”话犹未了，“拍”的一枪，打近窗口的坭墙，坭尘飞到张午桥的脸上，吓得他赶快缩回去。

熬了半个月，张午桥觉得耽下去不是“路数”，他决定“走头”了。走的那一天，他知道那把花白胡子是个显著的标志，深深叹了一口气，带着惋惜的心情把它剃光了。同时又觉得平日出入都坐轿子，抬着经过必定变成民兵瞄准的枪靶子，于是吩咐放几块大石头在里面，低垂轿帘仍旧抬在队伍当中，他自己却换了一套士兵制服扛了长枪杂在尖兵班里，行头溜走。果然不出所料，走不到五里，一轮排枪把轿子打得蜂巢似的，张午桥连跑带跃逃回大莱圩，没有了胡子，好些时都不愿见客。

绝粮水保九贼败逃

保九一个连进入滩地区的部隆以后，伪团长陈鹏叫连长恢复蒋政权。可是怎样“恢复”好呢？到处打锣也打不到一个百姓，为了完成“任务”，连长只好出布告自兼乡长。乡公所呢？虽然离碉堡不到一里，到那里“办公”就挨过民兵的冷枪，于是这连长兼乡长只好索性缩在乌龟壳里不出，马虎点在碉堡门口挂了乡公所的招牌。

这里的民兵却又花样不同。他们夜里不打枪，连长和他的弟兄在碉堡里睡得很好，鸡不鸣狗不吠（都给他们吃光了），好一片“太平景象”！天亮，保九贼开了碉堡门到河边洗脸了，正当毛巾覆在脸上抹，砰楞崩冷一阵弹雨洒过来，几个倒霉的马上倒栽葱跌到河里去。

捡了性命逃回碉堡的，连痔疮也不敢再出来。但是没有水喝怎么办？连长兼乡长严厉地下命令要派公差开出去挑水，好不容易才逼了一个冒险出去，出去之前从炮眼向下眺望过，什么人影儿也没有，刚走出去一箭之地，拍匍一枪，人连水桶又倒在地上。挑水的不敢出去，运粮来的又给民兵半路截掉。最后，碉堡里只剩下半席袋抢来的粟包干，连长兼乡长叫一个排长兼保长在夜里悄悄开门，用石头系了席袋沉到河边想把粟包干浸开。这一次“天有绝人之路”了，天亮之前想去捞回来，不知怎的又被民兵发觉先打捞去了。

没有吃，没有喝，连长懊恼地劈烂了乡公所的招牌，丢下空空如也的碉堡，逃回那良圩去了。

平碉堡民兵布假阵

二十一团主力东征之时，钦县的洞利圩一直被保十营盘据着，但也一直为洞利附近的民兵所包围着。保十营的给养在当地无法筹措，要从三十里外的贵台运来，人少去押运吗，民兵截抢了去；人多去押运吗，防守洞利圩的兵力薄弱了，民兵又来围攻圩场。他们的一个连长叹息地对贵洞乡的伪乡长说：“来守你们的洞利圩，简直惨过坐监！”耽了几个月，保十贼把这件“虱襖衫”交给一个姓梁的大地主组织起来的“自卫中队”，撤退到贵台去了。

那队团匪挑上这副担子，搅得日夕心惊，民兵深夜在郊外烧纸炮，他们就向着黑暗的夜空乱打机枪壮胆。圩外沙滩发现多一些足迹，他们就索性关起木闸停止圩期。东征主力回来的消息传到洞利，团匪更加颤栗不安，民兵们呢？可乐开啦。

一天绝早，团匪圩内的了望哨照例向四边山顶眺望，他发觉每个山顶都直挺挺的站有人民武装的哨兵，稜线上不断有人影移动，好些山谷都升起了浓浓的炊烟。“主力回来啦！住满了四围的山谷，打洞利罗！”团匪自己放出流言，半夜全部逃回姓梁地主的庄园里。

翌晚，民兵开入圩场来，写了许多宣传解放军各种政策的灰水标语，然后走到圩旁小土丘，动手拆起那个直径两丈墙高三丈的大碉堡来。但见火把通明，人头攒动，出力的哼哈声终宵不停。到天亮，矗立过巨象似的碉堡的小土丘，变成光秃秃的。敌人估计，这件拆卸工程一晚完成，最低限度要三百人。

谈起吓走洞利敌人加上拆卸碉堡的兵力，民兵队长会告诉你真正的人数，他竖起两巴掌，一正又一反，二十个！

见地雷营长吓失魂

民兵的地雷战也是使保贼、团匪谈虎色变的東西。特别在山南地区，山深林密，地雷战高度发扬了杀伤敌人的威力。敌人恐吓民众时动不动就说：“搜山！”民兵听到了，也有恃无恐地说：“搬地雷来！”

民兵们打惯猎，野猪怎样走，果狸怎样过都揣摩得很熟，他们对

于山区的大路小路，熟习得有如自己手上的掌纹。保贼、团匪进犯了，预知他走经的路线，埋下“踏雷”，敌人踩中了，就炸得他穿肠断腿。于是敌人大路不敢走，小路不敢走，专走山半排，可是见了茅草弯倒过的地方也不敢走。

山谷里，有时明明听得鸡啼猪叫，乡民是躲在里面的，因为怕踩地雷，敌人不敢进去。

敌人官长最怕的却是“拉雷”，他们说民兵往往放过尖兵和士兵队伍，见到骑马坐轿或穿军官制服的才拉线。“踏雷”没有眼睛，“拉雷”却有眼睛，所以特别可怕。保九一个营长携同他的太太官眷一行十数人众，通过那马、天稔到一个地方去，过了几道溪水，来到一处岸边，看见有几块平整光滑的石头很可以休息休息，于是一家子全坐下来，突然瞧到附近的树仔一动，他大叫一声不好，连忙滚到低地去，隔了一回，不见什么动静，叫卫士到树仔丛搜索一看，呀！不看犹可，一看他立刻脸白唇青，四个连发“拉雷”一字儿摆在那里，原来拉绳霉了，绳子断了才没有拉发。那个营长经此一役深有所感，他说：“这份差事辞了算了，今天不是祖宗有灵，一定‘冚家铲’了！”

对付保贼、团匪抢东西，民兵们又在屋里到处装起“看家雷”：开门，地雷响；掀米缸，地雷响；搬镬头，地雷响。……那马地方一个民兵英雄叫做“反四”的，他就趁着他们惊魂不定之时猛打枪，呼喊着追逐过去，曾在一次里打死六个敌人，威震东山区。

布网罗敌探纷就缚

捕捉敌探、传令、交通，阻击反动头子，民兵的成绩也很辉煌。

山南黄沙水地方有一个叫做“王排长”的民兵领袖，在半年反扫荡战斗里，一个人捉了十多个敌探、传令和交通。他的本领就是识得人多，心思细密。无论你黄沙水本身以至附近的稔稔、竹园、那棱、茅坡等地方，那个好人，那个坏人，谁人什么村有什么亲戚，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个陌生面孔经过固然瞒不过他的眼睛，到过反动据点他也不会马虎放过。陈克强收买一个妇人，叫她把他的进攻东山区密令藏在发髻里，由那棱带到茅坡去，“王排长”搜了出来。一

连保贼被困无法和他的团部联络，雇了两个民众假扮抬猪出那良卖，把信件藏在竹杠里，“王排长”也搜出来。

山北扶隆隘脚的黄三哥，也曾两次捉获冯丕临的重要交通，把敌人扫荡山区的全部计划搜得。

最近保卫秋收斗争中，敌人着重起用土匪恶霸组织地方反动武装配合进攻，民兵首先通过一切亲戚乡邻关系，进行争取说服工作，使有些盲从附和的回转头来，对于那些死心反动到底的，民兵就展开阻击工作。山北东安北区，福派村反动乡长两父子是协助保贼抢割、抢牛的首要分子，那个做父亲的最凶悍，他充当儿子乡长的卫士，四处逼勒民众，人又狡黠，不容易收拾他。一天，他又到邻村去迫粮，民兵在近闸地方埋伏妥当，用妇女老人到闸口和他周旋，等他一接近，一枪就结果了他。连续在第二天，又把那当反动乡长的儿子阻击死了。一双本地老虎剪除了，保贼抢割就没有了“盲公竹”。

组织了民兵的山区的周围，每个高峰上都搭起了哨棚，棚里架着竹梆，民兵英勇而又警惕地监视着敌人，他们用团结合群的力量，布下天罗地网。

十二月六日防城寄

(原载《群众》第49期，1948年12月16日)

丁英对黄其江关于 合灵情况报告的意见

(1948年12月6日) ①

我对黄其江同志关于合灵情况的报告 and 了解（最近小林同志转来的），有一些意见，现解说如下：

（一）我首先不同意这报告的二个基本观点：

（1）全篇都是“错误”，都是坏例子、坏典型，没有一个好例子、好典型，这是不符合刘少奇同志修改党章报告与方同志曾特别提示的精神的。

（2）忽视军事斗争——全篇什么错都说到，但是只是没有说到军事斗争上的错。对如何打好仗、如何建立主力，战略战术……等军事上的问题，一字不提。这是由于其江同志对军事斗争不太重视和感兴趣，所以在检查工作、报告工作、总结经验时，往往就会忘记这个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而观察问题时也就往往偏重于地方，偏重于统战等工作（当然这些工作也是重要的），但如果对最中心的如何作胜利的军事斗争，则丢脑后，这是舍本求末的。

（二）对这报告具体内容的意见：

（1）不错，灵东北和小江是去年曾被赶跑的，这是由于过早“大搞”思想所影响的痛苦行程，但在今年年初接受了经验后，即布置他们打回去。半年来，经过他们的艰苦奋斗，再没有被赶跑，重新立下根基，且有某些发展，这不是很好的一个胜利吗？他们为什么看不到这新的胜利和正在发展着的好现象？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2) 他说灵山垮了，只有合浦二百人了。

我来时，合浦这个二十四团连小江是有二百五十人——三百人。

灵山，不计莫平凡亲自带领的四五百人（在灵横边活动的，因被敌切断联络），但在政委陈明金同志领导下的灵东北活动的约二百人。在今年四五月间，曾在高、王同志领导下开了百多人来到合、博边境活动过个多月，才开回去的，这是我亲自到过他们部队看见过的。

假如莫平凡自己带的四五百人通通垮了（我相信不会通通垮的），此外，我敢肯定的说，合灵队伍至少也还保留着四百人到五百人，灵山不会完全垮的。

(3) 他说坚持了十年武装斗争基础的白石水也垮了。

白石水这个地方，在民〔国〕二十九〔年〕便有过反丁斗争，但不久上级下令“停止”、“撤退”，说“过左”，说“不合统战原则”，这样一来，国民党便大肆清乡，大肆屠杀，被烧村庄无数，被杀群众数百，有说千余，被赶入集中营，被拉去“当壮丁”的不可统计，全地区枪支被缴清光，以至以后群众害怕，谈虎色变。这是民〔国〕二十九〔年〕的反丁斗争情形，这是在其江同志为合浦县委书记时的事，他是应该清楚的。

至〔民国〕三十四年春，当地群众领袖张世聪同志回去，是曾再次发动起一些农民来参加起义的，但不久给敌人一个扫荡打击又沉下去了。

至前冬（我来时），这个被目为死火山的地区，既全无武装组织了。至去年春夏之间，经过很大的努力，如杀土匪张世金，以及经过干部同志的努力，是曾重新成立起一个第五连，并组织了百余民兵。但经过今年半年来敌人的重点进攻，一个时期民兵由于没有积极去领导，是瓦解了，而第五连也吃了几次败仗，也有一些损失，这是事实。但这个地方是垮了又恢复，恢复了又垮。假如从无到有的观点来看，自从去年以来到现在还是“有的”（虽然是受了些损失与挫折），因还保留有一个地方连——第五连。说它是今天垮了，今天垮的，我是不同意。

(4) 至于说到“十年基础的六湖”，那更不成话。这里虽有

几个农民与知识分子党员，但自从民三十二年四属发生领机的破坏事件，宣布停止党的生活后，这里的所谓党员，除个别仍保存热情外，一般都已失去热情和党性，早已和普通人差不多了。后来经过动员鼓励，有几个是参加了工作和武装斗争。自从去夏打了东城乡公所，大快人心，兴奋群众，打开公馆区局面，如能在几个乡的范围征到粮就是证明，以至今年在各地最困难时期，灵南、合中，以至灵东北、小江队伍都开到这里来“渡难关”。假如不是有积极的军事行动，这局面是不能打开的。

其江同志来非议打反动的东城乡公所，我认为是不对的，这是取消武装斗争与积极的军事行动的。

是的，在打乡公所时，是有缺点的，这就是把不继续抵抗的乡兵也在兵荒马乱中给二流子成份的战士杀了，但乡长是没有杀的，说“杀乡长”是与事实不符的。

至于说到目前的“退出”，这是一个大错误。这是在我去见小林同志的时期，敌人集中扫荡这乡村，当时领导这地斗争的负责同志，取消坚持，取消斗争，这是很大的错误。但等我见过小林同志回来时，和同志们检讨后，大家都了解了这“错误”，已具体布置回去坚持与斗争，而且已得到初步的胜利，如有些干部与战士已组织起武工队在那里活动，如阿龙同志与高叶武工队。

(5) 关于地区一天天缩小的问题

是的，今年上半年经过敌人半年来之重点向我老地区进攻扫荡后，老地区一般是缩小了，最明显的就是灵南和白石水山地，以至张黄。但如果只见到这缩小失败的一面，而看不到进展胜利的另一面，那是我们不能同意其江同志的报告和了解的。

敌人集中力量预计消灭我主力，要把我所有地区“扫光”，但我们坚持半年来的艰苦斗争的结果，我们主力仍保存，地区也扫不“光”。相反，我们却发展了新地区，如西场，去冬打回去，到今年初还只是三四十人，但到今夏却有百人以上，开展到四五个乡，直至钦边。又如武利江区，山地虽然缩小，但又在沿罗成江燃起火来了。再如灵东与合北，也是在今年才重新立稳足跟，开发着六万大山西部，

就沿海的南康公馆也是在今年上半年有着新的开展的。这情况正如分局所指出的：“黑了东方，亮了西方”。我认为其江同志是只看见黑点，看不见光明的，只看到失败，看不到胜利，那是会丧失武装斗争的信念的。

(6) 关于愈打愈反的问题。

不了解政策，不讲求政策，是合灵部队一贯来的坏传统，其根源是收编了许多土匪成份，我以前的报〔告〕里已说过。在去年春以前，简直是土匪的成份、思想与作风成为统治的东西。同时又由于四属党在今年春分局才正式承认，以前长久武装斗争期间，都是没有党的组织与领导的，以至没有给以及时纠正这些思想和作风，党员干部也就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的生锈与落后，所以，一旦他们手里拿起了枪杆子，是会乱来的。

但我认为应分清阶段，合浦部队自去年夏已开始了转变，灵山转变较迟些，但也不能否认他们是有进步的，这是由于我们曾做过一些整军整党和教育工作与清洗土匪成份。如果不分清阶段和从历史发展规律上去看，那必然会错误的。

愈打愈反的问题，我觉得不是今天的问题，是昨天、前天的事。他们的“反”不是今天“打反”的，是过去三四年或七八年前就打反了的。这一年来，是曾做过许多解除这“历史负担”的功夫，效果虽微，但不能否认这转变与努力，如打道担牛神水，能以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对吴丙光之争取；对何屋村之还枪，还了许多牛与枪给已表示“不反”和中立的地主富农。

半年来很少杀人，尤其很少杀错人，所以，乱打乱杀乱缴的作风已基本上转变（虽然还不够彻底）。由于我们过去强调了禁止乱打乱杀乱抢，在今年既萌芽了一种过右的思想和作风，有应打、应杀、应缴的也不打、不杀、不缴了，出口统战，入口政策，不了解拉中带打，打中带拉及杀一警百的意义和需要。与其说合灵今天过左之严重，还不如说过右更须注意。

不错，合灵部队尤其干部从政策上进一步的教育是很需要的，但要适当。假如只是强调“求同”，而不同时强调“立异”，那就会陷

于“去异求同”的危险。合灵地主、豪绅、官僚、政客，是诡计多端、阴谋百出的，合灵情况是很复杂的，过去合灵受“去异求同”的阶级敌人丧失警戒，在阶级敌人面前不能清醒自己的立场的血的教训是多得多的。

(7) 关于纵容土匪、二流子问题。

我上面说过，合灵部队是包含着很大的土匪成份的，有不象样的行动是必然的，尤其有一个时期——东纵撤退前后，在所谓用“江湖奇侠”、“土匪形式”的指示下，更加上吴有恒同志“造反”、“捣乱”及强调二流子之作用与举例后，合灵的土匪二流子成员与做作是一时得到合法的承认，以至得到理论指导的纵容，这是事实。但在合灵同志的经验中，已体验到这样做作是对人民对工作有很大的妨碍的，所以至去年下半年已开始批判和抵制，但还只是临时的、个别的，还不是有系统和彻底的转变，这是事实。但到今年上半年，进一步的检讨，才进一步的较彻底的清洗。如西场之赶胡须王、清沙岗佬，公馆南康之杀喜，及限制与不承认廖排长这个变质的假名“革命”、收编老张回队、取消陈十之活动、说服争取李六，张黄的△△也曾派员去整理，结果虽他们固执，没有大的转变，以至这土匪队的垮台，但这些事实是不能否认我们对土匪二流子思想和行动是一大转变。

如果不分清阶段，笼统的说“纵容”，甚至认为到现在仍是这样，看不见前后两个不同阶段，我是不同意的。

(8) 关于“没有地方工作”和“地方工作的转变”问题。

其江同志在报告上已承认了——这个没有地方工作的合灵，在今年春已开始注意和转变了，但他把这转变的原因放在陈江同志身上，这我又不能同意的。我们不是和陈江同志争功，但要弄清事实。事实上今春陈江同志带着西征部队从合灵经过一下，而且在兵荒马乱中，以后陈江同志从也未有来过指示与检查布置工作。如果把转变思想作风当作这么容易，把陈江同志当作“神通广大”，在兵荒马乱中过一下就转变了，而合灵同志如何实际努力置之不问，那是不应该的，不是面向实际与真理的。

(9) 军队（团部）的组织则什么都有，有正副团长、正副政委、

参谋长及各种参谋，而地方工作则无人做（意思）。

我认为，军队的组织什么都有，和展开地方工作是不会冲突的，这是多余的非议。

在合灵干部的缺乏不够使用下，一些干部有中心的既理地方，又搞部队是完全必要的。如果离开武装工作来搞地方，所谓建设地党，我相信地党没有建立，而放出去搞地党的干部已“先亡了头”。所以我们原来的布置是有中心的，既搞武装又搞地方。所谓“有中心”，就是有些干部以地方为主，有些干部又以部队为主。但中心搞地方的又不能离开武装，搞武装的又不能不理地方。

这是由于：①干部少，不能不这样；②地方不安定，反动势力强。只有这样才能使干部安全与工作开展；③地方工作虽然重要，但武装斗争工作仍是中心；④有统一的武装斗争指挥。

我们虽然在团部的组织什么都有，但事实上有许多干部是中心搞地方工作的，如参谋长之卢，实际上他一贯来都是中心搞公馆、南康这二个地方工作；又如参谋包，实际上他是中心搞西场这个沿海地带的地方工作的；又如政委陈大亨，他是统理地方与部队一元化的领导（是县书），副书记、副政委则中心放在部队。

这样的布置与组织，我认为是不必非议的。如果说地方工作要加强，那在不妨碍以部队为中心、不影响部队的健全与巩固下，我是赞成的，但如果认为我们过去只顾部队不顾地方，现在便要把这些干部换出来专搞地方，不理武装工作了，那是会发生危险的，会垮了部队和残害干部的。

我很担心他们现在从遂溪抽调来的五十余个赤手空拳的所谓搞地方工作的外来干部的安全，海康县书和博白县委之被抓，这经验是值得重视和检讨的，如不好好的接受这血的教训，更大的血的教训仍是会不断来的。

（10）关于三个连给敌人一个连打得丢枪而逃的问题。

如果把这件事就来证明合灵部队是“猪”，我也不太同意，合灵部队尤其是在苏显枢团副领导下的二、三个连，过去他们只是三五十人要坚持纱帽岭这个巴掌大的地区几年斗争，曾几次以三五十人的队

伍打敌人几百人，就这年余来，也还不断的打退敌人与打垮敌人，如水牛岭之打军官队，今年之在福禄岭与黄泥寮之战都是在双方军力相等下给敌人很大的杀伤，使敌溃退。

如果说合灵部队不会打漂亮的歼灭战那是很中肯的，但如果把这久经战斗的队伍描写成为全无作战能力的“猪”，那未免太过。

我对这部队的领导经验是：①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如果自己老是说敌人如何了不起，老是对自己泼冷水，看不见自己的所长与致胜条件，那一定是会失去斗志的。

这次所以发生这怪现象，对其江同志等到了后的领导有无关系，这是须要领导者自己反省的。②情况要了解，如情况不了解，自己没有战斗准备，一旦敌人突如其来，又不了解敌人究竟多少，那一定会惊慌失措。

如在这情况下，莫说我们只三个连，就是一个团，敌人一个排，都有可能发生这情况的，所以，当时的实际领导与布置又是有绝大关系的，不能以一时的个别现象，便不分析当时原因，而就下“猪”的结论，那末领导者未免不负当时领导上之“责”的。这是他们去后发生的“最近半月”之事，应检讨当时对他们的领导。如果自己关起门来留在后方写“总结”，而对武装部队不理不睬，又曾给过他们一盆当头冷水，下车伊始就夸夸其谈的批评打击，而发生了这怪现象又推之在他们“猪”的身上，我是对他们抱不平的。

（三）我所以来的原因

在他们的报告说：我是因为“不满大遂溪主义，不满遂溪人做皇帝，不满自己的位置，不满其江同志为区党委及温同志之处理……”而来告党状的，这报告有对的一面，也有误解和不够的一面。现我自己再解说如下：

（1）关于不满大遂溪主义和遂溪人做皇帝问题

实质我是反对小集团、小组织与派别活动，打击一部分，拉拢一部分的怪现象和用人唯亲，排除“异己”的干部政策，因此一部分的干部就飞黄腾达起来，化州同志所反映的“暴发户”，另一部分的干部便入冷宫落水狗，所谓“暴落户”。

所以我说的并不是道义不道义的问题，而是山头主义的问题。

(2) 至于我自己的位置问题

我觉得党分配什么事给我做，以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大概因为我曾发过牢骚，有些同志便认为我不满自己的位置，以为不愿降职，要正书记做。其实过去年余来，自己既负了四属，又加上广西几个县，负了这么重大的“责”，而实际上又照顾不来，自己受责任心的责备，在精神上是痛苦不过的。现在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工作，自己在精神上的负担是顿然轻快起来了。

是的，我不大愿意干这副书记之责，原因是好象觉得其江同志等，他之所以要这个副书记是用来敷衍应付我这个“人”的样子，好象连副书记都不给我做又怕不甚合情，给了又不放心，因此用了一个副书记来应付一下我之外，又是再来一个亲信沈汉英同志也做副书记。四个地委中便给副书记占去一半。这敷衍应付的形式太使人难堪，因此我力辞这职。我曾几次要求给我干一个县或一个区，但他又不肯，硬要我做，自己便感左右为难，难以团结与合作。

(3) 关于不满其江同志为区党委和不满温同志之处置问题

我觉得只要领导工作搞得好的，什么人做区党委，我们是不应该在“人”的问题上去计较的，而是对革命工作、人民事业，如何做才有利、才做得更好上去研究。

是的，我是曾向小林同志提过：“区党委的领导中，没有一个一贯来了解党内外全面情况的同志参加是一个缺憾〔陷〕”。但这并不等于反对其江同志个人。我是一个党员，有意见我是应该提的。

是的，我这次到雷州，看见其江同志的做作和其他干部的反映，有许多干部对其江同志的印象是不好的，如进行小组派别活动，打击他人，抬高自己……。我觉得如果这样下去，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我是一个党员，应有维护党的责任。因此，我有“自觉的明知故犯的自由行动来见分局同志，反映情况之行动”。我觉得我这行动，假如于党有帮助，就是个人受评击，受处罚，也将忍受一切的。所以，我这次来港，在我的主观上是“不顾个人得失来争取上级同志了解实情”的。

我觉得我的“言”，现在差不多发尽了。我来的目的已达到了，而我在组织上毕竟犯了违背组织原则的行动，这我请求党不要姑息，应给我应有的处罚，以免以后的效尤，以维党的严肃。

(四) 我的要求与希望：

(1) 对问题对于干部应有全面的本质的认识，不要被一时一事或能说能写的现象有所炫惑，党外党内的情况与问题都是复杂的。现在分局对问题的冷静审慎态度，一下子不做任何是非的结论是很好的，我们应该学习的。但最后我仍是希望有结论，有意见有批评。在未有结论以前，我们是应当一心一德的，“一致对敌”。我将以方同志所告诫的“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的历史故事来警戒自己和同志们，以面向胜利，面向团结来作座右铭。

(2) 为了使上级同志以后更好的全面了解情况，我这次回去后，希望能给我有直接向分局及区党委写报告提意见的机会（在必要时，而不是在任何时），那么，以后我可以保证不再犯这组织原则的错误，在遵守党纪上来锻炼和提高自已的党性。

丁英

十二月六日

温 △ △ 致方林信

——对分散发展方针的意见和敌情报告

(1948年12月8日) ①

方、林：

一、林昨离部队准备返港。

二、十一月十三日指示前天译好，我们完全同意分散发展方针，并坚决执行，有如下意见：

1. 抽一团建立边区小型主力仍属必要，因雷州不适宜留大兵活动，留下部队已足够向海、徐发展；其次，主力队逐步向北向东发展，化调百余到化北，准备调百余到茂、电、信山地，一团则在化、廉机动地区游击活动，打击小股敌人，并加强整训工作，改造干部战术思想，提高指挥能力，为各地建立主力榜样；再其次，主力经过锻炼改造工作，使之能到北向东发展，其活动按实际情况集中与分散灵活运用。

2. 化与茂、电、信仍划分为二个领导单位，因罗大搞思想仍未改变，工作不实际，党性薄弱，茂、电、信山地基础与化距离很远，领导不便，能力亦所不及，现拟调沈到茂、电、信，陈江返四属。

三、陈沛一个月来调保一、保二、保九一个大队及地方兵共千八百人，重点扫荡遂溪二次，采用分进合围，日夜出动，突袭穷追战术，对暴露村庄实行三光。沈曾集中七百余与敌大打，牺牲三个连长，一排长，轻机手多名，指战员伤亡共四十八名，廉敌调保九一大队，保十二个大队扫荡，我无大损失。地雷战敌伤亡四十余人。现敌与地主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带兵到我地区，日日抢粮，筑碉堡蚕食我地区，切断我交通线，税源困难日渐增加。

四、遂廉实行减租减息，分耕后收余粮，化州则分粮，是否分田未定。

五、军毡已运送否？急用，请复。

温

十二月八日

粤桂南区的形势和当前的方针

(1948年12月10日)

一、敌人在粤桂南区“清剿”匪军主力，广东境内有三个保安团、二个独立营、一个警卫营。在广西境〔内〕的有两个营和一个后备的保安团，总共约有三千五百人左右的机动兵力，分布于我粤桂南区十二个县的游击区和一个湛江市。

配合地方反动武装进行分区“清剿”，而其重点则放在遂溪和十万大山区，以实现其肃清平原围困山地的目的，今后仍会继续这套做法。但是半年来的斗争是粉碎了敌人的企图，消灭敌人约有半个团的兵力，我不仅保存主力而且壮大了，战斗力量大大地提高，锻炼大批领导战争的干部。山地和平原地区仍是广泛的深入的发展游击战争，提高群众的觉悟，坚定了斗争的信心，敌人则在其失败中暴露其严重的弱点，如士气低落，兵力分散，薄弱不足，顾此失彼，陷于被动，主将消极无信心，内部矛盾重重，日益动摇分化，和人民的对立更加尖锐。蒋匪王朝快要崩溃的形势下，敌人的弱点所造成的危机是更加深刻化了，任何“清剿”的计划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在蒋匪未垮先逃，兵力不足，危机重重的情形之下，敌人更加强了这几方面的做法：

1. 加强粤桂南区的联防，在广西北部尚未受到严重威胁，广西方面加强了广西南部的兵力（有一个保安旅部驻在南宁），补救广东兵力不足的弱点，但是两广间的矛盾和互相间对情况不熟悉，他们的联防合作是有限度，只是在其境内较积极而已。

2. 以陈济棠、邓龙光为首加强组织和扩充地方反动武装，团结地方反动势力来支撑危局，但在经济困难内部矛盾，人民反对，大势已去，也只能部分做到，而且是很脆弱的。

3 加强政治进攻，以配合军事进攻，运用湛、遂的这次经验，更加强内奸特务活动，或则是利用目前大势，伪装民主进步，“搭线”打入我阵营，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或给予突然的袭击或专搞政治土匪向我进攻。

4. 在分区“清剿”的失败情形之下，可能放弃了一些地区，集中主力再来一次重点进攻，以遂、廉为中心，然后再推移到其他地区，其目的则着重搞垮我基础，残杀我地方干部，建筑碉堡，使我主力无立足之地，然后围剿我主力。但是目前情况已不同于吴化时期的情形，敌人这种企图是会失败的。

二、大军快要渡江，全国胜利形势即将来临，和广东各地的积极斗争的配合之下，加速粤桂南区形势走向全面胜利的大变化，这是粤桂南区的基本形势。变化的趋向和具体情况会怎样呢？

1. 更加有利于我们斗争的变化：

(1) 地方反动势力由于内部矛盾更尖锐，人民愈反对，士气更低落，反动阵营内部更走向动摇分化。或则变为消极中立，或则变为两面，坚决反动的更陷于孤立，内部矛盾更尖锐，大军南下之时更会加深这样的变化。

(2) 统一战线的基础更广泛，更容易开展；除极少数坚决反动到底外，绝大多数可为战略与策略的同盟军，中间势力对我的信心更益增强，更积极支持我斗争，团结广泛的中间层对敌斗争的条件是比任何时候都好。

(3) 群众的斗争情绪继续高涨，群众斗争和游击战争更紧密的结合，反三征、反饥饿的斗争是会不断的以各种形式出现，无疑的这些变化是要靠我的力量来推动，才能加速大变化的到来，掌握着这种变化的趋势和加强主观力量去推动，则这种有利的客观情势加速的发展，就无限的增强我的力量，削弱了敌人的力量，走向彻底的胜利。

对于当前所遭遇着的困难，而感觉彷徨失望，或强调困难束手无策，则是很大的错误。而应该毫无怀疑的看清楚，认识这种从所未有的有利情势，今天的困难不会有和东纵北撤时以至今年初时那样的困难，任何困难都只是暂时的，和大势比起来，是不足为虑，是不能阻

碍我胜利的前进。我们应该继续贯彻“大胆进攻，放手发展”的方针，才能克服当前困难，打开了新的局面。

2. 在目前的变化当中，敌人是否会加强兵力于粤桂南区或是更加削弱呢？我们应从实际来看；从两广情况来说，粤桂南区不是重要的战略要冲，为着应付大军南下，敌人必须增加粤汉、广九铁路、东江、北江、中区、桂北以保卫广州、桂林，在其后方空虚，兵力薄弱不足时，可能要在这个地区抽调一部份兵力出去应急，因此在基本形势来说，敌人在粤桂南区的兵力在变化当中，将会削弱，而不会加强。但我们在思想上，不要强调所谓避免损失，等待敌人调走后才动，而应该在现有的情况下，加强进攻削弱敌人的力量，使敌人调出去的兵力很弱，只有这样才能加速形势的变化，更不应该考虑，怕刺激敌人会大举增兵（敌人在崩溃状态下没有可能），而束手束脚、缩首缩尾，不敢大胆进攻，放手发展，这就是不敢胜利，走到右的危险。

3. 在蒋崩溃而我大军未到两广，我又未能全歼残敌或敌人统治强的地区，敌人死亡前夜，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掠夺，和各种各样阴谋出现，制造严重的白色恐怖，我们应该有所警惕，在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但不要夸大敌人的利害，慌张失措起来，应该认识这是敌人最后的最脆弱的挣扎，能够挣扎的时间很短，应该及时揭发敌人的阴谋，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敌人的阴谋，减少人民在解放前夕的损失

4. 大变化当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我军在江北歼灭了敌人的主力，蒋匪的、总崩溃即将到来，而我大军又未到两广之时，各地处在混乱的状态下，两广地方势力可能与李济深勾结起来，以保境安民的旗帜霸占地方，奇取胜利的果实，以阻我发展。在我基础薄弱而地方势力占优势的地区，我要占领发展，就暂时遭遇困难，但在我大军到来时，这种情形就会改变的。而在我基础强地方势力弱的老地区，就会为我所占领，我们必须充分注意这种情势，对于地方势力占领新区的斗争应有充分的准备，大变化的情势到来，则应该有方向的迅速猛烈的占领地方，解除国民党的地方势力、地富的武装，放手武装人民，到处由上而下建立民主政权（由边区政府起到乡政权），加速人民的解

放。

三、当前的总方针：

应坚决执行八月指示，不能打折扣，但是可以按着实际情况有分析有步骤来实现。根据今天粤桂南区的情势，粤桂南区党的总方针应该是：为着完成建立以六万大山、十万大山为中心的战略基地（应准备好在大军南下时夺取这基地周围的七、八个至十几个县城的联成一片），这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基地。尤其是要发展广西南部的游击战争和迎接大军南下是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没有建立这基地是不可能迅速解放边区人民的。建立根据地不仅是今天情势迫切的需要，而且是有建立的主、客观条件，如目前客观有利形势和我已打下建立根据地的基础。今天一切工作都应为了准备完成建立根据地而努力。仍照今天情势应该向全党全军提出动员号召，面向胜利，面向团结，加紧准备力量，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全边区人民，提高全党全军的战斗情绪，为实现当前的总方针而奋斗。

四、为实现总方针而斗争的几个问题：

（一）加强军事斗争：

1. 应该继续贯彻执行“大胆进攻，放手发展”的方针，积极在新老区发展军事斗争，有计划的不断的找寻敌人的弱点或造成敌人的错觉，集中优势兵力给予以一部分一部分的歼灭性的打击。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无限的强大起来，根本改变这地区敌优我劣形势，才能实现建立战略根据地的总方针，才能有力量迎接胜利的到来。领导上应紧握着这个中心环节，弄通全党全军干部的思想，一方面清楚了解目前有利的形势下，敌人的弱点和困难更深，给我打击的条件更多，应克服一切困难，掌握一切有利时机，而又是经过周密的布置，向敌人坚决进攻。另一方面又必须了解要用群众自己的力量来解放自己，不要坐待大军来解放，一切存在着消极等待的观点都是错误。

不仅在地可以打仗，而且在平原地区也可以打好仗，只有两者密切的配合才有效的削弱敌人力量。根据过去坚持的经验，和今天的有利形势，目前留在雷州平原的部队完全可能坚持，过去曾经吸引敌人一半主力及给敌人很大的打击，对山地斗争起着很大的支持作用，

今后必须发挥平原部队积极斗争的作用，来掩护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的发展。但是不应保守于原有老地区活动，而应向海、徐发展，打通和琼崖的交通桥梁，积极恢复化、吴基础，而且逐步引向茂名南部和茂、信北（北流）边的山地发展。

四属部队一方面加紧巩固原有基础，积极运用各种方法，肃清山地敌人据点，依靠原有基地以大刀阔斧的精神开辟广西工作而特别重视横县工作。另一方面必须注意恢复原有平原基础及开创新的平原基地，这对于粉碎敌人围困山地及开展广西工作有很重大的意义。

必须注意用各种方法（主力或武工队）打通十万大山与六万大山联系的走廊，钦、灵、合边，六万大山与雷州联系的合博廉边走廊，若能完成，则各个据点作战便能密切配合，主力能够机动集中使用，各区干部就可迅速交流经验。

2. 建立粤桂南区主力；

要完成建立十万大山、六万大山根据地，不仅要在各个据点有其主力，同时必须有整个粤桂南区的主力才能达到这个战略意图。因此建立边区主力团，就成为当前的中心工作，但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立即建立边区主力的条件尚未成熟，而还需要一个准备过程，即是须先建立或健全各区支队的主力，各支队主力约在六百至八百人左右，经过各地区主力作战的配合、锻炼，而又完成组成主力的准备工作的时候，再进而组成边区的主力。其组成的原则是在各区支队主力中抽三分之一，以建立一个营为单位，由各个营组成主力兵团，人数约在八百人左右。目前就应该进行下列的准备工作：

(1) 完成建立或健全各区支队主力团的工作；

(2) 准备好建立主力的军政干部和领导机构司令部、政治部的干部。

(3) 在各支队中挑选组成的对象，加强动员工作，克服地方观念，加强领导，加强火力配备，每连配轻机三挺。

(4) 解决主力团活动时的经济、粮食、作战情报。建立主力时应注意的几点：重质不重量，要精干，保持纯洁统一，清洗坏分子，加强党的成份和党的领导骨干，建立主力团的各种制度，有个别地区

强调分散、武工队形式发展，而取消主力的偏向，必须纠正。已经有过主力形式活动的地区，原有主力必须坚持打击敌人，才能使武工队能够活动发展，否则就会被敌人天天“清剿”不能开展工作，原有地区也会垮掉。

3. 认真进行整军工作：

目前各部队都不巩固，各种制度没有建立或有而不健全，上下不团结，思想混乱，无纪律，自由主义，无日常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教育训练工作，党的领导作用很弱，党员少质量差，群众纪律一般不好，队伍成份不纯（流氓、土匪成份都有），战士落后。由于以上的严重现象，部队的战斗力就不能大大的提高和很大的发展，甚至有缩小的危险，是不可能担负完成当前的战略方针的。因此必须严格的进行整军工作，其目的就是为着提高战斗力，成为真正人民军队，来实现建立根据地的总方针。

目的的整军工作应着重下列几点：

(1) 首先从思想上整军，使全体指战员确立人民军队的观点，成为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队，必须总结过去各种违反人民军队的思想，同时又发扬人民军队思想的典型来教育全体指战员。

(2) 建立部队各种必要的制度和军事纪律，把建立的各种制度和纪律在全军展开讨论，弄通思想，首先各级首长及党员严格执行，起模范作用及经常检查执行情况，及时总结教育。

(3) 健全部队的参谋部工作和政治部工作，在现在的基础上大胆提拔干部来担负参谋工作、政治工作，虽然干部经验缺乏、能力弱，但是在首长加强帮助教育底下，也可以克服这弱点，如不健全这两方面部门的工作，则一切计划都会落空。

(4) 健全党委领导，保证经常在党委领导下，讨论和解决重大问题，克服个人包办的缺点，加强发展党，加强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整顿部队党，部队党应有步骤的进行公开。

(5) 重视由下而上的总结历史战斗的经验，展开军事民主，提高军事技术。对于干部、队员流动性很大的部队，或成分复杂有奸细活动的部队应立即进行保卫工作，对于参队每一个人，由群众组织起

来查成分、查来历、查斗争、查工作，由军人大会给他做结论，清洗坏分子出去。

4. 具体解决部队进行战斗时的各种困难：

当前要具体研究克服战斗技术的一切困难，如爆破技术、刺刀技术找专人负责来解决，爆破原料和制造技术，各支队单位应设立小规模弹械厂，自己大量翻制子弹，制手炸、地雷，这是解决弹药的主要办法，领导上应重视这项工作，找忠实负责的干部来担任，经常给予帮助，克服困难。

(二) 猛烈的开展政治攻势：

1. 由于目前全国胜利形势快要到来，蒋朝廷复灭在即，反动阵营土崩瓦解，人心兴奋，这是给我开展政治攻势空前有利的情势，我们应该大胆掌握当前各种有利条件和敌人的弱点，猛烈的开展政治攻势，以达瓦解、动摇、分化反动势力及其武装，使坚决反动的陷于孤立，更有利于我歼灭性的打击，团结广大中间阶层，发动下层支持解放的战争，这无疑的政治进攻和军事进攻正确的配合，就能打败敌人，这是实现总方针的主要工作，绝不能忽视的。

为着猛烈开展政治攻势，必须加强宣传工作，各地委县委须指定一个负责干部来建立这部门工作，目前开展政治攻势的宣传工作应抓住下列几件：

(1) 大量翻印关于我党政策（尤其是华南人民武装行动纲领）、重要文告（一年左右打败蒋介石）、解放军胜利战讯、蒋匪崩溃情势的宣传品，普遍散发到各阶层各角落去，有计划的动员开明绅士、进步群众，配合着这些宣传品进行宣传解释。

(2) 根据各个地方K党政军的首长和地方势力首领、士绅名流的特点（内部矛盾弱点），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或用我军名义写信解释大势、党的宽大政策和执行的典型，揭露反动分子的罪行，分别给予警告、劝告、争取将功赎罪，为人民立功，同时必须具体布置和攻势对象有关的党员或群众、中间分子来配合进行动摇、分化、瓦解的工作，把政治攻势和统一战线工作结合起来。

(3) 应该积极展开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用喊话或传单、漫画

的各种各样形式，宣传解释我的俘虏政策及实行的典型，蒋匪惨败、蒋军起义及投我的情形，号召拖枪逃跑回家、战场起义、向天打枪、守中立。

在目前斗争策略的运用，应把打击面缩到最少，今天为蒋介石而死的人实在很少，反动分子大多动摇害怕，为着减少阻力、增加助力，我们对于当前地方反动分子（不是蒋的嫡系）则仍应不放弃拉拢动摇分子的策略，根据实际情况，有时以打击为主，有时则以拉为主，拉打策略灵活运用，但以不上当和不迫他反动到底为原则，如对张瑞贵则颇有拉和动摇的条件，则应积极去拉，张君崇目前表现仍是坚决则以打为主，打中不放弃拉，对于符春茂的叛变分子仍可写信叫其回头或消极，只要今后不反动，则不咎其往，欢迎转变，以后“搭线”的情形会更多，可以利用来分化削弱反动阵营的力量，我们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就必须根据斗争的策略灵活运用。

各级领导机关应有计划的领导全党进行这工作，具体调查研究党内和群众可能进行的政治攻势的对象条件，分别具体布置之，运用各种方式方法来发展攻势，各支部各部都规定了自己政治攻势的具体计划，攻开那些反动而又动摇的分子。

（三）自力更生克服经济困难：

目前经济的严重困难，对于发展目前的斗争是很大的障碍，如不能恰当的解决，会使斗争遭受挫折和妨碍党的政策正确的执行，因此领导机关对于财政经济问题应该严重注意研究如何克服困难，开辟财源，适应斗争的需要，更加强斗争。过去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军事上未能打开局面，开辟税源地区，相反一年来有些依据收税的平原地区为敌所占领，交通要道为敌所控制，税收因之减少。其次是由于没有财政经济制度，处于无政府无组织状态，更加深了困难，如没健全的收支制度，贪污浪费严重，对税收工作、军需工作没检查，没领导，没帮助解决困难，完全是自流状态，对于目前所处的困难和弱点是完全有条件可以克服的，主要的是以发展军事斗争胜利，开辟富源地区（如雷州的海、徐）、恢复平原基础（如四属、化、吴），控制海陆交通要道，这是克服困难的主要办法，其次是克服无政府、无

组织的状态。

健全收支制度（可参考琼崖办法），建立检查制度，由各级首长亲自执行（纠正贪污浪费现象，提倡节约），对于个别贪污重大分子应给予适当的惩办，并总结经验进行全党全军的教育，再其次是加强开辟税源，改善税收办法；税率分别日用必需品的起征点，和非日用必需品、消耗品的起征点；后者税率应高于前者，收入尽可能办到以外币金银或实物为单位，应设法加强主要税站的武装和管理，对于有生产条件的地区则应该积极进行生产。

（四）加强团结、巩固党是实现党的总方针、争取彻底胜利的主要关键。

目前某些主要地区党内不团结、不巩固是当前党内的严重问题，如不迅速解决，党的工作必遭受很大的损失，吴、化的惨痛教训是不能再次重复，如能正确的解决，则是实现党的总方针的基本保证。这不仅是领导者的责任，而是全党的责任，必须全党同志动员起来，为加强团结巩固党而努力。

目前党内的严重现象是在于无政府、无组织的状态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其具体情况表现于：

1. 违反了党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组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有个别负责干部对于党的指示不经过党委的讨论和允许，自由对下级发表反对的意见（写书面通知和口头传播）；对于有关党的政策方针问题，也没有经过党委讨论，自由向外发表离开党路线的意见，并自由处理问题，违反党的利益，关于政策性的总结，未有经过党委讨论批准，就擅自发到下级去，而引起党内思想不统一。这是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自由主义作风的严重发展。

2. 违反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原则，进行诚恳的坦白批评，帮助纠正错误，而是背后抨击，大骂或则是互相抨击大骂，其目的则是为着打击他人抬高自己，其原因是闹名誉闹地位。由于这种作风的传播，弄成党内思想大混乱。

3. 极端民主，不要集中，毫无纪律，上级对下级的军事命令要下级讨论，才决定是否执行；对于党所分配的工作，合则做，不合则

不做，其理由有的说是思想未搞通，有的说自己没兴趣；在队伍的可自由离队，准亦走不准亦走，请假的也不依时归队，高兴则回，不高兴则置之不理。

4. 缺乏组织的严肃性，浓厚的庸俗作风，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没作严正的批评，怕弄得关系不好，而是迁就妥协，以物质来满足其个人要求，以缓和不满情绪，或则以此来拉拢一批人来打击他人或互相吹牛。亲则重用，照顾周到，疏则不理。

5. 缺乏工作严肃性与责任心，缺乏定期的具体计划。没有经常检查督促及其一定时期总结经验，做了便算，没有进步。开会无准备；漫谈几天都无解决问题。对上级的工作报告不重视，不是长期没有报告就是报告了也没内容。不积极设法克服交通联系的困难，轻视党的领导。

6. 党内的不团结是在于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互相不满，互相攻击，没有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精神，弄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分歧。

这些严重现象的根源，首先是由于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和弱点没有彻底纠正过来，还未有大胆的发动群众批评，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进行完整的自我批评，这就造成党内不满的基础，就给具有宗派主义思想的人打击的条件；其次是个别干部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思想的发展，表现着英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闹名誉闹地位、报复的思想。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就不能掌握治病救人的原则，而犯着专攻别人，提高自己和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领导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就给予下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作风以严重的影响，他们就暴露着无政府、无组织的自由主义的思想。

应依照下列原则解决团结问题：

党内不团结，上下级和同级都负有责任，不过只有轻重之分而已，因此和团结问题有关系的党员干部应搞通思想，弄清是非，赏罚公平，才能解决问题。

在一切为着党、为着工作、为着打败敌人的原则下，被批评的领导者 and 批评者双方应该开展自我批评，虚心检讨自己的思想和作风，

是否符合这个原则，被批评的领导者应虚心倾听同志的批评意见。同时自己向同志进行坦白反省，大胆承认错误。须认清楚思想和作风的不纯是全党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仅自己从反省中来改造自己，而且也为着教育全党，自己思想作风整过了，那末就会影响全党的思想作风，这是自己应负有的责任。

批评者应采取“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方针，帮助他人纠正错误，这是自己一种学习也是自己应有的责任。应认清楚领导者或被领导者的错误，自己也有责任，因为这是全党的思想作风问题，因此批评者也应该反省自己有无违反毛主席的原则，有无这样认清自己的责任，自己的动机是为着党还是为着个人，这些问题都须认识得很清楚，才能有很好的反省，弄清楚问题。

批评应该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不应是片面的局部的，而应是全面的，不应抱有任何成见出发，而是当作学习经验教训和治病救人改造全党来看。批评时应注意发扬成绩，纠正弱点，只讲坏不讲好则不对。分别基本是向好还是向坏的，应重视其新的发展（如对四属、博白工作应着重鼓励发扬成绩，表扬几年来坚持斗争的精神，提高积极性，不应该过于责备，使失掉信心）。历史的旧案如和当前斗争没有关系的。则留待环境好，而不妨碍斗争时再来搞，应着重于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

对于以温、吴为中心的党内不团结问题，应该弄清楚谁是谁非，和这个问题有关系的各个干部，应该互相进行反省和批评，总结这次经验教训，应该根据下列问题来检查获得结论。

1. 敌人集中力量向我进攻情形之下，应以对内为主，还是对敌为主？当时的做法是为着对敌斗争，为着团结，还是为着个人？使党更不团结，实际的结果是有利于敌人还是有利于党？

2. 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还是打击他人抬高自己？是否为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来达到个人的企图。

3. 温两年来犯着什么错误？错误的性质如何？有无新的进步？对党有无贡献，应该以怎样正确态度来对待。

为着使党内思想团结一致，必须解决当前党内的思想分歧问题。

应根据方同志的指示，由上而下的检讨二年来的斗争，获得结论，教育全党。但以不妨碍当前对敌斗争为原则。

为着保持组织上的统一，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反组织原则、违反纪律的行动，必须坚决执行下列原则：

1. 凡是关于党的政治方针政策，非经上级的允许不得有任何修改或对下面发表反对意见。

2. 关于政策性的原则方针问题（不论是总结也好，或决定计划也好），必须经过党委的讨论来决定，不能自由发〔表〕违反党路线的意见。

3. 一切关于原则性问题的处理须要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不能自由行动。

为着保证党内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必须在全党内进行加强党性的教育，增强党的观念，和一切违反党性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

应该号召全党团结在分局正确领导下为实现总方针而奋斗！

南路两年来工作的检讨

(1948年) ①

完全同意方同志的检讨，我们根据方同志的指示精神，总结南路党在两年来的领导，可分为三个时期来说：

第一，东纵北撤时期由1946年4月至12月，这时期的方针：一方面是撤退、复员，另一方面是坚持、隐蔽、发展。这个方针的目的是为着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由于这个方针是符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达到保存力量的要求，所以这个方针是对的，虽然这个方针在执行上是有弱点。这个方针的正确不仅是表现于达到保存力量的目的，尤其是表现于后期有利时机到来时，开展了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如撤退到安南的老一团，不仅帮助了越南革命，而且开展桂滇边的游击战争，打下了建立根据地基础。复员读书的知识分子，动员了许多青年学生到部队中去。留下坚持的武装人员有六百余人，一方面保卫了我暴露的基础，如果没有他们，则我们的基础必受到很大的摧残；另一方面发展了新的地区及成为去年发动发展武装斗争的骨干，如没有他们，去年就不可能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同志们坚持艰苦奋斗起着决定的作用。

这时期曾进行了反对两种偏向的斗争：一、初期由于强调撤退、复员，采取土匪形式，取消党的领导，而产生悲观失望，消极等待，放弃自卫斗争，使蒋匪嚣张疯狂地进行清乡，致我干部和群众遭受一些损失。在六月就开始反对这种偏向，强调坚持自卫斗争，集结小股主力打击清乡土顽，反对消极逃跑的倾向。强调分散积极的发展，反对消极掩蔽，纠正取消党领导和强调土匪形式的倾向；二、纠正了9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月间过早发动武装斗争左的倾向，坚持执行区党委“精干、隐蔽、分散、发展”的方针，虽然执行这方针过程中有偏向，遭受一些损失，但基本上达到保存力量的目的。

主要的弱点：（1）初期忽视坚持掩蔽分散积极发展，致丧失了有些可以发展的有利时机，在9月时过分强调十年黑暗和困难，使干部党员丧失斗志；（2）领导脱离群众，领导机关在城市，领导农村斗争不密切，没有和下面广大群众接触，不能深入了解情况，主观领导、家长制的领导，压抑下级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领导干部的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脱节，对下面生活没有很好的关照，缺乏鼓励和思想教育，这就孕育了上下不团结的因素。

第二时期是由去年1月到12月底大搞时期：

一、初期掌握了敌人空虚的有利时机，发展武装，打击敌人的气焰，摧毁敌统治机构，这种做法是对的。但打死铁胆后，就犯着左倾盲动的错误，这就是全面起义大搞，过早暴露力量和企图刺激敌人，招致敌人的重点进攻，增加了无限的困难。譬如以后向北、向东发展则是因为敌人已有警惕，置有重兵于山地境边，致遭受严重的困难，但是以后若政策不犯错误或能及时纠正，军事上又能积极打击敌人不断取得胜利，同时又能很早坚决打击去向外发展，即是说正确的坚决的执行分局指示的话，困难不仅可以克服，而且可以取得新的胜利，打开新的局面。但是实际并不如此，政策上左，军事上右，组织上不团结，因此就产生后期的困难和遭受一些损失。为什么不能及时纠正，政策上左倾及后期的保守倾向主要的根源是在于党内不团结（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领导上犯着各种错误的结果。

二、左倾的表现：（1）军事上是过于集中打硬仗，过早搞边区挂大招牌，收编土匪伪军，委头招兵，种下以后乱搞的祸根。没有经过思想准备，机械认识军事纪律（枪毙了一个区级干部群众领袖），军阀主义的作风。（2）在具体政策上过早建立一面政权，取消两面，不要统线，乱杀人，抄家、分粮吃地主，损害中贫农利益，经济自杀政策，没收出口货物，禁止谷米出口，这种左政策的结果多树敌人，孤立自己。敌人找到这些弱点，动员组织地主、富农、绅士建筑碉堡，

组织保安队来围困我们。(3) 县委反抗领导，家长制打击干部，拔根政策等等。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是在于速胜论小资产阶级的急性和农民的狭隘报复性的结合，小资产阶级英雄自大、闹地主、闹独立的思想所形成。

由于反左斗争没有从实质上弄通思想，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因此左倾思想遭遇着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就产生右的倾向，而后期军事上保守老地区，不敢或不坚决打出去，不积极主动进攻，打击敌人，而是打被动的消耗战，或避战逃跑，放弃斗争，这是由于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强调困难（过去他们是认为没有困难的），失却信心，这就是由左转向右的发展规律。

三、军事上不能打好歼灭战，也没有发展新区游击战争，长期停留于老地区，这是使化、吴严重局面不能挽救起来的主要原因，为什么：(1) 歼敌思想没有弄通，一不知其重大意义；二是不知其如何算歼敌，以前则以为打退或击溃也算胜利；三是不懂得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劣势的敌人；四是主动思想缺乏，没有搞好情报。(2) 没有按着自己基础及实际情况决定作战方针目标，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而是开始集中兵力打阵地战打大仗，而不是适当分散打击小股敌人，没有从伏击战、袭击战、小运动战搞起。(3) 组织战斗的经验缺乏，往往是漏洞百出，没有严密布置，不能达到歼敌目的，这是由于对敌我情况估计不足，对地形侦察了解不深入，战斗布置粗枝大叶，兵力使用没重点和不果断。为什么这弱点克服得很慢呢？主要是由于没有很好总结战斗经验，没有展开军事民主，没有向下层学习，打了就算。(4) 对战争的领导不重视，没有抓紧中心去搞具体研究情况，亲自动手策划战斗，并及时检查总结，取得典型经验，推动各个地区。对战争领导只要一般原则性的，没有深入下层具体解决其思想上搞不通的问题或各种困难问题，这是由于在思想上认为战斗是团的事，不是自己的事。其次是团结问题，转移对敌斗争的精神。(5) 战斗技术没有提高，这是政治上没有提高指战员的自觉性、创造性，没有总结战斗经验来改造，日常没有军政教育工作来提高。(6) 弹药爆破不能解决或没有认真注意找专人负责解决，由于此不敢大胆进

攻和战斗中坚持到最后解决战斗。(7) 没有健全的参谋政治工作甚至说没有，尤其是情报作战教育。

四、领导上的错误：

(1) 没有走群众路线，而是走书记干部路线，脱离群众，是很严重的错误：①主要是以县级干部书记为主了解情况，而他们则也是一样只是和区委和区长来了解情况；他们思想弄不通时则是以他的主观为标准，对的则多说，不对的则不说。②因此对于政策上所犯的错误的严重及具体情况，群众的意见，是不能反映到地委来，因此对于这种左的错误就不能进行有效的斗争。③决定方针政策没有真正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而只是根据几个干部意见就决定，停租、废债、分粮的错误就是这样产生的。

(2) 没有坚持组织上的原则和严肃性而采取了自由主义；①对于反抗党的领导，没有在党内明确而严肃的指出这些违反组织原则、违反党的政策错误及给予党的巨大损失的危险，警惕全党起来坚持执行党的指示，反对这种反抗领导。②大敌当前对于坚持错误不改的分子，在斗争尖锐当中仍是采取慢慢搞通思想的办法，没有坚决果断的解除领导职务，再行教育。③对于分局十月间打出去的指示，在执行中遭遇阻挠和困难，而没有按实际情况贯彻坚持执行。④没有和分局取得密切联系，经常的派交通及时给分局以新的书面报告，失却党帮助纠正错误的机会，这是很大的损失，这是不重视党的领导，党观念薄弱原故。

(3) 没有展开自我批评和批评来搞通思想搞团结，而只是对下级批评、指责，而没有虚心反省，倾听下面意见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仍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主观主义。自我批评虚心反省，对于当时党内思想斗争是有严重意义，可以启发他人反省，纠正错误走向团结，提高党员干部的积极性。

(4) 没有了解党内的思想情况，即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没有帮助吴[及]其他同志解除思想包袱，而只是从一般原则上而是不完全的批评是不能解决问题。

由于以上领导上的错误就造成不能纠正下面错误，搞好团结的主

要原因，地委要负责任，温负主要的责任。

五、有没有成绩，是有的：（1）对于华南武装斗争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虽然在方针和政策上搞错，但是发展了武装斗争，吸引了敌人十分之四的兵力，便于各地乘空隙发展的机会。其后又有东西区的挺进，帮助发展了中区的游击战争。（2）在斗争中会有损失，但基本上保存主力。这是目前坚持发展的基本条件迎接胜利的基础。

（3）发动了群众减租减息反三征的斗争。（4）开辟了海康局面，打下了四属和五属的武装斗争基础。（5）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使广大人民觉醒起来。（6）培养及锻炼了大批新干部。这些成绩首先是由于大搞前期的坚持积蓄了力量保存了力量，同时南路党一贯对武装斗争的重视，党内同志对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有了准备，和有了放手发动武装斗争的精神（吴的思想启发有很大的作用）。再由于地委执行了分局的方针，纠正了个别地区过早暴露发动大规模武装斗争的错误，末期在几个县纠正了左的政策。当然这些成绩是不够的，开始时如果不能大搞犯着各种错误，依照分局指示去做，则今天局面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大反攻后空前有利条件之下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如果大搞起来，已经暴露的力量和地区企图隐蔽或复员缩小起来，则会犯着很大错误，遭受很大的损失。在已搞起的只有把斗争坚持下去，继续进攻的精神，发展力量、克服困难，并防止错误继续发展，而引导正确的道路去，如对廉江、湛、遂就是这样。而在尚未有大搞或遭受挫折的地区，则应迅速改变为小搞，如茂、电、海康则是这样。

第三时期：由去年12月至今年8月

一、由12月到3月在基本上停止了左，但又转到右去，这就是强调退守，放弃进攻；强调争取上层，忽视发动下层；强调隐蔽分散，而忽视相机集中打击敌人；强调地党，忽视军事斗争的领导；强调总结工作而脱离斗争；强调合法而忽视非法（如经济问题）。由于以上有了偏向，军事斗争、群众斗争都不动，致使敌人不断进攻，特务、反动分子嚣张，建立保队，地区日渐缩小。在此情形下，中间分子、地主绅士动摇害怕以至助蒋。下层害怕，我则遭受军粮缺乏、经济困难、士无斗志，党内悲观失败情绪增长、思想混乱，这是大搞以来最

严重的时期，为什么呢？主要是由于在政治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忽视群众的力量，把敌人企图同实际混合，因而强调困难而忽视各种有利条件和变化的基本趋势，强调客观情况而忽视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做了群众的尾巴。这又是由于没有掌握转变的关键是在于加强武装斗争，加强自己力量，建立自己的威风，而是消极保守的右倾思想，这是小资思想遭到困难挫折而思想方法又从局部片面出发，就会走向右。

二、3月以后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这是发展的基本趋势：

(1) 军事上坚决执行打出去和老区大胆进攻的方针取得了很大胜利，纠正了隐蔽不动的错误，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其重要意义是在于：①掩护了东征部队，使其能够胜利达到目的地。②粉碎了敌人重点进攻计划，使敌人有一个时期由进攻转到退守。我地区开始稳定下去，提高了群众情绪，保护群众的利益，使敌人不敢放肆的摧残（当然还有摧残）。提高我斗志和胜利信心，而使敌的士气低落，争取了时间进行整军工作，经济军粮逐渐增加。③镇压了反动势力的嚣张、使由动摇而走向中立。④我的战略战术思想有了新的转变。⑤使恢复基础和发展新地区增加了新的有利条件。

(2) 各种具体政策基本上是符合分局的政策，过去左的政策基本上纠正过来。

(3) 开始注意整党、整军工作，虽然做得不彻底不够。但是为什么有以上的转变，这是由于①对南路形势的估计纠正了偏向，坚定了同志的信心；②坚持了2月指示和反对右的偏向；③掌握了以军事胜利来转变形势的关节。这是从分局的正确领导获得来的。

粤桂边区党委关于恢复地方组织处理 干部党员历史问题的几个原则

(1948年) ①

一、在恢复地方组织时，必须注意吸取抗战时期某些地区整批吸收、马虎处理，以致影响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使党的工作受到严重损失的惨痛经验。确立个别吸收，严格审查的原则。

二、必须严格谨慎执行，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是非轻重，给以适当处理的原则：

1. 对为了应付敌人，团结群众，与群众同进退，整个支部向敌人作群众性的自首，目前已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斗争者，经分别审查之后，可接收其全部组织关系。

2. 由支书率领自首，目前已积极参加各种斗争，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者经审查之后，可准其重新入党。

3. 自己自首并劝别人自首，没有陷害同志，目前已认识错误，向党坦白但无工作表现，暂作进步分子联系，给予工作机会，经过考验之后才考虑是否准其重新入党。

4. 自己自首并率领全体自首，目前向党坦白，并领导武装斗争，建立功绩者，可酌量情形准其重新入党。

5. 曾经叛卖组织，陷害同志，但目前表现尚好，自动向党坦白者可作同情分子联系，但不能恢复党籍。

6. 有过自首叛变行为，不肯向党坦白者，经调查证实，并经上级同意后，即停止其党籍。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7. 被捕后，没有供人叛变，但在出狱时履行一定手续，而内容又不妨碍党的利益者，可作思想动摇去进行教育。

8. 曾经加入本党，后来自动退出，现又要求入党者，须有经验的党员二人介绍，并经上级党委审查批准之后，才准重新入党。

9. 曾加入其他党派，目前尚无材料证明其完全可靠，但也无材料证明其确实是破坏分子者，暂作个别联系，待查明后，才能考虑其党籍问题。

10. 曾经加入其他党派，经过审查之后，证明他入党时确曾向党报告，并在长期工作中，确和该集团脱离关系者，可保留党籍。

11. 长期脱离组织关系，经审查后，证明其失关系期间仍继续为党工作，并有成绩表现，如建立政权、武装党群众集团者，应承认其全部党龄。

12. 长期脱离党的关系，经审查证明，在失关系期间，无做坏事，也无成绩表现，但目前已具备了党条件者，酌量情形，准其重新入党。

13. 中间曾与组织失去较短时期联系，头尾两段较长时间则在党的领导之下工作者，经审查后，认为没有政治问题，应承认其党龄。

14. 经审查之后，认为失联系原因，应由上级负责（如四二年的停止组织活动或由上级疏忽忘记转移）者，应恢复党籍。

15. 经审查后，认为历史上无大问题，但缺乏证明材料，一时不敢下肯定结论者，暂时重新入党，待查明后，才追认其全部党龄。

16. 经审查后，认为全部历史无大问题，但仍有个别问题不敢下结论者，应继续找寻材料进行研究。

美南关于最近南路工作情况报告

(1948年) ①

方、林二同志：

我在此已满三月，兹将研究情况及经验所得，向你们提供几点参考意见：

(一) 关于根据地问题：粤桂南部边区，从地理形势来看，北扣于西江，南临海，西部十万大山，如狭长围屏，东部茂、信一角与三罗、两阳、北流、容县，构成一山岳地带，范围颇大，北部玉林以西，灵山以东，合浦以北，兴业以南一块山地，博陆之内有几条形如长蛇的山脉，均成孤竖之势。南路本部基本上是一片岗陵（数十米远），林木颇多，这样的地理形势，如不和三罗、两阳结合，则无险可守。从政治形势来看，茂名（高州）、合浦（廉州）、玉林、湛江四个反动势力的中心，布成方阵，五属是广、要反动统治最集中强大的地区（这一点以前我们不知道）。

碉堡林立，神家庄的势力不让于高州、廉州等中心地区，现在南路与三属地方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已经普遍在我区内及附近则固守碉堡，在我力薄地方，则清乡扫荡异常猖狂，群众害怕。这样的反动统治算是很强的。左右江一带地区是广西统治最弱，山岳盘纵，幅员颇大，有革命斗争的传统；背负越南，左攫滇黔，右携粤桂，经济条件虽劣，但如能自越南取得补给，困难也不多。因此，我认为从长远着眼，南方左翼的根据地应确定在这里，如何经营这个战略基地，请你们更加注意。至于粤桂南路边区，除经营一些梅花式的星罗棋布的据点之外，应向东部茂、电、信发展，以期与中心衔接。望中区也加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强这方面工作。

(二) 一点经验：南路的斗争，今年上半年的速胜观点，大搞方针，解放区形式我认为是犯了左倾幼稚的错误，武装发展很快，工作方法有新的创造，这是成绩和好的地方，但自己立足未稳，就和还很强大的敌人进入规模较大的程度很尖锐的斗争，初期乘敌不均颇有成就，一振人心，现在敌已立定脚跟，对我反搏斗就很吃力。三个月来，无论新地区的开拓，武装力量与群众斗争的坚定都不易前进，人心观望。现在基本上是要我们如何巩固成果和如何巩固据点了。但现在我们的力量仍脆弱，据点仍在平原，万一不支，将无险可据，要挺进到山地，则那里基础极弱，地方反动武装严阵以待，敌之主力又跟踪追击。因此可说现在一路都有困难，不克服这种困难，迁延时日，斗争必遭严重的危机。我个人深有此感，故请你们注意对其他各地，不论平原或山地，当自己未曾站稳脚跟打下据点或根据地基础之前，张扬突出的集中大搞是冒险的。北江对于九连、大庾，西江对于连阳、临贺、萌渚、骑田，中区对于三罗、两阳，东江潮属对于莲花山脈和八乡山。上述各山岳地带，在目前斗争状况中，我们千万要伸出一只手去开拓工作，不可给现在的有利状况冲昏头脑。

(三) 关于当前南路的斗争提到困难问题：我认为如何冲破困难是当前首要的问题，你们前信所提的意见都是克服困难的正确办法，现在还没有切实的执行，原因甚多，其主要者是这时期着重在搞通思想。因如果对长期斗争认识不足，对斗争前途的迂迴曲折和攻守关系茫然无知，对当前的困难未有研究，要执行你们的意见是不可能的。现在准备根据你们的意见，集中提出四个问题来和这里的同志研究和布置：

(1) 是如何在战斗中建设主力并使它逐渐发展。

(2) 是如何在现在的扫荡中取得胜利战术指导（及群众斗争）的问题，我和这里的同志都是不够的，但仍应尽心研究。

(3) 是如何巩固老地区的现有基础，老地区旧时的力量凡可发动的都使出来了，新发展的适宜于长期，在不利情况又可以掩蔽保全的属少数。

(4) 是如何朝向山地前进，建立分散的据点，如茂、电、信，如化、廉、博、陆，如合、灵、兴、玉，如钦、防、十万大山区域等，其具体办法及进行情况候以后陆续报告。

美 南

粤桂边区党委

关于各项具体工作的原则方针

(1948年) ①

一、对地方派别的政策：

我们不公开参加任何一派，实行两边和、两边打以及两边拉、两边挑的政策。

二、对待械斗村的政策：

实行两边和、两边搅的政策，反对两边助、两边打的政策。

三、对地主官僚村庄的政策：

和上搅下，先和后搅，一面和一面搅。和即是和上层；和全村；搅即是搅下层，尤其是发动下层群众组织，专教育下层群众。但在未有力量之前，不可发动阶级斗争，不好过早搅反地主。群众斗争要在双方兼顾之下既可搅群众，又不搅反动地主。

四、对待反动分子、特务分子的政策：应是两边性的政策，对其反动性的一面，则与之斗争使其缩小；对其动摇性的一面，则加以利用，使其扩大。这个政策应该是一面打一面拉相结合，以拉为主，既打又拉，从打中去拉。打是为了拉，打就是镇压，拉就是宽大（打要杀一警百）。

五、对伪区乡保政策与武装政策：对其动摇性一面尽量利用，打击少数，争取多数（争取作两边掩护我们的活动）。

六、对待土匪的政策：以两边政策，对其依我性的一面则实行利用，对其反我性的一面则实行消灭。政策是有分别、有步骤地争取利用、改造、肃清土匪，争取助力，消除阻力。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七、对待流氓分子的政策应该利用，不可依靠，应该使用，不能重用，应该改造，不可放任。

八、对待基本群众的政策：一方面发动与发展基本群众，发动群众的基本方针是从群众的不同要求出发，有分别地、有步骤的发动群众斗争，解决群众的各种具体的民主、民生问题。

另一方面又要正确地进行宣传教育群众，宣传教育的基本方针是从各种群众不同的思想觉悟，步步提高群众。

关于开辟新地区的经验总结

(1948年) ①

(一) 为什么要开辟新地区

大反攻后，全国新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如果我们的基础还停留在旧地区，我们的工作就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为着推动南路以至粤桂边区革命高潮的全面到来，我们必须广泛发展新地区的工作，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随着胜利的日益迫近，我们的新困难也会跟着增加，由于过去集中一点盲目大搞的结果，过早暴露了自己，威胁了敌人，引起敌人对南路实行重点进攻。同时，由于宋子文的驻粤，日益加强对人民武装的防御与进攻，因而使南路遭遇到新的困难，这困难有可能随着全国有利形势的发展而日益增加。我们要渡过胜利前的困难，粉碎蒋、宋在华南的反动统治，必须“以发展粉碎进攻”，冲出现在的狭隘地区的圈子，把局面打开，力量扩大。否则，依然局限于一隅，会在围困中遭受损失的。

(二) 开辟新地区的任务

开辟新地区的主要任务有二：（1）广泛发动群众；（2）普遍组织武装。这两个主要任务，又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创立边区。

过去我们在开辟新地区的工作上，有单纯发展部队的偏向。我们的武工队或游击队开到新地区，不把群众工作放在第一位，甚至有的完全忽视群众工作，而单纯在新地区“招兵买马”。结果兵马虽然招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到一些，买到一点，但不能在新地区站稳，就被敌人赶回。开辟新地区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是由于干部只有单纯军事观点，缺乏群众观点，特别是依靠群众的观点，只想以枪杆子单纯武装打天下，不懂得群众是军队的保姆、靠山与脚跟，没有群众，我们就不能在新地区站稳，就不能生存发展，就不能得天下。

今天我们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如果不能有计划有目的的朝着建立边区这一目标前进，则我们的工作将会失去中心，失去重点，我们就会不懂得把一切工作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就会不能密切配合，互相联系，彼此照应，这在今天这种革命高潮来临之际，显然是跟不上形势的。

(三) 开辟新地区的活动方针

开辟新地区应该采取“分散活动，广泛发展”的方针，不可老是集中全力搞一点。过去我们的武工队和游击队在新地区发展一些力量，过早把人枪集中起来。结果地下空了，部队悬在半空，敌人进攻，立足困难，长山就是一个例子。这也是由于单纯军事观点，缺乏依靠群众观点的结果。有的武工队、游击队和徒手队，在新地区开辟了一、二个乡或几十条村，就满足起来，不再继续前进，不懂得天下是大的，我们的目的是打大天下，不是打几十条村的小天下。

(四) 开辟新地区的武装组织形式

我们的经验证明：武工队是开辟新地区工作初期的最好武装形式。我们所要开辟的新地区，一般的情形，是敌强我弱，优劣悬殊，在这样的形势下，不论武工队或游击队，如果一味张扬暴露，而不注意隐蔽，一则会时时被敌进攻，既打不过敌人，又要天天应付战斗，无能力做群众工作；二则群众看见我们公开暴露，又不能战胜敌人，因而发生害怕，不敢掩护我们，更没有信心和我们站在一道。在这个时候，武工队是比较更好的形式，既便于隐蔽活动，不易招致敌人进攻，不须过多应付战争，有余力做群众工作。同时，群众看见我们人数少，也敢于掩护我们，在这种条件下，就是徒手队也是可以开辟工作的，

广州湾外围群众基础的建立，就是如此。如果新地区敌人力量薄弱，我以战斗部队与武工队结合使用，当然更容易，也更迅速打开局面，但局面一经打开，敌之主力也往往集中向我围攻，寻找我之主力决战，此时我之主力部队，即应迅速秘密转入另一新地区活动。而留置若干小股游击队和武工队在当地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坚持斗争，不暴露，不打大仗，严密注意和镇压特务、奸细及反动分子的阴谋活动。全心全意为人民做好事，这样便易于坚持和开展工作。

(五) 和缓上层和发动下层问题

我们对上下层关系，一般的说，应该是和缓上层，发动下层，两者互相结合，不可偏废。在今天新地区的条件下，如果我们不注意到和缓上层，一到那里就与他们对立是会妨碍发动下层的，但是如果无原则、无区别地一味和缓上层，就会变成“走上层路线”，模糊自己的立场，失去群众的信仰，更是要不得。我们所需要和缓的上层，是指那些开明地主、士绅和今天还不需要打击的分子，至于为数很少的恶霸土劣、反动特务、为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坏蛋，则需要分别轻重先后，集中火力予以打击。我们和缓上层，是为了更好的发动下层。以发动下层为主，和缓上层为副。有些同志机械地了解问题，他们认为今天的革命对象，是地主阶级。因此对每个地主份子，都一样只应该打，不应该拉，拉就是“地主思想”，这是错误的。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地主阶级，但是对各种不同政治态度的地主分子，我们不应该一律对待。尤其当我们初到新地区时，下层群众尚未接近我们，而上层分子又或多或少地在群众中保有某些威信和影响，如果我们即刻向他们大家开火，那就会阻碍我们对下层的发动，因为这个时候群众还是听命于上层，而把我们目为“搞是非”的人。所以通过上层去接近下层，或者以小部分人去联络上层，麻痹上层，而以大部分人去接近和发动下层（因为有些上层分子害怕我们和下层接近，便故意殷勤招待，应付我们，暗中却恐吓或阻难下层与我们接近），都是顶有效的办法。东海、遂溪南区和茂、信、电在这方面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因此，我们对一般上层的方针，是先拉后打，下层群众未觉悟和

发动起来之前，我们要拉，但群众已经接近我们，已经觉悟起来，要求打倒上层时，我们就打，拉是为了发动群众，打也是为了发动群众，何时拉，何时打，看群众对我们和上层的态度如何来决定。过早或过迟，乱打或乱拉，都会犯错误。

(六) 入手问题

我们到新地区如何入手呢？过去的经验证明：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入手，即使是封建关系也好，比方宗族关系，我们要搞某条村，就找和某村同姓同族的干部去接洽。廉江的经验最多，他们通过宗族形式，组织了很多武装，这个族看见那个族组织了武装，不服气，起来竞赛。你看见我的枪枝好，服装好，全族也不服气，出钱改良装备。又比方功夫馆关系，廉江找到个功夫头，通过他去找他的徒弟，很快就找到了几百人。其他如朋友关系，亲戚关系，同事、同学关系，甚至土匪等等关系，都可以利用的，问题是通过上述各种关系深入下层，了解当地具体情况，根据群众要求，积极领导群众斗争，在或大或小的胜利的斗争中，积极去发展力量，壮大力量，并随时注意巩固和改造等工作。

(七) 分散与集中问题

如前所述，武工队与游击队开入新地区的活动方针，应当以分散为主，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开辟地区，扩展力量。故以分散活动为宜。但侦察或发现到有好打“好吃”的小敌或弱敌时，则须迅速集中，坚决予以打击和歼灭。待任务完成后，又立即实行分散，所以当须要集中时，就立刻集中，决不能坐失时机，助长敌人气焰，影响群众情绪，妨碍自己发展。当需要分散时，便立即分散，决不能为一二胜仗冲昏头脑，轻视敌人，长久集中，以致被迫和敌人打大仗，影响以后的发展。但何时应分散，何时应集中，又须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灵活使用，适当决定，不能死守原则。不过一般的讲，在目前情况下，总是分散的时候多，集中的时候少，工作的时候多，战斗的时候少。

(八) 流动发展与固定坚持问题

我们的游击队、武工队或徒手队，开到新地区，最初不能就在一个乡或一、二条村固定下来，满足于一点一滴的成就，而要采取流动发展的方式。但自始至终都是流动，也是不对的。过去经验证明，当我们搞开一二十或三四十条村之后，就要把几个人留下来，固定在这些地方，实地帮助和领导当地干部及积极分子，坚持工作，扩展工作，我们既要流动发展，又要固定、坚持，两者必须好好的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才能求得巩固的发展。

(九) 发动与强迫问题

我们的群运原则，是发动群众自觉自动的力量，因此，反对强迫命令主义，强迫群众开会、宣誓，命令群众组织农会、村队，群众被迫低头应付，如同应付国民党一样，但他心中不甘愿，甚至怨恨我们。许多地方曾经发生这样的情形：群众一面被迫答应开会，一面暗中派人（有的是反动分子策动的）去报告国民党，这是完全失败的。

但是有时用行政方式，强迫的命令乡镇保甲长或绅士为我们敲锣，召集群众，也是必要的，因为群众几千年来受惯了这些人的统治，这些人一敲响锣，群众是不敢不来的。这样召集群众之后，就有利于我们去接近群众、发动群众。所以这种强迫，主要是为了发动，但这是强迫上层，而不是强迫下层，强迫上层的目的是为了发动下层，如果去强迫下层就不对，我们对下层基本群众，是不能强迫的。当然，有些上层分子，如能经过说服，自愿帮助我们，最好也不要强迫。

(十) 公开与秘密问题

武工队或游击小组初到新地区，一般的说，应采秘密活动，即所谓“秘密武工队”或“秘密游击小组”。在这种秘密活动的方式下，又要与公开活动方式相结合，比方一条村，如村内群众好，无反动分子，就可以在村内公开，村外秘密，但如村内有反动分子，就在村内也要保持秘密，等到村内反动分子肃清之后，又可以在村内公开，这

就是“先秘密后公开”。

群众组织形式，有时是公开的，有时也是秘密的，如果村中全无坏人，群众的红色组织，可以在村内公开，村外秘密。反之，即建立群众的灰色组织（如兄弟会、功夫馆、同心会等等），形式上公开，实际上秘密，这叫做“愈公开，愈秘密”。

政权问题，过去的经验证明，应先秘密而后公开最好。如初期用两面政权，形式上是国民党的（乡保甲），实际上是我们的（同志、同情者、靠近我们的中间分子），等到我们力量强大，足以控制那个地区时，才建立一面的公开政权。秘密为了公开，两面为了一面。

根据地问题，也应划分公开根据地与秘密根据地，一切都公开了，而无一块掩蔽地区，那是很吃亏的。掩蔽根据地作用很大，帮助公开根据地保存力量，隐蔽医务、弹药粮食、被服，保持交通联络，并为领导机关使用等等。

（十一）依靠和利用问题

我们只依靠一种人，就是广大群众（工人、贫雇农、中农、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中小工商业者，以及一切贫苦的、被压迫的人们），特别是基本群众。天下是群众的天下，是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用自己的力量打出来的，没有发动广大群众自动自觉的力量去斗争，任何英雄好汉，都不能代替群众包打天下。所以我们到达新地区后，第一脚就要依靠基本群众，我们新地区发展的根本关键，在于能否发动新地区的基本群众。

但是，必要时，暂时利用流氓地痞，是可以的。有时基本群众还未发动起来，而流氓地痞先来（他们的动机是投机取巧），我们通过他们去接近群众，是有利于群众的发动的，但这是暂时的利用，而不是长期的依靠。流氓地痞不是基本群众，是绝对不能依靠的。就是利用也不能“太高谱”，而要很好的加以教育、约束和改造。如果“太高谱”了，无可救药了，就是反过来，用群众的力量加以淘汰和制裁，也是必要的。

(十二) 讲与做问题

讲就是政治宣传，做就是为群众做好事，两者要“双管齐下”，但以做为主，有做不讲不对，有讲不做更不对。

我们群运的目的，是要发动广大群众，可是怎样去发动呢？讲是需要的，许多地方经过我们的政治宣传之后，落后群众动员了起来，知道共产党道理对、力量大，快要胜利，于是希望大了，信心提高了。但单靠宣传，那是不够的，是不会生根的。因此，就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做法。

发动群众最基本的一点是解决群众的民生、民主问题，即为群众做好事。为群众做好事，群众就亲身体会到共产党为穷人，跟共产党走有好处，群众得了好处，就会起来为“好处”斗争。这是发展新区的中心课题。

为群众做好事，是最基本的，但要反对恩赐观点，如果我们只单纯恩赐东西给群众，就只能使群众对我们‘感恩’而不能发动群众的自动自觉——即阶级觉悟。如四属的群众工作，就有这个毛病，所以发动群众起来为自己的一切利益而斗争，又是中心之中心，即使我们的救灾救荒及其他一般的救济工作，在群众朴素的意识里，可能当作是一种“恩赐”，但我们仍应当作是一种群众运动来做才对。

过去我们的武工队和游击队开到新地区工作，往往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其基本原因是有讲无做。有些徒手队到新地区（如广州湾），肯一点一滴为群众做好事，反而一、二个人在二、三个月内发展了广大地区。

(十三) 镇压与宽大问题

我们对反动分子或特务分子，应该实行一面宽大，一面镇压的两面政策。我们到新地区时，反动分子与特务分子对我们工作的阻碍，是非常之大的，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出乱子。过去的经验证明：应该杀大多数群众认为最坏的、罪大恶极的分子，这样做了，既可分化敌人（其余的怕了），又可发动群众（群众不怕了），但是对不是大多

数群众愤恨的次要分子，则应该赦，对于我们认为该杀但群众没有认识他的罪恶而不主张杀的，应先做揭露工作，待群众认清同意杀时，杀之，如果乱打乱杀一顿，既触怒上层，又会激起下层反感。

所以，我们的方针应当是人杀得越少越好，必要的杀，也是为着拉更多的好人和我们在一道。我们要消灭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但除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外，我们不是要去消灭这些阶级里一切分子的肉体。

(十四) 大村与小村问题

在一般条件下，应先集中力量搞大村，以期突破一点，影响小村，发动小村。但大村居民往往比较复杂，他们跟外面亲戚朋友来往，也比较频繁，所以工作也比较难搞。如果我们的力量太小，阻力太大，在特殊条件下，可以先搞小村，以小村包围大村，推动大村。

“放手发展，放手大搞”的工作方针是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从现实情况与要求出发，并指导现实斗争的。为此，切实掌握具体情况，确定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以便更好的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扩大力量，就必须随时随地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以期实事求是，这是最要紧的。

(十五) 普及与提高问题

新地区的开展工作，在初期，一般的说是侧重于普及，广泛发展，分散经营，就是普及的做法。但是一到普及到了某种程度之后，就应当侧重于提高了，长时期的把工作停留在分散的、隐蔽或半隐蔽的白皮红心的状态下，显然是不能满足形势的要求的，此时领导就应当明确的提出进一步的斗争任务和口号——如实行分耕、分田、废债、建立主力、建立政权等，把斗争运动导向更高阶段。

关于钦廉四属政治经济情况报告

(1948年) ①

一、钦、廉二州共钦县、合浦、防城、灵山四县，计有人口约二百万（合浦七十余万，钦县约四十万，防城三十余万，灵山三十余万），这四属比较明显的特点是：

①落伍军阀及大官僚、政客相当多。主要人物有如下几个：陈济棠、陈维周、巫剑雄、陈汉光、刘振湘（以上是防城）、香翰屏、林翼中、黄质文、陈铭枢、邓世增、沈戟和、区芳浦、张梅新，过去大汉奸范德星等（以上是合浦）。

②由于第一个特点便产〔生〕了二个特点：a. 是当过军的落伍失意在乡军人多，尤其是中下层干部；b. 是武装多。

③是土地特别集中，阶级对立特别明显，这里有二十万租（合浦小江宋家）、十余万租（下江容家）的大地主，而几万租、几千租的地主则一时难统计。由于军阀、官僚政客多，而土地也就猛烈集中，由于土地集中而广大农民失去土地的情况也特别严重（可惜还没有具体统计的材料），这样阶级斗争也来得特别尖锐，民初更有农民自发的“保神会”众攻下县城，表面上是为神为迷信，实质是反地主豪绅吞并土地的斗争。前数年便有白石水、小江二区农民起来反地主的武装斗争，主要原因也是因土地。

④是土匪多。这是由于落伍军人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多，和民间武装多所产出来的，光是西场一区便有大小十余帮，共有人数二百人左右。只要看看钦、廉当地日报，差不多天天都有一二段是“匪”的消息。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⑤是祝家庄多。由于大地主多，土豪恶霸多和枪枝武器多，他们便很容易结合组织“祝家庄”来共同防匪，成为目前我们工作进展的很大障碍。这些“祝家庄”往往就有一二十挺轻机、百数十千长枪，养有家丁防守和顽军及K政权机构结合，事实上是农村封建势力镇压农民的堡垒。

从以上几个特点，可以了解到四属的工作尤其是武装工作的开展方面是有利，另一方面是有很大的障碍，反动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基本上客观上是有利的条件多的，只要我们的办法好是有很大的前途的。

二、K现有在四属的军事力量的统计：

①广西军：四中队约一百八十人在钦县、防城（在今年开到）（轻机三四挺）。

②保十大队：一大队共三中队共约百五十人，轻机二挺，重机一，冲锋机二，迫击炮一（大部在灵山，小部来合浦边境）。

③各县地方团队：

A. 合浦：自卫队二大队，共六中队，人数三百余人，轻机四挺。

B. 灵山：自卫队二大队，共七中队，人数约三百五十人，轻机七挺，冲锋三挺。

C. 钦县：自卫队共六中队，人数约三百人，武装配备不详。

D. 防城：自卫队共五中队，人数约二百八十人，轻机六挺。

④此外各县有些地区组织有联防队，但多数是有匪即集中起来，无“匪”又疏散，所以人数很难统计，这种组织多是乡村中豪绅地主主持。

⑤此外各区乡保还有一些警察（合浦五个派出所，每个约十五—二十名），每乡有自卫班（合浦五十乡，每乡约十名——二十名不等），间有些保，每保有二三名至十名的保丁。

K的四属的全部武装力量大概的是如此。

⑥由于地主多，乡村封建气味浓厚与势力强大。一方面他们容易结合成立祝家庄，但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又往往有矛盾斗争，往往为分乡村统治权、氏族土地或水利等引起斗争，而斗争往往就发展为双方动员数百人的武装斗争。如过去合东之南山范氏与上廉洞之张氏就是

为分田水，双方相持不下，时起时伏的至今未息的武装斗争。

⑦最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过去我党在合浦的组织是相当庞大（据说光是合浦一县就有过三百人以上），但经过几次挫折、解散后，到目前四属合计起来可以恢复的只有六十人左右，那末其余的哪里去了呢？大部份是消沉了，由于长期无人领导管理，而这些又多是社会关系复杂的知识分子，而这地区特务分子的组织又是基础强固的，所以这些消沉分子又容易和特务组织所结合，所以不少是入K的三青团、剧社或其经济组织的合作社或商店，也有不乏赤裸裸露骨的做起特务来。所以这里的组织是经过很大的变化，暴露特别严重，要组织地下党不容易，只有坚持与开展武装工作。事实上目前遗留下来的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基本忠诚的优秀人物。在坚持和开展武装斗争中是牺牲了不少的党的优秀同志和干部（光是灵山一县就有三十人以上，那里当时只有六十人左右，除消沉和牺牲的外，坚持斗争的是不够十人了。合浦同样这情况）。

三、K的“清剿”机构及其对我的“清剿”办法：

①K目前的“清剿”机构的组织，虽统一于林英所领导的粤桂南区“清剿”指挥部，但单位复杂，兵种乌合，产生出三个大弱点：

a. 是内部不和。指挥官林英本身原是粤南师管区司令，照理他是不应负地方绥靖的，但这次他以“分属军人，保土为责”为词来自告奋勇，而抓到这“清剿”司令兼职，其目的是在扩展其势力，趁机发财。林英其人的特性是横霸逞势，好露锋芒，骄妄爱财。他是琼崖人，地方人对他又有地方成见，当初八区专员林荫根本来是想自己来做头子的，但给林英自告奋勇，自己头上加一个监督的指挥长官，自己一切计划落空，当然扫兴。七区专员林时清见林荫根这后辈所倡导的所谓“七八两区连防剿匪”的提议，便不感兴趣，林荫根打电给他来湛开会磋商，林时清不到，林荫根大肆攻击他的“不合作”，林英也趁机打击他“对剿匪消极”，是此林时清有“辞职”之举。此外还表现在广西地区的行政长官和部队长官及保十总队长官都不太理睬其指挥，因〔鄙〕视林英之“横霸”，认为他目前这份兼职是“霸”来的，不应是他的。但当“匪”患严重时，他们也好乐得有人去支撑，

但如果当和缓起来或给予严重打击下而不和之，攻击林英的现象将更严重的。

b. 是兵种单位复杂，乌合组成，有保十总队、广西自卫队、各县自卫队和林英师区的新兵（忙丁），而这些新兵是缺乏战斗力的，所以往往林英不敢用这些新兵来作战，只用来虚张声势，而这样做，又往往引起其他打前锋的部队的不满，“只叫人去打，自己的兵不去打”。

c. 由于复杂，新兵乌合组成，因此“纪律”特别涣散，“扰民”事件到处产生，不能得到人民支持。

内部不和，兵源乌合，不能得到民众支持是他的三个大弱点。大概林英亦既知道这三个弱点是制其死命的问题吧，所以最近发出哀鸣！认为“纪律为军队命脉”，“非整饬无以收清剿之实”，“最近据报本区所辖各剿匪部队，间有军纪废弛，借清剿而扰民之害群之马”，认为这是“授奸匪以口实而长其气焰，招民众以反感”，要求其部下以后要“激发天良，克尽天职”，要“严训所属，服从命令，所到之处，除奸匪而外，秋毫不得滋扰，务使耕市不惊，军民合作。倘有各乡保甲长，因受奸匪诱惑，厚诬我军，妄加控诉，为奸匪作宣传者，亦即呈报究办，以保军誉，而振士气”。（四月九日密秘密代电）由此可见其自己也承认有“扰民事件，军纪废弛”之事实，但他这一纸文告是否就能有所改善，这可以确定是不能发生丝毫的效果，相反，今后如有民众及乡保甲长呈报或议论其“军纪废弛”和“扰民事件”事时，其部下必以“受匪诱惑”、“代匪宣传”、“破坏军誉”之名来拉人杀人的，多发一令，便多一发财机会。

他认为目前的“进剿”是治标，发动民众起来协助及健全保甲制度才是治本之法，因此又发一个所谓“党政军民协同”，兹将其书面谈话内容如下：

a. 军队少卫民，不如人民之自卫，主客异形，劳逸异势，其理至明。然军队职在国防，不能常任地方绥靖工作。省防团队，为数无多，不能处处防守，惟查匪徒肆虐以来，地方富有者大都避居城市，视乡事如奉越。此种偷安一时之心理，将遗害其身家。如地方贤达均

能回里领导，作自救救乡之运动，家自为守，人自为战，守御既固，则匪无所逞。自卫既有力量，纵匪患一时未尽根绝，一闻警报，军队攻取自易为力，故欲图长治久安，用兵于守，用兵于攻，攻守得宜，匪患乃绝。b. 军队剿匪时，所有地方武力、民众团体，均应分配使用，有枪出枪，有力出力，供给情报，向导引路，各就所能，分担任务。c. 通讯交通，不特与绥靖工作有关，抑且影响复员建设，所有公路桥梁与电线电杆，后由各乡村分段巡逻监护，如发现匪徒麋集或形踪可疑之人，应即飞报附近之防军团队，派兵追剿。若有知情不报，或发觉破坏偷窃事情，所属乡村，应负其责。d. 查匪区粮食缺乏，如能管制得宜，封锁严密，实足使之窒息。盼望各行政机关、地方人士，共同防范。如有济匪粮食者，一经查出有据，即拘拿法办。e. 党政军民配合运用，同心同力，主要条件，所有党政人员，务须研求方法，使各方联络密切，运用圆滑，以利事功。f. 组织即力量，故民众组织至关重要。在绥靖期间，以民众之组织击破匪之组织，尤属急不容缓。凡属党政人员，务宜因地制宜。发动民众组织各种社团，团结一致，以期共清匪患，而谋久远。以上所举不过略述端大，至于施行细则，容后策定。

②在四属目前实际上如何“清剿”呢？

a. 主要是用“三连”法和组织地主。所谓“三连”就是“联防”、“连剿”、“连座”。

“联防”是因兵力不足，叫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保与保、这个祝家庄与另外的祝家庄联防起来。

“连剿”是一发现“匪”要不分地区，动员所有兵力民力来进剿穷追，可以越界。

“连座”是五家联保，各甲互保，各保各乡互保，一家有匪连座其四，一甲一保一乡有匪藏伏，连座其他四甲四保四乡。

成立三五乡为一区的“联防清剿委员会”，来进行这三连法，利用地主豪绅做主持，有联防队，有便衣暗查，有剿匪缉匪基金（由地主筹，以至贫苦农民亦难免出谷出钱），规定经常会议（一月一次）与临时紧急会议（由联防主任召集），有了望哨与步哨，供给防军情

报，与防军合作进剿。进剿时往往只有自卫队一中〔队〕便动员数乡之乡保联防队及祝家庄之民众数百人来进剿，如三合、灵山东北之役都是如此

b. 这“三连法”地主豪绅也很会利用，有些地主豪绅把持着祖尝，他便召集全族会议，决定不准参加“奸匪”，如发现谁参加就“出族”，停给“丁谷”、“丁肉”，连及其父兄（如公馆陈族，白石水梁文光）。

有些地主利用“大家连合保牛”或“保租”之名，要每耕户有牛一头便要买枪一杆（黄牛买土曲一，水牛买长枪一，有租在百租以上要买轻机一）。当然这还是不甚普遍，只是某些地方既开始如此做法。

同时发动筑炮楼碉堡，不能的便用竹木来围筑成一个祀形小土城，每夜轮值守夜，但这势必要下层农民及在乡军人来支持，但地主豪绅的特性一般都是渔肉农民，不顾农民利益，所以很难得到农民的长期支持，当他一发现“这只代地主做守门狗，连猪骨头也不得吃”时，或一了解我们是为“穷佬打世界”时，或发动减租减息时，农民便不但不是支持，而且会到处探我们的路线来迎接我们，献计破“祝家庄”。

同时地主要养相当的守家狗，支出是很大的，且不一定可靠，如果当他一证实我们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时，也有不少是愿意和我们“和”。同时这些在乡落伍失意军人，本来是相当顺从其过去的长官（即现在的地主豪绅），是靠过他吃饭的，以前是满望他“有东山再起”之日，但只有日见不好之消息，如蒋介石不信任，蒋介石排除异己等，这些人便一方面失望，另一方面便恨蒋介石，也是有可能为我争取利用的。在我们地下军的组织里是有相当人数的。

关于南路半年来形势和工作情况报告

(1948年)

I、半年来的情势和斗争方针

一、敌情：

去年十月陈沛带保一、保二来接任粤桂南区剿总职，其剿的重心放在化、廉、吴、遂，在这几个县就摆着三个保安团（保一、保二、保十），并有在合浦的保九在合廉边、广西的保六在粤桂边的配合，当时他集结了二个保安团的兵力约千五百人左右，再加上各县的地反五百到一千向化、廉、吴、遂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初时是要找寻我主力，使用远途奔袭、分进合围、轻装突击，神出鬼没，四放谣言，施行神经战。先向遂溪出动，大扫一次，即刻奔扫吴、化，继〔而〕很快的又转回廉、遂，这样东奔西跑，来势甚凶，但我知情，突出包围。除遂溪于去年十一月和他打了一次主力战外，余无损失，基础仍存，乃转变进行重点扫荡清剿，而以化、吴为中心。除了集结保一、保十外，还调动化、茂、电三个县的自卫大队共约三千余人向吴、化重点进攻。首先搞垮吴川，后搞化南，再搞化北，其后则转向廉、遂。由于我政策的错误，多树敌人，敌人在吴、化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全面恢复了化、吴的反动统治，敌人从这次的胜利当中获得了如下的经验：重点填空题找寻我的错误和弱点，普遍组织地反、特务，建筑碉堡，剿抚兼施，先大屠杀，后招抚，组织自首，利用叛徒，逐村捕捉和屠杀我坚持的地方干部，以极端残酷的恐怖镇压农民，使〔之〕不敢收容、接近我人员，使我完全失掉群众的支持隐蔽，无法立足，全部撤退，这样便搞垮了吴、化的基础。敌人的胜利，气焰万丈，到了二月底，吴、化的保安队全部调到廉、遂，把重心放在廉、遂尤其是遂，

企图把吴、化的做法，全部搬到廉、遂施行。陈沛十二月调职，由张瑞贵继任，大致上仍是继承陈沛的衣钵，也于廉、遂的交通要道、主要据点建筑碉堡，组织地反，置重兵于我交通要道、主要据点，摧残我税站，折了我经济来源，晚间行动，远途奔袭我主力，可是由于我于三月份后军事上采取主动给敌人以相当的打击，又因保一调走，形势变化，敌人的企图和计划是失败了。

保二有二个营于三月调去合浦，留下一个营在廉江，保一则于四月中调走，四月底则从广西调一保安团来廉接防，保二的一个营调返湛江守总指挥部，保十则驻遂、湛，而经常保十有二个连驻湛。保十因过去长期在化、吴活动，对遂溪情况不熟，言语不通，需要一个时间了解情况，准备工作，布置阵势，才能发动进攻，于六、七月间才出动大扫一次。于六月后敌人的重点进攻似转到四属，当时便把留下湛的保二的一个营调返合浦保二团部统一指挥，同时保二团长撤职，由张瑞贵介绍的来接，率保二的一个营回合浦。广西在廉江的保安团因食不饱，待遇不良，逃跑百余人，徒劳无功，又以广西紧张调回去。六月底至七月底高雷相当空虚，只得一个保十。我于七月十日袭击湛江后，敌甚慌张，雷高的反动分子和张君嵩向宋子文力争之下才带了一个御林军警卫第二营来，另准其就地组织独立十二营，再由合浦调保二的一个营来遂，成立雷州的第十清剿司令部，由张君嵩兼第十区清剿司令，以支持残局。到十月初，高雷的保安队有保十团约六百人，驻遂溪，保二的一个营驻廉江之安铺，守湛的有独立十二营约二百人。另有保二的一个连守指挥部，警卫第二营第六连被我打垮后，调回湛补充警卫，警卫第二营驻城约二百人，总共约千二百人。这些都是直属于第十清剿司令部所指挥，另设一前进指挥所于遂城，由第十清剿副司令邓伯涵兼主任，指挥廉、遂匪军。

八月后，雷州军政情势有了新的变化：（1）雷州三县都调换县长，当十几年徐闻县长陈桐调长海康，海康县长薛文藻调长遂溪，新任徐闻县长廖国彦，这些县长都是属于何派的人物，高在湘（遂溪的反动分子，和铁胆死对头），而又是张君嵩所支持的人物，可以说是张匪的心腹，雷州的反共势力都可统一起来，这就是所谓政治配合军事之

一重要问题。(2) 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互相配合的进行，张匪不是单纯的军事观点的人物，他是懂得运用策略在斗争中的重要性。他提出九分政治，一分军事，他的政治策略就是统一反共势力于一身，而以高派为中心，拉拢、分化、打击敌对的反动势力。如对铁派，争取地方士绅为其帮凶，威迫利诱青年为其走狗，利用暴露的青年，以找寻线索一网打尽。对开明士绅和青年讲进步、左倾的话，以麻痹我和群众的警惕性，蒙蔽其反共的实质，而特别重视内奸特务政策，通过地方势力、保甲长、流氓份子组织广泛的特务网，每保找二个地方特务。自首政策，认为只要是确实脱离共产党的组织，则无须写悔过书，并利用高在湘的农场及有关的工厂收容自首份子，以解决其生活，施行政治训练，使其思想彻底改变。(3) 张匪对我的进攻是很坚决的，他提出勤剿穷追。凡是有情报的不分昼夜则必出动，不计较收获之大小，能够找我主力打更好，如没有则搞地方税站、地方工作人员。他划区“清剿”，把遂溪划为四个“清剿”区，每区置一个营的兵力，又可互相配合，但实际上是把兵力分散，各自为战而已。张匪企图靠其御林军打几个胜仗，提高士气，建立威信，扩充部队，准备建立一个旅，以邓伯涵为旅长。在廉东之战是邓伯涵亲自指挥，是极具信心来歼灭我主力的，焉知一败涂地。(4) 敌内部矛盾日益加深，张君嵩把保十团的六个连长撤职，由他自己所介绍的人接任，再等时机找寻保十团长陈一林之过错再设法赶走。陈一林对邓伯涵所率警卫营在廉东打败仗，觉得很高兴，嘲笑指挥无能，说皇军去打人却打败仗，难怪我们，他是在明攻失败，我是在被暗袭失败这是不同的。对于所设的前进指挥所很不满，前进指挥所不经团部可直接调动，团部就实际等于没用。陈一林不过是一个营长而已，而各营同时可能接到不同命令，不知执行那个的好，认为指挥无能不信任，张君嵩和张瑞贵有很深矛盾，张君嵩就任后是独断独行，张瑞贵是不过问，张君嵩召集雷、湛、廉五个县市长秘密会议，瑞贵没有参加。瑞贵表示很消极，再辞，张君嵩则准备去代替他。(5) 保十和警卫营遭受着连次的打击，士气消沉，连级干部都无信心，逃亡极大，保十有一个连逃亡三四十人，九月时尚领不到八月薪，领饷的连长表示无得食只好上山。

今年四月前敌士气骄蛮，反动势力嚣张，二三十人都敢出动，四月后，士气颓丧，非有一二百人不敢出动，反动势力低头，兵力和战斗力削弱，张瑞贵消极。张君嵩接任后为一方面统一了反动势力，但另一方面却加深了内部的矛盾和新的瓦解（铁胆这一部分反动势力动摇瓦解）。

二、民情

今年四月前，由于敌人在吴、化的暴行和群众所遭受的损失，使遂、廉人民都有深刻的影响。他们笼罩着黑暗的可怕的阴影，害怕陷于吴、化的悲剧，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愿我的部队在他的村住，怕打仗，怕敌人的摧残。有的在敌人的威胁和欺骗下去报告敌人，有些则在我部队离开后才报告。敌人透过反动分子压迫农民筑碉堡，他们都感觉没办法不做，怕不做匪军来捉人、杀人、抢掠、损失，很多是被迫着和敌人筑起堡垒。吴、化的群众是更怕了，很少敢招呼我人员住、坐、煮饭，虽是很亲的人都不给你入村。有一个同志要回家入到村门口，守闸的是他的叔不准他入去，一面吹螺角一面叫他快走，在敌人残酷的压迫下筑碉堡，组织保队和我们对立着。这时地主起来反清算，追回所减去租息和已分耕的土地，农民怀疑是不是恢复东纵北撤时的状态，因我主力向东西转进，以为我们又要来一次撤退，问我们的同志什么时候走，群众的斗争情绪很消沉，对于K的三征暴行不敢反抗，只采取消极态度拖缴。过去由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农会完全停止了活动，群众是等大军南下来解放他们，对目前和自己斗争无信心，对将来我们的胜利则有坚强的信心，不过目前的痛苦就难挨过。有些则希望我出力打K，使他不敢这样横行无忌。很关心我〔们〕的粮食，提议我们去蒋管区打谷仓、打城市以解决困难，有些很久不见我的干部突然见到了，则欢天喜地拉我同志到他家里吃东西，问长问短，并哭诉K的暴行，因不见我的同志在他村里活动，则到处查问这同志去那里是否安全，对于敌情仍是一样的供给我们的。

四月后群众情绪开始转变：我打了许多胜仗，群众提高了信心，知道我仍有力量，尤其是打湛江以后，群众情绪空前的高涨，纷纷慰劳，敌人不敢出动，很安定，认为这回世界不同了，世界就快得了，

这是四月前对敌休战和四月以后对敌进攻的不同情势。

三、我的情况：

四月前，化、吴的悲剧对于廉、遂党的情绪发生很大的影响，许多同志是准备大难临头“掘地洞”，有同志问廉江一个县委干部说：“放手大搞了，你们怎么办？”答道：“我没想什么，目前只想掘地洞，好收得紧”。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现。由于当时形势的困难，而上面又叫放手大搞，我们又未有明确的具体方针来执行，在这样情况下，党内情绪很大波动，究竟怎么办？很多人彷徨苦闷着，有些干部对南路形势发展趋势掌握不稳，只看见黑暗和困难一面，而非常强调困难、黑暗，常常把化、吴的悲剧来宣传而又是来吓人，对于当前的斗争则强调隐蔽、两面，不要刺激敌人，对于老地区的部队（廉、遂），主张全部推进四属十万大山去，认为形势困难，不能立足，有被消灭的危险。对部队活动强调分散隐蔽，不敢提出争取主动，积极进攻，改变局面。这种主张实际上是等于放弃老区的坚持。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四月遂溪部队不响一枪，就是受这种主张的影响。有些干部感觉老地区的种种困难，不安心工作，要离开老区到新区去，亦是受这种主张所影响。

东征部队出发前和廉、化部队都留在遂活动，再加上由化、吴撤下来二百余人的其中有许多是流氓、土匪，遂溪就增加了千五百至二千人吃饭，在贫脊的遂溪是很严重的负担呵，那时几无存粮，税收亦陷于停顿状态，天天要粮、要药、要钱，甚为头痛。地方干部就为部队的吃天天忙，地方工作都无法做，若找不到或找到慢些又挨部队的骂，很苦闷。部队因吃饭问题，请假或逃跑，或者怨言，政治工作都放低了，无法开展。很难处理的是由化、吴撤退下来的许多流氓、土匪（过去是农会长、村长、民兵队长、乡长、农军的人物），他们不能打仗，又不能做地方工作，跟着部队不能活动，留在地方又搞坏地方，若是照顾不妥则他们会自首叛变，这对于化州部队和遂溪地党是一个很大的包袱。

党内思想混乱，经过山东同志回来提倡民主后，党内就走向极民主化的偏向，有些同志自由行动，不受纪律的约束，没有组织生活，

没有工作，大家都在吵闹。

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四月的期间，雷州的领导显然是犯着右倾，强调争取上层，忽视下层，强调转变、隐蔽、两面，放弃斗争，尤其是忽视武装斗争的领导和军事上采取积极行动。致使在敌人不断的向我进攻之下遭受严重的困难，并加深了党内的混乱。

四、〔形势与方针〕：

三月初卢明同志非正式传达分局二月讨论的初步总结，我们于三月中召集了化、吴、廉、遂、湛、海等地的负责干部，根据二月指示的精神，讨论当前南路形势和方针，结果通过了我的报告，并经过一些修改成为地委的决定。在我的报告中强调三个问题，其一是指出南路形势开始变化，并将走向新的斗争高潮、发展，目前虽处在严重困难关头，但不久就会克服。形势基本上是朝着有利于我的方面发展，有下列因素是加速着形势向新的高潮发展：（1）全国战局的胜利发展，东北可能很快的解放，刘邓大军会加速渡江，这就必将使广东形势走向巨大的变化，这无疑的又使南路形势起着大的变化。（2）目前广东各地的放手大搞，虽然吸引着在南路重点进攻兵力的一部分去援救，很可能被迫在南路调一部保安团救急，各地区更大的胜利的发展给予南路人民以巨大的援助和鼓舞。（3）尤其是我有足够的力量和正确的方针改变整个局面，主要是我东西挺进，必可粉碎敌之重点进攻，新的山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就支持老区平原区的斗争，我平原老区的坚持和采取坚决的进攻打击敌人，就给予新的山地斗争很大的援助。

（4）敌人的困难和弱点是严重而不可克服的，敌人的困难就给予我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指出要把握基本发展趋势，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不要给目前暂时的困难所吓倒，和一些坏现象所蒙蔽，迷失方向，要坚定信心，勇敢前进，要克服当前二种偏向：A. 强调困难、黑暗、隐蔽、两面，放弃斗争，悲观失败情绪，B. 克服过去左倾残余，机械了解大搞方针，把过去的一套搬出来不顾实际盲目冲动。其二是指出必须坚持老区斗争，而且必须争取主动，找寻敌人弱点，坚决进攻，积极发展，这是克服当前困难、扭转局势的主要关键。作战方针，是调查研究敌人的行动规律，找寻敌人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给予歼

天性的打击，主力团则应以打保安团为主，地方部队则以打土顽为主，但不能机械，而须按实际情况灵活执行，以达到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今后必须注意：A. 反对打无把握的消耗仗，每仗事前应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布置，以达歼灭战的要求。B. 补充主要依靠前线，反对只靠购买来支持（过去便是如此）。C. 今后各地区作战必须互相配合，纠正过去彼动此静，各处于孤立，为敌各个击破。今后发展方向，北以粤桂边山地为主，南则以海、徐山地，以武装来恢复化、吴阵地。整军强调加强党的工作，提高战斗技术（精通三大技术）和指导战争能力，展开三查和诉苦工作。其三是加强党内团结，这是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实现的关键，实行三查三整（整包袱，整自由主义、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整小圈子）应从上而下的整（先从地委做起），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II、军事斗争

这里主要报告吴、化、廉、遂武装斗争情况，四属方面已由丁同志报告，不多提。

一、武装状况：

东征西进后，吴、化、廉、遂所留下的武装部队人数约一千一百八十。遂溪六百，化、吴二百三十，廉江三百五十（遂溪的统计数目是在八月初，廉江则在五、六月间，以后仍有很大变化），共分为四个团：廉江三团，化州四团，遂溪八团，另以前伪军符春茂部改编为五团。四月后成立高雷工委时成立第二支队司令部，统一指挥这几县的武装部队。

这几个团一部是原有各县留下坚持的最坚强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以区、乡队编组而成，除遂溪于最近重新组织区队外，其他各县则无了。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或者编入主力，或者是瓦解。今年战斗只是主力孤立的作战，而没有民兵的配合，部队的战斗力比半年前有很大的发展，从火力的配合来讲，目前总有轻机二十六挺，而其中有十六挺是今半年增加的；对战争的组织 and 指导比以前进步得多，过去未曾打过一次干净歼灭的仗，都是漏洞百出，变为无缴获之消耗战，

战略和战术思想都提高了一步。

二、游击战争回旋的地区则比以前缩小，主要是吴、化和廉北一部分山地的阵地丧失，武装部队不能活动。目前能够活动的则仅有廉江大部分、遂溪几及全县。发展游击战争的地区基本上是缩小而没有新的发展，博、陆始终没有办法搞起来，徐闻的阵地也连根拔起，全部退出；海康仍在半隐蔽状态。所以部队在这个时期天天在老区转，吃光了，粮食和经济都陷于严重困难，加重了老区群众的负担，今后若不能发展新区，则这种困难是很难克服。

以地区来说，遂溪是有普遍的群众基础，全县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各个地区都能联成一片，其中只是敌人一些据点而已，我是控制着整个农村，敌人则控制着大的市镇据点，而又都是依靠乌龟壳才能生存。遂溪和海康、遂溪和廉江的边境都能联成一片，部队都能纵横驰骋的，不过廉江南部敌人的据点多，活动较难。

发展地区成绩最好的是海康，用武工队的形式发展到近五百条的村庄，几占全县的一半，但是在半隐蔽状态，长枪部队未能公开活动，这是负责该区工作的同志所坚持的观点。最差的就是徐闻，十余个武工队都退了出来。广西博、陆亦有些开展，但是很慢，仍未能在该地区创立部队发展游击战争，而存在着很浓厚的依赖外援的观点，束缚着自己的发展。而陆川同志则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过去陆川搞武装是左倾冒险，今后不应以武装为主，而要以群众工作为主。我们对这些地区的领导薄弱是要负主要的责任。

三、作战

半年来的军事斗争是依照分局方针来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而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和发展，完全证明分局进攻方针的正确。首先是东西进军胜利的到达了目的地，开展了新区的游击战争，平原老区的坚持斗争是达成了它的任务，是坚决进攻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肃清平原、围困山地的计划，使东西进军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

半年来的战斗，主动打击敌人的大仗有五次，小的二次，遭遇和应战的三次，前后缴获轻机十五挺，另一挺是蒋匪逃亡拖出来的，步枪二百余支，掷弹筒五支，刺刀约百把，子弹一万三千余发，榴弹枪

十三支；消灭敌保安团一个营部、三个连又二个班，伤亡约二百五十余人，联防队二十余，县警约一百，保安团中有三个连长被打死，二名重伤。毁碉堡二十余座。我方牺牲十名，内连指导员一，副连长一，突击组组长一，受伤约二十余人。地方损失的：税站人员牺牲二人，受伤二人，地方干部三名牺牲（一县委书记，二个区委级干部），其他六人。

各个主要战役经过如下：

1. 旧“三·一”遂安公路三大湾诱敌聚歼的战斗。

敌在遂安公路线上筑了碉堡，保安团分兵把守，一是保护公路交通。二是彻底破坏我公路税收。三是以此为据点向我区经常扫荡。今年旧三月驻守遂安公路塘涵附近的碉堡是保一的一个排，匪军经常出动或化装商人伪装打税，以捕捉或袭击我税站，我们知道了敌的行动规律，就决定去搞它。敌情估计，碉堡内有一个排约三十左右人，配轻机三挺，遂安公路东西两侧的敌据点有安铺、遂溪城，驻有保安队与土打兵约三、四百人，各据点距离战斗地点约有三、四十里，我能于一小时内解决战斗，敌援无用。同时查确我派出税收人员打税时敌人一定出动，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就决定这样布置，派一组税收人员在公路打税诱敌出动，我军则埋伏两旁迅速运动占领高地，将敌合围，迫敌走向低地，把敌聚歼（战场地形是平原，但有高地，高地之中有一低地），另以一部来阻击东西南可能增援之敌。结果战斗于旧历三月一日发生，情况如我们所估计的一样，约十一时敌有二个班出动来搞我税收人员，我军于五百〔米〕长的战线上于十五分钟内运动完成对敌的包围，在我六倍于敌的优势及强的火力之下，在半个钟头内便解决战斗，半个钟头打扫战场完毕便立即撤退。我军刚退出战场后敌援赶到，但我已把敌抛在后面。计歼敌二个班，伤亡十余，一连长阵亡，俘虏四名，缴获轻机二挺，步枪十二支（忘记是否这数目），榴弹枪一支，子弹千余发。敌人三名托有一挺轻机逃脱。这次战斗的特点：①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劣势敌人，搞通了干部打歼灭战的思想。有些干部过去认为将敌人打垮给予很大的杀伤便是歼灭，而使用兵力上则常常对等或以少打多，或逐步使用兵力投入战场，结果都打成消耗

战，双方安全撤退。②小规模的运动战包围歼敌于预定地点，成功的主要条件是行动迅速，配合得宜，指挥机动灵活，发扬强的火力压缩敌于不利地形，迅速解决战斗。③英勇果敢，指战员都表现着猛冲猛打的精神，有些没有枪的传令和小鬼都冲上前去缴枪，有的战士不响枪拼命的追着说要缴敌人的二只脚枪（指轻机）。④迅速打扫战场，迅速撤退，如果不是坚决迅速撤退可能遇敌援打一场消耗战。⑤对情况了解正确，又能找到敌之行动规律及其弱点（骄蛮麻木），给予歼灭打击。因有上面的优点，保一虽顽强，但亦不免被歼。这次战斗主要弱点是担任警戒的一个连，因闻后面有枪声以为敌援，即仓惶退却，给三个敌人利用这弱点冲出。

2. 七月十日湛江突击战

敌情分析：（1）陈沛负责剿总之时是不主张把主力固守据点而要把它放出去作机动兵力的使用，他是不留保安团一兵一卒在湛江的。张瑞贵接任时就不同，他表示稳重，要留一个营，最少二个连保安队来守湛市的。如对他威胁大时则可能调更多的部队回来镇守。（2）守湛的是湛市自卫大队约二百余人，有二个中队驻防赤坎，保十有一个营和保二的一个连，营部和二个连（缺一个排）驻赤坎，保二的一个连及保十的一个排驻西营守指挥部，另有师管区二个中队，市府的一个警察中队，宪兵一分队。总共守湛江、赤坎的兵约三百人，西营约二百余人，敌人的弱点是太平、麻木、警戒疏忽，因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有搞过，我是没有力量去打的，官方以为是很稳当，赤坎外围虽有许多据点，但是有漏口可以进入。（3）我突击的目标是赤坎区，它距离西营三十里，距离遂城五十里，于夜间战斗，敌情不明时是不敢轻于增援，我拟派部队进行阻击及破坏其交通线。市区警戒面相当阔，东西南北都有敌外围据点，而各据点敌人兵力弱，可用少数兵力控制，敌会不敢出动，在遂溪扫荡的保十不可能来增援。（4）有战斗力的是保十的二个连，其他很脆弱，如控制保十或解决它，则其他是没有问题，保十的驻地和其警戒情形我是完全清楚，在袭击的条件，自卫大队部、警察局都有袭击条件。（5）敌情复杂。因为此是兵站又是敌人的后方基地，部队随时有增减，情况变化多，必须掌握时机，

迅速行动，否则会暴露，会丧失时机。

战斗前的准备工作：（1）选派负责干部二人去了解情况，研究情况。我亲去和各负责情报工作同志详谈，并布置所必须调查了解的项目和方法。这项工作是做得有成绩的，对于敌情是很了解，敌人据点内每一个哨卫情形及每晚有无变动情形都很确实清楚。一直到行动当晚都有三次情报从赤坎送到部队。（2）派出三个团级干部及担任各个突击目标的指挥员、突击组组长，及担任警戒、阻击的首长到市区、市郊侦察地形和突击目标内部情形，突击组指挥员亲到保十驻地营房侦察，了解敌之弱点和可能突袭的方法，团的首长亲自研究情况如何布置兵力，如何指挥，如何警戒阻击，对于各个目标、市区都绘有详图。（3）准备好进军路线与向导，市区向导，攻自卫队的云梯，攻银行的工具，调集各地便衣队组织突击队。（4）调集各团兵力，准备粮食、驻地、宣传品、布告。（5）进行全军的政治动员，城市的纪律教育，誓师出发。

战斗计划：（1）解决银行，解决经济为我行动的主要目的。为着达此目的必须在军事上取得决定的胜利，才能有条件来完成这个任务。在军事目标上则有三个，保十的营部和二个连、湛江自卫大队部、警察局，这三个目标中而以保十为中心，若能解决它，则其他便容易控制，政治目标则是特务头子张辅森、遂溪反动头子王子初，进行逮捕。经济目标则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为中心，其他商人的不准损害。（2）完成任务主要关键在于组织突击队，于是决定挑选三十五个至四十个优秀突击手突击保十，根据敌驻地分布又分成六个小组进行突击，每人配手炸一个，其它则按实际须要决定把所有卫士和地方的便衣队都调来组成突击队，共达八十余人，各突击目标则派出步兵来协助。（3）以保十突击队先发枪，其他各目标突击队则迅速的发动，预计于晚上十二时发动攻击，天光前撤离市区。派一个主力连阻击西营的敌人，一个连阻击遂溪的敌人，并派地方部队到遂城骚扰，同时破坏由赤坎到西营、由赤坎到遂溪的电线。这些阻击部队也于天光前自动撤退。（4）建立前敌指挥部，指挥进入市区的各团。前敌指挥部下划分下列工作部门：作战警戒、通讯联

络、经济部（专搞银行）、宣传工作队、担架运输队，特别重视搞经济的工作，由八团政治处主任负责。

战斗经过：因行军的组织工作搞得不好，致突击赤坎的部队到了晚上三时才到达市区发动攻击，照原定计划先向保十突击，于二十分钟后全部解决战斗，突击自卫大队及警察局则挫折，不能完成。突击保十的完全以便衣队来解决战斗，只用手炸、驳壳猛打、敌措手不及，很少能够还枪，主要的用刺刀来还击，到了我的手炸、驳壳弹都已打完，仍有数十敌人持着枪准备战斗，我英勇的突击手即冲入敌人的营房中取敌人的手炸还击及拿敌人的一支轻机来扫射，同时叫口号缴枪，结果四十余敌人放下武器被俘虏，战斗便结束。这次除一个副营长和二名士兵带了一支轻机逃脱外，全部被歼。计伤亡八十余人，内打死一连长，一连长重伤，被俘四十余人，缴轻机七支，轻重机一，步枪一百余支，手枪十一支，刺刀八十把，手炸一百余个，掷弹筒五门，榴弹枪十一支，子弹万余发，军毯六十余张，掷弱筒弹五十余个，榴弹枪弹一百一十，大洋一、二千万。当打扫战场时，闻外面有枪声以为援军到，曾将十几支日本枪掉落鱼塘。突击自卫队大队部的，因要抓〔爬〕上敌人的楼仔，以控制，但带去的云梯不够高抓〔爬〕不上，结果被敌人占领了楼仔，我突击手便没有信心不敢突进。这企图便失败，突击警察局的突击手因事前侦察不周密，进入市区时的向导不识路，而突击保十的已经响了枪很久，遂丧失了突击时机而停止了突击。打死张辅森特务头子的经过是这样，原来计划是要逮捕或打死他的，但是分配负责的人没有执行，刚巧前敌指挥部的阵地就在他住屋的附近，枪声响后听见附近有人打电话说情况不明。指挥官立即派人去监视查问，在拍他的门时张匪问是什么人，我答是自卫队派来保护的，便开了门，见到是我们的人，他即拔枪自卫，我的突击手便先把他打死，当场又打死了他的女工（以为其妻），同时捉了他的助手。打死了以后再检查目标因才知道是张匪。搞银行的突击手进入市区很迟，将近天光之时才动手，先爆破中央银行，打开夹万但没款，再炸仓库炸不开（爆破钢板的门），结果一无所获，便到中国银行去，很顺利的得到该行的会计开夹万，获得港币二万五千余元，大洋三亿余。当时的

负责人以为没有了便走（实在尚有一个夹万有港币十万元，白银十万元），这时已是上午八时，指挥部已经撤退。和指挥部失去联络以后再派干部带队伍入去收队，九时全部从容撤退完毕。是役我仅牺牲三个同志，一个同志受伤。

战斗发生后，除反动派惊慌万状而外，市民都很镇静，贫苦市民仍照常做工，我军在马路行进时市民围观，虽有匪军驱逐但不怕。我沿街歌唱，市民甚受感动。我军除搞银行外，对市民财产毫无侵害，这对过去受K欺骗蒙蔽的人是很奇怪的事，对我的观感完全改变，我军买卖公平，态度和蔼，勇敢镇静，给市民印象最深刻，变为神话普遍的互相传播我军的故事，比我的宣传工作做得还广泛深入。我军撤退后：张瑞贵和市长才带百余人如临大敌的到赤坎示威，市民无不痛切憎恨和鄙视，嘲笑地说：“为什么不早些来，现在摆威风吓我们有什么用？”

湛江的突击战的胜利，对形势发生严重的影响：（1）粉碎了保十的“清剿”计划，这个战斗发生的当天下午敌即紧急命令在遂、廉“清剿”的保十部队调返湛，保十的一个营在我军袭击的前一天，在我区进行烧杀、劫掠很利害，这营被紧急调回来，被迫放弃了它原定的扫荡计划。七月到八月中期间除在湛西村清乡外，廉、遂都无敌出动，可说是最稳定的一月。（2）打击敌的士气是相当大，一是由于损失惨重，二是由于俘虏政策和城市政策的实施。我军于九月十八日伏击保十团长之役刚开火时，即已有敌兵举手投降，要求不要打小据点，碉堡放弃，集中到大据点内，和过去的锋芒显然不同。（3）镇压和动摇了反动势力和争取了广大中间阶层尤其商人，我的城市政策影响相当大（主要是在于保护工商业，保护人权、财权）。我枪决了南路特务头子张辅森后，人心痛快，跟他作文化特务的陈闻天被吓得破胆，不治丧命，反动分子纷纷向我表示过去是被迫的，要我原谅，表示守中立或和我联络或准其回家。商人则表示希望下次又来，烧猪欢迎，这次如果迟的走，烧猪欢迎，认为如果是K来攻，则什么都没有。（4）群众情绪空前的高涨，纷纷慰劳，认为世界就变，和以前总不相同。

胜利的原因：（1）坚决执行大胆进攻的方针，从整个敌情研究当中，找寻到敌人主要的弱点麻木、骄傲、警戒疏忽、空虚，虽有很好的配备和坚强的部队，在被“攻其无备”的情况之下，亦很难避免歼灭的。保十就是这个例子，初时干部是不够信心的，当队伍已到接敌点时突击的指挥员犹疑能否隐蔽偷袭，在我们鼓励其大胆行动之下，克服了动摇性，才勇敢进攻取得了胜利。在布置战斗前亦有人反对这个行动计划，认为是冒险的，亦认为是幻想的，经过了斗争和坚持了进攻方针之后，才能坚决地进行这个战斗。（2）突击队的英勇顽强机敏的战斗精神，克服困难，才取得最后胜利。当子弹、手炸已打光而尚未解决战斗的时候，是胜败的关头，我们的突击队员毫不害怕、畏缩，立即拿起敌人的手炸、机枪继续打，而又能展开政治攻势，使战斗能很快的结束。我们挑选三十几个突击手，但是到达突击目的地时，有一半人是卧倒（即是被嘲笑为“卧射”）不敢突击，这时亦有个别指挥员有点害怕，但是多数指挥员和组长是坚定的，指出必须按原定计划进行，坚决率队猛冲，有些突击组长只剩下他一个人来坚持到最后（有些突击手卧倒不上前；有些跟错别个突击组，因此有些突击组只剩组长和组员一人，但仍然执行既定任务）。当时指挥员若有一个动摇则会影响全局，突击手有了这样的经验，同组的必须“夹手”，不“夹手”认为是危险。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个突击手打驳壳不准，敌人就用刺刀来刺，他机警立即闪开，而跟着他的突击组长上前扫一轮驳壳将敌人打死。如果没有这个组长机敏果敢，恐怕这个同志会牺牲的。（3）对敌情了解很清楚和对敌情分析和战斗计划决定的正确，这又是胜利的主要条件。参加突击的指挥员和前敌指挥部各负责干部都亲自到市区目标侦察，以至敌人的住地内部侦察；同时我们的情报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不断的供给了许多敌情材料，敌情的变化都能及时了解，这就使干部对情况熟悉才有坚强的信心。这充分说明加强情报工作的重要，有了很好的情报工作才有胜利的果实。（4）我军的行动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我的准备工作将一个月，我的企图在群众中是相当暴露，很多群众交头接耳谈及我们的行动，敌人虽曾有特务报告我可能打湛江的情报，但不相信群众衷心支持拥护，仍保持秘

密，而无发生意外的变化，这是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条件。

主要弱点：（1）这次行动在经济上未能达到我的要求，是有几方面的原因：A. 负责搞经济的干部没有参加行动，当时是没有坚强的干部来领导，及时解决行动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B. 搞经济的突击手和指挥员没有开会充分讨论各种行动技术和行动纪律问题，事前对爆破技术没有充分的研究（本来不应该爆破钢门而应该爆墙壁，同时又没依照原来决定去捉经理，致遭失败。事前对突击手没有充分的政治教育及纪律教育。在行动时突击手不听指挥，自由行动去取东西，对这次行动有相当的影响。C. 入银行搜查的同志有顾面子、感情用事的观点。因他对中国银行的会计有一面之交，不去坚决清查。D. 我们对这个工作的重视不够，缺乏具体领导、检查督促，对任务和方法指示不明确。（2）没有达成突击次要的目标，这是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对于突击自卫大队所需用的梯，究需多少高，这就没有明确规定，因这张梯的关系就影响全局；另一方面没有讨论到，如争夺楼仔发生困难时，则又能用什么方法突击，这是对问题考虑不周密的原故。对突击警察局主要是向导不好，对目标的侦察工作不彻底，行动亦迟缓。（3）攻击时间的延误对于整个行动计划有很大的影响。因时间匆忙不能有充分时间来搞银行，逮捕其他反动分子，展开政治攻势，这是由于行军组织不好，向导和行军路线的选择都不适合，各级首长对行军的管理责任心不够。（4）前敌指挥部和司令部对各个战斗单位没有领导。因此对所发生的各种问题就不能及时而正确的解决，尤其是对于经济工作。搞不好的原因：是通讯班的组织不健全，通讯人员害怕，不能担负任务，事前对于人员的选择是粗枝大叶，而又没有具体教育，没有掌握几个优秀的通讯员对于斗争的领导，无疑的会发生重大的影响。（5）政治动员不深入，尤其是关于缴获一切归公的纪律没有展开深入的讨论与发动党员干部起模范作用，坚决执行，同时具体规定的奖罚条例。因此，没有防止许多贪污现象的发生，同时造成了以后分配战利品的本位主义、自私观点的错误，使内部不团结，这是领导上须要负责任的。

3. 打保十团长的伏击战

敌情：我们所得的情报是保十团长于九月十八日带其在西营住第二营回遂溪城月的团部，同行者有张君嵩介绍的六个新任连长和第二营的营长家春等，行程是步兵一个连，清早六时出发，他九时则座三架汽车，李并带有一个连的兵坐车护送，敌人步行和坐车的总兵力约一百五十人左右，行军路线则是由西营到城月的公路。

战斗布置：选择公路侧有隐蔽地形并有高地的地形来埋伏队，以一个连放在左翼，以一个排于战斗发生时占领公路桥头的碉楼，其他则担任警戒阻击，指挥部便设在那里。右翼则放三个连，以一个连及派便衣队投入突击，二个连警戒右翼援军及阻击敌人。并决定凡见有军车的则打。

战斗经过：十一时敌车到达，我即展开火力猛打，结果打出九架军车来，先有五架车被我完全解决，另有四架退回后面，其中一架立即散开占领碉楼，因碉楼地势高，可控制整个战场，这是必争的，可是我负责占领的那一排因河水涨，不能涉过对岸占领这个碉楼。同时敌先出发之步兵在车之后赶上来救，从左翼包抄过来，我左翼不支退却，占领碉楼敌人火力猛扫，我军正在解决的车上搬战利品也迫得撤下去，负责警戒的也没有命令轻机手托轻机就走。因此就使整个阵势乱起来，由胜转为败退，各车都载满弹药、六五步枪、掷弹筒、轻机、被服，我方除拿了六条六五枪及二个掷弹筒炮外，余均无所获，确是痛心。原来这次除了保十团长外，还有海康、徐闻二个县长同行，这个情况我们事前是不知道，战斗布置上是没有估计这一着。这次战斗虽不能达到预期的战果，但对敌人的打击是大的，约杀伤其三十余人的，使保十团长、海、徐二县长惊惶失措，准备没有援兵就当俘虏或阵亡。战斗刚开始，匪军即举手投降，战斗力是很脆弱。这次我牺牲一个连指导员（是很好的干部，在战场上他打死三个敌人，冷不提防给敌人从背后打枪而牺牲）和一个队员，轻伤五人。

从这次行动中暴露着我们很大的弱点：（1）掌握时机歼灭敌人的决心不够，对这次行动重视不够。本来这次行动很早已有情报（约十天内）通知准备，但仍然不能及时充分的搞好准备工作，如地形的侦察、队伍的调集、队内的政治动员，因准备不及曾有停止行动之意，

在多次督促之下才决定行动，但仍无决定调集优势力歼灭敌人。这次我所调动使用仅一百五十人而已，形成兵力不足，不能阻击增援之敌。

(2) 对敌情的估计不灵活的机械了解，没有估计到变化的一着的布置，指挥员是估计步兵搜索先行，则车后行，主力应放在阻击这一股可能援救的右翼，于是我左翼的兵力则很弱。对于情报的报告是完全依照十足的相信，而没有以更多方面估计各种可能性，因此敌车九架时则来不及应付。在思想上没有着打九架车以至更多架的准备。(3) 侦察地形粗枝大叶，对于左翼过河占领高地碉楼，没有估计有什么困难，河水是否经常都是一样，潮涨时能否涉过，若须涉过则需时若干，能否及时占领碉楼，而只是主观地决定会顺利地实现自己计划，结果夺取碉堡交左翼负责的布置是错误的，使战斗失利。(4) 指挥阵地不适当和指挥不灵活。指挥员应跟着右翼的主力，但却在左翼，形势变化时就无法指挥；对于夺取高地碉楼应该有灵活的布置，因这个碉楼的占领是战斗胜利的关键，应该准备左翼占领发生障碍时，右翼应该担任占领任务，谁快就谁先占领。因为当时决定只是左翼负责，右翼便不理。(5) 缺乏战斗的顽强性，没有执行战场纪律。当敌占领碉楼时向我扫射，则我即撤退，没有顽抗甚至和敌争夺碉楼的战斗精神，因为当时我已解决五部车，必须坚持顽抗才能缴获战果，在当时〔对〕敌人的士气来说是可能的，但以撤退过早而致一无所获。当轻机班手没有命令而自动撤退，尚有几个排长都如此，而没有执行战场纪律制裁，以致形势立即发生变化。(6) 部队不巩固。从这次战斗中具体表现着，除上面说过外，当解决敌人五部车，但尚未结束战斗时，大部指战员就立即登车找他们自己所要的东西，且大家互争东西，有的说“一个皮急都被枪烂了”，大家都争月饼食，但枪弹军用物资却不理，这是很严重的现象，这是由于过去严重忽视整军工作，领导上没有深入下层了解情况，及时纠正各种错误，没有从积极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建立严格的纪律制度，战斗前没有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

四、湛江战役后的军事斗争：

打湛江获胜，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人民情绪高涨，反动势力动

摇。怎样掌握这个有利形势更猛烈的发展，这是当时的主要问题，我们曾有过这样的决定和活动：

(1) 乘胜利的威风猛烈的瓦解动摇土顽势力，开展政治攻势，配合军事斗争。凡是过去与我敌对，为蒋匪走狗，今天悔悟的一律采取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我们采取这个方针配合军事力量来瓦解地方反动势力，有三个显著的变化：其一是和我敌对的海土顽，二十余人在碉堡和我打，我都没法消灭它，湛江战役后有些动摇，他目前和我进行谈判和好（结果未详）。其二就是我遂溪主力一部到西南区打乐民圩，结果乐民圩的一个碉堡被我打破，这对于西南反动势力影响甚大，附近的反动村庄地主豪绅都要我军到他们的村，我军亦乘机而入，他们则纷纷送米、送猪慰劳，表示以后和平相约，并和我签订下列条件：a. 互不侵犯，保持中立；b. 保护我工作人员在村庄活动；c. 给我征收军粮。这些反动村纷纷瓦解，过去我军和我工作人员不能入去住和活动的，现在则可以。其三以前敌人占领的圩镇，我军强入去收税，土顽不敢出动。

(2) 猛烈摧毁敌人碉堡：敌人很多放弃了小据点而集中到大据点，则即拆毁焚烧，其留下的碉堡在遂安公路上毁了三个碉堡，在遂溪西区毁了一个、西南区二个。

(3) 九月初主力北上廉、化，进行恢复化州基础的活动，而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我智取廉东市镇南圩自卫队一个分队的武装，乘胜打入东西朗，缴了一部分地反武装，这时我军威大振，敌顽慌张害怕，急电张匪首派兵来援，结果邓伯涵所率的警卫第二营被打垮，这时敌顽地反更为动摇，堡垒纷纷放弃，被我烧毁，有些投降，有些则为我强攻打入（有的机枪可以打入）。这时群众情绪有些改变，肯和我人员接近，告诉我一些情况，但仍是很害怕。为我所毁的碉堡约有二十，缴获步枪五六十支。九月二十日第一阶段的战斗结束，把主力转到遂溪，九月底主力又转向东北活动，详情未悉。

(4) 准备再袭湛江，对敌情况完全清楚，袭击条件完全具备，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完成，集结了八、四、三、五等团的兵力准备于旧八月二十七晚行动。但是机密泄露，敌人知悉我的企图，是晚即全市

戒严，调大军回港。这是由于我内部有奸细活动的原故，我军事前知道这种情况，决定取消原有计划，把部队转到东北的方向活动。

五、建军工作：

我们是没有整套的建军思想，所以我们是缺乏明确的建军方针和建军的实际工作，有的只是一些灵[零]碎的工作而已。因为建军工作搞得不好，损害到坚强的主力的建立和战斗力的提高与更大的发展。

去年大搞时期是重量不重质，发展数量越多越好，这是考查成绩的标准。因此形成滥收、滥编的风气，凡是可收编的土匪、伪军，凡是有关系可以招委的头目，都尽量的收编、招委，致部队成份不纯，化州四团有三个土匪部收编的，过去新一团有二个连是符春茂的伪军。

过去主力的建立是依照原有发展的部队来选择，以打得的为标准，或收编的土匪、伪军也编入主力，在这些部队中再加上配备几条轻机和较强的干部就是所谓主力。由地委至团党委、司令部至团部都没有系统的深入了解部队内面情况和具体讨论部队的改造问题，而决定整个建军的方针，除了日常讨论解决部队日常问题外，则没有有计划的去领导部队工作，对于建军实在找不到什么创造和好的经验来。目前部队存在着各种严重现象，我们对建军工作的忽视是主要的原因。

最严重的现象是无政府无组织状态，以遂溪部队为典型：第一是便衣队是“皇军”，除和他有深长的历史关系的领袖外，任何人都不能管他，他可以不经任何手续离队，带着驳壳在地方横行，胡作乱为，可以捉人，也可以杀人，强迫税站交款或藉我军名义向商人借款，大饮大食、找爱人、发牢骚，生活行动和流氓分子一样。这些人都是过去的“老革命”，这些人的破坏作用是很严重的。第二是由便衣队升为连长的干部，遂溪八团中有二个连长是自由离队自由归队（喜欢时则来不喜欢则去），贪污腐化，不执行命令，不守纪律，对下则要下绝对服从他，对士兵的管教则是以打骂来代替，在士兵面前公开骂上级。第三是团级干部对执行命令也是不坚决的，并有违反纪律的现象。如对进攻港市问题已决定进行了，但是八团政委马则召集三、四团干部提出反对意见，对部队的调动也不能依时执行。第四，极端民主化，没有集中，什么问题都是慢慢的长谈，许多谈了没有明确的决定或没

有结论。对一个作战计划，都要经过下面同意才能执行，是没有命令和纪律制，把军队当作群众团体来看。第五，部队已有了小组织派别的活动，在部队中进行挑拨离间，打击他人。第六是内部不团结。团与团之间，兵与官之间，战士与战士之间都有或大或小的磨擦，常常因为处理内部问题占了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影响实际工作甚大。第七，目前部队尚未有建立和执行过正规制度，没有日常教育管理的制度，各种供应补给亦没有制度，都是自流发展。由于上述严重现象就给敌人进行内奸政策的基础，敌人已在我内部收买了奸细，敌对我的活动都知道相当清楚。

部队中党的工作最脆弱，有党的组织形式，但不能发挥党的核心作用，不重视发展党的工作，党员在部队中所占的比例就遂溪八团来说最多的五分之一，有的十分之一，我收编伪军符春茂的部队在一百人当中仅有二个干部是党员。所以目前情况党员在斗争中未能起决定作用，这是部队不巩固的主要原因之一。

没有有计划的培养教育军、政干部，目前团级干部都是过去一年前是连级，最高是营级的干部，过去是便衣队现在则提升为连长。这是由于没有干部的原故，他们本身是幼稚和落后，但是我没有有计划的帮助他们研究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加强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思想的教育。他们本身对学习也不积极，他们进步很慢，对于掌握一个团作战和管教一个团的工作能力都很弱的，旧的干部发展迟缓，又不大胆提拔新的干部，所以干部很缺乏，对于应付当前复杂的斗争是相当吃力的。因此目前司令部、团部各部门的工作是没有建立起来，是没有干部去做，因为没有健全参谋部、政治部的日常工作（简直是没有），整训、练兵都成为空谈，有计划的全面的布置军事行动，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打开新的局面就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对几个问题处理不好，影响部队指战员的情绪很大：a. 牺牲烈士的家属忽视照顾，有一个连长（优秀的）牺牲，只剩下一个衰老的母亲，天天啼哭，和他同时的战士及其家属受着很不好的影响，这个战士的父母亲〔对他说〕：“你看△△死了，她怎样的凄凉，你回来吧。”这个战士回家后情绪很不好，表示不干。b. 对于伤病员

只留交地方党处理，部队首长很少去理会，因地方党有许多困难和弱点，部队没有和他研究解决，对伤病人员许多照顾不到，引起了伤病员极端不满，c. 没有坚持原则处理问题，没有和违反纪律、破坏纪律、破坏团结及各种坏的倾向进行严肃的斗争，而是采取迁就、妥协拖延的态度，致使问题越搞越严重。如打湛江后，有二个连长贪污，缴获许多战利品不归公，而其他突击员则归公了，而当分配战利品时他们则没有，因此使许多突击手不满意，大发牢骚，表示以后不干。这事暴发后，对于那二个贪污的连长没有处理，更使群众对领导不满。对于一些自视有功的连长和便衣队自由高队、破坏纪律的行动，置之不理，只是把这些作为谈话的资料。因为他们的极坏的思想没有人和他斗争，没有人去干涉他们的行动，因此更骄更躁，是“老子天下第一”，“任所欲为”，这给予指战员的思想作风以极坏的影响，相仿效尤，歪风占了统治。为什么没有和他们非革命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是由于有这几种没有立场的错误思想：（1）感情用事，顾面子，对于和他历史深、感情〔厚〕的人很难开口批评，使其难过或使感情破裂，双方不好，只是用劝告的态度便算了。（2）对这些“横蛮”的人怕，怕的是搞他不过，他反起来，则影响更大。（3）强调他过去的历史和能力而去迁就他，如果是要执行军纪撤职时，则没有连长用呀！还是看看吧！（4）对这些严重问题缺乏警觉性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就不能有坚持原则、及时展开思想斗争的行动。由于领导上有了这些错误，就不能建立好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军队。

六、财政经济问题：

军粮缺乏。今年二月后，原有军粮已不够吃，而要购买，化州全部军粮丧失，工作人员和部队撤下来遂溪达四百余人，廉江亦困难，主力部队也常到遂溪来就食，所以廉、化、吴所需粮食大部或全部都靠遂溪来支持，遂溪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六月收军粮九千担，到今年七月时已吃了一万担，所差额都是预征、借，而由七月到十一月这三个月军粮就无法解决，统计遂溪要负担一千四百五十余人的粮食，统计须粮三千五百石以上，这个过渡时期困难解决的办法是把部队推向新地区去就食及发展工作，化州队则向廉、化就食。这样仍未能解决。

困难，另外要筹措、购买，办法虽是这样，但实际上仍是很难解决。四月以后则是餐搵餐食，朝不保夕，有时早餐要在下午三时才有吃，晚饭到十时才动手，经常是断炊，食粥的也是常事，有钱有时连米、番薯都没〔得〕买，如果那天有白米饭吃，则是一件最高兴的事。化州四团落后的战士骂：“没有钱没有粮带什么兵”。士兵情绪受着很大的影响，因军粮缺乏，活动受着很大限制，常常因为派出便衣队工作人员到处找米，我就常常暴露引起敌人围剿，因要就食所以部队要天天转移（即使没有什么敌情），流动性很大，每次研究“转移”时，除了敌情外，最主要的是研究那处有粮食，活动任务就受到很大障碍，如要整顿部队及集中作战，就因为粮食不能解决，不能不停顿，而要分散就食。团长、政委以上天天都要为粮食而化脑根〔筋〕，工作时间和精神大部分都用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那天能顺利的解决，则是最幸运最愉快的事。

为什么有这样的困难呢？（1）没有很好的组织来管理，浪费、消耗的现象很严重，以前规定每人食米十两（旧米）至十二两（新米），但特务长和伙夫都不依照这规定，常常超过这个数目，有米来时则尽煮。剩下来的饭，就分给老百姓。交通站就常常有十几个来客吃饭，食饭人多，做事人少，巨大的浪费。这些现象本来应该及时纠正，但是领导上不注意，没有检查，没有总结。没有提出彻底改进的办法，这种现象仍然继续下去。（2）缺粮地区多，负担粮的地区贫穷而又狭窄，如化、廉、吴都要靠贫瘠的遂溪来支持（遂溪产米不够食），原有化州粮食丰富而又丧失，产粮区的海、徐又限制，我武装部队不能活动。这地区没有变成游击区。照目前所征军〔粮〕是仅够维持海康工作人员，出力支持则不大。（3）粮食多的据点都有碉堡和地反把守，我无法解决，亦无法入去征粮。至于K的粮食，现在已很少散布在乡村，都已移于大的据点碉堡内，这又是我无法解决的。（4）有些地方有余粮，有些地方缺粮的，而二者很难沟通运输，调剂的办法只能将有余粮的买去支给缺粮的地区，但是蒋币惨跌，原来是十担谷的，卖出转为蒋币而转为谷时则仅及一半，这样吃亏不鲜。

遂溪征粮去年以租额计占十分之二，从二十、三十石租的地主起

征。以前是多向地主，今年则富裕中农都要负责。能够征粮的地区，海康二分之一，遂溪全境，湛江大部农村。征收工作有这样的弱点：

(1) 平均负担，加重负担，在遂溪今年的征粮，地主十分之二，中农也是十分之二（他所得实得的谷），同时一般中农以下的负担是很严重，如在遂溪有一村庄八十家人口，去年底到今年已负担四十担军粮。遂溪地主少，而又不大，大的走去城市征不到，因此，军粮缺时则往往向中贫农来借，甚至倒米缸，我征粮的地区虽为我控制，但仍是双重政权，就常常要负担二重的粮食。(2) 没有确实的调查清楚被征者的收入和支出的实际情形而确定征额，而往往是道听途说，贫的当富有来征。今年风灾水灾影响失收，而我又是如前一年的征收，使农民很不满，常常向我们诉苦。(3) 征收多次，如某村军粮已征收过了，但是部队多又常到，军粮不够吃，而又是再次征借，群众皆表不满。

税收：税率是百分之五，什么货都是一样，但是实收则仅百之一至二，因我税收人员不懂货质、货价，只凭商人自己报，同时收价随时变动，我今天打税的货价往往是前几天的，而又有税收人员顺情记税，我所受入之蒋币天天惨跌，要拿来同时已经贬值一半至一倍，变成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就雷州来说已建立的税站大的有六个，都是海面交通要道、公路线上。打湛江后，新开辟的税源是由湛江到琼、港、穗出口要冲、炮洲口打税，范围只及于小部分机帆、大部分风帆。在六月中收入约每天十余亿。但后蒋匪大扫荡，最近又恢复，详情未悉。由湛江到海康的海面我设税站于东海岛上牛牯湾，每天约二、三亿（七月时），但敌人大扫，把牛牯湾全村烧光，群众损失甚重，群众要求给他收税一、二个月来重建民房。海上税收则较陆上税收安定些，公路线上敌人经常出动，化装商人打税袭击，我遂安公路税站曾遭受袭击，损失一挺冲锋机，一手提机，牺牲二个同志和二个受伤，税收同志常常为敌追赶几十里，因而内伤的不少。我对于税收的武装保护不够重视，没有配好的驳壳，甚至配以轻机，使有足够的自卫力，对于他们的照顾不注意，没政治待遇，地方人员和部队又常常和他们磨擦，骂他们贪污腐化，因此这些人员很多表示不愿干，“吃力不讨

好”，诉苦。当然亦有些是贪污腐化，流氓习气很重的，这些我们都未很好的注意改正。

按七月时的税收情形来说，雷州约有二、三百亿，但是如果只是开支伙食生活费、药费则尚可维持，若要买米、买军毡则无可能。以前规定的生活费，二钱油都不能按时发给，因为连饭都无得吃，医药、冬衣很缺乏，病人日益增多，各种补充（弹、药、鞋）等都成问题，目前士兵的体质是很弱，发鸡盲的每连的都有几个，病人的增多，有一个连达二分之一强，营养缺乏，是主要原因之一。目前最急需补充的是医药、冬衣、被服。

目前尚未建立健全的财政制度，（1）主力部队中虽规定首长和战士的待遇一样（生活费、菜钱），并无等级之分，但是私人的用具则凭各人自己的需要开单去买，这就引起下级的不满，反映着做官的要什么都有，我们连一双鞋都没有，同时是有许多浪费的。（2）地方党的干部的开支就没有一定的制度，尤其是县、区级干部都是随便的，去年大食之风甚盛，而引起部队的不满。（3）没有预算和决算，没有检查，没有总结，都是自流发展。各军需虽有帐目，但是没有检查研究那些是必要的支出，那些是浪费和应该节约的，今年应如何改善。没有长久的打算，今日有钱今日使，明天无钱明天打算，都无整个计划，使许多浪费的现象不能及时的纠正过来。（4）领导上对财政经济工作尚未予充分的注意和经常给予帮助，克服困难，使财政经济工作配合斗争的需要。

九月底召集各地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会议，讨论整个财经工作，成立地委领导下的财经委员会。

III、各县工作概况

甲、半年来遂溪党的工作情况

一、敌情与对敌斗争

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年四月期间，我们在军事上采取消极隐蔽，不要刺激敌人的方针之下，取消了区乡队，敌人抓着我的弱点，却到处向我地区扫荡，二、三十人也敢围村捉人。这期间就遂溪之西、西北、

北、中四区在四个月中敌人就进行过一百二十余次的大小扫荡，捕去群众六百余人，被杀害党员及群众共六十六名，我损失武装十余支，财物损失（群众的不在内）及税收的损失二百亿以上（五月时物价计算）。群众损失，据不完全的统计约在四千亿以上。被强奸妇女则百名，扫荡的频繁与我们的损失，是二年来所未有。敌人除在军事上积极出动外并强迫各保及交通要道建立碉堡，仅在西区、西北区就筑有三十余个，尚有许多在准备建筑中，这是我们对敌人的碉堡政策没有采取积极领导群众进行破坏的斗争底结果。在此情况之下，反动乡长、地主放出谣言说：“共产快要被肃清了，现在已没有大股，而只有灵[零]星的散匪。”敌人除了军事扫荡外，还展开强烈的政治攻势：

（1）组织宣抚队到处叫嚣说蒋怎样胜利，他们力量怎样强大，美国怎样帮忙他，共产党已经解散等等欺骗宣传。（2）积极开展自新运动，反动头子利用其一切的社会关系去找我们的人员，威胁、利诱、拉拢去自新。如截建会反动头子李自桥写信给我二团团郑，叫郑带队叛变，保证生命安全，保持原有武装，收编不加歧视等。另一个反动份子陈某写信给我同志叫他去自首，并叫他在村中进行自首活动。又以勒索我被通缉同志家属出花红去奖给带枪逃跑的人（带枪投诚者奖谷六石）。在敌人的攻势下，我有二十五名不坚定的分子自首。同时又进行内奸政策，收买和我有关系的流氓分子打入我的队伍，如北区区队的特务长就是。（3）为要争取群众，缓和群众的斗争情绪使用许多花样。如有一个群众被镇长惨害，另一个反动头子故意出头去为被害群众“告状伸冤”。对已失去人心的乡长，则放出空气说某某乡镇长坏，要把他撤职，换上什么人来做（较有威信的人），欺骗群众说：“我们都是地方人，我做的都是爱护地方的。”

在敌人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底下，我是被打败的，这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许多同志天天为着应付敌人扫荡，而走去掩蔽，甚至成批成群的搬家到别区去，大家都想走，不想工作，有的成天想怎样去挖孔“掩蔽，怎样撤退去远的地方，大家见面时则谈怎样走，大家互相唉气，有的说：“我真不知道又来一次撤退。”有的说：“我若知道要撤退就不出来。”这是由于政治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和对化、吴的

恐怖局面所吓怕及军事上不能给敌人打击，以阻止敌人的锋芒的原故。

四月后转变过去的右倾方针，在政治上坚定同志们对斗争前途的信心，及在军事上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之下，主力又展开对敌的进攻，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因此就转变了同志的消极情绪变为积极对敌斗争。

(1) 展开反碉堡斗争。初时对敌的碉堡政策不敢坚决阻止和破坏，怕这样做会引起敌人猖狂的扫荡，迫群众又出钱出工。说“走群众路线”，于乎〔是〕敌得在我的地区建筑起三十余碉堡来。经过纠正了这种偏向以后，立即积极展开反碉堡斗争，破坏敌人十个碉堡，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去阻止敌人十四个碉堡的建筑。如某保长想执行K的命令建筑碉堡，我们即派人向父老解释：指出筑碉堡起来对该村百害而无一利，K兵会来住，更加重你们的负担，我军又会来打它，你村就成为战场。同时和他们商量应付办法。结果大家都愿停止而依照我的办法去应付，有的则叫群众一面筑我一面破坏，使群众走去报，表示无办法，叫他派兵来，结果也就停止下来。从这个斗争中证明对敌人在我中心区筑碉堡是绝对不能让他成功来围死我。群众虽然初时害怕，但是我必须坚决反对，在群众中揭发敌人的阴谋和群众利益联系起来，和群众具体商量应付办法，那末便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阻止和破坏敌人的堡垒政策的。(2) 反对敌人的自首政策。我们在党内和广大群众中广泛展开讨论敌人的自首政策阴谋、自首的前途和我党我军的英勇斗争故事，结果使许多动摇分子都坚定过来，表示如果不是这样指出利害，自己就被敌人骗了。(3) 反对敌人的特务活动。过去对特务分子只采取镇压，而没有争取，目前则采取宽大政策，我们在某村捉了一个特务分子，召开群众大会来公审讨论处置办法，结果罚他去修整全村坏了的牛车路，群众认为这样办很好。又如某村一特务被捕以后要他悔过，叫他的村父老担保，结果这个特务自首以后为我工作。(4) 反三征斗争没有什么成绩和经验，一般的来说都觉得很困难搞得成功。

现在开始再次恢复了各区的区队，在西区和西北区合组一个区队约四十人，西南区二十余，北区十余，东、中区二十余。目前区队的活动主要征军粮，镇压地方反动分子，配合主力作战。

二、群众工作与政权工作：

1、求生反饥饿斗争

四月前群众情绪很低落，慌乱害怕，不敢接近我，叫他召开农会或和他们商量什么问题都不感有什么兴趣或表示害怕，远远的离开我们，万事不理为上策。而此时群众生活很痛苦，很多贫苦农民断炊，生借无门，个别分子偷偷地去偷蕃薯，甚至准备去做大的抢掠。较好的群众，想向我们提出抢食救急，但又怕我责备或处罚他，又不敢去进行。在这样的情况我同志向群众提出反饥饿抢食求生的口号，很快获得了广大群众热烈的响应和参加行动。初时是我同志带他们去偷番薯吃，经过了几次之后便向群众提出组织“穷仔会”、“饿仔会”，这些会初时在北区搞起，跟着在各区普遍的发展着。全县共组织了二十五个“穷人会”，约有四百左右。这个斗争的原则是规定偷抢的对象是地富，尤其是反动分子、特务分子的东西，不侵犯中农利益，而且完全以群众自发斗争的形式出现。但是后来走到了不正确，什么都偷，什么都抢，如抢了一个布商财物，又抢了一家地主的谷时连抢了其他群众的财物，使群众反感不满，土匪的作风便发展起来。后来就明确的规定原则：（1）偷抢时的对象必须是反动分子、恶霸地主，不能抢中农以下的贫苦群众。（2）掌握政策，只抢粮食，不得什么都抢。（3）保守行动秘密。（4）所得利益应根据贫苦程度合理分配，不得自私。（5）禁止私人行动，服从会长指挥。（6）违反以上规定，由大会讨论处分。这规定颁布后，乱抢的现象便停止了。这种行动社会人士都认为是群众自发的，没有饭吃有什么办法不这样做呢。后来我和地富提出解决群众饥饿的办法，叫他们乐捐一些或生借一些东西去救济他们，免使他们成日抢，影响社会安静〔定〕，绅士地主很赞同给他们捐东西、借粮，这样就渐时渡过饥饿，到现在这种行动基本上停止了。经过这个斗争，群众的觉悟和我的关系有了很大的转变。

2. 防匪保护群众利益

西区是新开辟的阵地，群众落后，没有群众组织，我的武工队在那里很难开展工作，群众不高兴接近我，认为我是旧社会的乱民，但这些地方土匪很多，群众很怕而又恨。我们同志便于这时发动巡路捉

匪，土匪曾被我们追逐数次，而渐渐敛迹，使群众发展起来。群众从此对我很好，转变对我的态度。我同志便进一步推动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巡村巡夜，互相联防，参加组织的有百余群众。以前受K反动宣传的，或受过坏分子摆布的人，本来是对我有成见，甚至反对我们，经过我这次防匪的行动教育后，这部分群众就被我争取过来。

3. 吊耕减租减豆花

在遂溪农民都是在尾季交租的，现在就进行着秋季后的减租斗争，便在农会中讨论如何进行，农民提出向地主提出减租时，如地主不肯，则大家进行吊耕，并须大家一定要齐心来做才有办法。这个提议立即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群众认为这样做一定〔能〕够成功。这个斗争会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斗争，不象过去由上而下的恩赐。

减豆花。这在湛江农村和遂溪放豆花的现象是很普遍，我们就发动群众进行减豆花，照实物减二成。

4. 政权工作

目前我所控制的地区都是两重政权，以前是一面政权，其后K恢复了政权，但他所能控制的只是点和点周围的农村而已，这一点就无法控制，我以前所委任的乡、区、县长都保留了名义和地拉，不过没有什么机构，而且我为群众办事各种形式都有，如农会同志全都有起政权的作用，武工队也是政权工作者，现在乡村农民的纠纷都不去K处告状，因为要化钱而又不能获得解决。都找我们的同志来判决是非，不要钱，而又解决得公道，这是群众的观感。目前的政权工作是只限于排解群众问题的纠纷。

三、统线工作：

去年大搞以后忽视统线工作，而且一般都犯着“多树敌人，孤立自己”的错误，今年初已开始克服了这种错误，并执行党统线政策，有着相当的发展。

去年大搞时许多地富、开明绅士及中立的乡、保、甲长反对我，甚至同情我的进步人士也对我不满，一般的富裕中农对我不好。我们在党内进行政策总结教育，并在群众中广泛的进行自我批评及具体解释我党的政策后；群众对我的印象为之改变。并向反动分子调查研究

对象进行瓦解分化工作，过去对我有成见的或结有冤仇的都经过我的争取而转变过来，大大减少我的阻力。如西北区介炮乡长张德安过去是最反动的铁派的死党，但他失势，和K有矛盾，对K不满，他的地区都为我所控制，周围群众反对他，我又连续打了几次胜仗，他是相当害怕的，怕我会搞他的财产，因此内心很不安，而要和我们议和，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可是在另一方面又不敢相信我，怕我欺骗他，杀他。但经过我们通过好的关系向他解释我的宽大政策，只要他不和我作对，我可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又把他身边左右的人物如干事等都争取过来，他感觉到自己孤立，因此，不得不向我们屈服，表示以后不理我们的事情。从此这个区域没有反动分子来阻碍我们的工作。又如某校的校长过去是对我有成见，特别是去年清算准备分粮时对我们更为不满，说我们胡作乱为。后来我们写信给他解释我党的政策，尤其是我对知识分子、文化人士的态度，并承认我们过去有什么错误，于是他逐渐改变，后来并向我们坦白提出许多意见。对我观感完全改变。

△△村去年大搞时，强迫该村缴枪，使该村上层分子对我不满，和我对立起来，组织武装和我对抗。经过我耐心的多次的向他们解释我们今后对他的政策与态度，该村上层分子及地富逐渐转变，并以后向我交军粮。又附城△△村和△村的二个保长，其中一个坏的，一个是中立的。坏的对我很仇恨，没有条件可争取，而中立的有时对我同情，但怕坏的知道，所以又不敢和我接近，后来我设法把那个坏的杀掉，那个中立的便高兴起来，公开的接近我们了，掩护我的人员在他的地区活动。一般来说，我们对K的保甲长的争取是成功的，在北区十七个保长中有十四个与我们有联络，有一个过去积极反动，经争取后变成二面派，西北区二十个保长中和我联络的有十八个。

我们争取上层分子、地方开明士绅，粉碎K恢复联防队的计划，我军于四月中突击遂溪杨柑联防队的武装，缴获轻机二挺，步枪二十余后，蒋匪派兵到杨柑圩威吓强迫地方士绅和商家负责筹款购四轻机，否则他们便有通匪之罪。我军行动之时已估计到K有此阴谋，即布置同志去找当地绅士谈，揭发K的阴谋及和他讨论如何应付。绅士反而

怒斥蒋匪要负责赔偿买轻机，因为这二条轻机是地方出钱买来保卫地方，今给联防主任掉了，应负责买回来。结果蒋匪阴谋失败，联防队无法恢复。

我于突击湛江后，敌即回师“清剿”湛江农村，三四百群众被捕，上层士绅保甲长都出力去保释，支持我反对K，结果全部释放，群众无一牺牲，我全无损失。

四、党的组织工作

遂溪县划分为三个单位组织来领导，一个是南区与西南区，与海康五、九区成立一个县委；一个是由中区、西区、西北区、北区成立一个县委；一个是东区和湛江成立一个县委。现在仅就中部的县委来报告，它是遂溪的主要基础，纵横百余里。人口占全县一半以上，在这地区我能够完全控制的有六百余条村庄，可以活动的有八百余条村庄，我控制的村庄都有我党的组织或群众组织，详情如下：

1. 党的组织——县委领导下有四个区委，县委兼区委书记，区委下面管理若干总支部，总支书多由区委兼，区委没设常委，一切日常工作都由区委书记负责。

整个组织党员共有七百五十人，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发〔展〕的新党员有二百人，十年党龄以上的党员占百分之十，三年至七年的党龄党员占百分之五十五，三年以下占百分之三十五；党员的成份：贫雇农占百分之六十五，中农占百分之二十七，富农占百分之八，其余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农民占百分之九十七。

2. 整军工作——由于过去领导上一贯多责骂少鼓励，家长命令的作风，由上而下的存在着。自去年提倡党内民主之后，一般同志都发生另一偏向，把一切错误的事都委诸上级，什么事都说上级不对，别人不对，只有自己对，到处大骂上级，大骂别人，自己完全不负责任。由于去年大搞的错误和今年初的转变又有右的偏向，使下级对上级领导不信任。由于领导上过分夸大敌人的力量和困难，敌人猖狂扫荡之形势日趋困难之下，内部发生慌乱动摇，以至逃跑、自首、消沉、苦闷，对党不满，造成了全党思想上的混乱，同志们又走到另一偏向，专讲民主，不讲集中，什么都不满，什么都有意见，专门去找别人的

错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专从生活上、琐碎问题上发脾气，翻旧帐。无所不计，无斗不猛。看上级同志对他照顾不周（如少给一些钱他用），就到处宣传说对他不照顾，官僚作风，自私自利，△△犯了错误，对上〔级〕的善意批评不接受，反骂上级故意批评他。区级同志看见下面同志对他什么都不满，什么都反对，什么都不接受，自己丧失信心，不知如何做人，工作上变消沉，什么都不敢开口，苦苦闷闷，甚至要求给他休息一个时期。有些同志则变成颓丧、〔堕〕落，成日想女子，想讨老婆，想享乐，今日在这里荡荡，明日又到那里游游。这种思想的混乱，使我们的同志放弃了对敌斗争，放弃了一切工作，做成全党的沉闷，影响工作是很严重的。

根据上面严重情况，整党是当前极端重要工作，并决定下列原则来进行。

1. 弄清是非：找出互相间的成见在那里，原因如何，事情发生的经过怎样。要弄清这些首先要使他们互相进行坦白的报告，说明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例如北区区委书记何与另一区委叶，因误会而发生成见，互相都不愿说出来，后以各人表白自己的内心和意见所在，叶同志才知对何的误会。从此双方消除误会，解下包袱。

2. 由上而下的自我批评。如北区书过去不够尊重同志的意见，自作自为，引起同志间的不满，不服从他的领导，到处诋毁他，批评他。后来他自己召集一个民主大会，叫所有对他不满的同志都来参加，要求他们对他作严厉的批评，对他们的批评表示完全接受，自己则作了一次坦白的严厉的自我反省，把一切错误都由自己来负责。结果感动了个别好的同志进行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亦跟着自我反省，这样便加强了党内的团结。

3. 运用群众力量，依靠群众：在西区有个同志很喜欢搞事，脾气极坏，到这里骂这个，到那里骂那个，什么都要骂一顿，自高自大，目无组织，目无党纪，经过党多次的批评，都不肯接受，反而说那样不对，这样不对。后来在一个大会上，全体群众都展开对他严厉批评，全场都以他为主要目标，集中火力批评他，结果他被迫承认错误，后来作风有了一点改变。

4. 适当的运用组织纪律去制裁不肯改变错误的同志。有一个同志平常好闹意气，说人长短，不肯工作，曾多次批评都不改变，分配他工作不接受，结果给他一个严厉的批评和警告，被迫到转变了。

这个工作在西区、中区、北区都进行着，而以北区的整党成绩最好。

乙、目前正在展开恢复化、吴基础的斗争

一、目前化州情况：

目前K基本上全面恢复化州的反动统治：（1）在我区完全恢复了保甲制度，规定每甲须出二个人二支枪，每保买轻机一挺，组织地反。今年夏收时土蒋四围出动抢收谷，即使是刚割出来尚未晒干即拿去，据说是怕我军收不到，并急于买枪扩军，以防止我军入去。（2）大大扩充地反，加强乡保的武装，现在乡公所的自卫队少则四十人，多则八十人，有的有二挺轻机，保队多则十余；少则五、六名，这些家伙都是住在乌龟壳来守。（3）普遍围村建筑碉堡，隔几里路就有一个碉堡，碉堡建筑在山顶或高地以便眺望控制。（4）白色恐怖镇压群众，凡是替我煲饭或收容我者杀，使群众不敢接近我，使我陷于孤立。（5）斩光一切树林勒古，围界，使我完全无法掩蔽。

我完全退出了化州。主要是由于我失掉了群众的支持，我就无法立足，敌人施行反动政策后，群众就不敢接近我、代我煲饭、打探情况、交通联络，不供给粮食，若我到村庄，群众则必推你出去。有一个是自己的亲属，也不给予入村，同时吹响了螺角告警。这样我就无法生存，不撤出来，会可能连续不断的遭受损失。为着保存干部，就不能不撤退，过去派回去恢复工作的武工队也是同样情形撤退了。

我主力向廉东北活动，打下恢复化州的立足点：七月底决定以廉、化的主力向廉东南活动，而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为辅，广泛散发我的传单（布告和告民众书），宣传解释我党的政策，揭发与打击K对我的一切诬蔑。但单纯政治进攻是不能瓦解反动势力的，必须配合军事进攻，在军事上必须打几场胜仗，才能使政治进攻发生更大的效果。初期行动的目的一方面是使广大阶层对我的政策有新的深刻的认识，改变对我的态度，并转向支持我反对K。另一方面则是镇压地方反动

势力，以便打到立脚点以达逐渐的恢复基础。在上述的方针下，这次的廉东进军，是达到我们的目的。我缴了一个地主武装和一个圩上自卫队武装，我又打垮了敌人主力的进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时我军的行动当中不乱杀人（不杀一人），正确执行俘虏政策的结果，广大群众认为这次是打湛江的结果，说我真好，不杀人。群众兴奋，反动分子动摇，纷纷迁居城市了，但群众所受的教训太多了，所以对我仍不敢大胆接近和我大胆讲话，他不知道你们企得多久，是否会走，怕你走后K又来一次摧残，我没收了仓谷平卖，群众不敢要，只有拿猪来换才敢要。这说明要恢复基础须经长期艰苦的斗争。

于九月底第二次再调主力北上，继续我第一次的攻势，详情未悉。

二、吴川情况

自敌恢复统治后，即于每保成立十个保队，每乡二十个自卫队，县边境的联防队，地主反动都一律改编为保队。吴川蒋匪武装计县政府的自卫队二中队，警察一中队，共二百二十人，区乡公所兵三百人，保队千余人，县境联防队百余人，总共千五百人以上。现计划联保、联防，建立一个保中队，凡是有保队的则有碉堡，普遍强迫围村，民众要出钱买枪，出工筑碉堡，征粮征税更惨，今年K秋季征实之前每担租要征谷七斗至八斗，秋季后更重，还有什么鞋袜津贴费、壮丁安家费。这是蒋匪统治以来捐税最多最重的时期。

经蒋匪半年来的摧残（屠杀、捕捉、吊打、焚烧、掳掠）后，群众情绪已消沉下去，然而由于蒋匪的暴行又教育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又有新的生长，广大群众很渴望我主力早日打回来救他们，甚至一部分地主、富农都有这样的表示。有一部分地主觉得反下去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利益，相反的被K抽剥更惨，连那些反动头子黄镇、郑为辑都觉得反共无把握，也表示消极，这是一些新的变化。

七、八月时我们曾派三个干部回吴川作恢复工作的准备，主要是了解情况，恢复交通，找立足点，这次有二个同志行动暴露被特务起兵包围，幸我早已知道而撤退无损失。第二次派了三十个同志回去工作，首先是使群众对我党政策有深刻的了解，并公开承认我过去的错误，使明白我们今天的做法和过去的不同。其次就是迅速发展新村庄的

新关系，找多几个立足点，经过了我们的宣传工作和为群众服务的实际行动，使各阶层人士对我已逐渐了解，不是乱搞的，他们已逐渐允许我们在他的村庄住，并煲饭吃，但你须秘密不可暴露。敌军工作有了发展，有十五个保队和我有关系，有了许多保甲长表示中立或两面，绅士肯出来讲公道话，保释我被捕的人员，但有些过去为我杀过或打过的仍是坚决反动。

丙、海康概况

(1) 我的工作地区占全县三分之一，有关系组织基础村庄四百条，有党基础村庄九十五条，游击小组员二千人，同心会一千一百人，党员二百八十九人，武装短枪一百一十七支，长枪六十五支，另有一海康连，由八团指挥，人数一百，步枪七十五。此连在遂溪活〔动〕。

(2) 海康的基础主要在东区、中区，西南区最弱，而又是地方武装最多、经济、粮食富庶之区。目前正积极设法开辟这地区，使全县力量发展趋于平衡，这是军事和经济重要的地区。

(3) 是以短枪武工队来开辟的地区是半掩蔽状态，开辟工作的经验是很多的，但是有一个偏向，就是只满足于现有状态，强调长枪部队活动困难和环境条件不适宜，不敢把它发展为游击区。由于自满及不敢大胆搞武装，没有强的自卫力量，遂于九月被敌袭击，县委书记欧因而牺牲。损失惨重。

(4) 海康是雷州的谷仓，盐业、渔业繁盛，是雷州经济富庶之地，若能控制它则能控制徐闻，则对支持南路斗争非常重要的一着，同时又与徐闻山地相连，地形条件相当好，可作为雷州地区的根据地。但目前是否适宜于现有的基础，开展那个地区的游击战争。有的认为时机未到，仍须等候，有的认为必须发展起来，才能打开新的局面，这个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四) 党内团结问题

目前党内团结是南路建党以来最严重的问题，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未能团结一致，使党的工作遭受很大的损失，这是极端痛心的事。当然我自己要负主要的责任，但是问题很复杂，必须把是非弄清楚，不应存有成见，听信谰言，主观臆测，才有可能彻底解决问

题，才能使粤桂边区斗争有彻底的转机。在加紧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定关头，是不能漠视的。至于我自己所犯的 error 和所应负的责任，就我所了解的当坦白的报告，但未够或不明确或有偏向错误之处，希望上级严格的指正，为党、为个人都是必要的。

甲、有什么不团结的问题。主要的是以我与黄其江同志关系为中心，其他则是下级和上级、同级之间的关系，而发生不团结的问题。

A. 我与黄其江同志不团结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政治上的分歧：

关于坚持老区斗争，在敌人不断进攻和遭遇严重困难的情况之下，黄同志对于老地区坚持斗争问题往往发生右的倾向：表现有这几点：

(1) 今年初黄同志转变雷州的左倾政策时是强调隐蔽，强调争取上层（向上层承认错误），严重忽视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对武装斗争采取隐蔽保存力量的消极方针（名义上是精简区乡队，实际结果是瓦解了它），实质上是放弃武装斗争的领导。几个月来部队没有打过枪，因此这种转变不仅不能彻底克服困难，反而因右的偏向产生了新的困难，反动势力嚣张，地主起来反清算吓农民，党内同志和群众情绪普遍消沉。(2) 三、四月讨论坚持老区时他提议把老区主力全部推向四属，只留极少数武工队来坚持（我们这里武工队完全是短枪的），因为打不过人，又无饭吃，又环境条件不适宜大规模武装斗争，如果实行此计，则老区完了，走上化州的覆辙，但讨论到合灵五属工作时他又主张把合灵部队四、五〔百〕人推向遂溪。(3) 打湛江问题，他不主张打，因为打了会刺激敌人，增加兵力，展开更残酷的扫荡，认为应该要避免刺激敌人，争取使老区趋于稳定。这是坚持老区的方针。(4) 对敌人的和平幻想，认为叛徒薛文藻调长遂溪是遂溪处于非常有利的形势，他开了五十几个开明士绅进步份子的名单交给投机分子周裕卿（遂溪民政科长）来委任当乡长。对张君嵩的策略实质上是采取支持的态度，并上书劝告张匪和平谈判合作。要暴露分子出力争取张君嵩清剿区司令部当政务处长，希望能够争取转变。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湛江警察局长傅润芝（是大革命后的叛徒，是张君嵩的心腹）到廉江找一位大革命时的元老（过去和傅同事，对我同情）

说：张君嵩对于时局的认识很清楚，这次来湛不敢幻想有什么大的成就，但很想能打开一个和张炎一样的局面，尽量容纳正气青年和开明绅士，在地方上做些好事，并邀这个绅士同去见张匪，张与这绅士也曾一面相识，张匪见他时表现着很诚恳地询问当地情况，并希望他对地方问题多贡献意见，绅士初很敷衍，表示拥护他在广州时所发表怎样使耕者有其田，来解决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秩序。张认为还太笼统，希望他代拟一个具体方案藉资参考，又说他到湛江以来人选正在审慎物色中，想找一个有号召能力的青年来当政务处长，提出莱浴塵、杨支水、黄健夫三人，问这绅士是否认识，他说莱、杨认识，但健夫根本不相识。这绅士回去后即找黄其江同志商量该项方案问题，即由黄代拟一份，大意如下：①当前南路局势，南路共党数年来由于国际国内影响及土豪劣绅的加强压迫人民，给予蓬勃发展的机会，虽然经林、韦、陈、张的大清剿，不但未能消灭且日益扩展，这正是司令所谓“军事不解决问题，非从政治着手不可”。现在南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以至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骚然。②我们的基本方针：解决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秩序。③具体方案：1. 整肃军纪。过去“清剿”部队，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怨声载道，哀鸿遍野，非严肃军纪不足以服人心。2. 取缔横征暴敛。3. 裁撤乡保队，减轻人民负担，这些兵既不能卫乡，又不能肃清共匪，徒然加重人民负担，又给士绅以剥削机会，劳民伤财，无济于事。4. 惩办土豪劣绅、恶霸、地痞，这些人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无所不极，人民无不咬牙切齿，政府用之，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失政府威信，极应严惩，启用正气青年、开明人士以收人心。5. 招考流亡百姓归乡安业。6. 第六项是该方案重心。这个问题的意义是在等张匪看完后问他时才这样说：关于这项是有意见的，但说出来恐怕司令不同意，不如不说为好，张是会要他说的。这时才说：“在这项我的意见就是希望你和共党谈判，大家互不侵犯，共同维持社会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对你有功，对人民有利。”

对于发展新区的斗争：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黄同志是不主张主力开辟新区的游击战争（当然是对有条件开辟的地区来说）。在几个

问题上表现出来：（1）去年十一月时他带回分局意见，把主力打出去，方向是茂、电、信、两阳的山地。我们完全同意。便和茂、电、信负责同志讨论，他认为可以用二百强的主力向那边发展游击战争，决定了由欧初同志负责带队，并准备好一切进军事宜。但是后来因敌情关系，我和他分开，他和遂、廉、茂干部讨论发展新区问题时，取消以主力来开辟，仍然采用武工队（短枪形式）来搞。由于这样的原故，茂、电、信山地工作长期在敌人扫荡底下无法开展。（2）对于主力向东发展，他是不同意的，认为是冒险的行动，他没有经过任何手续，自己标新立异发出指示。他给雷州干部的指示是如此：我再三考虑雷州部队的进退问题，再提几点个人初步的意见：1. 大军提早南下，温下令停止西进，准备东进（我已写信给他，分局要东进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大军南下情况如何未知，但从我们南下本身的基本形势来看，我们大军东进要具备以下条件：大军打到广西，大大牵制敌人军力，敌人把全部或大部保安队调走了，我们主力便可集中起来东进。但假如南下大军还在湖南、江西，南路的敌人兵力依然未动，我们东进是不利的。因为茂、电、信是敌人统治中心，反动势力强大，我基础薄弱，如果保安队在南路，我们实行东进，保安队配合地方反动武装清剿，我们必然遭受损失。不顾这些实际情况，贸然躁急东进，就要犯错误，就会招致重大损失。（3）对于总结海康工作时，认为一年来的经验证明搞公开游击区局面，武装部队公开活动的形式是不对的。无错，海康过去一年用短枪武工队隐蔽的发展工作是有很大的成绩，但今天的情况下是否仍以这个形式为主，那末我就不能同意“不能搞游击区”、“不能搞武装部队”的观点，今天完全是可以搞的。以前是不是肯定不应搞武装斗争呢？这我又不同意的，以前搞的不通，主要没准备工作，在政策上乱打，没有统线，策略的错误，如果不犯这种错误，搞公开武装活动也是可能的。从这几个问题上，他对武装斗争的观点都是偏向于消极掩蔽，不敢采取积极进攻、发展。有些干部对他的批评说：“如果由他搞武装斗争，则必然是取消武装斗争。”这是由于他对形势的估计犯着夸大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自己，强调困难的一面，而忽视变化和有利的基本的一面，他常常认为

雷州、湛江是敌人的重要战略据点，与琼岛互为犄角，为广西出口的要道，不应该过于刺激敌人，在那里威胁敌人，则敌人就在那里增兵扫荡。根据这个观点，我就不适宜搞武装斗争。有些干部对他的批评说：“他是只能带些武工队在这里游游，在那里宿宿，生活安定舒适，如果叫他带武装就不成。”如获情报敌人增兵扫荡，他就很爱〔忧〕虑会被敌人消灭，就要打算远远的撤走那个部队，免受损失。他往往说要从“实际出发”，而他的实际则是片面的实际，如他说湛江敌人怎么重视，不要威胁他，招致敌人残酷的进攻。而没有看到敌人的弱点和困难，〔我〕正确的政策和人民力量的一面，是可以打破敌人的进攻（过去的事实是证明了这一点），往往把敌人主观企图，而看成为敌人行动的结果。所以往往为敌人所吓倒，而采取“退却”路线了。

二、组织上的分歧：

黄同志在组织问题上是在犯着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的错误，宗派主义为其显著的特点，表现在下列问题上：

（1）没有经过地委讨论，自己擅自发出反对东进的意见，这个意见是我给他一封信说分局要我主力东进，叫他立即回来讨论党的指示之后发出的，这是完全违反党纪的行动。又当讨论组织东进主力问题时，我坚持分局的意见，以遂溪为主力来组成，他反对，认为遂溪主力宜西进不宜东进，若东进就会垮，我坚持原有的意见，他发脾气说我是“教条”。原来“教条”就是拿反对上级指示时运用的。

他去年回去搞雷州总结，总结内容没有向地委报告，他就广泛发出，结果有一个同志带一份总结给敌人抓去了，我的策略、统线的关系、两面政权关系、新的掩蔽区、我党内的情况，无一漏网都给敌人知道。引起工作很大的损失。这仅是一件而已，其他尚多。如他回来时立即写其山东总结，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不管内容有无问题，一面写一面就散发了。

对于许多重大问题他是独断独行的，如关于雷州县委人选是由他决定，事后亦无正式报告、批准，给薛文藻的五、六十个名单，给张匪的方案都是未经过党的讨论自行其是，无疑地极大损害党的利益。

（2）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展开他的小组派别活动。

他的小组派别活动是从他回来的一天便开始，主要目的是倒温，争取领导地位。

首先在回到香港时便拉拢了南路同乡进行思想动员和政治资本，把他的山东总结到处宣传鼓动，造成改组领导机关的舆论，和争取分局的信任，这个目的是达到的。

他回来后第一步工作是写“山东总结”，宣传“山东总结”，在南路干部中打下了倒温的思想准备基础。第二是搞转变政策，搞雷州总结，集合了雷州干部开了个多月的会，完成了总结的杰作，打稳了基础。第三步就是召集倒温会议，派左向分局报告，小林同志到南路后，便完全实现了他的愿望。他的行动已是众人皆知，连他自己也不敢否认他的小组派别行动，小林同志和有些干部初时是被蒙着。但“庐山真面目”终于暴露了，有同志批评他是“狡猾、阴谋”。

旧去年十二月召集倒温会议，参加者是雷州几个主要干部和东江、防城的未去同志。他在第一次会上提出了种种改造领导机关的理由，但胡陈同志反对这个意见，认为要团结，过去的问题可以召集会议，大家坦白来谈，搞通思想来解决问题，不倒[少]同志赞成这个意见。在此情形下他就大发脾气，若如此我就不干，无结果而散。经过了拉拉扯扯，搞通思想之下又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派左同志去报告。又立即写几次急信要我由廉江下来遂溪商讨重大问题，这时正值化州情势紧张，要派欧初到化州解决问题之时，但又接到遂溪联名的信，和欧同志商量结果我下去，欧则带警卫部队仍留廉江活动，当我返廉后再决定去化问题（这样决定对化州斗争影响很大），我赶程于旧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便到达遂溪，找到了他们。当然是不肯报告真意。据黄的报告主要是讨论吴有恒问题，并提出派左去港报告，不同意吴回南路工作，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我当时的意见是不同意左去港，主要是他的安全问题，他是被通缉的。他来的时候方同志很小心，经过很艰难才送到来，他去是冒险的。其次是西进部队要他去，搞目前工作重要。再其次关于老吴问题，我们可用电报拍给分局就可以了。但是左认为安全绝无问题，他自己可负责，只要你批准就得。黄等认为非要他去不可。电报不能解决问题，安全也可不成问题，坚持要他去。

我是知道有复杂问题，但仍不知其真相。我是被迫同意左去。后来我返廉江途中接获欧同志给我急信，要回去讨论分局的重要指示，我便立即写信给左，叫即来廉江讨论分局指示，暂勿去港，但他复信认为仍是去，结果我无法阻止他去。这次去，左自己应负责。左去后分局仍未有明确的决定，黄很苦闷，表示要走，心情不好，要和我谈心，但是谈了几次，都是吞吞吐吐，不敢把问题提出来。他倒温的运动我早已知悉，但是我对他的态度并无改变，对他的苦闷，我表白态度，对他没成见，大家应该团结合作，我不曾对他反省过。小林到南路后宣布他为区党委，并把高雷四属、五属划分为二个地委，他兼合灵、广西、五属、廉江、化北的地委书记，我为雷湛化吴的地委书记。此时他认为已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并不是最后的胜利，因为我在此负责工作，他感觉不可能控制雷州，他要乘胜利余威控制全南路，成为最高领袖，他决计要把我打垮。初时他几次向小林同志提议划分为几个单位工作很难搞，认为合灵五属很穷，干部少，如没有雷州援助则工作无法开展，应合而为一。因为若合而为一，当然是他当领袖。小林同志根据斗争的需要坚持原有决定，甚至向他表示他怕困难则由我来负责，终于被迫同意这个决定。此计行不通，乃转而硬倒，而打到方兰同志为助手，以不倒做书记，方兰为副书记，靠她做接近小林同志的桥梁，通过她反映意见给小林。利用在东海总结海康工作的时间拉拢到方兰，争取到不倒同志，有了这二个骨干，便进而争取高陈。高陈同志在其蒙蔽之下也被拉着走，有了这批资本，于是在旧七月初由方兰同志向小林同志提意见，说现在干部都想走，因温的作风没有改变，不能合作，大家要他走，才能解决问题，否则工作便无法做，并提议以不倒同志为书记。小林同志对南路的复杂情况未了解（我未有详细向他报告，我自己要负责任），只听了片面之词，于是同意了意见，于是小林同志找我谈，反映黄、方等的意见，并叫我来港报告工作和学习。我表示去留毫无问题，不过我走前必须把问题弄清楚，是非弄个明白，我才能走。如他们对我有什么意见应召集一个会议来批评，我是愿意接受的。否则我不知过在那里，怎样改呢？小林同志同意召集干部会议，于是找他们谈，黄、方等初时同意，但后来

又改变说只要我表白对小林同志对化州的总结报告，就可以了，如果同意小林同志的报告就不须要开会，小林同志转达这个意见，我说我的意见已在化州总结会议上讲过，但是仍要开会为好。结果认为没时间，就停止召开这个批评会议。小林同志找土打朱、胡陈同志谈我走及地委书记问题。土打朱（支队司令）大发脾气，指斥此事不光明正大，偷偷摸摸，阴谋倒阁，我坚决反对，如这样做我就辞职，并责小林同志的粗心，不冷静研究处理问题，听信谣言做事，表示非常不满。胡陈同志表示反对，如这样做，我辞去地委职，我不干了。小林同志对这种情况是估计不到，但早已宣布了新的计划，怎能朝令夕改，此时正是进退维谷极端苦闷。明天仍照计而行，召开成立新的地委会议，小林同志在会议中说我参加革命以来未曾流过眼泪，只有昨晚我流了泪，对这件事处理是不妥当，由我负责。土打朱则怒火冲天，大发脾气，说温第一个走，我是第二个走，辞职不干，你们虽然叫我们，但我是没心机做，胡陈亦在会议上提出辞职，会议是不欢而散，我对他们没有评击，只是旁观，准备“撤退”。黄其江同志便宣告最后胜利，此时正是敌人大扫东海，我军准备南北进攻，但是由于一切精神集中“内争”顾不得反扫荡不扫荡，当然不会有军事行动去解救东海之围，敌人是占了很大的便宜，在东海为所欲为了。黄同志虽然是取得了胜利，但是又产生了新的苦闷，就是他的面目是完全暴露了（以前是掩盖可欺骗一时），而有人反对他（他估计不到的钉子），听说他对方兰和不倒喊〔哭〕了大场，说他在山东只整了学风，没有整党风，他虽不是主愿〔观〕上搞小组派别，但客观上是搞小组派别行动，他写信给我，要我去见他，说：“我反省错在何方，错应由我负责。”写信给小林同志，表示承认错误，准备写反省书。

他的宗派主义、英雄主义、老子天下第一，打击他人提高自己，自私报复性的思想在过去历史上是相当严重的，南路特务头子张辅森（湛江之役被我击毙）对我同志（这同志被捕）挑拨离间地说：我以前是做过共产党，但是我不干，因共产党的上级是不照顾干部的，又说：“黄其江这个人我识得他，他过去是英雄自大，自私很利害的人，现在到山东整风可能好些。”不知何故，特务是知道这样清楚。他村

庄里的农民过去是对他很不满意的。他在学校时曾对自己一个很好的同学捣蛋：他的同学是自治会的理财干事，他把他同学的数部毁了，然后发动同学和他清帐，结果这个同学找不出帐目来而被同学骂。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对他很不满，直到现在。他在抗战初期和一个女同志发生性的关系，以后不要，找另一个女同志了，对原来的爱人说：“党决定我和你离婚，并介绍你给另一个同志，如你不接受，开除你的党籍”。他过去做过遂溪、合浦的县委书记，后因病解职，并曾受过县委很多批评责备，他自己郁郁不得志。他对〔在〕这个时期对领导很不满。后来在山东学习，因是搞通思想最好的一个干部而受到奖励，又回来时受到分局的重视和提拔，这种英雄自大更加速的发展。回到南路后，见到人就说：“如果是大个同来领导我则不干，除非他走。”对陈恩更恨，说：“如果陈恩在这里我要绑他。”南路机关一定要改组，我要到香港报告，二叔公识得什么，他只靠做官做大”，我老婆如果找不回来，我要他赔。粗言谩骂（如泼妇骂街，没有共产党员的道德）不堪闻，凡是过去和他不好的都同样的谩骂，目前党内到处乱骂的作风受这点影响很大。他对个人问题很重视，曾对我说过几次，过去对他的处分和对他的批评来一个清算，并因为过去许多人对他印象不好，要使群众知道他不是这么坏的。

B. 土打朱（第二支队司令）同志和小林同志的不团结，自倒温事件发生后，土打朱对小林就不满，说他对问题没有具体调查清楚，主观出来处理，问题发生后认小林没有正式承认错误。他目前对工作都是采取消极态度，几次向我表示说，他现在工作没有重心，对小林的意见是不大尊重，而且是负气。

土打朱和不倒（地委书记）也是搞不好。不倒的历史比不上土打朱，政治较他弱，要不倒领导他是行不通，不倒自己感觉亦无法领导。这也形成他的苦闷。

胡陈和地委不合作。自倒温的事件发生后，他就采取消极态度，他要求离开，他过去和其江在历史上一贯是不好的，两者存有很深的成见。

乙、不团结对党发生严重的损害

一年以来由于党内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不能团结一致，使党

的工作遭受无限的损失，化、吴斗争的失败，不团结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化、吴的损失仍未能引起同志们的警惕，而及时纠正过去的错误，而且继续的发展下去，这是十分痛心的事。我自己的去留是绝无问题，如果是党的决定，谁要来负责我就给谁，但是我所关心的是党的利益有无损害的问题。无疑的黄其江的宗派主义作风是给南路党极端有害的影响，首先受影响的是对敌斗争，过去一个时期遂溪主力不打仗，及打湛江后军事行动的停滞（高雷长期局促于一隅的状态），党内不团结实在是主要的原因。

其次是使党内思想混乱，互相攻击，互不信任，不尊重领导，自由行动，公开反抗领导，不安心工作，消极腐化，正气不发扬，邪气到处传播，小组派别活动，形成无政府无组织的状态。由于这种情况党的决议不能有很好的讨论和具体的执行，党的工作就不能有计划的检查和总结，党的工作就没有走上轨道，工作的效率是事倍而功半。干部的进步与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干部因背着各种包袱，情绪消沉，得过且过，所谓只求无过不求有功，丧失了雄心气魄。这个时间干部的政治落后，斤斤计较于个人利益得失，于小圈子中转不能解放出来。过去所谓搞通思想是翻旧案，清谈，脱离当前实际工作，又只是找弱点，强调他人的弱点，结果越搞问题越多，互相间的矛盾更大，并没有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过去一年来，山东同志提倡民主是应该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同志在行动上是有很大的偏向，就是走向极端民主，不要集中，连上级的指示都要经过下级同意才能执行。分配工作同意则做，不同意的则不做，说是思想未搞通。这些人在头脑中没有党纪。

再其次便利于敌人实施特务内奸政策。最近部队发〔现〕了有内奸活动，都是敌人找到了我的弱点，进行收买我内部动摇、腐化、牢骚满腹的分子，这对部队和党是严重的威胁。

（丙）不团结的根源是什么

一、由于过去领导上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右倾和组织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家长制，造成同级和下级对领导上的不满和不信任的主要基础，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另写详细的反省报告）。

二、吴有恒同志、黄其江同志的宗派主义思想，利用过去领导上

的错误和党内不满条件，进行打击他人，提高自己，以达到他个人的企图。

三、地方封建派别思想在党内反映（大遂溪主义，小林同志的分析）。

梁广致中央电

——收缴陈一林部战果

(1949年1月)

中央：

一、粤保十团陈一林部于亥皓在遂溪城起义，击毙绥靖清剿匪正副司令张君嵩、邓伯涵，歼灭张匪警卫营全部，保十八团及湛江自卫队大部，并攻入赤坎。马日与我联络后，要求我领导改编，当作权宜处置，授该部以支队番号。后因该部无政治基础，官兵不能吃苦，我又无安置妥当，致有一部集体携械逃亡，乃于取得陈同意后，收缴该部武器疏散其大部官兵。

二、经陈手交与我之武器：轻机三十五挺，重机八挺，大小炮五门，掷弹筒等三十余具，卡宾枪、冲锋枪共十六枝，步枪四百二十支，子弹七万余发，电台四部，报话机一部，其他军用品甚多。

三、陈与张发奎、邓龙光固有关系，但起义后形势所迫非依靠我不可，月来受我影响教育，现陈完全信赖我，坚决表示跟我走，且要求入党。与其一起留下之干部及家属有八十余人，经教育后，可为我用。

四、陈致中央电及告华南国民党官员书附发。请新华社转播。

五、陈部起义规模之大，战果之丰，在华南尚属空前。为争取敌军起义，扩大党的影响，请中央即来电嘉勉。

六、陈部起义后，我高雷部队乘胜大搞，恢复化、吴，打开徐、海工作。截至亥有日止，战绩初步统计：缴轻机枪三挺，步枪二十支，子弹一万三千余发，摧毁碉堡三十余座（徐闻战绩未计入），现仍继续扩展中。

梁广

子

(转港, 请高与李涛同志商: 1. 发表事 (昨有陈电); 2. 是否可用总司令名电陈嘉勉。——罗迈)

中共粵桂边地委工作报告

——十万山区四个月来敌情和我工作成绩*

(1949年2月3日)

一、四个月来一般情况的变化

四个月来可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九月初到十一月初，第二个时期是从十二月中旬到一月初旬。现先讲第一期：

1. 敌情。在第一期，两广敌人的扫荡配合不紧密的，各自分区来进行。具体表现林茂刚接任四区专员，保安副司令换了陆伟才，保四团派了一个营，接了驻防上思的保八，陆伟才赶到上思来指挥。他采取全面封锁山区、策动自新、组织反动势力和逐步蚕食我控制区的办法，他以保六一个营分驻于那荡、华兰，以特编队驻平福。一面困我游击队在十万山脚，一面强迫所有山脚的乡村实行搬村围阡并封隘，不准商人来往，同时通过地方关系想诱降我地方干部黄兰生及其他工作人员，委出可以诱降的人为乡长。但他对我控制区东安乡则仍以保四一营来进攻。自九月十三日开始即侵入报安村，以后每天深入几里，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来蚕食。他一面协助反动派秋收和抢割我群众的禾，同时引诱群众归顺，说他是来保护秋收的，叫大家返来割禾，返家的均不杀，也不须写自新书。并且不象过去保六那样到处烧杀抢，对缩山的民众的家具财物，全不毁坏。此外，敌人将在东屏、东安等乡反动派武装编成一个地方大队，协助他进行“清剿”。

在防城，保九、警察队、自卫队〔将我〕压缩在狭小山沟，全县普遍搬村围阡之后，更疯狂了。他以保九一营、二营和警察第一、第二大分驻于滩散洞中、那良、扶勤、那拔、镇平等乡的据点，强迫

民众砍山，深入山林来搜索，以求彻底肃清陈锦君。陈鹏对民众说：

“水就干了，大家等着捉鱼吧。”他们认为竭泽而渔了。保九三营和警察第三大队，则在海区和东山以东地区继续“清剿”我武工队及工作人员。敌人又将依照甘励初的命令，将全县乡自卫队扩充集结成五个大队（每队约百五十人）协助“清剿”，到处征兵，每保六个至十个，并将所有自新份子（大部分是民兵）二百余人集中在县城训练，充当兵役。催收两年地税，还时籍口通匪，到处烧、杀、抢，勒索财物。

在钦县，保十营仍驻贵洞那天，封锁马君山，并用县自卫队李宣三大队扫荡小董一带。在灵西有两个县警察中队长驻“清剿”。

2. 我情。在九月总结时，我们的处境是地区已缩小到只剩十万大山的山人乡和东安乡是我控制区，其他地方敌人都恢复了统治。防城主力已分散躲在〔东〕山、里麻山、板真山、北仑沟等地，许多工作人员推过越南境马头山隐蔽，畏缩、害怕、消沉的情绪充满团级以下的指挥员的头脑，团级干部亦有几个不敢斗争，加以经济困难，粮食、被服无着，更增加这种情绪。民众在敌疯狂扫荡下受“三征”、搬村、围阘和“三光”政策之苦，不能接近我，反动派更猖狂了。在上思西征团独七团（防城打出去的主力）、二十一团都被压缩在山脚村庄，粮食极度困难，全无税收，指挥员都担心冬衣、被服无法解决，情绪比防城更差（二十一团较好）。伤病员百余人；全无医药，时有病死者，对指挥员精神威胁更大，子弹缺乏，战斗意志极其消沉，思乡逃跑不断发生。各乡反动派抬头，镇压群众，使他们怕接近我，只有东安乡好些。但觉得无法负担我队粮食，且担心秋收时敌人扫荡无法收割。过去收编的土匪队、公安队、平福队、九特队、凤开队出去自新者五六十人，还有几个袭击金团病员，抢了四支步枪去投敌，以后还不断带敌打我团级干部。除二十一团外，都无信心坚持了。这种情况，使我们感到主观困难比客观困难还大得多，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才能粉碎敌人今后的扫荡，否则就可能遭受很大的损失。

故在第一期，我们于九月尾将金团送入越南，将独七团推进防城加强斗争，留第二营在上思坚持。横县部队则一面配合二十一团进行

保护秋收的反扫荡斗争，一面准备于秋收后推返横县去。这期间，二十一团将部队分散，积极迫近敌人，到处活动和打击他，造成包围形势，使敌一出动就被打。敌进入我地区，粮食找不到，从外边运来又困难，连交通联络也不易，而主力则伺机给以大的打击。结果经过二十天（九月十二日至十月初三）斗争，便将敌人赶走了。同时部队一面掩护群众收割，一面又帮民众收割，到敌人走时，我们的秋收亦全部完竣了。在东安中区、北区，则用两面形式出现，也全部能够收割完竣了。敌人伤亡、逃跑三十二名，我只伤亡二人，群众被烧屋四间，被抢谷五千余斤。这一反扫荡成功，使横县部队顺利地于十月尾安全返横县去了。军民对敌斗争信心更高，合作亦更好了。在防城，自九月总结后，领导中心放在防城，因为防城是最有基础的地方，而敌人的扫荡又最紧要，扭转此区，便能改变全局。为此，我们首先纠正畏缩、害怕的倾向，提高斗争情绪。我们〔掌〕握这一点便集中了二百人，经过周密布置，由干部亲自率领，在那屡伏击保九一个排，缴了一挺轻机，四支步枪。这一仗便将低落情绪改变了。跟着我们集结主力，开始整军，号召下一仗要歼灭保九一个连，缴五挺机枪过年。于是第二仗在殿六伏击，又歼灭敌保九一个排，缴了步〔机〕枪一挺，步枪九枝，这样就将军民的斗争情绪提高了，干部信心加强了。在这期间，我们普遍加强武工活动，将山区周围地区的村庄联系起来，并扩大起来了下乡范围，在胜利中加征粮，解决了四、五个月的粮食，更稳定下部队的情绪。在党工〔作〕方面，将二十团领导的保守倾向克服，将混乱现象与事务作风改变，健全了领导机关。同时，初步研究连、区级以上干部加强改造，并将支部初步整理，增强了党的领导作用，这样便打下第二期有利的发展条件。

在上思西边和海边都在武工活动两面联系，初步恢复了一部分地方，在小董、灵西、大寺一带发展了更多的新的乡村，使我们准备了向外发展的条件，可能改变被困在山区的局面。

第二期：

1. 敌情。敌人鉴于防城东安、自地扫荡的失败，全山区封村，并未将我围死，搬村围闸亦未能隔绝民众与我联系，反因我两面政策，

使敌更难捉摸我与群众关系，防城的竭泽而渔、铲平除根的梦给两次伏击打破了，因此便准备更大规模的扫荡计划。此时，张瑞贵返来策划“清剿”工作，改变了第一期的做法，采取了两广统一行动，一齐向山区扫荡。在扫荡前，放出调走保九的谣言和进行诱降的办法来麻木我们，然后突然包围突袭，并到处烧杀抢，镇压、摧残民众。这期间，敌人于十一月初八将保八全团七百余人调到上思来（保六一个营调到左江去了），又从合浦调保二团部和一个营（共四百余人）到钦县。敌人于十一月中旬开始向山区全面扫荡。十一月十二日，保四二个营四百余人，和特编队百人向东安山区进攻，迫走我主力，夜袭我留下坚持部队不遂，便推入大山反复搜索，烧杀群众，抢了山林中的藏粮。至二十六日，保二于扫荡小董一带后，赶到贵洞，和三个自卫中队共七百人，从东西配合保四，二十七日突袭我大塘队不遂，即追入马君山最深处搜索，将我军民藏粮与物资抢光，又抢了那个村的财物，捉去四十余人。如此反复扫荡山区，“清剿”村庄继续了两个月。到一月十五日，保二才开始调走两个连，保四调走一个营。在防城，十一月二十七日，保九的一、二营，警察第一大队和自卫大队共一千一百人向东山、里麻山、北仑沟三点进攻，保九三营，警察第二大队和自卫队扫荡东山以东及海边作为配合。同时在上思，保四一个连和特编队共二百余人扫荡山人乡，配合北仑沟的进攻，使我不能象过去那样，广东扫荡时过广西了。经我两次伏击，其攻势就停顿了一下，又于十二月十八日再来扫东山。到十二月二十九日，保九一个连起义才告结束。

2. 我情。在防城，当敌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进攻时，正是我主力集中整训，士气高涨的情况下，加上情报准确，我们便选择敌最弱一路来歼灭。结果二十七晨将警察第三中队解决了。接着，二十九日又歼警察第八中队。这两次被歼后，敌之气焰便被压下去了。跟着十二月二十八日策动保九第一营第一连（保九主力连之一）起义，结果因中途事发被打死连长后，七个班拉了两挺轻机，十支步枪，共十四人，过来我边了。三十日因为敌被我包围封锁，故我继续攻该连，用火箭炮打毁敌轻机一挺，伤毙敌排长一和班长一名，士兵三名。到正月初

一晨才撤退，敌这一连只剩下一个排长和几个班长及四十几名不敢使用的士兵（这批兵现在仍集训中，不发给枪了），虽不全部解决亦垮台了。经过两次歼灭战和一次起义，敌人不敢分散各据点驻防了，其内部猜忌、动摇、逃跑增加了，陈鹏也恐慌起来，准备后路了（将家眷搬入越南境芒街居住，准备去做法伪军）。其他队伍暗中联络，准备起义的不断搭线，反动头子（如裴瑞熙）亦愿与我讲和，不阻止我武工队活动，其他反动〔分子〕都表示不反对我，纷纷来讲和搭线（黄明容等），甚至最反动的头子陈树尧亦不敢坚决到底了。群众看定我就快胜利，都大胆起来，准备斗争，并要求我们快些来打敌人，解放他们。乘着这一胜利，武工队活动将过去所控制区（十七个乡镇）都恢复了，还伸展到钦县边界的黄屋屯乡和越境海宁省去了。统战工作亦更易开展，军民情绪空前高涨。

在东安、贵洞一带，因敌压力大，领导干部畏缩起来，只顾躲避缩山，将主力分散了，并未给敌人以适当的打击，又未准备乘敌之隙来打敌，恢复地区，致使我地区长期沦陷，民众受损失极大，悲观失望情绪增长，出去自新了。地方队伍减员四十余，地工人员自新十多人，一个民兵队长偷了一支步枪去投敌。因此，指战员情绪低落了，畏缩保守占统治地位。但因大局好，防城胜利，和两三年武装斗争的锻炼，使大家还有信心坚持下去。至十二月尾于讨论和听李同志传达分局指示后，才纠正这种偏向，现已有新的布置。

在上思两边，因武工队活动加强，纠正过去错误，向民众认错，消除误解和顾虑，已恢复了那荡、华兰、平福、公安、九特、管站、叫丁等乡的工作，并发展妙如、佛子、昌敦和绥缘一部分的点线，冲破敌人包围封锁困守山脚的局面。在小董、〔灵〕西、大寺陆续扩阔，海区恢复了，开始有税收了。

经过四个月的斗争，我们已开始转变了去年九月那样处境极端困难的局面，这种冲破敌人的包围封锁，并准备了向广阔平原大规模发展的条件。今天敌人虽然尚在山区与平原地区有许多据点，并在某些点中还驻有较多的兵力，随时可能再组织重点扫荡，但敌人再想全面扫荡，将我压缩在山区的狭小范围，已经再不可能了。现在两广各地

民众反三征的自发斗争日益增多，各阶层对我的胜利信心空前提高，反动派更加动摇，敌人内部各自寻求出路，分崩离析之日快要来临。我指战员情绪已高涨，在南方激变的高潮将来临的形势下，这些有利因素，必会继续增加的。而今天我们每天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敌人扫荡的严重，而在于我们的干部少而能力低，还不敢放手发展，我们的主力少，战斗力还不够强，我们的基础还未稳固，还未够广大，因此，就落于形势后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弱点，否则始终是追不上形势的。

二、四个月工作的检讨和总结

A. 方针问题。九月总结后，我们根据当时主客观条件，决定了“坚持山地，巩固队伍，争取发展，扩大外围”这一方针。经过了四个月的考验，我们认为这一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我们今天能在山地基本地区站立得稳，和我们主力在两个时期反扫荡的胜利中巩固起来了。我们恢复和发展了六十一乡镇和越南海宁（从马兴山到芒街）一部分地区，纠正了畏缩保守、分散隐蔽、害怕斗争的倾向，纠正了集大兵打大仗，用武装游击作军事征服来开辟地区的错误，发扬了积极争取部分歼敌的游击战、袭击战、地雷战，提高了主动进攻敌人的斗争精神，普遍采用武工队、地工组，通过各种关系，用两面的灰色的形式去恢复和发展地区。因此，就提高了军民斗争情绪，冲破敌人的包围封锁了。此外，还将西征团送入越南和推进横县，得到了更大的巩固和发展，这就是执行正确的方针的结果。但是在方针的精神上，还带有某种程度的保守倾向。只求保存力量，过份强调巩固一面，并未强调今天巩固，为了今后更大的发展，在发展精神下来求得巩固。因此，使干部思想上感到苦闷与矛盾（大局如此使人兴奋，而我斗争却在守城），因而工作就会缩手缩脚，思想上没有准备今后大的发展，不但今天的巩固工作会做得不好，而且一旦形势大变，更有利于大规模发展时，就会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才能赶得上形势了。今天干部情绪就是这样。为什么方针会有这样偏向呢？这是由于我们当时过份强调困难一面，将本区斗争和全局斗争割裂来看，将今天斗争

和今后斗争割裂开来看。因此，多看到此时此地的困难，少看到全局和今后的有利条件，因此在精神上就陷于保守。由于干部保守，在整个工作计划上便多讨论决定巩固的一面，极少涉及发展的一面，因而在军事上就不能全面积极争取主动打击敌人，一部份一部份削弱敌人，就不能巩固和扩大主力，就不能普遍发展、建立民兵及其他武装。因此，使我们今天深感兵力不足和不够坚强，未能将局面迅速推开的痛苦。在群众工作上，我们普遍都是只有群众的联系，未有将群众组织起来。各地群众已起来反三征、反暴行，且不断有自发的斗争，但我们不只不起领导与推动作用，而且许多同志还未注意到这些斗争，还未将这些斗争组织起来，广泛推开和提高一步（如上思、防城各地群众要求我们帮助他们散闸，帮他们反三征和破仓分粮。我们没有很好帮他们忙，甚至上思那洞已有群众组织起来反征兵，我们亦未有好好帮助和领导。如小董、灵西民众要求我杀恶霸乡长和反K军铲烟苗，我们并未积极支持，怕暴露不能立足）。因此，未能掀起广泛的、蓬勃的群众运动，打下我们的群众基础。在宣传统战工作上薄弱，往往群众向我们同志宣传形势如何好转，鼓励我们坚持下去，鼓励我们大胆活动，往往许多中间人士来和我们商量合作，许多反动份子找人来搭我，但我们总未有组织、有计划地去进行大规模的下乡和宣传攻势，广泛争取各阶层民众，只是被动的、凌乱的，有人找到、问到我们时才进行这一工作。因此，政治影响不大，争取各阶层群众、各种社会力量还很差。今天有许多群众不了解我政策而对我有误会的人尚多，这固然同过去违反政策行动的恶影留在民众心目中有关，但我们这方面工作薄弱，更增加消除这种心理的困难。在经济工作上只从解决当前困难着眼，并未顾将来更大发展时的需要，因此，更着重大规模的开源与建立长远的经济事业打下稳固的经济基础的计划是没有的，只做到今天掘来今天吃而已。在党工作就只做到初步审查中级以上的干部和整理支部，还未着重大批培养干部，大量发展党，普遍建立支部工作。因此，今天极感到干部缺乏，党的基础太薄弱，远落在形势需要的后面。在干部思想上，浓厚的山头主义严重地存在，没雄心魄力，保守倾向重，而工作作风则是见一点做一点的事务主义占统治地位，

使我们很难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而走上集中的、统一的、有纪律、有秩序的领导的。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没有顾及今后更大发展，建立起更大规模的根据地的思想而造成的错误。所以，九月方针的偏向对我们今后工作影响很大，使我们深感追不上形势了。

B. 具体工作问题

1. 军事斗争。成绩：

①我们执行了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方针。在这方针下，提高了对敌斗争的精神，反对畏缩倾向，集中优势兵力，一部份一部份歼灭敌人，发扬袭击战、地雷战，反对集大兵打大仗、打消耗战和无把握的战。另一面则普遍用武工队去开辟新地区，发动群众斗争，铲除恶霸，打小股敌人，到处活跃，配合主力歼灭敌人。这一点是在干部军事思想上有了进步的。因此，能够粉碎敌人两次的大扫荡，恢复和发展了六十一个乡镇和海宁省一部份，歼灭敌人三个连，缴获轻机六挺，步枪五十五支，子弹三千发，壮大了自己并将敌压缩了，同时冲破敌人的包围封锁。

②在防城已建立了两百人的主力，经过了初步的整军，战斗力是加强了，这对全局将起核心推动作用，使今后斗争会提高一步。

③乘敌之动摇逃跑之际，我们开始揽保九之起义。这一成功，不但使敌官兵互相猜忌，不但引起其他敌军照样做（过去以为我是见到就杀的顾忌消除了）。而且推动我全体军民都去搞敌军工作了，故今后可能不断有起义的事情发生，使敌迅速瓦解，使我更加壮大的。

缺点：

①未能全面积极争取主动，有配合、有策应地打击敌人，使各区斗争孤立。如当东安乡积极反扫荡时，上思西区并未积极配合牵制敌人，只顾自己缩山避战。如防城猛烈开展伏击战歼灭敌时，上思各地都缩山避战，就是证明。因此，我们虽在一地胜利，而另一地又失败了；一地发展，一地沦陷了。同时，这更便利了敌集中兵力来作重点进攻，使我们可能被敌各个击破、各个摧残，这对我们的斗争是极其不利的。

②我们未着重巩固和扩大主力，使我们组织更大的战斗歼灭敌人，

无力改变敌我形势，迎接胜利。例如，防城虽集结得二百人的主力，并未能扩大集结。后虽有整训，但是无粮，因敌情经常要分散活动。在集中和分散时都未能握紧去进行整训计划所规定的工作。因此，各种制度尚未健全，游击主义的习气极重，自由散漫，学习松懈，对党的领导不尊重，只服从带惯了队的陈生同志，盲目的山头主义极重，纪律很差。而政治认识差，阶级觉悟低，成份不纯，加上过去土匪作风、过左政策的影响，使主力虽有其名，但离我们的要求还远，必须努力加强整训，才能名符其实。至于二十一团在敌人扫荡中又将主力分散做武工队，而在各地方是可能建立主力的。如小董西区又未能抓紧去建立。因此，我们虽有九百队伍，但没有强有力的主力来大量歼敌，改变形势，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缺点，必须克服。

③对地方部队和民兵的领导很弱，因此，不但不能扩大，反而缩小和瓦解了。例如东安民兵全部瓦解了。平福队、公安队、九特队等或投降叛变或动摇逃跑，亦所剩无几了。凤凰队独立营和第二营第五连都大量减员就是证明。这种孤立我们的主力和使主力难以扩大，这就使各地群众失了斗争的核心，影响群众运动的开展甚大。

④经济制度混乱，后勤工作无人专责，使给养、医药都不好。交通情报不健全。特别是无认真开源，解决经济困难无长远和全局打算，故经济始终不能建立稳固的基础。所有这些都是充分表现出军事机构极不健全，影响全局斗争极大的。

2. 群众工作。成绩：

①普遍用武工队、地工组，通过各种关系用两面的灰色的形式去联系群众，纠正畏缩害怕倾向，大胆放手去搞，纠正用军事征服来开辟地区的错误，纠正大摇大摆，张扬暴露，招致敌来摧残群众的做法，同时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向群众宣传解释今天的政策与做法，因此，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敢于接近我们、帮助我们了。有些地方（以下缺一——编者）

②在不影响主力的原则下，坚决抽调干部去主持武工队，找寻各地有关系的同志参加武工队，并着重使用农民同志（过去只靠无群工经验，怕死，又不懂如何接近农民与帮助农民的学生哥来搞，始终搞

不通)，配合知识份子一齐去搞。在领导上指定专人负责，亲自帮助各武工队布置工作，检讨和总结工作，及时纠正错误和加强其斗争。克服了过去无人专责领导和领导不深入具体的恶习。因此，群众工作普遍推开了，恢复和发展广大地区。这一点在防城的成绩特别显著。因此，能够乘着反扫荡的胜利猛烈发展的缘故。

缺点：

①我们搞群工是以方便部队为主，未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斗争，改善他们的生活，除去他们的压迫为主。因此，我们为群众服务少，要群众帮助我们多。因此，普遍都联系到群众，但未能打下群众基础。各地群众都积极要求反三征、反暴行、散闸、破仓分粮，有些已自发斗争了，但我们未去领导，使之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这样就使我们今天不能克服全区的主要弱点——没有普遍的巩固的群众基础，因而形成部队单独作战，未能得充分的群众条件的配合。这一点不改变，我们是无法改变形势胜利，必须引起全党同志们注意，集中全力改变过来才妥当。

②我们忽视城市工作，特别是忽视学生工作，因此今天干部大感缺乏，且造成和外界隔绝的状态。南宁有四五千学生，其他各县共计不下五千人，他们都和我们有各种关系的，都受过我们或多或少的影响。特别在今天的形势下，他们更渴望走到革命阵营来。不过自从我们搞起武装之后，便忽视这一工作了。我们将许多学生工作同志撤入游击区之后，便没有派人去搞这一工作了。这是纯军事思想作怪，使今天地区搞开了之后，不知怎样应付好。同时因为得不到城市各阶层的援助，使我们斗争非常孤立，局限在狭小地区，头脑蔽（闭）塞，更易失了政治敏感，落在形势后面。所有这些都未使我们干部深刻认识，这就会始终成为山大王而不是得天下的主人翁。

③未有专人负责统战工作，未有组织、未计划去进行宣传攻势。因此，许多人不了解我政策，许多人对我还误解顾忌，妨碍我争取广大的各阶层群众、各种社会力量甚大，使敌人更能欺骗一部份群众来和我们斗争，对我是极不利的。

3. 党务工作

成绩：

①领机本身开始注意党工，纠正九月以前完全不理党工的倾向。

②初步审查连级、区级以上干部和整理防城支部，便利正确培养、提拔和使用干部，便利健全支部工作。

缺点：

①领机虽注意党工，但并未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团级干部重视党工（如二十一团政委、团长在此反省，因为思想上认为武装斗争以军事第一，只要搞好军事一切都会好的，且事务主义作风重。虽在会议决定重视党工，但做之下便不理了，二十团的干部亦如此，甚至有不接受党领导的。如上思独立营长就是）。许多工作都未正式通过党委和支部讨论通过执行，而是由个别负责同志交换一下便进行了。有时即使是集体通过，以后又不依照执行，又没有检讨批评和总结，始终保持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这一点极之妨碍党的集中与统一，妨碍团结（如二十团与二十一团各顾各，两团本身各顾各），妨碍克服保守倾向、山头主义、事务主义、自由主义的作风，使党的领导作用大大减弱，成为党工目前主要的弱点。

②未能普遍发展党特别是地方党。而在部队党的发展中，又犯了不负责的拉夫倾向。在地方党的发展中，始终是关起大门，因此，使党的素质很差，未起作用。同时又使党与部队的比重极不相称（全军有千五百人，党员只有二百七十人，地方只有十几人）。同时支部不健全，大多数党员都未受到教育，得到进步，因此，不起核心的作用。有些党员说：“做了党员还不及做对象时受教育多得多”。“做党员是顶笨的，只是辛苦多一点，其他无好处”。“做党员不做党员没有什么要紧”。而群众对我党员则说：“某某是党员，比我还差，我不入党”。“做革命几时我都做，无须入党”。第二营长说：“张营长，我看他一定是党员，但带人来诱我自新完全是无立场的”。所有这些，证明我们党内教育极差的，使党员认识差，组织观念薄弱，无原则立场，不能起作用，给群众看低，党在群众中无威信，妨碍党的领导，妨碍党的发展和巩固。但我们知道了这些仍未引起干部重视，结果始终没有改变，实是严重的问题。

③对在职干部的培养很差，使他们深感认识低。能力弱，不知怎样做才搞得通工作，因而苦闷。领导上未能有计划的进行政治教育和总结各干部的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使他们长期停留在一定限度内不能前进。有些干部说：“做来做去只是多做了一些事情，但总不见有什么进步，自己的缺点总未改正，愈搞好似愈不通”。大多数的干部都希望能去香港或其他地方训练一下，然后返来工作。由此可知，我们对在职干部教育是很差的，十分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便不能推进他们的工作效率，影响工作的发展极大。我们未有办过训练班，未能培养出大批干部，以应需要，这不但未能广泛动员各地知识份子来受训，就是已参加队的知识分子与农民中有许多积极分子也未有好好训练他们，因此，使他们落后无知，能力低，工作逐渐消沉。这难怪我们今天干部缺乏到难以补救的程度。还有我们许多地方上有威信的士绅（如上思黄参议长、韦耀卿）和有学问、能力的大学生（如防城的陈崇基、谢大来、江滨等），非党干部取轻视态度，未能适当发挥他的能力和作用，未能好好教育与提高他们，未能关照他们，与他们合作得好，长期丢他们在一角落，使他们极之苦闷，极之无聊地过活，直至他们坚决要离开我们时才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这点可知我们对待这样有为的非党干部的态度是极不对的，这就妨碍他们争取广大社会人士和各阶层群众，妨碍党与非党的合作甚大。

④保卫工作极端忽视。在九月会议时，我们曾枪决黄同志的保卫员老温公，因为偷枪准备逃跑，过去又在税站大食大饮，嫖赌腐化，藉名打劫已纳税的商人。但此事并未引起同志们的注意，至最近连续发生，二十一团政委的保卫员，籍买米带钱逃跑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是因为政治麻木，没有将保卫领机当成重要的事情来办理，因此，选择保卫员时，只择打得的、机警的人，但不注意政治上是否可靠。或者选择与自己有庸俗关系的人，但不注意其是否有政治觉悟与认清保卫工作的重要而愿牺牲一切。为此，工作、政务只靠感情拉拢、庸俗关系来维系，这样推选保卫员是不对的，必然会发生不良的现象的，万一敌人收买了这些，我们的领机可能给敌人消灭的。我们的干部还有一种的错误认识，以为自己不怕牺牲，自己顾自

己是自私的，所以不愿从连队中抽调好的人来做保卫员，而人家抽调保卫员时，也可以藉口影响连队来拒绝抽调。因此，就使所有保卫员都是随便找一个来作跟班便算了事，这样的做法实在不了解保卫工作的重要意义。同志们不知保卫领机是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保卫革命领导核心，使革命事业能够得到正确的领导而取得胜利，并不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性命而已。同时，敌人正集中精神派特务来暗杀我负责同志，出巨赏来杀我负责同志。我们对领机的保卫是更加重要而急切了。但此事始终未引起同志们的重视。因此，今后必须严格纠正之。其次，保卫队伍的建立，也在上述的错误认识之下加上山头主义作怪便始终未有很好的解决。再次，全党、全军的审查工作还未进行，特别是已经发现有问题的、过去做托派，今天来历不明的人，我们亦一样与他和平共居，相安若素，毫无一点警惕性。二十一团郭实的态度就是。以上这些事实充分反映我们的反特防奸工作极不够。我们都是阶级警惕性极差，麻木不仁。因此在这一方面屡次犯了错误都未改变，今年必须严格纠正。

C. 经验教训

1. 在九月会议以前，我们不从本区实际出发，只强调全国和各地形势的好转，忽视本区实际困难，因此集大兵打出上思、绥边和珪钦，军事发展有点硬碰，以为用军事可以征服一切，结果失败了。这是不懂得发展的规律先要放点连线，在有条件时才大搞一下，用跃进方法来充实基础。但他们过分冲动，条件还未成熟就想用军事力量来霸占地方，一口吞下去，结果吞不下去，差点还梗死呢。好在还吐得快。但在九月会议后，我们过分强调本区暂时的困难，忽视全国和各地的有利，忽视今后形势更加有利，因此，我们精神上又犯了保守，不注意发展的前途，没有准备今后发展的条件，使工作落在形势后面。由此可知，对形势估计错误或不足，就会决定错误或有偏向的方针，就会犯左倾盲动和右倾保守的倾向，这就是影响整个工作的成效而造成这样错误的原因，就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所作怪（九月前犯教条主义，九月后又犯经验主义）。因此，纠正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提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客观地、周密详细分析研究全盘实际情况，

正确地估计形势来决定方针，成为我们改进今后工作的主要环节，我们必须紧紧地握着这一环节来纠正一切工作错误，使今年工作有新的转变。

2. 由于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认识或认识不深刻，因此我们全盘工作中最弱的一环是党工，其次是群工。我们一向是由纯军事的思想统治着，直至今天仍未改变。因此，忽视党的领导，对党的政策、决议和上级指示不重视，严重的山头主义、自由主义普遍存在，造成无政府、无纪律状态，自觉或不自觉的妨碍集中的领导、统一的行动。因而政治上长期落后，事务主义的工作作风始终不改，同时造成武装斗争中未能建立广泛而巩固的群众基础，不要统战，不要白区和城市工作的配合，造成孤立的局面。这种思想不改变，我们很难前进一步，很难使党、群、宣、统工得到发展，如此就很难追得上今天形势的需要了。在军事斗争上，我们是掌握到歼灭战的思想 and 游击战战术方法，但由于我对主力建立还不重视，这就会妨碍我们的提高，使我们不能作大规模的歼敌战斗，使我们不能迅速削弱敌人，壮大自己，改变敌我形势，这是今天的军事方面的偏向。所有这些都证明我们未能掌握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很好的运用到本区的实际斗争中改造我们的工作，推动我大踏步前进。为此，今后必须从这方面努力学习，以纠正过去的错误。

3. 上下级联系太疏远，组织制度未建立起来，我们不能及时纠正错误。例如我们半年才由李同志到分局报告一次，分局则于五月派李、杨两同志来一次，此次又派李同志来一次。我们一年来全未去过地委、区党委报告过，只有写过二次报告和杨同志去一次，而地委只派叶勤带一次指示信来（中途被敌袭击失去，等于没有来），在我们本身和合灵陈华同志除了西征时路经该地，匆匆谈了两天外，一直没有会过面（四属临工委）。在十万山本身经常我和李、黄同志一分开，就两三个月各人顾各人的地区，在集中时又很少深刻地全盘详细讨论工作。直至九月会议后才和黄同志集中在防城搞。我们在离开防城打出去时，对防城的领导，只是信件来往，两个月才返去检查一次工作。九月会议后，我们离二十一团两个多月未能及时帮助他们纠正畏缩、

避战的倾向，所有这些都是使我们孤立地、单独地进行斗争，长期犯了错误而不能迅速地改变，对我们的进步极大阻碍，影响整个斗争极大。

（四）集中讨论时不深刻，因而决定方针计划不周详、不明确、不具体。因此，影响执行不一致，不能贯彻到底。分散到各地负责时，独立解决问题，对集中的决议采取自由主义，所做的离开决议，自出心肠，随事务兜圈子，且联系差，更使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变成分割状态了。一般号召少，比如对群众工作无明确号召，无依照此时此地提出适合民众要求的斗争口号。比如所有决议我们都很少能够贯彻到全党全军每一个人去。这就是证明了领导不深入、具体，使下面普遍感觉到不知怎样做好，又未得上级的帮助，只是交代任务，但未帮他们研究如何才能完成它。同时，具体领导和一般号召脱离的，不贯彻实行起来。比如号召查整，除发下一两篇指示外，无下文了。领导上并未具体帮下面进行查整，而自己亦不怎样理到查整。好象发了指示之后工作就会自动完成了一样，无须再来过问了。因此许多工作都落了空。

上面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组织领导是十分薄弱的。造成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造成空谈，造成事务主义，就是很自然的了。这样的领导的确不能适合于今天的形势的要求，不能担当如此广阔，如此复杂的而又急激变化的。全山区的斗争必须彻底地改变才能掌握得住今后的工作，使之上轨道，大踏步前进，追上形势。

5. 在敌人扫荡时，我们不只主动地有计划地避过敌人的主要锋芒，使全部工作不受严重的损失，而且还应争取主力积极打击敌人，并有效地、一部分一部分歼灭敌人，否则就不能将敌人的扫荡粉碎，而我队必须产生畏缩害怕、悲观失望的严重现象，敌人更加猖狂了。在几个月的事实中证明，即使在内线作战情况下，我们亦应主动积极展开局部的，不能单独缩山避战，如此才能粉碎敌人之扫荡，改变形势，继续展开全面对敌进攻。以防城为例，独七推过山北后，单纯缩山避战，结果造成敌人竭泽而渔的严重局面。九月十五日后，主动地打了伏击战，至保九起义，形势就变了，敌人缩返据点不敢出动了。但在

改变形势之后，我们并未展开全面进攻，使敌人得到喘息机会，重组下次扫荡，我则放过有利时机，争取更大的发展与更多的歼敌机会了。这一种缺乏时时都有旺盛的主动积极，不断进攻敌人，一部分一部分削弱敌人，一次又一次壮大自己，改变敌强我弱为我强敌弱的形势，以便取得最后胜利的精神是必须坚决纠正的，否则我们便不能完成新任务。

6. 为了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而达到集中的统一的领导，我们必须高度地发扬民主。在此次学习会上充分反映出领导不民主，使下级不知其应负的责任。对许多应知的事，特别是一般的方针、计划及其本身的职责不明了，故他们贸然自作自为，或盲目服从而不自觉，使下级有许多意见不敢讲或不能讲，特别是许多不满郁在心里不能发挥，造成上下不团结的严重现象，造成消极怠工、无责任心、无积极创造性的现象。领导机关从来没有认真反省检讨自己的不对，只是责备下级，没有虚心向下级倾听意见。所有这些都是极端妨碍领导的集中与统一，所以必须尽量发扬民主（只要不走向极端民主化，妨碍集中与统一，妨碍团结），来达到集中与统一，我们不能以权限划清和命令强迫集中来达到真正的集中，我们必须通过高度发扬民主来达到高度的集中，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走的正确的路。为此，领导机关本身应首先以身作则，向下级作深刻的反省，检讨过去不民主的事实和产生根源。并在今后行动中找出克服的切实办法，以保证不能再犯，然后推动各级领导继续向这一方面努力，使全党、全军都能在发扬民主过程中求得真正的集中领导与统一行动的目的。

个别问题

（一）领机问题

1. 由陈为正书记，李、黄为副书记。

2. 大周同志介绍来由左江过来的林中同志参加原日的四属工委，现将他的简史付上，请审核批复。我们对林同志了解不深，但经过此次交谈中知其工作能力当可负责，且他是广西人，较熟悉广西情况，因此我们是愿意他来增强地委的领导的。如何处理，请决定指示我们。

（二）地区接收：

由右江转来珙属三官区、迁隆区、扶南、绥缘两县的关系经李同志接收了，由左江转来的思乐、明边（？）、江宁三县的关系经左江工委认为要凭祥对他们工作有利，不赞成转过来。此次我们入越，再向大周同志交涉，以便划清权责。不知你们意见如何？请指示（因凭祥与思、明斗争是密切相关的）。

（三）入越问题：

1. 决定陈同志为代表与越方商谈决定双方合作问题。

2. 商谈内容：

甲、建立统一指挥机构，最高决定机关由双方所派代表组织成的委员会集体决定。倘有问题不能解决，各自向双方的上级请示作最后决定。至于军事指挥，若越方调一主力中团来扫荡边境，军事指挥主要责任由他负责。若只调独立中团，干部能力弱，且部队力量不大，由他负责反难领导。

乙、任务是扫荡中越边界和打一个出海口岸。步骤先扫荡中国境，以防城为主取得一立足点，然后再扫海宁，因为中国境敌人力量薄弱，且离其主要据点远，较易解决。而越境则敌力量大，离海防近，较难解决之故。如此全部兵力要三千人，越方两个中团二千，我方一千人，全部供应由越方为主，我协助之。我方武装弹药不足是由越方补充。领机位置及后勤等机构建立问题，双方具体商量解决之。

丙、建立双方商业问题：

丁、借款问题。我们为了建立较大商业，打下稳固经济基础，支持整个斗争，需要时，便于与香港、广州湾及越方海区联络，并准备建立城市长远基础起见，决定在南宁、东兴、北海及海防做较大的商业和做二只大船来往香港、广州湾及越方海区，预算资金最少要西员纸五百万元。为此我们此拟不知你们意见怎样，我们相信此数可能在一年内归还越方，不知可否，请即电知入越陈同志，以便进行。

（四）联络台问题：

本区离上级远而斗争复杂，今后又要与越方合作。因此，我们深感需要建立一联络台。我们慎重考虑过，就今天的条件是可保护电台的安全，以后更无问题，所以请你们批准，并希派电务员来负责或者

我们从大周或李碧山处找人呈你们核准录用。

(五) 黄宜生同志因郝鹏举叛变时被捕，前月已抵小董找二十一团代转上级组织解决他的问题。现我们叫二十一团送他来我处，一面审查他，同时将他要拍给陈毅同志的电稿抄给你们。此事如何解决，请指示。倘已解决了问题，能否留他在此工作，帮助我们搞好本区。

(六) 干部问题：

现本区地阔，干部少，能力弱，请尽可能送些干部给我们，特别是建党、训练干部有经验人最需要。

(七) 请派人来南宁主持照顾各方。南宁是桂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那里与十万山区、右江区、横贵武区及左江区联系均易，都是一天途程可到，在市区有社会关系掩护，居留没有什么问题。现我们和右江及横贵武在南宁已建立联系，但为了领导照顾这一幅广大地区的工作，我们建议由分局派人到那里坐镇主持。

(八) 建议越北独立中团改变领导关系。该中团改番号为“海宁中团”，奉越命令，照主力中团编制，扩充足额，于四月中开出海宁占领区活动。本部去年入越队伍亦有约200人，临时参加其建制整训，其先遣武工队且已开到边界，与防城部队联系并加强工作。海宁为越之边缘省份，日寇占领时，防城队曾在该地开展敌后华侨游击战争，在山脉的连绵和群众的关系上面为防城的伸延地区。为了统一上加强领导，打开越、粤、桂边的新局面，我们建议该中团的组织领导关系改隶粤区，为此也可避免滇桂黔边委照顾不及之弊。

请明示本区与法国外交关系及华侨工作的方针。由于本区与法、越的统治区海宁省及谅山省一部分相连接，东兴、芒街为华侨进出口的门户，我们在处理侨务工作和法、越、华间的民族关系时，处处都不能避免与法帝国主义者发生矛盾与事实上之外交关系。如我营级干部林仕文同志在该地居留被捕，阮文志女同志亦因进出华侨社会被捕，经交涉虽不引渡给国民党反动派，但却拒不释放。而其教士的日益尖锐与复杂，我们对法帝国主义应采取什么外交方针？而且因祖国人民的不断胜利，边邻华侨均热烈拥护我党我军，我们与华侨联系建立工作，即在海防、河内亦有点线展开。海宁华侨由于大多数都是钦防人，

更加密切，当党的侨务机构来建立工作以前，我们侨运方针及权责如何，亦急待指示。

(九) 公开政权的革命干部准备。

为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建立公开政权，我们计划先在较有基础的防城、钦县、上思三县首先建立，次及边邻各县。其主要人选均在地方干部提拔。分别报告如下，请求鉴定批准：

黄志英，男，防城人，三十一岁，家庭出身富农小资产者，肄业中山大学史学系二年级，曾在本县中学当过教员。1946年二月参加党，在青年学生中工作。1945年春曾执行党的任务回农村准备武装斗争工作，同年七月曾建立公开武装队伍入越参加“越南革命”，历时二月余复员；继任中学教师一年，1947年返中大复学，同年夏即返防城参加武装队伍，历任连队指导员、县临时行政特派员、二十团政治处主任等职，多数时间专责搞群工及滨海区统线与经济工作。曾在1948年春负伤一次，并二次被敌袭击，均冒险犯难，坚定忠诚，且好学深思，办事细心负责，不避艰烦，社会阅历较深，中上阶层均有威信。惟因长期独立工作，缺乏党的教育与下层工作的锻炼，党性和下层群众观点仍有个别弱点，但在实际斗争中都获得迅速的克服进步。

朱守刚，男，钦县人，三十一岁，家庭出身为小市民，中学程度，抗日时期参加二十六集团军政工队及军队政治工作，再接受进步联系和工作。1941年逆流发生，复员回乡在小董做小学教师，1942年二月参加党，即在当地任镇公所文化干事和中心校校长，广泛推动乡村小学教育，团结地方上层和知识分子颇著威信，并建立了党的支部及农村基础。1944年冬南路起义，彼在小董起义，任大队长（百余人），因无战斗经验，先后一月即为反动派武装镇压，全产溃败，曾与现任二十一团政委卢文同时被捕，逃脱往合灵，随合灵队工作。1946随南鲜主力返钦县，恢复工作。主力入越则留下坚持，组织武工队活动于十万山区各县，队伍扩大统编时，曾任钦防农民翻身总队长（化名陈洪威）、二十一团团团长、马君山区工委副书记，与各阶层群众有密切联系，是极有威信的群工干部。由于数年来艰苦斗争，从未稍懈，党、政、军全般能力都平衡发展，而又长于军、政。而主要弱点是政治开

展不够，易因于一己的狭隘经验而陷于保守。

林山（化名林克），男，四十余岁，小地主，中学程度。抗日时期参加珙宁政工团等政治工作。逆流发生即返其原籍教小学，足迹遍各乡镇，有“林教师”之称。在各乡镇的知识分子中曾有很大的影响，大约在1940年入党，广西“一·一五”事件即失去联系，而与广东钦县地方组织建立有进步的联系。1947秋接受党的任务，领导上思起义，建立独立营，任政委，并于是时正式恢复了党籍。1948年调任上思、绥边开展工作，任工委之一。因长期抱病，未有发挥工作效能，而且因长期失去了党的领导，政治开展与掌握政策不够坚定，立场易于动摇，但是与广大群众有联系，且相当洞澈〔察〕下情，肯虚心学习，执行党的意见，刻苦肯干，且有威信。因此加以特殊教育和帮助，是可以任公开政权工作的。

沈鸿周，男，二十九岁，中地主，高中毕业，曾任中学教员，是钦防名绅耆沈耀抗的儿子。学生时代即接受影响，帮助党工作。1945年春即接受党的意见回乡搞武装斗争工作。夏组织队伍入越海宁塘花负责华侨大队长之职。1947年三月入党，“华游”被打垮，回乡坚持游击小组活动。南解于一九四六年开抵十万山区，始重新起义组织地方大队，任大队长。后随主力撤越后改编为老一团第三营任营长。在越期间，大部时间参加训练班学习。1947年夏始返国参加工作，编团任二十团团长。办事有谋略，细心负责，有号召力和团结得群众。主要弱点是阶级出身地主，身体弱，因而斗争性不够顽强，经滇桂黔边委鉴定，较适合负责政权工作。

我们的意见：钦县由朱守刚负责县长，上思由林崑山负责县长，防城则由黄志英负责县长，如其工作上的意外需要或情况必要时，则由沈鸿周负责。

（十）交通问题。我们的领导中心放在防城，因此与分局联系以走港芒线为快捷。具体情况由来人口头报告，桂珙线仍畅通，物资人员则仍可走此线。

梁广给香港分局的报告

——关于保安第十团起义情况*

(1949年1—2月)

关于保十团起义的报告 (1949年1月12日)

保安第十团于十二月十九日起义，事前与我们全无关系，至二十一日才和我们取得联络。现将整个过程报告如下：

(一) 起义的动机。保十团现〔原〕是张发奎建立的，张走后宋来接收，对原有保安团干部已不信任，采取并吞，已把几个保安团干部撤换。保十团自张君嵩到任后，即对陈一林不信任，最危险为难的任务就交给他，待遇刻薄，专找寻弱点来作撤职的机会。因此全体官兵对张及警卫营已有很深的成见，最近有把陈撤职查办的传说已更明显。张于几月前已派一副团长及六个连长，以企图控制全团，这是矛盾的主要因素。

(二) 事前的准备。据陈说，半年来已派人到广州、香港、上海去找我党关系和地方实力（主要是张发奎），当时已取得联络，并表示我军在过江或进攻南京时即行起义，也有此企图。但这次起义时，因时间急迫，与张没有联络。同时两个月来陈未有离开队伍，到营、连队去了解情况及掌握干部，可说作思想上的准备（对张君嵩不满作鼓动工作）。十九日张又下令保十出动，一林乘此即召开干部秘密会议，报告张对保十歧视的事实。由于事前对思想上的准备，经宣布后全体干部情绪激愤，决定起义。并商议发展方向：一个接受我领导，一个是向十万大山转向安南去，据说，与胡志明是好朋友。

陈在事前曾运动有保二驻安铺的一个营及遂、廉的几个反动乡镇

首脑的同情，和准备随从的人数约有七百余亦会跟他一同起义。个别的有信复约陈，表示响应（实在是投机分子）。当时就以为能占领西赤，解决物资困难，并能控制南路一时期。

在军事上布置，把留于遂城的警卫营百余人，用代替保十点名办法来缴械，并于十九日晨邀请张君嵩训话，以便伏杀起义，并准备向湛江进攻。

（三）事变经过。保十合计有八百余人，于十九日晨张君嵩、邓伯涵及梁军事处长、省保安视察员颜、警卫营营长共二十余人到遂城时，即为保十伏击毙命，而副团长及张君嵩派去的连长也一同枪决，并即乘机向湛江进攻，与保十八团警卫营一部展开激战，占领司令部地下，不能全部解决，双方各伤亡百余人，银行未能解决，即全部撤回遂城。这时有一营长古冷云带了一个连两个排逃向安铺去。二十日晨又有一营长带一排长借名往赤坎接陈团长回遂而逃。陈于二十日晚派了专人分诸路找我联络，直至二十一日晨我派了王克同志见到他们。继即开我八团去与他们会合。

（四）二十一日与我们取得联系后即表示愿接受我领导，由于干部情绪未稳定，对于各项问题还未提出讨论，对我的信任还未明确，只是为了解决当前的方向和各种困难，而且阻延再向赤坎进攻。二十三日因敌有援兵到，情况起了变化就中止。

跟着研究他们的发展方向问题，决定转向十万大山，原因是：

1. 他们队伍的素质很差，他们的起义是迫于私愤，没有政治认识的，思想混乱，士无斗志，要巩固是不容易（他们大抢、大食、好赌、懒做）。

2. 敌对保十起义特别重视，派援兵来镇压是必然的，如留在廉、遂作战对于我及人民均不利，如推出外围与敌周旋，又缺乏群众支持，经济无着，纪律难维持，对我政治影响有害的。

3. 队员多是本地人，捱不得苦易逃跑，加以他们长期间和我作对，我与民众都有很难为情之感。

以上是保十的特点，而我们无安稳地区，经济上的困难，民众负担已很重，对这支队伍补给并不容易。在战斗任务上，我们原有团队

已勉强负担。至于保十全体干部也要求到稳定的地区去，能够休整一个时期。曾考虑到廉桂边五属一带活动，但因那里无群众基础，活动又不容易，最后仍向十万大山方向去。

至于番号问题，他们对前途安定情绪，要求给予名义，决定给其番号为第八支队，准备编为二个团，干部作重新的调整（这时还未发生有组织的逃亡，仍有轻重机七十多挺，人数七百余）。二十四日即从遂出发，到廉境牛官水地区时，该夜有一个主力连带了全体武装、五挺轻机离去，主因怕苦。二十五日曾再考虑他们的进军方向，但在他们全体干部交换意见后仍决定继续前进，并加派灵山一个排去保卫陈等。二十七日到博白境时，有一营长（冯志坚，整编为副团长，与陈一林已不大好）带了四个连十四挺轻机又逃走了。

当时陈与干部信心已动摇了，决定折返廉江。二十八日到廉边时，一个警卫连白日又逃跑，并向天放枪掩护撤退。至此陈一林已感到留下的人也不可靠了，为了安全与武器不再落在敌人的手里，就自动的和干部商量，先把连队的机枪及炮等武装缴下，翌日我队伍开到协助，步枪也顺利地缴下来了。同时集合全体官兵由一林（团长）训话，结果良好，并在当天内即把三百余人疏散，并给川资。大部士兵很难过，互相痛哭流泪，但他们又知道自己不能捱苦，不得不忍痛离去。现留下一林及营级干部（以前是连级）、军需副官、排、班级干部二十余名，士兵四十余名，决定留此工作，现全部官兵仍有七十余人及家眷共约百人左右。

（五）目前的处置办法。八支的番号与他们的级别仍保留，暂时派干部给予教育及休整，准备二三个月后，即把我三、四、八团集合为主力，选择他们干部来配合指挥作战，全体干部情绪都很好，陈一林和别几个干部积极要求入党（怎样？希复），现在党章给他看并给予教育。

（六）物资接管数字。

八二迫击炮二门，炮弹百余，六0迫击炮三门，炮弹数十发，重机枪（日式及马克森式）共八挺，步枪四百二十余支（多数日式的），机、步枪弹七万余发，掷弹筒及枪尾筒有三十余门，弹筒弹约三百余

发，轻便冲锋机及卡宾枪约二十支，驳壳及其他手枪约十余支，大部分仍由他们配用。电台四座，新式精美收发两用报话总机一座，均是完整的，军用电话约八九副，手榴弹约三百余颗，乘马五匹及其零星物资难调查的，可惜西赤的军械仓库我们未能及时攻下。

(七) 从这次行动中，我军事上、政治上都收到很大的收效，除了保十团给敌的打击外，我遂溪县的各区武装都积极行动出击，计破坏了敌人炮楼三十三座，收复了五个乡镇。缴获物资：长短枪一百三十四支，轻机一挺，子弹二千发，手榴弹十余个，胶鞋一百七十四双，谷米一百八十四担。

另我化、吴第四团乘胜进军吴川，二天内继续激战八九次，打下五个堡垒，缴获轻机两挺，步枪八十余支，子弹一万余发。化、吴局面会因此而较顺利的发展。

我遂溪县第八团亦进军去海、廉、徐闻去，据报已安抵目的地。

政治上民众信心大大提高，情绪高涨。保十官兵对我党及解放[军]很敬仰，全体官兵也感到解放军的伟大，离开士兵虽多，但对今后瓦解敌军工作有了帮助，对整个华南及广东也有他底意义。

(八) 以下是我要解决一些问题 (略) (原件如此——编者)

(1949. 1. 12)

续关于保十团起义的报告 (1949年2月8日)

“关于保十起义的报告”秘写后尚未送出，又先后收到分局十二月二十九日 (一月二十一日收到) 及一月一日 (二月二日收到) 两次关于保十起义的指示，这两个指示主要是根据我们十二月二十一日 (即与陈一林会面的当天) 的电报而作的。这个电报是最初的报告，是在计划联合进攻湛江的匆促情况下发出的，不但了解保十的实情不深，而且无法表达当时我们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处理方针与步骤，现再详细报告如下：

(一) 陈部起义似与张发奎有关，这在杨应彬同志与陈一林初次会面时，陈即已隐约透露 (陈说他曾派人至沪见张，张表示俟大军渡江，京、沪吃紧，他和若干粤系军人即南下通电促蒋下野)，但他与

张的联系并不密切，起义后与各方关系更已中断。十二月十九日晚，陈攻湛江不下，无法解决经济困难。退回遂溪县后，官兵思想混乱，彷徨无主，有两个营长（古冷云、周南）反对起义，已率队逃亡。陈在此困难情形下乃转而向我，表示愿意接受我之领导，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请求仍保持原来部队成员，不要编散。当时我决定“大胆领导、大胆掌握陈部”方针，其理由如次：

(1) 陈部起义事先未与我联络，事后又有保存实力之企图，其起义原因是因为与张君嵩、邓伯涵有矛盾，这表示了他起义的动机不纯，我们要乘他的混乱猛烈发展自己，并且只能有限度的帮助他，这是一面；但另一面，他起义后与外界是无联络，内部不稳，甚至陈个人的生命都有危险，在这种情形下陈转而靠我，四出找我部队，虽有投机成份，但未尝不是陈思想转变的开始。我若能大胆领导他们，不仅可以掌握这支队伍，而且将更加扩大我党政治影响，提高我党威信。事实也是这样：这起义投我之后，高雷群众对我党、我军威信大为提高，赞扬“共产党真是神通广大，保十团也被他搞过去了，”而把符春茂叛变后的悲观情绪完全改变过来。更因为陈部起义后，不是自立旗帜，自挂招牌，而是在我的领导下，这样更在广大群众面前提高我们的威信。若我对陈部取消极观望态度，则陈部必然迅速瓦解，若干动摇干部，将率队集体逃回敌方去，这样不但武器无法保存，连陈等起义干部也无法保全，我更无法把陈部这次因派系矛盾而发生的兵变，转为反蒋拥我的起义，这样将使这次兵变的影响迅速消失，将使其他蒋军部队望而却步，不敢步其后尘，将造成我们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败。因此我们决定采取大胆领导、争取部队的方针。

(2) 陈部来南路整整两年，前一个时期在化、吴，由于我领导错误，给他不少“空子”，使他得在化、吴积极行动。但后一个时期在遂廉，由于我领导正确，没有“空子”可钻，且一再受我惨重打击，该部行动甚为消极，最近几个月，因为他与张君嵩有矛盾，则几乎完全“怠战”。去年八月二十一日分局来电说：“张君嵩任十区绥司，想搞一独立力量，故如其不积极向我进攻，我策略上也可缓和向他进攻。”又说：张将“筹养自给，不理上峰命令，自认为对的即一

意孤行之”。但对我们的斗争经验证明，适与此情报相反。张君嵩来南路后，其气焰声势之嚣张，作法之毒辣阴险，以及给与我们之破坏损失之惨重，在南路的敌人中，是史无前例的。他是军统主要人物及戴笠亲信干部之一，其行动是最积极的。而陈一林则因与他有矛盾，行动消极，几次执行命令都是敷衍了事，这次打死张，在陈则是为了私仇，在我则去了一个最凶恶的敌人。后期陈部之消极怠战，一方面是我们军事上更强大，战术更高明了；另一方面是陈一林与张君嵩有矛盾，不肯为他卖命；再一方面也多少说明了在国内大势影响下，陈部思想上开始发生变化（陈本人这样表示过），我们和他们见面后，我党、我军及我区民众给他们的影响，也大大教育了他们，不少干部、士兵一再表示他们对我党我军的敬佩。这使我们深深感到，这些干部、士兵乃至陈一林本人，都可以在实际斗争中加以改造的。我们认为即使他们起义初期有保全实力的企图，但由于全国形势的影响，由于我军力量的日益增强，由于斗争的教育与改造，将迫使他们走上其原来企图不同的道路——我们的道路。因此我们决定了大胆领导、争取陈部的方针。

(3) 陈部起义事先无政治基础与思想准备，在目前南路游击战争的状态下，他们捱不了苦，走不惯夜路，没打惯游击战争，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是十分可能溃散的。因此当陈部决定去十万大山时，我们不但派了十余干部去协助陈部，而且派了新三团去护送，以便沿途接收武装（准备沿途接收武装是陈与我们商量决定的），准备当陈部万一溃散时能退而求其次，保存主要武器及干部。

不论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展开我之斗争；不论为了教育改造陈部官兵，使其能为我用；不论为了取得武器，保存其基本干部，我们都要大胆领导陈部。因此当派了杨应彬（刚从十万大山回来，与陈有八年同事关系，代表军委）、何文（原第二支政治副主任，后调升八支政委）、胡陈（高雷地委之一）等十余同志前往掌握该部，虽然因该部内部不稳，相率逃亡，失去一批武器。但由于我们取得陈的信任，终于达成接收其大部份武器，保存其基本干部的目的。这个处理经过，不但我全体干部认为圆满，即使陈及其干部也认为极适当。

(二) 关于番号问题。我们未先呈准分局再行授与，这确是我们手续上不对的地方，但在我们主观上，则实在一丝一毫也没有存在忽视上级的无纪律的思想意识。我们当时只一心一意想着如何与我党扩大更多的影响，如何为我军争取更多的武器，当时情况是那么紧急，我们之间的连络又那样的迟缓，若待复电到达，势必失去时机（陈部于十二月十九日起义，二十八日疏散，在我们积极帮助下，前后仅支持十日，而我们第一个电报十二月二十一日发出，直至一月二十一日才收到分局的第一个电复，前后竟一个月），而陈部则干部动摇，思想混乱，险象环生，迫不及待。陈一再要求我们领导，给与番号，以安定队伍情绪，指出光明前途，若不作此紧急情况下的权宜处置，则掌握陈部势将不可能，这一点要请分局体谅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部队没有力量来缴他们的枪（而且也不应当），这样做在政治上对我们极不利，这些枪势必会一批批被古冷云之流拖回敌人方面去。若想“以群众面目向他们买”则不但没有钱，即使有钱又能买多少？

至于我们给他的番号，只是“建议”性质，在电报中因只说“拟授以支队番号”，并说“以上各项请速指示”。即对陈一林，我们也说明“要待分局最后批准”。目前虽然仍保持八支番号，但其主要干部都分派往各部队协助军事教育工作，该部官兵共有七十三人（73人），分散到三团、四团及遂溪区队任军事教官及连付、排付、士兵的约有五十余人，新闻电台工作的有七人，医官一人，协助一般情报汇集的（不是特种情报，只是敌军一般状况的汇集、综合、判断工作）三人，跟陈一林夫妇的不足十人。从分散工作中，一方面使用其技术，一方面则教育改造他们。八支番号，因未得批准也从未对外使用。

(三) 关于请求斗争上配合于经济上支援问题。我们这次处理保十起，虽有缺点，但尚不致幼稚到失去立场。那个电报中所提关于经济上援助及斗争上配合当然不是专为了救陈一林，主要是为了南路这个地区。半年来南路连接发生两次攻入湛江及保十起义等大事件，吸引了大量敌军南来，援助了各地斗争。我们估计到保十起义后敌大军必定前来镇压，这样对保十固然不利，对我们也未见有益，因而要求各地予以协助，这是很正当合理而不过份的要求。至于高雷部队则自

始至终以我为主利用保十起义，猛烈发展开辟了海、徐大部分地区，现仍在扩展中，拔除了遂、廉大部份敌据点，恢复了化、吴一部份工作，攻占了湛江市第三大城的太平市和雷州半岛重要海港乌石港。一个半月来据不完全的统计：缴获轻机六挺，手提机一挺，长短枪百余支，子弹二万六千发，毁敌碉楼四十座。毙伤俘敌区长、营长、盐场分署长以下五百八十余名，超过过去九个月消灭敌人数目的总和，现仍在猛烈发展中，一五三师及保十一团六十余人南来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损失。

经济上，去年春，高雷部除东征、西征全部经费及以后陆续付出的接济物资及款项是靠卖去年下半年的粮食来支付的，去年下半年的军粮则透支今年的。陈部起义时，我们费尽心思只筹得二千元金元券，以后他们的伙食生活费及疏[散]费、大部分官兵与眷属的必要路费也全靠卖谷来维持（这种支付也是必需的，符合我们对敌俘及起义官兵“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并发给路费”的原则的）。现在我们不但没有钱，而且没有粮，而高、雷、廉全部党政军工作人员数在四千以上，我们请求经济上的支援怎么会专为陈一林呢？分局批评我们失立场，我们真是百思而不解。

总之，这次对陈一林部的大胆领导是正确的，我们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威望与地位，打开了广大地区，摧毁了敌方反动力量，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与兵变转变为反蒋拥我的起义，为华南敌军开辟一条正确道路，争取了大量轻重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估计时价在港币五十万元以上），而我们付出之借价不过港币壹万元。我和各主要干部根据分局的指示仔细检讨这些事件，一致认为我们为党、为人民、为革命做了一件有益无害的事业，再三思虑都想不出“无组织、失立场”的地方。我想觉得分局十二月二十九日指示中所说的“具体作法不够大胆，不适合目前形势的”。如果我们以这种畏首畏尾的消极观望的态度来处理，则不但全部武器将原封不动的逃回敌人手中，我们现在还不能象现在这样有力利用这一形势开展斗争。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领导，我们竟不敢大胆领导，在政治上将招致严重的失败。“大胆领导我党武装”是分局去年二月指示

中提出的口号，但是十二月二十九日电报的精神，我们看不出在那一点上是大胆的。因此我们请求分局根据我们处理陈团的成功经验重新考虑对我们“无纪律无立场”的批评，并对今后争取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处理方针给以更明确的指示。否则不论在精神上、方针上都会令此间干部感到不知所措。

另外关于张发奎、邓龙光在南路的活动，据我们调查所得及询问陈一林的结果是这样：张的关系事实上就是邓的关系，邓在高州全境及雷州某些县份有潜势力，这些人是县长、区长及目前地方反动武装的掌握者，但没有统一的组织与行动，他们也许想搞独立局面，但赶不上形势的发展。而陈一林在目前形势下再要投靠他们是无甚可能的，他对时局的看法并不糊涂，与其说他想搞独立武装将来去投靠张、邓，不如说他想搞点成绩，立点功劳将来在新军队中有一定地位。

(四) 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1. 陈部起义于今一个半月，武器给了我们，人员给我们调遣，也在口头上及文字上表明了今后要在我党领导下奋斗到底，行动上也表现了他们确想做一点事。但上级对此事还未有表示，对其番号问题也未有答复。我们原想把三、四、八团集结起来成为边区主力支队，选择陈部一些干部分配下去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现在分局批评我们无立场，我们不晓得究竟如何做好？分局对八支番号能批准否？如不批准也不能给陈做司令，则他今后的工作如何安置，请明确示知。最近他因迟迟不见分局批示，又无工做，内心十分苦闷与疑虑。我们除以“联络困难”安慰他外，仍请迅速确定他的工作。

关于他和他的干部处理办法，我们想到下列两种：

第一，如分局批准八支番号，任陈为司令，我拟派沈汉英为副司令，何文为政委，叶寿深（大叔，安南被捕，最近由港回来）为政治处主任，统是自己同志。部队则由三、四、八团各抽主力出来编组，团以下各级干部全是同志，陈之军事干部不多，除其中最得力的两个（打死张君嵩是他们布置的以后由博白折回廉江，疏散部队时缴枪工作也是他们执行，当时他们是第一、第二营营长，未携枪集体逃亡的就是这两个营）派任副团长外，其余分别任司令部参谋、副官及连付、

排付。

第二，如分局不能批准八支番号，则由三、四、八团抽出大部编为**主力支队**，我自兼司令及政委，陈一林任副司令，何文任副政委，叶寿深任**政治处主任**，其余干部照**第一项办法**安置。

两个办法经各干部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第一个较好。如照第二个办法，我将花全部时间、精力于主力支队，是不妥当的，不论第一个第二个办法，我们都能确实掌握队伍，不会有任何意外，而大胆使用陈一林有三个好处：①现在南路我们还找不出更适合的军事人材，我们急需这批干部；②陈有不少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他去瓦解与争取。③可以进一步争取与教育陈等，使成为自己人。不晓得分局同意这个意见否？

2. 陈本人数度要求入党，应如何处置？

3. 他的致敬电已发出，为扩大我党影响是否可予嘉奖？

4. 如八支番号能批准，则沈汉英、何文、叶寿深等调升职是否批准？

5. 今后我各级党关于处理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权限如何确定？什么级以上的起义部队一定要分局批准方能处理？象保十这样事先与我无联络，事后要求我领导的突发事件，在情况紧急时可否赋予我们以紧急措施权，请指示。

6. 湛江完全在我遂溪乡村包围中，一旦形势急转直下时，湛江可能为我迅速占领。但此间全无城市干部，无论如何请派一些城市干部来。

7. 此间经济情况确实困难万分，拨发的款请速汇来。

(五) 去年四月至今年的一月不完全的高雷队伍三、四、八团战绩统计：

1. [民] 三十七年四月至十二月十二日九个月战绩（保十起义前）：

战斗次数27次，毙伤俘敌特务头子张辅森及中队长以下555名，缴获轻机23挺，六0炮1门，步枪618支，手枪23支，子弹23490发，手榴弹49个，枪榴筒14支，掷弹筒8个，各式炮弹137发，刺刀80把，

军毡80床，西药1担，港币22000元，蒋钞3亿，毁敌堡垒26座，解放过湛江、杨柑、洋菁、志满、纪家、南圩等市镇。

2. [民]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民]三十八年元月三十一日，四十日战绩（保十起义后）：

战斗27次，毙伤俘敌营长、正副区长、盐场分署主任、联防主任以下586名，缴获轻机6挺，手提机1挺，步枪487支，手枪31支，子弹26170发，手榴弹80颗，谷1683担（大部分发群众），胶鞋174双，电话机4部，无线电器材6担，毁敌碉堡41座。解放湛江属之太平市、遂溪县城及所属之洋菁、河头，海康属之乌石港，徐闻属之曲界、仙安、锦囊、前山、下洋、胜利等十余重要市镇。并一度攻入安铺北坡、杨柑等市镇，另争取遂溪义和乡杨起德部反蒋起义，并于起义中缴获遂溪县自卫中队之枪支，计轻机一挺，长短枪三十余支。

又：①保十起义前战绩统计：缴获轻机23挺，应改为21挺，手榴弹49颗应改为220颗。另增加手提机一挺，胶鞋126双。

②全部战绩统计，请代作相加手续。

③全部缴获都是在战斗中，从敌人手中缴来的，没有一枪一弹收缴自民间。

④所需干部除一般工作干部外，特请注意动员卫生、会计、电文报教[校]等人材，因工作日益展开，人手太少，予工作影响太大，请即动员陈俊材、彭忠英、彭迁云、叶椿、李栽庚、黄克、欧华清诸同志回来，另外是张△△。

⑤请在募捐款项下拨二千元港币为路费。

梁广

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
(同年2月23日收到)

请为处理或转二叔：

1. 关于交通问题，黄以后可以做交通，有物资不可交他带，以

免因经济而引起政治上注视。运物资另由人员责好了，此人已找到，迟些告你。梅云线已通，有人不便从湛来时，可从此道。

2. 保十家眷每月要汇款接济，一人是医生，一是电报员，我们须用他，不得不照顾，地址列后（原件无地址——编者）

3. 交通员的旅费希由你处支出。同时将汇款地址给你，最好托人带来，以免亏去汇款。

4. 程还未会〔回〕，不知有变化否，希复。

5. 叶可回来，因他与保十人员很熟识。

6. 曾派吴应深回港作口头报告，主要是赶快汇款来。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

关于连续作战及攻坚战斗的一些经验

(1949年初)

今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下旬，南路我军第一支队新三团，曾于四十天内连续作战二十余次，打下廉江县属那贺、沙铲、长山、青平、车板、龙湾、石头、横山、三合等九个乡公所，及射大，青山脚、大岭、多杰仔等十余个联保，另于运动中与敌一五三师四五八团第三营遭遇，消灭他一个连。同一时期，第二支队新四团作战十余次，打下良、太平、山底、禾寮等四个乡公所，及矮仔涌、方贝、荔枝山等十余据点，并击溃保安独三营、化县自卫队等联合之敌七百人，三、四两团共毙伤敌一百五十余名，俘敌四百余人，摧毁坚固城堡四十座，缴轻机六挺，长短枪一千四百余支，子弹三万发。我仅牺牲十名，伤二十余名。兹特将关于连续作战与攻坚战斗的一些经验写出，以供各地参考。

甲、连续作战的指导

(一) 当时廉江的敌情和我军状况

保十起义后，敌一五三师和保十一团调来南路，他们纠合了保二和独三营共七千人左右的兵力，重点扫荡廉江。我主力三个团则避开敌重点所在，转出外线，分别在海、徐及化、吴各地猛烈发展，并打下太平市、乌石港、曲界、河头等重镇，敌见重点扫荡无效，乃转而分兵驻防，在海、徐、遂溪、湛江公路及廉江等地各驻一个团，此时驻廉江的有一五三师二个营（后增为一个团）和伪县警二个大队，连同各乡自卫队，总兵力在二千人以上。

廉江全境我之活动虽普遍，但敌乡公所及保队据点林立，我区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中。各乡公所及保队凭籍坚固城堡据守，我军攻坚

能力尚差，很少拔除过坚固据点。

(二) 三、四团的任务：

边区为创造粤桂边的根据地，乃授三、四团以这样的任务：拔除廉江各地敌据点，打通与陆川、博白、合浦、化县的联系，实行割据山区，并相机打击运动中之敌省国防军。

(三) 作战指导腹案：

两个团受命后，因一在廉西，一在遂溪、廉化边境，故在初期缺乏明确的计划性，而赋与各团以机动灵活独立作战的活动范围，但指定三团先在廉西及廉北，四团先在廉东南及廉化边境猛烈扫荡，互相配合，使廉城之敌无法兼顾，然后再集结两团兵力，向廉东北及化北进军。至战术运用上，根据敌我条件决定为：

1. 主要攻击目标是各地乡保政权及乡保队，但不放弃在有利条件下打敌省国防军，俟各地乡保政权摧毁后，则集中力量打敌省国防军（此时敌已无耳目、无粮食，便于我消灭他）。

2. 在作战顺序上，先从容易吃的着手，取得经验，并提高部队情绪，不要一开始就啃硬骨头。

3. 将全县反动据点编成几个“作战单元”，每个单元包括三、四个大小据点，解决每个单元最多使用三四天的时间，除为了想达成围城打援的目的外，应避免同时攻据点又要应敌援军的两面作战状态。

4. 地方工作人员随时彻底了解各据点内的敌情，并绘成要图，以便主力随时机动攻击。主力部队则以飘忽的行动，快跑猛打，纵横扫荡，使敌野战部队追不上我，地方反动武装又无法进行防御准备。

（以上作战指导腹案是作战开始，打下了一二据点后才正式确定，但仍未作出书面的详细的计划）

(四) 作战经过（参阅要图）

三团于二月十三日开始打那贺乡公所，稍一接触，敌即投降，全俘守敌。十五日打下沙铲乡公所及尖岭保队。十六日和平解决大岭，俘廉江反动头子雷寿益，并缴青山脚等三个联保队的武装。至此廉西搞得赤火朝天，红极一时，敌一五三师一个营约×百人（此时三团亦仅得四百人）由廉城西犯，三团即转而向东，准备打武陵乡公所。

待至石岭附近时，西进之敌又回石岭，我乃转而向西北，于两天内打下射大联保，活捉伪长山乡长林华山等五十余人，并以北平式解决长山乡公所及文林、鲫鱼塘、那凌三个联保，使廉西及廉北广大地区完全解放。继即东进准备打武陵，适敌一五三师一个营，由廉江来援，与我激战至黑，因地形于我不利，乃放弃武陵，转而南下打龙湾乡公所。解决后，复乘胜西进，打下多杰仔（伪青平乡长的家），和平解决青平乡公所、大路湾联保及那刀保队，又转向东，打武陵。在路上与敌一五三师一个营遭遇，因敌占地形不利，被我压迫于新坡屋村附近，激战二小时，打死敌人十六名（内连长一名），伤四十余名，俘九名，因敌我兵力相埒，无法将其全歼，只缴得步枪七支，子弹4000发，行李辎重二十余担。我仅轻伤一名，残敌漏夜溃逃五十里回廉江而去。翌日二打武陵，因准备未周，迟延了一日，第三日敌一个营又来解围，我再度放弃对武陵的攻击。续向东去，执行与四团联合搞开廉东北与化北的计划。

四团与三团会师前在廉东南猛烈活动，以白日强攻的作战，打下良、矮仔涌等据点，并与一五三师一个营作战，击溃该敌（详细作战经过记不甚清楚，因此时笔者随三团）。

三四团会合后，于三月八日由四团负责打下太平店，当晚敌一五三师一个营前来夜袭四团，我毫无损耗。翌日两团续向廉东北进军，分别打下廉江的良峰联保，反动头子王天元的家，山腰联保及化县属的山底乡公所，击溃敌保安独三营及化县自卫队七百余人。复折向西，于两日间进驻三合、禾寮两乡镇及何村、竹寨、新村三个联保。至五月下旬打下车板及山菜。四十日连续作战至此告一段落。

横山乡公所是区队打的。

（五）检讨：

这一连续作战行动有什么收获？

1. 消灭了大量敌人，拔除了大批反动据点，解放了广大土地，莫立了根据地的初步基础。

2. 振奋了民心，提高了士气，动摇了敌人，整个扭转了敌攻我守的形势，我已掌握作战的主动权。

3. 大大提高了部队作战信心与攻坚能力，取得了组织战役及攻坚战斗的初步经验。

为什么会有这些收获？

1. 一开始就策定积极进攻的正确方针和连续作战的指导腹案，保有旺盛的攻击精神和战斗意志，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连续作战”的指示。

2. 执行连续作战计划腹案时，灵活机动，随敌我形势而灵活选择攻击目标，不为计划所拘束。

3. 各部队一般的都执行了边区军委的指示“作战方针上反对保守主义，战斗布置上反对冒险主义”。因此在每一次据点攻击时即使时间匆迫，都能从事相当周密的准备工作，减少伤亡。

4. 坚持先打击地方反动武装的方针，使敌我总兵力优劣悬殊的情形下能够不陷于两面作战状态，集中力量消灭反动武装。

5. 部队行动机动（大踏步前进，大踏步转移），结合了从摸索中创造出来的一套攻坚办法，使我军战斗力大大提高，保证了无坚不摧、无攻不克（除武陵因二次增援，我主动放弃之外）。

但是，在这一行动中我们还是犯了许多错误和存在着许多弱点：

1. 缺乏高度的计划性，没有在一开始就把他当作一个完整的战役作战来处理，整个行动，最初只有笼统的“概念”，以后也只是一个“腹案”，最多也只是一个不成文的初步计划，这显然还表示着我们的作战还停留在低级的游击战争的无计划状态中。

2. 在三、四团分别拔除地方反动据点时，集中力量打乡保队是对的，但在两个团会合后没有计划的找敌省国防军来打，在由大岭东进及由车板东进时，放过了歼敌机会，这是不对的，保守的。

3. 廉江敌据点虽已扫荡得差不多，但化北及陆川、博白南部的还没有扫除。进到化北山底乡后因敌七百余入前来阻击，我便折回廉化，以及到廉化后有可能搞博南的沙陂乡等地而不去搞，这些都是保守的表现。

4. 战斗技术是提高了，但很快便陷于经验主义的泥沼，三团只会夜间攻击，四团则只会日间攻击，双方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精

神是很不够的，而领导上当时也没有很迅速及时的号召两团互相学习。

5. 两个团联合行动后只由一个同志代表军委去指挥，缺乏一个指挥机构，因此不能发挥有组织的集体领导的力量，更没有参谋工作，这是我们的游击队向上提高向前发展的大障碍。

乙、攻坚战斗经验总结

(一) 敌据点的一般构造：

廉江一般反动据点都是一些当铺式的城堡，这些城堡大多数建在村边或村中，其构造概如下图（图形略。略中内容为：城堡宽约十余丈，四周走马楼式的围城可以行人，外沿有单砖或双砖可挡攻者枪弹。围墙外再设一障碍物。城堡四角有四个炮楼，每个有三层至四层，高约三丈。四面有枪眼，能互相侧射。城堡屋内常有水井。——编者）

(二) 侦察要领：

对一个据点的侦察，大概分两个时期，一是地工人员的侦察，一是攻击部队本身的侦察。前者虽往往不是军事干部无法彻底了解，但已可决定能攻与不能攻；后者则攻击部队包围了据点后所实行的战场侦察，这个侦察的作用在于决定细部攻击技术。要侦察的项目最好是能全部了解据点内部及外部情形，但由于敌人严密封锁，往往不可能清楚地了解内部情形。据这次经验所得，要侦察的主要的不是城堡内部情形，而是外部情形，因为这些敌人并不是军事专家，并没有把城堡要塞化，防御设施是在四个炮楼和四面围墙上，内部房屋是没有预先做好的射击设备的，我们只要能了解外部情形就可进行攻击，不必要等内部每间房门如何开？窗如何设都了解才攻击。要了解的事情是：

1. 城堡筑在村中？村边？还是村外？在低洼地抑或在高地上？有无可利用的死角（子弹打不到的）或遮蔽角（视线看不到的）？我攻击部队能否利用这些安全进入攻击发起位置？附近有无小高地可瞰制城堡。

2. 城堡有多高多宽？有无水井、粮仓？四角碉楼多高？几层？多少枪眼？互相侧射程度如何？碉楼的屋顶是洋灰的平顶还是瓦面的尖顶？屋檐是竹条的还是木条的？

3. 城堡外有没有外壕？壕内有没有水？有没有木栅、竹钉、狐狸炮？有无可给我们利用的轻机枪射击位置？

4. 突击组开始突击前的攻击发起位置应选择何处？

(三) 组织突击组：

1. 号召“请缨立功”，再从“志愿军”中选择适合的突击组员，分别编组。

2. 各组分别进行秘密侦察。

3. 召开“诸葛亮会议”，研究各组侦察结果及各组的攻击腹案，确定攻击方法，规定第一组第二组及轻机组的精密的合同动作，必要时先行演习。

4. 准备突击工具：

云梯（不能太短或太长，如果碉楼是平顶的，为防止顽强敌人在楼顶推开我军梯子，宁可短而不可过长伸出碉楼之上，致授敌以隙）。

绳子（防敌锯断桁梁或楼棚太高跳不下及突击成功绑反动首要时用）。

刺刀或斧（突击至楼顶时斩开屋椽时用，如平顶楼则不必要）。

火球（以烂布条扎成，浸火油，夜间突击时用）。

土工器具（准备挖墙时用）。

(四) 组织接收组：

为保证攻入据点后能有秩序地完整接收，应组织接收组，其组织及任务如下：

1. 军事组：以参谋人员及突击组组成，负责对据点内的武器收缴及俘虏处置。

2. 政治组：以政治人员组成，负责对各种文件的处理及对俘虏的教育工作。

3. 物资组：以军需人员及地方工作人员组成，负责处理全部物资及乡仓谷的搬运掩藏。

(五) 突击作战要领：

1. 要集中火力制压一点，使突击组能确实占领一个炮楼，只要能占领一个楼，敌人互相侧防的火力连锁就断了，就能继续占领其他

各楼，如右图。

2. 突击组登楼后应迅速跃下楼底，冲入屋内与敌肉搏，除非顽敌据其他炮楼继续抵抗，这样往往不必要攻其他炮楼就能解决战斗。

3. 突击组占楼顶后，原在地下掩护的轻机应迅速用绳索吊上楼顶对其他炮楼实施制压，或打其瓦面威胁守敌。

4. 顽强的敌人每趁我突击组未全部突入，先头突击组立脚未稳时实行反扑，故先头突击组应果敢消灭其他敌人，迅速解决战斗，不可缩在碉楼内形成僵持状态。

5. 攻占敌人一个炮楼后敌人已普遍动摇，突击手应并用火线喊话，从政治上瓦解敌人。

(六) 敌投降后的工作：

1. 迅速将俘虏押出城堡之外（进行教育工作），使各接收组得从容进行细密的核收工作，部队应即加强外围警戒。

2. 迅速处理物资，发动群众担谷（通常以我七群三分谷，使群众得到了利益我又能掩藏了物资）

3. 如估计我不能控制该据点，而敌有重新建立的可能，应发动群众拆炮楼（或炸毁），以期彻底摧毁，但城堡内其他房屋（尤其是祠堂、学校）不应拆毁。

4. 召开群众大会，处理俘虏。

5. 总结经验。

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

——应着重做好敌军下层工作*

(1949年初) ①

(一) 自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引退”，北平和平解决后，各地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地方反动土顽纷纷动摇，有些在我政治攻势与军事威胁下向我拉关系，有些则自动来找我搭线，或表示准备起义响应，或表示愿掩护我活动，或答应接济我情报弹药，不一而足。凡此种种，不管其出于诚意和虚伪的，都显示了敌人阵营的纷乱。这种情形，目前仍在各地继续发生，造成推广亲我之活动，扩大人民武装，组织群众，发展我区革命游击战争，瓦解敌军的有利条件。月来我各地党部已对这种变化的形势引起注意，加以利用，有了部分收获。目前仍须总结此一期间的经验，加强敌军工作。

(二) 但必须正确认识敌人只是动摇而不是转变，仅是投机，而不是革命，从阶级本身利益看，尤其是各地的土顽地主武装，他们和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目前态度的改换，并不是由于他们本身与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的内在矛盾，而仅仅是由于国民党在全国的大势已去，因此，他们只好或仍在国民党统治集团整个反动阴谋的指使下，另耍花枪，或自作主张，寻求活路。因此，我们对于这些搭线人物，切不可被他们麻痹，自生幻想。有些地方反动地主，月来一面和我们搭线谈判，说了许多甜言密语，而另一方面则更积极组团筑堡，阻我活动；有些反动地主利用谈判，麻痹了我们当地的同志，因而顺利组织了或加强了其反动武装，便向我开起火来了。

① 原件未署作者。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这样的事，在各地区已发现了数起。这是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今天的以和备战、以战求和阴谋一致的。有些地方反动地主，在今天仍然迷信他们“中央政府”的和平攻势，可以达到分疆而治的目的。因此他们认为只要现在能抵抗住我们这些土共，使他们的小天下不即“沦陷”，则将来他还是照旧做土皇帝的。

(三) 要把敌人上层与下层，一般职业军人与和地方反动地主有密切关系的反动武装区别清楚。敌人下层是较容易争取参加革命，而其上层则是很难改造的；一般职业军人是较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而反动地主则一般都是不能接受革命思想的。因此，对于敌军工作，不应只停留于拉拢上层与应酬反动地主这种工作上面，应该积极想法使我们的政策、主张为敌军下层与一般职业军人了解，并和这些分子建立各种直接、间接关系。在某些敌上层人物及反动地主已对我采取两面态度的时候，我们应猛力进一步去展开对敌下层与敌控制乡村的一般群众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使之倾向我们。只有敌军下层及其控制乡村的一般群众倾向我们，才能有把握控制敌人的变化。目前有些地区，已做到我武组公开进出敌据点，有许多机会去接近敌下层官兵及一般群众，但许多同志仍然忽略积极进行对敌士兵及一般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应及时提出注意。

(四) 由于全国形势的发展与我区人民力量的日益壮大，争取敌军起义，目前条件更为具备了。进行敌军工作，应积极运用一切有利条件组织敌军起义，但不是一切和我搭上线的敌军都可以起义的，尤其是敌军的上层人物，在目前敌以和备战的阴谋中，是不肯立即脱离国民党而公开投向革命的，甚至有些在思想上真正同情革命分子，在我大军尚未渡江，我区人民武装斗争仍仅是（原件缺字——编者）

梁广致统战部并转香港分局电

——请示处理保十团问题

(1949年2月18日)

统战部：

请转港分局

- 一、分局公布的华南行动纲领，可否设法送一份给我们。
- 二、粤桂边军委会名义在必要时可否公开使用。
- 三、关于处理保十团问题详细报告，我们已派程同志送上，对其番号及干部问题如何处理，请速示。

保十团起义两月余，因未得分局批示，故未敢公布其番号，亦无给其干部岗位职权。因未见上级对其有何表示，其上下级干部均感我党不信任他们，无从发挥其所长，无机会给他们立功、甚表彷徨、苦闷、不安，而有心回家谋生计，前两天已自动走了两个中级干部，我们亦感难应付。

四、我们对保十团起义后处理的过程，高雷、粤桂边两地委的检讨，均认为是正确的，做得好，连保十团的上下级干部亦认为我们处理适当合理，方方同志亥艳的指示精神，我们请求根据最近送给分局的报告，再作详尽检讨。

梁广

丑巧 (2月18日)

梁广致中央、中央统战部并转香港分局电

——俘长山等三个伪乡长，拟释放扩大影响

(1949年2月24日)

中央、中央统战部并转港分局：

我攻下廉西北数伪乡公所，俘沙铲、那贺（贡）、长山三伪乡长，彼等是地方反动头子，尤其沙铲乡长雷世益是头等反动地主恶霸，数年来对我进攻，烧杀淫掠，极为凶残，人民痛恨入骨，普遍要求惩办。但考虑象雷等这样的反动头子，在周围各县尚有很多，彼等多据守坚固土地，且碉堡多，难攻。若杀雷等会激起彼等更坚决，反死守据点，增我攻坚困难，若长期扣押留后判处又为环境不许。是否释放雷等用以分化、动摇其他反动头子，利于我政治瓦解。且过去南路因过左政策乱杀人，曾搞反一些人，引起各界反感，释放雷等，使人宽大政策在社会上愈可有力证明，可使搞反的人动摇，可使各界改变对我观感。虽然释放雷等亦会引起群众不满，但可向群众解释，使他们明了我政策。请即示复。

梁广

丑敬（2月24日）

（港分局已复电，如能说服群众，可以不杀）

梁广致中央并转香港分局电

——关于陈一林近况*

(1949年2月28日)

中央并转港分局：

陈一林率保十团起义已二月余，我们对其处理过程及其表现等均已详细报告。因分局未有明确批示，我未取公布其番号及决定其全体工作职权。时间过久，故陈及其部属颇感苦闷、不安，并对我怀疑、不满。我虽常对其解释亦无效，现我甚难应付，如此下去，恐生意外事端，影响甚大，请速作具体决策示复。可否请先给其一电，安慰稳定其情绪，这一批干部我们是很需要的。我们初期对保十团处理过程，此间干部检讨一致认为正确的，做得很好。现将其最近给粤桂边地委同志的信及方方同志去年亥艳指示电发给你们参考：

“（上略）近来精神恍惚，心情缭乱万分，每念年老双亲不知下落，小女只身飘零，家财尽叶，骨肉分离时，便会联想到目前可怕处境等问题，有关系之亲属也相继地逃走了，他们说我太相信你们，过于忠实你们，说你们对我是无诚意的，我解释也无用，但是工作前途真痛不欲生矣！同志：将如何救我？唯我保十起义，请你们调查认识清楚，如不彻底认识与了解的话，那张君高、邓伯涵之死，警卫营之覆没，保十之武装以及南路暨省港各方震动和给宋子文的打击，对革命也毫无意义。如你们愿意八支队就如此下去，如你们认为南路革命如此就可以成功了，如认为一林乃庸愚。对革命工作不会有贡献的话，那我也愿意就此遗臭万年，不再作名留千古之艰苦斗争工作了。不然我们不遵照方方同志的指示全力迈进，同志：此又将何以救我呢？精神总是闷着下去呢？（下略）”

陈一林夫妇签字

丑梗（2月23日）

方方亥艳电如下：

“陈一林问题据我们所知，全系邓龙光、张发奎×自救的阴谋，你们不在混乱中力求发展自己，而妄想收编给钱，尤其是不得我们同意，随便给以支队司令名义，显系一种无纪律、失立场的错误。现应立即乘此时机发展自己，对陈部只能适当使用。款项可以帮助你们一万元，但不能帮助陈，只能作为你们斗争费及必要的支出。如果陈不满时，应个别争取中下层，甚至以群众面目收买其武器。此地没有干部可派别地，仗是要打的，但不是专为陈而打。请中央嘉勉更属不必。详情俟温回去传达。”

梁广

丑俭（2月28日）

梁广致中央电

——陈一林略历及各方关系

(1949年3月7日)

中央：

粤桂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梁钧鉴：

一林谨将主要略历及与各方关系真象摘要报告如次：

甲、念五年陈济棠下野，我由第七师编整入广州分校学员参谋队，念七年毕业，派入六五军充参谋（李振球充军长），念八年缪培南接军长，被调入四战区长官部情报课充参谋，办理单纯军事情报业务，专一对付日寇。而皖南之事件各有关案件，以及当时在长官部工作之中共人员左洪涛等，本课从未过问与干究（由政治部办理）。〔民〕三十年接情报课长，至〔民〕三十年因觉个人心术不适，暂辞工作，请准投入陆大参十一期，读至抗战胜利后，〔民〕三十四年冬卒業，返抵穗。当时行营情报科长无人，欲一林转回负责，终因不感兴趣坚辞。在外住二月余，未负任何实职。至〔民〕三十五年春调充监护团上校副团长。同年夏监护团结束，复在穗住三月余，入秋转回行营总务处充课长。是年冬调充保十团长。对穗三人小组处理东江纵队事务，一林绝未过问，即数年来在部内中共人员，呈上级有命令防制，就情报科员一林负责期间，亦从无干预，此左洪涛、扬应彬、何家槐诸同志极为明了。在内战期间，一林已未负担情报任务员。

乙、一林与张发奎之关系：由军校派至一二〇军转调入战区长官部，在参谋处工作期间，由工作上得到参谋处长之认识而获得进步，实非有任何特殊关系，此点左洪涛同志当极明了。至与邓龙光、黄铭珮则属毫无关系，而此有事实可以证明，谅左、杨同志亦清楚。

至此次一林率保十全团起义，实系年来深入农村，视睹广大群众之痛苦，究何以使之，孰令致之，及对建立富强康乐新中国与改良全国人民生活，对大时代之认识彻底与坚决负起责任，谅国民党有为的青年将校中，如一林同样有认识者定大有人在。保十此次起义，事前除曾谋与中共联络外（黄健夫同志可证明），对国民党任何人士绝未与发生关系，由事件突起，各方全无所知，而事起后，各方尚未敢即予致信之事实，可为证明。以上乃确实的陈述。除另电详细报告外，乞赐亮察为盼。

职陈一林亲叩丑支”

关于陈一林过去情形，杨应彬（现在我处负责参谋工作）可证明者有以下四点：

1. 任情报课长期间内，确专办对敌军事情报，未办政治情报。
2. 战区情报课仅在一项业务上与军令部第二厅有关，至陈本人则与军统无关。
3. 广州行营阻挠东纵北撤的工作与其无关系。
4. 他的报告内所述，在张发奎部任职经过及与张、邓无特别关系各节，据我所知是实在的。

梁广

寅虞（3月7日）

梁广致中央并转香港分局电

——南路情况

(1949年3月15日)

中央并请转港分局：

甲、现在目前高雷我区情况：

一、过去我南路整个基础极端的混乱离心现象，我亦为此去过港，但在我全国军事胜利大势所趋影响下，由于分局正确领导及我们工作干部努力，此种现象，目前可说初步已告一段落，但不能说已完全克服，因仍有个别地区，个别干部未能及时克服。基础是好的，纯洁的，可以克服过来的（于去年戌破获我二支内奸，获便衣队长陈进），八年的老党员亦是奸细，亥发现三团参谋及一交通站站长是奸细，连同在外与其联络负责人均是助我买弹药的人。以上四人经审查自认，我无用迫供，只用政治说服感动他们，后已枪毙。

二、至目前为止，在廉、遂、海、徐及化、吴边境，我军主动的积极活动，歼灭敌人（土蒋及保警团队等）在二千人以上。缴获长短枪一千八百支，机枪三十七至四十挺，子弹约九万发，六零炮一门，掷弹筒、枪榴筒共三十门，摧毁伪乡镇政权三十余所，共摧毁堡垒近百座，生俘敌一千一二百人，毙伤敌伍百人以上。争取敌军起义者，保安第十团八百余人，一个乡（义和乡）乡政及散兵六十余（步枪百支，机枪两挺）起义。军区现武器能使用的：轻机七十余挺，重机八挺，冲锋机约十八挺，其他迫击炮二门，六零炮三门，掷弹筒、枪榴筒共约五十门，步枪好的、次的，现在使用的和埋藏下的，共约五千支以上。现在主力部队三、四、八三个团共一千四百人全是好装备，

战斗力强，歼敌一个营（即三百人）是有把握的（这三个团准备编为第八支队，由陈一林为司令）。

廉、遂、海预备建立三个新的团及各区队，现已有一千六百人，各部队及各地武装正在积极扩展或新建中。合浦、灵山方面在军事上近两月来亦已开始转变积极活动，出击敌人均有获胜。如保二团副团长陈浩之被我袭击重伤，该地区我原有第二十四团，现存一百六十人及十八团现存一百四十余人（该团近转屯江休整），全团共有机枪约二十挺。

乙、目前我活动地区：

一、在前年（〔民〕三十六年）搞垮了和搞反了的地区（包括化州、吴川、合浦、灵山等县）目前基本上恢复了工作。我工作人员除少数敌据点外已可立足和自由地来往了，但组织和发动群众仍不容易，只能作初步点线基础，只与群众联系，了解情况和分化瓦解敌人宣传工作等的活动，武装活动仍有困难，因敌人堡垒据点甚密，但在我军事、政治攻势之下敌人大多数已动摇，有主力部队配合也可能作武装活动的。

二、目前我控制地区：从廉北、广西边境直达遂、海、徐闻南端已打成一片，徐闻已为我全部占领（县城在内，可能有反复）。目前除廉江县城、安铺镇、遂溪城、月城镇、雷州城、南兴镇及少数据点之外，该四县境全部为我控制。

三、新扩展的地区，除海、徐两县外主要是广西东南五属如：博白、陆川及北流东南部，博、陆二县是全县性的，现除三、四个乡是梅花点基础，其余都是全面的了。现已开始建立武装活动，北流东南已和信宜（瑜官）我区联接起来了。合浦方面除恢复原有地区工作外，新地区亦相当扩大了。现在与钦、防、十万山区联接起来了。桂中南区如永淳、横县、宾阳、上林、迁江、来宾、武宣、贵县共八个县，现有党员三百五十八人（内有候补党员二百七十三人）。上林现有武装二百人，轻机五挺，横北一带我十九团现有约二百人，轻机十八挺（贵北廖延年股不在内，廖是王震队南征时留下的，他不愿与我方联

系，他现约有数十人举义，是桂东南军区司令），全区有一万四千余人的群众组织。

四、目前仍存着许多严重弱点，如领导干部不强，连我在内，原有较为精干的干部、积极分子早已东征西征及北上去了（将近二千人），现外来的干部甚少，所有干部目前都是分散工作的，但亦赶上不形势的发展。最近才举办了一期青年训练班，学员二百一十人，都是中学以上的学生，约于本星期可结业；时间：训练三星期。党的组织生活普遍不健全，党内教育谈不上，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是无法赶上形势发展的，群众工作和组织亦很少，这是最严重的一环。政权工作有其名无工作，最近我们摧毁了敌伪乡镇政权不少，但我们又不懂得如何去建立新的政权，在此广大地区变成无政府状态。

丙、目前粤桂边区斗争方针：

一、建立二千至二千五百人的主力支队，是三、四、八三个团组成，由陈一林为支队司令（因我目前无这样的干部），副司令、政委、政治处主任均为我较强之党员，三、四、八团的干部及队员均为我原有的人员，陈原有部属官员共六十余人，五个营级干部（原为连级起义后提升），一为支队参谋室主任，一为参谋，一为政治处副主任，二为三、四团副团长，其余的为副连、排、班长等职，数月来在各部队中表现均好，有些已可吸收为党员了。该支队港分局已同意下月初可正式成立。

二、所扫清廉江西北及北部、化州北部、陆州、博白之南部，敌伪据点及乡镇政权拟作粤桂边区的初步山地的根据地，如无大变化最近一个月内可完成初步肃清土蒋工作，八团仍望留雷州半岛协助海、徐发展和巩固工作，一个月后调上。八支队集中使用，战术上仍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集中及灵活分散使用力量及主力支队，完成其初步任务。事后约在辰初或辰底贵西协助合灵与十万大山方面打通或向合、灵、贵、兴、博五县边境山地（陆万山）发展，请港分局通知中区方面向两阳、信、茂与我打通联成一片、茂、电、信三县工作应拨归我方领导，中区这一年来并无给他多大帮助，联系也困难，我已通知信、

茂、电的干部来开会。在酉前或今年内，我以陆万山为中心，达北上完成与十万山区、桂中南区、中区打通联成一片。对敌人的打击方向其主要的对象仍以扫清敌伪，铲除乡镇政权为目标，对敌正规军之弱点及大的城镇有机会时，我仍不放过。

三、在我军已摧毁和扫清了土蒋武装势力的地区，进行初步的巩固工作，建立我区乡及县政权。现遂溪已建立了十六个乡政权，廉江亦着手建立，海、徐尚未曾报告。现拟先在雷州半岛及粤桂南边（以廉江为中心），两区各建立一个行政督导工作，并创办乡政干训班，大批培养行政干部，广泛组织地方民兵，普遍组织不脱离生产的村队、乡队，县以下各区每区建立脱离生产的常备队五十人至一百人（一个连），准备编成县的主力营或团。一切补给主要是靠从敌手上夺取，合理的向民众征收公粮及水陆交通税收等三项。在目前依然是困难的，但局面进一步打开后，困难是可以逐步克服的。

四、民运工作在敌伪统治区仍以反三征为主，解决民众困难及纠纷，团结和组织民众，组织地下军（游击小组），在我控制区目前以协助民众春耕、排难解纷及救济为主，组织农会、妇女会、新青团、互助社、合作社等团体，改善军民关系，并号召全党全军节省粮食减轻民负，同时加强对民众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准备随着形势的发展把群众斗争向前推进一步，大量吸收青年知识份子，组织乡村工作队，继续举办小规模乡村工作训练班。

五、去年六月间划分的地区及地委，在半年多实际工作时是有很成绩的。今为求更合理适当，便利今后斗争，对各地区及领导机构有重新划分的必要，现决定：

1. 湛、遂、海、徐四县市成立雷州地委，书记兼第二支队政委沈不倒，副书记方兰。

2. 廉、化、吴及玉林五属为粤桂南边区地委，高老黄（湛江东海人）为书记，李郁（化县人山东回来的）、林星（陆川人，中大生）为党委。

3. 茂、电、信、梅四县为高州地委，人选未定，已通知来开会。

4. 合浦、灵山、钦东南、横南、贵南、兴业等六县为六万山区

地委，陈华（丁英）为书记，符志行（琼崖来的）、高谭（合抱人）为常委。

5. 桂中南地委人选未定，已通知来开会。

6. 十万山区地委照港分局决定。

六、在领导上，过去各级领导机关是分散不健全的，现已不能适应斗争需要，必须健全领导，特别是区党委和军委及各个地委的领导。摆在面前的许多问题急待解决，如党员审查、组织整理、宣传工作，尤其是过去南路党长期不健全、无教育、政治落后、党性薄弱，极需在思想、组织和政治上加强教育。但此间领导干部十分缺乏，故拟请调李明同志及军事、党务工作方面的高级干部前来，以便加强领导。

梁广

寅删（3月1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 第十八团团部紧急宣告

——奉命调查地方战犯

(1949年4月15日)

本局现奉上级命令：迅速调查灵山、横南、合灵边各地重要战争罪犯，提名具报，资案法办，自首批提名后继续犯罪的，亦应陆续举报，不容漏网。为此，特就这件事发表如下宣告：

亲爱的同胞们！战斗同志们！在反动派枪杀掠夺下久受摧残的各界人民们！革命家属们！烈士家属们，青年学生们！公开绅士们！

我们艰苦辛酸、受灾受难的时间过去了，胸中正义的愤怒之火压抑不住了。

今天，我们含泪期望着的胜利日子快到了。蒋介石匪首垮了台，国民党反动政府四分五裂。我们的解放大军就要打来了！今后不是反动派审判我们的时候，而是我们审判反动派的时候！战争罪犯一定要遭受惩办的。这就须要大家一齐起来动手调查，大家组织起伟大力量来，制止战犯们的反抗！

调查地方战犯这件事是重大的，必须革命群众一齐起来做，必须做得公正合理。各地同胞，应即就县内、区内、乡内反动头子的犯罪行为，把其发生时间、地点及事件经过，用书面或口头详细告诉我军同志，转来本部审查。在这里，必须证据确凿，必须根据解放军总部“惩办战争罪犯命令”第一、二项的原则去进行。必须从革命观点出发，而不能从个人报复观点出发。不能因为氏族、地方派别，或同村、同家等社会关系，而牵连无罪的人。不能诬告，不能陷害。

平日被人嫌疑和某一反动头子共同犯罪的人，若能出首密告反动头子，且在行动上实际告发他，可以免罪。

在未经本团呈请上级核定公布以前，不能随便指名某人是战犯，造是生非。法办战犯的权力，属于本军，严禁乱打乱杀。革命行动是有纪律的。同胞们，同志们，必须抛弃狭隘报复思想，来接受革命纪律，才不致犯着错误。

警告一切犯有战罪的人们！你们若是妄想顽抗，那是无用的！你们继续犯罪愈多，就愈不能获得人民的原谅！你们脱开战犯罪名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按照人民解放军总部“惩办战争罪犯命令”第三项的精神，采有效办法反罪图功。立功办法是：（一）逮捕坚决反动的战犯送交本军；（二）在伪政府各级机关中当政人物，或在乡间有作用人物。平日对伪法令阳奉阴违，并利用其职务或地位，掩护本军同志活动；（三）在伪军中带兵的，平日约束部队，不得扰害人民，并将军事行动通知本军；决战时对本军不加抵抗，并掌握力量准备兵变：

（四）即刻转变态度，以实际行动帮助革命，或以粮食、军需资助革命；（五）本军与当事人三方协商，酌量赔偿人民损失，曾经屠杀人民或本军同志的，酌赔恤金；（六）抢救属于本军的战利品、公文、档案及城市建设获得安全或免于破坏等等。你们能够这样做，不但可以取得人民谅解，而且可以免罪，还将获得政府的奖励。我党中央的宽大精神你们是知道的。傅作义将军反罪图功，就是个辉煌的例子。我们决依据本团在灵山人民起义四周年纪念日重要声言中的原则，尽量谋取和平解决地方问题。但是，事情必须及早商量。假若你们迁延时日，不到本军谈判，坐误立功时机，到了形势更加急逼，时局快要底定之日，你们一定受到惩办，永远难于赎罪的！

同胞们！同志们！紧记着这句名言：“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

团长 莫平凡 副团长 梁邦多
政委 陈荣正 副政委 梁中光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

古大存致中央统战部并转方方电

——魏、曾二人准备起义

(1949年4月15日)

中央统战部转方方同志：

魏大杰、曾天节在大革命时五华工作过，是我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逃外地投国民党军队做事，未破坏其所知的工作。一九三八年，我在粤曾与他二人见过，表示还好，彼等在邹洪部任团长、大队长，是复兴份子，据说是为饭碗之故。彼等在保安队中联系很广，起义要准备得好，时机选择适当，是可利用的颇大的力量。

古大存

卯删（4月15日）

军队向前进（南路解放区报道之一）

（1949年4月20日）

南 军

南路人民力量日益壮大的显著标志之一，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空前提高。在全国人民解放军正以疾风迅雷之势，用天津式或北平式解决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力量的时候，南路的人民解放军也运用着同样的方式，拔除了数十个残存在解放区的敌军据点，使北起广西博白、陆川，南迄琼州海峡这一块纵长五百里的全国三大半岛之一的雷州半岛，完全连成一片，即使在白天，即使是数以千计的大部队，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在这个平原上迈步前进，对龟缩在广州湾和其他据点内的敌人说来，这真是最无情的讽刺。雷州半岛是个一望无垠的平原，这里没有像其他地区那样可以运用地形上的优点，这里又是在华南三大城市之一的湛江市的旁边，国民党的反动军队经常驻守着七八千的正规军与保安队，然而依靠了人民，依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一支平原游击队不但克服了敌人的进攻，而且主动的四处向敌人进击，并且在战斗中逐渐增强了自己。

丰硕的战果

今年春季、南路解放军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攻势，这个攻势的目的是开辟海（康）、徐（闻），肃清廉江。攻势结果竟收获了预期以上的战绩，海、徐两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乡镇获得解放，廉江则除县城、安铺、石岭、塘蓬四个据点外，全部解放，人民政权掌握的乡村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政府的布告已经贴在县城的墙上，政令推行到城外的乡村中。三个月歼、俘敌一五三师四五七团副团长以下正规

军和地方团队官兵一千二百名，缴获数量如下：

重机枪	四挺	轻机枪	二十二挺
迫击炮	三门	冲锋机	四挺
手提机	五挺	长短枪	一六〇〇枝
子弹	六〇〇〇发	仓赋谷	五〇〇〇石
平毁碉楼	一五〇座	其他物资	不计其数

为什么南路人民军队在这末短短的时间内，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对比下能获得这样辉煌的战绩？最直接的原因是解放军的战斗空前提高了，他们不但能打野战，而且能攻坚，不但能攻坚，而且懂得以北平式的方式解决据点。在这里，我且报导解放军某团在春季攻势，四十日连续作战，攻克二十余个据点中的几个典型例子：

天津式的战斗

廉江县属的沙铲乡伪乡长雷受益，是廉江县著名恶霸（关于雷受益的被俘及对其改造教育将另文详述），伪乡公所设在一间大地主的城堡里，这座城堡与廉北其他许多坚固城堡一样，厚厚的城墙，四角各有一座三四丈高的碉楼，碉楼突出围墙之外，能互相侧射，使攻者没有死角可以利用，而碉楼的墙脚是灰沙浇的，上面是双层大火砖，即使重机对准一点连续发射也无法打穿，城堡内有水井，有粮仓，即使围上十天八天也满不在乎。——就这样，地方反动武装凭藉了坚固的城堡，拒绝了解放军“只要和平缴枪，保证全体官兵生命财产安全”的提议，大言不惭的说：“你们只管打，打得下是你们的，打不下赶快退走，要缴枪是梦想！”送信去的人被警告，再去送信他们就开枪，自然，他们是一个字也不复的。

这是廉江战役的第一个作战目标，廉西十万被摧残的群众眼瞪瞪的望着这个战斗。反动武装在探测我们的攻坚能力，他们以为我们打不下，而斗胆向我们挑战了。

对这些执迷不悟的反动分子，我们的答复是“以天津式的战斗消灭它！”

白天，迫击炮先实行摧毁性的射击，从精神上瓦解敌人的斗志，

并破坏敌人的防御设施，一面则扎云梯，侦察突击道路，突击组练习架梯突击，轻机组选择射击位置，准备以炽盛火力封锁敌人的枪眼，掩护突击组爬梯突击。

是夜，月色朦胧，突击组在轻机炽盛火力掩护下，清除了障碍物，架好云梯，不到五分钟便占领了一个碉楼，手榴弹爆炸，驳壳手枪在歌唱，逐屋战斗惨烈进行，一个钟头后，顽强的敌人终于屈服了。

“不行了，我们讲和吧！”

“讲和？哼！立即投降！否则全部消灭！”

“好！投降！投降！即刻缴枪，请你们不要开枪了。”

对坚持抵抗的首恶分子应该惩办吗？应该的。伪副乡长李德隆、乡队副邓锡汉等三名，不但是坚决抵抗的首恶分子，而且平日欺压人民，无恶不作，经人民一致要求后予以枪决，其余的经教育后释放。另一乡长的侄子雷宗钧则请求带罪图功，说服他的叔父受益（那时他不在乡公所而在自己家里）缴枪。在这个攻坚战中我军仅轻伤战士一员。

北平式的和平

沙铲攻坚战后的第四天，我军又以更果敢但毫无伤亡的攻击，打下另一个反动城堡——射大联保，全部歼俘伪长山乡长林华山以下五十余人，军威大振，反动派胆颤心惊，于是出现了北平式的和平，在我军紧密包围下，运用政治力量解决了长山乡公所。

沙铲乡公所是以攻坚战来解决的，在猛烈的逐屋战斗中，生命财产就不可避免的要有损伤，首恶的份子坚决抵抗，就不能不予以应有的处分！长山乡公所是一枪不发和平解决的，解放军就有条不紊的接收全部武装、文件、档案和物资，伪乡公所及自卫中队全部人员的生命财产，也就受到充分的保障。这个处理是在极精密的计划之下进行的，虽然在敌人选择北平式的和平之前一秒钟，负责攻击的部队都全部屏息凝神，准备以战斗消灭顽抗的敌人。

当城堡内的敌人接收和平缴枪的意见时，解放军立即通知他们按以下的步骤行动：

- 一、将全部武装集中乡公所大厅内，不得匿藏或毁坏；
- 二、开城门由我方接收人员进内点收；
- 三、各人携带私人行李物件出城外广场集中，听候检查遣散；
- 四、户政、粮政、财政、文牍人员及乡队副应检具各种武器物资清册，会同我方人员一一点交清楚。

接收人员则区分为三组：第一组由军事人员组成，首先入城堡清查武器弹药，并检查有没有危险装置（如预埋地雷等）第二组由政工人员组成，接收全部文件、档案、册籍，对我民主政权有用的保留，无用的焚毁；第三组由军需人员及地方工作同志混合编组，接收全部物资仓谷。武装部队除留置少数实施警戒外，其余一概加强外围警戒工作。

这样的接收保证了不浪费、不紊乱、而且迅速确实，在解放的市镇上，建立了良好的革命秩序。长山乡公所的解决，计接收了轻机一挺、手提机一挺、长短枪九十支，仓谷六百石。为使国民党人员明了我们对“北平式”的政策，还特别从接收仓谷中拨出二十石代伪政府清发士兵欠饷，解放军这种仁至义尽的做法，竟使放下武器的蒋军士兵感动得哭出来，伪乡长也高赞“你们是王者之师”了。

向解放大军看齐

某团在今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下旬四十天中连续作战，从廉东的太平店扫到廉西的车板圩，从廉西南的那贺圩打到廉东的丰满，走了一千里路，打下了廉江著名大镇青平、车板、那贺、沙铲、长山、龙湾、三合、禾寮、太平、草塘及坚固据点射大、多杰仔、文林、那凌、鲫鱼塘、良岸、大路湾、山菜、那刀、青山脚、大岭等二十余处，并在运动中与敌一五三师四五八团第三营遭遇，击溃全营，消灭他连长以下八十余人，缴获步枪七枝，弹药辎重行李二十余担，而我仅轻伤战士一人。

“军队向前进！”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南路解放军正在这个指示下努力学习，学习打野战、打攻坚战、打伏击战、打袭击战；学习组织战役，学习大部队的战场指挥，一句话，要向南下大军看齐！

四月二十日 南路

(原载《群众》第120期, 1949年5月12日)

雷州半岛的民兵战

(南路解放区报道之二)

(1949年4月22日)

南 军

坚持雷州半岛平原游击战的主要力量是广大的民兵——这些与步枪结合起来的农民，当过去武装斗争的艰难日子里，他们坚决留在平原与敌人周旋，而今天，当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他们更活跃了。雷州半岛的民兵战是太多、太生动、也太富于神话了，但是这决不是神话，而是人民伟大创造力量的表现。

三路大军六个人

保十团起义后，虽然宋子文派了一五三师和保十一团前来镇压，但是大势所趋，雷州地方反动力量普遍动摇了。这时遂溪东区民兵，为要解决久已包围中的新圩市反动政权及自卫队武装，便巧妙地想出虚张声势的游击战法，向这个距湛江不及半小时汽车里程的公路市镇进攻。

他们一共只有六个人，却分成三路，一面布置群众宣扬“解放军三路打新圩，离此地只有几里路了”，一面“三路大军”沿途开枪，向新圩攻击前进，防守新圩的伪湛江自卫队有一中队人（实力三十余名），平时慑于我军声威，已怕得不得了，一听“三路大军”攻击而来，不由得惊惶失措，仓忙向湛江逃走，那知逃不到一里路，却在公路边被我“两路大军”所包围截击，此时另一路“大军”早已入市，砰砰 响起枪来，敌人动摇了。

“缴枪不杀！”

“缴枪不杀！”

这三十多个敌人，除了十多个已逃得远的追不到之外，其余全部缴了枪，入到市区的一路“大军”两个人，则动员群众挑了几十颗手榴弹和二十几床军毯、军服及其他军用物资胜利归来了。

交通员智缴敌车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多月之前。

遂安公路（遂溪到安铺）是完全在我控制下的一条横贯雷州半岛北端的重要交通线。那天遂溪的敌人一五三师四五八团第三营三百多人调防到安铺去，其主力部队已先行，后面还有两个军士和四名枪兵押着两辆牛车的辎重行李，缓缓向西走。两个交通员和一个税站站员从乡村小路转到公路上来，不早不迟，刚好和他们打个照面。这时走到牛车前头的一个群众向他们咕笃了一句：“不要怕，后面没有人，做他！”

做不做呢？他们三个人只有三枝土左轮和土拉八，而敌人却是六枝卡宾和汤姆生，而且敌人的主力刚走不了几里路。

“算了吧，我们闪过一边。”一个交通员说。

“不怕，用点计仔。”另一个说。他们立即闪入路旁的树林子里高声叫：

“第一排向左，第二排向右，冲锋，——前进！——”一面他们乒乒乓乓的从树林子里突出去，向那六个敌人攻击。

愚蠢的敌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丢下两车东西没命的向遂溪回头路跑。他们三个追了半里多路，看看追不上了，才回头押着两大车东西，优哉游哉的回去。计得子弹四百余发，军毯二十余张，土工器具四把，香烟二百五十多条，胶鞋三百余双，还有许许多多零星物件。这二百多条香烟缴上来后，由交通员建议分发给全体同志们。于是这个生动的故事就一直从徐闻传到玉林，从合浦传到茂名。

麻雀战累死敌人

三月中旬，窜扰青平的敌一五三师的一个营，要从青平赶回石岭，〔此〕事为我沙铲区民兵侦悉，因时间关系，他们只能动员到四个人来实行阻击工作。于是他们预伏在敌人行进路附近，先行伏击，一个枪排打过去（即四枝步枪同时放），打跌敌人两个，战斗于是展开了，他们四个人分散在四个小山头上，等敌人接近了才放一枪。敌人却使用了六〇炮、掷弹筒、重机、轻机，从下午一时直打到天黑，消耗了五六十颗炮弹，六千多发子弹，天又下雨，河水又涨，肚子又饿，直到天黑还爬不了五里路。入夜后才走到农村宿营，大事抢掠，连坛子里一点谷种都抢去。当夜，民兵再往骚扰，害得敌人一夜都不能安睡。残暴的敌人竟把一肚子气发到民众头上，翌日，变本加厉的奸淫虏掠，把于筐也烧了，小猪仔、老母鸡也刳了，被强奸的妇女竟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是敌人在自挖坟墓，随着这种泯灭人性的暴行，廉江的民兵队伍是几何级数般地壮大了。

活跃在湛江市郊的民兵

民兵不但单独进行英勇战斗，而且在某些大的战役行动中，担任一定的任务，配合主力作战。

比方今年春，南路人民武装某部主力进军海、遂、湛江边，第一个攻击目标是湛江市第三大镇的太平市（其他两个为赤坎和西营）。太平位置在广州湾边的湛江（湛江至海康）公路上，湛江的敌人只要有两点钟汽车就可赶到，因此对太平市的攻击战斗，其成败关键，在于对湛江南下之敌的阻击是否成功。当时这个任务交给一个区的民兵负责，他们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在攻击开始的前一个晚上，彻底破坏了太平至湛江的电话线、公路、桥梁。把苦竹渡的汽车轮渡拉到上游掩蔽起来，河上其他民船也疏散到海外去。

第二天一早，主力部队对太平市的攻击开始了，至下午二时全部解决通平区公所和警察局。湛江的敌人知道了，派兵来援救，沿途好辛苦才到苦竹渡口，但是没有船，这样就被南峰民兵的三、四枝步枪

阻住了。直至第二天，我军转移后，才偷偷摸摸的爬到太平市去。

遂溪东区的民兵特别英勇灵活，他们经常把赤坎西南一里多路的桥梁破坏，夜间去骚扰敌人，使得敌一五三师师长李宏达不能不以一团的兵力留守湛江，而又只能龟缩在湛江市里，害着严重的神经衰弱。

(四月二十二日 南路)

(原载《群众》第122期，1949年5月26日)

记“雷公”（南路解放区报导之三）

（1949年4月24日）

南 军

廉江县伪沙铲乡长雷受益，人民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雷公”。闻其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个名字在廉江人民的心头是一个可怖的压迫。

雷公今年五十八岁，雷姓在廉江本是一个小姓，但雷公却能在封建宗法斗争中保持他廉西小霸王的地位，多年来实际统治着廉西十余万人民，这是因为他有一套旧社会和政权中的统治手法的缘故。他在旧政权中做了四十年的职员，跑过长江流域和江南其他地方，能说，能写，使人们一见面便得到这样一个印象：“雷公是能干的。”

是的，雷公是能干的，但是四十年来他的“能干”给反动派作了帮凶，给人民凭〔平〕添了不少的痛苦，而他自己则逐渐爬上地方反动统治的宝座，实际宰割着人民。

自南路武装斗争开始，他就站在对立的地位，最初他还保持着所谓“忠恕之道”，不敢做得太露骨，还装出一副“孺然仁者”的假面具。但是阶级斗争毕竟是残酷的，只几个短兵相接便把雷公的凶相毕露无遗了。他的哥哥雷受春因为坚决与人民为敌，被枪决了，他的儿子也因为做特务而受做怨办，于是他就更疯狂更顽固的蛮干到底了。每次廉江敌人的残酷“扫荡”，他都有份，而他便是廉西地区的实际主持人，每次“扫荡”所经村庄都被烧杀抢掠得一干二净，而雷公总是笑咪咪的满载而归。他又是国民党三征暴政的执行人，廉西许多青年寡妇都牢牢的记着是雷公从她手里抢去丈夫的。

雷公，雷公，这国民党在廉西罪恶政权的象征！

今年二月中旬，南路人民解放军某部强攻沙铲乡公所。捉到雷公的侄儿宗钩，他一被俘就请求“戴罪图功”，他说“我一定带解放军到我家去叫我叔公缴枪。”于是他随着队伍到达大岭，经他叫过之后，果然一枪不发就使雷公下令守大岭的乡保队和雷族人缴了枪。雷公一开门就责怪他的侄子不识时务，不该在沙铲乡公所抵抗，随后翻过身来笑脸迎人地说：“各位长官，我知道我该死，我杀了这么多人，罪大恶极！我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请贵军宽赦我的家里人，只要他们能活得下去我死也瞑目了。”这时候的雷公又是一副多么可怜的面孔呀！

解放军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只没收他存在家中的乡仓谷和其他公用物资，雷公私人的财产按照对和平缴枪的敌人的原则分毫不动。这时大岭岭排上早已经从廉西各乡拥来了数千群众，挑着箩筐、麻袋来担乡仓谷。多少年来的仇恨，多少年来的冤屈，现在都一齐倾泻出来了。雷公的村子周围筑起了木栅被群众拆除，拿来当柴烧，数十堆的野火照红了整个山头，从夜晚担到第二天天明，乡谷还未担完，轮不到的就在山顶露营。许多群众避过警戒兵的监视，把雷公家里的谷耙、竿筐、鸡笼、水桶担着走，说他们认得出这东西是他们自己的；许多群众趁哨兵一个不留神就一把火，把一些草房烧起来；许多群众用扁担打雷公养的猪，用石头打雷公养的狗，群众愤激的说：“实在恨入骨了，我打烂他两片瓦也是愉快的。”

政工人员召集了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向在家解释我们的态度，希望大家不要单凭一时的气忿恣意破坏，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既是人民的军队，大家就应当相信我们会作公平合理的处理。这个意见立即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破坏行为停止了。我们的部队转移以后，再也没有人去继续破坏或辱打雷公的家属，象雷公自己先前所预料的那样。这里充分证明了人民的宽大，和中国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在人民心目中崇高的威望。

解放军决定要雷公叔侄随军受训一个时候，他们自己也坚决请求随军，因为他害怕会给恨他入骨的群众打死，这样便开始了雷公的随军生活。

雷公被俘成了廉江的一件大事，反动势力整天打听雷公的消息，广大人民也整天打听雷公的消息，“雷公死了没有呢？”

雷公在一开始时便以为自己一定会死的，后来解放军首长告诉他：“共产党与解放军不是以杀人为职志，而是以救人为职志的，你肯和平缴枪，已经减轻了一些罪恶，如果今后能大彻大悟痛改前非，而且能为人民立功，那末人民是可以宽恕你的。”于是雷公决意为人民立功赎罪，而且开始阅读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许多文件。

随军受训的一个月，在雷公生命史上是一件起死回生的大事。他经过的村庄大多数是曾经受过他残杀和破坏的，听说队伍要来，村边便挤满了男女老少，大家在谈雷公，当雷公杂在俘虏群中出现时，群众便指手划脚的在骂雷公。有一个老婆婆说：“我要灌水给他吃，去年他把我的烂蚊帐都抢去了。”有一个年青的寡妇说：“先生，请你准我割一块仙人掌来打他，他大前年强拉我的丈夫去当兵，至今杳无消息，丢下我和手边这个孩子怎样能活得下去？”另一个老婆婆偷偷的藏了一把刀，蹑手蹑足的走到雷公旁边，想割他一块肉，被卫兵发觉制止了。她大喊起来：“先生，我的儿子就是被他拉去打死的，我不能要他偿命，也要割他一块肉还我！”还有许许多多人站在外面说这样说那样的，雷公闭目凝神，一字一句都刺进他心坎里。

雷公开始悔恨自己，他想着立功，在春季攻势扫荡各个反动据点时，他曾跑到据点旁边去现身说法，劝里面的敌人投降。他说：“抵抗解放军是死路一条。廉江县雷公最恶，杀人最多，沙铲乡公所建筑最坚固，但是再坚固的也要被攻破，我的侄子也免不了要做俘虏。我告诉你们：解放军是赏罚严明、是非立辨的，他们说得到就做得得到，他们说‘缴枪的不杀，顽抗的必办’，你们看呀：沙铲、射大、龙湾妄图抵抗，结果首恶分子枪决了；那贺、大岭、长山、那浚、青平各地和平缴枪，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死。”雷公又说：“我雷公做了一世糊涂事，替蒋介石执行反人民的政策，共产党救了我，使我清醒过来，准我立功赎罪，我都有自新之路，你们还怕什么咧？”雷公又说：

“我跟他们走了这末久，我深知他们是一定成功的。过去我和国军出发‘清剿’，行军所至，鬼都见不到一个，走入村里，老太婆都

躲起来；现在跟解放军走，条条村的人都像家人父子一样欢迎他们。我就晓得人心早归向他们了。”

雷公的确在瓦解敌人据点上立了功。他看见我军指战员亲爱团结，刻苦耐劳的情形，大为感动，竟在受训的期间戒掉了自己的鸦片烟瘾，决定从新做人。

雷公决心改邪归正，回到人民这边来，人民是欢迎的。一个月以后，我军人员多方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都认为只要他能洗心革面，重做好人，是可以宽恕他的。雷公则自愿拿出三百担谷子来赔偿受害群众的损失，并要求我地工人员陪他到各乡村去向群众叩头认罪。另由雷公自撰骈体文的《向人民道歉书》在《人民报》上发表。三月下旬的一个墟期，雷公叔侄便在沙铲圩上向他从前的“治下子民”诚恳的认错之后获释了。

雷公叔侄的释放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一事件向一切反动分子指明一条道路：解放军是经常为一切曾经作恶的反动分子开放自新之门的，“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那末人民总是会以宽大的态度来对他，准许他立功赎罪的。

和雷公同一时期被俘也获得人民谅解的重要分子，还有一个伪海康东南区联防主任兼大队长苏圻，他们两个人的释放，普遍动摇了南路地方反动分子，大大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

（四月二十四日 南路）

（原载《群众》第123期，1949年6月2日）

粤桂边区军政机构干部人选（草案）

——第八支队、边纵司令部和边区
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干部人选*

（1949年4月29日）

杨应彬

一、第八支队（主力支队）干部人选

司令 陈一林（三十八岁，蕉岭人，国民党燕塘军校参谋班及陆大参谋班毕业，曾于军校集体入国民党，曾在缪培南、张发奎部内部任参谋及情报课长。富裕中农家庭，起义投我后，其在广州及湛江之财产已被没收，现家境不甚宽裕。起义后曾要求入党，后知我党入党条件后，最近已不提，想立功后再提出，并表示一定要努力做一个“漂亮的党员”。目前其思想意识的改造正在进行中，有若干进步，但彻底改造尚需时日）。

副司令 王克（即王健夫，抗战前后毕业于国民党军校十一期，一九三八年赴延安入“抗大”，即在“抗大”入党，后一直在国民党部队工作。1948年秋湛江事件发生后，离开张君嵩十清剿区，入我部队工作。为人积极热情，无官僚气，深入下层，但政治上尚有待今后努力提高）。

政委 莫逊（琼纵介绍来的，二十余年党龄的老干部，曾任支队政委，相当于今日南路的团政委——六年，来南路前是地委常委。详见琼纵对其之鉴定）。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何文（二十八岁，台山人，约有十年党龄，曾任东纵时期大队政委及暹共中央秘书长等职。到南路后任二支副政

治部主任。保十起义后，参加处理工作，深得一般保十干部之信任）。

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 李廉东（合浦人，十年左右老党员，曾任老一团政治处主任及二十四团政委，对部队党工作颇具经验）。

政治部副主任兼宣教科长 潘逸甫（梅县人，保十起义主要干部，陈一林的秘书，民大学生，曾在四战区长官部及广州行营任情报参谋。东纵北撤谈判期间，曾奉命化装士兵侦察方同志等行动，据他自己坦白此一段历史时，深感愧悔。相当敏感聪明，但彻底改造尚须时日，曾入国民党）。

参谋处主任 黄庆经（蕉岭人，保十起义主要干部，军校十四期工科毕业，曾在军校集团入国民党，保十起义前任副营长，起义后任营长，军事技术上有些专长，但尚须政治上加以改造）。

二十二团团团长 李树德（廉江人，二十八岁，约五年党龄，第一次起义时的干部，长期坚持廉江武装斗争，现任新三团团团长）。

政委 矮梁（未悉真名，约五六年党龄，廉江人，第一次起义后的干部，刻苦耐劳，有武装斗争经验。现任廉江县常委）。

副团长 邹瑾青（保十起义主要干部，龙川人，三十二岁，国民党军校十六期步科，曾于军校时集团入国民党，保十起义前任连长，起义时亲自击毙张君嵩等。起义后任营长，在疏散保十官兵收缴武装时起重大作用。头脑尚简单，政治上仍须给予教育）。

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 叶杨眉（廉江人，约有六七年党龄，曾随老一团入越，热情、苦干、负责，政治上尚须提高，现任新三团副政委）。

二十三团团团长 钟燕飞（从化人，曾任国民党下级军官，后加入部队并入党，军事上积极热心，但政治上尚须提高。他在坚持化、吴斗争中曾起大作用，现任新四团团团长）。

政委 方明（化县人，八九年左右党龄，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精明干练，但因斗争残酷，对政策掌握上常易过左。现任新四团团团长）。

第一副团长 叶车杨（化县人，五年左右党龄。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在群众及部队中威信甚高，有军事才能。政治上近来亦很进步，现任新四团副团长）。

第二副团长 郭广耀（大埔人，保十起义主要干部，二十八岁，国民党军校十八期步科，曾于军校集团入国民党。保十起义前任连长，起义时亲自击毙张君嵩等。起义后任营长，疏散保十官兵收缴武装时，曾起重大作用。头脑简单，政治上尚须大力提高）。

二十四团团长兼政委 马如杰（遂溪人，八九年党龄，长期坚持南路武装斗争工作。曾随东纵北撤上山东学习，相当坚强。现任新八团政委）。

副团长 黄林（遂溪人，汽车工人出身，约四年党龄，过去因有保命思想，在部队中威信不高，现已在改造中。现任新八团副团长）。

各团团级主要干部中尚有缺政治处主任的，俟以后补提名。营级以下尚未确定，暂从略，以后补提名呈报。

二、纵队司令部干部人选

司令兼政委 梁 广（简历从略）

副 司 令 唐才猷（简历从略）

政治部主任 温 明（简历从略）

参 谋 长 杨应彬（大埔人，二十九岁，乡村贫民家庭，半工读至初中后，至上海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一九三五年入党的外围组织“新兴教育者联盟”。一九三六年入党，抗战后与左洪涛同志等入张发奎部做统战工作。一九四〇年奉组织命入国民党军校，一九四三年入陆大参谋班，曾任国民党排、连长及参谋。一九四七年撤退来港，一九四八年奉派为粤桂边区区委军事特派员，前往十万大山工作。去年底调回南路，在边区军委工作，实际的武装斗争锻炼时间甚短）。（或参谋长由唐才猷兼，杨任参谋处主任）

三、边区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干部人选：

主任委员（兼） 梁 广（略）

副主任委员（第一） 黄其江（粤桂边区区委常委）

副主任委员（第二） 陈信才（略）

委 员 彭仲英（略）

这几人已由温明、郑坤廉（略）同志向方同志谈过。

沈斌（即不倒，湛江人，抗战初期入党，南路老干部之一，党性

颇强，对方针政策的把握正确。曾任雷州区行政专员，现任雷州地委书记兼第二支队政委)

巫伯 (真名未详，防城人，在钦防社会上、中、下层均有威望，是长期在我影响下的进步人士。据闻最近已在湛解决其组织关系，现已回十万大山，曾任K防城教育局长及那良中学校长)

陈学仁 (浙江人，在桂工作十五六年，据我所知，他早已是党员，曾任K宾阳县县长，为人诚恳，忠厚朴实，因他在桂中南有相当高的威望，他自己又曾表示要求入游击区，最好能准予调入粤桂边区工作)

以上各干部简历是就我所知的写出，其中评语则是小林同志的一般意见，但也不是组织的正式鉴定，因此其中如有错误，应由执笔者负责。

——杨应彬记

四月二十九日

梁广致中央并转香港分局电

——高雷部队一年战绩

(1949年4月)

中央并请转港分局：

粤桂边区高雷部队一年战绩统计：

甲、一九四八年四月至十二月十九日保十起义前，作战二十七次，歼敌（毙、伤、俘总数）五百五十五名，缴轻机二十一挺、手提机一挺、六零炮一门、步枪六百一十八支、手枪二十三支、手榴弹二百二十颗、子弹二万三千四百九十发、掷弹筒八个、榴弹筒十四个、军毡八十床、刺刀八十把、西药十四担、其他军用物资甚多，平毁堡垒二十六座。

乙、一九四八年亥皓保十起义后至一九四九年三月作战共十次，歼敌（毙、伤、俘总数）一千一百零五名，缴轻机十二挺、手提机四挺、步枪一千三百九十三支、手机一百支、手榴弹五箱又八十一颗、子弹四万八千一百一十四发、军毡一百零五床、无线电器材六担、军用雨衣六十五件、火药八缸、仓库谷六千八百二十三石，平毁据点二、城堡四十四、共有碉楼一八九座。

丙、一年来共作战一零七次，歼敌一千六百六十名，缴轻机三十三挺、手提机五挺、六零炮一门、步枪二千八百一十一枝、手枪一百二十三支、手榴弹六箱又三百零一颗、各式炮弹一百三十七发、子弹七万一千六百零四发、掷弹筒八具、枪榴筒十四具、刺刀八十把、军毡一百八十五床、西药一担、无线电器材六担、军用雨衣六十五件、火药八缸、仓库谷六千八百二十三石，平毁碉楼二百一十五座。

丁、争取起义部队：保安第十团八百余人，遂溪县义和乡公所的

自卫中队六十人，廉江县石岭乡自卫中队三十人随部队起义，武器（略）。

戊、一年来解放城市、土地如下：省辖市湛江（二次）；县城二座：遂溪、徐闻；市镇四十四座，计廉江县十五座：良、青平、太平店、长山、那贺、沙铲、横山、石颈、三合、禾寮、龙湾、南安、戎（乾）案、车叔、草塘；遂溪县十座：洋菁、杨柑、界炮、河头、纪家、乌坡塘、畚（牛）人（仔）圩、调丰、中伙、乐民；湛江市属二座：太平、新圩；海康县六座：曲界、前山、下洋、锦囊、龙塞、仙安、石版、黄定、和安、下桥、胜利、艾罗；化县一座：山底。各市镇绝大部分均在我占领中，现廉、遂、海区（完全解放）共有四十个乡，其余均已半解放（解放市镇中徐、海两县数字系根据寅东报告）。

梁 广

卯（4月）

南路人民当家做主

(南路解放区报道之四)

(1949年5月1日)

南 军

南路人民不但在摧毁一个旧的为反动地主官僚恶霸所把持的反人民政权，而且正在缔造一个新的为人民大众所拥护的民主政权。南路人民已经在当家做主了。

单就雷州半岛上的廉江、遂溪、海康、徐闻四县说来，今天都已建立了县的人民政府和区、乡的人民政府，最近并已着手设立县以上的行政督导处，以指导各县的施政工作。

廉江全县三十个乡镇，现已建立民主政权的共有二十多个，遂溪全县原有二十二个乡镇，人民政权根据实际需要划分为遂北县与遂南县，单遂北县就已正式建立了十六个乡政权，遂南县亦已普遍建立；至于海康、徐闻是今年新打开局面的，但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在海康十六个乡镇中就已建立了九个乡政权，徐闻十一个乡镇则建立了七个乡政权。这些建立乡政权的乡，都是完全解放的或绝大部份已解放，只有一两个据点不拔除，但对人民政权政令的推行毫无阻碍的。

人民民主政权选出了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热心的共产党员为县长，廉江的是罗培畴，遂北的是陈开濂，遂南的未有正式选出，海康的正县长是肖汉辉，副县长是韩华保；徐闻的正县长是谭国雄，副县长是赖再德。他们都是多年来领导南路人民坚持解放事业，一步也没有离开本县土地的积极分子，人民之所以选举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会开空头支票，不是因为他们会做“官”；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天生的行政人

材；而是因为他们真心实意把全部精神乃至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人民革命事业，在多年艰苦的考验中，人民见到他们百折不挠的忠贞品质；是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热心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只知有人民而不知有自己；是因为他们时时刻刻亲近人民，倾听人民的意见，要革的革除，要兴办的兴办，一切悉依人民的意旨为施政的根据。

至于区、乡一级的政权，则由人民选出各该区、乡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来担负，许多过去积极热心的农会主席、地下军领袖和妇女会积极分子，现在都是区、乡长或副的区、乡长。这样就保证了人民政权能坚决掌握在人民的手中，真正为人民做好事。

当前南路各县人民政权的施政纲领中的几项中心工作，首先是确保人民既得利益，巩固人民政权，因此解决一切恶霸土豪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武装是急不容缓的，但是人民政权有步骤有分寸的社会政策又保证了能够团结农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来从事当前的斗争。那就是说，阴谋推翻人民政权的坏分子是必须镇压的，但一切能够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善良的地主、富农和工商业者，乃至国民党政府中的文武官吏，其个人及其家庭全部生命财产都得到充分的保障，比方廉江伪沙铲乡长雷受益被俘随军受训期中，及悔改被释以后，其全家生命财产都受到充分的保障；伪徐闻县长陈桐，曾在雷州当过十几年的伪县长，刮了不少冤枉钱，他在徐闻山区曾以现代化的经营办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农场，这个农场是在徐闻解放区内，人民政府为了给陈桐以悔过赎罪的机会，也保证了不没收它并准许继续耕作。

其次是坚决推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救济灾荒，兴办水利，扶助春耕，真正为广大农民谋福利。减租减息的政策现在已经在南路各县普遍推行，在人民政权完全控制的地区，固然已全部执行，即使湛江市内各农村也已普遍施行，地主已公认这是合理的应该执行的，过去那种明减暗不减的阳奉阴违的现象现在已经不多见了。说到救济灾荒的工作，民主政权更曾以大力来进行，海康东部因去年飓风冲毁了海堤，海水流入稻田，农民受害不少，现在已由人民政权发动抢修，今年夏收可保无虞。又如遂溪△区属坭地，雨水缺乏，那边有一千多亩稻田是靠附近一口大水塘蓄水灌溉才能耕种的，往年这口水塘常常干

来种作物，这样，水塘主人虽然每年可收到一百几十担稻子，但另外几十家千余亩土地却因此没有水源无法种植，全区将实际损失几千担粮，遂溪本来是缺正粮的县份（杂粮很多），这样将使粮食更行减少，影响军粮、民食实在不少。民主政府有鉴于此，特地召集双方研究，结果得到一个两利的办法，就是：全部水塘租给种田人，每年由大家按收获数量比率，交回整个水塘每年收获总量的谷子给水塘主人，而水塘每年养鱼的出息则双方平分，这个办法双方都很满意，当笔者走过这个地区时，早已一塘春水，附近一片丰饶的黑土都在翻身了。民主政权发动群众相互救灾的工作，在廉江县是做得很好的，蒋〔匪〕军一五三师和保十一团、保二团等五个团，曾在今年初，向廉江发动一次六千人的大“扫荡”，因为我们的主力早已转出海、徐及化、吴去开辟工作，他们扑了一个空，但人民却受了惨酷的摧残，蒋〔匪〕军走到许多村庄，指着仓里的谷说：“这是匪谷”，抢得精光；有见妇女就说“就是女匪。”施以兽行；看见山上的砍柴的或田里做工的都说“这是匪徒”乱杀一通。在这种暴行下，廉西村庄，十室九空，民主政府除了拨粮救济之外，还发动各区及乡互助，从精神上及物质上支援被难的村庄。今年春耕，各地民主政府，特别是老区政府，都在实际行动上帮助了一些贫苦的农户。虽然今年因为打开了局面，粮食大致不成问题，但是领导机关已经号召全党全军要节粮。有些部队准备在驻军期间吃一餐粥或杂粮，许多地区的地工人员则提出“自己养活自己”的口号，以捕鱼、晒盐和耕种来解决自己的生活。去年冬收遂△区一个区的地方工作人员，就收割了一百五十多担谷子，养活了不少工作人员，减轻了群众不少负担。

再次，民主政权的中心工作是如何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对于一切群众职业团体和革命组织如晨会、妇女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民主团体，都将以政权的力量保障其合法存在，并帮助其发展。遂溪△区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因民不聊生，盗匪变成一些铤而走险的人的职业行径，在游击区时代，他们自动组织了“饿仔会”专去偷大地主和恶霸土豪的作物。现在遂溪△区已全部解放，这种人已不是非做“饿仔”不可，现在已在民主政权的指导下逐渐把这种人

民自发的救生组织改造成革命性质的组织，有些份子则被个别吸收到农会、民兵队这里面去了。整个南路有组织的群众已有××万人，当然这个数目与人口相比还差得太远，因此如何组织群众，便成了今天南路人民政权的急迫的任务了。

今天在南路负责政权工作的干部，是十分得人民敬仰的，比方遂北县长陈开濂就是一个典型。他是青抗时代的共产党员，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农民群众中，坚持斗争，敌人曾多方设法侦捕他，但是靠了三十万遂溪人民的掩护和保卫，敌人就怎么样也捉不到他，南路的反动份子和反动军队走马灯似的撤换了或调走了多少，而陈开濂就是一个不倒翁。一直等到今天屹立在雷州平原上。他是一位教师，曾在抗战期中任过乡长，今天是人民政权的县长，但这位县长的裤子是经常打着补丁的。遂溪县的男女老幼都知道他是县长，而且见过他，他们给他起了一个尊称叫“濂伯”或“阿伯”。这个穿着补丁裤子的三十余岁的县长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象征：南路人民当家做主了。

五月一日 南路

（原载《群众》第124期，1949年6月9日）

军民大动员实施纲要

——动员工作的重要性、动员工作内容和方法*

(1949年5月9日)

粤桂南边地委

一、动员工作的重要性

关于迎接大军，迎接胜利的各项工工作，时机紧迫，刻不容缓。除了干部的动员和全党的动员，还要马上进行全军、全民的大动员，使军民一致认识到有利形势发展的迅速，自身任务的重大，因而鼓舞起旺盛的战斗热情，密切团结在我党领导之下，充分发挥群众的伟大力量，才能依期甚至提前完成。所以我党、政、军、民各级领导干部、工作同志，应该深切认识到这件动员工作做得好不好，是能否完成党和人民所给予我们的任务之主要关键，因而用最大努力来领导布置这一工作，作为推动全盘工作的开始。

二、谁负责领导这件工作？

领导动员工作的进行，主要的责任首先落在各县工委书记、各区特派员同志的身上，他们必须自己很好地了解这件工作的重要性，进而周密地全盘考虑本县本地区各部门工作干部的情况、我情、敌情、民情，然后定出动员计划，召集各团、营、区级干部讨论研究如何执行，最好亲自动手领导一个干部能力比较强、群众觉悟性和组织性比较高的部队单位或地区单位作成试验，随即总结其经验，介绍给其他部队和地区的单位作为参考。到了普遍发动时，重要的事情是检查，提防例行公事的形式主义，必须使执行动员工作的同志懂得比较动员

前和动员后的群众表现情形，懂得怎样掌握动员后的热烈情绪，展开一连串的预定工作，不可动员过了又无事可做，冷落下去。尤其重要的，是在整个动员过程中，留意发现积极份子，好好地团结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提高一步，变成今后推动工作的活力，同时就要在此留意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

部队的教导员、指导员、服务员、地方工作的区委书记、地工组组长、武工队的指导员或队长，是担任执行组织动员工作的骨干份子，必须教识他们怎样做。碰到困难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细致地指导他们，动员工作才能做得好。

三、怎样进行？

动员时间的先后：（一）干部；（二）党员；（三）各部队各机关；（四）各乡村民众。

因为动员的目的是启发自动自觉的积极性，煽起热情去执行工作，完成任务。所以应该首先要从动员干部和动员党员入手，干部、党员动了起来，起模范带头作用，群众才容易跟着起来。各部队机关因为原来有固定的组织，成员比较懂得革命道理，对他们动员了之后，就可以通过他们，又去动员其他更广泛的群众。所以，他们可以比各乡村民众的动员提前举行。

干部动员，可以由首长召集干部会议作报告，报告是主要的，报告之后可以展开讨论。

党员动员，地方党开支部会，部队党可以开党员大会，主要也是由支书或上级党负责人报告。报告后，在支部或小组内展开讨论，同时必须每一个人都提出自己完成任务的保证和立功计划。

一个连以上的大部队，可以布置隆重庄严的会场，举行有仪式、有节目的动员大会。会上必须事先动员党员或积极份子起模范带头作用，以影响激励其他成员。这个时候公开宣布自己的立功计划，发起挑战竞赛，都是必要的。

各小股游击队、武工队、地工组等，可以和民众举行联合动员会，队员、组员除了以身作则之外，并要好好地团结、启发民众。

各乡村民众的动员，可根据村屯的大小和人员的多寡、有没有敌情顾虑等来决定规模的大小。规模大的情绪容易热烈，但会流于不深入，所以必须于事前、事后有很好的组织工作。规模小的容易陷于冷落，所以把握会场情绪，使其热烈是必要的。如有可能，总以举行规模较大者为好。

四、动员大会的内容

名称：大的可用“迎接胜利紧急动员大会”，小型的可用“庆祝胜利渡江晚会”。

会场布置：我干部、党员、部队、机关的动员大会，悬挂党旗和毛主席像（可能则同时悬挂朱总司令像），尽量加强参加者对党的观念。民众的动员大会，挂国旗及毛主席像，亦须加强其对我党的认识。

在大会上

（一）讲明形势——首长根据地委《紧急动员迎接胜利的指示》中关于形势部份的基本观点，配合上新形势材料，充分讲清楚大军渡江后对华南各地斗争大大有利的形势，指出胜利已是必然，现在“万事具备”，只欠主观努力，提高大家的胜利信心和斗争勇气，鼓励大家迎头赶上形势，誓不做“黄明堂”。这个讲话的鼓舞作用很大，所以必须好好准备。

（二）宣布任务——甲、对部队机关，根据指示所列举的各项任务，把与参加大会者切身相关，能够公开不致泄漏秘密者当众宣布，如主力部队宣布整军练兵，五月份一定要打两仗至三仗，积极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地武、民兵等宣布必须经常打敌人，到处打敌人；军需部门的宣布筹款、筹粮、筹弹；交通站宣布、保证信件传递迅速，依时到达；医务所，油印室等，宣布提高技术及工作效能；党务机关宣布展组计划，号召部队的模范指战员、地工的模范工作者、群众斗争中的积极份子，提高觉悟，申请入党。

乙、对乡村民众，我们则宣布：（1）国民党反动派的“政府”已经是个不合法的伪政府，人民今后对它没有负任何义务的必要，坚

决拒绝纳粮当兵，拒绝接受伪命令，拒绝使用伪金元券。对于还不肯听从人民意见办事的伪官员加以逮捕审判，伪政府来压迫就连同其他乡村一同起来武装反抗。（2）今后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合法的、正统的政府。有事要叫这个政府办，有纠纷要叫这个政府调解，拥护这个自己的政府，听从这个政府的命令。伪乡村保甲长暂时保留的地方，他们要听这个政府指挥，为人民服务。

（3）拥护解放军，抵抗国民党匪伪的压迫洗劫，踊跃参军、捐粮，组织民兵自卫。

（三）发出号召——部队提出如“到△△去食灰水粽”、“打下△△过中秋”、“忠心为革命，立功做党员”等，民众提出如“全村一条心，合力打敌人”、“不放敌探进来，捉清村内奸细”、“有枪借给解放军，有粮交给自家人”、“真心做革命，好人入共产”等。

领导上必须注意，这次大动员是一个行动的号召，也是一个强烈的政治攻势，务使造成士气高涨，民心鼎沸，我声威浩大，敌则草木皆兵，以利于今后军事斗争和群众斗争等工作的展开。

五、检查与报告

为了求得动员的深入贯彻，必须按级检查，看做了没有，做得好不好。地委检查各县工委，各县工委检查各区委、各团、营、连及地方部队。区委则检查各地工组、武工队、各乡村。同时各部队及地方单位，做了之后要按级报告，以备检查总结。如有不努力执行的，以对革命怠工论，按情节轻重予以批评、警告和处罚。

地委 一九四九年五月九日

中共十万山区地委 关于建立政权机构的指示

(1949年5月15日)

我们组织人民武装，与反动派作艰苦的斗争，为的是保卫人民民主权利，推翻反动派的统治政权，建立代表人民的新民主政权。本地区过去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暂时以军队的面目来进行政权工作，这是局部的不完全的工作。今天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迅速地创立起代表人民民主权利的完整的旗帜，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迅速建立新民主政权机构。而建立政权的工作成为当前紧急动员迎接胜利的重要的一环。

这里要求我们充分认识政权机构的重要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这句话，有许多同志在书本上看过了，但还要进一步来认识下列几点：

第一，只有把政权机构建立起来，才能够完全的而且迅速集中人民的意志，才能够完全的而且迅速的把全体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因为军队与民众团体的组织，仅限于先进的自愿的部份人民群众，而政权组织则除自愿的先进的那部分以外，还要用大多数的力量去强制少数落后群众，使广泛的人民群众都一律参加到政权的组织系统里去，任何人民群众都是政权组织里的一个成员。唯其如此，政权机构是一个强有力的动员集中人民力量，对代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国民党反动派，给以打击和镇压的对敌斗争的工具。

第二，政权机构建立，对于我们当前紧急动员，进行政治攻势，孤立敌人与瓦解敌人，更加显出其作用。因为广大人民群众都已经了

解我党领导的民主政府是真正代表其利益的正统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要我们把这面鲜明伟大的旗帜树立起来，基本群众将欢欣鼓舞来支持这面旗帜，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分子将大胆的靠紧这面旗帜。尤其是反动派残民以逞的各级伪政府的非法组织，在相形之下，更加显出其丑恶状态，敌人将更加慌张、混乱、分化以至加速其灭亡。

第三，政权机构建立后，更有利于领导与组织人民自己力量去进行人民需要的救济灾荒、互助合作以及各种生产建设工作，并成为军队的强大后援与直接配合作战。

紧急动员迎接胜利的指示，已经规定各县于五月内建立区、乡、村各级政府。兹颁发区、乡村各级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这个条例是政权建设工作步骤的第一阶段的办法，希各按照这个条例去组织政府机关。每个单位只要有一、二个基本干部，就可以建立政府机关。缺额的以后逐渐补充。我区今天仍然处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所以我们的政权不能不是打起包袱随时跑路，带了地方武装或武工队打游击的政权，所以政权工作人员最好是能领导地武、民兵对敌作战的，最低限度是能挨得起游击活动艰苦、坚持为人民办事的。又为了保证这个政权是掌握革命人民的手中，所以当基本群众还未发动起来之前，由上而下实行委派，将来才逐步进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也是必要的。因此敌伪统治地区，我们的政权工作人员可以由部队首长，武工队长地工组长兼任，公开发表其民主政府的职位名义以资号召。在干部配备上，要确实保证这个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政府，而且善于团结各民主阶层的广泛人民群众的新民主政府，因此决定：
①一般的区委书记担任区长兼区大队政委，如有适当的区委可担任区长的，区委书记只担任区大队政委；②区委军事干部兼区大队长及区政府军事股长；③区委粮食、经济干部担任财粮股股长，如区委会全无此项干部，以适当的党员干部充任；④如有地方进步人士可担任区长以利号召时，区委书记担任副区长兼区大队政委；⑤副区长一职如缺乏适当干部，同时没有地方进步人士可充任，则暂缺；⑥一般的乡长兼乡中队长，如因特殊情形乡长政治上软弱时，另由得力干部充任乡中队长。除上述五点外，其他关于干部配备，由各县、各区依据具

体情况处理。

其次，各区、乡政府成立时，应很好出布告，进行政治攻势（布告格式内容已分发），并作普遍宣传，能开群众大会的最好，不能开大会的开小会或个别谈话访问。配合反三征、反暴行工作，宣传新民主政府的政策（即华南人民武装当前行动纲领）与新民主政府对各阶层的态度，宣传反动政府的非法组织即将完全灭亡等等。

又次，我们所成立的民主政权机构，今天的中心工作必须是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深入地发动并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如反三征、反暴行以至秋收后的减租减息），从切实为群众解除痛苦、为人民服务当中，动员人力、物力帮助军队支援战争。围绕这一中心工作来进行的工作才是当急之务，不要过早就把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当为首要的工作，忘记了我们今天主要的努力是打胜仗、消灭敌人。

最后，对反动派下级乡、保、甲长如何处理的问题：①在我占优势的地区，应着令其移交，不许他们公布与施行伪令。根据我们需要，可以暂时许他们树空招牌，无需要则空招牌也取消之；②在敌我相持的地区，暂成两重政权状态，争取他们中立，不干涉我们工作。如他们中，谁敢坚决抗拒，就坚决地打击谁；③在敌占优势的地区，我政府仍要成立，要出布告，但工作方法是秘密活动，伪保、甲长如为我控制，暂以加委，要他们完成一定的任务，如征粮、送情报等等（参考“怎样做政府工作”第二项）。

这个工作在本地区才正式开始，经验少，除尽可能收集材料供给各县参考外，希各县要有专人负责领导，切实研究改进工作。（以下有十五字看不清——编者）等等，从实际工作中创造经验，把这个工作搞好，同时并于新历六月底以前把初期建政工作的经过及经验详细报告上来。

中国共产党十万山区地委
公元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
（旧历四月十八日）发

中共粤桂南边区地委

关于目前本区形势与今后方针的决议

(1949年5月15日)

我们完全同意分局对当前形势和方针任务的具体指示，并根据本区实际情况决定执行方针与具体工作如下：

甲、本区目前形势发展特点

一、大军渡江后，形势发展对我空前有利，在廉江到处闻见群众谈胜利，谈翻身，有些乡村圩镇召开庆祝大军渡江及南京解放大会，群众舞手舞脚，欢呼雀跃，有一条村男女老少千余人参加开会，圩镇燃烧爆竹，拍手共庆。参军热潮高涨，其区队一天四十多人参军。劳军热烈，捐款捐粮，很为兴奋。春荒缺粮，群众蜂拥而至，包围富户，各县群众普遍要求破仓分粮，停止三征和苛捐杂税，蠢蠢欲动，要求斗争。犹疑不决中立分子，大胆靠拢，积极起来。反动头子多谋搭线，图以宽罪，或畏罪潜逃和准备出走。敌伪惊慌，放弃小据点，重点防御大城市，敌占区缩小，给养困难，士气低落，逃亡日多，日夜戒严，自相惊扰，议论纷纷，准备解放军到来谋以脱罪。这种情形虽然初起于局部后方，当普遍发展到全面，且发展过程可能是急趋直下的。

二、我们迎接胜利的暂时困难是什么呢？主要是干部不足，经验缺乏，今广大地区群众渴望着我去工作，有利条件很多，无法派干部，许多干部要走向正规化，不知从何下手，加以三种地区三种不同群众基础，廉江老区群众斗争虽已普遍发动，尚未能有计划有组织领导群众斗争提高到群众自觉的以自己力量去解放自己，化、吴、梅恢复区群众基础薄弱，且带着观望等待心理，博陆新区我之政治影响尚少，并未有在群众中生根。敌人实力不足，没有全面进攻我们的力量可以

定论，但敌人节节抵抗，分散保存的决心尚未死亡，如伪府撤回广州，广东敌人大喊招兵买马，声言抵抗到底，李、白飞返桂林，粤桂相谋妥协，五属特务嚣张，南路敌人局部扫荡，筑堡驻防依然继续。因此，我区地处于玉、港、高敌人三大据点之间，敌人是不容易放弃。且我们斗争发展不平衡，除南有雷州依托外，其他各方面都是突出，在我们行动之际，敌人重点的新的联合围剿是有可能的。但是只要我们政策不犯错误，是可以打开局面的，干部是可以大批培养，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群众生根工作，只是搞通干部思想，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有充分条件，一定能够克服这个暂时的困难。

三、今天我们要在原基础上稳健地胜利前进，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产生：一是反对对〔因〕胜利形势而冲昏头脑，脚不踏实地，左冲右撞，麻木不仁，招致不必要的困难和挫折；一是反对强调困难，坐待外援，消极自馁思想，不敢起来斗争，不敢坚持斗争，不敢迎接新的形势到来。目前来说廉江以反对前者为主。化、吴、博、陆以反对后者为主。

乙、今后方针任务

A. 根据上述形势和实现分局重点巩固，全面发展，准备胜利方针，本区斗争方针应该是：提高廉江，恢复吴、化，打开博、陆，开辟郁〔玉〕（林）、北（流）、容（县）、茂（名）边。逐步形成边区根据地。贯彻这个方针于几种不同地区有几种不同做法：

一、提高廉江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向正规化走，坚决肃清一切乡、保散匪，压缩敌人于廉、安两大据点。如敌之主力调走，争取解放这两大城镇，使廉江成为边区初步根据地。

二、吴、化以廉东南为基地，积极发展武装，加紧准备，配合主力扫荡敌之据点，恢复前年武装斗争的控制局面。一面自力更生，一面主力配合，坚持斗争以前者为主。

三、博、陆方面先搞博南、陆南，后打博北、陆北，组织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从小规模游击战发展至全面控制，稳健地有步骤的前进。

四、郁〔玉〕、北、容、茂边采取武工队及徒手队分散发展农村基础，准备力量，发动武装斗争。完成这个方针的重心，应该是依靠

农村，依靠下层基础，大胆发动武装斗争，采取积极的军事的政治的攻势，灵活和正确运用统战策略，争取上层，瓦解敌人，孤立敌人，利于我们缩小打击面，重点进攻，否则，局面打不开，甚至遭受失败的。

B. 当前具体工作：

一、武装斗争：

(一) 关于解决发展武装斗争、坚持武装斗争思想上几个问题：

1. 提高武装斗争雄心，肃清消极自馁思想。由于过去武装斗争失败经验所影响，目前党内有些党员干部强调困难，等待外援，无武装斗争兴趣，降低了搞武装的雄心，部队同志怕辛苦，喜欢返后方去，这些思想在吴、化某些党员干部中相当浓厚的存在着。今天我们要彻底认清过去武装斗争失败的是非，敢于迎接有利形势，大家动员起来参加武斗，领导武斗，支援武斗，号召好党员、好干部到部队去。

2. 克服单纯军事观点，专要武装，不要群众，以枪杆子打天下，不要统战策略，多树敌人，以武装代替一切，不要群众工作，不要党的生根工作，使武装脱离群众，变成孤立，局面垮了，武装斗争失败。过去吴、化、合、灵、兴、业等地武装斗争失败，就是严重地违犯了这个错误。

3. 学习遂、廉武斗经验，遂、廉武斗与单纯军事观点者相反，他不是以武斗代替一切，有群众工作，有党的生根工作，也有统战策略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是样样都做得很好，而且初期也犯过一些扩大打击面，多树敌人的错误，好在他们早点转变过来。他们的基本思想是以从武装与群众相结合的观点出发去发展武装的，因此，他们几年来的武装能够发展、巩固和胜利地坚持壮大了自己。

(二) 重点整军，全面发展，在目前来说是以发展为主。

1. 建立地委主力问题：原地委主力区党委拟抽调，地委应该重组新的主力，今后廉江为主，抽调区队三百五十人以上，博、陆各二十人，化、吴共二十人，成立一个四百人以上的小团，番号为第一团，钟永月任政委，三叔任团长，杨君池、何朝玉分任副团长，拟以江洪为政治处主任。

2. 部队发展番号及干部配备问题：

(1) 地委成立支队，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第一支队，政委和司令员由高、黄兼任，支队下暂建四个团，每团人数三百人以上，限于三个月内成立起来，廉江第一团（即现地委主力团），吴、化第二团，博、白第三团，陆州新一团，各团政委、团长如没有适当人选时，暂由各县委书记兼任，委任副政委、副团长或参谋长负实际责任。

(2) 各团成立后，暂留本县活动，给养由各县自筹，团抽调集中于支队司令部后，即成立县大队为县主力，县建县大队，区建区中队，乡建乡分队，村建民兵基干队，各队人数若干，看当时具体情况决定。这些都是属于脱离生产部队，均按支队司令部颁布生活制度及工作制度教养。而民兵则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民兵以三至四大队为一总队，三至四中队为一大队，三至四分队为一中队，分队以下建民兵小组。目前廉江应逐村逐乡普遍组织半公开或公开民兵，起用留存的一切旧枪、土炮武装民兵，化、吴、博、陆暂采取秘密形式普遍组织地下军，加强教育和活动，逐步提高到公开民兵。

(3) 团营连级干部，分别由各县委介绍，报告地委听候批准加委。

3. 作战方针与战术问题：

我们部队要打开歼灭仗不容易，但必须坚决学习，由打小歼灭仗到打大歼灭仗。反对打无把握的大仗、消耗仗。目前地委主力主要是打县自卫队，坚决肃清乡、保散匪，摧毁乡、保政权，打击分散敌之小主力的扫荡部队，保护群众利益，巩固我区。各县主力主要是打乡、保队及少数下乡催征的县兵，配合群众反三征斗争，民兵则展开地雷战、麻雀战、破坏战、骚扰战，牵制敌人，配合主力斗争。

4. 军事行动方向问题：本区以打开吴、化、博、陆为整个战略方针，应该在主力帮助下，积极行动。根据现在情况，可先搞化、吴，再搞博、陆，如将来情况变化，则可改变方向，化、吴、博、陆可以吃的敌据点，地方部队可以去吃，不必等待主力。但无论化、吴、博、陆，今天均须作准备工作，配合主力行动，局面不是一次打得开，而是应采取多次反复的方法，逐步消灭敌人。

5. 部队教育问题：

展开诉苦运动，提高部队阶级觉悟，勇于承认错误，敢于战斗，部队到那里应成为工作队，展开爱民工作，加强爱民教育。至于对政权观点也应在部队里纠正，培养拥政观点，尊重政权，部队应成为执行政府法令和协助完成政府法令模范者。

二、群众斗争：

(一) 革命为了谁？依靠谁？我们做群众工作，首先要建立正确观点。我们革命是为了无产者与半无产者，依靠无产者与半无产者，在城市是依靠工人，在农村是依靠雇农、贫农、中农，贫雇、中农就是我们的农村中基本群众，争取地富是我们的革命策略。因此，我们应该全心全意为基本群众解决切身问题，绝对不能侵犯其丝毫利益，或存在着任何私人观点。目前我们有些同志为自己衣食住行，为帮助群众做事求得报酬，为求成绩向上级报销，为个人出风头特权统治，为实行军阀统治而拖群众落水强迫革命。又有些同志实行恩赐革命，不是依靠群众以自己力量去解决自己问题（如廉江双减斗争大部分是恩赐观点），只会争取中上层利于工作开展，忽视保护群众利益，在下层中生根，分不清谁是基本群众，谁是群众的敌人，只是心血来潮看人情面办事，这些都是严重错误的不为群众不依靠群众的观点和做法，全党同志应该勇敢起来承认错误，纠正错误，否则群众是不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的。

(二) 群众工作方法问题：群众工作有四个基本方法，即是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为群众解决切身问题，培养群众骨干问题。这四个基本方法是以解决群众切身问题为主，但它四者是贯彻在一起，不能孤立进行，稍有偏向，群众工作是不能做得好的。我们有些同志重教育群众工作，有些同志重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两者都是偏向，不能从群众斗争中去提高群众觉悟到以自己力量解放自己，积极分子不能成为革命的柱石。

(三) 目前发展方针与组织形式问题：全面发展工、农、青、妇运动，以农运为主去推动其他运动发展，组织广大群众起来迎接新的形势，支援解放战争。今天本区工作重心仍应放在农村，如果我们抛

弃了农民，一切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在廉江群众组织形式应将各种各样的农民组织形式改为农会，农妇组织改为妇女会，普遍发展农村，城市、学校新青团员。农会限以雇、贫、中农参加，保证领导权掌握在贫雇农的手里。新青团员以工农青年为主，革命知识青年为次。化、吴、博、陆及其他地区，可从吊耕或反“三征”中发展各种各样组织，团结广大群众，组织地富起来反对“三征”。在各种组织中可秘密组织农民为秘密农会，农妇为妇女会，青年为新青团做骨干，保证领导权不移到地富的手上。

(四) 反“三征”及减租减息问题：廉江以减租斗争为主，总结过去双减经验，克服包办、恩赐观点，有计划、有组织去领导提高一步。但在双减斗争中必须注意组织地、富起来联合反对“三征”，化、吴、博、陆则着重反“三征”，主要方法是拖、走、吓、打四种，以武装斗争配合进行，分别基础，有计划地突破一点，推动其他，逐步提高群众斗争要求，准备好双减的条件。

(五) 解决春荒问题：

1. 动员全党在思想上重视解决春荒问题，列为工作成绩考查之一。
2. 方法方式：(1) 坚决领导反“三征”，减轻群众负担。(2) 设法流通借贷，必要时组织群众包围富户借粮，组织各种副业生产。(3) 动员全党、全军实行节约，减少开支。(4) 全面布置，突破一点，总结经验。

(六) 统线工作：总结廉江统线工作经验，成为全党的教育材料，利用今天胜利形势，大力展开政治攻势，瓦解分化胁从者，孤立首恶者，大胆发动群众，组织一切可能联合的社会力量向敌人积极进攻。

三、政权工作：

(一) 纠正对政权的错误观点及关系：

1. 部队应开展拥政教育，成为尊重政权，执行政府法令的模范，政权系统工作人员保证部队给养及运输，并成为实行部队军事措施命令的积极者。

2. 党员应学习领导政权，做政权工作，成为推行政令及遵守法令的模范。而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干部，又必须服从党委与党团

的决议、决定与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

3. 严禁空挂招牌、乱委乱派的作风，确立对人民负责的观点。

4. 树立刻苦耐劳、廉洁从公、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反对骑在群众头上的统治思想。

(二) 关于政权工作的几个基本政策问题：

去年九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政权政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严禁多捉滥捕，乱打乱杀是我们的司法政策；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是我们文化教育政策；宽大俘虏是我们的俘虏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我们的经济政策。今天我们学习领导政权，做政权工作，必须贯彻这些政策到每个行政人员的思想和行动中。

(三) 政权中心任务：1. 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改善群众生活。2. 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参加战争，支援战争。一切坐办公室发号施令的思想是应该反对的。

(四) 各级政权机构及干部配备问题：

本区成立一个行政督察处，正、副主任各一，周斌同志任正主任，副主任缺，下设民、财、教三科，各科长一，科员若干；县成立人民政府，正、副县长各一，下设民、财、教等三科，各科长一，科员二；县以下成立区、乡、村三级政府，区、乡、村长一至二。关于司法方面，县设人民法院，乡设调解委员会，村调解员。县、区、乡长必须是同级党委兼任或党员，副县、区、乡长若没有党员，可容纳进步分子，但各级政府委员中必须保证党员占三分之二，以保证我党领导权。非党员区、乡长可列席同级党委会议讨论政权工作问题。目前廉江委罗培畴、陆振华任正、副县长，各科长及区、乡长由督导主任协同县长介绍，报告地委批准加委，化、吴、博、陆须于下月底由各县委介绍正、副县长人选，报告地委批准，待机成立各县人民政府。

(五) 政权领导问题：党、政不可不分，由各级党委指定专人代表党委领导各级政权工作，但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用党的名义去公

开施政。现政权工作重心在村乡政权的健全与巩固。

(六) 当前具体工作:

1. 解决春荒, 领导双减, 发动群众参军及组织民兵。
2. 配合当前军事斗争, 发展政治攻势, 摧毁敌伪政权, 扩大我政权基础。
3. 改造各乡村小学, 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
4. 发展经济生产, 整理财政, 健全各级财政机构。
5. 建立各级政权机构及行政工作制度 (由督导处拟草工作制度)。
6. 调查研究敌伪政府, 学习、研究接收工作。

四、党务工作:

目前党的工作重心是大量发展党员, 培养干部, 确立制度, 健全组织, 其具体工作如下:

(一) 发展党员问题:

1. 在“不让一个好的分子留在党外, 一个坏的分子混进党内”的方针下, 大胆发展。发展以工农为主, 革命知识分子为次, 对上层分子宁少勿滥。

2. 今后各级党委组织部, 必须加强领导发展工作, 检查督促工作, 总结经验, 纠正偏向。

3. 加强化、吴、梅、博、陆、北、玉发展工作, 廉江基础薄弱的地方亦同。自五月起, 在三个月内, 博、陆发展一倍, 农民占三分之二, 化、吴、梅、茂发展二百五十, 农民占三分之二, 化北在原基础上发展两倍半, 成分亦同, 廉江发展六百, 各区发展均以普遍为主。

(二) 确立制度, 健全组织:

1. 充实各级党委机构:

首先建立组织部、宣传部, 后再建立民运部。地委组织部设干部、组织干事各一, 县委组织部亦然。区委组织部干事一人, 总支委、支委共设组织委员, 宣传部、地委、县委均设对外宣传、对内教育干事各一, 区委宣传部干事一人, 总支委、支委只设宣传委员, 地委、县委民运部未有成立并未有正式成立统一的新青团、妇女会、农会以前, 各县委可成立农委、妇委、新青团, 在常委会领导下工作。县级各

种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若不是县委兼任，则须区级以上干部负责，县委、地委均组织财经小组，统一领导财政经济，区委则组织经管处，主要负责人由各级党委兼任，或忠实党员干部充任，在行政上划归各级政权系统管理，受各级党委领导。至于地方武装及民兵，为利于统一指挥，各县委成立武装部，武装部长由县委兼任。

2. 健全党委制：

(1) 属于大政方针、原则性问题，均须党委决定，但必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不可偏废。会议不可开得太频繁，军队首长在情况紧张时有临机处置之权，然而个人意见和党委意见必须分别说明，不能以个人意见代替党委意见。

(2) 会议制度：地委全体委员会四个月一次，常委会二个月一次；县委全体委员会三个月一次，常委会一个半月一次；区委以下由各县委根据实际情况规定。

(3) 报告检查制度：地委每两个月向区党委作书面报告一次，每四个月作综合性报告一次；县委每两个月向地委作书面报告一次，三个月作综合性报告一次；区委以下由县委自定，报告内容与方法应依照分局决定而执行。地委、县委每三个月至四个月检查所属下级的工作一次，检查应深入支部去，找典型检查，总结经验。

(4) 党日制度：规定部队逢五、逢十，学校星期日为党日，农村支部每十天定一天为党日。党日活动内容主要是上党课，进行自我批评及集体批评，工作会议，学习会议，在党日也可举行，但不能代替了党日，若有妨碍则另定时间举行这两种会议。

(5) 所有党员都过组织生活，缴纳党费，各级首长如不能在同级党委中过组织生活，则同自己保卫员过党日组织生活。

3. 了解当前党内组织情况，由地委组织部负责起草调查提纲，及各县委调查汇报，七月底综合报告区党委。

(三) 宣传教育工作：

1. 党内教育培养干部问题：

(1) 干部训练问题：地委协同廉江县委举办支书训练班、乡政干部训练班，人数若干，看具体情况决定，其教育方针、内容、方法

是：一面总结经验，一面研究文件（文件略），教育方法以讲授为主，引导其思想反省，帮助其总结，使其搅通思想政策，熟练业务。实施详细计划另定。

(2) 在职干部学习问题：

a. 地委、县委、区委学习反无政府、无纪律及党委制（参考材料：“修改党章报告”中“民主集中制”问题，“左倾幼稚病”前言，中央宣传部关于“左倾幼稚病前言的序言”，“反对经验主义”，分局颁发的“职权制度”），时间两个月。各干部可同当地不同级的干部组织学习小组学习，尽可能写笔记，并将讨论结论报告地委。

b. 总支委以下干部学习《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强调其中纪律性问题）。新党员也应进行入党教育，但内容方法由各地自定。

c. 加强农村支部农民党员文化学习，每支部成立学习小组，以识字党员教不识字党员，或吸收识字的进步群众参加，实行互教共学，提高文化水平，若有夜校或识字班，则是更好的方式。

2. 对外宣传问题：

(1) 展开政治攻势：

a. 地委成立出版处，县委成立油印室，大量翻印战争胜利消息、已经解放的敌军的文告及函件、我党领袖关于战争命令、政策等谈话和文告，普遍散发于敌据点及乡村、城市；地方出地方性简报，反映地方斗争情况及工作经验。

b. 支队司令部组织宣传队到各乡村普遍宣传，并发告蒋军官兵书。

c. 动员全党、全军召开庆祝大军渡江及南京解放大会，总结经验，收集材料投寄《人民报》社。

(四) 地区划分及干部配备：（略）

(五) 反对两种领导作风：

1. 反对专在上面兜圈子，不到下面去，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作风。

2. 反对不是总结经验，从实际出发，专搬教条，夸夸其谈的作风。

五、财政经济工作：

(一) 今天本区经济困难，粮食缺乏，已成为极端严重现象。我们应开源节流，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去度过这个难关。反对强调经济困

难，对工作怠工。

(二) 建立各级统收统支的财经机构，每月按级报告，按级检查，不论地方工作与部队工作同志，均按生活制度及收支手续收支，废除乱收乱支的浪费现象。

(三) 关于开源问题：破仓分粮，追收旧粮，借粮，一升米五斤番薯养军运动，收片烟税、廉江各解放圩镇营业税，试办安市营业税。实行全党、全军节约。

(四) 划定县与县、区与区之间收税区域，现在博白应停止到青平收税，陆川停止收河航税，其他地区如何划分再行决定。对于税站人员，应加紧政治教育，每站设专人管理党政工作，扫除贪污腐化及违反税收政策的现象。

粤桂南边区地委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

南路人民拥军热（南路解放区报道之五）

（1949年5月16日）

要是有人问：这一个华南最早建立起来的平原游击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在敌人南路统治中心湛江市的旁边没有广大回旋余地的半岛上开创、生根，并且今天已逐渐向解放区的规模发展的？我们可以很快的回答他：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张、政策，已经完全为高雷广大人民所接受、所拥护，而日益积极起来为实现它而斗争了。

远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抗会”，就动员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里面绝大部分已经是中共党员）深入到雷州农村去，穿破布衣，打赤脚，喝红薯汤，做田工，整天整夜汗水淋漓，和农民同餐共宿，替农民排难解纷，帮农民耕田挑粪，教农民读书识字，以后又领导农民反三征，破仓分粮，减租减息，清算恶霸，为农民做了不少好事，因而在农民中建立了牢不可拔的坚强威信，到现在已整整十一年。十一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政策早已为农民所接受，变成沛然莫之能御的物质力量，因而能够紧紧的以乡村包围了广州湾；能够在华南每次革命高潮到来时率先发动和恢复武装斗争；能够在形势逆转时坚持斗争，抵抗敌人的压迫与摧残；更能够以自己的主力三次远征，帮助了今天滇黔桂边区、十万大山和粤中区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今年四月一日给粤桂边区的祝捷电中说：“继去年南路主力东征、西进之后，你们坚持斗争，今春又展开雷州半岛及粤桂边缘各地的新局面，军威远播，光芒四射，甚可欣慰。”这是南路人民的光荣，而今天，当大军渡江南来，全国即将彻底解放的时候，南路人民是更加热烈的拥政拥军，支持解放战争了。

在以往最艰难的日子里

在以往最艰难的日子里（当然这些日子在南路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南路的人民曾经倾尽自己的所有，甚至以自己的性命来爱护、保卫革命的力量。比方在日本投降之后的撤退时期，自己的武装活动停止了，税收也没有了，数目庞大的武装人员和地下人员全部掩蔽起来，他们睡在树林里、蔗地上，靠着人民的侦察和维护，他们躲过了敌人的围捕，深更半夜里，人民自己吃红薯汤而让出白米饭来送给同志们吃。这样继续了一年多，直至恢复武装斗争。

又比方，有一个女同志掩蔽在一个农民家里，敌人来围村，一定要逮捕她，那个农妇站出来硬从敌人手中把这位女同志拉回来说：“她是我的媳妇。”而指着她自己的真媳妇说：“她是外村人我不认识她，你们认为有嫌疑拉去枪毙吧！”她的媳妇也就泰然自若承认是来探亲的外村人因而被捕。

又比方，有一次敌人包围了一条二千余人的大村子，把村子赶到禾塘上（广场），架起轻机逼迫村中人指出谁是共产党党员，二千多男女老幼竟没有一个说出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和解放军战士的姓名来，最后村中父老说：“我们都是老百姓，你们要抓一起抓去，共产党是一个也抓不到的。”敌人无可奈何只得撤走了，其实那一次共产党和解放军战士一共有三十多人杂在这二千多村民中。

在雷州平原上，既无大森林，又没大山岭，人烟稠密，交通方便，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即使白天大摇大摆行军，十里路外的敌人只要不是他们亲自看见，便无法知道我们的情形；相反，我们却对敌人的情形了如指掌，打过不少次漂亮的歼灭战，这些都因为有人民替我们封锁了消息，而又替我们侦察敌情的缘故。

全力支持解放战争

雷州半岛是一个冲积平原，除半岛中部有一条脊椎似的小丘陵是粘土（他们叫“坭地”）地带外，其他地区尽是沙土（他们叫“沙地”），因而杂粮的出产就成为每年作物收获的大宗，蕃薯、粟、玉

蜀黍、芋头等，成为民众的主要粮食，但是人民认识到解放军是在为人民打天下，因此宁可自己苦一个时候，在合理负担的原则下，热烈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尽先交出军粮。去年雷州丰收，遂溪、廉江两县就各征得××××担粮，海康、徐闻两县的局面今年春才全部打开，但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也征足了××××担，由于人民对民主政府的信仰与拥护，我们的征粮工作一直开展到湛江市郊。有许多群众自动捐粮出来，因为他们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已免除了国民党的三征暴政，他们有能力担负这些军粮，何况今春以来解放军拔除雷州各个反动乡公所据点，打开谷仓，缴得六千余担谷子，又绝大部分都分给群众担去，“解放军这样照顾我们，我们是一定要帮助解放军的”。

人民对于解放军一切战争勤务是热烈参加的，运输、交通、向导，只要部队或政府一提出号召，无不踊跃参加，政府和军队为了照顾群众的利益，比较长时间的战勤工作，也订定制度发给一定的报酬。保十起义后，陈一林团长在写给解放军的第一封信里就提到缴有大批物质，希望能动员六百民夫搬运，结果不到半天功夫，竟动员了千多人，站得遂溪城外满山遍野都是，保十起义官兵感动地说：“过去我们要请夫抓夫，几天都还不足几十人，你们一声号召啦！——就是千几百人，真太得民心了。”

这是人民的战争哟！

参军热潮

今年春季，南路解放军分头向海、徐和廉、化进军，不到三个月打开了三倍于往昔的地区，解放了四十多万人口，于是一个热烈的扩军运动开始了。

在遂△区，过去因为靠近湛江，敌人压力大，扩军工作不容易展开，但今年不同了，在一声号召之下，短短的一个月内，竟有×××人前来参军；遂△△区也在同一个时间内发展至×××人，成为遂溪护军的模范区。在海康、徐闻动员起来的民兵数以千计，他们自己拿出武器来使用，不够时，也暂时用鸟枪、土枪，“以后向敌人要七九！”在廉、化各地，今年以来也扩军××××人，广西的博白、陆川各县

也纷纷动员起来了。

今春，在徐闻发生了夫妻参军的佳话：

有一天，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农妇突然跑到×团团部来要求参军，我军政治处人员问他：“有没有人介绍？”她说：“没有。”“没有人介绍我们是不能乱收的，况且，你又是一个女的。”我们工作人员说。“怎么？女的就不能革命？没有人介绍，我就请你介绍！”她理直气壮的说。我们工作人员大吃一惊，转而向她解释：“不是不要你参军，实在不明白你的身份，你要坦白说是不是和你丈夫吵了架？”“没有吵架，我要参加解放军。”“那末，好，我和你去看你丈夫，如果他答应，我们就答应，他不答应，我们也不能答应。”于是我们去找她的丈夫，那晓得他的丈夫竟一口答应了，而且说：“她是因为晓得我要参加解放军才先跑来的，报名应该我在先。”现在他们夫妻两个都在解放军中工作得很好；一个当战士，一个在医务所学看护。在南路人民队伍中父子、兄弟、夫妻、叔侄乃至祖孙同在部队中的很多。

另外在廉江县△△村，有一次主力部队在那边驻了一夜，第二天离村时，竟有八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跟了出来，跟着部队要参军。经女同志再三劝说，大吵大闹的不肯回去，直跟了几天，打了几仗，她们不惊也不走。以后主力队伍把她们交给地方队伍去处理，但那里晚上地方队伍转移时，她们没跟去，又跟上主力部队了。直跟了十几天，经过再三说服后，才由交通送她们回去参加地方工作。

人民就这末痴情热爱自己的队伍的。

劳军运动

人民的赏罚标准是十分明确的，对于打胜仗的为人民立功的队伍，人民会节衣缩食省出钱来买慰劳品犒劳。

保十起义投入解放军后，南路人民因为他们在立功赎罪的第一个行动中，就打死南路人民最凶恶的刽子手张君嵩和邓伯涵等人，有功应赏。当起义部队开进解放区后方时，沿途民众自动筹集慰劳品来慰劳，生猪、烧猪、青菜、萝卜、片糖、鸡鸭等不计其数。有一个区的

群众，原以为起义队伍会经过他们镇上，早两天就筹好了猪五只、青菜、大蒜、萝卜堆积如山。后来知道并不经过他们那边，就派了代表，拿了慰劳信，挑了一担糖，赶了七十里追上来表示他们的盛意。另一条村子有一位农妇竟集合了三十几个小孩，烧着鞭炮，打着锣鼓来慰问陈一林将军，并热烈的说：“好了，现在你们回来，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新△团此次向海、徐进军，更得到人民的热烈慰问，猪肉、鱼足足吃了几个月。虽经部队一再坚辞，但人民说：“这是我们的微意，你们不接受就看不起我们”。

今年春，海、徐人民发动劳军运动，短短的十多天，就捐了一千五百对胶鞋。今年的春装他们又在积极替部队筹措了。

今年三月，南路部队于春季攻势收到伟大战果后，在廉江某地举行了一个×千多人的祝捷大会，庆祝春季攻势的胜利，并宣誓要加紧战斗，创造更大的战绩来迎接大军渡江。大会中有军政干部训练团的女同志代表全团向军政首长们和战斗英雄们献花，更有附近的群众吹吹打打，抬着猪羊，烧着鞭炮前来慰劳。慰劳团的代表是一个农民，他走到台上去，用朴素的语言，述说他们的心情和愿望，他说：“自从解放军解放这里以后，我们已不受国民党的三征剥削了，现在解放军又差不多解放了整个廉江县，使廉江三十万人都翻了身，但是我们还要努力，消灭所有反动武装，使全体农民都能丰衣足食！”

南路人民对春节是十分重视的，饮灯酒可以从正月半一直饮到三月中。今年的春节特别热闹，原因是人民生活普遍有了改善，遂溪各乡村学校学生都普遍增加，于是全体地工人员成了人民饮灯酒不可或缺的上宾，在酒阑席散以后，这些朴实的农民，会向工作人员述说他们在民主政权的保护和帮助下，如何开始改善了生活。东海岛上的人民更募集了几千个年糕和粽粿，渡海过大陆，用牛车拖到遂溪△区来劳军。路上走了四五天，那时天气又暖和，有一部份已经发酵了，但发酵的粽粿仍是好吃的，人民的子弟兵全部接纳了人民的盛意。

出头的日子到了

这些可爱的人民，自有革命以来就出人、出枪、出钱、出粮，还拿出全部心意来支持斗争。现在他们看到全国解放在即，回顾以往艰难的日子，再看看被烧杀的村庄，他们喟然感叹的说：“多艰难呵！但是我们终于胜利了，出头的日子到了。”

五月 日 南路

(原载《群众》第125期，1949年6月16日)

周楠致中央统战部、港分局电

——敌向我进攻及我之布置

(1949年5月30日)

中央统战部、港分局：

一、敌打垮万宝邦主力后，即集结八个团于滇越路（开远至宜良间），滇黔公路（曲靖、沾益）线上与盘县、兴义间，主要是二十六军部份黔保安团，对滇东地区作包围形势，四月底开始进攻，占我弥勒、路南两县。当我滇东南主力向滇东推进，曾在渡盘江之际，敌以两个团兵力向澜西及盘江北岸进犯，企图阻我过江。现卢西城被占，但我主力已大部过江，敌有继续进犯模样。卢汉亦集结三个保安团于宜良，出动对我进攻。我决定：

1. 集结三个主力团于罗平一带，与地方武装结合，待机歼敌，或选择目标出击，争取几天时间休整部队。

2. 加强滇东北、滇中、滇东南各个地区的活动，对敌进攻配合作战。

3. 加强敌占领区地方部队的游击战，困扰敌人，并派出精干武工队到敌交通线上活动。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与坚壁清野。

4. 展开对敌宣传瓦解，敌曾有滇保十一团副营长朱朝相在陆良起义，携来重机一挺，轻机六挺，步枪百三十支。

5. 如敌力量较我强大，逐步包围时，则以一部坚持基本地区，大部转出外围向滇中或其他方面发展，威胁敌后，粉碎敌攻势。

二、我主力团在盘江南岸师宗境内拔除敌据点，高粱大恶霸何廷珍全部被歼，缴获甚多，在清查中。

三、李明尚未到，庄、郑曾于卯寒派郭兆华赴港，未到，余明已

从右江来此。。

周楠

辰陷（5月30日）

① 中央军委已齐复电：“周楠并告方方、林平：周辰陷电部署，是好的。请即遵照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方针。选中向你们进攻之孤立或较弱小之敌（如云南、贵州的保安团），逐次消灭他一路或两路，形势即可求得改变。但须转告全体同志，在蒋桂残敌企图负隅西南与解放大军尚未向云贵进军之前，务须作艰苦斗争的准备。万保邦部如何被打塌的，请查告。”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茂电信

两阳指挥部告粤桂边区民众书

(1949年5月)

亲爱的同胞们：

蒋介石独裁政府快倒台了，老百姓翻身的日子就要到来。

今天由于蒋介石勾引美国打内战，被共军打死八十万几，他知道死期将到了。国民党政府在南路更加反动，他硬要征兵捉人，拉去前线送死；他硬要征粮，交迟一点就咪妈鬼叫；捉人去坐监；他硬要征地税，一元地税收八斗，又要征苛捐杂税，百姓割只牛要几万，割只猪仔也要万几。再加上贪官污吏，到处包烟包赌包娼，敲榨百姓，使老百姓有得食冇得着，个个欠一身债。还有最坏蛋的就是反动派在粤桂边区所谓“清乡反共”不过是到处拉人揭钱，杀人放火，捉猪拉牛，抢劫物资，奸淫妇女，乘机发财，涨饱荷包，而且把善良百姓和爱国人士当作“土匪”，随意捉去杀头，总想把一切好人杀了，这是什么道理，还成什么世界？

同胞们！蒋政府这样黑暗，还留他做什么？快把他丢到屎坑里去，现在你们只有一条生路，就是：不论富贵贫农，不论男女老幼，大家都要一齐起来反对征兵，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誓死不当蒋介石的兵，如果已经去当兵的，就快叫他返来，并且调过枪口对准蒋介石打去。一农民要反对征粮，一粒谷也不应交给蒋介石拿来打内战，商人要反对苛捐杂税，不应用血汗赚来的钱，送给狗官享世界，地主也要反对征地税，不应把地税谷养肥蒋政府那帮卖国贼！

同胞们！蒋政府黑暗腐败，不得民心，一定倒台，共产党一定胜利。如果你们想要好世界，只有帮助共产党，参加红军。因为共产党

救国救民，人人皆知，而且在华北解放区已经分田地给穷人，借钱给穷人买耕牛、买肥料、买种子，使老百姓有田耕，有饭吃，有衫着，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

赶快团结起来啊！不要等待，不要害怕，因为等待害怕是死路，我军誓死保护你们，替穷人打天下，同时和你们一起反对征兵，反对征粮，反对苛捐杂税，反对专制独裁，成立人民政府，实行民主，减租减息，解除人民痛苦，使人民丰衣足食过着快乐的日子！

反对征兵征粮，废除苛捐杂税！

联合国民党内爱国人士打倒反动派！

粤桂边区人民团结万岁！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胜利万岁！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茂电信两阳指挥部印

中共十万山区地委关于 怎样做农会工作的指示

(1949年5月)

一、搭架子

在没有开始进行农会组织工作的新区域，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有了一些委员，但人数不多，只有几个人，因此先行成立筹备委员会，挂起农民协会的招牌。在那里负责领导的工作同志，可以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名义，进行宣传教育农民，吸收会员与准备正式成立农会。

二、教育与发展会员

我们要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吸收积极分子为农会会员。这一件事，决不是空口说白话，决不是说一大套道理就办得好的，一定要在那个地方，为解决农民切身利益而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去教育与发展会员，把农会组织起来，才是有血有肉的生动东西。因为只有在斗争中进行教育才能深入，才容易发现真正纯洁的积极分子，也才容易发现投机流氓分子而加以洗刷。

教育与发展农会会员，首先要特别注意贫雇农，不仅要尽量在贫雇农中间教育与吸收会员，而且要尽量在他们中培养与提拔干部，以便造成农会的领导成份纯洁而坚强，即是贫雇农占优势。但同时对中农也要积极加以教育与团结他们，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农会。

通常在解决农民切身利益的某一个运动中大量发展会员。例如，在减租斗争中或解决春荒斗争中，教育与发展大批会员，然后在不断的各个运动中来考验与洗刷坏分子，进行巩固工作以及再进一步发展。例如在对敌武装斗争或参军运动中来教育农民，考验会员。在这种运动中，很容易发现不坚强的或坏分子，而真正优秀的积极分子也就

显出来了。因此，进行调整农会组织，把坏的分子撤换与洗刷，把优秀的提到农会委员会去。

农会教育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下列几点：

第一，关于农民的惨痛苦难的根源。要使大家知道农民所有苦难，根本是数千年来封建地主剥削制度所造成，要大家知道一切苦难不是“八字”、“天命”所决定。

第二，关于团结与组织的重要性。要大家都知道：农民要翻身，一定依靠农民自己团结一致，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可以获得胜利，决不依赖人民政府与人民军队的恩赐施舍。同时有组织的力量可以使原有的力量增加若干倍力量。

第三，关于农民今天的切身利益与明天的远大利益的关系的说明教育。要使大家为今天的切身利益而斗争，更加要积极为明天远大利益而斗争，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

第四，农民解放运动必须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走上正确方向以至获得完全胜利。没有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是不可能的。

第五，关于各个阶级的政治军事形势的传达与教育。使大家认识远大前途与坚定胜利信心，鼓舞斗争情绪，不致因一时困难而悲观失望。

第六，对于会员特别对农会干部，必须侧重阶级分析的教育，分清农民中的各阶层，认清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关系。

三、正式成立农会

在一个地区只要有了会员三十人左右，就应该召开会员大会正式成立农会，正式成立农会的工作包括下面几项：

(一) 首先开筹备会议，解决下列问题：

1. 讨论决定开会时间地点；
2. 讨论并确定候选名单；
3. 讨论决定大会中讨论节目，根据当前重要工作来提出，例如发展会员任务，解决谷种或减租问题，动员参军与支援前线问题。

(二) 成立大会内容与程序如下：

- 1 推选大会主席团；
- 2 筹备会报告筹备经过；
3. 讨论事项（包括筹备会预定节目与会员提出的问题）；
4. 选举委员会与正副主席，其选举过程：
 - (1) 选举监票人与数票人；
 - (2) 提出并讨论候选人名单；
 - (3) 正式投票（不会写票的情况下，实行豆选），选举委员与正副主席。
5. 当选的委员会开小会分工后，即举行宣誓就职与宣告农会正式成立。

四、整理与改造农会

在已经有农会组织的地区，必须对那些只有空招牌而毫无工作表现的，领导成份不纯的农会加以整理和改造。而对于那些比较上了轨道的农会，也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提高、充实。在整理与改造的进程中，必须采取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检举清查的办法，把冒充劳动农民的地主、富农同坏蛋分子清除出会，并经过政治动员和民主选举方式，把贫雇农的积极分子选到委员会中去，以保证农会掌握在贫雇农手上，但同时注意到团结与吸收中农的积极分子参加。

五、农会的基本工作任务

（一）减租减息与分配土地。从削弱封建剥削制度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这任务主要是为了劳动农民，同时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力量来实现，决不是恩赐的。在我们华南地区，一、二年内还是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削弱封建势力，动员组织农民力量。因此，在人民政府宣布实行减租减息办法后，农会应该经常的把减租减息作为农会本身首要工作，而农会主要是为了这件事而组织而斗争的。

（二）生产运动与劳动合作。组织减租减息或分配土地的直接目的，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因为没有农业生产大发展，农民生活是不可能进一步改善，以达到丰衣足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发展农业生产，以便为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奠定基础。这样农民以及整

个人民大众的远大利益，完满的自由幸福生活才能获得。

(三) 动员参军，组织武装，发动支援前线。为保卫农民斗争的果实，农民必须武装起来，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军队。还要知道，农民是人民军队的主要来源，没有广大觉悟的农民群众参军，整个革命斗争是不可能长期坚持的，所以农会必须把这件事为农会基本工作之一。

六、农会委员会的经常业务：

- (一) 会员的征收与登记统计；
- (二) 会员的组织与教育；
- (三) 收会费与处理会费；
- (四) 调查土地关系与阶级变化情况；
- (五) 掌握各个季节的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工作方针与计划；
- (六) 兴修水利、建筑堤坝、开垦荒地的设计；
- (七) 了解农村生产情况，研究生产办法与劳动互助等等；
- (八) 会员的婚、嫁、疾病、丧葬等事情的互助解决（如募集公积金、供月会等）；
- (九) 各种斗争的组织与总结；
- (十) 动员农民参军与发动支援前线。

粤桂边区第三支队政治部发
公元一九四九年新历七月一日

神州照希关于敌情侦察报告

(1949年5、9月) ①

一、敌驻军地点：

(一) 第二连李锦新部现驻县府（其营房在东侧之林家祠）人数约八十名，配日式旧机一挺，捷克轻机一挺，日式65步枪二十五支，旧式七九步枪约四十支，汤姆生冲锋枪一挺。

同一个营地却分两处，一为县府，一为林家祠（如附图），县府之形势，南为正门，临县前街，北为后园，与K党部大楼相对。K党部现为阳春自卫总队部之办公处，晚上，伪自己副总队长陈承德在此住宿，经常驻兵一班，现由第二连士兵负责，县府后园有楼门通民众会场，由此与K党部联络是很容易的。东北角为镇小操场及中山公园，直抵环城东路及环城北路，环城路之东北角有炮楼，可控制近郊，更远一点的，则为螭螃岗，经常派兵一班（现由第二连负责）驻守。这一处的作用颇大，它是龙船庙和县府之间的联络据点。县府东翼的林家祠，与县府相通，为第二连之营房，经常都是用它做士兵宿舍。

1. 构造：县府之四周均有围墙，东南之围墙靠紧林家祠，县府把围墙洞穿开一门口，与林家祠相通，因此，东面之围墙应分两部来剖析它。林家祠之围墙较坚固，更因有林家祠为辅翼，故由此进攻是不易的，靠近民众会场演讲台（主席台）的围墙，用不完整的青砖砌成，厚约一尺，但日久失修，从外表看来是岌岌可危的。“主席台”之左右两侧则为土堆，爬上则可控制县府之后园，靠近K党部的土堆“主席台”左的围墙，开一横门。自K党部做了自卫总队部后，这横门日间是开放的，有单哨守望。晚上则关闭，后园之东北角围墙内有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了望哨亭一个，晚上是有兵守望的。西北角之围墙内，也同样有哨亭一个，也有兵守卫。但如果攻占了K党部大楼，则这两个了望哨亭便定会失去作用了。西面之围墙外有土堆一个（现正征民工锄平，工程还未完成），爬上土堆可以控制后园，这个土堆如果由城隍庙侧之小巷冲上去，了望亭及K党部大楼是看不见的，因为这里已成为射击的死角。此西墙外之土堆，恰在城隍庙之后，与围墙之高度相等。西墙靠北一角曾经倾圮，新用灰泥将内砖砌上，这种建筑是无法抵御重机之攻击的。县府后花园之墙，均厚约一尺，为断了的青砖砌成。县府之前门，面对县前街，有铁闸一道，晚上则关上，紧急时亦如是。前门之防御全靠环城路之张家祠，有路可以通入县前街；其次就靠的四个木闸，有事时及夜间则将木闸关上派兵警戒，戒严时亦如是。

2. 营房附近交通路线（如附图），环城南路之张家及黄家祠之间，有一小巷可通县前街，张家祠之东侧亦有一小巷可通县前街，此为县府南面之交通小道，是与张家祠、黄家祠两线相通的。县府北面为县背街，可通公园及环城北路，及与K党部大楼据点相犄角，县府后园之东北角围墙有一横门，可出民众会场，东面兵房之林家祠，有一小门通出林屋巷。林家祠之前为烂屋之屋地，有高墙相隔，其墙为青砖砌成，厚约八寸。攻破了这面照壁墙，可以用机枪指向兵房。县府、张家祠、黄家祠三驻地，均以环城路四个角之炮楼为巩固点。但攻破了这四个炮楼，还有许多小巷，除附图指出之哨岗掩体外，其巷口闸门亦可利用作为射击掩蔽。此等交通路线之障碍物，亦应注意及之。

3. 敌人的生活规律：驻县府的，每晨五时许在后园内操练，从口令了解他，似为新兵训练基本动作，至六时许则分发勤务。上午八时早餐，下午四时晚餐，平时不能出街。有事出街必须请假，防逃跑也。官兵之间厉行打骂禁、闭制度及按级监视制，即连长监视排长，排长监视班长，班长监视士兵，士兵逃跑，班长要负责的，最近营部设指导员，由特务学生梁运烈、刘廷岳、林厚民等担任。每天上午十一时至一时左右则对兵士举行精神讲话，初时似乎很认真，但听得厌了，讲的也厌了，近来刘很懒慢了，有时一星期举行一次，有时则因勤务（放哨）太多，士兵不愿听古。连、排长的生活一般说来都是

颓废浪漫的，平时多在茶楼消磨时光，晚上有时亦如是。

4. 夜间各营房的警戒情形：县府方面，前门及两面木闸哨兵四名，负责前门警戒；后园方面，东西两个了望哨亭，各有哨兵一名。党部大楼有哨兵一名，镇小东面之课室后东北角有掩体一个，哨兵一名。东北角环城炮楼有哨兵三名至五名。林家祠方面有掩体两个，一在林屋巷中，与李家祠之横门相对，另一个则在林屋巷尾（近镇小学楼旁），为一单人之哨兵掩体。

（二）林志茂第三连驻张家祠，据调查所得，现有人数两个排，另一个排派往先农将答，现驻张家祠之人数约五十名，附粤造轻机一挺，市桥厂轻机一挺。

营地形势（如图）：西面隔一小巷为第一营营部，有卫兵约十名，长短枪各半。东面隔一菜地，为李家祠即种惠书院，第二营后方办事处也。有军眷及后方办事人员多名（未详）。种惠书院之后楼为无线电台（有一横门可通张家祠前之空地，横门口有一小园，以篱笆围之。张家祠之外围巩固点为东南角及西南角两个炮楼。张家祠之前门有小掩体两个，对面之马路亦有掩体一个可容二人至三人。

1. 营房构造：张家祠为旧式之祠堂，座北向南，前面有围墙，开一头门，墙厚一尺，青砖砌成，门阔五尺。围墙内有石灰地坪，深约丈五，阔约四丈。地坪之上为正祠分两座（如附图），前座为队长室，西座及后座为士兵宿舍。张家祠之后为民房，东为小巷及空地。西为小窄巷，与黄家祠相隔此巷。全间建筑物为青砖砌成，无窗，墙厚约八寸，如明白旧式之祠堂则可以清楚了。

2. 营房附近交通路线（如附图）。张家祠之前为一大草坪，其南为环城南路，东边有一小巷可通县前街，西边有一小巷（杨家巷），与黄家祠（第一营营部）相通，此小巷亦可通县前街。黄家祠之前面为小巷（向南的，名叫莲塘尾）可通范家祠，范家祠之侧亦有一小巷可通县前街。

3. 敌人生活规律与前面所报告的同。

4. 夜间营房警戒情形：前门外之掩体夜间哨兵一名，草坪外之环城路掩体哨兵一名，其外则为第一营营部，亦有哨兵在围墙内了望

出外，可协助张家祠之警戒，另环城路东南角与西南角之炮楼亦可为张家之外卫也。此四个环城炮楼，平时很少警戒，但戒严时间，日夜均派兵警戒，由三人至五人。

(三) 第一连李世瑞，十九日由蟠龙拉回（由联防队派一个分队入蟠龙接防）。现驻公园侧之袁家祠（如图），人数约七十名。

1. 营房构造：为旧式之祠堂，建筑材料和其他旧式祠宇一样，前门为县前街，从外表看来如大住家，有一大门楼，无祠堂之扁额，故看不见它是祠堂。入了大门楼，有一沙灰巷，通入正座，此巷之东墙为花园围墙，已崩坏一大幅，但由此入正座，还须经过一个门口的（如附图），故由崩口不能直接进入正座，但可由此进攻正座。前门有掩体一个，哨兵在此守卫。

2. 营房附近交通如附图，袁家祠之东北角为公园，正北为镇小校墙，西部为李家祠。前门为县前街（李家祠之西隔一小巷则为林家祠），若从镇小据墙攻击袁家祠之后墙，则易受党部大楼威胁（射击），故从公园之缺口进攻较易入手也。

3. 生活规律同上。

4. 夜间之警戒：沙灰巷之外有掩体，有哨兵一人至二人守卫，沙灰巷内正座之横门，亦有掩体一所，哨兵一名，此处可控制缺口之墙。

(四) 龙船庙之驻兵为伪一区联防队，为一孤立之据点，晚间派哨兵四名分左右前三个哨守卫。据士兵反映，他们一有风声都是提心吊胆的，警戒比较认真。现在人数约六十名，十四日派了25人入蟠龙，只得三十余人均为步枪，为最易拔除之据点。其交通路线如图，前面有防御工事，下面为低田，故由其正门攻击则不容易，其后为荒丘乱坟堆，其左为树林，其右为荒坟，高低不平，由此进攻容易。

(五) 螭螭岗之哨岗堡垒，驻兵一班，有交通壕一条，由中学后背直上，四边有防御墙，堆土成之。日夜均有哨兵两名，一守卫，一四面了望。

(六) 集中仓（即瑞贞堂，在汉阳市外），有兵一班驻守，有时由警营，现由第三连负责。日间则一人在门外守卫，晚上关了门子，

在围墙之小炮楼了望，远远见一黑影则大声呼喝。警戒颇严。

(七) 党部大楼有兵一班防守，由驻县府的就近派出，日间则在头门，晚上把铁门关上，在楼上守卫之。

反动派驻宅

属洗马街的：

1. 吴英芳——门牌十七号，即培强药房对面。
2. 梁荣熙——门牌二十九号，亚东商店是他私人开的，亚东商店行下便是他的住宅。

3. 陈鸿炎——春和支店对面。

属西门街的：

1. 陈承德——门牌三十三号（新大屋），美华理发院对上二间，门口上吊着两只灯笼。
2. 叶其峰、谢中柱——（金山佬旧大屋）即陈伯桓宅行上一间。
3. 税捐处长钟明雅，寄住陈承德宅。

登龙街的：

1. 许若愚、陈佑——西山会馆。

属东门街的：

柯仲汉——门牌十九号。

属县前街的：

1. 陈兆云——门牌二十三号。
2. 梁高文——门牌三十七号。
3. 石奇英——门牌三十五号（即旧春和号）。

环城南路：

刘显廉——门牌五十九号，青云餐室斜对面的古老大屋。

父聚街的：

蒋藻生——他的屋是全街最大的一间。

属于敌产者：

1. 瑞贞堂集中仓，地点于漠阳河市圩侧。
2. K党部东邻附城县仓，位县政府背（即县背街）各农粮处。
3. X春印刷公司，位于环城南路警局对面之蒋家祠，内有前后门。

4. 电力公司，位于旧康王庙内，贴近河边。

属于官僚资本者：

1. 振昌行——登龙街，柯昌藩米铺现有资产；猪十二只，右邻李聚兴宅，左邻陈宏和宅，背靠大鱼塘。

2. 同兴行——县前街四十七号，马太璞米店兼屯积居奇。

3. 恒泰——洗马街二十号，春中缴谷处营米业，对面宏卢，曾明林住宅。吴英芳所属。

4. 亚东商店——洗马街农民行斜对面梁荣驹开，营布匹杂货小型生意，右邻自己住宅，左邻收水银铺，正对面为幼重婆屋。

5. 巨栈——洗马街，右邻为天寿药房，对面为巨栈家眷住宅，为县府军粮碾磨处。李家和兄弟共属。铺背据鱼塘。

6. 民生——雅铺街×号，其北为盈利熟×店，其南为汇源。

现在为先农乡购大枪之谷的谷仓。

与官僚资本有关的：

1. 荣丰栈——于洗马街尽头闸口处隔闸处，名荣丰栈（闸外），一边营京果，荣丰一边营菜种、布匹（闸内），该布匹店对正陈鸿炎住宅，铺面货物布置为全市第一，该铺属阳江人黄宝崧、蒋藻生，常与县府密切来往。

2. 同安药房——洗马横街闸口处，近青石桥，营药材，范启程所属。

3. 美洲洋服店——洗马街。对面刘鸿伟律师住宅。右与曾广梅楼相邻，左与刘义兴收水铺仔相邻，背靠鱼塘，为吴英芳跛早所属。

(1) 县府专命令：黎家斌指挥缉获民主。党同志，于闰七月十七日在于联防办事处（即西门街博爱善堂）扣留，刘同志回县府。

(2) 沙万前十天，在阳江扣留同志六名，枪十一枝，外途去一名，实缉获五名，后由阳江县府枪决二名。

(3) 沙万行踪：现在沙万在阳春官亭口西河，七艘船住不日定由电船下阳江，呈报工作报告。

(4) 沙万性格：沙万乃阳江指挥部第一名密探工作者，年近三十岁度，个子肥大，面圆眼细，头脑留红毛庄，不长不短，身穿黑胶

網，白底笠衫，查悉由二十四、二十五两天返江城，或由民船运渡去不定，希派同志给密查船，可除害虫，不至妨碍同志工作。

(5) 团队情况：同前日一样，无大变化，现拟内保警有戒严工作，由黎家斌报各同志接近春，故施行戒严工作。

第一连驻守县前街李家祠，第三连照常守张家祠，第〔二〕连守县府，第四连守春湾合水圩，第五连守龙门河口金堡，第六连未明驻守何处。

(6) 黎家斌前数天上三湖工作，无什情报。

(7) 春湾欧风（即欧才记、欧新三）应特别注意，极应铲之。

闰七月二十四日照希

（公历九月十六日）

(8) 县师教导主任刘大材和他由阳江带来的女生指导员关小贤监视学生甚严，无论在任何时候，学生有不到上课或自修时，立即叫教员协同往找寻。有一次夜晚自修堂有三个女生缺席，他惊惶失措，马上派人去追寻，闹得哄动了全校，原来那三个女生是在礼堂后面谈话。刘某同黄允熊、丁衍钦关系甚密，丁在他家乡杀死了妻子后，曾逃在黄的家里躲避，后来才去南京的。这次是黄允熊叫他返来做中学的教务主任。

(9) 由匪县党部〔组〕织的戡乱建国宣传委员会，是由刘做主任委员，林举铨为副，中学校长及中心小学校长为委员，规定各校组织宣传队，由校长或教导主任为队长，按月作工作报告，如有不成立宣传队的学校，校长当失职论。

旧四月二十四日

(一) (A) 旧四月二十四由陈书时出汽油专汽车五架往接防军，下午载回军队一百六十余人（据称为四个连），配有轻机十五挺，重机一挺，步枪一百二十余枝及航空曲手枪数枝，其余无武器者皆为夫及弹药兵，此队人查为肇庆保安师方日英部之第六团第二营，营长香耀潘，闻说甘接广州某副师长电话，本派驻河源县之保安十三团来江，但因该团中途叛变，故改派该营来（此营亦原驻河源县）。该营至三埠时，被三埠拦着要兵，如阳江不是专了车去接，怕一个兵也没得来，

可见现K军队实不够分配，各地均向当局要兵，故估计驻阳江之兵时间不会久就要调去，但其械颇足，我要及时留意。(B)旧四月二十一日，因阳春情势紧急，故驻江之某连已调往阳春。(C)旧四月二十一日又由海道运来军队五十四人(番号不明)配有轻机六挺，其他枪械未详，此队兵多为阳春、信宜、新兴人。(D)该保安营来江后，其驻地如下：(1)营部设南门东关巷关岳庙。(2)东门二里茶宁上之东岳庙。(3)北门、独候公及金鸡阁。(4)西门在下濠苏屋祠及下濠小学。这次驻地，在城之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布置得相当周密，有事时可互相呼应。(E)据说旧四月二十三日有两车军队由江电路去了，又有些搭船由漠阳江直上，似经阳春，又有些调往灵山经过，闻说皆为保安队人，其人数不详。

(二)旧四月二十日，伪府召各机关代表及地方绅士开欢迎省军筹划清剿座谈会议，出席者有甘青池、张希杰、林振玉、谢彦华、王思补、抱愚、沙世祥等。其开会情形如下：(A)议决于明二十一日各机关派代表一人带同青菜二百斤，鹅十只，油一百斤，猪肉二百斤赴驻军地犒劳。(B)议决每月津贴省军官兵港币一千五百元，此项数由全县修复电话费全部拨支(此款项本出于东平闸收沙扒织资四澳之出入口捐，每月收入共约三千元，一半(一千五百)用来津贴县保安营，其余一千五百元则用作修复江织段电话用)渠认为省军来了，治安当无问题，电话迟些修复当不成问题。可见K库经费现已十分枯竭。(C)为配合省军到境，发起组织剿匪宣抚工作团，推谢彦华、王思补为策划委员，留城策划工作，张希杰、林振玉为该团正副主任，选用团员六人随军出发。当时张希杰提出“渠”工作多，不能离职。后经甘责其不愿下乡，在这严重时期还不敢负起责任，专责以大义后，张才答应。可见K党人物现大家都想推卸责任，为自己打算，更见我在乡力量强大，不敢下乡了。至于团员有人提出由K党部内职员中选用，某代表话现党部内职员皆已停薪留职，大家没饭吃，怎肯做工，抱公、世祥同声说“可惜我非党员，否则什么工我都肯做”。后由甘想出办法，说现县保安营尚有少数空额，每个额每月有谷250斤，现可将此谷津贴各团员。

(三) 旧四月二十二日K党部书记长谢彦华辞职照准。K省党部改派刘真存接充、因派系气流关系，K党部秘书张希杰亦提出辞职。

(四) 旧四月二十日伪第十区专员李江聘沙世祥、陈抱愚为该县顾问，陈立彬、叶潭芳为该县参议。此举以联络地方恶势力，准备以后积极对付我。

(五) 宕中中学因班际球赛惹起纠纷，因为学校处理不当，故惹起风潮，先由两班（二年级）罢课，继又有一班响应，发出传单，指出校长陈炳霈藉学渔利，倒行逆施之罪状四点：（1）拼命搜刮学生金钱，贪污舞弊。（2）混迹商场，无心教育。（3）学校设备缺乏，一片荒凉。（4）任用人格卑污教员（吴恩沛）。并要求学校当局彻底觉悟，赶走吴恩沛，才回校上课。校长陈炳霈对此事十分慌张，更得教员梁汝明之怂恿，经县府请兵镇压。县长甘说此事可能受红军利用，故派出武警察到校弹压及便衣警探一小组到处调查，该小组负责人阮△△、庆华、称必要时可捕捉学生，现此风潮仍未平息。K县府认为当前学潮情势严重，乃于四月二十三日召开对付学潮会议，议决用突击方法提前考试（新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五日结束）。又扶东中学训育主任雷启江带两班学生去旅行而参加了队，但也有一部分回校。此事报纸无载为县府传出。

神州 旧四月二十四晚
(公历5月21日)